紅都女皇



江青同志

Comerade Chiang Ch'ing
by
Roxane Witk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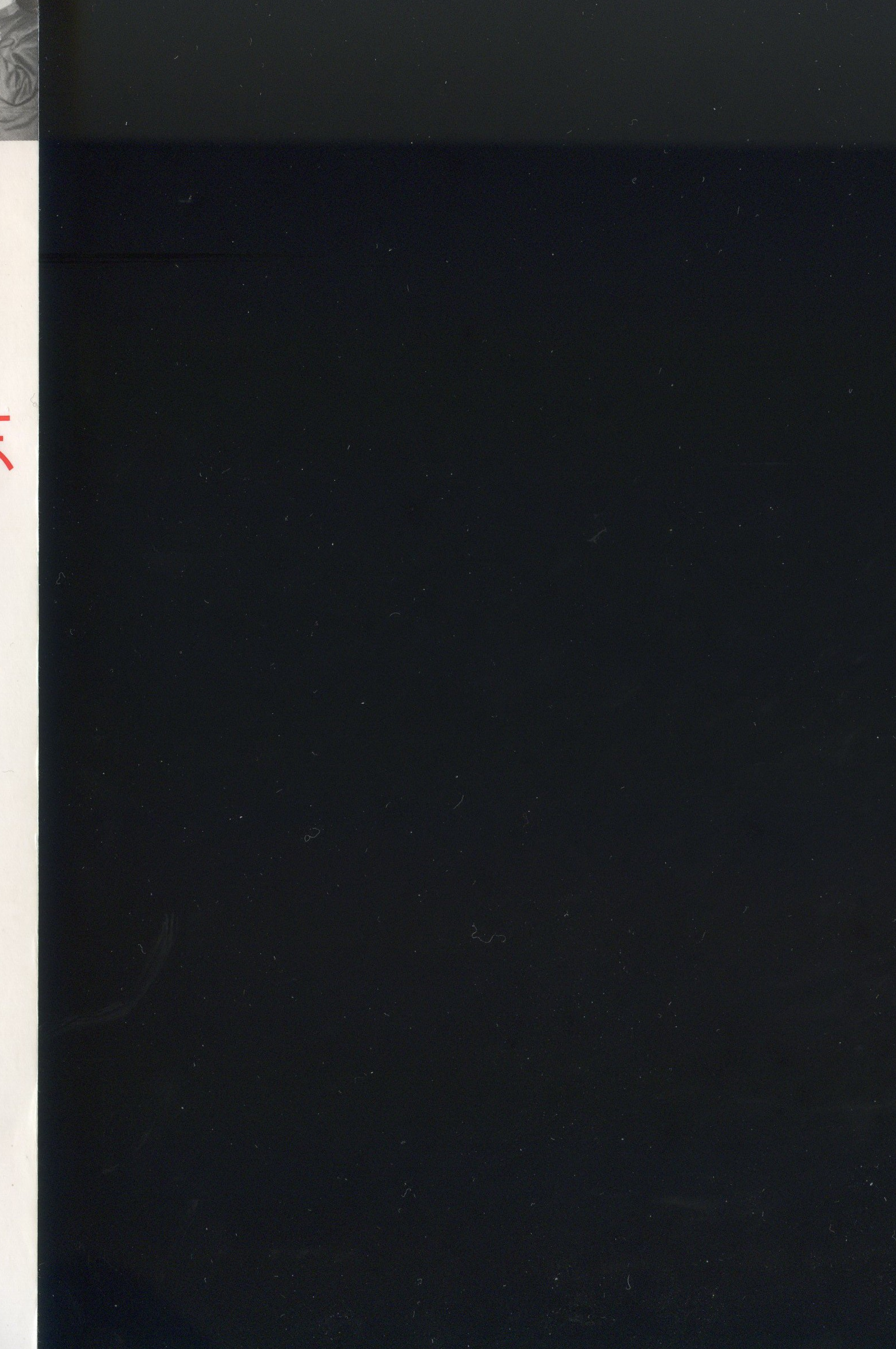
作者＝維特克
Roxane Witke

毛澤東為此書震怒
江青因此書而失寵

後中文版終於面世

叢書

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



紅都女皇

江青同志

Comrade Chiang Ch'ing

羅克珊·維特克
Roxane Witke

范思譯

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

紅都女皇一江青同志
羅克珊·維特克著
范思譯

Comrade Chiang Ch'ing
by Roxane Witke

ISBN 988-98295-4-1

English edition published by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7

Published by Thinkers Publishing Limited 2006

香港筲箕灣郵政局郵政信箱44465號

發行代理：田園書屋　電話：2394 8863

定價：港幣$120　新台幣$400

中文版說明

1972年的《紅都女皇》事件，是十年文革中大陸家喻戶曉的話題。當時傳說江青與來訪的美國學者維特克夫人談話60餘小時，後者據此寫成《紅都女皇》一書。毛澤東看了由香港出版的中譯本大發脾氣，江青就此失寵。其實這是誤傳，維特克(Roxane Witke)根據江青談話寫的這本書從來就沒有中譯本。我們現在出版的《紅都女皇——江青同志》是第一個真正的中譯本。

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無疑是中共歷史上最具戲劇性和神秘性的人物。在權力頂峰時期，她被封為「文化革命的旗手」；在成為階下囚以後，她又被指為禍國殃民的「白骨精」。江青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誰為她提供了在中國政治舞台上表演的機會？又是誰縱容她在這個舞台的前沿盡情地表演十年之久？關於江青一生的真相及其解讀，是二十世紀留給中國人的一個迷。1972年8月，江青在北京、廣州與維特克談話10次，共60餘小時，希望維特克在美國為她寫傳。江青在談話中不僅自吹自擂，而且大談中共視為高度機密的人與事。可以說，像這樣肆無忌憚披露內幕的談話，在毛時代是絕無僅有的。周恩來知悉後請示毛澤東，封存了江青準備給維特克的全部材料。據說，毛看完有關談話記錄後，十分氣憤，批示：「孤陋寡聞，愚昧無知，立即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事後中共外交人員一再敦促維特克不要出版一本完全是江青傳記形式的書，但遭拒絕。維特克依據自己的筆記寫成此書，1977年在美國出版，名為《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長久以來被人稱為《紅都女皇》。

作者維特克畢業於美國史丹福大學，在芝加哥大學獲歷史學碩士學位，1960年代末在台灣作研究工作，懂中文，能聽能講。1970年，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獲博士學位。她專攻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中國革命中的女權問題，屬於美國知識界的左派。1972年訪問中國時在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任教。維特克是一位成熟的美國學者，沒有被江青利用，在此書中客觀描述與分析了她奇跡般見到的江青，既不盲目吹捧，也不蓄意貶低。例如，她分析江青為甚麼在談話中那麼強調西北戰場，是因為江青要說明「她參與了那場戰事，對新中國的建立有不可忽視的功勞」，但解放後被冷落了，沒有得到領導人的位置而心懷怨恨，文革中「復仇的火焰使她完全瘋狂而失掉理智」，註定了最後失敗的下場。維特克的書是經過與江青近距離接觸以及長達60小時談話後完成的，有大量難得的第一手內幕資料。海外學術界普遍認為，這是一部有關這位文革時期最顯赫人物的嚴肅而又立場超然的力作。

奇怪的是，此書出版近30年，竟一直沒有中文版，人們對此眾說紛紜。維特克在序中提到，中共用高價收買她的版權，使此書不能出版流傳。有一種說法稱，在作者堅持之下，英文版不可阻擋，同意中共收購中文版可能成為維特克在壓力下的一種妥協。儘管這種假設迄今尚無法證實，但我們認為極有可能。此書雖沒有中文版，但在大陸無人不知，近年來還不斷被提及。如張穎的《風雨往事——維特克採訪江青實錄》，葉永烈的《江青傳》，陳東林、杜蒲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鄔吉成、王凡的《紅色警衛》，以及楊銀祿在香港出版的《我給江青當秘書》等。其中以訛傳訛，胡編亂造之處比比皆是。例如，葉永烈寫《江青傳》顯然沒有讀過維特克的書，竟說「當毛澤東得知《江青同志》在西方出版後，曾頗為震怒。」此書出版時，毛澤

東已去世多時，尚能「頗為震怒」，實在是十足的天方夜譚，可見大陸此類傳記的不可靠不嚴謹。儘管此書已經出版快30年了，但在海外的影響猶存，上海出身的密西根大學音樂教授盛宗亮創作的歌劇《毛夫人》前些年在美國演出，盛宗亮把江青定位為「中國男權社會的受害者」，歌劇描寫壓迫與復仇，充滿欲望、背叛、報復與謀殺。思路來源之一就是維特克的《江青同志》。相信中國讀者更有興趣一睹此書的廬山真面目。

有感於此，我們特在文革發生40周年前將全書譯出，讓中國人有可能透過江青的故事，更深入地認識那個但願永不重復的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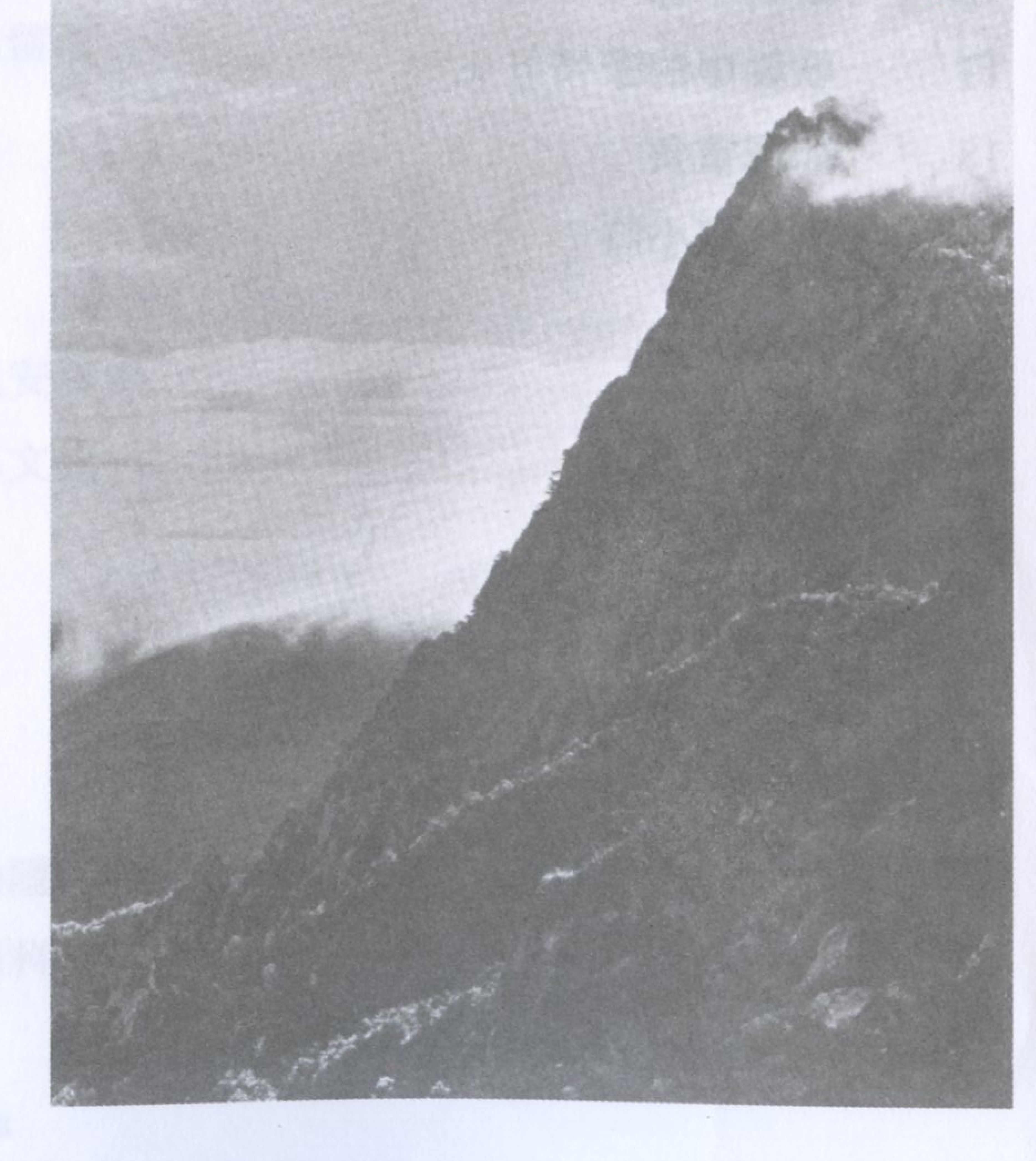
作者維特克夫人儘管是一個懂中文的中國問題專家，但畢竟是一個美國人，因此在記錄和理解江青談話時有很多錯訛和不確之處，且很多錯誤是極其明顯的。但為了保存原著面貌，我們採取將錯就錯的態度。原著的一些註釋和參考資料只是為了幫助西方讀者閱讀，冗長而繁瑣，在中譯本中也被刪除。由於中譯本由多人合作譯出，水準略有參差，譯者已盡力統校，因時間匆促，肯定存在錯漏，敬請讀者原諒。

范思（譯者）

2005年12月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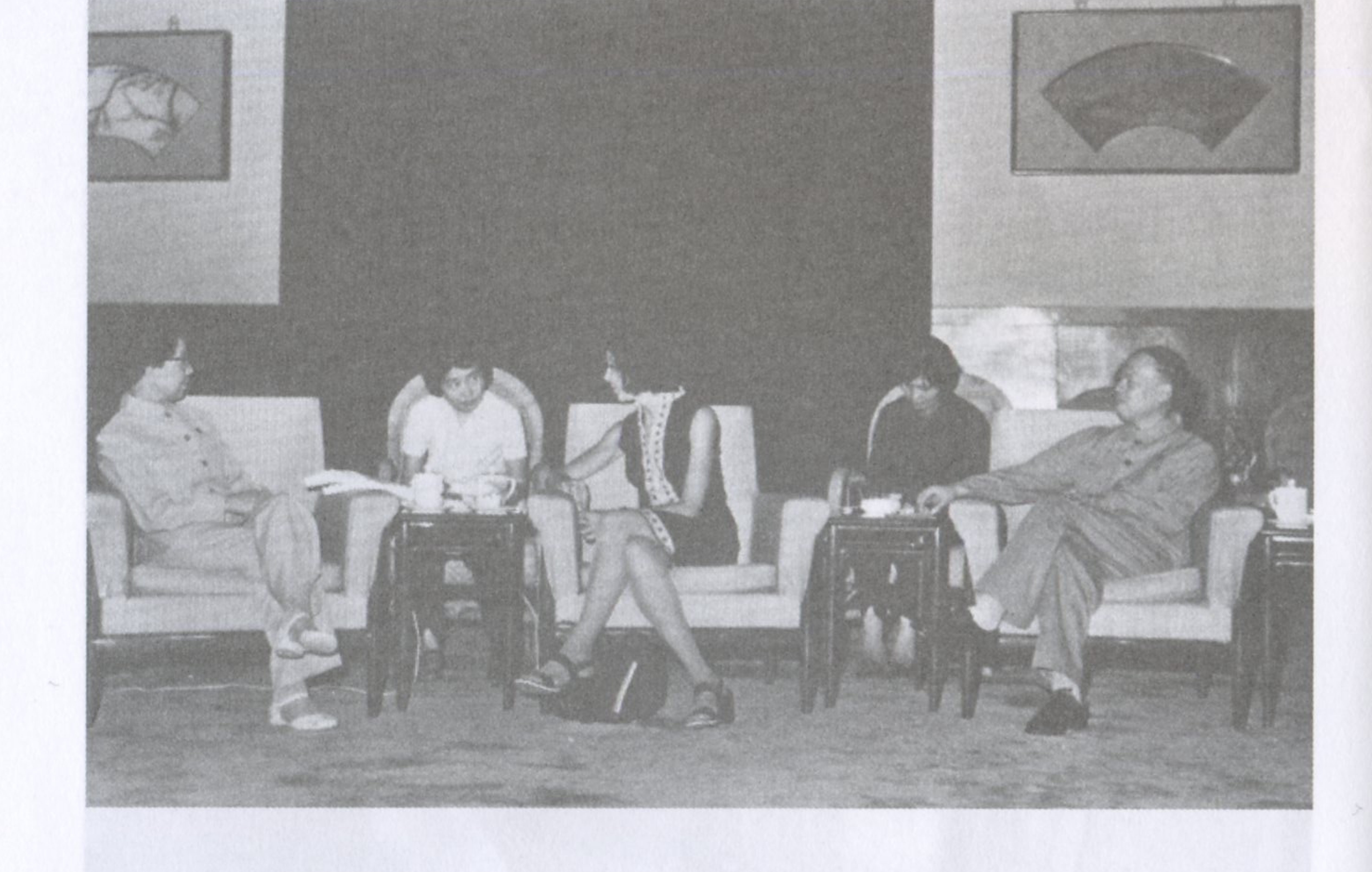
江上有奇峰，鎖在煙霧中。
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



廬山漢陽頂



江青、姚文元和作者在人民大會堂。新華社攝



江青、沈若芸、作者、徐爾維和姚文元。新華社攝





上：在大會堂的烤鴨晚宴上。新華社攝
下：與會者與江青和作者。新華社攝



江青在果園的遊廊。作者攝





上左：沈若芸。作者攝
上右：俞士連。作者攝
下：快活的講故事人。作者攝



江青與蘭花。作者攝





江青準備拍攝她的隨行人員的照片。
作者攝



江青拍攝的牡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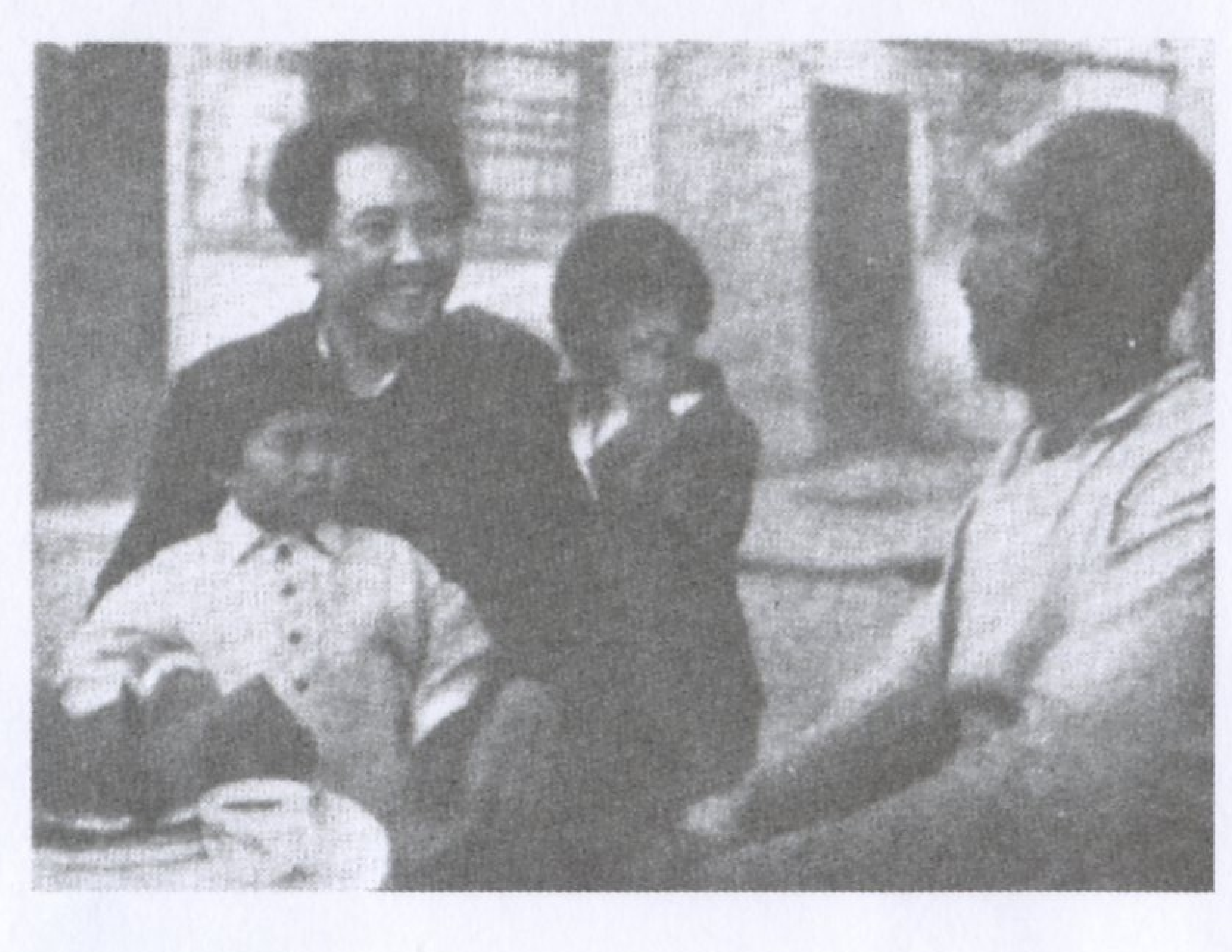
藍蘋

□藍蘋

藍蘋小姐，第一次給我們認識的在舞台上的娜拉，她那種真摯的情感從眉宇際直演映後，射到每個觀衆的心頭裏，她哭，觀衆都傷心，她笑了，觀衆也隨之展顏，因此我們確想到，她在銀幕上會給我們更動人的印象，自由神演出後，我們就肯定了這話。她沒有時下女星們那種浮華的慾望，但卻有最美麗潔樸的希望，她用功，她肯上進，她也是最有希望的一位，在新人羣中。

左：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扮演娜拉
右：江青在馬背上，1939 年





上：毛澤東在延安窰洞前
下：毛和他的兩個女兒：李敏和李納，1944 年



1945 年在延安



1947 年初，江青和毛澤東



江青和毛澤東在延安



江青和毛澤東在行軍途中



毛澤東與貧農民在一起。江青和毛與老鄉共進晚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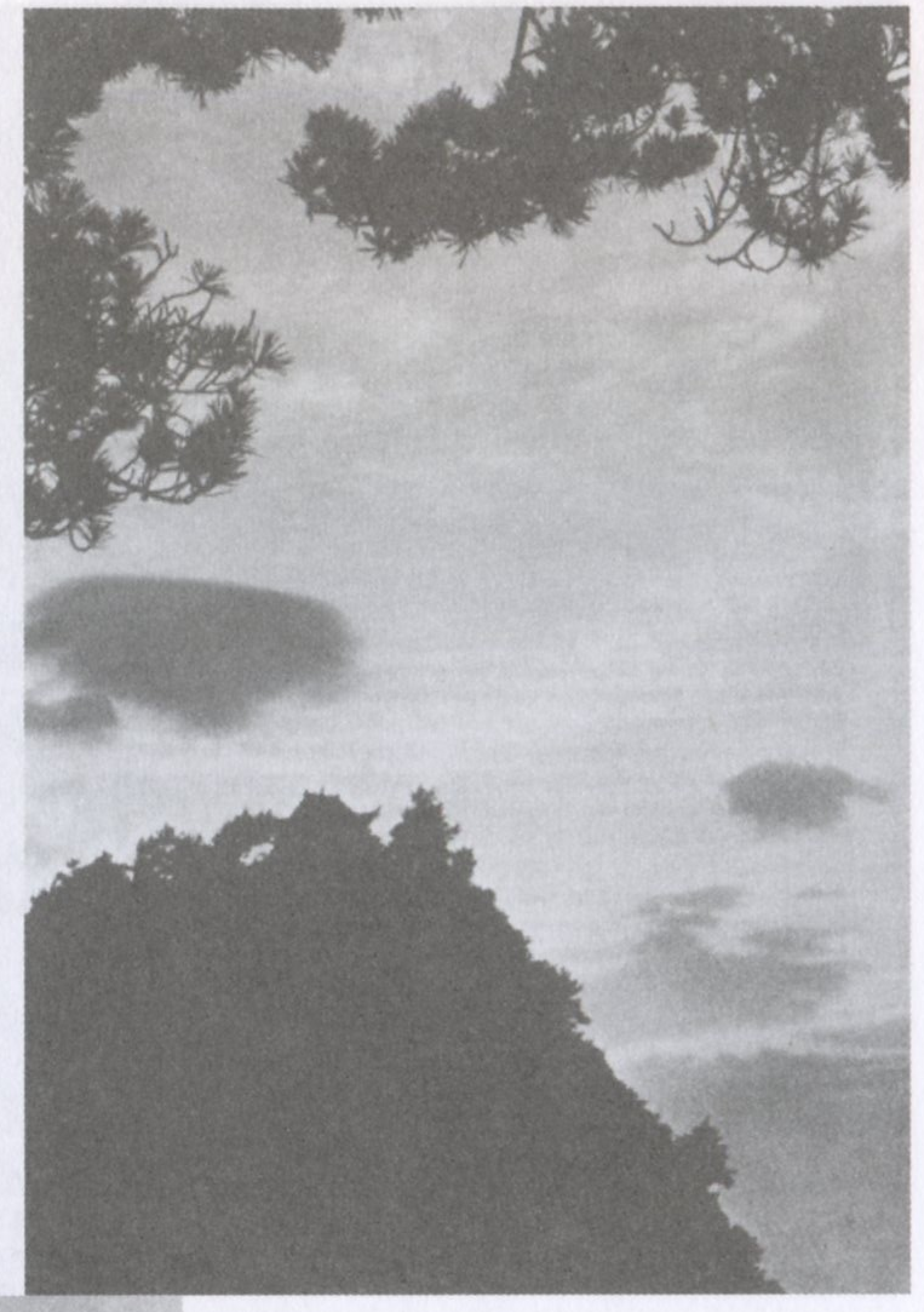


江青和毛在行進的最後幾站之一埋頭文件





1951 年，江青在犁地
1975 年她再次來到模範大隊大寨犁地



廬山

廬山仙人洞

錄 毛主席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

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贈 維特克夫人

江青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

廬山照片的背面，展示毛的四行詩和給作者的致辭

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
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煤山

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



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





上：江青和作者，《紅燈記》演出的中場休息。新華社攝
下：《紅燈記》演出過程中，作者、江青和隨行人員。新華社攝



上左：《紅燈記》中天真的鐵梅和作者。新華社攝
上右：《紅燈記》扮演男主角的演員陳浩亮和作者。新華社攝
下：革命的紅燈照亮了舞台。選自《中國文藝》1968 年第 8 號

1962年，江青和毛澤東











1966年反革命頭子被逮捕的四張照片



上：《新北大》1967 年 3 月刊封面上的江青肖像
下：1967 年 4 月周恩來、江青、康生、張春橋、王力、姚文元等



上：文化大革命當中，江青同解放軍演員在一起
下：江青和尼克松總統，1972 年

上：葉劍英、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周恩來
下：1974 年 9 月，馬科斯夫人和江青



江青拍攝的毛澤東肖像

在人民大會堂，毛澤東的遺體前。1976年9月13日





1976年10月廣州的招貼畫，宣布四人幫倒臺





1976 年 10 月廣州的招貼畫，宣布四人幫倒臺



1976年11月的一張廣州的招貼畫

MAP 1



MAP OF CHAIRMA
毛泽东主
YÜ-LIN
榆林
FU-I-HO
榲义河
内
蒙
古
INNER MONGOLIA
GREAT WALL
HENG-SHAN
横山
SHENSI 陕
西
CHING-PIEN
靖边
HSIAO-YAI-TZU
8.3
肖崖子
8.4
HUO-SHUI-SHAN
8.2
火石山
T IEN-TZU-WAN 田次湾
6.9
6.16-8.1
小河, 6.7
HSIAO-HO
HUAI-CHU RIVER
CH'ING-YANG-CH'A
8.1
青阳岔
4.5
4.12-6.7
王家湾
WANG-CHIA-WAN
SHIH-CHIA-WAN
石家湾
4.4
RIVER
KAO-CHIA
JEN-CHIA-
任家山
WA-YAO-PAO
瓦窑堡
TING-AN 定安
HSU-CHIA-KOU 徐家沟
3.19
YANG-MA-HO 羊马河
LIU-CHIA-CH'Ü 刘家渠
3.18
P'AN-LUNG
蟠龙
PAO-AN
保安
AN-CHAI (ANSAI)
安寨
CH'ING-HUA
青化砭
YAO-TIEN
TZU
姚店子
CH'UAN-K'OU
川口
KAO-CH'IAO-CHEN
高桥镇
YENAN
延安
YEN
RIVER
MARCH 18, 1947, 6 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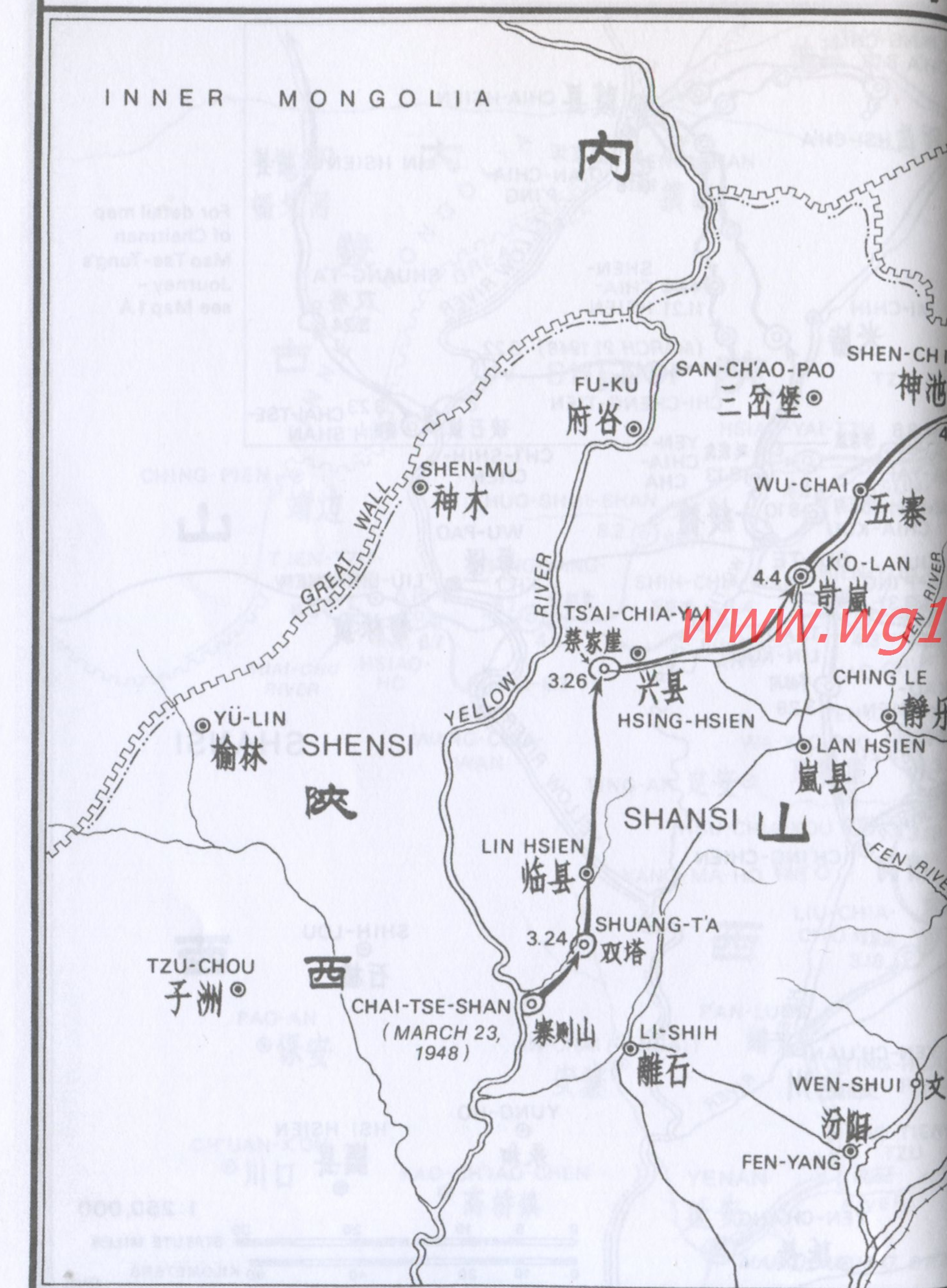


MAO TSE-TUNG'S JOURNEY
行动路线图
LIANG-CHIA-CH'A 8.19
西岔 HSI-CH'A
10.17
葭县 CHIA-HSIEN
谭家坪
10.18
T'AN-CHIA-P'ING
YELLOW RIVER
LIN HSIEN 临县
For detail map of Chairman Mao Tse-Tung's Journey – see Map 1 A
SHEN-CHIA-HSIEN
申家崄
11.21
MI-CHIH
米脂
SHUANG-T'A
双塔
3.24
(MARCH 21, 1948)
3.22
吉镇店
CHI-CHENG-TIEN
3.23
CHAI-TSE-SHAN
碛石镇
寨则山
8.8
李家崖
LI-CHIA-YAI
YEN-CHIA-CHA
延家岔
8.13
CH'I-SHIH-CHEN
HUANG-CHIA-KOU
黄家沟
8.10
绥德
SUI-TE
WU-PAO
吴堡
山
CH'IU-CHIA-P'ING
3.31
WU-TING RIVER
LIU-LIN-CHEN
柳林镇
TSAO-LIN-KOU
枣林沟
3.28
KAO-CHIA-HSIEN
高家崄
3.21
SHANSI
TUNG RIVER
YELLOW RIVER
清涧
CH'ING-CHIEN
SHIH-LOU
石楼
西
HSIEN RIVER
YEN-CH'UAN
延川
YUNG-HO
永和
HSI HSIEN
隰县
YEN-CH'ANG
延長
1:250,000
0 5 10 20 30 STATUTE MILES
0 10 20 40 60 KILOMETERS
SHB

MAP 2

MAP OF CHAIRMAN

毛泽东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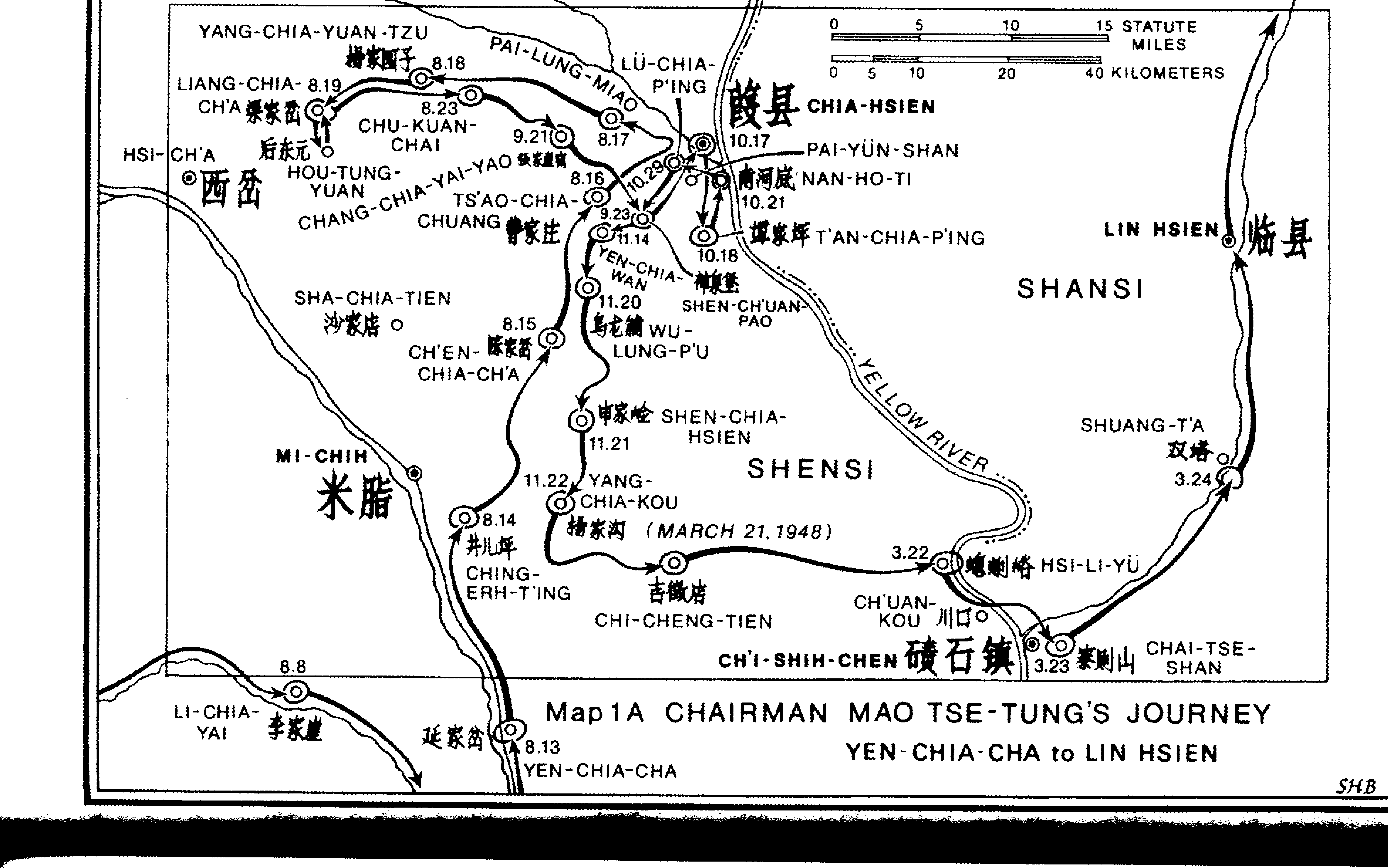
MAO TSE-TUNG'S JOURNEY

行动路线图

INNER MONGOLIA
蒙 古

朔县 SHUO HSIEN
HUI RIVER
FAN-CHIH 繁峙
SHA-HO 沙河
LING-CH'IU 灵邱
平型关 P'ING-HSING-KUAN
HO-HUI 河会
广武 KUANG-WU
4.7 PA-CH'IANG-CHUANG 坝墻庄
YANG-LING-CHIEH 4.11 杨林街
4.6 代县 TAI HSIEN
宁武 CHU-WU
HSI-HSIA KUAN 西下关
4.12
阜平 FU-P'ING
4.13 城南庄 CH'ENG-NAN-CHUANG
4.18 花山 HUA-SHAN
五台 WU-T'AI
CH'Ü-YANG 曲阳
YUAN-P'ING 原平
河 北 HOPEH
HSING-T'ANG 行唐
TA-SHA RIVER
HU-T'O RIVER
5.27 西柏坡 HSI-PAI-P'O
LING-SHOU 灵寿
HSIN HSIEN 忻县
SHANSI
P'ING SHAN 平山
正定 CHENG-TING
MENG HSIEN 孟县
石家庄 SHIH-CHIA-CHUANG
T'AI-YÜAN 太原
SHOU YANG 寿阳
FEN RIVER
榆次 YU T'ZU
HSI-YAN 昔阳
LIN CH'ENG 临城

0 5 10 20 40 60 STATUTE MILES
0 5 10 20 40 60 80 KILOMETERS
1:500,000
SHB



Map 1A CHAIRMAN MAO TSE-TUNG'S JOURNEY

YEN-CHIA-CHA to LIN HSIEN

序言

羅克珊・維特克

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

——毛澤東《實踐論》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一個月後，他的遺孀江青和其他3位靠鼓吹毛的文化大革命方針而掌權的高級領導人，姚文元、王洪文和張春橋，被自稱為毛主席的繼承人逮捕，並被定性為黨和國家的敵人。此後幾周內，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上百萬民衆湧上街頭，聲討「四人幫」企圖謀害毛的繼承人華國鋒，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上海的游行隊伍抬着江青的漫畫像，在她的頸部畫上了一串絞索和一塊牌子，上面用巨大的美術字寫着她的名字，畫像看上去就像幾根骨頭。早在10月，華國鋒就向中央政治局報告說，江青企圖通過一系列非法活動擴大權力，其中包括1972年夏與一位美國女學者之間不同尋常的會晤，指責她要用這次長達一星期的會晤來「建立自己的幫派體系」，並向外國人出賣個人隱私和黨的機密。接下來的一個月裏，政治漫畫牆報咒罵她是「女皇」、「叛徒」。一些牆報展出江青和「美國女學者」——我，進行會晤的照片。曾經擁有的特權變成了對她的懲罰。

江青是現今世界上最有影響力、最長壽的革命領導人毛澤東的第四位、也是最後一位妻子。在我們的會晤和我寫作本書期間，無論中國政府如何限制她的公開活動，她也是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女人。在我們的對話中，她更多地談到在這30年來，她怎樣

通過自身努力，而不是作為毛澤東的妻子，成為一位領導人的。甚至在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及後來處於政治巔峰的日子裏，她的地位也並不穩定。這些不穩定的因素，通過她對過去的敍述被巧妙而着重地描述出來。在那30年的首10年裏，幾乎沒人注意到她，在第二個和第三個10年中，在這個家長制社會裏，無論是過去，還是比較寬鬆的現在，她都一直被自己作為革命領袖妻子的角色所局限。直到第四個10年，當毛的生命力日漸衰竭，更多地作為一個象徵而不是一個充滿活力的領袖時，她才得以大步走向權力。

儘管是高層團隊中的一員，她發覺自己並不為世界所了解。自古以來，中國任何有才學的人都希望永垂史冊。江青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幾個有着同樣抱負的女人之一。本書是她渴求歷史承認的見證，記載着只有她自己知道的過去，並希望後人記住她的信仰和成就。

當然，尋求這樣的個人宣傳，江青冒了很大的風險。因為書寫個人歷史這樣的追求，是在公然對抗共產黨時代的個人定位。從1930年代晚期到1940年代中期，在西北根據地延安，中國共產黨給人的印象是一群年輕、充滿熱情的農村革命者，沒有什麼名氣，或者說名聲不太好，當時的統治者國民黨企圖隔絕他們與外界的接觸，以壓制來自共產黨的挑戰。共產黨通過信任那些鋌而走險進入根據地的記者，向他們展示個人歷史，成功地突破了國民黨的包圍。這些外國記者中，最值得紀念的是埃德加·斯諾，他向中國以外的世界表達了他對這些努力奮鬥的革命者的同情。

20世紀中期，隨着共產黨鞏固了統治中國的政權後，個人傳記的年代結束了。他們開始了對土地和人民的完全改造，並與外國締結了正式的外交關係。1970年代，中國還控制在那些曾經統治延安的同一群人手中，他們更加積極地倡導馬克思主義信條：是人民創造了歷史。中國的領導人此時已經積累了近四分之一世

紀的統治自信。他們邀請了成百上千的外國人訪問中國，希望外國人對這些改革感到驚訝，並向全世界正面和大量地報導被解放的人民。

江青，這個嚴格的中國共產黨員，並不會公然對抗這樣一個公理，即人民創造了歷史，因此歷史必須記錄人民。但她不能忘記，當她在延安依然生活在毛的陰影中時，她錯過了將自己的名字和成就曉喻海外的機會。因此，1972年的夏天，當她駕馭着由她發起的文化大革命時，她抓住機會説服我（我的任務只是報導中國女性群衆），因此有了她為當領袖而獨自奮鬥以及與其他人在毛去世後爭奪權力的經歷。

為了表達她的意思，她通常用間接的方法。她的政治天才，如同過去中國的統治者一樣，要用藝術和文學手段來完善。在她給我的一幅藝術照「廬山漢陽峰」（見卷首插圖）的背面，她抄了一首詩，肯定是毛未發表的詩（風格和內容與他1960年早期的詩詞一樣。）在中國詩歌傳統中，看似寫景，實則議政。他將她比作神奇的山峰，經常掩映在江靄中（江青的江字是「河流」之意）。只是偶爾顯露崢嶸，這裏可能指她的動機。

1

「讓我在你面前剖析一下我自己吧，」江青建議道。她以充滿感情的坦率和獨到的藝術眼光，講述着她生活中的每件事。「剖析」這個隱喻是她思維中的永恒，也是她自述的主旨，這是她從魯迅那裏借來的詞彙。魯迅是20世紀最偉大的批判作家，是一位讓她崇拜的偶像。她的剖析，如同魯迅的一樣，永遠是一把雙刃劍：剖析自己的同時也剖析別人。在不太嚴格的解釋中，這些詞彙變成了自我批評與批評，革命生活中每天的禱告。

江青在我們會晤中的剖析暴露了過多的矛盾和衝突。最引人

注目的是：她一方面被個人的不安全感困擾，另一方面在公衆場合還要保持堅定自信的姿態；她在同志團體中始終採取挑戰者的姿態，無情地奉行極端的革命道德標準。毛對馬克思的認同——辯證法是「革命的邏輯」——掌控着江青的感情生活和觀念世界。從孩童時代開始，她就在衝突中成長。她在青年時代所汲取的馬克思辯證法强化了她的任性和好鬥的性情。這些性情在作為激進的鼓動者反抗蔣介石專制政府的經歷中被加强了。與土匪王子的婚姻給了她革命先鋒的地位。這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她的心靈和頭腦。然而，毛在重大事件過程中對重大問題的獨立思考，以及江青個人的野心決定了她仍不會滿足。

江青的生活、革命以及由此而來的這本書因而也充斥着矛盾，一些讓人費解，一些又讓人柳暗花明。馬克思理論變成的毛語錄集中在大規模的階級鬥爭上（地主對農民、資本家對工人、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大部份外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以觀察這種宏觀的兩極對立為滿足，但其他更為人熟知和更容易理解的衝突也體現出革命覺悟，例如，領導之間、領導與被領導之間、不同性別之間、不同輩份之間、公開和私下之間、知識自由和政治教條之間、人性的「强」與「弱」之間的緊張。儘管江青的正式聲明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範疇內，但她的生活故事則表明其他衝突同樣有意義，更能直接反映她的心理。

總而言之，她所描述的生活，除了稍有一絲的家庭和同志式的聯繫外，幾乎是寂寞而艱難，缺乏信任和溫情。在她與毛的孩子被撫養成人之後，毛在他激進的政治事業上蹣跚前行，顯著的標誌就是引退和思考。因此，江青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獨。在她的中年時代面臨着選擇，要麼默默地老去，要麼在領導團體中爭得一席之地，在競爭中她只有依靠個人的智慧才能生存。因此，從1960年代起，她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之中。在此期間，她形成了自己的政治風格，即深思熟慮的辯證思維和權宜之計的友善，但

本質上是對抗性的。她逐漸完善了從心腹和顧問中獲取絕對忠誠的藝術。他們反過來可以通過政治系統協調下面的人。但是她對他們忠實的陶醉總是伴隨着遭到背叛的恐懼。在拋棄甚至公開誣衊那些政治過氣的同志方面，沒有誰比得上毛澤東更令她疑慮重重。在一個以為人民服務至上，而不是為個人服務為信條的世界裏，沒有哪種友誼不受到「階級立場」的影響。由於她所崇尚的政治標準，她所談及的「剖析」更多的是剖析敵人而不是朋友。

早在1934年，當她還是一個有抱負的年輕女演員時，她對群衆的態度就是矛盾的。即使在那時，群衆也是所有激進政治所追求的終極主題和目標。他們會衝向她用鮮花將她擠壓嗎？他們會謀害她嗎？或者他們會羞辱她，逼着她自殺嗎？我發現，她的個人困擾幾乎永遠與政治密切相關。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她被文化界代表人物周揚及其智囊團迫害的故事。那是一些她內心排斥了30年的男人。這個長長的故事一半出於想像，一半出自真實，直到她掌握了足够的權力毀滅他們。個人的復仇被融合到了為毛的政治服務的方針中，驅使着她要來一場文化大革命，反對他們頑固的「修正主義」思想。在我們看來，這種思想比她和毛的思想有着更多的自由主義。

在她的意識中，她不能肯定毛對她的巨大工程是否支持，特別是當他成為退休的哲學家而不是一位執政國王的時候。焦慮貫穿着她的整個敍述，這種焦慮更像是對毛衝動的合理反應而不是妄想。在否定了他與第一任夫人（一位父母强加給他的農民媳婦）的關係後，他和第二任夫人結婚並放棄了她。她是一位知識份子，為他生下了 3 個兒子。她是作為國民黨對毛煽動共產主義的報復對象被殺害的。第三任妻子在可怕的長征中發瘋了。她在蘇聯長期的流放後被送進了中國的瘋人院。至於他的兩位指定繼承人——劉少奇和林彪，毛突然改變了主意，在他們事業的頂峰毀掉了他們。面對如此的行為，如何能讓作為妻子和政治助手的江

青有一點點的安全感呢？

2

如果不是處在江青複雜的個人環境中，而僅僅作為一個人類學家去認識江青，可能會不理解她生活的合理性。如此簡單輕易的標籤，像「激進份子」、「極左」、甚至「妄想狂」，根本不可能全面體現她的個性，反映她和成千上萬人一樣所投身的革命。當一個社會更傾向於宣揚它必須是什麼，而不是展示它本身是什麼的時候，重塑現實的任務實在非同小可。

傳統的拖累與革命的推動，同樣讓當代中國發生着驚天動地的變化。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關係在任何地方都是以政治動力為核心的。思想家孔子，一位人們信奉了二千多年的倫理和政治法則的導師，將統治者對於人民的作用比作風之於草的壓力。通過內在的德行和外在的行動、言語和行事，統治者為人民樹立了榜樣，人民大多服從於他們的道德力量。

共產黨的領導們從他們的運動開始之初，就有意無意地利用了這個觀念。然後將其發揚光大，影響着所有的支持者。「領導同志」（最高團隊的領導者自稱）要給人民樹立道德和行為的榜樣。為了鼓勵群衆廣泛響應，其中的個別人因服從中央的道德力量而得到嘉獎。群衆中最傑出的人被樹立為當地的榜樣。這個競爭的進程一直延伸到統治的最基本的競技場——家庭、學校和工作單位中。在整個政治結構中，在最底層實施的政策源於最高層。

是誰掌握着歷史？是誰創造了歷史？是早就處於高層的領導人和新從群衆中選拔的領導人，如儒家傳統早已暗示過的？抑或主要是人民大衆，如馬克思教導的，並為中國共產黨所確認的？江青，如同她所代表的政權，所有言行都要符合這兩種傳統的範疇。而且，如果哪一邊都不適合她的話，她就要生活在兩個社會範疇的邊緣。

作為一名女性，她經常陷入兩難境地。作為群衆的孩子，她背棄了家庭，學會了通過表演藝術贏得人們的欣賞，並通過奮鬥達到革命權力的頂峰。她和毛的婚姻一方面確認了她的成就，同時使她看起來被置於一個所謂男女平等的新社會的頂端。但實際上，她被迫呆在一個偉人的陰影裏，排除在領導們的討論會之外，並脱離了正在開始改變歷史的群衆。在她的中年，她通過利用其他有權力的男人和表演藝術擺脱了主席的控制，恢復了她與人民群衆之間的聯繫。只有他們才能給予她政治合法性和一生永遠革命的安全感。

對江青來説，執政的國民政府1930年代鎮壓不滿者的決定，特別是鎮壓像她這樣的激進份子，強化了她在群衆中生活的艱難。此外，性別也是對她不利的一面，即傳統對女孩子的蔑視和對女影星的詆毀。在西北解放區與毛澤東的命運相連，激起了另外的偏見：一是反對更年輕的女性取代上年紀的妻子；一是反對領導人的妻子尋求與衆不同的地位和與人民的直接關係。江青，作為1960年代自我提拔的領導，還捲入了與另一個傳統的衝突，並且這幾乎是普世性的傳統，即藝術權威是男人的天然權力。在文革中，她主導了極其重要的文化領域。在當代中國，這是傳達政治思想、決定人民覺悟的領域。比起同時代的任何女人，她更多地使尼采哲學凌駕於她那一代人之上，並越來越以福斯坦信條生活：沒有她不能掌握的藝術，不能了解的科學和不能攻克的領域。

從兒時自發的叛逆者，江青演變成了一個極端的女人。由於她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政治覺悟，她痛恨中間地位。在她周圍的世界，她憎恨中產階級。在她控制下發展的戲劇中，她從舞台上掃除了「中間人物」（那些不代表階級極端性的人）。所有她的項目都會不計後果地進行到底。一些事情對她來講是不真實的，除非傷害了她或另一個人、或一個社會階層。她不斷冒險，通過自己的勤奮工作，改變着過往形成的觀念。文革的即興風格，顯示

她有意識背叛共產主義政治中某些令人厭倦的虔誠和老式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堅持從權力和責任中驅除女人和年輕人。

儘管在男性統治社會中，她有各種理由成為一名女權主義者，但她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女權主義者。當她偶爾提及中國女人面臨的困難以及她們變化的地位時（她沒有評價西方女性的情況），她幾乎從不抱怨。儘管這經常是真實的，即男人們特別地針對她，或普遍地阻礙她發表意見的權利和權力上升。她沉默的理由主要來自於意識形態。對於中國的過去，用馬克思的觀點來看，女權主義運動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階段。因此，中國共產黨解釋這一教條說，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女人必須放棄性別鬥爭，加入階級鬥爭，與她們的無產階級兄弟一道反對共同的壓迫者——地主、資本家和帝國主義。每當江青在我們的會晤中發泄對男人的不滿時，她攻擊他們的「修正主義」和「反革命」企圖，但只是偶爾攻擊其「大男子主義」。大聲宣稱共產黨領導層被男性愛國主義者盤踞可能引發這樣的問題：當前的政權是否成功進入了社會主義階段？是否違反了傳統和革命的觀念，即領導是人民效仿的道德楷模。出於大部份的政治和個人原因，她不能挑剔丈夫。畢竟，毛主席在女性群衆面前是以她們的支持者形象出現的。這位領袖給她們灌輸了這樣的驕傲：「婦女能頂半邊天」。

江青應該作為一位具有超凡勇氣的人、轉折時代的女領袖以及革命先鋒派領袖被人們記住。她是封建時代的殘餘，當統治者娶了無權無勢但美貌的才女時，她們中的一些人最終得以在君主背後弄權。前仆後繼的民族解放運動很少將女人送上最高領導層，但文化大革命使窮人、年輕人和女性達到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高的社會地位。儘管江青到達權力頂峰道路的第一步與婚姻有關，她最終達到的權力，召喚其他女性無視與丈夫或家人的關係而走向政治權力。

如果江青的政治生涯基於革命（農業、工業或科學進步）的

物質層面——我的歷史重塑工作也會容易得多。很少有人會反對這個觀點：增加食品生產和均衡食品分配，必定是一個經常鬧饑荒的大國所追求的基本目標。但江青爬上革命控制塔的時候，經濟在長期掌權的男人監管之下。其他人被確立為政治真理——意識形態的衛士。不過，非物質的一面在馬克思語言中構成的「上層建築」——更吸引江青。毛自始至終都知道，對於革命領導權最大的挑戰是能否控制人的思想，以無產階級利益的新名義，鼓動那些沒有知識和受過教育的人拋棄若干世紀的舊價值觀。正如江青的敍述中所表露的，中國的領導人和觀察者一直思考着道德以及革命手段的問題，包括宣傳的使用和濫用問題。總而言之，我們關於領袖們做出選擇的私下思考了解很少，遠不如對他們公開決策的了解。

意識形態經常被說成是孤立的。外國記者和政治分析家將「理論家」或「激進份子」當作同一個陣營的人。然而，在中國，意識形態還是和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密切相關的。思想和行動的關聯困擾着江青，她的主要工作是管理人們的思想動機。例如，如何能激發工農通過推翻社會監管者（地主、資本家等）去打破世世代代的習俗。實際上，這些監管者在他們的眼裏更多的是家長作風而並不是殘暴。如何能調動起上百萬年輕人反抗孔子之道，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師道尊嚴那一套？如何讓女人學會勇敢地和男人分庭抗禮，儘管她們在習慣上對男人五體投地比向男人叫嚷更舒服。如何能讓多少個世紀都遵循古老生產方式的人有創造性，以便達到前所未有的生產目標？如何讓新生產者在精神上更有效地被激勵，而不是靠物質刺激？

對於這類問題的回答，依靠史無前例的極端執著去改革激勵語言和獎懲系統。在那個無情推行上層建築產業的1960年代，江青以總工程師的形象出現，揮舞着毛主席設計的藍圖。在他們的世界裏，在規範公衆對現在和過去的觀念時，她，毛以及他們的

支持者都不能容忍任何對抗性權威或權力。

「一個了不起的作家，可以說是國家的第二個政府，」索忍尼辛在《第一圈》中這樣寫道，那是他在被迫害前幾年寫的。因為沙皇傳統被西方自由和自由主義的概念極大地修正了，蘇維埃被迫容忍一個或多或少的、永久的反對派。但中國的獨裁帝王傳統基本上在毛澤東的政府繼承以前沒有被這樣的思想觸及過。上百萬支持者的贊同淹沒了異議的聲音。這種聲音首先出現在向同樣獨裁的蔣介石政府發起自由挑戰的轉折時期。不支持毛政府的作家要被鎮壓、被迫害或接受思想改造的「拯救」。

在毛的統治下，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這些在我們文化中必需的，被譴責為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和反革命的。當江青從對抗一個中央政府（1930年代的國民政府）轉變為維護另一個（毛澤東的）時，她變成了精神王國的靈魂，上層建築的女長老、全國無產階級文化陣綫的女領袖。假設中央政府是真正的「人民政府」，一個「第二個政府」，不論是左還是右，絕對是不需要的。

江青和毛，一個被免職，一個去世，將不可避免地被作為凡人和領袖來比較。儘管他們在才能和謀略方面的差距是明顯的，但追求的事業卻是共同的。江青的談話和陳述，缺乏意識形態的精彩和對歷史的充分把握，缺乏內涵、鋒芒和詩那樣的節奏。她的不公正和荒謬的暗示不時削弱了毛澤東被粉飾過的形象。江青學會遠離公衆領域而生活，並將她的政治生涯交付實踐的檢驗。更重要的，與評價她以及她通過本書給予中國人的貢獻相比，她的生活故事和對她影響的評價可能對歷史更重要。

江青同志有着特殊的魅力，這在中國盡人皆知。我在近距離內能感受得到，但在遠處這種魅力便消散了，在她的寫作中已經徹底失去了。不管她年齡的話，你會發現，她展示出一種來自巨大權力的特殊吸引力，或被稱為魅力。她令人驚嘆的獨白被戲劇

性的情緒左右，從暴怒到溫柔，再從溫柔到興奮，就像她所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大衆面孔一樣善變。她在政治領導上的「明星氣質」，不是過去演藝生涯的簡單殘留，而是產生於她對歷史地位的自我意識。無論是在公衆還是私人場合，她同樣表現出能言善辯。她個人的活躍，解釋和反映了人民對自己國家出色的京劇的欣賞力。

3

本書是在江青表達了出版願望的情況下得到「授權」的。在公開發行前，她從未要求審閱手稿。我們第一次在北京的會面，我沒有準備，雖然帶了一個筆記本，但聽得太入神了，沒想起用它。她涉及的話題很廣泛，有些輕輕帶過，有些談得興致勃勃。會晤記錄的副本在兩周後才給我，她解釋說，為了「準確和謹慎」起見，會晤記錄經過周恩來總理、姚文元（江青的筆桿子）及其他一些領導同志（其中沒有包括毛）編輯過。如我所料，一些詆毀林彪的驚人話語及其對於她身心健康的傷害，從官方記錄中刪掉了，但沒有從我的記憶中消失。應她的要求，這些細節也沒有出現在本書中。

接下來的會晤中，我不斷作筆記，儘管江青保證我會像第一次那樣拿到一份記錄副本。她說，這些記錄是根據錄音帶事後整理，由一個或多個書記員抄寫，包含了我們邊走邊談的大部份內容，這部份內容只記錄在書記員的筆記中。儘管書記員們很有效率，而且我對江青說到做到的能力深信不疑，但我還是準備了自己的記錄，包括她說的大部份話以及我對她的觀察，她的言談舉止、行坐起臥，以及其他人的參與。如果需要，我的筆記完全可以與官方許諾的記錄相比。官方記錄一旦經過周和其他領導人的政治編輯，難免會有其內在的利害關係。

在我1972年返回美國後的一年多，通過中國駐聯合國大使

黃華及其夫人何理良提供的外交渠道，江青和我互相交換了很多書籍和照片，兩部紀錄片以及各種信息。不過，那些餘下的談話記錄有幾個月的時間杳無音信。我不時收到傳來的消息，說他們用兩種文字（中英文，就像第一次一樣）準備文稿的工作非常繁重，但他們最終會提供的。1973年5月，我終於得到何理良的正式通知，說我和江青的談話記錄「太長太繁雜」，不適宜作為黨和政府的正式報告發表。她向我承諾（她和大使在其他場合多次重複了這個承諾），我可以自由發表第一份記錄（這部份資料與江青後來告訴我的完整經歷密切相關），並以我自己的記錄發表，但我最好不要寫成一本「傳記」（這會違反馬克思主義原則，即是人民而不是領袖創造了歷史。而且中國共產黨認為，毛才是真理與智慧的唯一體現），要「以毛主席的觀點」書寫革命歷史，其中有一章或兩章寫江青。

「但我沒有見過毛主席，因此不了解他的觀點。」我回答道。

「你可以閱讀他的著作。」何理良說。

其實很多外國人已經讀過了，我告訴她，但對於主席的個人觀點，我沒有什麼新的內容可以增加，那都來自江青的敍述。我當時明白他們已接到命令，取消先前江青要我完全按照她的「角度」來發表的委託。

除了第一份以外，後來的記錄都沒有給我，這在一開始確實令人沮喪，不過後來這件事反而變得饒有趣味，因為我發現面對的是中國領導人之間明顯的矛盾和利益衝突。從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人對我不太自然的熱情中，我察覺到了細微的焦慮 。我知道這只是複雜、深刻的分歧和裂痕的外在表現。僅僅看毛主席的總結和指示，那些內幕不可能為中國公眾所知。但從長遠來看，他們不交出江青談話官方版本的決定，使我有了出版這本書的自由。我可以寫下她說的話，外界有關的評價，當然也包括我自己的解讀，而不僅僅作為江青的傳聲筒。中國領導人之間的矛盾衝

突也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其中一部份。例如，江青一直答應會把記錄交給我，而且我在中國時，她從未食言。難道是她自己突然改變決定不再授權了嗎？也許那個決定是毛做出的，或者毛是受人教唆，那些人不滿江青喋喋不休為自己樹碑立傳，泄露領導人之間殘酷爭鬥內幕，以及輕率地發表與毛或集體意見截然不同的論調。

這些不可猜測的事情反而堅定了我的決心：採用江青提供的大量口述資料。這本書的編撰工作並沒有對聯合國的中方代表隱瞞，而他們對此的焦慮與日俱增，他們顯然已從北京得知了一些江青與我談話的內容（和來自高層的異議）。最後，1974年1月，何理良（她剛在北京逗留了3個月）再次强烈要求我不要出版完整的傳記內容，或我所謂的「江青同志眼中的革命歷史」。何問我是否記得「五月通知」（1973年5月她和黃華警告我不要寫傳記），並提出給我錢換取我照他們指令辦的承諾。我自然拒絕了。出於對江青最初意願和對歷史的尊重，我感到不能將那唯一的記錄隱藏起來，我要繼續這項工程。

某些中國高級官員想要禁止的，正是他們的美國對手渴望知道的。國務卿基辛格辦公室秘書，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都派了代表，通過朋友和合作夥伴直接或間接地向我索取那些會談記錄和我的個人筆記複印件。我以兩個理由回絕了他們。第一，沒有中國政府的代表嘗試利用我作為美國政府的政治信息管道，談話沒有涉及任何國家安全問題。第二，作為一個到過中國的歷史學家，我所代表的只是我自己，我認為在檢驗這些材料的準確性和判斷性以及編撰此書之前，我沒有義務將我的原材料交給其他人。該書將向一般公衆講述江青不平凡的生活及其與革命歷史的聯繫。

從中國回來後，我在史丹福大學花了一年時間，在哈佛花了2年時間研究。我對江青進行訪談的情況，儘管只是一些片斷，但在學術界及一些公開場合廣為傳播。在那些場合，我只講

述了她的生平，她的同志和整個中國。從1975年深秋開始，在老年、將死去以及新上來的領導人中間進行着更多司空見慣的內部鬥爭，比起平時造成更多的公共影響，而我私下或公開談到的關於那次會晤的隻言片語，被《中國觀察》記者捕捉到了，他們的任務就是關注中國領導集團的起伏。在這些零星報導中，有一篇說到江青與一個外國人的談話太輕率，透露了毛主席的「秘密戰略」，因此導致了她的衰落和倒台，這顯然是誇大其詞，因為隨後江青及其信徒頻頻亮相，地位依然如舊。第二年春天，在公開批判周恩來的接班人鄧小平期間，路過廣州的遊客可以看到抨擊江青的大字報（認為她是反右傾運動的主使者），指責她教唆出版了一本傳記，泄露黨的內部文件，還講述了一些讓毛主席蒙羞的私事。1976年春，同樣的猜測，包括一些不負責任的報導，在國際上傳得沸沸揚揚。例如，說我的哈佛辦公室部份手稿失竊，並被交給當政的鄧小平總理，而鄧又將其轉給毛。

這些有關中國統治者的推測及他們私人外交活動的危險，也是江青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在她的回憶中，一條永恒的主綫，就是她一生中不斷被各種各樣的流言蜚語中傷。這也是女性為爭取政治影響而付出努力時不可避免的。有一次，她曾關心地對我說，希望我與她親密的私人交往以及關於她的寫作不會使我成為謠言的靶子。

江青的情緒多變，她的談話游走於私人和公衆話題之間，一會兒直率，一會兒又很注意分寸；有時是她的個人意見，有時是毛的正統思想，使解讀她的個人和歷史意義顯得尤為困難。本書除了直接和間接引用了她的原話外，還加入了我把她當作一個人和一個健談的人的觀察。必要的時候，我也在她的回憶裏加入了一些歷史文獻資料。她沒有必要的奉承和恭維——也是她政治風格的一部份——在書中被 刪去了。把她的過去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她作為一個主角、講述者和為她的人民

樹立榜樣的任務不可能由她自己去完成，這個難題對於我們這些中國文化的門外漢來說更是難上加難。在性別禁忌方面，在那裏甚至一位最革命的女人也沒有獲得完全解放。此外，翻譯也是一個問題（把漢語逐字逐句地譯成英語並不是很清晰順暢）。還有馬克思主義的術語具有的僵化刻板，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他們的世界觀。

如果主席或中央委員會需要一份純粹讚美江青的作品，他們自己會編撰一份，並用他們自己選擇的語言傳播。經過我稍稍編輯修改過的採訪報導，同時又帶有自述回憶錄的特徵，從長遠看不是為任何人服務，尤其不是為江青——她對世界的看法需要一些解釋。就我們之間的文化和階級碰撞和衝突來說，如果僅僅從一個記者角度，對這些聳人聽聞的故事，憑着感覺匆匆做出評判，就會辜負了她冒險披露個人和歷史見證的本意，扭曲迷茫的事實得不到探索。我沒有這樣做，我寧願選擇用這樣的風格來表現她：用和她在一起的經歷來完善她的敍述和我對她本人、她的世界仔細的冷眼旁觀。正如她曾好幾次自信地對我說的那樣，因為我是一個歷史學家，而不是一個記者。

1

邂逅

我從來沒有告訴過另一個外國人我的過去，你是我要告訴的第一個人，因為我聽説你希望了解這些。

江青 1972.8.12

由於中美關係戲劇性的轉變，我到中國的旅行有了出人意料的進展。這個轉變是繼20多年來美國對中國奉行「拒不承認」政策之後，從1971年夏天開始的。這一古怪政策源於我們在冷戰時期對共產主義的恐懼。這種政治思想在中國的獨特體現讓我們感到困惑。與我們這種出於本能而忽略中國相匹配的，是中國歷史上的自我封閉。儘管後者現在已被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潛移默化地瓦解。馬克思世界觀使得中國人對帝國主義列強慣常的詆毀合法化。不過，在中國共產黨的望遠鏡中，美國政府已赫然出現。在那個基於現實政治的神奇一刻，我們習慣的敵意轉向對了解的渴望。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與周恩來總理的秘密接觸之後，緊接着是尼克松總統著名的北京之行。當我們在電視上關注着這些歷史性會面時，對於中國革命領導人引領八億人民擺脱過去傳統，我們開始重審自己以往熱情與敵意交織的奇詭態度。

這一切轉變來得如此之快。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當年秋天加入了聯合國，中國技巧嫻熟的文化和外交手臂已伸到美國。我國人民對於體驗「真實」中國的渴望突然間變得難以滿足。我的很多同事匆忙趕往位於渥太華的中國大使館申請簽證，我卻沒有這樣

做。儘管中國現代社會和文化歷史是我在1960年代教學和研究的課題，但我在1950年代冷戰時期的成長經歷，使我堅信社會和文化歷史將超越個人的直接參與，保持其「學術性」。

機會和率性結束了我的袖手旁觀。1971年晚秋，我例行來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參加現代中國研討會。那一晚，我住在簡樸的羅斯福酒店。第二天早晨，當我在大堂用過早餐後、瀏覽《紐約時報》時，我的注意力被一個從身旁掠過的人所吸引，此人穿戴整齊、表情嚴肅，目光平直、修剪得短短的頭髮，高領的海軍藍制服。毫無疑問，這是剛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抵達的代表團。這些官員臨時住在14層，而我住在同一間酒店裏居然沒有察覺這奇迹般的巧合。

在下一個約會之前還有片刻空閒，我快步走到電梯間，不假思索地按了14層，當時動機無非是想了解這些嚴肅的來自北京的大使們是否堅持他們的飲食習慣，這是我5年前在台灣了解到的。他們是否還吃那種典型的中國北方早餐：大餅和油餅？也許他們正在酒店陳舊的暖氣上溫熱他們的茶壺？

門開處，兩個高大的警察和一個穿制服的酒店侍者，露出臉來。「您的身份證？」一個警官要求道。我遞了過去。「有何貴幹？」我胡亂說了一通與中國相關的學術研究之類的話。此時，我看到一個穿睡衣的中國人小心地從一扇開着的門後看過來。我趕緊向他打招呼：「你吃飯了嗎？」並問他是否習慣美國城市。他警覺起來，隨即消失在門後。一陣慌亂過後，出現了一個瘦削的男人，他穿着一件短袖襯衫和一條肥大的褲子。在陪我走進一個小房間時，他緊張地自我介紹：「我姓劉。」我們坐下後，他把茶和煙遞給我，都是中國產品。我們用蹦出來的中文、法文和英文開始了一段輕鬆的對話，關於中國的外交變化、學生交換的可能性以及在中美之間開闢一個思想交流社區的可能性。談話是友善的，但雙方都不太明朗。毛主席的名字沒有被提及。

離開時，劉先生輕聲邀請我抽一天來訪。侍者跟在我身後跳進電梯。下樓時巧妙地和我搭訕：「你以為我是一名侍者，可我是一名偵探。不僅如此，我還是約翰．傑伊法學院的學生。儘管我懷疑，但如果你真是一位教授，能不能批改我的生態學學期論文？」他的建議在空氣中回蕩着，我在路上一直往前走，經過幾個行人多的街區後終於把他甩掉了。

那次異乎尋常的見面提醒我，冷戰扭曲了人們看問題的目光。學術研究的甘苦，幾乎使我忘卻：共產黨人也可以用不同於自己所選擇的極端思想所認可的方式去行動和説話。

幾星期後，我回到紐約參加另一次學術會議，那些中國人已經住進了另一座經他們改造的酒店，位於西66街。在那裏，他們開始更有效地與特立獨行的美國人周旋。因為我有幾小時時間，便決定回訪一次，現在不太容易了。因為我打了近20個電話。在那些撥錯的電話中，有一個接通了中華民國（台灣）在聯合國的辦公室（即將撤走），一個男人氣急敗壞的聲音吼道：「共匪不住在這裏！」

花了若干個硬幣後，我終於和劉先生的同事何理良聯繫上了。她是代表團顧問，黃華大使的夫人，黃華大使是這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多年來一直是中國在海外就職的最高級官員。何理良要求我那天下午到訪。在我們的談話中，一會兒用中文，一會兒用法文（當時，法文是她的主要外交語言），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高梁，當時他是代表團的二秘。高梁非常強壯，總是興高采烈的，他只講中文。從談話中，我發現他們通過自己的手段已了解到現代中國女權運動是我正準備出版的一本書的題目。這是我的一項事業，使我能熟悉他們這些「老革命」的反叛青春期。他們還發現我是16卷革命家回憶錄《紅旗飄飄》英譯本的合著者。在評價那套叢書時，他們警告説一些倒台同志的思想「有錯誤」。他們還對我寫的一篇關於毛主席早期文章的研究作品感興

趣，題目是『五四時代的毛、女人和自殺』。當談到社會主義革命中女人的兩難境地時，何理良要我確信，只要女人參加到無產階級鬥爭中來，她們和男人就是平等的。於是，我提到1967年秋、當我完成在亞洲和歐洲歷時 2 年的遊學、返回伯克利時，曾讀到關於江青的新聞報導，並被她吸引住了。這個曾經難以捉摸的毛澤東妻子突然稱霸整個國家的舞台，攻擊老男人和他們的權力機構。我無法抵擋將所有其他工作擱置一邊，以便撰寫她的故事的想法，但事實證明這幾乎是個不可能的工程，因為直到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以往她個人以及她擔當的任何政治角色都沒有被共產黨媒體報導過。統治中心保持這樣的沉默引起了中國觀察家們廣泛而輕率的推測。因為他們吃驚和興奮地看到了一位弄權的中國女人。

那些喋喋不休的中國老紳士也加入了這場大合唱。他們聲稱以前認識這顆再生的新星，那時的她，既不是大美女，也不是驚天動地的女演員，而是一個聲名狼藉、脾氣很壞、不合群的人。這些回憶差不多是千篇一律的桃色事件：電影明星的浪漫史和受傷的心散布在她通往權力的道路上。這些信息是否準確？是否都值得懷疑？倘若所有這些故事的主角是一個男人，並突然之間獲得了權力，又會怎樣呢？由那些討巧的或憤怒的女人製造的性別歧視的謠言，能作為傳記可靠的素材嗎？花費 6 個星期在這種辱罵的唾液裏浸泡，讓我感到噁心。我把這一切扔進文件堆，再也不去看它一眼，直到幾個月後我見到了那個有爭議的女人。

何理良對我所講的江青在海外不公正的淺薄形象感到憤怒。她承認，江青是一位「有獨到見解的革命者」，但我不應僅僅停留在她的過去。為什麼不研究年輕一些的女同志，特別是那些近幾年新提拔到中央的？我是否在意她和高梁替我寫一封信到北京要求訪問中國，研究革命的女人和文化？只有親眼看到這個國家，並與那裏的人直接交談，我才能避免基於外國圖書館館藏做

研究而陷入的謬誤。

我當然不介意，同時也沒把她的建議當真。只是回到紐約州立大學賓姆頓校區繼續教書，並重寫關於1920年代中國女權主義的歷史。幾個星期後，高梁給我打電話，他的聲音裏充滿了興奮。中國對外友協（中國政府與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打交道的機構）已經邀請我「作為個人」在那個夏季訪問中國，不必支付任何在中國的費用，也沒有必要去渥太華。高告訴我，只需把護照寄過去，一本清除了以前訪問台灣記錄的新護照。幾天後，簽證的護照放在一個普通的棕色信封裏還來了。

1

7月18日，我飛到香港。在啓德機場，「我們的朋友」對外友協的代表來迎接我，態度非常和藹。他們把我送到一家不太張揚的酒店。第二天早上，這些朋友的上司賴先生和另外兩人秘密陪同我坐火車，穿過九龍半島到達深圳，這是香港和中國之間的邊界小站。我站在僅從歷史上所了解的文明邊緣，幾乎無法想像現實中的人。早年，我的調查旅行只是從香港的山頭以及金門、馬祖島上瞥見的景象，那就是我們曾經認為的「紅色中國」。遙遠的人影只是朦朦朧朧風景畫上的幾個筆劃。即使現在，景致依然不那麼真實，在革命樂曲聲中，我轉過身，背對着九龍，走過羅湖橋，面對着小説中描述的永恒中國印象：快樂的工人農民站在主角位置，耕作過的整齊田地在他們身後，背景是起伏的綠色群山。在一縷晨光照耀下，現實景象的第一瞥竟有彼得．馬克斯的超現實主義印象。

從深圳，我繼續乘火車到達廣州。兩位當地對外友協的女士負責接待，一位是年輕人，另一位是中年人，她們都很熱情好客。午休（她們把自己的習慣强加給我，我只能假裝睡覺）和一

頓美味的南方風格的晚餐後，我繼續飛往北京。途中，過於謹慎的飛行員報告有惡劣天氣，並決定臨時停在鄭州過夜。那是一次置身煙草工業中心的難忘經歷。我們不能取行李，只好在無產階級富麗堂皇、但搖搖欲墜的旅店藤床上度過悶熱的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們飛完了剩餘的旅程。

在機場，來接我的是對外友協北京機構的工作人員。當我們開過通往首都、綠柳掩映的道路時，我和3位代表攀談起來，他們會在今後6個半星期中做我的陪同。俞士蓮是一位有經驗的翻譯，35歲左右；陳文超，翻譯，30歲出頭，正在接受培訓。另一位女士叫陳明仙，我們一般稱她老陳（老成持重的老）因為她比我們都大，剛40歲出頭，儘管兩位翻譯和老陳的年齡差距不到10歲，但這10年標誌着一個代溝。前者完全是共產主義教育制度的產物。老陳經歷過半西方式的自由教育，這種教育已被共產黨的勝利所擊敗。儘管她不講英語，但廣博的知識和微妙的敏感性使我們之間的交流很容易。因此，我相信，這可以使我在訪問中碰到的難題變得順利。

下榻北京飯店後，他們要求我列一份行程表，並交一份希望會晤的人員名單。日程表包括主要景點和城市，這是很平常的。我建議的採訪名單包括了有希望見到和看起來不可能見到的人，包括本書主角，那是對中國最顯赫的女人和文化大革命權威在形式上的敬意。因為她那嚇人的名聲，當時我根本沒指望會見到她。

三周內，我對北京進行了重點參觀，皇家的和革命的。然後飛到西北，參觀了西安，一度輝煌的唐朝（公元618-960年）首都，並參觀了延安，簡陋的小城，被粉飾成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信徒們的聖地。每到一站，翻譯都安排我會見不同年齡的男男女女，介紹他們的生活在解放後的變化。除了幾個值得記憶的例外，這些精心挑選的新社會秩序的代表們，不是放棄了個人經歷的故事，就是按照現時正統的政治思想路綫將之重新編輯過

了。對於這種強加於人的道德觀和空洞無物的理論教育，我已經漸漸習慣了，但他們不斷的政治禱告令人苦惱不已。我總是提醒自己，他們不是簡單地試圖向我證明什麼，而是在讓他們自己確信，新制度是「正確的」，而舊制度是「錯誤的」。在這些大量安排好的交流中，不同年代的人還是不一樣。有資歷和有地位的人所作的回憶通常是豐富和坦誠的。經歷過創業年代政治嘗試的老年婦女對公認話題的爭論通常是强硬和充滿激情的，特別是關於革命是如何成功的、這一系統性評價。某些人比較機敏和幽默，但幾乎沒有人會憑藉自己的革命本錢，回答一個非政治教條的問題。在不同階層和不同文化之間，任何一類的冒險都是不可能的。比起老年婦女，年輕女人對於敍述經驗和給予判斷則少有自信，即便面對的是一些熟視無睹的事情。與此相矛盾的是，年輕女人説起話來要比她們的年齡認真和老成很多。不過，她們簡單地背誦黨的條文也充分顯示，其領導控制公眾思想和行為的力量。

大部份關於邪惡的劉少奇（毛拋棄的第一位接班人）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憶苦思甜報告都非常單調，促使我直接告訴我的同伴（這些人對我這部作品的成功有很大幫助），如果他們希望外國人願意讀我關於中國女人的評論，我們的重點需作調整。描寫幾個千篇一律的群眾「典型」，引不起外國人的興趣，會見一些至少揚名海外、不同尋常的人物，並展示她們隨着時代進步的經歷，豈不更好？

建議被採納了，因為在我行程的第3個星期，訪問的級別逐漸提升，雙方的挑戰也在升級。與歷史學家、醫生和表演藝術家的會議能開上半天或一整天，來的大部份是女人。我發現自己處於她們的教條思想唯一對立面的地位，我不屈不撓地與他們爭辯。這樣的爭辯使我很疲憊，我渴望玩一些智力遊戲。偶然一次機會，我發現自己擔當了魔鬼的辯護律師（已被打倒的劉少奇的修正主義擁護者）。唯一的選擇，就是讓她們從政治和理論上説服

我，認同她們所擁護的絕對路綫。

2

8月11日晚上，我的同伴們比平時都要激動地告訴我，鄧穎超（婦女革命運動領袖、周恩來總理的夫人）和康克清（紅軍創始人朱德的戰士妻子）要和我探討婦女革命運動的起源。這對於我的調查主綫是個完美的收場。況且對於她們生活的披露，至少可以說不那麼讓人氣餒。

我悄悄地從酒店長長的樓梯下了樓，撲進幾乎沒有照明的天安門廣場之夜的熱浪中。在那裏，我可以不被人發現地和眾人摩肩接踵，直到凌晨。睡了一會兒，我就起身準備9點在外交部的會面。鄧穎超和康克清由其他女幹部陪同，顯然後者都是革命女領袖的陪襯。鄧穎超，一位60多歲優雅的女人，非常富有幽默感和機智。那個早上，她回憶了過去50年的危機，幾乎鮮為人知的女性革命。

我的腦海裏翻騰着過去的事，頭腦昏沉沉的。回到北京賓館後，第一次因頭痛而沉入了中國式午睡，接着我被俞士蓮吵醒，我感到莫名其妙，因為在這種時候她和其他陪同通常都在打盹。她用緊張的聲調說：「今天下午可能有些年輕同事要到你的房間拜訪。」

「是誰？」

「我不能確定，」她閃爍其辭地答道。過了一會兒，她在門口再次重複宣佈「年輕同事」很可能要來拜訪我。「你最好整理一下東西，我去叫一些好茶和水果盤。」我正在整理桌上的紙張和書時，茶盤、礦泉水和一大盤水果就送到了。俞回來了，她的眼睛興奮地發光。「她們這就過來，而且看來她們是江青派來的！」

3 點整，兩個身着革命風格嚴肅打扮、光彩照人、令人生畏

的年輕女人站在我的門口。徐爾維和沈若芸和我握手，用黨的高級工作人員真誠的、公事公辦的口氣介紹自己。我用中文表示歡迎，而她們則用非常棒的英語，那種英國上流社會的語音語調回答我。

「江青同志希望你了解她的政治思想，她要我們向你宣讀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4篇講話提要。」沈開始說明了來意。

「為什麼這麼急？」我問道，並思忖着。

「我們不知道，」她們微笑着說，並開始了工作。

2個半小時中，她們用英語即席翻譯完了江青在1966年關於軍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冗長講話，中間只從沒有茶托的杯子裏抿了一口水。她大膽的十條指示號召解放軍發揮主動性，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來，打擊「1930年代的黑綫（當時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文藝和國際左派文化第一次繁榮），並創造新的革命文藝作品，為工人、農民和解放軍戰士服務。

她們說，我的角色不是聽聽而已，而要用共產黨的方式奮筆疾書。如果我的鋼筆在敍述時停住移動，她們中的一個或兩個都會停下盯着看，直到我繼續作筆記。

「為什麼不讓我自己找時間讀這些文章？」

「因為江青同志吩咐我們讀給你聽。」

我當時的預感在返回美國研究江青講話記錄時得到了證實，即大部份在中國限量發行的打印稿提到了一些同事，如林彪、陳伯達以及其他文革領導人，這些人後來都在革命選舉中被免職。

就這樣，她們繼續讀，我記錄，直到五點半，俞從門縫裏向她們做手勢才結束。她們立刻扣上塑料包（官員用的書包）和江青未刪改過的發言稿，說聲再見就迅速地走掉了。俞興奮但若無其事地告訴我，應該梳洗一下，但我已疲憊不堪，和這些非凡社會秩序的女締造者們一起度過了漫長的上午，然後整個下午都在高度緊張地作筆錄。於是，我告訴俞那個晚上只想安靜地吃晚

飯，寫一些自己的想法，並早早地休息。

「你不能那樣做，」她聲音有些尖刻地說道。

「為什麼不？」

「因為江青同志可能今天晚上有時間見你。所以得快一點！」

不一會兒，「有可能」變成了「很可能」，然後變成了「一定」。對這次拜訪沒有任何關於性質、地點、或目的的綫索。我極力做到通情達理，並擺脱腦子裏以前關於江青難相處的形象。我只見過她本人一次，在人民大會堂的宴會上，隔着4張桌子遠距離看到過她。那是8月1日建軍45周年紀念日的宴會上。她和其他領導人一起，呆板地往前走，並被安排在正桌的中間位置，這是革命的男領袖們的桌子，包括朱德、董必武，這兩人都是臉色蠟黃、瘦骨嶙峋的80歲老人。身穿灰制服的她幾乎不和衣着光鮮的宴會同伴、柬埔寨西哈努克夫人説話。而這位夫人微笑着並活潑地聊天，一點不被江青沉悶的表情所影響。我還記起江青的一些新資料：江青穿一身肥大的軍裝，戴一頂時髦的帽子，在文革中向群眾發表長篇大論。再早些的印象來自1960年代的照片，帶有50年代的氣息，表情明顯發窘，衝着鏡頭使勁地微笑。

「還有20分鐘！」俞邊説邊催促我脱掉從早晨5點一直穿着、被汗水浸透的襯衫和褲子。我快速用冷水洗了澡，吃了雙倍劑量的藥、止住陣陣襲來的頭痛，穿上俞替我挑的旅行裙裝，她說：「穿黑的比穿紅的好。」

中國人的好客是出了名的。當我們的車轟鳴着從長安街開過時，我這樣提醒着自己，還有他們用放縱客人興趣的方式讓客人就範的技巧。人民大會堂是領導們開重要政治會議和娛樂的地方，當汽車開向人民大會堂的寬大台階時，顯而易見，這個看似偶然的安排實際上經過了精心綵排。因為江青向外國人發出了邀請，這在她是很罕見的舉動。在這種場合，她的作用就是作決

定，媒體被召集來營造官式氣氛。黨的新聞機構——新華社的攝影師聚集在汽車周圍拍照，在登上台階時，遠處有電視攝像機。我在大廳和江青的隨員快速互報姓名和點頭寒暄，隨員中包括毛澤東出名的侄女、外交部副部長王海蓉。我們走過更多的房間，一直被帶到一間被燈光照得白燦燦的門廳。一聲清嗓子和高八度的聲音宣佈江青同志就在隔壁房間，「快準備好了。」

3

門開了，江青輕飄飄地進來了，手臂張開，開心地笑着。她抓緊我的手，探尋地盯着我的眼睛。手放下了，但眼睛還盯着對方，一句話沒說，這樣看了大概足足兩分鐘。

「你比我想像的年輕，」她邊觀察邊說。

「我要比看上去大很多，」我說着，希望她不會失望。

她笑了起來，說她老了，快60歲了。我說她看上去要比實際年齡年輕很多，甚至在革命年代，年齡仍然具有資格優勢。接下來的匆忙對話中，她仔細打量着我的臉、頭髮、服裝和高跟涼鞋，沒有一點不好意思，根本不隱藏她的好奇心。我也同樣好奇，但我相信在打量人方面不那麼咄咄逼人。

江青戴了一副邊框是棕色塑料的弓形眼鏡，自從1960年代早期，我就在照片上注意到她戴的這副眼鏡。她細膩的、橄欖色的臉在高溫下閃閃發光，鼻子和臉頰完全像是雕刻出來的，形狀類似毛的。鼻尖上肉粉色的痣和她的右嘴角更像是裝飾而不是缺陷。

她身高 5 英尺 5 英寸，聲稱自己個頭相當高（像大部份山東人一樣）。當她站在我的身邊，立刻縮了幾英寸。她嘲弄地皺了皺眉，望着我不公平的鞋跟優勢。她很苗條，骨胳很小，削肩膀，細腰。她的動作非常柔軟和優雅。她的手很精巧，如同古代詩人描寫的「葱指」，她的舉止像流水一樣。

她的服裝很保守——珍珠灰的褲子和與之相配的短夾克，裏面是定做的白絲綢襯衫。她穿了一雙塑料涼鞋，像每個中國人那樣，不過她的涼鞋與眾不同的是白色，和她那個白色塑料手包很相配。樣式、剪裁和套裝質量與鄧穎超的一樣，比一般人穿的做工要好。她的衣服邊也和鄧的一樣，有些輕微的破舊。

局促不安地站在江青左手邊的是姚文元。江青熱情地將他介紹給大家，他從文革早期便用筆桿子忠誠地為江青服務。這個男人中等個頭兒、禿頂、渾圓的臂膀像一頭牛似的。姚身穿珍珠灰色的短夾克套裝，這種灰色是第一梯隊領導人的保留色。所有在場的男人中，只有他戴了一頂典型的工人帽，帽冠很軟、配着一個窄窄的帽舌。他不安地將穿着油亮皮鞋的兩腳移來移去，其他人說話時，他不停地將帽子從頭上摘下又戴上。在這第一次邂逅中，他就生動表現出過份殷勤的舉止，從來不會浪費過他的時間。他比江青小十幾歲，顯然聽命於她，對她的談話總是做出積極的反應。

江青將我們帶到一個接待室。在那裏，我們進入了一場關於歷史和文學的瑣碎談話，彼此都對對方的文化進行着勇敢（或者徒勞）的評論。閑聊時，我們用普通話談，但在那個晚上關於主題的討論（她過去的生活、目前的工作和各種意見）都通過翻譯，這兩個翻譯就是江青下午派來的兩個厲害的使者，沈若芸和徐爾維。我對江青說，此時此刻比我在中國的任何經歷都生動、都出乎意料，我完全忘了記筆記。她安慰我說，有錄音帶和書記員作筆記，並且要經過其他領導同志過目才能給我，用中英文。

房間用的是革命中國不太渲染的內部裝飾。有特大號和加厚的扶手椅，難以形容的邊桌和咖啡桌，以及給助手和翻譯準備的輕型木椅。帶蓋的青花瓷茶杯飄出濃郁的芬芳，大概是宋朝瓷器的翻版。除了江青杯子的把手上纏了一小段紅色紗綫、還有她身旁桌子上用小毛巾裹着的電動呼叫按鈕，她給人的印象與其他人

沒有任何區別。

為10個人準備的晚宴，我們兩人和8位助手的，是在另一間敞亮房間舉行的。圓桌上，我被安排在江青左邊的座位，右側是姚文元。菜譜是傳統的北京烤鴨，我說過是我的最愛。「我知道，」她開心地微笑着說。在新菜上桌時，她能很快指出稀有的海味和蔬菜以及它們的成份，並一定讓我吃那些花（可食用的）。當烤鴨爪子和內臟被切成薄片、精緻地擺放在盤子裏端上來時，姚文元的筷子衝向鴨舌，然後送到我嘴裏。我吞下去、謝謝他，並忍住沒說出來：我一輩子從沒吃過這麼像橡皮的東西。

那個晚上是我唯一一次見姚文元。因為江青既是主人，又是討論的主題，與她面對面交談，勢必意味着我會背對着姚文元。但那還不是最尷尬的，事實上，他是我在訪問中唯一拒絕理解我使用中文的人，儘管我的中文近乎完美。當我和他說話時，他像投降似的舉起雙手並叫過來一名翻譯，說：「她說什麼！她說什麼！」因為他是上海人，聲音依然有着霸道的轟鳴聲。我的美國口音普通話，用北京方言發音，可能讓他聽不懂。也許是我拒絕將所有的思想用通用的意識形態行話表達出來冒犯了他？

第一道剩菜被一些陌生面孔的女孩子們拿走了，一些更豐滿的年輕女子端着更大的盤子走過來，她們將盤子裏盛的醬色烤鴨端給客人欣賞，接着退到屏風後面靈巧地切開這些鴨子。她們把鴨皮從肉上片下來，再把肉從骨頭上片下來，剩下的骨架做湯，作為倒數第二道菜。當這個表演繼續時，我對姚文元說，最近剛剛參觀了中古友好人民公社，在那裏看到了鴨子養殖的整個過程。

「填鴨」，姚確認道。

「是的，我甚至還拍到了最後一道工序，專家用飼管把食物從鴨子嘴裏塞進去。」

「你也喜歡照相！」江青說道。「這是我和你共同的愛好，我喜歡照相。」

接着我們談話了北京周圍適合照相的地方。我關注人的主題：男男女女打太極拳時，彎曲着四肢移動，或在有回聲的宮牆周圍唱舊戲。而她喜歡自然景致。

「你有沒有在太陽落山時在北海公園拍過雲的照片？」她問道。我沒拍過。她繼續說道：「我不太擅長攝影，但我拍的那張照片可以給你。」

後來她承認近年拍了大量的照片，大約有一萬張，但已毀了三、四千張，還有更多的要清理掉，特別是那些缺乏藝術性或歷史價值的 。

「為什麼要拍這麼多照片呢？」

「只是為了鍛煉自己！」那個她經常用的短語，是她自我約束和努力去做的最好寫照。

周總理曾熱心建議她應該見哪些外國客人，她換了一個話題說。當艾德加．斯諾的夫人路易斯．維拉． 斯諾1970年9月來北京時，為她安排了一次接風，得到通知後時間很短，江青正在家裏小睡，即被召集參加，由於沒有提前通知，不知道帶什麼合適的禮物送給尊貴的客人。而斯諾夫人也分不清楚，將給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的禮物錯給了江青！

「你見過斯諾夫婦嗎？」她問道。

沒有，儘管我讀過很多斯諾寫的書，我們簡單地交流過。我和她的前妻尼姆．韋爾斯保持通信聯繫，她在1930年底採訪過中國婦女革命領袖。

「他現在的夫人對中國也非常友好。如果你見到她，請轉達我對她及其全家的問候，並希望她再來。當你成為中國的朋友，你也可以經常訪問我們。只要我活着，我一定會接待你。」

提到將來和死亡，她的神情變得嚴肅起來。她掃視了一下同桌的其他面孔，說道：「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能很好地理解生老病死的規律。可以保持政治青春，但很難永保健康。我承認我現在老了。」

姚文元抓住她突然的情緒變化，開始背誦道：

>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曹操的這些詩句非常好，」姚評述道。

「這首詩的其他詩句也不錯。」江青接着背道：

>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

「這後頭還有四行呢。這是樸素的唯物主義。」她提醒道：

> 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那首詩把江青的思緒帶到了長壽和身體健康的關係上來。正如她的生活故事所展示的，她長期受到疾病的折磨，將疾病和她的敵人當作並行的挑戰，挑戰她的生命和政治的生存願望。她的筷子翻開剛上的菜，說道：「我最近一直在休息。但因為你的緣故，我今天必須來。我身體一直不好，最近睡不好覺。我需要看病和休息，做運動。」

「你做什麼運動？」我問道。

「游泳、騎馬、散步和園藝。」她一邊回答，一邊將手伸進口袋，掏出一把茉莉花，這是她在中南海（毛的家庭住址位於北京前皇宮的一部份）家裏種的。當她把這些氣味濃郁的白色小花放在我手心時，她的臉反射出我的驚喜。「我還種了一些中草藥，」她補充道。「我自己種茉莉花外，還種一些蔬菜。並設法培育了一小塊地的稻子，已經這麼高了。」（她把兩隻手分開一英尺左右，一手在上，一手在下）。「我種了棉花，所有這些有助於我身心放鬆。」

「我們出口茉莉花，」她繼續說道，明顯帶着為國家感到驕傲的口氣。「我們還在江蘇、浙江、廣東和山東種植茶葉。」

「像很多外國人一樣，我很喜歡茉莉花茶，儘管我的最愛是水仙花茶。」我說。

「水仙花茶對眼睛好。種植水仙花是副業。在農村大面積種植。你見過中國的木芍藥嗎？」

「我見過一些，但主要是從明朝繪畫或照片上看到的，很少看到真的。」

「我可以給你看一些照片。我種了一些，它們也是中藥材。」她將大拇指和食指分開兩英寸的樣子，說道：「根以上這麼長的一塊皮就可以養活一個藥房3到4個月，非常昂貴。」

「它治什麼病？」我好奇地問。

「我不是中醫，所以我也不知道。還有草芍藥，無論根部還是花都能入藥。當然我所種的都上交國家。」

「我的上呼吸道器官有慢性病，」她繼續用同樣就事論事的態度說道。「這引起泌尿系統問題。過去，我一發燒就打抗生素。不過最近我用荷花梗，這對泌尿系統非常有效。現在我每天服用4次荷花梗，感覺好多了。」

對於這些私下披露印象深刻之餘，我問如何服用荷花梗。她解釋道：「你把它放在水裏煮上15分鐘，然後像喝茶一樣喝煮好的溶液。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我從1969年以來沒再犯過類似的大病。我要求一些醫藥科學家對荷花梗作一次分析，他們只能分離出一種生物鹼。但單純服用生物鹼是沒用的，因為荷花梗有很多其他特性。我相信未來醫藥科學家們能對它的成份進一步研究。拿夜來香說吧，它的花像一根髮夾；香味很濃郁，蛇都躲着它。整棵植物都可以入藥。直到現在，醫藥科學家們也不能分析出它的成份。所以醫藥科學家距離日常生活的要求還差得很遠。如果美國科學家感興趣，當然可以在這一領域進行研究。因為你們和

我們在地球兩側所處的緯度是一樣的，我們這裏能種植的，在你們那裏也能種。你見過荷花嗎？」

「見過，大部份是在頤和園的諧趣園。」

「頤和園所有的荷花都是紅荷花。」

「而紫竹院的那些荷花是白色的。」姚文元補充道。

「中國人總是說荷花全身都是寶，沒有一點可浪費的。」她繼續說。「我們剛才吃的開胃菜就是白荷花的根部。紅荷花的根就不能這樣做了。白的那種可以作為副食，荷花種植在長江以南非常盛行。在那裏，種植荷花在農民家庭是很普遍的副業。」

正在此時，最後幾道菜中有一種奶油色的蓮子粥上了席，每人一碗，粥上飄着茉莉花。江青解釋說：「所謂『冰糖蓮子羹』是用小米做的。我家鄉產這種小米。小米比大米更有營養。然後再加上鷄蛋清和肥油。」

江青對於菜餚的營養和藥用特性流暢的解釋，反映了她在享受食物從全國各地送到她在首都的餐桌上的樂趣。第一道甜點中，一條條楔形的粉色的、肉質細膩的瓜是我從未見過的。江青說：「這是哈密瓜，新疆產的。」她繼續說：「現在新疆有470萬維吾爾人。」（維吾爾人是一個政治上有用的少數民族，能成為中國和蘇聯之間的緩衝地帶。）我發現這種瓜非常好吃，並誇獎了一番。一定有人記住了，否則，北京飯店在此後的夜晚就不會供應熟透的哈密瓜。

江青的情緒變化很快，當注意到撒了一些鴨汁在褲子上，便揮舞着手大笑起來，說她自己還像小孩子一樣邋遢。最後一道甜點，我從未見過的、道教傳說中的長生不老桃端上來時，她惡作劇似的調侃我：「你來中國之前，是不是把我們想像成三頭六臂的魔鬼？」

「沒有。但我做好了有人至少叫我一次『洋鬼子』那個老綽號的思想準備。不過我失望了。」

「你的頭髮太長，裙子過短了。」她輕輕地笑着評價我。後來我發現她的笑裏有一種快感，有時還有些尖刻。

「我走到哪兒都有群眾認出我並圍着我。」她轉向另一個話題。「有一次我打算在頤和園周圍溜達溜達，但忘了那天是兒童節，突然被幾千人圍住了，沒法走掉。」

「少見多怪；多見少怪。」江青有了做詩的靈感。「當我乘車出去時，必須把兩扇而不是一扇窗戶搖起來。否則，群眾會發現，叫喊並追我的車。當毛主席出去時，問題嚴重到了極點。一旦誰注意到了，群眾立刻湧向他的車。周總理出去，群眾就大聲呼喊，引起他的注意，並簇擁着和他握手。」

晚宴過後，我們去天橋劇場，晚了一個小時，這是一場奉命演出，劇目是《紅燈記》，是江青改革的第一部戲劇，為了滿足無產階級政治標準，那是她在文革中強加給所有藝術的標準。

戲劇結束後，江青以一個勝利者的姿態出了劇場，引領着大家來到一個私密會客室，在這裏，我們全都陷進了寬大的沙發裏。散場觀眾的喧鬧聲被大門隔在外面，江青注視着我道：「我希望你能步埃德加·斯諾和斯諾夫人的後塵。」*

「可望不可及的榜樣！」我回答道。我被這個挑戰嚇壞了，但是理解我們之間的真正問題是信任。

「人們可能會說我們給你洗了腦，你害怕嗎？」她揶揄道。

「不，我不怕。這種洗腦是不可能的。」

「畢竟，尼克松總統和夫人曾來過這裏。如果我能陪同尼克松總統和夫人，為什麼我不能陪你？你可以競選總統！」

她轉向了更嚴肅的話題：我目前的角色。我是她第一個吐露過去的外國人，她說，接着回答了我關於發表此次會晤的問題。她說：「你可以發表。但必須意識到我沒有把你當作一個記者對待，而是作為一名好朋友。首先我必須請總理查看我們會晤的記錄。我今晚對你所說的都是事實。顯然，我們（她和共產黨領導

人）走過了一條艱難困苦的道路。儘管我現在快60歲了，我還要保持革命青春。」

關於「革命青春」她是否還會講解更多一些，以及她生活的其他方面？我問道。

「這次沒時間了。下次你到中國來，我們再談。這會兒，我要給你一些紀念品，儘管我是一個攝影門外漢，我還是拍了一些照片，我要給你一些當作紀念。也許這是班門弄斧。我這會兒沒帶好的，我拍了一些女民兵，但『有些人』拿走了好的。等回到中南海，我再找一找。」

當我們在劇院告別後，劇院裏除了她的隨員幾乎空無一人，我被要求先離開，以便沒人能透過夜色看到她的離開。

4

儘管我沒有期待再次見到江青，她的形象、煽動性和善變已經深深植入我的腦海。為了讓其他人公正地了解她的過去，她對於自己早年生活和參加革命的動機所講的那點內容是不足够的，根本算不上清晰，確實讓人想進一步了解。她是4億女人中的一個。不過，我猜想她獨特的經歷（每天和卓越的領導人在一起）對於理解革命的中國女人最基本的兩難境地會有一些啓發。

和江青在一起的那晚過後，第二天早上，我繼續與鄧穎超和其他婦女領導幹部們討論。我們的討論持續了 4 個上午。像她的丈夫周恩來一樣，鄧知識廣博，對於意識形態問題，她的講話很有說服力，語言也要比政治口號豐富得多。她生於1904年，只比江青大10歲，從輩份上講，差別卻很大。鄧屬於共產黨的第一代，是毛的學生，早在1920年就已在運動中非常活躍。江青屬於第二代革命者，他們中的一些人早在30年代就在白區與共產黨聯繫，而不是和紅區、毛的革命中心聯繫，這種狀態持續到30年代

末。鄧和李富春的夫人、一位自覺的革命者蔡暢擺脱舊社會的束縛，和其他建黨那一代的婦女一道，將她們的生命投入到喚醒、組織中國婦女參加革命，投入政治運動中。在婦女這個特殊問題上，鄧明確和毫無怨言的責任感，以及她在所有政治議題上都與婦女聯繫起來的習慣，使她與江青截然不同。可以説，江青的女權運動更多的是私下追求的，而且政治抱負要求她不能使自己的生活具有為性別平等而鬥爭的特點。

不過，我沒有失去與江青的聯繫。每天下午，在和鄧穎超談話結束後，江青的使者徐爾維和沈若芸就來我的房間，繼續宣讀江青的講話。兩個人都是一流的翻譯，徐和沈不僅僅是語言學家，或官僚機構的執行者，她們純正的政治觀念和鍍金的舌頭同樣應受重視，還可作為文化的使者。沈若芸迷人的個性、清秀漂亮的外貌、語言技能、政治敏感性以及冷峻的職業化氣質，保證她在任何社會都能獲得成功。出眾的天賦，使她為之奮鬥的冷酷無情的無產階級事業更加不同凡響，儘管她也從不斷增長的名氣和權力中獲益。1960年代中期，她在倫敦學習了一年半被召回，和所有海外的中國共產黨人一道，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1972年，她陪同中國乒乓球隊到美國開展公開的外交任務。1972年夏，她為江青服務，執行最敏感的任務。同年年尾，她到美國，當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的私人翻譯。1974年，她被提升為駐華盛頓聯絡處的工作人員。

在我與江青的意外見面之後，沈不顧白天黑夜開始不定時地來我這裏。除了政治閱讀，還帶來了迄今為止沒有發表的江青和毛在延安1940年代的照片，一些彩色的藝術照，一套瓷器熊猫（景德鎮的瓷器。不過，那裏的產品在帝國時代就已衰落了），還有江青生活中的其他紀念品。她的藝術照都是些風景和花卉，是傳統中國畫中最為推崇的主題，我被這個經過技術改進的以前達官貴人階層的書畫作品所吸引。多才多藝的美術和精湛

的園藝相結合，沉迷於自我修養，對身體技能的驕傲，以及對戲劇的官方保護，都將她在文化上與中國的帝王文化聯繫起來。與毛澤東、讓人敬畏的紅軍領袖朱德、郭沫若和其他全身心信奉無產階級思想的高級領導人一樣，江青繼續練習和發表古典詩詞。然而，那些級別較低的同志和下一代人都無法接觸那種高雅的傳統。與他們的帝王先人一樣，不管技巧如何嫻熟，沒有一個現任領導人，包括江青，願意承認自己是個內行。在仔細研究她的照片時，我饒有興趣地注意到，贈語是用紅鉛筆寫在背面的，這是無產階級對帝王簽字用的朱紅墨水的更新。

通過沈的中介，江青半開玩笑地考察了我的攝影技巧。在三朵她親手用種子培育出的芍藥花照片中，她採用了自然光還是閃光燈？這些照片是一天中什麼時候拍的？大氣中濕度的來源是什麼？我非常喜歡這個遊戲，就把我的猜測告訴了沈，她隔天來的時候再把正確答案帶給我，並說江青發現她的聰明技巧逃過了我的判斷有多高興。我猜想是早晨太陽的自然光綫，而其實是江青在警衛員幫助下，在黃昏使用了精密的人工光綫系統；我所猜花瓣上的水滴是自然效果，其實是拍照前，她用手指尖將水滴在花瓣上。

我在上海的 5 天是從 8 月的第三個周末開始的。這次為我安排了更龐大的隨行隊伍。除了我在北京的全陪外，又增加了 5 位女士和一位來自上海的男士。他們來自藝術、科學和外事部門。當然，官方宣傳是江青在我訪問中第一次介入的結果，《人民日報》上刊載了那次活動的報導和照片。在上海，經常披露革命奇迹，包括針刺麻醉用於正在進行子宮手術的快樂清醒的婦女身上。精神封鎖加政治催眠，這看起來是個奇迹。著名教育學家蔡元培的小女兒蔡萃盎低聲談論父親和自己的生活，記錄詳實且非意識形態的歷史。一些年輕女作家承認，根據文革制定的嚴格標準，幾乎不可能通過寫作「為人民服務」。在這些上海女性中，

最受推崇的「新女性」王秀珍，是一個30歲的紡織女工，她被選入1969年黨的第9屆中央委員會和1973年的第10屆中央委員會。成為政治明星並沒有腐蝕她的謙遜。但她對於過去的激情講述，像其他很多人的一樣缺乏說服力，講話好像都有固定套路，而不是根據個人喜怒哀樂。

最重要的是，訪問把我們帶進了上海文化領域，這裏當時被認為是江青的地盤，姚文元是守護人。參觀當代有爭議的偉大作家魯迅的家鄉那天，最後以和江青繼續討論文藝作為結束。我還就偉大的十八世紀小說《紅樓夢》和文學批評家、復旦大學教授劉大傑展開討論。姚文元還安排參觀了戲劇和芭蕾舞劇團。

24日傍晚，我們到江青保護下的芭蕾舞學校和舞蹈演員見面，然後精疲力竭地回到駐地。當我們迎着朦朦朧朧的落日開車時，夕陽籠罩着上海低矮的工業區，我的同伴都看着老陳，老陳一邊極力保持鎮靜，一邊激動地宣佈：「我們得知江青同志已秘密飛往廣州。在那裏，她將回憶她的生活和革命史。她將再接見你一到兩次。你所有提出的問題，她都將回答。你將乘明天從北京派來的飛機到達那裏。必須強調，這次旅行是保密的，除了這些陪同你的人以外，不能讓任何人知道。」

我們是否要被送到一個神秘的、按照女人意志統治的王國（或女王國）？我默默地問自己，一邊極力尋找真實感。不一會兒，我們全都大笑起來，這趟旅行看來合理的目的，其實又充滿荒誕和不可思議，實在好笑。無可否認，事件看似自然發展的背後，起影響的是江青不可違背的嚴肅決定：講出自己的經歷。

第二天下午，我們的上海隨員來機場送我們。俞、老陳和我被引到一片只停着一架大型銀色噴氣式飛機的空地上。乘客只有從北京飛過來的張穎，她在宣傳事務上是個非常出色的人物，翻譯沈若芸和唐龍彬副主任——我們一行中唯一的男性微笑着出現在艙門，向我們揮着手。

飛機寬大和設計精美的內部裝飾與中國普通人的標準差距很遠。張穎和我被引到前艙，這裏放着寫字桌和餐桌，電子設備和大號床，上面蓋了一條精美的粉紅色綉花床單和白色枕頭。在這裏單獨相處，張穎回憶起30年代末在重慶當記者的冒險生涯。那是去延安之前的事，她與江青首次相遇是在延安，共產黨的根據地。作為一名宣傳幹部，她以不偏離黨的路綫的方式嚴肅回答我對魯迅廣博知識的興之所至的欣賞。她表示只是欣賞魯迅身上那一點點共產主義精神的閃光。儘管她忠於權威，但思想活躍，我們的意識形態差異並不能減少彼此的尊重和待遇的奢侈。在我們親切爭論時，兩位容貌漂亮的女解放軍送來了一盤烤鴨、各種各樣的甜肉，剛蒸好的饅頭、精緻的水果、冰激淩、白酒、啤酒和葡萄酒。

我被中國葡萄酒灌醉了，終於向張穎的要求屈服，她不斷催我休息一下以備廣州那些未知的安排。她回到主艙去了。絲綢床單和無產階級的鬧鈴形成了一種明顯對比。當我入睡時，女服務員放下了淺色的窗簾。我一直熟睡，直到被一個溫柔的聲音喚醒。副駕駛員的聲音在我頭上響起。他報告我們在廣州上空下降的精確時間。

「江青同志已經準備好了！」這是讓我們離開會客室的召喚，剛才我們一直在這裏等待，於是乘車前往江青的別墅。黃昏，我們的車鳴叫着穿過嘈雜的廣東街道、人和動物。當我們駛入郊區時，夜幕降臨，在顛簸的路上一個個急轉彎讓人失去了方向感。通往江青別墅的是一條狹窄蜿蜒的路，兩側是茂密的竹林。在竹林中，年輕解放軍衛兵的刺刀閃光若隱若現。別墅是一棟寬大的單層現代建築，佇立在一片寂靜的空地上，四周被熱帶花園環繞：攀爬的九重葛，怒放的芙蓉、波光粼粼的池塘上開放着粉紅色的蓮花、芬芳的木蘭、茉莉和薑花、蟬鳴和沒有曲調的鳥兒叫聲。

別墅內部非常寬敞，但裝潢很一般，只有幾個漂亮的蘭金色花瓶和全部是現代作品的軸畫，但沒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表現的政治。這裏距北方的首都有幾千英里，在那裏，她承受着政府的禮遇和對手的壓力。在這裏，江青更溫柔，更隨意了。她穿了一件裁剪精湛、中國風格的連衣裙，全褶裙垂到小腿中間位置，這種式樣是受到了我們50年代早期風格的啓發。白色塑料涼鞋和手提包與在北京用的一樣，儘管手提包帶子纏上了一塊古怪的破布。

「我在場你緊張嗎？你不必緊張。」

「不緊張。」事實上，我比第一次相遇更放鬆了。我開始作筆記，因為酷熱和潮濕，將袖子一直挽到手肘以上。

「你太熱了。」她注意到，便向一位助手示意打開空調，空調轟鳴着開始運轉，過了好一會兒才固定在低聲吼叫，然後便突然失靈了。

回憶起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兩個星期前，周總理問她是否要見我。他告訴江青我是一個「熱愛中國的年輕人」，在我和聯合國代表團討論後得到約翰·謝偉思的推薦。儘管我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我被斷定為一個「對中國人民和所有革命人民有力的支持者。」儘管她當時準備好乘飛機執行另一項任務，但還是決定留下來見我。為什麼？因為如果不這樣做會使她看上去自大或傲慢。此外，她不能將對中國人民的責任推卸掉。她還知道我早已和鄧大姐（鄧穎超）見過，並和她開始研究討論了。百忙中，她為我安排了幾場京戲，並說沒有時間做精心安排。然後，她為送我什麼禮物而絞盡腦汁。一想到這一切可怕的憂慮和匆忙讓她大汗淋漓，她大笑起來。當然她並不太了解我，但是第一次見面的晚上給她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們分手後，她開始特別認真考慮我的工作性質，並決定一系列會晤的「基本建設」（她使用這個詞，但沒有解釋它的含義）。她非常清楚這一切都會被發表。

四、五天前，她飛往廣州。為什麼在廣州？是為了在日常

政府工作中抽出時間休假和看病。擺脫了北京的壓力後，她睡得好，吃得香。幾天之內，她最近幾個月時常出問題的記憶力恢復了正常。為避免我得出錯誤結論——這是她經常打發時間的方式。她要我相信平常是全身心投入到「嚴肅的政治事務」中的，並聲稱：「我不能容忍雞毛蒜皮的小事。」她和我不能把時間浪費在小事上。

在我到來前不久，她向1500多人報告目前的形勢，並給一組執政官員做報告。除了這些安排，真正動機是見我，但她強調我們的會面必須保密。如果廣州的群眾知道她繼續駐留，以及與他們之間的近距離，會非常興奮。而如果他們發現她的真正意圖是與一個外國人談話，就會猜疑。因此，除了她、她的隨行人員和我的陪同之外，一直沒有告訴我，直到8月底離開。

她繼續說，埃德加・斯諾有時間上的優勢，能和毛主席、周總理和其他1930年代末在西北工作的老一輩革命領導人長談。到現在為止，我交談過的人年歲最大的是鄧穎超。在五四運動（1919）時，她15歲，江青才5歲，太小了，無法理解這一大事件。江青承認鄧穎超的革命歷史比她長，但又指出自己的革命史要更「廣泛」，因為她的歷史不限於婦女事務。

當她和其他領導人在西北（1937-1947）工作時，共同目標是支持毛主席的觀點。由於她的特殊優勢（她和毛於1939年結婚），比鄧穎超能提供更多細節議論延安時代。儘管她本人沒有參加過30年代中期從中央蘇區到達西北的長征，她卻能清楚地回顧那段歷史。總之，她將專注於親眼見證的事情，但不會強加給我任何東西，如果我不關心軍事，她會跳過那些內容。因為資產階級總是「武裝到牙齒的」，中國人民不能沒有武裝。中國人不想要戰爭，從來不對其他國家發動非正義戰爭。她的眉毛放鬆下來說，不想獨自嘮叨下去。

她微笑着拿過來一個細長的織錦盒子，從裏面取出一把小扇

子，是用檀香木精雕細刻的。她喜愛地用手把玩着，說這把扇子用了很多年。絲綢的一面是手繪的粉紅色梅花，另一面是毛澤東詩詞《冬雲》，作於1962年12月26日70歲生日那一天（中國計算年齡的方法，將出生的那天當做第一個生日）。詩歌如下：

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
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風吹。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
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當我瀏覽毛的詩句時，她說這不是真迹。毛主席的書法是藝術品，他的草書是非常著名的，與王羲之不相上下。如果有人以為可能有機會擁有一件毛主席的書法真品，就會不要命去爭取的。她動作幅度很大地轉過身，讓我們看身後牆壁上掛着的毛肆意揮灑的書法複製品。回到電扇旁，她說為我要了一幅字，很快就送到，不過我現在可以擁有這一份。過了一會兒，她又決定將它送給我的女兒。「她叫什麼？」

「亞歷山大。」

「你為什麼選擇一個羅馬名字？」她問道。我講了一些關於俄羅斯人從希臘語裏借鑒的事。不過，看來沒有引起她的興趣。

她接着伸手從瓷瓶中拿起白茉莉花和白蘭花，將手伸進水碗，把水滴彈在花瓣上。那個漂亮的動作開啓了今後每個和她共度的夜晚。偶爾，在談話過程中，她會把散落的花遞給在座的女人。風扇斷斷續續地轉動幾個小時、直至深夜，花兒的沁人芬芳混着濃重的檀香環繞着我們，緩緩地滲透到房間的每個角落。

「我們該如何開始呢？」她試探道。我非常好奇，想看她如何選擇表達方式。我說，「作為文化活動的總指揮，你必須保持主動性。」我知道，與採訪一個西方人或西化的領導人有很大不

同，那種人期待着一系列問題，包括我的爭辯。至於現在，我和她已經相處足够長的時間，能够意識到我的美式興趣一定要和她的生活以及中國革命史最深層的動機相交集，談話才能深入。

她的人生故事很長，有苦惱，有浪漫。她像做夢一樣開始了敍述，「但不要只寫我，」她急忙補充一句。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她建議將她的故事放在整個革命背景中。當一個人把革命經驗當作一個整體來看，任何個人的作用都會變得渺小，而她的作用非常微小，她肯定地説。

我被允許自由表達不同意見，並和她爭論。這不僅不會損害我們的友誼，還能使友誼長存。她唯一的要求是不要曲解她的意思。我不想讚揚或責備她，但希望擺脱儒家和共產主義歷史學家的説教，我回答道。我希望準確傳達她的話，把握她只有直接面對面時才能表現出來的個性。她援引魯迅的話説，儘管她會批評別人，但也會永遠嚴於自我批評。一個人永遠不能自滿。她希望我在中國獨一無二的經驗不致使我自負。不論一個人的生命多麼不平凡，都要保持謙虛。

她微笑着揣測，問我是不是要了解更多關於她個人的生活，如果是這樣，就要從戰爭説起，因為戰爭因素包含在她個人經歷以及整個革命過程的綫索中。如果我不感興趣，她就不把革命史強加於我，但她保證敍述不會乾巴巴的。接着，我們就轉向了個人歷史，從她的童年開始。

每天晚上，江青的敍述只有在警衛員和護士不斷堅持下、以及兩個私人醫生不時示意下才告一段落。她們在房間遠處地板上走來走去，或安靜地注視着她。除了這些衛士，徐爾維和沈若芸也經常在場當翻譯，還有宣傳部副部長張穎，副司長唐隆彬（她隨行人員中唯一的男士），以及我的兩個陪同俞士蓮和老陳。我和她們偶爾交換一下眼神或互相微笑，江青在場情況下，她們幾乎保持絕對的安靜，這與平時愛説愛笑截然不同。

第二天晚上，我們轉移到更大的別墅（江青依舊住在第一幢），這一棟別墅房間更多，可以連續使用，因為悶熱的南方空氣越來越不流通。每個有着很多窗戶的房間都配備了毛巾：大的、小的、幹的、濕的，這是用來解乏的。茶、香煙、一碗碗的乾果、書寫設備、文具、矮桌上的麥克風，以及其他記錄設備。這樣的會晤持續了 6 天，那個傍晚僅僅是個開始，我們很晚才用餐，晚餐時休息一會兒，然後繼續談到第二天凌晨。江青就這樣持續地以無產階級帝王的風格將她革命生涯中的故事講給我聽，她視為給我的特權。她的講述興之所至，時常偏離主題。

I

成長

2

逃離童年

我也還有記憶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覺得我的記憶好像被刀刮過了的魚鱗，有些還留在身體上，有些是掉在水裏了，將水一攪，有幾片還會翻騰，閃爍，然而中間混着血絲，連我自己也怕因此污了賞鑒家的眼目。

——魯迅《憶韋素園君》1934年

江青是1914年來到這個世界的，當時叫李進。她不想暴露具體生日，說是因為不想讓群眾慶祝她的生日。她的第一個家是在諸城，一個 8 萬人口的城市，位於濰河南岸，距山東港口城市青島約50英里，在直隸灣和黃海之間。山東是被外國帝國主義最先侵略的幾個省份之一。1860年海濱城市煙台割給法國。1898年威海衛港口租給英國，青島半島租給德國。江青出生的那年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將德國控制的山東地盤作為立足點，打算從這裏將整個中國最終納入膨脹的日本帝國。在她的童年時期，日本頻繁的軍事佔領，以及修築殖民設施，給全省造成長期的不安定。

儘管長期籠罩在帝國主義的陰影下，這個省具有最悠久的革命傳統。19世紀中期和末期，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造反，長期的匪患，為山東提供了革命的主力，還有1911年的革命鬥士（死亡者被稱為烈士）。山東是全國五四運動的發源地之一。9 年後，首府濟南成為「濟南慘案」的發生地，引發了新的中日軍事對抗。

山東是中國第二大省和人口稠密的省份，其民眾生活像地

獄，在江青孩童時代的記憶中印象深刻。普通人家平常只吃一頓或兩頓飯。營養不良導致的腸胃失調和慢慢死去的比率非常高，饑荒奪去了很多人的性命。不過，江青老家諸城縣的物質條件比大部份地方要好很多，文化和教育底蘊也相當豐厚。在最後一個王朝倒台後，現代教育體系誕生。20世紀頭20年裏，在留學大潮中，諸城送到日本、歐洲和美國的學生，比山東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儘管江青不在此列，最終從老師、作家、國民黨改革者和激進的反叛者那裏，還是受到不少西方影響。

江青在北京的晚宴上首度回憶過她的童年。她很謹慎地開始，撇開政治說教，簡要地回憶舊社會的痛苦，地主階級普遍的背信棄義，以及對不同外國帝國主義的全民抵抗。後來她繼續隨意地說下去，沒有過多的修飾。

1

「既然你那麼想了解我的過去，我可以簡單地告訴你。」她開始說道。「我在舊社會長大，有着一個可怕的童年。我不僅恨中國的地主，對外國人也有自發的抵觸情緒。因為無論從西方，還是從東方來的外國鬼子都曾欺負過我們。我們沒有足夠的食品和衣物。外國人瞧不起我們，把我們叫做『東亞病夫』。」

李進是她叫江青以前若干個名字中的第一個。江青是她在共產主義圈子裏的名字。她有很多兄弟姐妹（究竟有多少，她卻絕口不提），最小的一個也比她大12歲。（她對於家人人數、名字以及後來提到的朋友都諱莫如深，可能是為了保護那些仍然在世的人，不願他們在持續的政治鬥爭中受到公眾注意、調查或揭發。）父親在她出生時是個60歲的老頭，母親才40多歲。江青記憶中母親比父親年輕很多，且十分溫柔。父親早先是跟木匠學藝，後來自立門戶，開設一間專門做車輪的店（山東聞名的吱扭

吱扭的獨輪車）。「因為我們窮，三餐不給，父親便常打罵母親。」這種行為使他得了一個渾號「罵人藝術家」。他想打孩子就打，但當他野蠻地打母親時，所有的孩子都會圍在母親身旁，盡最大努力保護她。

父親的狂暴行為是無法忘記的。那年元宵節，有錢的人家早早地掛起一盞盞瑰麗多彩的花燈，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財大氣粗，而他力不能及的，江青的父親滿肚子氣，抓起一把鐵鍬，緊跟在母親身後追打，先打在她的背上，接着又打在手上，竟打斷了她的一根手指。江青擋在母親身前，竟也挨了一巴掌，打落一顆牙齒。當江青描述這段暴力情景時，用食指挑起上嘴唇，展示牙齒被打斷的地方。回想起這件往事，她說：「開始我認為所有男人都不是好東西，由於我父親毆打母親和我們小孩子的方式。其實，是折磨人的貧困使他這樣的。」無論父親有什麼理由，看來這件事使她母親再也不能忍受了，她背起江青離開了家，從此再也沒回去。儘管還是個小孩，江青表情神秘地補充道：「從那時候開始，我學會了摸黑走夜路。」

諸城縣的一個地主有一個妻子和幾個小妾，但沒有男孩。他讓江青的母親到他家做僕人。江青開始拒絕和母親同往，但後來還是同意了。她記得從那時起，母親就被很多人呼來喚去。母親進入那家人家的動機可能讓江青很困惑，她如下的話證實了這一點：「母親出去幹活，是為了能讓我上學。其實，我當年能讀完幾年小學，是因為學費和書本是免費的。但即使在那個時候，我也經常餓肚子或吃冷飯，這使我患上慢性腸胃病。」她回憶起親戚們為了減輕她的饑餓疼痛，給她粗糙的冷麵餅充饑，她吞下去就嘔吐，並伴有長期的噁心。她說，從孩童時代開始，她就受到消化問題的折磨。

她小時候從來沒有穿過新衣服，或真正屬於女孩子的衣服（說到這裏，她的語氣帶着怨恨），所有衣服都是哥哥穿剩的，

頭上的兩根小辮子給她帶來不少麻煩。在她母親東主家有一個小女兒，喜歡摹仿江青的怪模樣。一次，那個孩子又捉弄她，猛扯江青的頭髮，她痛極而怒，使盡全身力氣把那個孩子推倒在地。可怕的情景出現了，東主家的人都忙着幫那個孩子，結果，江青的母親被解僱了。

她的母親不久找到了另一份工作，這次是一家「破落地主」，財富的喪失意味着沒有飯吃。一天夜裏，當江青一個人留在房間裏時，瓢潑大雨從破舊的窗戶灑進屋裏，只有一盞小油燈照明，江青百無聊賴地坐在炕（中國北方家庭普遍使用石頭砌成的大床）上幾個小時，一動不動地等着母親回來。黎明時分，大雨停了，母親才出現。母親吃驚地發現，江青還直直地坐在她走時放下的地方，母親流着淚把她抱在懷裏。她給江青一塊餅乾，但江青實在太虛弱了，一口都吃不下，母親也一口都不吃，輕輕地將這寶貴的食物揣起來，給她留着過後再吃。

「當我五、六歲時，學會了摸黑走路，去找母親。」她重複了幾次，讓聽眾猜測她母親夜間究竟是做什麼工作的。獨自在夜晚游蕩的景象成了她童年回憶的主題。江青繼續説道，其他人害怕走夜路會遇見魔鬼，她卻從來沒有這種恐懼，只害怕一樣東西——狼。她有好幾年都在擔心被狼追趕、吃掉的恐懼中度過。對於狼的回憶使她想起了另一個時期，當時在陳村居住，那裏的每個人都姓陳。每天只能吃一頓飯，被饑餓驅使着，走進河谷去尋找母親。村子裏的人很少，卻有很多狗。突然，她遭到一群狗的攻擊，一條狗咬了她的腿。她説着撩起裙邊，讓我們看膝蓋以上淡淡的、卻還能辨認出來的傷疤。母親聽到狗吠急忙趕來，一把將江青攬到懷裏，背回家，淚流滿面。

最後，母親換了工作，來到一個破落地主的莊園，江青上了諸城另一所小學。她是在一位叫薛登煥的學者資助下入學的。這位學者在五四時期曾因提倡對窮人和女孩子的教育而出名，後來

成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授（提倡中國婦女高等教育的先鋒）。上小學時，薛老師給她取了一個新名字，雲鶴，與她修長的身材很貼切。這所學校是縣裏辦的，主要是為地主的女兒而設，但招幾個和她一樣的勞動人民的女兒來「陪襯」。家境實在太窮，沒錢買校服，有什麼便穿什麼，大部份是男孩子穿過的舊衣服，其他孩子覺得她的模樣滑稽可笑。江青的破爛鞋子，其中一隻露出了大腳趾，於是刻薄地嘲笑是她的「大哥」，至於她突出的腳後跟，則被嘲笑為「鴨蛋」。

在母親僱主家中，她還要受到「嬸嬸」和「侄女」（嬸嬸和侄女可能是僱主家的親戚）同樣的挖苦嘲諷。一次，江青被她們嘲諷得怒從心起，揮拳打中嬸嬸的胸膛，兩個女人並不還手，而是嚎啕大哭。也許因為看她年紀太小的原故，她解釋道。被這件事激怒後，她衝到學校向校長宣佈要退學逃跑。讓她驚訝的是，校長同情地接待了她，擦乾了她的眼淚，告訴她不應該讓這些事情擾亂自己，最要緊的是刻苦讀書，堅持學業。她溫和地說，老師們開始尊重她，一些老師甚至喜歡上她了。

但在學校還引起其他一些衝突。她最痛恨的是修身課[1]：用儒家道德自我修煉。一天，她在修身課上做白日夢，老師非常生氣，把她拖進廁所，用戒尺打了 5 下。（她說，那個老師還打過她母親僱主的女兒。）下課後，他似乎有些歉疚，走過來安慰她。可是後來她又因其他事而發生兩次衝突，一個學期後就退學了。她發誓，從此以後再也不要受人欺負。她的小學教育就這樣在第 5 年便突然結束。

全世界經常驚訝於中國人成為「文明」人有多麼長久，江青卻表示懷疑。從孩提時代起，她就知道他們有多麼野蠻。在山東有一個慣例，惡霸要嚇唬當地平民百姓，就會砍掉一些鄉下人

1　字面意思是培養自身，修身的含義類似自我約束或自我克制。在中國共產黨接管教育之前，修身在教學中被系統實施，使年輕學子意識到自己卑微的地位，從而尊重權威。

的頭，把剛砍下的血淋淋的人頭掛在城牆上。當她還是一個小孩時，看到這個場面就病倒了，想着「人竟可以如此沒有心肝。」母親知道有這種血腥場面都會躲開，讓鄰居們替小孩子蒙上眼睛。即使眼睛被蒙上了，江青也能想像出那可怕的屠殺。

另外一些暴力印象也無法忘掉。諸城是一個富饒的地方，但每年秋收時，當地土匪都會搶劫別人的收成。那些被捉到的罪犯被關監獄，一些被槍斃或用大刀砍頭。諸城的兩個軍官負責審查監獄，並決定誰應該被處死。小時候，江青就會數槍聲，猜測有多少人死掉。她的好奇心被激發了，有一天沿着長長的城牆走，聽說軍官們在白天檢查監獄時，經常要殺掉十來個人，包括一些清白無辜的人。為什麼無辜的人會被殺害？軍事長官的策略是保護自身安全，白天把城門打開一條縫，黃昏就把大門緊鎖。他們害怕外鄉人或其他不明來路的人惹麻煩。闖入者一旦被發現，就會被槍殺。她發現處決都在小東門執行。那是在一座吊橋附近，人們過橋時，橋會蕩來蕩去，讓人有一種下沉的感覺，但江青不害怕，因為她住在山上，習慣了登高。

她記得那時候一直在思考一些人為什麼要殺人，更迷惑不解的是公眾對殺人的熱衷。當諸城執行死刑的時間一到，富人們在高高的城牆上往下觀看，用來砍頭的大刀上綁着的紅纓穗會隨着大刀片舞動。犯人魚貫而入，每個人背上背着一張布告。即使不去看死刑，她也能明白，每一次拍手歡呼聲，標誌着一個人的死亡，拍得最響的是那些富人。

「有一次，我看到了懸掛的頭顱。」她繼續說。在那些日子裏，她和家人住在諸城的內外城牆之間。當她去城牆內的學校上學時，注意力被一種古怪的走路聲吸引過去。抬頭看去，一個老頭向她走來，挑着一副扁擔，一邊掛着一顆人頭，還滴着鮮血。她被嚇壞了，轉身就拼命地跑回家，把書扔在地上，一頭撲在床上，發起了高燒。「我想，關於我的童年，這應該夠了。」江青

平靜地說道。

2

江青在危險四伏的年代成長起來，在她的意識中留下了永久的威脅與動蕩的烙印。早在1920年代，軍閥和帝國主義橫行，威脅着國家的統一。上海和青島等貿易港口城市的工業化也刺激了五四一代青年的政治覺悟。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在尋求煽動起義、促進革命發展。他們在外國人的工廠和工人秘密接觸，傳播馬克思的思想，醞釀大罷工，抗議虐待勞工、長時間工作、僱用童工和悲慘的居住條件。當青島和上海日本紗廠罷工爆發時，日本人逮捕了「激進份子」，其中很多人是學生。1920年代最駭人聽聞的對抗發生在1925年5月30日的上海，當大學生們代表受日本和英國工廠剝削的中國工人上街游行時，遭到英國警察開槍鎮壓。那次流血衝突激起了强烈的公眾反響，波及到青島和中國其他城市。

1920年代後期，為了維護在山東的長期利益，幾千日本軍人駐扎在濟南和青島。雖然江青沒有詳細描述這段中國政治史，但顯然這在她身上已打下深深的烙印。1928年春，她剛滿14歲，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隊和軍閥馮玉祥、閻錫山發動了北伐戰爭的第二階段，完成了中國統一。日本立即派遣了一支遠征軍來保護濟南幾千日本人的利益，試圖阻止北伐軍北上。5月2日，蔣介石將總部移到濟南對付日本軍隊。在5月的第一個星期，日本和北伐軍在濟南的休戰被無數小摩擦和溝通的困難打斷。5月7日，蔣介石被迫撤走大部份隊伍向北行進，留下的隊伍落入了日本佔領軍的魔掌，日本人實施了幾乎一年的恐怖統治。日本人通過漢奸治理這個城市，禁止新聞自由和公開集會，並殺戮同情蔣介石事業的中國公民。江青順便提到這次危機，因為這影響了她的生活。

最後一個滿洲皇帝被推翻（1911年）後，江青繼續說，軍事首腦諸玉璞統轄了直隸省（後來的河北），包括首都北京。1927

年，她和母親來到天津，與姐姐住在一起，姐姐嫁給了一個服務於諸玉璞和其他北方軍閥的小文官。她記得1927年是蔣介石背叛革命的那一年：「我當時只有13歲，必須做所有的家務：抹地、打掃房間、買菜和去當鋪。但那（體力勞動）也鍛煉了我。不過，我還是想繼續念書。可是那裏所有的學校學費都高得驚人，我付不起。我的姐夫也失業了。」那一年，記得是北伐軍將到達的時候（1928年6月6日到達天津），她決定離家，去當一家中國煙廠的工人。當時香煙都是用手卷的，工作都由兒童來完成，但姐夫不准她去，儘管貧困狀況逼使他當掉了幾乎所有家當。他說，在那裏工作會使她變成一個「小官僚」（她沒有解釋這個綽號）[2]。儘管對他的反對很惱火，她還是聽從了。1929年，姐姐一家帶着江青和母親搬到了山東首府濟南。

濟南位於山東西部，距黃河只有6英里，與儒家聖地泰山有2小時的路程。從明朝開始，濟南就是一個重要的文化中心，內城聳立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城門和寶塔，外城牆是清朝修建的。江青搬到那裏時，城市人口超過了40萬，市內交通系統和外部鐵路連接是全省最好的。公共教育由於受到20世紀早期改革的刺激，也是最好的，有200所小學，幾所高中和學院，包括齊魯大學。通過教育系統，知識生活被具有現代思想的教師們構建，其中很多人是國民黨員。這個城市的種族構成，從19世紀開始就非常複雜，當時城市對外國居民開放，主要是歐洲人，大部份是德國人，最新移民是日本人，在江青到達這個城市時，大約有5000多日本人。

從明朝開始，濟南就以劇院聞名，與中國其他地方習俗截然不同的是，濟南的一些劇院有女演員。在這個歷史文化中心，江青找到了做演員的職業。她的學習是從山東省實驗劇院開始的，那是一所寄宿學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學費和生活費由政府提供。作為回報，畢業生通常要不定期地做一段學徒為劇院工作。

2　譯註：應是作者的誤會，江青原話是稱其姐夫為小官僚。

「1929年，我被濟南的山東省實驗劇院錄取。這是一所藝術學校，主要學習現代戲，也有一些古典音樂和戲劇課。那時我才15歲。學校免收學費和膳費，每月有 2 元津貼（約合60美分）。學校希望招收初中和高中畢業生，甚至大學生，而我沒有上過中學，嚴格説來，我是沒有入學資格的，我被錄取，只是因為學校的女孩太少了。我在那裏只學了一年，但學到很多東西。我如饑似渴地學習，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盡可能地多學東西。」她不僅廣泛閱讀了戲劇史，學會了唱傳統戲曲和演現代戲，還了解了很多樂器，如鋼琴，這在當時是舶來品，只學了 3 個星期。儘管老師很喜歡她。他是一個非常嚴厲的老師，為了校準她彈琴的節拍，用棍子打她的手腕，這是她最不喜歡的教學方法。訓練很少，她只是進行音階和基本功練習。

江青班上只有 3 個女孩，她是最小的一個。另外 2 個與其他同學一樣，看不起江青，因為她穿着破舊。校長夫人俞姍，曾經是天津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在此就讀）的學生，是其中一個女孩子的姐姐。她是一個「反動份子」，沒完沒了地欺負江青。但江青堅持立場，並設法搞惡作劇報復。40年過去了，她還能回想起一件有趣、卻不無敵意的往事。不過，她坦然承認了。

學校在一座古老的孔廟裏，夏天，房間非常悶熱。下課後，同學們經常到大殿乘涼，江青清楚地記得高大的孔子雕像佇立在大殿中央。他戴着一頂巨大的、前後帶珠簾的帽子，兩側是72位聖賢，他們是他的弟子。一個悶熱的夜晚，江青走進大殿，在一把舊藤椅上坐下來。那兩個女同學走進來，命令她搬椅子給她們坐。江青順從她們的要求，先提起一盞燈籠，幫助她們搬來兩把椅子。可是當她們得意洋洋地坐下之後，江青卻不動聲色，提着燈籠悄悄溜出殿外，把門關上，逃之夭夭。兩個女孩子突然間被關在陰森可怕的大殿內，嚇得大叫救命。男學生跑來安慰她

們，男孩子找到燈籠，在黑夜裏追趕江青，要「教訓她」，因為她欺負同學。她飛快地跑進小溪邊的灌木叢裏，躲在那裏不讓他們找到。但女孩知道最終她還是會回宿舍，到時就可以報復了。她以為她們已睡着了，悄悄溜回房間，鑽到床上，拉過蚊帳緊緊裹住自己。她們知道她非常怕癢，把手指不懷好意地伸進她的蚊帳裏，她尖叫起來。惱怒的女孩們強迫她保證再也不做缺德事。「那要看情況，」她含糊其詞地答應。

她們還一起經歷了很多有趣的事。為了演戲，江青必須掌握京白，全中國標準的官話和文化交流語言。她的口音是山東，特別是老家口音。蹩腳的京白惹來學生們哄堂大笑，他們的發音都已很流利了，不過，她堅持不懈。有一位同學教她，並耐心聽她練習台詞。她更多的回憶是對自己成就的驕傲，而不是憎恨他人。

有一次，學校上演一部由著名劇作家、南國社創始人田漢創作的「資產階級戲劇」作品《湖上的悲劇》，南國社是一個創新的、在那個年代很有影響的戲劇團體。校長夫人的妹妹被指定擔任主演，江青擔任B角，每逢觀眾最少的星期一演出。江青全神貫注地進入了角色，這正是她的風格，觀眾感動得哭了。這種反應也感染了江青。這種效果來自「自然主義」流派的演技（隨後，她解釋中共反對自然主義）。演出後卸裝時，校長和老師大步走進化妝室，誇獎她的表演和讚許她有成為一個悲劇演員的天賦。在讚揚聲中，她眼流滿面，匆忙衝出了化妝室。儘管如此，她把它作為情節劇再次體驗着，對於這一時期的回憶總的來說仍帶有一些慍怒：「事實上，我在濟南處處受氣。」她加上一句，沒有進一步詳細說明。

「當西北軍閥韓覆渠到濟南後，學校關閉。我參加了由學校老師和同學組成的流動劇團去了北京。我離開時沒有告訴母親，只是在火車就要開動時給她發了一封信。

「那一年（1930年），我才16歲，在北京吃盡苦頭。我的行

裝少得可憐，甚至連內衣都沒有。儘管我把家裏最好的被子帶了來，但還是冷得發抖，因為棉套已經破舊不堪。那時候的北京，漫天風沙，夜晚陰陰沉沉。當時我還不懂政治，根本不明白「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意義，我只知道要填飽肚子，還有我熱愛的戲劇。」

「1931年早春，我到了青島，（她形象地回憶對青島的最初印象：碼頭上寒冷的霧氣和帶着海水鹹味的微風。多奇怪呀，她說，儘管老家諸城距離此地還不到50英里，但從沒見過大海。）我以前的老師趙太侔，一個同鄉，曾經是濟南實驗劇院的校長，現在出任青島大學校長兼文學系教授。通過這些關係，他安排我進入青島大學。」

趙太侔的邀請使她心動，但搬到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則感覺不安。趙為了鼓勵她，許諾為她在大學裏設一個藝術系（大概是戲劇藝術，儘管她沒有這樣說），並提供她到青島的旅費。實驗藝術劇院的同學勸她接受，她終於同意了。（儘管她去了那所大學，但似乎從未註冊成為正式學生。）「實際上，趙太侔屬於國民黨改革派。他的文學觀點和胡適[3]很相近。我一度被資產階級所欣賞。」她笑着補充了一句。「有一段時期，包括梁實秋和聞一多的胡適派，曾試圖把我拉到他們那邊去[4]。聞一多是我在青島大學的老師，我旁聽過他很多課。」

「我們最了不起的反面教員是日本帝國主義。1931年9月18日瀋陽事件之後，東三省（滿洲）被日本帝國主義侵佔。那是不能容忍的。我們不能成為外國民族的奴隸。對我自己來說，也感到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迫切性。那時，整個中國掀起了民主革命的高

3 受過美國培訓的知識份子領袖。1949年後，他是主要的台灣發言人。

4 梁曾在哈佛和哥倫比亞大學留過學，並將莎士比亞所有的作品都翻譯成中文。聞一多是一位聲望很高的詩人，同時也作為中國民主黨派左翼領袖而聞名。出席第一次晚宴的姚文元插話道：「聞一多是在民主革命後期被蔣介石的打手殺害的，因為他參加反蔣運動。毛主席在他1949年8月寫的文章中對他評價很高。」

潮。很多學生罷課或向政府請願，工人也支持他們。廣大人民群眾都投入了這次運動中。

「受到這種形勢鼓舞，我對趙老師說，『我要參加請願活動。』他反駁道，『你也要製造麻煩嗎？』我楞住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轉身離開了，知道他非常不高興。我獨自走向小山，在樹林中徘徊。他說學生愛國運動是『製造麻煩』，使我深感困惑。最後，意識到他的觀點是錯誤的，我決定加入青島左翼演員聯盟（一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5]。

「在青島大學，廣大學生罷課罷考。在這種環境下，我拒絕接受老師的任何幫助，加入了大學教工隊伍，當了圖書管理員。我的工作是寫卡。同時繼續旁聽。每個月掙30元（約合9美元），寄給母親10元，在青島的生活開支很高，剩下的20元根本不夠。你知道，我不僅要支付自己的開銷，還要幫助其他同志。我們必須支持舞台表演，號召救國，[6]沒有人在財力上支持我們。我們把表演帶到工廠，帶到鄉村，人民歡迎我們，並幫助我們，但他們也很困難。當時我還不知道必須讓窮人獲得解放。這是我入黨以後才從其他同志那裏了解的，一個人必須為無產階級服務。」

大學只不過是江青青島生活的一方面。她在1931年到那裏不久，與一些劇作家建立了海濱劇社，宗旨是為政治，而不是為藝術：要在學校、工廠和農村用戲劇形式宣傳抗日。在城市新年慶祝活動表演結束後，劇組離開城市，奔赴鄉村，傳播江西紅軍發展蘇區的消息。1931年，關於紅軍領袖以及蘇區生活的消息非常匱乏，他們的力量還不能威脅國民黨政權。儘管如此，公開談論蘇區還是冒風險的。為了避免被滲透到農村的國民黨特務逮捕，海濱劇社決定在這個日本人佔領區盡量不張揚，分成幾個小組，分別進入鄉村。

5　她那一代人中比較敏感的人認爲，這次出行也是一次感情逃避的象徵。

6　救國是一個從1920年到1940年間廣泛應用的詞，指的是所有有組織的愛國行動，從日本人手裏「拯救國家」。

第一次進入鄉村，遇到了想像不到的貧困，幾乎沒有食物可買，公共餐館和酒館根本不存在。她多次談到饑餓的感覺。長期被迫挨餓吞噬着他們的鬥志。他們到達的第一個村子是嶗山灣，離青島海岸幾英里。演員們進村後，村民被男人的西裝和女人的中式直領、開叉裙子這些在民國城市裏司空見慣的服飾驚呆了。村民們很不歡迎他們，給了他們一塊銀元，顯然是讓他們快些上路。不僅如此，憤怒的村民還責怪他們來這裏找樂子，而不是認真演戲。劇團的宣傳沒有顯著效果。那些年，江青增添了善於反思的優點，儘管還根本不知道「總結經驗」（這共產黨訓練政治工作者的方法。在一場演出或一項工作完成後，立即跟進對演員表現的綜合評估）。

在打算離開嶗山灣時，村民建議他們去王各莊，一個離青島海岸幾英里的較大的村子。村裏有幾間酒館。江青被分配做孩子工作，日本人已佔據了整個青島沿海地區，通過教孩子們抗日歌曲，與他們建立關係。孩子們反應很積極。他們早就得到父母的教誨要警惕邪惡的「西方和東洋的鬼子」。孩子們很喜歡她，有幾個還邀請她去他們的家。顯然，她對這段回憶感到非常滿足，說其他劇社成員也和她一樣陶醉於這樣的成功。

劇組在王各莊的幾天裏，江青逐漸適應了當地的生活方式，農民們開始喜歡上她。他們把她從劇組裏挑出來，央求她唱他們最愛聽的京戲片段。江青高興地回憶着當時的情景。儘管那時她還不是太喜歡京劇，為了讓農民們高興，她答允了。不久，他們就參與進來，用當地的表演形式演唱。劇組贏得了人們的信任，他們開始將政治信息加入到歌詞和故事裏。這種創新在年輕的農民身上特別起作用。演員告訴他們蘇區生活時（大部份是二手報導），他們非常驚訝，特別是聽說食物和衣服的公社所有權。

海濱劇社的大部份政治作品處於實驗階段，其中一部在王各莊的實驗節目是《放下你的鞭子》的原版。這部獨幕劇是關於日

本佔領區東北難民生活的，是一個典型的街頭劇，1930年代全國最流行的抗戰曲目。因為原版有一些瑕疵，江青不想讓劇本廣泛傳播。一些當地藝術家試圖從她那裏得到副本，她迅速將劇本塞進口袋，從人群中溜走，直接跑到墳地，把它藏到墓碑下。

王各莊的觀眾包括很多士兵，他們顯然很喜歡劇組的表演。江青對他們的讚揚聲非常陶醉，於是同意和他們中的3個人來往。當在一起閑聊政治時，這些士兵不斷强調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合作，這種可能性對當時的她來説是難以置信的。儘管他們在政治上有分歧，還是很友善地分手了。士兵們堅持要送她一些禮物，表示對其藝術表演的贊賞。她晚上回到旅店時滿載而歸，有棉被、山東名產甘藍、蒸饅頭。後來才知道當天與她談話的士兵參加過1927年的上海起義，起義導致國民黨對共產黨的血腥清洗。在劇組到來前，王各莊就有一個共產黨支部，但她從未和那個支部接觸過，與共產黨的首次接觸是後來在青島。

幾天後，演員們準備離開王各莊，有些村民要求江青留下。她被村民的好客感動不已，但演員們必須繼續出發。每次出發去那些偏僻的地方，他們的錢就會花光，肚子餓得咕咕叫。有一次，他們和以往一樣一文不名地擠在一輛汽車上，過了幾小時，司機把車停在一處狹窄的山路上，要他們付車費。他們盡力説服他，到了目的地一定會付錢，但被大聲拒絕了，如果不是一些當地人替他們付了錢，他們就會被丟下。這種「窮」山民和「富」城市知識份子的尷尬會面給江青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以後，她在青島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探索了其社會意義。

提到那篇寫於1931年的文章，江青想起最近的一件事。在文革中，「林彪集團」（林彪一直作為她的主要政治助手受到讚揚，直到1971年秋）委任了兩伙人搜集在權力鬥爭中可以用來攻擊她的材料。一伙人以「五一六兵團」聞名，收集了所有她的各種歷史材料，以便找麻煩。這個「五一六兵團」還要求周恩來親

自搜集江青多年前寫的文章，其中包括這篇她還是海濱劇社成員時寫的。在他們的壓力下，周妥協了，但他的調查沒能揭發出什麼問題。除了這篇在青島的文章，另一份吸引他們的是「我的公開信」，刊登在上海《大公報》上。遲疑了一會兒，江青修正剛才的話說，實際上，周搜集到了她寫給一家婦女雜志社的文章。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幾乎把這件事忘了。當她被審問時，審問人批判她只是為了金錢寫這樣的東西。她同意在生活拮据的情況下，只是為了錢才寫了那篇文章進而挫敗了對方。

3

民國年代，一個窮學生進入大學課堂當旁聽生非常普遍，和正規學生做同樣的功課，但沒有權利拿學位。江青以這種身份接觸那些名教授，他們不僅在青島大學，後來在北京大學以及上海的大學都非常知名。作為青島大學的一名旁聽生，她第一次接觸到作為新思想源泉的知識份子。儘管她後來否定開放的學術條件，但在17歲這個敏感的年紀，她確實受到大學環境中自由思想的鼓舞。

江青承認，已經好多年沒有回憶在青島的這段經歷了，並把經歷重新簡略描述了一下。由於在戲劇方面的不凡經歷，她對古代和現代文學都很感興趣，還嘗試寫作（在她那一代受過教育的理想主義青年中很普遍）。她回憶起的第一位老師是聞一多，曾教授過唐詩、小說、戲劇和中國文學史。第二位是楊振聲，小說《玉君》（1925）的作者，當時任青島大學校長。她向他學習創作，對他比對聞一多的了解多。她也去上一位女作家方令孺的課，所能記起的只有她曾任浙江文聯主席。江青說，聞一多，楊振聲和方令孺都在美國留過學，楊和方在1949年解放時還健在，其他老師的名字想不起來了。她記得最清楚的是自己所下

的文學功夫。她在楊振聲課上寫的第一個故事得到熱情讚揚，楊誇她的故事很像著名女作家謝冰心的作品。江青是冰心（她的筆名眾所周知）的崇拜者，被這樣的對比弄得不知所措。隨後的一篇故事沒有獲得同樣的成功，儘管楊給了她全班最高分，但也作了批評：「李小姐，你的強盜太過彬彬有禮。當他罵人時用「該死」，那是很優雅的語言，對一個強盜來說不夠粗暴。」她聽到這樣的批評覺得很丟臉，於是再也沒去上他的課。

1931年夏，江青寫了一部戲，叫《誰之罪？》，是關於一個年輕革命者的。他和重病的母親一起生活，警察找不到他就抓走了他的母親，最後兒子被捕，母親死去。戲劇情節讓她想起劇本寫作老師趙炳歐，她和這位老師也有過一段苦惱的交鋒，那是在初秋時節。他稱讚了她的風格，但對劇中所表現的政治模糊性感到困惑，直言不諱地問，她的「革命者」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對此一無所知的江青，面對這樣的問題，感到沮喪和發窘。她反問道：「你告訴我，共產黨和國民黨有什麼區別？」對她的一知半解，趙發出嘲弄的大笑，江青覺得在他眼裏自己是一個傻瓜。然而，他很喜歡這個劇本，督促她把一幕擴展成3幕。這部戲並不那麼重要，她說，重要的是他刺激了我的好奇心。儘管在海濱劇社的路途中，她為蘇維埃製作了一些簡單的宣傳資料，現在她才開始思考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在思想上的區別。「從那時起，我開始了觀察。」

那個秋天，大學以往的平靜生活被1931年9月18日的「瀋陽事件」打破，日本軍隊進入了東北。在白熱化的危機中，她依然對改良主義者[7]的含義以及他們與國民黨的關係一無所知。儘管她和許多人以前都認為這些集中在大學的「民族主義者」是愛國的，

7　「改良主義」指知識份子所持的綜合態度，包括大學教授，從1920年晚期開始積極地支持國民黨。這些改良主義者支持向大眾傳播文化，並採用西方標準的公共高等教育，有時容忍日本帝國主義，強烈反對社會暴力和階級爭鬥。最後兩點是把他們和共產黨區分開的分水嶺。

崇尚國家統一。然而他們錯了，她現在認識到這些受人尊敬的改良主義者並不是真的不惜一切代價決心抗日。在「瀋陽事件」激起的愛國熱潮中，她公開聲明抗日，他們卻批評她是一個惹事生非的人。趙炳歐的譏諷縈繞在耳邊，她獨自走進青島城外的樹林，反復思考他說的話。她明白，趙一定是個國民黨員，國民黨並不堅持強硬的抵抗立場。她不願再接受趙炳歐的任何幫助，開始自己的事業。

我和江青談話的接待室相當寬敞，不過廣州 8 月的夜晚非常悶熱，在江青詳述她的童年時，濕熱的空氣開始包圍了我們，她建議換到另一個房間去。她站起身，高興地舒展四肢，整理並撫平她的裙子。我們去的房間同樣很寬敞，我們坐下來，她繼續講述。她還向作家沈從文學過寫小說，沈欣賞她的文學天賦，囑她每周寫一篇小說，他是認真的，但她從來沒做過這方面的努力。沈和姐姐沈舟舟住在一起，沈的姐姐常邀請江青到她家去。她見江青需要錢，建議她為沈織一件毛衣，付錢給她，江青拒絕了。在她這樣一個窮學生眼裏，沈家看上去很富有。聽說沈舟舟曾在北京的法國教會學校讀過書，一所高級的學校，學費非常昂貴，一個學期就要五、六百銀元。

在濟南、北京和青島歲月，她受的文化熏陶是，藝術學校（1929-1930）的一年，「文化殿堂」的 2 年（1931-1933），指青島大學和海濱劇社兩個文化圈。在那些年裏，江青養成了對小說和詩歌的喜愛。她還喜歡翻譯的外國詩歌，仔細閱讀了「外國古詩」，儘管她認為大部份詩是不能翻譯的，不能被外國人真正理解。她說，年輕時曾寫詩並考慮發表，還寫散文，其中一些發表了，但到了30年代，她認清這些遠不及積極從事革命活動重要。她只接受了 8 年正規教育，包括5年小學。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她真正的學習是「社會教育」，從實際經驗中學習。1933年僅僅是個開始。

3

從黨到監獄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

——魯迅《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1930年

俄瑞斯忒斯：你看不見他們，你不能——但我能看見：他們在尋找我，我必須動起來！

——T·S·愛略特《Sweeney Agonisters》

1933年江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一年對她的個人生活和展現她的歷史都具有重大的意義。她和許許多多同時代的叛逆青年一樣拋棄了家庭，厭倦了失去意義的宗教儀式。加入共產黨成為他們走向成熟的主要方式。像其他努力求知、維持生計並默默無聞地生活在國民黨殘酷統治下的同志一樣，江青很難保持自己的黨員身份，因為地下工作的特點決定了和黨組織保持聯繫很困難。當她在青島秘密入黨時，還完全不了解其組織結構，不了解除了自己身邊的同志外，還有誰是黨員。她也不清楚馬克思主義（當時中國共產黨膚淺掌握的外國學說）對她的國家有什麼意義。她生活在一個男人統治的社會裏，使她很容易受到侵害。

中國共產黨是在12年前由十來個不滿現實，渴望變革的年輕人在上海發起成立的。根據莫斯科的指示，中國共產黨和它的天

然敵手國民黨從1923年到1927年開始合作反對軍閥，希望建立一個統一的新國家。兩黨無情的分裂發生在1927年。當時的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為了自己的獨裁統治，向共產黨在城市的地下組織發動了大舉進攻。最後的決裂是在 4 月上海大屠殺後，而上海是共產黨的工人組織最强大和最有利於發動城市起義的地方。

兩黨分裂還導致了另一種分裂，出現在共產黨的農村和城市派別之間。1928年，毛澤東和朱德（自稱是中央委員會的追隨者）在江西省的井岡山創建了紅軍，但控制着中央委員會的城市派鄙視這種認為可以發動無知農民進行土地革命的非正統思想。20年代末期，城市派領導是李立三，一位在莫斯科受過訓練的辯論家和工人領袖。他在上海重新整頓了在1927年春被國民黨摧毀的黨組織，連續3年發動了代價巨大的城市起義。他同時還希望在上海推動「革命的高潮」：由農村的紅軍進攻這座工業城市，並把它置於共產黨領導之下。另一個年輕的激進者瞿秋白是一位在文學和政治理論上頗有建樹的作家。他從1927年夏對共產黨開始了大約一年的領導。他也錯誤估計城市的革命潛力。這兩個人似乎都忘記了中國幾乎沒有工業，絕大部份是思想保守的鄉村。他們都沒有認識到在多大程度上農村可以建立獨立的革命模式，且可以不受城市派的約束。這些錯誤讓上海的領導人及其追隨者容易受到國民黨蓋世太保的攻擊。特務清洗了國民黨內部知名的或受懷疑的共產黨員，追捕、囚禁和處決其他共產黨員。在實行馬克思經典模式的革命失敗後，年青的理想主義者於1933年前後紛紛離開上海。其中一些人撤退到了毛澤東和朱德在江西建立的紅色根據地，另一些人則前往莫斯科尋求庇護。即使在城市派解散後，關於中國要走哪一條道路的問題仍在理論家中間爭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應該把目標轉向城市，還是鄉村？是見多識廣的城市知識份子，還是農村的軍事人員，應該作為共產黨的理論家和代言人？黨的組織是冒險分散在白區工作，還是集結到蘇區？直

到1935年，中央委員會才把思路從蘇聯轉向中國。8月，在長征路上召開了遵義會議，毛澤東在新的領導集體中擔任領袖。

這些重要歷史時刻來臨時，江青還是一個為生活掙扎的少女，沒有父母、姊妹、丈夫和親戚的幫助，那時沒有女孩像她那樣生存。生在城市，長在城市，她對中國農村一無所知，更不知道那裏正播撒着革命的種子和希望。1931年，日本對東北的侵略破壞了中國的領土完整，也使江青第一次審視自己的世界，參加被視為顛覆的愛國者活動。此時的毛澤東和朱德正活躍在新的歷史舞台上。依靠年輕、狂熱的意志和鼓勵對貧窮和壓迫的憤恨，他們把起義隊伍帶到江西山中，那裏幾百年來就是綠林好漢的天堂。毛澤東在那裏被選舉為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首都設在瑞金。1931年在上海，28個布爾什維克（在莫斯科受過訓練的中國青年的綽號，他們在20年代末回國）以集體領導名義把瞿秋白趕出政治局，剝奪他對城市共產黨的領導權。他們深信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相呼應，通過共產國際的代表能夠找到通往國家統一的捷徑。從1931年到1935年（江青的政治覺醒期和黨的初建時期），王明（在共產主義團體中聞名的陳紹禹）領導着28個布爾什維克。儘管王明大部份時間都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但他的布爾什維克在中國已完全掌握了黨在城市的權力，而此時農村的政治發展更趨分散。

城市地下活動的生活現實幾乎不可能再現。沒有任何中國的歷史學家能够客觀和全面地記錄那段歷史。幸存下來的人也都遵從保密誓言。他們這麼做的動機出於傳統和革命的政治需要：一方面保護老戰友不因現在看來是非正常的行為而受到指責；另一方面保護有關建黨和黨早期歷史的一些說法，因為那段歷史受到了稱頌，至少是不能冒犯毛澤東。

這些說法之一是：錢不能玷污同志關係，或不可以靠花錢入黨。但如江青透露的，黨員經常帶有價格的標籤，可用現金支

付，如果是女人的話，甚至可以是性交易。此外，為了與其他同志取得聯繫；或讓人在緊要關頭保持沉默；甚至為了將來的不時之需，付出金錢都是必要的。人們不禁會質疑，所有這些和以往眾所周知的「歷史點滴」是多麼不同。

支離破碎的激進團體努力想和黨殘破的城市力量保持聯繫。對他們的生活來説，心理影響是最重要的。江青這樣的新手和那些難以捉摸而又不總是可靠的地下黨領導人的關係是脆弱。這在她和同時代黨員身上培養了一種持久的特殊態度。他們總是時刻警惕着，緊張着，防備着突如其來的進攻，也因此養成了謹慎，多疑和詭辯的習慣。他們總是處於順從和叛逆的交替之中。有時侯，他們還會做出極端舉動來喚起世人注意。

1

江青以期待的目光看着我，問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你想知道我是怎樣入黨的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江青回顧了她在青島度過的 2 年時光。她的回答會讓這一段還未公開的個人歷史有一個正式記錄。她當時還是一個沒畢業的學生，一個正尋找機會的演員和初出茅廬的作家。隨着和文化界交往的增多，她結識了一些共產黨員。那段時期，她在濟南學習戲劇。舞台是她收入的來源和學習的途徑。到了更具現代活力的海濱城市青島後，她逐漸脱離了少年的單純，愈發投入到政治交往中去，同時仍然繼續着學習和演藝生活。

在青島大部份時光，她對政治的關心是出於民族主義的激勵。讓她記憶最深刻的兩件事，是1931年的9．18事變和日本進攻上海的12．8事變。當中國的主權受到侵犯的消息傳來，她和愛國激進份子一道要求政府採取更強硬的政策抵抗日本。她很快開始懷疑在學術上受尊敬的所謂「改良派」實際上對不抵抗政策持同

情態度。另外，如前所說，他們對她公開表示要保衛祖國持反對態度。經過這一系列的事件，她意識到不能再把他們作為自己的老師。他們政治上的保守和不願意承擔風險的態度讓她學會了獨立，驅使她去尋求一個更理想的團體，最終找到了最激進的共產黨。

她艱難地建立起了新的關係網，靠着贏取黨的外圍成員的信任，逐漸向黨的內部靠近。1931年，她加入了左翼演員聯盟和左翼作家聯盟在青島的分支機構，第二年又加入了反帝大同盟。這些組織或多或少都是帶有共產黨色彩的前沿組織。關於這點她會在以後講述。為了生計，她在青島大學圖書館謀了一份管理員工作。這樣一份輕鬆的工作，讓她有時間「認真閱讀」大量以前沒接觸過的種類豐富的著作。利用業餘時間讀了「第一本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這本書喚起了她對其他在中國翻譯出版的社會主義著作的興趣。

在江青談到過去的工作之際，我向她提示了當年她和毛澤東相似的生活道路。12年前，毛澤東也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有着一份收入微薄的工作。他們倆都是利用這個機會閱讀了大量書籍，第一次接觸了馬克思列寧的基本理論著作，也都是在此後的一年裏加入了共產黨。江青直接了當地反駁說「我不能和主席相提並論。他在各種崗位上都做了大量工作。我只是在學生、農民和工人中做了少量的工作。解放戰爭時期在部隊工作過一段時期。」

當時青島的政治局面非常黑暗。由於一些（共產國際控制的）共產黨員的「叛變行為」，30年代黨在青島的部份組織陷於癱瘓，沒有常設機構，接納新黨員也特別嚴格。每一份入黨申請都要經過個別處理，對重要人物給予特別關注。1932年末，江青被介紹給當時任青島黨支部書記的李大章。李大章後來成為中國最大的省份——四川省黨的領導人。江青補充說李大章在文革期間受到殘酷迫害。江青申請入黨，遷延甚久，她向李大章質問，為什麼入黨請求被長久拖延。幾個月以來，她一直嘗試取得聯繫，

但杳無音訊。他很尷尬，但沒有作任何解釋。她相信應該有一個合理解釋。針對她個人的偏見是什麼呢？

雖然李大章也只有20多歲，但已在年輕的激進者中享有職業革命家的聲譽。李大章為她安排了一系列秘密接頭方法，讓她不受國民政府的逮捕和報復，安全與黨組織接頭。1933年的一天，3個共產黨員被安排和江青在青島的街道上做一次似乎偶然的相遇。江青在一個男同學陪伴下按照約定路綫行走。他們像情侶一樣相依而行，一邊警惕着特務和密探，一邊觀察着事先約好的暗號。計劃很成功，她被直接交給了黨派來的人。她的申請被接納，當年2月，她成為一名黨員。

這個入黨的秘密程序强化了她的立場，也改變了她的面貌。她記得那年春天，一些朋友並不知道她政治上的變化，開始給她起了一個外號：二趕子，因為她的腿骨瘦如柴，還毫無顧忌地大步行走。她體重日減，因為生活很困苦，每天只吃兩個燒餅（中國北方常見的面餅）。一些朋友問她，這樣怎麼活下去呢？她撒謊説，自己是到親戚家裏吃的。按常規，她應該在大學食堂吃飯，但這樣每個月要付8塊錢，她負擔不起。她還要在其他方面省錢，如看戲時只能購買3等票，儘管她本想坐頭等區。

為什麼這麼省錢？「還李大章的債」，她簡短地回答，沒有更多的解釋，但至少想表明她這個共產黨員是明碼實價的。

2

那年晚春，江青和其他數百名，很快是上千名，左翼作家、藝術家和劇作家不約而同地匯聚到上海。上海是東方的巴黎和莫斯科、現代中國文化的麥加，有着豐富的西方文化物質和精神內涵，但沒有把這種獨特的多元文化的結合傳播到中國其他地方。對一個想登上國家舞台的演員和置身於政治中心的年輕革命者來

說，上海有着無法抗拒的魅力。政治激進份子的記憶之痛仍然是1927年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清洗。在他們看來，這座城市裏流淌着數千名被懷疑和共產黨有聯繫的「革命烈士」的鮮血。那次政治劇變宣告了「白色恐怖」的來臨。從那時起，國民黨靠的是幫派、密探和憲兵的統治。有趣的是，由於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存在讓中國人免於逮捕的治外法權，政治氛圍讓左派的生活比在南京和北平要安全得多。那裏的國民黨統治較理性，也較少遇到激烈的抵抗。

江青離開青島時既興奮又緊張，一些朋友到碼頭送行，給她介紹了一個年輕人（她在談話中沒有公開他的名字）在路上照顧她。她對這樣的安排莫名其妙，但沒有表示異議。第一次海上行程，讓她暈船得厲害。雖然她可以爬上「虎」山，但對大海卻無能為力，將來也是如此。這次旅行是一場伴隨着暈船和嘔吐的惡夢。由於完全不能自持，她向其他人，包括她的旅伴請求幫助，多麼的無助啊！

更糟糕的是她和旅伴的關係變得緊張起來。旅伴從她和送行的朋友的交談中，知道她希望老同學，另一個男性，到碼頭接她，但不能確定他究竟能不能來，微感不安；於是他大膽提議兩人一起在旅館度過到上海的第一夜。江青被他的無禮激怒，斷然拒絕，知道他是個「壞東西」。她說上海有的是女子寄宿公寓，如果朋友不來接她，可以直接去。旅伴繼續糾纏，改變了策略，要她先付15元錢，可以為她找到一個適當的住處，她也拒絕了。船靠岸後，她在人群中發現了那位朋友，如獲救星，飛奔到朋友身邊，上了他的汽車，揚長而去，（她紅着臉回憶說）連行李都忘記在碼頭上了。

到上海當晚，她又遇見一個朋友。他在一個和俄國有關係的劇團工作（她在此提到蘇聯當時剛與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係，1932年12月12日）。劇團正在排演一出關於中國農村的「進步戲

劇」。他還邀請她到上海最大的百貨公司先施公司[8]共進晚餐。吃飯時，街上尖利的女人叫聲打破了餐廳的沉靜。「什麼聲音？」江青警惕地問。「只是一個妓女在拉客，」他回答說。這就是她和聞名的上海市民生活的第一次接觸（她邊笑邊回憶）。

她繼續回憶說，那個晚上的談話對她以後在上海的 4 年生活有着深刻影響。她第一次知道了新近成立的「春秋劇社」是左翼戲劇運動的主力。劇社由左翼戲劇家聯盟（劇聯）頭目田漢領導。 江青沉思着說，他當時可能並不知道1933年聯盟成立之初，她就在青島加入了它的分支機構。她說，當時田漢還不是「叛徒」（江青的這段話，間接地觸及到文革期間，在她授意下批判田漢的運動），曾為共產黨作過許多文化的與社會的活動。因為田漢當時為共產黨做了許多工作（田漢1931年加入共產黨），所以她相信只要見到他，並取得信任，就能和上海的共產黨支部取得聯繫，以維持她的黨員資格。

我問道：她已經是一個共產黨員，為什麼和上海黨組織取得聯繫還如此困難？

她解釋說，由於執行王明路綫，使得上海黨組織逐漸受到削弱，到1930年代中期幾乎完全瓦解，因此不能公開和直接的與其他城市的黨員聯繫。用她的話說，「我們像『浮萍』一樣幸存了下來」，指的是流離的共產黨員就像是水上的漂流物。她說，離開青島等於失去黨員身份。因為在上海這樣的城市，如果不能尋得新的個人聯繫，請求承認你原來的黨籍，是辦不到的。她相信，田漢是「劇聯」領導人，可以給她幫助。當時，他是一個迷一般的人物。她開始尋找，卻根本不知道他的地址。而且，她不會忘卻，在白色恐怖下，尋找這樣一個有名氣而與左派聯繫廣泛的人物，須冒生命危險。

因此，江青在上海的頭幾天，便費心到「春秋劇社」尋找田

8 解放後改叫第一百貨公司。

漢和其他領導人去了。尋求人們的指點和建立任何方式的聯繫都是極端困難的，因為她的山東家鄉話和在舞台上用的北京話無法幫她聽懂上海話，這也是必須要學的。她對田漢的曲折追尋，很可能遭遇特務或需要緊急逃生。她像寫劇本一樣繪聲繪色地敍述當時的情景。她回憶起曾在一個著名劇作家和令人敬畏的政治家面前介紹自己。想在上海工作是多麼令她焦躁不安。她說，想被引見給田漢，因為他不但是「春秋劇社」領導人，在黨內也具有影響力。看來她的真誠和執着起了作用，有人決定為她安排介紹田漢。

他們告訴她，田漢是兩兄弟的大哥，弟弟田洪（被她稱為「壞蛋」）會負責聯絡她。田洪向江青示愛，其態度使她厭惡。按照指示，田洪領她去見不斷變換住地的哥哥。他把她領到他媽媽的住處。雖然地址記不清了，但記得那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女人，和藹地接待了她，留江青一起住幾天，對他們談談（江青）自己的一切。沒有其他選擇，江青只有同意，但出言謹慎。她只告訴他們想要知道的：在青島認識的若干黨員的名字（她懊惱地說，其中一些人在以後幾年裏叛變了）。這使得她贏得了田漢家庭的信任。

幾天後，田漢、周揚、陽翰笙[9]一起來看江青。他們說，他們代表中央委員會，了解青島黨組織的情況，已決定允許她通過適當的渠道和上海的黨組織建立聯繫（此舉似乎只是初步恢復她的黨員資格）。其次，他們問她可以為黨做什麼工作。在得知她是演員後，他們讓她在電影和舞台表演之間做一選擇。她同意文化工作對他們的主義是重要的，但拒絕了這兩項提議，她寧願去做「基層群眾工作」。她的意思是不願出風頭，喜歡做宣傳工作，可以經常與群眾不拘形式地接近。她的答覆一定使他們驚訝

9 實際上，她提到的後兩人是他們在1930年代用的化名周志毅和華寒。他們都是左翼戲劇運動的主導人物。

（她現在覺得很有趣），因為與他們的期待相反。但他們仍一致同意，介紹她到無產階級的劇團，「山海工學團」，劇團由劇作家、製作人張庚領導，這是一個很難打交道的人。

「山海工學團」是一個將普通教育和表演藝術結合在一起的機構，學校由陶行知命名，目的是實現他的教育思想和社會關注。陶行知是江青一直佩服的人，是那時著名教育家，與聞一多齊名，兩者都不是中共黨員。那時陶已年過40，總是以長輩的態度關愛着包括江青在內的充滿理想的年輕人。江青說，她喜歡和這些受他「喜愛和保護」的人共事。

「山海工學團」座落在大場，離陶行知創辦的上海戲劇學校不遠。現在那裏已經變成了飛機場。由於不收學費，「山海工學團」吸引了來自附近文化和經濟都很蕭條的農業和工業區的學生。學校提供9種課程，還為沒有接受過早期教育的婦女、店員等人設計了補習教育課程。從一開始，陶行知就積極參與學校的建設，頻頻造訪，對其生存深感責任重大。每當學校資金短缺，或學生沒有足够食品時，他和老師們就會出去為學校募集資金。

出於顯而易見的熱愛和尊敬，江青繼續說：陶行知是一個學識淵博、思想開明的人。這一品質從他名字的寓意和他的身體力行中就可以看出。陶行知受倡導直觀論的新儒家哲學家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影響，曾用名「知行」（字面意思是知識和行動）。陶行知原名的含義是「知要先於行」。在他長大後，把名字倒過來變為「行知」，涵義也變成「行要先於知」[10]。

受約翰·杜威（五四運動期間曾在中國演講）民主教育思想的啓發，陶行知到美國深造。這一經歷使他的「思想開明」起來。回國後，他不知疲倦地支持大眾教育：免收學費，提供免費的食宿——晏陽初發起的大眾教育運動的結果。江青初識陶行知

10 這一哲學區別體現在陶行知研究的約翰. 杜威的經驗主義和仍然對現代思維起重要作用的明朝的新儒家思想中。共產黨所强調的用行動實現理想也是這一哲學的體現。

時，他是育才學校（免費的小學，有着良好聲譽）的校長。早在幾年前（1927年）陶行知的名字就和南京曉莊師範學校聯繫在一起。據江青説，曉莊師範學校「專注於思想的自由」，各種政見在那裏都允許發表，這令國民黨感到害怕和失望。1927年初，國民黨利用獨裁權力，以公開鼓吹民主和無政府主義的罪名，逮捕了該校許多學生，其中有些是黨員和共青團員。政府最終在1930年關閉了學校，囚禁了老師和學生。對這一非常規教育機構的鎮壓，在政治對立的雙方都是轟動新聞。作為年輕的激進份子，江青為勇敢青年的故事所深深打動：他們唱着『國際歌』直面獄卒，不懼他們的威嚇。

田漢負責把她送到「山海工學團」工作，就覺得有資格控制她生活上的一切。田洪被派去跟着江青上課，匯報她的一切行動，使得江青沮喪和無法忍受。田洪干預她的工作，並表示她所討厭的痴情。無奈之下，她寫信給田漢詳告難以忍受他弟弟的行為，希望派田洪做別的工作。

當時，田漢的弟弟和別的朋友都稱呼他「老大」，因為他是田家的長子。這個稱呼很適合他，因為這也是流氓社會使用的黑話（她這麼説時，對於後來被報復的人顯然露出快活和憤恨的語氣）。她是如何學會流氓語言的？在與最底層人民打交道的政治工作中，誰「教會」她黑道的語言？她真正接觸黑話是在1950年代初，當時她化名在鄉村工作。在那裏，她收集了各種黑話，包括一個匪幫中為首的9個人的稱呼，匪首通常被稱為「老大」。

儘管她向「老大」田漢揭發了「壞蛋」田洪，卻不能擺脱田洪的糾纏。不久她就明白了，田洪對她的侵擾，原來是田漢指揮下的一種政治行為。這種手段實在陰險。她找田漢的本意，是希望透過他與上海的黨組織取得聯繫。結果適得其反，田漢用轉彎抹角的手段阻止她和可以庇護她的人聯繫。沒有這些重要的聯繫，再加江青在左翼圈子裏的名氣，她正「飄蕩在危險的水

域」。更無情的是，她沒有地下黨保護的困境漸為人知。一些被當作朋友的人拒絕提供幫助，他們知道像她這樣處境的人遲早會被逮捕，自己可能會受牽連。

江青通過田漢認識了廖沫沙，「劇聯」的一名成員。廖是一位戰鬥的作家，「那時還算不錯」（間接指他後來在報刊上對毛澤東的婉轉批評，這樣的冒犯導致了垮台）。江青說廖的岳父是一位名人，但沒有說出他的名字。30年代初的廖很貧窮，與妻子生活在骯髒的街區，住在一個閣樓上。江青和他們見面時，他的妻子正在懷孕。廖沫沙表面上請江青同住，實則借機考察她的政治傾向和性格。沒有更好的去處，她接受了邀請。房間狹窄，江青被迫睡在一張小桌上。他們經常為她而爭吵，因為她是外人，情形日益惡化，她晚上幾乎無法睡覺。

在和廖夫婦接觸同時，江青也接觸了以大夏大學（上海大學的別稱）為中心的知識群體，她在那裏旁聽課程。從30年代早期到1935年的12．9運動，知識份子的政治色彩始終是極左的，受到俄國指導下的王明路綫影響。每次師生發起示威游行，大量年輕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就會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在12．9學生運動[11]的高潮中，「大批王明路綫追隨者高舉着紅旗」。她強調大部份遭到逮捕的都是中共黨員。

江青在大夏大學學習時，天氣變得悶熱。她清楚地記得穿着薄衣的舒適感覺。在學生中交朋友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作為外省來的女演員，令人矚目地參加各種左翼活動，削弱了他們對她的信任。為了擺脫廖沫沙夫婦的牽累，她必須盡快找到錢。她拜訪了一個家境好的女同學。女同學禮貌地接待了她，讓她受寵若驚。她開門見山地提出借20元錢，女同學猶豫了一下，嘀咕着說已把錢交了學費，目前手頭很緊。儘管如此，江青還是借到了

11 12.9運動是和五四運動和1966年的文革學生運動同等重要的大規模學生運動。都是由北京大學發起。對這一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參見J. Isreal 和W. Klein的*Rebels And Bureaucrats: China's December 9ers*（伯克萊，1975）

錢，徑直跑到廖家，打算把錢轉借給他，因為知道他也急着用錢（她在這裏閃爍其詞，暗示是用錢來「換取」廖沫沙對她突然離開的沉默）。在他拿到這筆錢時，她提出要搬出去住，並請他盡快地還錢（說到這兒，她打斷了談話，憤憤不平地說，直到今天，還沒收到廖一文錢）。

暫且不談廖沫沙，她必須盡快償還同學的債務。怎樣才能做到呢？她確實還有其他一些微薄的收入，包括在幾個中學兼課。（學校按小時付費，但她沒有說明究竟有多少收入。主要開銷是交通費，到大學去聽課，去教書，去劇院表演和在城裏辦事。）因此可以存下錢來，在合理時間內償還所欠的20元錢，使得那位同學很意外。這讓她感到欣慰。廖沫沙沒有提更多要求。她也決心不再與「戲聯」的人有任何來往，特別是那些阻撓她和黨組織接觸的人。他們剝奪了她最想要的：在上海恢復黨員身份。

3

在30年代，對各種年齡和職業的左派份子來說，參加游行示威已成一種生活方式。有組織地就時政問題發表看法或向政府請願，比獨立的個人更少受到處罰。江青回憶說：1933年比以後的任何一年都更容易發動示威。同年8月，她正在教書，並擔任郊區女教師團體的代表，還加入了一個由學生和工人組成的團體。他們曾一起到碼頭歡迎英國工黨的馬萊爵士和法國的瓦揚·古久列（共產黨員、人道報編輯）。9月的第一個星期，他們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反戰集會。在兩支銅管樂隊伴奏下和鞭炮聲中，歡迎人群揮舞着紅旗歡迎這些「反對帝國主義的傑出代言人」。

在大學發動的游行和在上海寬闊馬路上的游行是截然不同的。她對大學場景的回憶：教授、學生、課堂和思想的展示比不上對現場逮捕和騷亂的記憶深刻。如同她回憶的那樣，從1933年

到1934年，上海和大夏大學黨組織執行的是王明左傾路綫，共青團的政治立場比王明路綫更左。由於黨內各種政治分歧，她不能自覺把這些同志當作朋友。不管同志間是多麼的不愉快，但大家都要面對國民黨威脅。國民黨一直想瓦解有組織的抵抗，派遣秘密武裝起來的藍衣社、（軍國主義青年團，被稱為法西斯，常和希特勒的黑衫黨和墨索里尼的棕衫黨相提並論）間諜、特務和情報人員滲透進學生團體中。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尤其嚴重），區分敵友是非常困難的。[12]

為了推動抗戰，江青很快和朋友們參加了席捲上海的示威活動。1932年7月18日，紀念國民黨第19路軍在上海抗日一周年之際，她和一個年齡相仿的男孩上街為部隊募捐，他們遇到了其他抵抗者，包括一隊同樣冒着生命危險募捐的人。看到那些臥在鐵軌上的堅强的人們對政府容忍日本侵略的抗議，她猜想其中一些人是來自中央蘇區的紅軍（指的可能是第19路軍的戰士，他們10月在福州建立了人民政府；但他們要求和鄰近的共產黨中央蘇區建立聯合陣綫的提議遭到拒絕）。

頻繁參加街頭示威，為她進入組織創造了條件。沒有預告的情況下，學生領袖會突然宣佈集會時間和地點，支持者從住處迅速趕來集合，亮出口號和要求，在警察和便衣抓捕他們前便各自散去。對年輕人與政府的抗爭和英勇行為（當然也包括她自己）的回憶，讓她感到振奮。她幾次提到這樣的示威活動是冒着生命危險的，但抗議者別無選擇。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方法體現自己的價值，為他們的事業籌集經費嗎？這些活動受到左翼教育工作者聯盟（教聯）的支持。陶行知和其他持同情態度的人都屬於這一組織。

江青對紀念1931年日本侵略東北（瀋陽事件）而組織的示

12 30年代早期的時候，她和她的城市中的共產黨朋友奉行的是王明的路綫。直到1937年，江青批判了王明，轉而接受了毛澤東「中間路綫」，這一路綫否定了王明和更左的青年團。

威活動記憶猶新。對左翼學生和激進份子來說，那一系列抗議活動最終招致了混亂的失敗。國民黨秘密警察和共產黨叛徒抓獲了共青團主要成員，並宣稱他們是「自己人」。這些犧牲的團員發誓：決不做「敵人的爪牙」。他們寧願為事業獻身，也不會像懦夫一樣活着。在一次誓師會上，他們喊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不惜一切代價抵抗）、「寧左勿右」。儘管江青很佩服他們，但對他們的遭遇還是心有餘忌。她說，從此參加示威活動就變得很謹慎了。

她決定再次尋找與地下黨的聯繫。加入紀念瀋陽事件的抗議活動肯定是有風險的，但由此能獲得一些黨員的贊賞和關注，給他們留下一些印象：她是如何勇敢投身於共產主義事業，藉以和地下黨組織建立關係。這個辦法果然行之有效，她贏得了一些領導人的信任，提升她為遊行隊伍中一個秘密縱隊負責人。

身處第一綫，她將面對更多考驗。示威活動的一個組織者請她照顧兩個剛加入行列的女工。這兩個人，她都沒有見過，（這裏她坦率地講述了自己最初的印象）讓她吃驚的是這些女工都比她穿得好。怎麼可能呢？她們顯然沒有家累，而她則不然。（她沒做更多解釋。是否她在暗示正供養母親、丈夫、情人或同志）。雖然她穿得並不漂亮，但還是和普通女工打扮不同。她是一個女演員，一個有知識的女學生，縱然為了政治理由，她也不穿無產階級裝束。但這些參加游行的人，並不介意她與眾不同的裝束，結果把她選為領頭人。

在9月18日游行當天下午，江青正在義演《嬰兒殺戮》。這出戲改編自日本電影，藉以諷喻當前的現實。演出籌集的錢將捐給英美煙草公司罷工工人。像往常一樣，戲票分幾等：普通票價20或30分；貴賓票從 5 元到10元不等。因為戲票沒有完全售出，劇團的忠實支持者陶行知買下了剩餘的票，以此支持演員和工人的行動。這場義演讓她永生難忘，演出讓觀眾和演員，其中也有未

參與示威者，都非常興奮。她一般在舞台上很少注意觀眾反應，但這次仔細觀察了觀眾的舉動。因為劇本的反抗色彩，觀眾和演員一樣可能會受到懲罰。那天下午，有人被捕，最後一幕結束後，演員們從舞台後門疏散，快速跟上游行隊伍。

游行結束後，人們紛紛散去。江青感到孤獨無助、疲憊和饑餓。一摸口袋，錢包不見了，現在連吃一頓飯的錢也沒有了。她想起附近有一家白俄開的小餐館，提供美味的羅宋湯。她認得開店的老人，相信會讓她免費吃一頓。進餐館後，有幾個在這裏就餐的觀眾，一看見她，大家都非常吃驚，原來以為她被警察抓走了。他們為李雲鶴歡呼，這個女明星因扮演各種角色都應付自如而出名（她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些話是自吹自擂）。一定有人對餐館老闆講過：陶行知曾勇敢的站在觀眾中讚揚江青的表演，於是她得到一頓豐盛的晚餐，因為老闆支持陶的自由主義思想。

第二天，她被安排去參加反日集會，說好由一個女人把她領到出發地點，但她們在路上走散了。江青恐怕同志們會誤認她不願參加游行，就匆忙趕到泥城橋，但沒有遇到熟人。於是又往前走，發現那裏已經被騎警封鎖，大部份是英國租界當局僱用的錫克兵。在這個危險區域，她盡量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尋找着。偶然碰到了一位男同志，才知示威地點已改在經常舉行示威活動的北京西路。她沿着愛文義路向那裏跑去，街上沒有示威人群，繼續尋找，直到看見一群打扮不俗的文人。他們在普通群眾中出現，說明示威活動就在附近。

對街頭追逐的回憶讓江青疲憊不堪，她最後的話幾近耳語。沉默了一會後，她又恢復了嗓音。前一晚對童年的回憶讓她很激動，不得不靠服用安眠藥才平靜下來。由於不小心過量服用，她倒在地板上，護士發現後把她抬上床。她笑着這樣對我說。這個晚上，她的保鏢小趙，一個護士和醫生比以往更加小心。他們在屋裏走動，觀察着江青的情緒和疲勞症狀。小趙想請她在午夜前

休息，江青奚落着他又一次笑了，笑聲意味着他很難讓江青休息。短暫的意志交鋒讓她高興起來，她站起來，解開絲巾，在房間裏來回踱步，絲巾在她身後不停地晃動着。

在游行隊伍的邊上，她認出一個以前教過的男學生。他現在是學生會成員，背着一個很引人注目的包裹，裏面可能裝着武器或傳單。不久，一個錫克騎警看見他，高高舉起警棍，從跳躍的馬上將男孩胳膊上的包裹打落在地。男孩被打蒙了，立即失去平衡，然後掙扎着跑開了。錫克士兵的野蠻激怒了江青，她的第一反應是跟着男孩，照顧他。這樣做很不明智，因為她也可能被警察打。為了引人注意，她緩步來到服裝店前，假裝觀看櫥窗裏的新款服裝，一邊觀察周圍情況。很快就有一個中年婦女走過來，靜靜地站在她旁邊。江青認出是老王，已在上海做了一年基層政治工作。她示意江青跟在後面走到離泥城橋不遠的愛文義路上。這時發覺警察在跟踪，江青讓她先離開。因為她不像江青那樣有名，可以安全脱身，江青則小心地回到了學校。

儘管江青既不是中央委員會中的一份子，也不是省委的成員，甚至不是上海黨支部的成員，但她的共產主義革命家的名聲卻日漸擴大，使她在示威時需要特別小心。如果被邀請參加那種即聚即散的「飛行集會」，她會認真研究安全狀況。如果她繼續自由地從事文化工作，那生活會像被捕坐牢那樣有意義嗎？（經過反複思考，她流露出不安，這要綜合考慮自我犧牲的意願、生存的意志和對名利的渴望）。

左翼政治和文化團體要想生存下來就必須採取有效的行動和聯絡方式：最低限度地降低警察的注意。江青和朋友們不斷討論成功的策略。她工作的地區社會和政治情況複雜，不易引起外人注意。表面的僞裝讓地下聯絡更加方便，但需時刻警惕。

那年秋天，她收到了一封豎折的信，信上寫着她的名字——

雲鶴[13]。但鶴字做了改動，左半部份不見了，只剩下「鳥」字——為了安全起見，這種做法在白區很常見，人們為了政治掩護或私人理由會隨時改變姓名。信用的是暗語，發信人對她受到狗咬，正住院康復表示慰問。江青知道這封信的真實含義是：她的生命處於危險中，必須盡快離開這個地區。

當時給她的這個密令是多麼令人氣惱！從她到上海起，首要目標就是取得信任，以便和黨組織建立聯繫。左翼組織中的競爭對手（其中一些人很難相處）不斷給她建議，很多都是自相矛盾的。其中一個叫「革命團」的組織現在已轉向極左，「比王明的黨中央還左」。如她所說：青年團和其他青年學生團體已被「左派操縱」。現在這些極左團體強迫她和一些沒有左傾的朋友離開，但並不關心他們去哪裏。在知道她的困境和不安後，「教聯」強調她必須執行立即離開的命令。她開始不願接受，上海不僅關係到她的政治和職業利益，也是她唯一有着密切私人聯繫的地方。最後，她還是屈服了，離開上海到了北平。

在她的回憶中，北平的白色恐怖和上海一樣嚴酷。政局因為上海「第三種人」的出現而更為緊張。「第三種人」也出現在北平和天津，保護國民黨政府在那裏的利益。在這裏，江青比以前還要孤立和危險。她到北京大學做了一名旁聽生。在她所處的第三個學術環境（青島大學和大夏大學之後），她選擇了社會科學。這一領域有北大最受歡迎的教師之一——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達。每次李達上政治學課，全校學生都會擠滿課堂，江青也是他們中的一員。

在北大期間，她幾乎沒有錢，一個月的收入（未披露來源）僅僅7元錢。付房租後，餘下的膳費，平均一頓飯只能花4分錢，所以只能吃饅頭和開水度日。北大是毛澤東工作過的地方，也是中國

13 30年代初，她一直使用李雲鶴的名字。李是她的家族姓氏。在朋友中，她一般被叫做「鶴」。

最著名的大學。即使她這樣的旁聽生也可以通過上課和閱讀學到很多東西。她還設法搞到了能够進入北京市圖書館的圖書証。在圖書館裏，她花了幾個月的時間，閱讀了十分豐富的文獻。

通過她跳躍的敍述，一個少女的形象浮現於學者的嚴肅形象之前。當描述在北平學騎自行車的時候，她臉上閃爍着笑容。幾次狼狽的摔跤後，她才掌握了竅門。她承認年輕時在許多方面都顯得笨拙，平衡感也很差。她靠着意志的力量學會騎自行車和其他許多事情。

4

那年春天，江青從北平回到上海。旅行是由黨領導的「教聯」秘密安排的。這次遷移，個人的戲劇性比事件展現要豐富得多。「教聯」負責為她安排，表明與黨組織中斷一年多的關係得到了恢復。經過「教聯」和其他左派團體的努力，幾個月來，上海許多學校都被共產黨掌握，用她的話說「落入我們的手中」。黨派她到為女工開設的夜校上課，夜校同時也受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管理。儘管女青年會在這方面起了「啓蒙」的作用，但在其他方面是「非常反動的」。江青對基督教教義毫無興趣。

江青同時代表基督教和共產黨在這裏工作，看起來自相矛盾，需要對她的解釋做更多的歷史考證。1927年，由於蔣介石背叛了他的共產黨盟友，導致大部份由黨領導的工會被取締，或由那些沒有政治背景和受國民黨控制的工會所取代。這次工人力量的轉變，發生在世界正經歷經濟危機、共產黨中央遷往江西之際。1932年，少數堅持留在上海的工人領袖必須建立新的關係。除了滲透進國民黨組織，沒有其他選擇。當時聲譽良好，倡導現代改革的基督教團體在勞工中影響很大。在30年代城市的多重危機中，基督教女青年會和基督教青年會都致力於工人福利和海外事務上。在中國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上海，因為這裏對勞工的有組

織剝削是最嚴重和最普遍的。從國民黨角度看，這些外國的和基督教的團體有助於改善政府的國際形象。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和青年會自然就成為唯一不受政府壓制的非官方組織，可以公開從事愛國和其他改革活動。

女青年會在上海的負責人很明智地像使用外國僱員一樣，把中國婦女派到相應崗位上。也許是「教聯」的推薦，或由於她在上海的從教經歷，江青也獲得了這樣的機會。夜校向女工開放，大部份是不諳世事的農民，提供的服務範圍甚廣，包括社交俱樂部和娛樂活動，調查改進工人的工作條件，教授女工讀寫及醫學知識。基督教女青年會還支持抵制日貨的運動，排演反日的話劇，舉行愛國的演講會和討論會。

女青年會的這些愛國活動和其他激進團體——左翼教育家、作家和劇作家聯盟、共產黨等的活動不謀而合，但後者不僅關心教育和愛國問題，更注重在工人中培養無產階級覺悟。他們相信最終會在中國和世界上推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1934年在勞工領域的工作和江青以前的經歷完全不同。她指出，和工人階級一起工作，並不等於需要像其他女工一樣從事體力勞動。她是一名教師，這一角色中包括和女工一起生活，這是女青年會安排的。做了一段時間，她被派去訪問工人家庭，收集他們家庭生活狀況的資料。她很喜歡這件差事，後來還去調查了診所和小工廠的情形。此後，她把注意力放到更大的工廠，大部份是中國人管理、外國人出資。進入工廠是困難的，經理們害怕對他們不利的報告會鼓動工人在政治上聯合起來，進行反日宣傳，中斷生產。她發現對大大小小工廠的訪問最吸引人。

她在調查過程中所受的阻撓和辱罵，為對工人生活的全面見證所彌補。工人們住在「宿舍」裏，通常由廉價隔板搭建，供離家的工人居住，男女分開，生活的各方面都受嚴格控制。分給江青的宿舍在廠區，她住在後屋，前面的一間用作教室，幾個女工

使用其餘的房間。她責備自己開始時顯得幼稚和沒有效率，為教學做準備佔據了太多時間，那時她還要演出和參加政治活動。她的時間都用在備課和批改學生作業上，結果沒有時間休息，經常工作到精疲力竭。疲勞和挫折是她對那段生活的主要記憶。

但她面對的考驗和女工們比起來是微不足道的。學生們大部份來自大型的紡織廠，而大多數紡織廠是中國人管理的日資企業。其餘學生為英資企業，特別是英美煙草公司工作。她回憶說：工廠6點開工，為了準時趕到，同宿舍的女工要在早晨4點起床，摸黑穿過城市的街道來到工廠。英美煙草公司的工作環境像地獄一樣恐怖。女工們最好的報酬是每個月17到18元。童工的使用非常普遍，收入幾乎低到一無所獲。夏天，這裏的空氣異常濕熱，車間的窗戶都被關閉，宛如洗蒸氣浴一般。冬天，窗戶卻是開着的。因為廠主擔心感覺舒適的工人會懈怠下來，他們利用夏熱冬寒來控制勞動效率。煙草廠的衛生間條件惡劣，令人作嘔。

煙草廠的設施極差：只有幾排原木長椅。為了能爭到一個位子，孩子們（不一定能獲得工作）必須夜裏來排隊，整夜地擠在隊列裏，有幸獲得位子的兒童要不停地工作幾小時，不斷地捲煙，並把它們裝進盒子。（「就像我小時候想要做得一樣」，江青笑着說。）

為了說明煙草廠的情況，她引述了一個「富家女」的故事。她沒有解釋富人為什麼會選擇把女兒送到這樣聲名狼藉的野蠻環境中來。女孩看起來很有志氣。她前一天夜裏就早早地來排隊，想獲取一個工作機會。負責看管工人的工頭想把自己人安排到女孩前面插隊，見女孩固執地不願移動，工頭抓着她的肩膀，把她拖到樓梯口，踢下樓梯。女孩的身體蜷曲着，倒在樓梯下一動不動，不久就死去了。江青平靜地說：目睹這種情景，工人會很容易順從。

除了來自煙廠的工人，學生中還有在附近中國人擁有的小

襪廠裏工作的女工。那裏的工資水平比煙草公司更可憐，最高工資是每月12元。即便如此，還是比平均工資要高得多。對工人的剝削是無止境的，如果織機上損壞了一根針，看管機器的工人要賠償一元錢來換新的。她的一個學生在一個月裏碰巧損壞了八根針。在賠償以後，她再沒錢付食宿和供養家庭。她可能永遠都無法還清這筆罰款。江青說，她當時掙得很少，幫不了那個女孩。

工廠對女工的欺壓比起工頭來還要好得多。江青也和工頭打過交道。為了讓工廠有充足的新勞工，工頭們（或像他們所說的「拿摩溫」）經常到鄉下招募農民，然後帶到城裏做廉價勞力。「拿摩溫」採用的手段是極不道德的。為了吸引無知和貧困的農民，他們把上海描繪成天堂，即使最笨的農民在那裏也可以賺大錢。因為無可救藥的輕信和對生存的渴望，老農民把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家人賣給工頭。誘惑他們的「天堂」實際上是真正的地獄。工時長得難以置信。換班的工人擠在籠子大小的局促空間裏休息，靠一份可憐的粥和水維生，他們都患上了營養不良，許多人死掉了。

江青發覺不但國民黨敵視她的政治活動，和她競爭的左派團體也嫉妒她的成功。當她在女工夜校做老師時，上海的共產黨和青年團（由青年激進份子組成，和共產黨保持着鬆散的聯繫）領導人都競相爭取群眾，宣傳他們的主張。

每當她在掃盲和宣傳工作取得進展時（她所說的基層工作），一些青年團的人總是以逢迎和討好的手段，試圖分享她的成功果實。他們顯然聽說「教聯」在支持她的工作。他們不滿這良好的聯繫。一天，一個青年團員突如其來，到她宿舍的房間裏。江青對這次會面閃爍其詞，不清楚他是想強姦，還是和她鬥爭。只知道他蠻橫地想在個人方面或政治方面壓倒她。江青堅持自己的立場，拒絕認同「他們的政治方式和言詞」，她說。擺脫了他，她繼續組織追隨者參加一年一度紀念瀋陽事件的游行。

整個城市中，首要的敵人當然是國民黨。它的特務組織精於僞裝。經驗讓她日漸警醒和聰明地躲避追捕（回憶帶給她顯而易見的愉快）。國民黨為了擴大對他們的逮捕，經常突擊檢查巴士。每次看到警察揮旗叫停巴士，她會用幾種辦法逃避身份檢查和可能的逮捕：如迅速地離開，在他們搜捕前消失；離開巴士時，如果碰到警察，謙恭地和他們打招呼，使他們放鬆警惕，讓她離去；如果被困在巴士上，無法躲避嚴格的搜查，準備作激烈反抗；在携帶敏感政治文件情況下，如果受到警察盤問，做出令人討厭的動作，讓特務們無奈地放行。

儘管有她的言傳身教，夜校女工仍很少能理解政治。幾個女工還因為大意，落到共青團員手中，遭到他們語言和身體上的污辱。這是對她學生的公開侵犯。也許是女工們文化程度太低，對持有煽動性材料的危險並不重視。她想起這樣一件事：一次，她正在上課，一些女工把政治宣傳品帶進了課堂。女工們的疏忽激怒了她，她晃動着傳單，狠狠地批評了她們，把所有傳單燒成灰，命令女工到厨房煮了幾壺開水。連一無所知的厨娘都被迫參與進來，一起把燒焦的碎片投入沸水，銷毀了有關黨的秘密的最後痕迹。

她通常為 2 個班級上課：為夜班女工開設的早班課和為換班工人開設的晚班課。下午沒有課，她可以自由活動。一天晚上，她回來很晚，在房間裏批改學生作業，直到早晨4點才上床。上夜班的女工在天亮前陸續回來。通常為了不驚醒她，她們會在門口脱下鞋，踮着腳進房間。江青住的房間通風很差，有時會把門半掩着透氣。那天，她們的腳步聲比平時重，還伴隨着物體和牆碰撞的聲音。她感到奇怪，開門見女工們一個接一個走過。通常她們携帶的是上班用的小工具盒，這次卻挎着從未見過的大包袱。江青讓女工直接到屋裏檢查。

現在，她自問：當時是多麼專橫，連自己都感到驚訝。她們叫她李老師，喜歡她從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於人。江青尷尬地

說，女工們對她非常好。她們欣賞她很少捲入政治紛爭（儘管事實上不是），不希望她受到政府的報復。

她命令把全部神秘的包袱打開。女工們開始摸索着包袱，慢慢地打開外皮。江青急不可待地把她們推到一邊，自己解開包袱，發現裏面裝的是用報紙卷起來的傳單——政治宣傳品。女工們還以為這樣做不引人注意。「幹蠢事」，她尖叫道。然後，馬上讓她們把外表惹眼的報紙扔掉，留下有價值的傳單。她嚴厲地說：從工廠來回運送敏感的材料，一定要用最小的包裹運送。更好的方法是把傳單藏進雨傘裏。如果途中遇到搜查，可以立刻扔掉傳單，說帶的只是一把雨傘。

在工人中分發傳單，是最簡單的事，但要保證女工的安全也很棘手，不是江青獨自能夠應付的，此外還要顧及自己的安全。江青提醒女工們：如果發覺後面有人跟踪，不要直接回宿舍，應該繞路到其他女工家，或溜進商店甩掉敵人。既便這樣，女工們經常的缺席還是令她神經緊張。

一天晚上，幾個女工沒有像往常一樣下班回來。她焦慮不安，難以入睡，擔心她們會遇見麻煩，最後她們總算都平安而歸，有兩人在幾小時後回來。她們相信被跟踪了，就按她教的辦法：躲進工友家裏，在確定沒有危險後，才原路返回。種種跡像表明她的住處已不再安全，她收拾好行李，借了一些錢，另外租了一處房子。

她搬家後的一天，在外出寄信時遇到一個青島的老朋友（她生動地描述了這個老朋友出眾的外表和整潔的白色制服）。在談話中，他告訴她在公共租界的郵局做出納員，但這只是一種對外身份，他本身是一個左派組織成員。「能見到你真是太高興了！」他不斷重複着這樣的話。她對他的工作感興趣嗎？願意和他合作嗎？願意幫他傳遞信息嗎？這些提議讓她疑慮和害怕，她說還沒有與黨組織取得聯繫，希望這樣說可以打消他的念頭。當

然，她承認這都是為了自我保護而說的謊話。

她把這次邂逅向黨組織匯報，組織指示她，如果再遇到這個老朋友該怎麼做。幾天後，她路過兆豐公園（這個公園是專為外國人建造的，她淡淡地說。由於她買了季票，隨時可以進園），又遇到這個朋友。按照黨組織指示，她遞給他一封信，儘管當時並不知道信的內容。他們談了幾句話，她說不應該再見面了。他似乎理解她所受的限制，但顯然不想與她失去聯繫。幾天後，他送給她一份名為『世界知識』的左聯刊物。他們又在兆豐公園相遇了，他仍然堅持要求她的幫助，還邀請她一起吃飯。她焦慮地推說沒有時間，拒絕了邀請。為了擺脫他，她沿着另外一個方向離開公園，那條路緊臨着一個居民區。在路上，她遇到一個女朋友，她們最初相識在青島。這個姑娘邀請江青到住所一敍。因為沒有公共汽車，江青不敢耽擱，拒絕了邀請，快速向前走去。

與那個姑娘分手後，平靜的街道突然被身後傳來的男人叫喊聲和咒罵聲打破了。她回頭一瞥，發現有兩個男子在追人，另一男子在尖叫：「你們這些蠢豬！」過了一會兒，那兩個人靠近她，轉過臉去看，一個像工人模樣，一個像商人模樣。她還沒來得及說話，就被一把抓住了，被他們緊緊架在中間。她一生中第一次遭遇綁架。她氣壞了，說在這條街上，根據治外法權，中國人可以免受官方逮捕，他們的綁架是違法的。但這些話毫無作用，他們一臉冷漠，粗暴地把她帶到一個警察分局。這裏沒有女監，他們不能對她搜身。由於沒有脫掉衣服，他們只搜到一本世界知識雜志，僅憑這本書並不足以給她定罪。

儘管拘留她的理由不充分，對方仍決定把她驅逐出租界（從租界大批驅逐不受歡迎份子是對付他們比較容易的方法之一）。由於害怕被帶到一個陌生地方，她告訴他們在黑夜中不認得路，也沒帶出行衣服。但對方不理不睬。為了讓她快點離開，他們從她的一堆隨行物品中拿起一件她從未穿過的天鵝絨旗袍。她很快

把衣服穿上，下面仍穿着簡樸的洋裝，洋裝外套着一件羊毛編織的馬甲。從貼身內衣裏，她偷偷地拿出最珍貴、也是最危險的秘密表格，放進馬甲衣角裏。穿着這身奇怪的裝束，她離開了警察局，進入茫茫夜色中。

如同一生中所遭受的許多恐怖事件一樣，江青把這次黑夜逃亡描述得荒誕離奇。她疾步向前走，能跑則跑。在走過鄰近街區時，一個奇怪的身影出現了，又一次碰到了綁架。她飛快地逃跑，不久到了城市邊緣，鄉村就在前方。她放慢腳步，上氣不接下氣，疲憊不堪。突然，一雙粗糙的大手從背後抓住她，並牢牢地按住她。儘管使勁掙脫，但一點用都沒有。「我被綁架了！」她聲嘶力竭地一遍又一遍尖叫着。但這都是白費力氣，在城區外，沒有人能聽到她的叫喊或來救她。她以為又是警察，但走近一看，來人是黑社會打扮。見沒有逃跑的希望，她試圖裝出可憐相來等待機會。她指責這些人對待婦女的行為像畜生一樣。她的話起了一點作用，其中一人放鬆對她的控制，做出可笑的騎士姿態。當他們沿着路向前走時，她趁人不備，假裝被絆了一下，摔倒在地，故意跌進莊稼地裏，偷偷取出那份秘密表格，飛快地塞進嘴裏，使勁地嚼了嚼，吞進肚子。儘管紙吞進肚裏的感覺有點怪，但什麼證據也沒有了。

他們把她從地里拉回路上，押送到區警察局關了起來。在看押房裏，她聽到這些人打電話向上級匯報，説抓到一個嫌疑份子。他們以為有這一成績就可以申請使用一輛帶黑色牌照的私人轎車（同白色牌照的普通車相比，這種轎車更有氣派）。「但是，當時所有轎車都很小。」江青補充道。

坐在看押房中不久，她就明白自己是被牽連的，他們懷疑她與國民黨的公敵有聯繫。她解釋，國民政府高價懸賞緝拿這些公敵的首腦人物。一個有膽量的密探抓捕一個嫌疑人（此人的口供和合作可能會讓抓捕者最終捕到一個公眾敵人），可以賺取大筆

賞金，並揚名立萬。

在他們眼裏，她有什麼價值呢？這顯然是與最聲名狼藉的共產主義者王明有關。這個28個布爾什維克的領袖，1930年到1931年間，從莫斯科經過共產國際的培訓回來，掌管着中共中央委員會。到1930年代中期，王明被證明是中國共產黨的叛徒（由於當前的政治原因，她毫不猶豫地指出這一點）。儘管他犯了錯誤，其追隨者仍然控制着上海的共產黨機構。為了能逃脫出去，她不能暴露與王明或受其影響的組織有任何關係。尤其不能暴露出自己捲入城市起義或工人組織中，這是王明路綫的戰術要素。

在接受審訊時，她努力在那些對方可能察覺的方面表現出清白無辜。如承認到過公園和一個年輕男子（這個男子顯然是一個告密者）約會。很清楚，她一直在被人監視。她說，僅僅由於喜歡看在那裏玩耍的孩子，因此在兆豐公園漫步是她的習慣。（該公園曾是那些認為治外法權能保護自己免受中國政府逮捕者的一個熟悉的約會地點）現在，她必須回到教師的正常工作中去。她的故事看來沒有令對方信服，因此仍被作為疑犯從區警察局移送到市警察局。重新入獄使她非常生氣。「你們應該多花時間去抓捕那些真正的共產黨員！」她想起當時譏諷那些逮捕她的人，感到很好笑。

5

傍晚持續的炎熱，使她那橄欖色的皮膚像清晨一樣散發着光芒。江青說道：「我曾被國民黨綁架過，並被拘留 8 個月。」這段經歷以前從未說過，她臉上的表情流露出複雜的情感：無緣無故遭囚禁的挫敗感；在擁擠的女子監獄裏、生活在自嘲中的幽默感。

在監獄的囚犯中（全都是政治犯，沒有刑事犯），一個有經驗的女共產黨員給了江青一些有用的忠告：她打量她（江青）的外表說，留短髮使你看起來像一個激進份子。這個女共產黨員自

己扎着長辮子，看起來土裏土氣，她裝成文盲，行動傻裏傻氣。江青覺得她的話有道理，也裝得很愚蠢。當其他犯人高唱革命歌曲時，她就堅持京劇（對當時的她來說，唱京劇是落後的，說罷哈哈大笑。）不管她裝得多麼愚蠢，警察局還是不放鬆詢問她與革命團體的關係。後來才知道，這是由於犯人中有一個女叛徒的緣故。此人告訴警察：李雲鶴並不像她裝出來的那麼天真。

在政治犯中，有一個女工，在江青進來前已被捕 8 個月了。和許多被黨內叛徒出賣的好同志一樣，她的故事是一個典型。叛徒是一個被稱為黑大漢的監獄官，他曾是共產黨員，走左傾路綫的王明派份子。黑大漢是安徽人，入黨後在江蘇省委工作。在上海被捕入獄。被捕後 2 小時就背叛了，成為國民黨秘密警察，但表面上仍假裝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他追踪這個女工好幾天，最後跟到法租界，她就住在那裏，以便享有治外法權。在騙取她的信任後，他說她的身份已經暴露，處在非常危險的狀況下，需要立刻搬家，並帶上黨的文件。「這一手段非常毒辣，」江青冷漠地說道。這名女工是一個選擇住在法租界，並持有正式居住證的同志，她認為治外法權能保護她免受中國警察的逮捕。但是，黑大漢說服她離開了，當她一跨出法租界時，立刻被警察包圍，在尖叫聲中被拖進警察局。官方對她的被捕發佈新聞稱「她是自願把黨的文件交給抓捕者的。」江青譏諷道。

當她被投入黑大漢掌管的監獄後（也就是江青被關押處），黑大漢試圖和她發生性行為，不知道他的企圖達到沒有。大約就在那段時間，他娶了另外一個女人，但當他開始追又一個女人時，背叛了他的妻子。他不僅是一個叛徒和無信仰的人，還是一個虐待狂，常常無緣無故傷害妻子。有一次，他強迫妻子平躺在地上，把磚墊在她腳下，猛地倒在她腿上，使她的膝蓋粉碎性骨折，落下終生殘疾。

這個受黑大漢欺騙而被捕入獄的女同志，被奪走了黨的文

件，因此與可能保護她的黨組織喪失了聯繫。獄警為了逼她供出黨的關係，嚴刑拷問，她沒有屈服。最後，叛徒黑大漢出來，代她寫了一份供狀。

對江青來說，面臨的最大困難是同外面保持聯繫。她一直希望有人能出來證明她的清白。她怎樣才能被釋放呢？她給曾做過兼職教師的工人夜校寫了一封信，請求他們能派一個證人。等了幾周，也沒人來。她發給獄友的信息沒有回音。她企圖同獄內外保持聯繫的唯一後果，是引起了警察局的注意，對她進行了更嚴厲的審訊。經過一系列在當時並不清楚的聯繫，她了解到黨組織沒有忘記她。有人化名給她送了一條被子、麵包和一些錢。警察把錢沒收了，麵包到她手裏時已成了麵包屑，只有被子完好無損。

不久，又有許多被逮捕的婦女進了監獄。江青吃驚地看到新來的有5個以前的學生。其中2人被捕的原因，據說是為了替共產黨送被子、麵包和錢給江青。她們生氣的表情流露了對她的怨恨。看到這些無辜的婦女遭受不公正的懲罰，江青被激怒了，要求面見監獄官理論。衛兵把她帶到審訊室，江青站在監獄官面前，大聲叫喊：「你們抓不到真正的共產黨員，只會抓幾個善良的給我送被子的姑娘，你們為什麼不槍斃我呀？」黑大漢被激怒了，使勁抽了她一嘴巴。這一巴掌使她一陣眩暈，幾乎站立不穩。他還用非常下流的語言辱罵她，江青也罵還他。

聽到我在審訊室中的話，這些被捕學生感到極其不安，江青回憶道。為了使她確信並沒有怨恨，她們堅持自己的被捕與她毫無關係，並猜想可能是由於參加了游行才被抓起來的。在她們努力使彼此平靜下來時，江青的注意力轉向了狹小的窗戶，透過這扇窗戶，她看到一個送葬隊伍。這些被捕學生也在觀看，黑大漢也注意到了這個送葬隊伍。他的眼中閃着兇光，面部表情變得虛假、傲慢。他對在場的警察和犯人宣佈：「我不會利用這個共產黨員的葬禮隊伍製造另外一系列的逮捕，因為女監的人已經多得

容納不下了。」

在監房重新安置後，江青開始訓練其他女犯應付審訊的方法。只要有可能，在受審訊時就說一些無關緊要的話，如『我們只是在看游行隊伍』。但她們笨拙的表現令人失望。一個由於拿着傳單而被捕的婦女是一個文盲，她對這些材料的危險性毫無概念。在江青記憶裏，這些女犯人的情緒都容易極度激動。只要有一個女人哭泣，所有人都會跟着哭成一片。為了試驗一下，江青讓以前的一個學生（這個學生當時仍然尊稱江青老師）開始大哭，其餘的婦女馬上也嚎啕大哭，整個監獄被哭聲淹沒。看守監獄的士兵通常都比較年輕，不像監獄官那樣無情。然而，這種集體哭聲仍使他們極其惱火，其中一個最按捺不住的衛兵總是提着一根鞭子，威脅誰再哭就拉出來抽一頓。聽到他的威脅，幾個女人被嚇哭了。不久每個人都在抽泣，甚至包括一些衛兵。

新的被拘者都要接受單獨審訊，對受審的和等待受審的人來說，這種經歷同樣都是痛苦的。最後，大部份比江青晚進來的女犯一個個都被釋放了，為什麼還不釋放她呢？她解釋說，「因為沒有人站出來證明她的政治清白。」在一個學生快要被釋放前，她在旁示意，托她帶口信給共產黨幹部「如果沒有證人，江青將永遠得不到自由。」同時，她還讓這個女孩使黨組織確信：江青的真實身份還沒有暴露。

即使那個女孩子按着她說的做了，但也沒有任何結果。最後一次求助，江青決定動用外國關係，她知道監獄官害怕外國人。江青告訴另一個將要被釋放的學生去找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外國人來保釋她。這一招還真奏效。一個外國人來了，證明她的清白，於是江青立即被釋放了。

離開監獄後，由於害怕連累別人，江青沒有回到以前的住所，而是搬到一個朋友那裏。1935年2月，中國農曆新年，江青開始了新一年的生活。

4

從左翼到舞台中心

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於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於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驅制駕馭，

曹雪芹《紅樓夢》

1930年代的上海是迷人地方，同時也是一個充滿凶險的城市。自從繁華的唐都長安以來，上海的國際化程度超過了中國所有城市。在公元八、九世紀，來自中亞和南亞的貿易商以及佛教徒，使這個中央王國的生活迅速多樣化起來。一千年後，當中國的帝制開始走向沒落時，上海港被置於不平等條約體制下。在這種體制下，歐美的商人和基督教傳教士分別在這裏尋求物質上的利益和從精神來挽救它。商業的膨脹鼓勵了新的社會和文化變遷。作為中國最西化的都市，上海成了現代教育、出版新聞以及表演藝術最發達的中心。

江青對在上海歲月的回憶，揭示了外國人與中國人、窮人與富人、反動份子與激進份子、投降派與愛國者之間的對立，即財富和權力不平等的極端對立。對於像她這樣的被壓迫者來說，生活是痛苦的。

在1930年代的上海，300万人口中約有 5 萬外國人。江青似

乎只是模糊地分辯人群中的外國人。在她的記憶裏，種族方面，她的熟人、朋友或敵人中，沒有人與眾不同。在更大的城市範圍內，這些外國人無處不在。按照不同的喜好，選擇不同優點的社區，分布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他們住在西式公寓裏，周圍是田園風光的公園。他們有自己的管弦樂團、芭蕾舞團、電影院、書店以及報導世界各地新聞的雜志。對於那些渴望從舊式教育中解脱出來的中國青年來説，外國人豐富的文化具有很大的誘惑力，但在政治上是危險或無益的。

上海的外國商業主義催生了一個新階級：中國的資本家。他們都是野心勃勃的人，操縱着國內外市場，同時也擔負着為國民黨政權提供金融支持的角色。如果説外國人是生活在香格里拉（世外桃源），那麼，這種新的半獨立的資產階級則是生活在苟延殘喘之中，因為嶄露頭角的共產主義不能容忍自由企業及其文化商品。

然而，在1930年代，好萊塢在資產階級及其熱切期待變革的兒女中發現了一個有利可圖的市場。外國迷人的男女賽璐珞肖像刺激了對都市化標誌的需求，如鷄尾酒吧，巴黎時裝，西餐，保齡球館，出租車和社交舞，像平·克勞斯貝一樣的低音吟唱歌手（平·克勞斯貝的流行歌曲曾被中國文化清教徒認為是黃色歌曲）以及滿街不可避免的妓院（包括異國情調的白俄女人和按摩院）。物質享受、異國娛樂和社會優越感，淡化了這些城市新貴的政治意識。他們忽視數量上遠遠多過自己的窮人，積極從那些對中國有政治野心的外國投資者那裏獲取利潤。這使他們成為政治覺醒的左派輕而易舉的目標。關心無助的民眾和決心為國土完整而戰，成為反對國民黨人士的共同目標。然而，大部份激進作家、教師、請願者和演員最優先做的是，投資於中國最大的天然資源——被動員的貧苦大眾，向他們灌輸無產階級覺悟，期望以此促進革命的轉變。一切革命言論中，左派的聲音實踐了兩個主

要的歷史傳統。首先是士大夫的職責，這是一種盛行於明清時期（1368－1911）的新儒家立場，即停止對紛亂世事的玩世不恭、或道家的避世態度。相反，有功名的人應該獻身於天下人的福祉。在1930年代，有政治覺悟、決心喚醒大眾、反對自私自利寡頭政府的作家、藝術家、教師和演員表現出一種相似的公共責任意識。他們把這種意識溶入他們的專業語言。在熱情洋溢的反對外國威脅的言論中，1930年代的左派還繼承了另一個歷史傳統，即對外來統治的反抗。明朝創立者推翻了野蠻的蒙古人，恢復了本土化的統治。300年後，明朝的防禦力量逐漸衰退，1644年，中國落入滿人的統治下。267年後，滿人又被孫中山團結起來的力量推翻。到了1930年代，繼起的一代年青民族主義者將抵抗日本人。

溝通方式的擴展是20世紀的一個新生事物。政論文章的影響力因更普及的讀寫能力和更多更廣的發行出版渠道加強了。激進的聲音通過政治性戲劇和電影進一步放大。在清朝統治的最後10年間，開始了戲劇的創新，在民國統治下加速了這種創新。傳統中國戲劇的主要模式被隨意改編成歌劇。即使存在地區差別以及不同流派內各自的演變， 中國歌劇仍逐漸形成了特色：情節簡單、人物造型化、劃一的手勢、令人眼花繚亂的特技、高腔和微弱的管弦樂等。除了某些地方性的和現代化的變異，所有角色都由男人扮演。當中國人向國外尋求新思想時，忽視了我們的大歌劇，這個名義上的孿生兄弟。因為他們認為歌劇的音樂和合唱以及誇張風格在文化移植中勢必失敗。相反，他們受到話劇的吸引。在話劇中，語言承載着意義，提供了吸引人的新情節、新人物和新的哲學觀念。

中國人對外國戲劇的嘗試發展得生氣勃勃，但在共產主義政權勝利後很快就停止了。1907年，一群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成立了「春柳劇團」。第一次表演的是中文版的茶花女（小仲馬的小說）。西方戲劇很快在年青人中流行起來。他們渴望扮演新角

色。中國在1920年代的10年間，是唯一自覺現代化，且沒有後來那種文化或政治抱怨的時期。這個時期是以巨大的翻譯工程為標誌的。易卜生、斯特林堡、尤金·奧尼爾、蕭伯納和奧斯卡·懷德的作品是被翻譯最多的。同時，摹仿的或創新的劇作家利用歷史或當代題材塑造自己的話劇。到1920年代中期，洪深、曹禺、歐陽予倩和田漢成為全國聞名的劇作家。他們的作品在進步人士中流行了40年，直到文革盛行嚴厲的無產階級風氣時才被禁止。

作為一個十多歲的女演員，江青不僅學習傳統劇目，也開始學習現代劇目。隨後，面對中國可能被日本帝國主義滅亡的局面，一批先鋒派作家被迫重新審視在相對平靜的20年代曾佔主導地位的唯美主義學說。備受第一代自由文化人推崇的帶西洋調情風格的美學在30年代早期嘎然而止。一些以左翼為代表的新聲音出現了，他們更看重目標，努力追求一種簡單、通俗，能激發民眾救國激情的風格。

在一個流行由協會和團體來管理的社會中，左翼聯盟的建立是政治發展的必然產物。表面上看，這些都是由作家、戲劇家、教師、新聞工作者、批評家等組成的專業團體，眾所周知，他們都是左翼年輕大眾喜歡的人士（儘管他們不一定是共產黨員）。象其他年輕的激進人士一樣，為了求得一席之地，江青急需加入到團體中去。1931年，在青島，她加入「劇聯」（1931年，該團體由許多小戲劇團體合並而成），也是首批捲入這種迅速轉變的左翼團體中去的。「劇聯」主要成員有上海藝術劇院（1930年成立，並在同年推出羅曼·羅蘭的《愛情與死亡遊戲》和雷馬克的舞台劇《西綫無戰事》）和南國劇社（由劇作家田漢創建）。從一開始，「劇聯」就有時代特徵和國際化色彩。與基爾德劇院，、十三排劇院（後更名為十三排戲劇研究所）、聯邦戲院和30年代美國的戲劇家聯會一樣，它也被作為一種傳遞政治信息的工具。

在危急的戰況推動下，各地衍生出新的戲劇團體，街道劇院、鄉村演劇隊等（如江青在山東參加的海濱劇社）十分普及，深受歡迎，最後被共產黨大規模採用。在城市中，由業餘社團和小社團推出的霍普特曼和布萊希特風格的正宗無產階級戲劇越來越多。江青也參演了這樣的劇目，並最終在專業劇院（該劇院面向萌芽中的資產階級，包括知識份子和文化消費者）上演。在那裏上演了果戈里， 奧斯卓夫斯基，史特林堡和易卜生的資產階級劇目，提出了人類狀況的問題，引起了一場自由的文化革命。1960年代，這場革命被江青鎮壓。

20世紀早期的中國，在專業劇院中，女演員仍是稀有之物。在較少商業化的業餘劇院，她們的情形要好得多。傳統戲劇大部份由男演員壟斷，一些男演員還專攻女角。他們在極小的腳墊上蹣跚行走，逼真地展現女性的「裹足」之美。但對整個中國來說，男演員的優勢並非都是如此。在廣東，男人和女人很早就一齊出現在戲劇舞台上。在浙江，戲劇實際上由女人壟斷，她們也扮演男子的角色。浙江作家魯迅常常發表關於男人喜歡女人演戲的評論。

不論男演員和女演員的地位孰高孰低，他/她們在社會上都很受歧視，甚至在1930年代的國際都市上海，儘管其中的佼佼者被眾多新興的商人圍繞，但仍常常被拿來與屠夫、罪犯、游民和妓女相提並論。在我的整個採訪中，儘管江青渴望表達其政治業績，但對她在這一時期的社會地位相當敏感。

1920年代早期，著名劇作家兼導演洪深（曾在哈佛留學）第一個堅持在現代舞台劇中使用女演員。在田漢的指引下，在業餘劇院和實驗劇院已開始使用女演員。田漢20世紀中期在上海創建的具有影響力的南國劇社，是山東濟南實驗劇院和「劇聯」的先驅。這兩個劇院都是首批在藝術上接受女演員的戲劇團體，儘管公眾對此沒有反應。有一個關於江青悲哀的諷刺故事：她從來沒有把對田漢的不滿（田漢對江青也一樣）與對他的專業成就混為

一談。田漢發起了專為業餘人士和現代劇團設計的小舞台運動，正是在這次運動中，江青首次贏得了公眾的注意。

1

1930年代的上海藝術團体盛行，江青宣稱加入了左翼聯盟。左翼聯盟的作用包括保護藝術家免受國民黨對異端書籍的粗暴審查、對先鋒藝術的破壞、對革新電影的鎮壓、對自由教育的限制。每個社團都有自身的政治色彩，這種政治色彩是領導人品質的體現和其所信仰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到1930年代為止，有左翼作家聯盟、教育家聯盟、戲劇家聯盟以及社會科學家聯盟。所有這些團體最終都與左翼文化界總同盟（文總）連結在一起。「文總」是由劇作家陽翰笙領導的。江青曾在1933年底與他見過面，當時他是「劇聯」的領導人之一。儘管這些形形色色的社團是獨立的，但各自成員（包括共青團員在內）之間的個人關係網絡是錯綜複雜的。

在1935年農曆新年被釋放後，江青很快恢復了演藝生涯。她說，有生以來第一次受到真正的喝彩。幾個左翼團體都秘密派人與她接頭，建立關係。儘管她尚未成為辦過正式手續的有充分資格的共產黨員，但左翼團體承認她是一個革命者。她强調他們已經知道了她（以一個滿懷熱情去消滅反動思想的人的口吻宣稱）。現在，他們開始彼此競爭想把她拉到自己一邊。他們一定已經認識到，不論她曾經參加的戲劇、電影和其他活動看起來是多麼平淡無味，但在本質上都是革命的。

在1935年初的幾個月裏，江青仍遭受着長時間蹲監獄所帶來的痛苦折磨。監獄裏缺衣少食以及不能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使她的身體非常虛弱。在被關押期間，她的月經停止，一直沒有恢復。一到下午，她要遭受發冷發燒的折磨。她的這種身體狀況被傳到上

海黨組織那裏。他們提出送她到浙江的一個療養地去休養，那裏氣候比較溫暖，然而被拒絕了。因為她首先希望恢復與上海文化生活的聯繫。儘管如此，她還要再等幾個月才能開始正常的工作。

在慶祝新年期間，田漢主持的「劇聯」，送給她一張觀看田漢戲劇《回春之曲》的免費票，祝賀她從監獄裏被釋放出來。她非常高興能去，但找不到可以禦寒的衣服。所有的過冬衣服在她蹲監獄時都不見了。她說，大部份時間都非常冷。她將此歸結為體質衰退和缺少衣服。她向朋友借了一件大衣，拿着票進了金城大劇院，她選了一個能够欣賞到整個演出的昂貴包厢。

幾天後，她去看了另外一部戲劇。她說這段故事的目的與戲劇本身無關，而是為了説明某些共產黨關鍵領導人並不知道她也是共產黨員。她坐在包厢裏等待有人掀開門簾進來，一邊無聊地看着面前走來走去的人。她的眼睛突然被一張熟悉的面孔吸引住了。這是一個穿着非常出眾的女人。她穿着一雙漂亮的鞋子和一件黑色毛皮大衣，戴着一幅墨鏡。她是一位著名人士的妻子，叫慶澍[14]，據說剛從洪湖蘇區回來。顯然，在劇院的那個晚上，她沒有注意到江青。幾個月後，她聽說江青是「劇聯」成員，但不知道她還是一個共產黨員。

那年春末，她乘火車到了北京，在沒有黨組織的保護下逗留了幾個星期。她繼續在北京大學旁聽李達講課，並在北京市圖書館裏長時間地閱讀。此時，她聽到消息說，田漢和其他重要左翼份子為了他們的共產主義理想已在 2 月被捕。她記得當時是何等擔心，他們的被捕將給她的政治生涯帶來不利影響，因為他們領導着「劇聯」。

當時，國民黨政府非常反共，僅僅去看蘇聯電影也是非常危險的事（回憶到這裏，江青難以置信地大笑）。有一次，她在

14 江青指的可能是孟慶澍，陳紹禹的妻子。陳紹禹，別名王明。因爲他最終成了江青的政敵，她可能有意迴避直接提及他的妻子。

北京看一部蘇聯電影，為了避免遭到守在出口的官員盤查，她不得不從一個偏門溜了出去。走在街上時，遇到了田漢的弟弟田洪（壞蛋）。他在前年曾追求過她。她向「教聯」的黨組織詳細匯報見到他（和其他人）的地點。

突然，她收到「教聯」的通知，囑她速回上海，擔任《玩偶之家》中的主角娜拉。這個消息使她十分興奮，因為娜拉是她很喜歡的一個角色。回到上海後，她在「教聯」中的上級邀請她加入一個專演現代戲劇的著名演員團體。在以後數周內，他們演出了易卜生的幾部戲劇、奧斯妥夫斯基的《暴風雨》和果戈里的《欽差大臣》。在《欽差大臣》中，江青扮演一個女英雄。她也演過由狄更斯小說《雙城記》改編的劇本。她說讀過原著的中譯本，小說比劇本好。儘管書中表達的觀點是反動的，但她仍認為是一本有價值的書，可以提供歷史知識。

她對娜拉的演繹贏得了新聞媒介熱情洋溢的評論，但不知道她在上海文化界認識的一些重要人物是否對這些評論有影響。只有張庚（兩年前在山海工學團曾是她的領導，現在是上海黨組織的一名重要人物）出來唱反調，批評她的表演風格「太自然主義」。他是一個頑固的傳統派人物，不能接受她對娜拉個性所持的觀念，因為她把娜拉演成一個叛逆的女性。她脫離了易卜生本來對娜拉個性的觀念，根據自己的判斷處理這個人物。在她看來，這樣是對原著的提高。對她如此表演娜拉的性格，觀眾的掌聲如雷。她補充說：在當時，觀眾很少為演員鼓掌，不像現在對革命劇目必須鼓掌。

「作為一個藝術作品，《玩偶之家》沒有提供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她繼續說道。魯迅曾經作過一次演講，後來寫成文章，題目是『娜拉出走之後』。魯迅只是對娜拉離家後如何生活下去進行猜測的眾多人士中的一個。她將僅僅成為某種「公共展覽品」嗎？她找到工作了嗎？魯迅對這些問題和其他一些有關女性

解放的問題進行了探究。

2

在上海舞台上表演現代戲劇為江青贏得了新的知名度。在她的一生中，第一次開始同著名男女演員合作，李雲鶴開始被公眾所熟知。儘管表演和觀眾的反應給了她極大滿足，但演員生活的物質條件非常糟糕。劇烈的通貨膨脹引起所有生產成本急劇增加。與她曾待過的低成本的平民劇院相比，在這個商業世界裏要忍受貪心的劇院老闆收取的高租金。如果一場演出能賺500元，一半要付給劇院老闆作為租金。

儘管財務負擔或多或少可以由演員們均攤，她還要遭受的精神折磨和其他演員的蔑視。為什麼蔑視她呢？也許是因為他們懷疑她，作為文化精英圈中的政治人物，其左翼活動會使大家獲罪。一定是他們認為她的演技不行，她坦承。他們對她明顯的蔑視折磨着她，以致她在他們面前從未輕鬆過，甚至在晚上不能入睡。她永遠不會忘記，在床上幾個小時、翻來覆去遭受苦悶的折磨！為了贏得同行們至少是專業人士的贊賞，她把精力緊張地投入持續的個人排練。失眠時，她就起床背台詞，直到深夜。即使到現在，她還能聽到當年隱隱約約的回音：樓下房間裏那個裁縫的縫紉機發出隆隆聲，斷斷續續地傳來。結果，自身努力超越了正規教練，她掌握了話劇所要求的專門技能，最重要是能表現舞台對話的發聲，這比古代戲劇中的高腔或活報劇中的尖叫更難捉摸。隨着她的名氣在戲劇圈中攀升，那些過去看不起她的人開始奉迎她。當她回憶這一切的時候，臉上帶着諷刺冷漠的微笑。

在演完歐洲劇目後，與這個優秀的業餘劇團一起，江青演了一系列「民主民族主義的著名劇目」。所有劇本都是反映中國的當代題材。演到第二輪的時候，劇團中一部份人分離出去成立了「40年代劇團」。為什麼活在1930年代卻要自稱「40年代劇團」

呢？因為他們自認先鋒派，要超前社會10年。他們上演的第一個劇目是夏衍 的《賽金花》[15]（1936年11月在著名的金城大戲院）。劇名是義和團年代那個臭名昭著的女子（她曾經成為一個德國將軍的情婦）的名字。看到中國女演員扮演這個下賤的女人，江青怒不可遏。在她的心目中，這個聲名狼藉的女人有辱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她說，她直言不諱的意見激怒了「40年代劇團」的成員。他們還揚言要殺掉她。說到這裏，她的聲音尖銳，情緒激動。

江青繼續說，儘管張庚批評過她的表演，但被她的魅力所迷。他追求她，使她在政治上受到傷害。到了1935年，他和徐懋庸已是上海共產黨領導層中的重要人物，是黨組織的實際領導人。當時沒有人與他競爭，他竟把上海作為個人的地盤。在她記憶中，張庚無可否認是一個非常刻薄的人，她經受過他那種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義。她漸漸有名，並被看作是張庚的一伙，於是他便在黨內吹噓，說她是「屬於」他的，「她是我的女朋友，大

15 賽金花不尋常的個人歷史被深深地牽連進外國帝國主義同中國民族主義之間的鬥爭中，江青對她的歷史幾乎是念念不忘的，當提到她時經常又是非常激烈的好像她仍然是一個威脅。賽金花出生於蘇州，這是一個以出產漂亮才女而具有傳奇色彩的城市。1880年代後期，她到了德國，成為普魯士軍隊首領瓦西德的情婦。在義和團運動期間（1898-1900），德國皇帝由於義和團殺死了他的代表以及德國沒有受邀參加挽救在北京對外國使館的圍攻而極其憤怒，他任命瓦西德為陸軍元帥，並勸誘其他的外國列強接受瓦西德擔任鎮壓中國起義的盟軍總司令。賽金花陪同瓦西德到了北京，在那裏，她努力說服瓦西德不要殺害她的同胞或破壞財物，但她的勸說沒有成功。人們根據他們在北京公開的曖昧關係寫出了許多浪漫的文學作品。其中，曾樸的小說《孽海花》（1906年）是關於賽金花一生最成功的小說版本。清朝滅亡後，賽金花也不再有往日的風采，她淒涼的生活在上海。作家劉半農根據聽到的關於賽金花的故事於1934年出版了《賽金花本事》。劉半農的小說最終被亨利．麥可利維翻譯成*That Chinese Woman: The Life of Sai Chin-hua*（倫敦， 1959）。1936年，夏衍根據劉半農著作改編的戲劇版本在上海評論界引起好評。賽金花一角由當時最走紅的女演員之一王瑩扮演。看到夏衍的劇本，周揚宣佈它為國防戲劇開闢了一個新天地，因為它同當代的抗日主題相似。《國防文學論壇》上海 1936 174）文化大革命期間，江青不斷重複提出這個問題：賽金花是幫助還是褻瀆了中國的民族事業？她堅持是後者。當然，當時她掌握著懲治夏衍的權力：破壞他的事業、毀壞他的名聲、禁止他的作品。

家不准打她的主意。」（談話至此，江青輕蔑地哼了一聲，說她有多討厭他）她不讓他接近。晚上開完政治會議後，他常常請求送她回家，她從未允許過。有一次，他竟厚顏無恥地向她求婚，她斷然拒絕。這顯然使他很丟臉。為了報復，他利用上海黨組織領導人的地位，禁止「劇聯」的人和她接近，還散布謠言說她是托派份子。

張庚的報復行為，對她自身的政治工作造成損失。例如，1935年3月初（也許是1936年），為了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江青組織了一次業餘演出，租借一家旅館的劇場排練。她通知參加者7日在賓館集合，進行最後的準備和預演。當她按時到達時，沒有一個人出現，把她留在困境中置之不顧。（是張庚因忿怒而取消了這次安排嗎？）她非常絕望，因為幾乎所有的票都已經賣出，買票的大多數是工人，還有最忠誠的朋友陶行知也買了一些，她不能令他們失望。

匆匆忙忙地把一群演員找到一起，倉促完成預演。那一天，她正發高燒，但只能奮不顧身。正在兩人合唱時，她察覺舞台道具還沒有送到。預演一結束，她馬上拖着發高燒的身體去買代用品。但走出劇場就滑了一跤，從樓梯上摔了下去，幸運的是沒有受傷。當她恢復鎮靜爬起來時，有人過來對她宣佈，這個劇目不能在這旅館的劇場上演。聽到這個消息，她驚慌失措。臨到最後一分鐘，黃紹竑（一個國民黨高級官員）的侄女出面挽救了困局，她簽了合約，該劇始得上演。一切安排好後，江青到後台寫了一封信，抗議對她安排的表演進行惡意抵制。

這一切演出中的問題，使江青的精神受到極大刺激。在表演過程中，她突然大哭起來，哭得不能自制，以致忘記了台詞，也聽不到提詞員的聲音。然而，這段預先沒有的劇情一定非常動人，觀眾和她一起哭泣。因為急於使表演恢復正常，一個演員假裝喝醉酒撞在她背上喚醒她。這樣才達到預期目的，使表演順利

繼續下去。表演結束時，她已虛弱得幾乎不能動彈，體溫升到華氏104度，感染了肺炎。朋友們立即把她送到醫院，住院幾天才復原。

3

1935年對中國和世界來說，都是關鍵的一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威脅不能再被忽視。在東亞，好戰的日本軍國主義份子正策劃從他們的東北基地對中國發動侵略。當時中心位於莫斯科的共產主義世界，通過第七次共產國際大會對此做出應對。莫斯科對中國的命令非常簡單，即把所有的政治分歧放在一邊，抵抗國際法西斯主義逆流。然而，命令的執行是難以想像的困難。中國正經受着苦難，既來自深刻持久的社會弊端，也來自連年的軍閥混戰和國共內戰。莫斯科要求同志們把注意力集中到城市，因為那裏的民族主義和革命基礎在明顯擴大。仍在暗處的毛澤東和紅軍正進行着長征，從東南的瑞金到西北的延安。當時也沒有意識到農村革命（儘管受到莫斯科忽視）將成為世界歷史上最成功的經驗。

江青對1935年的回憶仍是城市革命的場面。她描述前半年的政治氣候是不安定的。來自莫斯科的政治導向引起了組織變化，打破了各類自稱左翼人士的規矩。儘管在她1935年返回上海時，「劇聯」仍是完好無缺，但在過去 4 年間，成員已經變了很多。7月末，「劇聯」新領導人在 8 月 1 日召集了會議，江青也出席了。在這次公開討論會上，領導人公布了『八一宣言』，那是王明在莫斯科起草的（當時他正出席第七次共產國際會議）。宣言號召取締革命聯盟，在建立各界救國會取代。其目的為排除宗派主義，呼籲所有的聯盟和黨派把救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共同目標。

宣言不僅是中國共產主義的重要轉折點，而且引起文藝界深

刻的對立。統一陣綫方針的發表，意味着削弱上海共產黨組織對其下屬組織的控制力。對於江青來說，儘管曾設法維持與左翼各團體的聯繫，但由於張庚在1935年秋的報復行為，再次與黨組織斷了聯繫。她說，這些團體包括電影界救國會，婦女救國會和中蘇友好協會。她在這些團體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僅僅是眾多新興團體中的幾個。（這些新團體在衝突的黨派和政治團體間建立統一陣綫）她警告說：「他們的名字是騙人的。」儘管名義上是左派，但許多領導人是漢奸、叛徒或特務（當然，在某種程度上不能確定）。她認識一些革命團成員，他們被認為是前共產黨人，但實際上是反共人士。儘管如此，革命團很快就被「劇聯」瓦解，「劇聯」按照在莫斯科起草的「八一宣言」的授權採取行動。

儘管各界救國會在1935年8月誕生，但彼此的融合非常慢。在江青的回憶中，直到她離開上海到達延安後 2 年，救國會才完全組織起來。實際上「文總」或多或少地存在了幾年，儘管領導人變得越來越保守，成員則仍是像江青那樣的革命青年。

真誠的革命青年如何證明他們的價值？江青解釋說：「一種方法是表明以前的黨員資格，但在白區，許多問題使這種表明的可靠性複雜化了，如曾取得黨員資格的持續有效性，以及其他人假冒黨員資格的問題。當時，確定一個人的黨員資格要從他可能是假黨員開始着手調查。（在延安，她也被懷疑）事實上，1930年代早、中期，左翼團體的許多人吹噓自己實際不存在的黨員資格。一些真誠的革命青年仍然從屬於這些名義上的左翼團體。她警告說，判斷一個人是否真的革命者，必須盡一切可能進行甄別。例如，黨的理論家艾思奇是一個真正的好同志，儘管也有一些人曾做出相反的判斷。林之陸也是這樣，也曾遭到錯誤的批評。林在延安黨校時成為江青的同班同學，後來在新疆工作，與主席最小的弟弟毛澤民一起遭到殺害。

一些假左派專門詆毀任何被他們看作對手的才子的名譽。作

家魯迅是一個特殊的左派，成為他們的主要目標，儘管包括江青自己在內的其他人也遭到同樣對待。愛搬弄是非者和記者用各種庸俗的理由和政治誹謗來貶低她。說到這裏，她非常氣憤，但沒有給出更多細節。這些她還能容忍，因為相信人民是站在她這一邊的。群眾能理解，儘管在表演資產階級戲劇，或活躍在文化界上層，但她在真誠地從事革命工作。

在文化上層社會中，其他傑出人物是所謂「七君子」（沈鈞儒、鄒韜奮、史良（女）、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樸），這是一個領導救國會運動的記者和專業人士的聯合。與她聯合的那些革命青年相比，他們稍微年長一些。僅僅因為他們是著名的救國總會執行委員，國民黨因他們的左派活動和共產主義活動而打擊他們，儘管他們都不是共產黨員。1936年11月，他們被逮捕。這是蔣介石在西安被扣、並被迫接受七君子提出的國防政策的前一個月。儘管如此，直到1937年7月抗日戰爭正式爆發，七君子仍沒有從蘇州監獄獲釋。當然，她不象七君子那樣知名，即使不能認識所有的七君子，但她也得到了所有革命工人的認可。（她自我辯護式地說道）在非共產黨的左派人士中，七君子是最著名的。但還有其他人，他們實際上更年輕，最後從上海移居延安。在那裏，他們宣稱（虛假地）代表了白區黨組織。

在延安，對她本人的審查也相當複雜，因為工作的多樣性容易引起外人誤會。對她的個人迫害，上海左派領導人和群眾之間不斷增加的疏遠，這兩種因素結合在一起，使1935年後她在那裏的活動籠罩着一片「烏雲」。在前 2 年，作為一個教師和真正的左翼團體成員，按當時流行的說法，她是在基層做群眾工作。但開始建立統一陣綫後，「劇聯」黨組織取代了「教聯」，成為她的上級。相應地，她的職業也發生了變化。在表演藝術界有廣泛聯繫的「劇聯」掌握了主動權，可以指派她到上層社會，即置身於知名的演員、劇作家、批評家和作家之間，他們相對較少受制於

「文總」和其他反政府組織。從無產階級（或為無產階級服務的知識份子）到光怪陸離的都市娛樂圈，使她對新的人格和專業要求顯得比較生疏。電影公司經理一開始就在合同問題上糾纏她。她帶着焦慮説到這裏，稍後就回到對作一個電影演員的討論上。

1935年末，上海的共產主義圈子被敵人和變節份子分裂。這種與共產主義運動主力軍隔絕的危險孤立，一直延續到他們在西北艱難地建立一個立足點。經歷了一年長征後，以毛澤東為領導的中央委員會在1935年10月到達西北。那些農村革命的領導人怎麼可能知道1930年代上海左翼團體的真實狀況呢？在到達延安後，她發現他們對大部份自封左翼團體所奉行的反動政治一無所知。直到文革前夕，當她最後揭露真相時，他們才知道上海的真實情況（高級領導人怎麼會被蒙蔽了這麼長時間）。

4

1930年代，比所有年輕的和並不年輕的左翼份子以及民權運動領導人眼光更高更遠的有一個人，那就是魯迅。在江青的回憶當中，魯迅和毛澤東在她心中的份量是一樣的，一個是文化英雄，一個是政治英雄。儘管在中國共產黨的眼裏，文化和政治問題是聯繫在一起的。她非常崇拜這兩個人物，超過其他所有人，並且非常頻繁地提到他們。出於意識形態目的，在我們的談話中，她精心選擇了一些例子——有些是牽强的，來表達對這兩個人的理解和深切的尊敬，這也是她在文革時期和1970年代中期一直堅持的。

有一天晚上，半夜了，江青的話題轉向討論魯迅。此時，她的同伴都已經困倦了，只好用熱茶來提神，並交替用冷熱水、濕毛巾和幹毛巾來驅趕睡意，但江青的精力卻毫不減弱。明亮的燈光加劇了天氣的酷熱，她額頭上滿是汗珠。她始終沒有中斷獨

白，只是偶爾把手伸進裝書的塑料袋裏，拿出一把綠色的梳子，在頭頂梳理她的短髮。

說到魯迅的背景，她說，即使是年輕時，他也是反孔的。在五四運動前幾年，魯迅在日本求學，成為一個「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在1920年代中期，北洋軍閥政府的政治迫害，迫使他離開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教職。在那裏，他捲入一場關於任命反動女校長（楊蔭榆）的爭論中。1926年，他接受了南方廈門大學的教職，第二年搬到廣州附近，成為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他在1927年到達上海，中國政治歷史上的一個舉足輕重的地方。在那裏，他稱自己為「觀潮」人，接下來的 3 年，他只是觀望。隨後，他停止觀望，拿起手中的筆作為戰鬥的武器。

當江青1933年到達上海時，魯迅還在那裏。當時白色恐怖蔓延，黨的地下組織頻繁受到襲擊，有時幾個組織在同一天受到摧毀。儘管魯迅從來就不是黨員，但還是想盡辦法保護他的朋友。江青舉了個例子：陳賡將軍在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戰役中受傷，於1933年來上海治療，魯迅得知後將他接到家中，陳賡和另一個紅軍指揮官謝富治（？），在魯迅家裏住了一段時間。瞿秋白，黨的領導人兼作家，也是魯迅的好朋友。但那是在他叛變前的事了，江青尖銳地指出。

即使在年輕時，當魯迅奇怪的思維方式令她無法理解時，江青仍然尊敬他。她經常讀他的散文「自由談」和他為上海文人報紙《申報》所寫的其他文章。要知道哪篇文章是魯迅寫的，很不容易，因為他總是用不同的筆名來迷惑那些想讓他沉默的政治機構。後來江青學會了通過魯迅的風格來識別他的文章。

那麼，魯迅認識你嗎？我問江青。她在上海時，有人告訴她，魯迅曾看過她的舞台演出，她臉色微紅地回答，強調是聽別人說的，她自己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在1930年代中期，江青只是一個小人物，對魯迅還不完全了

解。後來知道毛主席很早就認識魯迅，並將他看作社會觀察家和作家。主席在西北時，讀遍了手頭上能夠得到的所有魯迅作品。不管走到哪裏，他總是尋找更多的魯迅作品。在讀了魯迅「偽自白書」後，主席和周恩來進行了討論並斷言：「此人是個真正正直的人。」

在成為毛主席的妻子後（她談論自己地位躍升的通常方式），她驚訝地得知，參加長征的人隨身都帶着很多書，包括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在以後的歲月中，這些書有很多被了解它們特殊歷史價值的人偷走。她設法找到一些毛澤東批注過的書。她強調，這些書多麼珍貴。

在紅軍1935年到達陝北後，黨派人與魯迅接觸，希望保護他，拉他加入共產黨的事業。起初在上海尋找魯迅，當時他在那裏的處境已經非常危險，但沒有找到他。然後尋找範圍擴大到全國，還是找不到。如果主席成功地將他從上海轉入共產黨根據地呢？江青自信地假設，如果有共產黨支持，魯迅不會這樣輕易地被疾病壓垮，在1936年10月去世，他會活得更久一些。

在爆發「兩個口號之爭」時，黨開始尋找魯迅。「兩個口號之爭」是王明從莫斯科得到啓示發動的一場著名爭論。當時中共中央採用了毛主席的文藝路綫，概括成口號就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16]江青指出，這個口號代表了無產階級性質和對日本的反抗精神。王明的對立口號是「國防文學」。既然每一階級都可以被說成是對保衛國家有利，那麼根據馬克思主義，王明的口號混淆了階級性質，江青下了這樣的結論。魯迅支持毛主席的口號並為之奮鬥。以周揚、田漢、陽翰笙和夏衍為首的「四條漢子」和自稱為「左翼」（形左實右）的份子聯合起來反對魯迅，「他們對王明口號的吹捧，與賽金花做德國人的情婦一樣，是政

16 毛運用了魯迅的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實際是作家胡風在他的文章《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中提出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北京，1960年，565-566頁）

治上的墮落，或者類似於石達開對太平天國的背叛。賽和石都是百分百的反對共產黨的叛國者，」江青憤怒地說，絲毫沒有意識到這兩個人分別生活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的20年和70年。

魯迅是一個有着堅定立場的人，江青繼續説道，例如，他從不送禮。他曾經寫道，如果你用最好的東西待客，他們會詛咒你的。儘管這樣，當得知毛澤東帶領紅軍到達西北時，他送去了衣服和食物。不過他的禮物肯定是丟了，或者被偷了，因為這些禮物沒有被收到。

儘管魯迅是個不同尋常的人，但也必須從唯物主義觀點來評判他。從文章中看出，他是一名「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觀察政治環境三、四年，然後在以為了解情況後，就開始戰鬥，直至倒下。毛主席稱讚他是「最勇敢的真理堅持者」。

江青説，幾年前找到一些魯迅佚名手稿，並向我展示魯迅親筆寫的一封信的複印件。她把這封信從北京帶到廣州，證明自己的觀點。在這封信裏，魯迅説，幾個月來研究國民黨的反動布告，才明白他們詛咒任何人，除了「四條漢子」。這些文字説明魯迅是一個認真的觀察家，在那些日子裏，江青和像她這樣的人感覺「四條漢子」及其追隨者不是好人，儘管不得不對付這些人，但還是不能看清他們的罪惡本質。為什麼？因為缺乏魯迅那樣的觀察力和對細節的敏感。當時她還很年輕，但直覺上知道那些阻止她與黨中央聯繫的人是錯誤的。

魯迅不僅僅只是被動地觀察，並不是把目光局限在自己身上。他誠懇地批評他人，並針鋒相對地進行反擊。無可避免，尖刻的語言和犀利的筆鋒為他招來無數敵人。

在江青與毛主席結婚後，她和魯迅的遺孀許廣平成為朋友。「她告訴我，當他們兩人出門時，不敢一起走在大街的同一側，而要分成兩邊走。這樣，如果國民黨抓住了一個，另一個可以逃脱。這就是我們在那個年代的生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是要被逮捕的。

魯迅在上海的聲望越來越高，不僅為藝術和文學界所熟知，而且在廣大工人和農民群眾當中也很有威望。他們覺得魯迅理解他們的處境，並鼓勵年輕作家代表他們寫作。魯迅在1936年去世的時候，工人階級聚集在他的葬禮上，游行隊伍十分龐大。「我走在送葬隊伍的前面，」江青回憶道，「除了國際歌外，我們幾乎唱遍了當時所有的革命歌曲，如果唱國際歌，毫無疑問會被抓起來的。我們 4 個人一組，肩並肩、手挽手地前進。」

在魯迅去世的時候，追隨魯迅先生的藝術家、作家和知識份子聚集在他靈前。儘管他對丁玲、蕭軍、胡風等作家有很大影響，但他們的形象在歷史記載中還是被誇大了。那些「戴着左翼面罩的聰明人，事實上是國民黨的密探」，江青痛苦地說。

對於「四條漢子」，她繼續說，在1930年代，他們宣稱代表黨組織，但只是在歪曲黨的政策。這些僞共產黨人、國民黨的代理人，通過文藝和新聞雜誌對魯迅進行殘酷無情的迫害和鬥爭，直到魯迅死去。在所有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都受到無情迫害圍攻的情況下，魯迅的生命力減弱了。她再一次假設，如果當時毛主席，或者她和毛主席設法把魯迅從上海轉移到革命根據地，那麼他會多活一些時間。當然，他從來不是一名共產黨員，但對於像他這樣的人來說是否是黨員並不重要。她和毛主席都認為，他是一個無黨派的馬克思主義者。

江青厭煩地皺了一下眉頭，說知道我上星期在上海時，認為不應當把魯迅當作是共產主義者。她轉向張穎，讓她給我一份魯迅寫於1936年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一封信」，江青很快準備了一份中文原稿的複印件。「看這個」，江青對我說：「你會感覺到魯迅是一個優秀的共產主義者。」

在她的注視下，我瀏覽了這封信，後來又仔細閱讀了這封信。在信裏，魯迅稱讚了毛澤東現實的革命戰略，同時反對托派份子的高調理論，並批判了那些攻擊毛澤東建立反日本統一陣綫

策略的人。後來，這封信在文革時期成為政治領導人的學習資料，被廣泛傳閱，使魯迅成為上海1930年代中共歷史上的核心人物。魯迅的遺孀許廣平女士也對修正歷史的事業做出巨大貢獻。1967年，當魯迅30多年前的對手被打倒時，她站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度寫下「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之下，（魯迅）擲個人安危於不顧，公開宣佈為成為毛主席的戰友而自豪。在當時，魯迅和毛主席相隔很遠，但魯迅的心和毛主席的心緊緊連在一起。對魯迅來說，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他心中最紅的太陽。」

為了正確了解魯迅在1930年代政治爭論中的立場，江青建議我看魯迅「答徐懋庸的信」，這封信可以澄清魯迅「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和周揚支持王明「國防文學」之間的爭論。她指出，後者的意思是一切服從抗日，可以不顧階級性質。為了了解魯迅的政治觀和歷史觀以及評判人的方式，人們應當讀他寫的「論反日統一陣綫」，「論儒學」和「論人言可畏」。這些文章體現了特殊的歷史環境，整個左翼圈，包括她自己都被操縱公眾觀點的人殘害。

輕輕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江青對着房間的一個寬桌點了點頭，桌上堆着20多卷紅色封面的書籍。「1938年原版的《魯迅全集》，」她激動地說，又補充道，「現在這個版本已經很少見了，即使是專門派給她的助手，也很難在書店或私人收藏中找到。這部書對我來說是一個禮物，是對我和魯迅共同信念的紀念，說明共產黨對魯迅所有著作的認可。」人們應該讀魯迅的原版，她告誡說。為什麼？因為1950年代和60年代，「四條漢子」以及與他們合作的出版商，準備再版魯迅著作，但已與原版有出入。他們歪曲魯迅的一部份著作，以符合他們一直與主席對抗的資產階級路綫。原文做了哪些改動呢？他們刪掉了所有能夠想像得到的魯迅對他們蔑視的描寫，她回答。

5

江青對魯迅和1930年代政治的評價，於公於私，比她敢於接受採訪有着更深刻的含義和更具諷刺意味。從很年輕時起，江青和成千上萬的年輕叛逆者和理想主義者一樣，對魯迅深深崇拜，他通古博今，學貫中西，但從不局限於任何一個學派。當同時代的其他學者都在尋求政治保護時，只有他真心實意地充當一個反叛者，拒絕一個繼續要求中國人封建式無條件忠誠的現代政府的威脅。他傑出的才智和他所代表的力量，使他避免了國民黨政府的逮捕和處決，這是政府處置少數反叛者的慣用手法。江青指出，國民黨使用製造公眾輿論的手段—散布流言蜚語間接地殺死了魯迅，同時在精神和肉體上折磨很多保護魯迅的人。

聽江青連續數小時滔滔不絕地即席講述魯迅，魯迅最後給我留下幾方面的印象，不僅在他的文學風格上。我與遇到的其他共產黨人圍繞魯迅的談話幾乎都沒有超出馬克思主義理論範圍。當然，與江青的談話也不例外，儘管如果她能選擇，她在才智上可能超過他們。用她自己的話說，她欣賞魯迅使用犀利的反語和嬉笑怒罵的文章來躲避無窮無盡的敵人。當她忘記自己的身份回到自我的時候，她會運用號召性的語言，用比她的政治同伴豐富得多的語言來編織自己的文學夢。當然，在文學範疇內，她的想像力、思維的敏感度和在對人類感情的深度上，她都不是魯迅的對手。

我們圍繞魯迅的大部份談話和所有共產黨官方發表的文章，都集中於魯迅與共產黨及其意識形態的聯繫。魯迅在精神上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這一點對江青個人來很重要，她頻繁地把他和自己放在一起。魯迅從來不是一名持有黨證的共產主義者。同樣，江青在上海時也失去了正式的共產黨員資格，失去政治聯繫使她在今後幾年裏受到懷疑。她特意强調了他們兩人在這種狀況下的表現，不僅在國民黨迫害下，而且在「文學政委」周揚、陽翰笙等人

的排擠下。魯迅曾幽默地反擊過這4個人，他們的臭名一直延續到現在。對江青來說，魯迅的思想以及他與黨的關係，能證明自己在中斷與黨的聯繫後仍堅守共產主義信念。此點至關重要。

文革以來的10多年，以江青為首的思想家們繼續挖掘魯迅的任何可被解釋為批判「四條漢子」、支持毛澤東事業的文章。在1930年代生氣勃勃而又殘酷的文化氛圍中，魯迅是一個為毛澤東在上海提供思想陣地的深具影響力的文學名人。此時正是毛澤東及其長征隊伍在鬥爭中求生存、亟需在沿海地區獲得政治尊重的時刻。當然，關鍵是江青獨具慧眼地從上海作家中發掘出魯迅，並發現只有魯迅適合作為她、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在1960年代掃蕩自由主義的守護神。

5

上海電影圈留痕

酒、音樂和電影是人類的三大發明。其中，電影是最年輕、最有力量的，它能刺激各種思想成為夢想。夢是心靈的自由運動，它能映照出專制社會的悲哀。電影傳播思想的能力是無限的。

田漢，《我的電影生涯的回憶》

江青一直都痴迷於電影，認為電影對現代文化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在她的意識裏，電影和文學是緊密相連的。在她意外受到的教育中，幸運地接觸到了外國文學。我們在人民大會堂的第一次談話中，她說道：

「我嘗試過寫小說、劇本和詩歌，但寫得都不怎麼好。我知道的第一個美國作家是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石油》、《煤炭大王》和《叢林》的作者。辛克萊是一個改良主義者。後來，我讀了傑克·倫敦和約翰·斯坦貝爾的書。儘管看過無數電影，我發現自己還是太無知了。很多文學名著和電影創作都在羅斯福時代。我經常不吃飯，忍着饑餓，把錢省下來，就是為了看一場電影。我非常喜歡格利泰·嘉寶的表演。她還在演電影嗎？」

我猜，她在美國過着自己的私人生活。

「我得為她說一句好話，你們美國人沒有授予嘉寶奧斯卡金像獎[17]，這是很不公平的。我認為，這是美國政府的錯誤，而不是美國人民的錯誤。我在延安的時候，一個叫布魯克斯·阿金森的記者曾和我討論過嘉寶。」

17 1954年，格利泰·嘉寶被授予奧斯卡特別榮譽獎，表彰她令人難忘的銀幕演技。

布魯克斯·阿金森因為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劇評而聞名美國。「他和我討論了文學和藝術，他現在還在紐約嗎？」

「是的，不過現在已經離開了時報。」

「如果你見到他，請轉告：我還記得他。如果你見到嘉寶，向她轉達我的問候。她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格利泰·嘉寶是偉大的嘉寶。她對19世紀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作品的演繹是出色的。她性格中有叛逆的一面。她有高貴的氣質，不受別人影響，並不把電影表演戲劇化。」

想想這是多麼不可思議！RW在中國人想像中的小城市紐約第五大街邂逅了這位傳奇人物嘉寶，我說，在電影裏和在生活中，嘉寶身上有一種孤獨的氣質，使她與其他人不同。她保持着自己的與眾不同。

「是的，與眾不同」，江青重複道，「她應該得到奧斯卡獎。我想建議米高梅將她的電影《茶花女》和《克麗斯汀女王》（Queen Christina）重新製作、公開放映，並向她頒獎，這才是公平的。她是瑞典人，我們有這兩部電影的拷貝。」

聽說嘉寶的電影仍為一部份中國人所愛，我想起了江青在文革中發表的幾次講話，她談到某些非無產階級作品適合做反面教材。嘉寶和卓別林的電影，曾經吸引了很多狂熱的中國觀眾，它們不是無產階級電影，是應該做出積極評價，還是消極地作為反面教材呢？我問。

我們可以從演員的演技和電影技術中學到一些東西的，但我們缺少這些電影的拷貝。對她含蓄表達的願望，我提出想辦法安排送她一些，儘管還沒有想好要怎麼辦成這件事。

得到外國電影拷貝，對我們來說非常困難，她承認，「你們有一部電影叫《音樂之聲》，我們從香港搞到了這部片子，但是色彩的翻版非常糟糕。後來我們在其他國家到處想找好一點的，但至今還沒有找到。確實是太不容易了。這部影片相對比較嚴

肅，而且是反法西斯的。導演的技術非常出色。」[18]

這些年看了很多部電影，她說，對自己鍾愛的電影有時不止看一遍。有一部特殊的文獻片，是俄羅斯電影家羅曼·卡門（Roman Karmen）拍的，她曾經看了3遍。

「我讀過小說 Gone with the Wind，中文譯成《飄》，字面意思是像風一樣旋轉，是你們的一個女作家寫的，」她說，「同樣的，有一部電影叫作《亂世佳人》。」

「描述內戰時期新興資產階級的，」姚文元急切地打斷了她的話，「南方擁護奴隸制度的奴隸主階級消失了。當時美國正處於劇變時期，局勢動蕩。從現在開始的4年，美國將紀念獨立200周年。美國歷史上的這200年很值得研究。分析美國的過去和現在有助於了解美國的未來。」

「知道我為什麼提到《飄》嗎？」江青問我，「不是因為它具有任何偉大的文學價值，確切地說，這部影片使我了解了美國內戰。」

「我讀過一些文學著作。在少年時代，我學過一些美國歷史，但現在已經記不清了，只記住了華盛頓和林肯。300萬人口的領袖華盛頓打敗了有3000萬人口的英國（實際上在華盛頓時代大約是1000萬人口）。我個人認為，華盛頓後來犯下了屠殺印第安人的罪惡。現在你們是研究歷史的，我是相當無知的。從歷史上來說，當與法國作戰時，他和印第安人合作，但在打敗英國後，就開始屠殺印第安人。不過，華盛頓還是一個了不起的偉人。」

即便在此之後，美國政府在賠償印第安人方面也一直拖延，我承認。

「這是壟斷資產階級的錯誤，」江青說，「勞動人民不會那樣做，加利福尼亞的壟斷財團比較晚，他們是在1930年代才形成

18 回到美國後，我聯繫了製片人和導演羅伯特·沃斯，他寄給江青一部《音樂之聲》拷貝，江青送給他一部革命芭蕾舞劇《白毛女》片子作為交換，但後來她堅持讓我保留。

的，比東部要晚。1930年代的西部白人還很野蠻，他們對待印第安人非常殘忍。」

1930年代的美國西部片並沒有真實反映那個時代，我趕緊說，那些影片是1900年以前那個年代的故事虛構。

「但是，美國還在繼續生產西部片，」她結束了這場談話。

1

有一次，吃過晚餐後，我們在她在廣州別墅的大廳裏悠閑地散步，江青說要用嘉寶的《克麗斯汀女王》款待我。她期待的面容熠熠生輝。這部1933年米高梅出品的影片是她的至愛，她專門從北京運來作為這個晚上的娛樂活動。她個人的中外影片收藏幾乎包括了全部的嘉寶影片，但收藏的《茶花女》卻只有幾年來一次次翻版後的糟糕拷貝。她也沒有《安娜·卡列尼娜》的拷貝，她遺憾地說。

當燈光一個個熄滅後，她的眼睛發出光芒，我們坐在黑暗中。她說不管什麼時候看這部電影都會沉浸進去。電影在屏幕上開始放映，影帶由於年代久遠而咯吱作響，演員的動作有時失常地快或變得非常慢，聲音幾乎模糊到聽不見，也沒有中文對白。但這一切並沒有使江青沮喪，她從頭至尾對這部電影劇本非常了解。實際上，她一直跟着劇情的發展，小聲談論故事的內容和對白，傳到我的耳朵裏，遠比影片的聲音清楚得多。

這部電影很吸引我，不只是因為以前從來沒看過，更重要的這是江青選擇放映的。這個歐洲神話和江青的非凡一生之間有什麼聯繫嗎？17世紀的瑞典女王克麗斯汀是美麗而任性的君主，拒絕皇室為她安排的婚姻，迷上了為了西班牙國王來瑞典向她求婚的西班牙大使（約翰·基爾伯特）。她裝扮成一個迷人的年輕人，到大使預訂的旅館和他見面。因為旅館住滿了，這兩個「年

輕人」被安排住在同一個房間。當夜幕降臨時，她揭開了自己的僞裝[19]，他們結合在了一起，她為他放棄了王位。但後來他死了，克麗斯汀失去了愛人和權力。影片以嘉寶站立的身影作為結束，她耀眼的身影平靜地站在船頭，毫不畏懼地凝視着未知的將來。

燈亮了，映出了江青與眾不同的身影。她眼中蒙上了一層淚霧，這是平常很少見的情景，我的眼睛則是疲倦的。看了看錶，將近凌晨兩點鐘。我對時間的關注沒有逃過江青的眼睛。她面帶微笑地宣佈：這只是中間休息，一旦架好攝影機，我們將看到最近出土的考古文物文獻片，這是文革以來在湖南長沙市、毛主席出生地附近出土的。同時，我們將一個接一個地繼續拍照，下午在蘭花園蓮花池上的觀月台還沒有拍完。為在室內造出一個自然背景，她讓小趙佈置種着竹子的大花盆和耀眼的室內燈光。我們花了約一小時互相拍照。

在考古文獻片中，有一個經過防腐處理的2個多世紀前的「鹽漬的公主」。江青沉迷在這部電影裏，好像她參與了影片的製作，並就其科學意義，而不是對其遵從無產階級的考古新觀點做了過多的評論。

2

江青只在1936年和1937年從事電影工作。她開始用這點信息講述希望能忽略掉的一部份人生。但那 2 年不可能從她以後的生活中分離出來，她認真地說。人們一般認為她花費了整個青春追逐名利。一些人還宣稱她生活的唯一目標是在她21歲時成為明星。這與事實相差多遠啊！在表演上，在每件事情上，她都從最

19 這段曲折的情節不慎吻合了老套的中國俠客傳說（還在香港和台灣盛行）。在這個傳說中，一個不落世俗、渴望冒險的年青女子將自己裝扮成青年男子，和她的同伴經歷種種冒險，不久在和她的夥伴就寢時，在恰當的時候，顯露出她的女性真面目。因為假扮異性的主題在當前共產黨的電影中是被禁止的，江青可能像其他千千萬萬的人一樣，感到有些懷舊。

底端開始慢慢地上升。在18歲時，她有了一份作為演員的穩定工作，儘管薪水非常低。除了局外人注意到的表演，她年輕時真正想做的是為共產黨工作。似乎看穿了我的內心深處，她說，外國人不會了解她有多麼忠於共產主義，在這個夜晚之前，也不會有其他人知道她對共產主義的忠貞。她邊說邊朝隨從人員曖昧地笑了一下。她的話是冷冷的，暗示着權力給她帶來的回報。

過了片刻，她又沉默了，目光轉到周圍人的臉上，然後收回了目光。多年以來，她遭受了、並仍在遭受着來自黨內外的政治迫害。她回過頭來微笑一下，緩解在聽眾中製造的緊張氣氛。她說：「我真正的專長是一直在搬開大大小小的石頭，這樣我成了真正的女英雄。當然做革命工作是光榮的，不管是渺小，還是崇高。如果做對了，一個人不應該自傲；如果做錯了，就應該提高自己的自覺性。」

她不追逐電影帶來的名利，她繼續快速地說。但在她有了演員的名氣後，幾家電影公司找到她強簽合同，這時魯迅出來保護她了。魯迅作為一名作家，批評電影公司是多麼殘忍地欺凌演員。最大的電影公司（通過周揚及其黨羽的文化運作，直接或間接地為國民黨服務）誹謗他和恐嚇要殺死江青來反擊魯迅。因此，在上海的那些年，她和魯迅都受到了相同的迫害。像魯迅那樣，她的神經時刻受到敵人的折磨。在說到各種不同的人和團體時，她的聲音痛苦地升高了。那時候，國民黨和共產黨裏都有人陰謀殺害她。除了上海的《大公報》，其他所有媒體，收音機、報紙和其他有影響的宣傳品，都在散步反對她的思想。他們慣用的戰略戰術是陰險狡詐的，儘管這在白色恐怖下是很常見的。他們散布她將被綁架的謠言，實際上，他們正試圖逼她自殺。她已失去個人權利，沒有接觸媒體的渠道，沒有辦法去反駁攻擊者、為自己辯護。在那些攻擊者中，很多人控制着媒體。當認識到自己實際上被與外界隔離了，很容易受到攻擊後，她每天都生活在

恐懼中。她的健康日漸惡化，抵抗力急劇下降。

江青帶着憤怒和絕望敍述着。迂迴曲折的話語和傳遞的部份信息，將現在的讀者，當時的一小部份聽眾，領入對她敍述的歷史真相的思考。她對自己1930年代在電影界的敍述是謹慎而含糊的，因為她正在給自己建構這樣的歷史：即圍繞她的政治爭論和文革前對她的人身攻擊，一直干擾着她的共產主義革命。並且，她在1936年和1937年的電影工作是對王明國防路綫（得到周揚及其追隨者的支持）的一種挑戰，儘管當時的這種挑戰遠比現在她對王明的攻擊要輕微得多。王明路綫基本上主導了上海的地下黨。現在，她已沒有必要對35年前輕視她的人進行反擊，因為在後來的政治鬥爭中，他們的後繼者，那些自由主義文化人已屈服於她的成功。

可以肯定，江青想為自己建構這樣的歷史：儘管她在1930年代被迫保持雙重身份：在地下黨中充當文化人，在基督教青年會資助的改革中充當教師和調查人員，但自始至終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也就是說，她不只是在舞台上與左派調情，她比王明份子更熱情地用文藝作為階級鬥爭的武器，因此她和魯迅一樣，更稱得上激進份子。儘管她沒有詳述是如何被迫簽下電影合同（也有可能遭受性虐待）和演了哪些電影，我們可以想像，她竭力拒演的電影基本上是那些宣傳取消階級鬥爭的反戰電影，或是忽視政治的純商業性電影。當魯迅站出來、保護那些受國民黨人及娛樂電影製片商強迫的演員時，王明路綫的擁護者開始誹謗魯迅，並對江青的生命進行威脅。他們共同的敵人（她與魯迅的命運是相同的）警告她說，如果不順從，他們就要綁架她，強迫她簽署演出合同。敵人的威脅和不得不違背政治原則去演出，這種可怕前景把她逼到自殺邊緣。如果真的選擇了自殺（像其他上海女演員那樣），那麼，她的敵人必須對她的毀滅負責。

在考慮她的動機時，我們不會忘記，1972年正是江青得意忘

形的時刻。她說：蔣介石和國民黨軍隊撤退到台灣島已經20多年了，她在左翼陣營的宿敵周揚、夏衍、田漢和陽翰笙也早已在6年前受到了懲罰。他們的文化遺產或遭銷毀，或被查封了。此刻，還有誰能來證實或反駁江青的上述指控呢？

幸運的是，工資（可能是從演出和教學中所得）漲了，江青繼續敍述，但她的大部份工資都用來資助親友。他們是誰？「兩個同事和另外一些朋友」，她含糊地回答。那些清楚她收入很低的人，認為她的消費習慣很奇怪，特別是她像有錢人一樣喜歡在飯館吃飯。但這些人不知道她進飯館的時候，所要的只是一些饅頭，她吃得特別慢，每頓飯要用15分鐘。她在生活必需品上省下來的錢，除了資助家人外，都用來買各種書刊。她經常花費幾個小時在書店看書，書店員工認識她後，都很信任她。如果她想要買書、但手頭沒有錢時，他們會把書給她送來，允許她以後再付錢。

當時的上海，對大部份人來說，錢是個頭疼的問題。上海有成千上萬無望的失業者，搶劫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她被偷過好幾次（在回憶這段經歷時，她突然大笑），在要用錢時，沒有辦法，只能去當鋪。當她因在舞台和電影中表演而家喻戶曉後，再和當鋪老闆打交道就十分尷尬了。在所有財物中，只有手錶和鋼筆（中國共產主義知識份子和官員的象徵）能被當鋪接受。有一次，她把手錶和鋼筆放在櫃枱上，當鋪老闆走近看着她，問她想當多少錢。「5 元」，她說。沒有討價還價，也沒有多餘的廢話，老闆平靜地遞給她 5 元錢，拿走了手錶和鋼筆。這筆交易很不平常，說明當鋪老闆一定已經認出她，並很同情她的困境。以後和當鋪打交道變得越來越容易了。為了守信譽，她總是幾天之內就把錢還來。

她宣稱最終簽下電影合同是為貧窮所迫，為了增强說服力，江青把在上海最初兩年的生活做成很多張小卡片，每張都說明她急需錢。她經常沒有坐車的錢。有一次乘電車去很遠的地方參加一場政治會議。散會時天已漆黑了，只剩下末班車，儘管平時都

是買一等票，但這次只有夠付三等票的零錢。唯一的空座在震得最厲害的車尾，車在街道上不規則地穿梭，她覺得越來越噁心，她是個容易暈車的人，從童年起就這樣。為了不吐出來，她不到目的地就提前下了車，只能步行回家了，還有幾里路遠呢（一華里相約當於三分之一英里）。回到宿舍，她的腿腫得厲害。

還有一次，在上海參觀齊白石作品時，刮起了颱風，公交服務中斷。她只能坐黃包車，但黃包車夫要先收車費，她付不起那麼多，只能一路走回去。身後刮來的風非常大，差點把她刮倒，她只能抱住一棵樹，但再大的樹也被刮斷了，樹枝散落得滿地都是。等她到家時渾身顫栗，發起了高燒。她和同事合住的小屋在風中劇烈地搖動着。

當任教的工人學校面臨艱難時，她也和那裏的其他人一樣處於饑餓之中。當時她還是一個業餘劇團的成員，每周演出3次，場場爆滿。但即使這樣，也很難賺到錢。為了維持劇團的生存，演員們不得不自掏腰包，她也得像男人一樣捐錢。說到這裏，她臉上顯現出男女平等的自豪。

為了讓我對她有個清楚的了解，江青拿出以前那些陳舊灰暗的照片，表情嚴肅起來。她一定要我明白「從未從男人身上獲取過任何東西」。在舊中國，當男人和女人一起出去時，通常是男人花錢，但她從來不這樣做。她沒錢時，就會對男人說：「這次你付錢，但下次我來付。」有一次，她一時衝動想到當時一流的劇院去看嘉寶演的《茶花女》。在一種放縱自己的心情下，她穿上男式外套，拿着男人才用的錢包，到了售票處，所有座位好的票都售完了，只剩下一元一張的樓座票，這個價格可以買到二、三流劇院的頭等票。她想還是去那樣的劇院吧。走在街上時，她發覺有個人正偷偷看着她，越走越近了，但她不敢回頭。她跑到等在劇院門前的一個男朋友那裏，他們買票時，她才發現錢包不見了，被扒手偷走了，一定是剛才在街上跟踪她的那個神秘人

物。她又氣又羞，擔心她的朋友會以為她只是裝着付錢，何況，她也不願意承認錢包被偷了，怕會使朋友為她難過。於是她急切地向他道別，招手攔了一輛黃包車，去找其他可以借錢給她的朋友。朋友不在，最後她去了一家銀行，以高利息借了一小筆錢。她現在不好意思地承認，在去延安前都沒有還清那筆借款。

日漸惡化的健康使她情緒低落，連續的高燒令她不時地昏迷。白天出門時，她不知道在報上會看到對她什麼樣的誹謗和流言。在那些日子裏，她感到自己好像是「待罪的羔羊」（她沒有將自己當時的處境説成是聲名狼藉或脆弱）。然而，群眾是如此多變和不可捉摸，他們可能憤怒地對她，也可能熱情地和她握手，或者用鮮花來歡迎她。

一個在《大公報》做記者的女朋友知道了她的危險處境：她生活中無法擺脱的恐懼和無休無止的威脅。她鼓勵江青把自己的處境在媒體上公開，為什麼不反抗呢？江青拒絕了。然而，不久她去見一個曾在另一份報紙上辱罵她的記者。他擺出一副寬宏大量的姿態，伸出手來想和她握手。江青被激怒了，緊緊抱住自己的胳膊，厲聲地説：「你這是在粗暴地羞辱我。」

1936年，當江青的個人危機變得越來越嚴重時，她希望能離開上海，特別是在「雙十」慶典之後（10月10日是舊中國國慶日），但當時她與一家電影公司簽了合同，所以還不能離開這座城市。一些好朋友鼓勵她，將那些令自己痛苦的事情寫出來。最初她是不願意寫的，所以後來他們知道她決定發表後都非常驚訝。遺憾的是，第一篇文章沒有像她計劃中的那樣發表。因為她在文章中用了「日本帝國主義」，出版商對這個詞非常敏感，結果曲解了她的本意。在這之後，另一些朋友告誡她不要在媒體上暴露激進思想。「你這樣做會被逮捕的，」他們這樣警告她。她生氣地提醒他們，她已經在 2 年前被綁架過，並在監獄裏呆了幾個月。

在這幾個月的危機中，她發表了幾篇文章，其中一篇叫《我

們的生活》，1937年5月25日發表在左翼刊物《啓蒙》上。儘管她還年輕，當時才23歲，身上那點馬克思主義還很幼稚，但對於演員的兩難境地表達得很率直。她對現代戲劇運動的信仰被體現在一名女演員為自身辯護的聲音中。她的社會地位、專業水平和政治觀點經常被質疑。30年後，她將在文化大革命的控制塔上捍衛自己的觀點，但當時在《我們的生活》中，她這樣寫道：

> 很多人都不了解演員的生活，人們經常會羡慕地説他們過着「多麼快樂舒服的生活」。或者一些以自我為中心的貴族會輕蔑地嘲笑我們：「他們只是一些風流的演員而已。」對於另一些人，我們這些參加新型舞台表演的人是他們眼中的一粒沙子，他們一心想要把我們除掉。我們像導火綫一樣危險，受到了那些企圖消滅我們的敵人四面八方的攻擊。帝國主義可能是現在最强大的力量。重要的是（帝國主義者）想要維護他們的舊制度和特權，如他們帶着獵狗四處走動（江青的比喻），時刻準備着跳起來毀滅……新型的舞台表演藝術。在公共租借地和法租界中，他們蠻横地攻擊我們的演員，我們知道他們還會在其他方面攻擊我們。

男女演員都必須有健康的體魄、堅强的思想和精神意志，她繼續説。他們不是娛樂的工具，也不是玩偶，在緊要關頭，演員必須清楚他們的社會責任，並為此而演出。他們必須像劇作家和導演那樣去工作，去盡可能深入地關注和理解社會問題。

江青回憶那段歲月所用的清晰而激昂的語氣，與她敍述的演員的痛苦生活形成鮮明對比。「現在你知道了，李雲鶴就是這樣被造就出來的。」她停頓一下，調整自己，馬上從絕望轉為堅定。從那次噩夢中醒來以後，她説，共產黨紅旗的形象就充盈了她的內心。她堅信紅旗一定會插遍中國，也一定會插遍全世界。

3

在世紀交替之後，電影和話劇都得到了發展，電影主要集中在上海，儘管在香港和其他大城市也有電影公司。在外國電影競爭和外國投資的刺激下，中國的電影事業，直到1925（1952年？）年左右，都明顯是摹仿西方，是好萊塢電影表演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宣傳的結合。中國的新電影工作者，其中許多人受過外國培訓，也受到當時先進的日本科技和審美標準的影響。他們使用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表演和製作風格，洋為中用，很多電影都是圍繞城市衝突的主題而展開的，如工人階級政治覺悟的提高，貧困兒童的教育，婦女解放和婦女權益，失業問題等。

儘管中國電影事業得到了發展，但佔優勢的還是外國影片。1936年江青第一次參加拍電影那年，共有373部影片在上海首映，除30部以外，其餘都在好萊塢製作，中國電影公司只製作了一小部份，且仍受好萊塢風格的影響。

在1920年代初，美國電影技術人員開始在上海培訓中國同行，儘管20年代末，出於成本考慮，他們中的大部份人已被辭退了，但他們留下了水平參差不齊的技術人員和過時的好萊塢設備。儘管資金缺乏造成困難，在1920年代末，上海還是有幾家電影公司運作起來，每一家都造就了公認的品牌和明星。

從1930年代開始，左翼文化運動的領導人，特別是熟悉現代戲劇的那些人，看到了電影作為宣傳工具的特有潛力，開始發展電影事業。像戲劇一樣，電影不要求觀眾的文化修養，當時電影的製作和發行成本相對比較節省。1930年代初期，還沒有一個正式的電影人團體，電影公司的興趣是被一些「劇聯」領導人推動的。如田漢、夏衍和陽翰笙等人一齊創造了現代政治劇和電影。1932年1月28日，上海遭到日本進攻後，夏衍勸說中國共產黨建立了秘密電影小組。因為電影已越來越多地被作為政治宣傳工具，

電影評論開始萌芽並為左派政治服務。1932年7月，中共創立了自己的電影刊物《電影藝術》，目的是推動「公開的鬥爭和客觀的批判」，即從意識形態上修正電影評論。1933年2月，黨在上海成立中國電影文化協會，組織電影界與帝國主義鬥爭。

江青在電影界的角色被政治和藝術，也被一些强勢人物所決定。前面已提到過的一個是製片人兼劇作家夏衍。他的經歷長期與江青平行，偶爾交叉在一起，此時就會互相交鋒。兩人都隨着戲劇而成長起來，夏衍以劇作家身份參加左翼戲劇運動，最終投身電影事業。作為早期共產主義者，夏衍加入了杭州的一個馬克思小組，並到日本求學，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和1931年成為「左聯」和「劇聯」的創始人之一。第二年開始製作前衛的左翼電影，當時電影事業整體上還很不景氣，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受到日本侵華的影響。1932年夏，他和其他一些共產黨員加入明星電影公司，探索一條接近人民大眾生活題材的電影創作道路，淘汰那些以浪漫愛情和女人題材吸引西化知識份子的電影。夏衍負責把階級鬥爭這樣的馬克思主義題材引入中國電影。當江青參與教育女工和調查上海工廠條件的日常工作時，夏衍正在將那些無產階級狀況與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電影做政治聯繫，如他寫「女性的吶喊」，反映紡織行業的悲慘狀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當時這樣做都帶着仇恨情緒，後來這種情緒卻使江青和夏衍成為敵人。

在時代壓力下，明星電影公司和其他電影公司都在製作揭露國民黨道德腐敗和消極抗戰的電影。這使他們與持不同政見的新聞記者、作家和出版社一樣站在反政府陣營，也受到相同的處罰。蓋世太保類型的藍衫社，一個反對共產主義的組織，和其他情治機關有時會襲擊和關閉冒犯當局的電影公司，就像他們對出版社、書店、文化協會、學校所做的那樣。1932年11月，藍衫社以技術落後為藉口解散了藝華電影公司，作為對其他電影公司的警告。

被解散的電影公司的左派僱員，很快在其他公司找到避難所，並恢復工作。國民黨政府向那些電影公司派遣特務，製造內部份裂。僞裝成左翼藝術家的文化特務透過改寫劇本，製作電影和刊登廣告來維護國民黨利益。為了壓制公眾對電影的政治爭論，電影和報刊一樣都要接受檢查，獨立的電影期刊時常受到檢查或被官方查禁。

1934年是左翼電影家和政府公開敵對的最後一年。1935年，迫於建立救亡團體和形成統一陣綫的壓力，也為了共同的生存，敵對黨派之間停止了爭論，但這些救亡團體並非沒有各自獨立的政治立場。一旦他們中有人批判官方對日本的妥協行為，就可能招來政府的鎮壓行動。現在對反對派組織的廣泛攻擊越來越多地被對個別人士的陰險迫害所替代。大部份報紙和刊物被國民黨控制，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誹謗那些坦率直言的作家和藝術家，對他們私生活「聳人聽聞」的一面大肆渲染，抨擊他們的政治信仰。在上海這個還未徹底自由的城市，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受到這種攻擊。文藝界的女人，特別是女演員，她們美麗和浪漫的光環與她們的社會名聲不成比例，最容易受到公眾輿論的操弄，甚至被逼自殺。

1935年，在國民黨政府的白色恐怖統治下，電影與其他藝術一樣，被迫實行大改組。在前些年，電影已作為一種通俗媒體而繁榮起來，其意識形態的表述是直白的，它對社會罪惡和革命方略都以一種明顯方式表達出來。但1935年，在國民黨名義上接受統一陣綫之後，電影還是受到國民政府的威脅。這就迫使反國民黨的電影人塑造更微妙的人物和用更曲折的方式來表達政治觀點，在藝術上取得了很多成績。儘管到了1940年代末，電影業被共產黨政權控制，這種藝術表現形式又逐漸丟失了。到文革期間，簡單的人物塑造和信息傳遞被強調和突出。1935年，不只是在電影的表現手法上，而且在聘用演員時，電影公司也被迫採用

迂迴戰術，電影合同不再像以前那樣與團體簽訂，而是與演員個人簽訂。江青透露，她就是當時電影公司想找的人中的一個，一些人向她施壓，讓她簽署有損於政治前途的合同。

4

江青開始接觸電影是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左翼電影人帶着他們的才能以及適應新角色所需的名字和外表被政府趕到地下。江青用藝名與聯華電影公司簽了合同。直到那個時候，無論在秘密的政治生活，還是在舞台上，她的名字都是李雲鶴。她强調使用李這個姓是保留了家族的姓。當她簽署第一份合同時，「劇聯」的一個領導成員，一個她很敬佩、但並不熟悉的人，要求她用一個新名字，一個可以擺脱李這個姓氏的名字，因為當時她的姓氏在政治圈裏已聲名狼藉（對此她沒有詳細説明）。她選了一個藝名，藍平。這個名字出於個人考慮，選擇「藍色的」的藍，是因為她喜歡穿藍色的衣服：深藍、淺藍或藍灰色；選擇平，是因為她很快要離開上海去北平（意思是「北方的和平」——當時的英文地名是Peking），她選擇「和平」作為她的名，姓名合在一起，就是藍色的和平。

但在她和聯華公司簽約後，這個「劇聯」領導人決定改變她的名，將和平的平字改成發音相同，但更吸引人眼球的字：蘋，蘋果的蘋。他認為，這個字在電影中會比原先那個字更有影響力。從此以後，她一直使用蘋果的蘋字，在電影界的名字是藍蘋——「藍色的蘋果」。這個給她改名的人後來被田漢出賣了，她尖刻地補充道。

在白色恐怖之下，藝術家終年受到威脅，因為他們與各國反帝團體的合作，往往被人或明或暗地與外國買辦混淆起來。與戲劇不同的是，戲劇表演總是由演員自己控制，而電影是由編輯和

審查人員按照他們的意志來剪輯的。我讓她舉一些例子，江青謹慎地回答說還沒有想好，但她有話要說。

「在1930年代初，電影公司和我們的關係比較密切，因為當國家處於亡國的危險時刻，頹廢墮落的電影沒有市場，人民群眾要求民主，希望打敗日本。當時美國電影有着主導地位，佔據了電影市場的百分之七十，票價高到工人階級買不起。當時，上海也有一些具有民主色彩的電影，這些影片或多或少地描寫人民群眾生活，或啓發人們反對帝國主義。但這些電影都不敢很直白地表達思想，因為如果這樣做了，那麼他們立刻會被綁架，就像我曾經被綁架和坐監獄那樣。」

我們可以在文獻中查到比江青敍述得更詳細的資料。1934年10月，保守的明星電影公司開除了夏衍，譴責他 2 年的電影創作是搞「破壞」。於是他加入了左派的聯華電影公司，繼續保持着與中共秘密電影小組的聯繫，並恢復了激進的電影創作。聯華電影公司是由一批中外金融家在1929年合資創辦的，包括幾個軍閥在內。他們決心製作不同於鬼怪和游俠等題材的電影，當時這類電影是票房保證，直到1970年代仍風行海外中國人社區的影視圈。聯華公司的早期電影是圍繞着其領導成員的文化和道德關注製作的：他們在五四時期成熟起來，他們背叛了舊的家族制度，有着「現代」的愛情和婚姻，存在浪漫愛情和社會責任之間的矛盾。1930年代初戰爭的災難迫使聯華公司拋棄這些傷感主題，去製作一些隱含着政治信息的電影。為了在政治上安全過關，他們創造了一種新的電影表現形式。

基於在文革期間做出的政治判斷，江青說：「在1930年代中期，被魯迅稱為四條漢子的周揚、陽翰笙、夏衍、田漢已經背叛了革命，此後就再也沒有好電影了。那時我剛開始在一家電影公司工作。我不是一個很有才華的演員，但的確在新演員中脱穎而出了。我可以下到基層人民群眾中去，充當工人們的（戲劇）導

演，當然（無產階級藝術家）也時刻在表演他們自己。我也到學校中去，做了大量這方面的工作。」

江青也提到了她演過舞台劇，但我幾次直接問她演電影的事，都不回答。除了輕視1930年代後期的全部電影外，我想，她還有個人目的，其中有些可以想象的。她不止一次地提到，她想淡化電影明星的形象。我們也可以想像，她不想讓外國人追溯她演的舊電影，以及把這些作為電影節的噱頭。多年來有一個傳聞說自從與江青結婚後，毛澤東命令將所有江青參與表演的電影銷毀。但考慮到歷史事實，這種傳聞並不可信。在1950年代初期，毛澤東的政權還沒有收編私營電影公司及其電影資料，當時大多數主要的商業電影已被帶到香港和海外其他中國人社區。儘管後來有文獻證明，1950年以後中國出版的書中，只要提到江青做過電影演員，這些書都在1960年代初被禁止出版。這些書的作者遭到惡毒的批判，因為他們與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確立的正統政治立場相對立。也許江青封鎖其電影生涯的信息，最重要的動機，在於她演的那些電影是在統一陣綫時期拍的，當時的電影製作人採取國防電影路綫，拍攝與國民黨共同抗戰的電影，而不是保持左翼份子的無產階級鬥爭立場，即後來江青為旗手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立場。毫無疑問，國防文學路綫利用了電影事業，當然成為後來政治論述的對象，尤其是後來為了打擊毛澤東政敵的威信而採取的政治論述。

在劇作家的帶領下，中國主流現代作家開始創作電影劇本，電影成為所有媒體中最受歡迎的宣傳工具，同時銀幕新人輩出，當時最出名的電影明星有白楊和趙丹，他們有時也被稱為中國的嘉寶和蓋博。他們的名字，當年比江青的名字要響亮得多。對此，江青從未提到過。

在對江青的電影生涯進行回顧時，必須提到1935年夏的統一陣綫。當時救亡團體中的無黨派人士（他們傾向於左翼團體）

提出，所有作家和藝術家都不應該犧牲國家利益而服務於黨派利益，停止對國民黨政府在抗戰中僞善和無能的無情揭露。因此，電影也只能採取間接手法批判政府。江青的第一部電影《狼山喋血記》見證着電影的這種寓言式的風格。這部電影由沈浮的小說《冷月狼煙錄》改編，沈浮是一個有工人背景的劇作家，1933年加入聯華電影公司。當時，作家和電影導演的處境比1935年之後相對自由。沈浮和導演費穆一起將這部小說改編成電影，由費穆執導，著名演員周達明主演，江青後來與周達明很熟。

《狼山喋血記》表面上只是一個悲劇故事，講述一群襲擊山村的狼吃掉很多居民，村裏人心惶惶。熟悉伊索寓言的觀眾無疑能理解劇中的狼象徵着日本人，村民把他們當成入侵者。影片中的女主人公小玉及其父親一心要報仇。趙二，一個迷信的茶館老闆，認為狼歸山神管，是消滅不了的，唯一的躲避辦法是畫一道符咒。老張毫不畏懼，獨自出去尋找狼群。劉三，和他的妻子一樣（由江青扮演），對狼感到害怕（藝術就像生活）。

當小玉、小玉的父親和勇敢的老張去打狼的時候，遇到手裏提着死狗避邪的捕狗人，他們也加入了打狼行列。小玉的父親赤手空拳，當場被狼吃掉。當夜，狼群又一次襲擊山村，並殺死了劉三的兒子和兒媳婦。他們的悲劇激化了最後的衝突。當狼群在光天化日下竄到街上時，小玉、老張和劉三發動村民們起來反擊，劉三的妻子曾經害怕狼，現在也勇敢地加入了打狼行列。村民們高舉火把，唱着「打狼歌」參加了戰鬥：

生死向前去，打狼保村莊，
兄弟血如海，姐妹屍如霜，
豺狼縱凶狠，我們不退讓，
情願打狼死，不能沒家鄉！

像所有1930年代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製作的電影一樣，《狼山喋血記》也必須在放映前通過幾次審查。在政府審查制度下，首先是劇本，然後是情節和對白，最後是拍攝完成的影片，都必須得到中央電影審查委員會的批准。接下來，外國人控制的上海市府試影片，審查其內容是否觸犯日本。最後，日本領館可以抽查任何一部有侮辱帝國主義特權嫌疑的電影。儘管上海市府的審查人員猜想『狼牙山喋血記』的狼影射日本，但日本領館可能覺得這種誹謗不可信，竟然讓這部影片通過了審查。

在動蕩的政局下，這部電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秩序維護者——不言而喻是一部份附和日本的人，攻擊電影顯而易見的寓意。左翼批評家——痛恨國民黨對外妥協的那些人，稱讚影片巧妙的表達方式。最主要的支持者是由30多名激進批評家組成的藝術劇社，一個共產黨新的秘密組織，成員裏面包括很多江青的同事：她拒絕過的追求者張庚、電影製作人鄭伯奇和蔡楚生、演員和電影評論家唐納（別名馬季良），傳說江青曾與唐納結過婚。（在江青逃往內地，轉而忠於毛澤東這個王明的政敵後，他們當初稱讚江青實踐國防文學換來的卻是殘酷的傷害。他們對此能預見嗎？）

與激怒日本人相比，上海資產階級代言人更擔心這些影片的乏味。他們已習慣色情電影，即所謂軟電影。他們懷念在女人看來「吃冰淇淋」的、能引起肉欲的鏡頭，「暴露的乳房和挑逗的裝扮」。

儘管這部電影得到官方批准，但在1936年秋還是被國民黨警察和公共租界禁止放映。這種做法激怒了藝術劇社向國際呼籲：劇作家和電影導演不應該受到無理的政治迫害。

在人民共和國制度下寫作的歷史學家很少有人敢對江青在那部電影中的表演進行評論。有一個人曾經這樣做了，但做得非常

謹慎，就是程季華。[20]令人驚訝的，是他並沒有成為文革的犧牲品。他對中國電影史的敍述中包括了《狼山喋血記》，特別評論了藍蘋的表演。他稱讚她刻劃了一個樸素的農婦形象：她在經歷悲慘遭遇、失去了孩子後覺悟了。藍蘋的表演得到人民群眾和評論家的認可，他適時地指出。

《王老五》，藍蘋在聯華公司演出的第二部影片，更直白地表現了社會剝削和民眾反抗的主題。電影背景是城市的貧民區，由著名的蔡楚生導演，他也是藝術劇社的一員。為了拍攝上海江邊船民的真實生活，他尋找了大量的社會場景。在現實改編成的電影故事裏，電影中的人物王老五是一個35歲的貧窮單身漢。他有着勞動人民的優良品質，儘管政治覺悟不高。他迷戀上漂亮的女裁縫（藍蘋扮演），但女裁縫並不愛他。後來女裁縫的父親死了，王老五仗義相助，她深受感動，才嫁給王老五，住在棚戶區，生了4個孩子。困苦的生活使他消沉，開始酗酒。1932年1月，日本進攻上海，他們的生活更困苦了。

20 在他對江青演出的電影的描寫中，江青都是作為藍蘋出現，和她後來革命的名字江青以及她和毛澤東結婚的事情都沒有提到。程證實了很多她所提到的事情，儘管在對她1937年以後的行為所作的聲明上，他也自相矛盾，也許這是他的疏忽或者是故意所為。例如，他說1938年她與國民黨中央宣傳局的電影公司簽了合同。日本入侵時期上海電影業解散，國民黨中央宣傳局於1937年夏天在內陸城市武漢和重慶又重新進行電影製作，由於缺乏他們自己的電影人才，國民黨拉攏激進的電影人士加入他們的行列，其中有導演沈西苓和一些知名的演員包括趙丹和藍蘋。藍蘋演出了電影《中華兒女》，這部電影由四個故事組成，描述了不同社會階層和生活在中國不同區域的人們如何加入抗戰。她在影片中的表演部份叫做「農民的覺醒」，是關於在農村喚醒農民愛國精神的故事。這部電影於1938年9月在重慶完成，1939年放映。但是江青在1972年夏天說（她以激烈的態度對謠言進行了否定）她是在1937年8月直接從上海通過西安到達延安，這就使得程季華所說的她拍那部《中華兒女》的電影是不可能的，也許是程弄錯了事實或者這是程的一種錯誤的外交手段？他對夏衍、楊翰笙以及其他1930年代的電影人才一貫都是持讚揚的態度，而這些人在19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了批鬥，這不能不令人聯想到這樣的事實：1966年《人民日報》因為程季華表揚夏衍和其他人而對他進行攻擊，同時程被告知原本要包括1949-1959這段時間的第三卷的出版，必須向後拖延，直到他將前兩卷徹底修改並交給他們出版。但是直到1970年代中期修改的版本也沒有出版。

工頭（勞動人民的敵人）想收買王老五縱火燒毀棚戶區，擾亂人心。如果在以前，頭腦簡單的王老五很容易上當，但是這次他本能地拒絕了，並當眾指責這個工頭是漢奸。工頭被激怒了，放火燒了王老五的小屋，他的妻子和孩子僥幸逃出火海。工頭反誣王老五是「該死的漢奸」。他的妻子淚流滿面地站在眾人面前，哀求大家不要打他，說他想做個好人，只是不知道怎麼做。工頭放的火引來了敵人，村莊被炮轟，日本人從四面八方包圍了他們。最後的畫面是王老五的妻子趴在丈夫屍體上，在血淚交流中憤怒地抬起頭，怒罵所有的外國侵略者和漢奸。

儘管影片明顯有些誇張，但卻為藍蘋贏得了名氣。在1937年6月拍攝完成時，藍蘋的社會形象和對不同事物的看法被媒體廣泛引用，在報紙娛樂版上報導。那種名人閃光的一面與民眾生活的悲慘狀況毫不相干。在影片發行前，蔣介石已在陝西西安被俘（1936年12月），並被迫採取全民抗日和統一陣綫政策，以換取活命。後來的幾個月裏，在他統轄的地區也跟着響應。因為任何中國的政權，無論古代，還是現代；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要求文化符合政府的政策。在電影圈中，王老五是一個麻煩的個案。漢奸工頭被用來暗指國民黨政府，揭露其假抗日的面目，於是這部電影一直拖到1938年4月才被允許放映。此時，整個政治畫面已經改變。日本對上海的佔領成為一個悲慘的現實：迫使成百上千人背井離鄉，包括江青在內。

為了避免使這部電影觸犯日本，國民黨審查人員刪掉了王老五反抗日本，即拒絕向工頭妥協的部份。不只電影的藝術整體性受到損害，更重要的是，內容已變成是對日本入侵的一種默許了。在電影經過剪輯和拼湊後，藍蘋，這個革命的江青，表現的是一個通敵賣國者。

在江青對30多年的回顧中，她對當時處境是無奈的——她沒有任何辦法可以修復名譽的損失。她和所有像她那樣無權的人，

只能承受自上而下的急劇政治變化。從痛苦的經歷中，她學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課：避免被犧牲的唯一途徑是獲得權力。

5

戰時政治不穩定造成的傷害是江青影幕生活的一面；電影圈中的流言則是另一面。人們越是近距離地觀察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和演員們複雜的糾紛，就越會對這個圈子的表象感到困惑。正像1930年代民族災難迫使「為藝術而藝術」不再流行那樣，「為電影而電影」也屈服於政治壓力。藝術和生活間的差距自覺縮小了，促使一些作家通過電影去探索共同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江青謹慎地將注意力轉移到這樣一種狀況，並舉自己以及命運悲慘的明星阮玲玉的生活為例。

江青回憶起編劇夏衍時略帶一絲輕蔑。除他之外，江青提起的還有兩個著名作家，魯迅和田漢，也為聯華電影公司寫過劇本。在她看來，魯迅沒有做過錯事，但田漢就不一樣了。對田漢的個人恩怨多少影響了她對他過去的評價，他的短暫的、卻有影響力的電影生涯需要另外討論。

1920年代電影的藝術潛能首先激起了田漢的興趣，當時歐洲浪漫主義和日本唯美主義在中國知識界盛行。他稱呼電影是「銀色的夢」，「酒、音樂和電影是人類的三大發明」。1926年，他創立了南國影劇社，南國戲劇社的電影版。1931年轉向馬克思主義後，他否定了將「銀色的夢」作為資本主義觀念的想法。他在政治上轉向了左派，更多想到的是廣大觀眾，並且開始創作反映城市社會變化的電影劇本。他最好的電影劇本包括《三個摩登女性》，由聯華電影公司1933年映出，並用劇作家的筆名田漢發行。這部政治情節劇的主角是阮玲玉，影評家把她比作嘉寶（在中國人的眼睛裏，嘉寶是西方的電影女神），阮玲玉注定要成為

她那個時代的偶像。

在阮玲玉電影生涯的頂峰時期，她主演了另一部感人的電影『新女性』，反映了當代的女權運動、左翼主義和政治迫害，由聯華電影公司出品，蔡楚生和周達明（曾和阮玲玉結婚）導演，這兩個人也可能選擇江青做主演。這部無聲電影得到了聶耳（5年後在延安寫下黃河大合唱的歌詞，最後被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延用）的高度評價。這部影片以1934年2月自殺的電影明星艾霞為創作原型。在影片中，艾霞的身份變成一位女作家，因為寫小說失敗，養不起女兒，於是陷入絕望之中。在一種病態的消沉中，她企圖自殺，在緊要關頭被發現，匆忙送進醫院搶救，但沒有搶救過來。在臨死前，她聽到窗外傳來報童的賣報聲「著名女作家自殺了」。影片以無產階級的覺醒結束：一群剛從報紙上得知艾霞自殺的女工（她們不是文盲）將悲痛化為力量，勇敢地面對着未來，迎着初升的太陽前進。

江青沒有直接談到阮玲玉，但從她對自己電影生涯的描述來看，阮玲玉無疑曾是她銀幕上的偶像，在真實生活中也是，直到江青逃離上海。阮玲玉比她大4歲，出生在上海一個工人家庭。像江青一樣，她是由母親撫養長大。在開始電影生涯後，她搬到聯華電影公司，當時和江青一樣都是20歲左右的年紀，為左翼和前衛電影而工作。然而，阮玲玉顯然不僅比江青漂亮，比她演技好，而且還是一個令人同情的自殺者，為城市社會的道德良知刻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像無數在她前後出現的明星一樣，人們永遠記住她的悲慘遭遇：惡毒流言的犧牲品。

1935年2月，艾霞死後的一周年紀念日，《新女性》在上海公映。具有諷刺意義的是，3月8日是中國人慶祝的國際婦女節，阮玲玉這個在影片中演繹了艾霞之死的電影明星，選擇這一天自殺，年僅25歲。

在阮玲玉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裏，與電影攝影師周達明的離

婚，以及與另一個男人的同居，使她受到了公開的嘲弄和指責。所有生活在鎂光燈下的女演員，不論是在左翼電影中演出的阮玲玉和江青，還是在商業電影中演出的其他人，都容易受到公眾的責難。如果她們的政治觀點背離了傳統，那麼，這種責難就會加倍。大多數有名氣的女明星，也許能與克拉．鮑芙（Clara Bow）和蓓蒂．葛萊寶（Betty Grable）齊名，都與國民黨政客、軍官和商業巨頭有聯繫。用中國的傳統標準衡量，不管這些女人在政治上是何等幼稚或反動，她們都是第一流的社會激進份子。在舊中國，大多數女人都過着循規蹈矩的本份生活，習慣於自我犧牲。而女演員們製造的快樂以及對快樂的追求，是對這些循規蹈矩的女人和自我犧牲的妻子的一種嘲弄。即使在當代農村，嚴格的道德規範和社會壓力對女人的要求也比對男人要多得多，雙重的束縛讓那些被迫失去貞操的女人選擇自殺。這些本份的女人至死都帶着這種專制的道德規範，死後被人稱讚，並作為後人的楷模。

儘管這些片面的、嚴厲的性道德在革命者和其他進步人士中很少得到贊同，黃色小報記者仍借助媒體和公眾輿論來羞辱這些「非正統」的女人。如同在政治界一樣，在藝術界也有一些國民黨政府並不介意加以侮辱和毀滅的人。這種從渲染，迫害，到自殺的事件已經變得司空見慣。

1935年春，阮玲玉在上海自殺。她的故事經歷了從藝術到生活，最後又回歸藝術的過程，無論是在人生舞台，還是在藝術舞台上，她的名聲都受到了詆毀。在死後的數周內，在上海大劇院為她舉行了「影星之死」的紀念會。江青的收藏中有魯迅的一篇文章「論『人言可畏』」，這4個字選自阮玲玉的遺書。江青對我說，「看看這篇文章，從中你會找到我生活的一些綫索。」

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對於現代人來說也是適用的。文章寫的是演藝界的女人，她們受到誹謗，只因為是演員，而記者是一些「舌頭劈啪作響的長舌婦」，他們靠迎合那些喜歡看名女人桃

色新聞的讀者口味賺錢。「一個女孩跑掉了，是自奔，還是被誘拐尚未可知，才子就斷定，「小姑獨宿，不慣無郎」，你怎麼知道？一個村婦再嫁了兩回，原是窮鄉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筆下，就又賜以大字標題道，「奇淫不減武則天」[21]，這程度，你又是怎麼知道的？」

一個女人一旦被下了定論，魯迅指出，那麼不管接下來對這種錯誤定論做出的是道歉，還是更正，但危害已經造成了，「不過無拳無勇如阮玲玉，可就真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額外畫上一臉花，沒法洗刷。叫她奮鬥嗎？她沒有機關報，怎麼奮鬥？有冤無頭，有怨無主，和誰奮鬥呢？我們又可以設身處地想一想，那麼大概就知她的以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們以為她的自殺和新聞記者有關，也是真的。」

實際上，江青是在說自己的困境，在她被下了「大膽」的定論後，就經常出現在報紙頭版的顯眼位置。假如今天中國是一個更自由的社會，一個男人和女人的不正常性關係的暴露可以免於懲罰的話，那麼她會對自己的過去更坦率。她透露給我的綫索，結合公眾的記錄，以及一些國外的流言，給了我這種假設的根據。她逃離的理由有個人和政治兩方面的因素，而這兩個因素是經常混淆在一起的。她宣稱，她電影生涯更多地是受可怕的貧窮，而不是個人目標的驅使。她的名字與當時一個演員兼影評家的名字——唐納聯繫在一起，唐納也是共產黨創立的藝術劇社的一個領導成員。有人說她和唐納結婚了，但她拋棄了他，悲痛使唐納處於自殺的邊緣。唐納的自殺立刻引起了媒體的轟動，媒體的矛頭指向了江青，使她成為有罪的一方。這不僅讓江青的知名

21 周朝（684-705）的女皇（自封「皇帝」），唐朝的中斷期。幾世紀以來，關於她的荒淫無度、專制暴戾和反傳統的傳奇故事廣為流傳。1939年在上海和1963年在香港，她的傳說被拍成電影。郭沫若關於她的歷史劇最先出現在1960年，於1963年修改。1974年，中國共產黨為這段歷史翻案，將她奉為女「法家」，大加讚賞。

度提高了，而且也使她在大眾眼裏變成了惡毒的女人和虐待狂。儘管藍蘋和唐納的故事現已無從考證，她生活經歷中的浪漫插曲微不足道，但圍繞她生活的流言以及對她主演的影片的政治曲解，使她帶着一個不名譽的公眾形象到達共產黨根據地——延安。她怎麼去改變自己，讓別人忘記這一切呢？

II

在邊區

6

毛澤東的延安道路

有時，一次機遇，

一個注視，或匆匆一瞥，

一個人的命運就可能出現轉機

——大衛．霍克斯英譯的《紅樓夢》

江青沉浸在對過去的回憶中，她是個非常專心的人。每晚10點或11點左右，都會有個小男孩小心翼翼地走到她跟前，通報晚餐已經準備好了，但她仍繼續談話，彷彿什麼都沒有聽到。小男孩不時地走來說晚餐準備好了，她終於停止談話，然後說：「請把餐具洗一下，給我送到飯廳。」

在寬大、卻幾乎沒怎麼裝飾的大廳裏，我倆和7個隨從人員坐到一個圓桌前。桌布是白色的，很厚重，瓷器和筷子是上好的質地，具有南國情調的高雅別致，卻樸素無華，絲毫不顯得張揚。顯然，江青很喜歡扮演這種宴席女主人的角色。而我喜歡做的，是對她說的話作出評價，並回答問題，然後在適當時機引入我的話題。其他人則喜歡沉默地享受餐桌上的美味，顯出對江青有趣的娛樂方式非常着迷：這幾天晚上對外國搭檔的連續轟炸。

餐桌上的談話是她此前敍述的延續，儘管心情很放鬆，我手裏還是拿着記錄本和筆。在廣州的第一晚，江青揚了揚眉毛，開玩笑地問我是否打算好好享用這頓晚宴。「當然，」我回答。然後補充說，她的出現讓我不能工作了，我感到不安。她大聲笑着

責怪我「工作太拼命」。這是共產黨內很通用的恭維話。在第二晚的餐桌上，我故意裝出健忘的樣子，用左手拿着筷子，右手潦草地做着筆記，這種無禮舉動很容易讓江青蹙起眉頭。我很羨慕記錄員，可以記下我們說過的每句話，同時還有女隨從人員用筷子將食物喂到他的嘴裏。

我們的膳食經過精心準備，別致而又毫不鋪張。每個人面前有10道菜：肉類、家禽和地方菜。在兩頓飯之間有茶點招待，只有在餐桌上才會出現紅酒和白酒，白酒是一種叫做「茅台」的烈性酒。江青通常是不喝酒的，當大家都舉杯祝酒時，她會將酒杯端到唇邊，但從來不品嘗一口。她看到我能喝酒，還不時地續飲幾杯，她笑了笑，說不介意我喝酒。「這也是我研究的部份」，我讓她放心，雙手舉起酒杯，對着已經喝紅了臉的老陳示意，老陳來自四川，年齡比我大。她咯咯地笑了，故作姿態地宣佈：「我們都知道怎麼喝白酒。」

至於自己，江青只是說酒精侵害了她的神經系統，然後繼續握着筷子往盛滿美味菜餚的盤子裏夾菜。

江青喜歡清淡口味的菜餚，特別是最後上的那些盛在小碗裏的糊狀菜餚，有的是漂浮着珍奇海鮮和花狀蘑菇的湯，有的是在剁碎的蝦末和綠葉蔬菜點綴下閃閃發光的大米粥，還有表層飄浮着茉莉花瓣的小米粥和加了糖的核桃汁，這是江青推薦的，據說特別有營養。它們看起來都很好看，但出於習慣，我還是避開了這些菜餚，而選擇那些刺激的、帶酸辣味的菜餚，而且每吃一口菜都要蘸着醋和辣椒醬，空氣中彌漫着一股濃重的辣椒粉的味道。在我們第一次一起吃飯後，我的座位前總是額外擺放着調味品，醋和辣椒醬。「主席還是喜歡吃湖南辣椒嗎？」我問。（湖南是毛澤東的老家，那裏的辣椒非常有名）。「不如以前了，他現在年紀大了，」她輕聲回答我。

1

說到日本再次入侵上海，江青準備逃離這座城市的時候，她中斷了講述，給我留下一個懸念。我猜想，她會將自己的目標定在哪裏呢？我記得有一篇杜撰的香港報導中提到江青參加了國民黨宣傳部組織的中央電影公司，並到過重慶和其他一些內地城市，一直從事國防電影的拍攝，並於一、兩年後在延安出現。另有一種更為合理的解釋，共產黨電影歷史學家程季華的報導中說，1938年，江青在武漢的中央電影公司工作，第二年去重慶拍攝《中華兒女》，與英俊瀟灑的才子趙丹共同擔任主角。

我的沉思被她的話打斷了。她說在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離開了上海，民族的災難摧毀了聯華公司，又一輪的中日戰爭開始了。在上海報紙發表「我的自白書」寫出自己的困境後，她帶着憤怒和痛苦逃離了這座城市。等她輾轉900多英里到達西安時，戰爭形勢變得更嚴峻了。8月13日，日本炸開了通向上海的道路，摧毀了這獨一無二的社會和文化現象：令人難忘的「1930年代的上海」。

1930年代末的西安還只是陝西南部一個雜亂而落後的集鎮，是上一個千年的遺物，曾做過11個朝代的首都，人口只有5萬，其中有5000人是國民黨特務，他們控制着這座城市。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在這裏建立了八路軍辦事處。從1937年到1946年，八路軍辦事處（1970年代作為共產主義革命聖地被重建）是在流亡左翼份子到達行程的終點前（延安以北300英里的山區），教導他們認識共產黨神聖信條的地方。江青是選擇這一行程的眾多年輕人中的一員。對大部份人來說，這次行程是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張學良扣留了蔣介石，此後形勢有所改善。但我們（紅軍）仍處於限制下。蔣介石調遣3萬兵力包圍了我們的根據地。就在12月12日事變後，我得知我們

的部隊已到達陝北，我要求去那裏。直到1937年夏（實際上是8月下旬），我才到達延安。當時去延安已經非常困難了，我坐上一輛運糧食的軍用卡車。路上遇到一場暴雨，道路被沖毀了，我只得中途下來等了很久。當時身上帶的盤纏已經用盡，真到了日暮途窮的地步，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有人找來一匹馬，但我不會騎馬。我小心翼翼地爬到馬背上，但馬只是吃草，紋絲不動。我不想承認自己不會騎馬，下馬折了一根柳樹枝，然後上馬用來抽打馬屁股。這使它野性發作，狂奔起來。我彷彿覺得自己隨時可能掉下來摔成碎片。最後，這匹馬精疲力竭，速度才慢了下來。」

「我到達洛川時，中央政治局正在那裏召開會議。我感到非常害怕和不安，深恐會在他們面前昏倒。但我仍決定見一見中央的領導同志，他們全體都出來和我打招呼（名人的一種自我吹噓？）。我心裏想絕對不能在他們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還好，我和他們都握了手。後來聽説，這次會議，非常重要。」

正談論着中央委員會政治話題時，江青把話題轉到了馬和戰爭精神上。在延安，馬是很稀有的，只有領導才能騎到馬。她與毛主席結婚後也擁有了一匹馬，這使她克服了對騎馬的恐懼。為了強迫自己學會騎馬，她不斷地練習，達到了10分鐘騎 5 公里的速度（比一小時18英里要快）。

「即使現在我還在騎一匹溫馴的老馬，我喜歡騎馬，你呢？」

「我得承認，我喜歡騎馬的感覺遠勝於騎馬的過程。如果馬感覺到了我的不安，會用它的方式來和我相處。」

「你必須有一匹烈馬，然後自己訓練它，」她建議道，「當我的馬聽到我叫它『馬兒』時，它會回頭向我嘶鳴。但如果我沒有馴服它的話，它可能會把我摔下來。」

她又接着前面的話題繼續説起到達根據地的這一段經歷。在從洛川北到延安的50英里艱苦跋涉的最後一程，她和其他人一

起坐在卡車後面。巧合的是，她坐的卡車前面就是毛澤東坐的卡車，洛川會議結束後毛正在返回延安的路上。當時並不知道有這種巧合，她是後來才知道的。她對延安古老城牆的第一眼印象記憶深刻。在城牆的南門上刻着「安瀾」兩字，「平息風浪的意思」，她懷舊地說。

江青的敘述中沒有提到紅軍重組的情況。在她1937年8月到達延安的7個月前，中共的領導機構從寶安遷到東南40多英里的延安。延安在後來的10年中成為陝甘寧邊區的首都（見地圖）[22]。邊區位於洛川以南，長城以北，黃河蜿蜒流過，將河東和河西隔絕。江青到達延安時，共產黨結束長征2年後正處在休整階段，為求得全黨一致和確立黨的信條，經歷了最痛苦和最關鍵的時刻。在那次令人難以置信的、考驗人們意志的長征中的幸存者，成為一代革命的創始人，被稱為「長征老戰士」。這種地位的差別永遠是江青的一個劣勢，同時也促使她在另一次談話中談起後來她參加過的解放戰爭。

長征的實際路程眾所周知，但其人文意義只能在歷史記錄上粗略地查到。長征開始於1934年秋天。國民黨從1930年12月到1934年10月對中央蘇區發起包圍戰。紅軍在遭受連續失敗後開始撤退。在這次6000多英里馬拉松式的偉大長征中，只有約2萬人的軍隊（不到長征出發時人數的百分之三十）活了下來。在到達陝北吳起鎮後，長征宣告勝利結束。黨的核心機構轉移到保安縣北部180英里的地區。這裏位於荒山之中，以前曾是個邊境城鎮，因曾是17世紀中期推翻明朝的起義者住地而聞名。

留在保安的中央委員們經歷了著名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使蔣介石被迫接受抗日統一陣綫，同時中央委員會也改變了戰略部署，遷移到了延安這個城牆包圍着的城市，現在大部份都已成

22 1937年9月22日，本著統一陣綫的精神，共產黨與國民黨達成共識，將陝北根據地更名為陝甘寧邊區，指當時三個省被部份解放的地區，通過普選建立了民主制度，並將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後來的事件證明這些改變只是表面文章。

為廢墟。作為3個世紀以來防禦北方游牧部落入侵的軍事要塞，延安一直都很繁華，直到19世紀中葉的穆斯林和太平天國起義。1928年到1933年的西北大饑荒，則是這個地區自然災害史上最近發生的事，有數以百萬的人餓死。延安幾乎沒有什麼城市建築，實際上是一個由黃土[23]和懸崖絕壁所構築成的天然軍事要塞。所有建築都是窰洞，一些在硬土中打孔隔成的空間，這樣的房子冬暖夏涼，敵人的炮彈無法轟炸。窰洞要比印第安人住的房屋考究得多，有拱形的門洞，糊上紙的木格窗戶，裏面是隔成方形的房間。好一些的窰洞裝有結實的黑漆木門，比大多數中國普通居民的住所要文明得多。之字形的小路通過懸崖峭壁將兩排窰洞連接起來。紅軍到達時，延安大約有3000人，在後來的10多年裏，延安人口達到了頂峰，有10萬人[24]。

延安革命根據地對於吸收新人是非常謹慎的，特別對於女人，要綜合考慮她的聲譽，政治經歷，以及組織的信任。江青到達後不久就見到了李富春、黨的組織部副部長（婦女運動傑出領導人蔡暢的丈夫）。在江青說明自己的政治經歷時，描述了在上海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多年來如何努力去和上海地下黨組織聯繫，儘管她說自己在青島已經入黨，但還是遇到了障礙。他們也不告訴她為什麼對她有這樣的不公平待遇。她在李富春面前坦白和控訴情緒激動，但李富春一直保持着同情態度，平靜地說：「那些都不重要，今後一切都沒有問題了。」

「沒有問題」，這句話是對一個人到達延安時政治地位的判斷。在到達前，正式確立黨的關係，可以優先進入「黨校」和邊區政府所屬的其他一流教育機構。戰爭爆發以來，學生和城市知識份子一窩蜂似地奔向延安，入學考試的競爭非常激烈。江青立刻把目標瞄準了最高學府「黨校」。這裏錄取學員須經中央委員

23 被風刮來的紅褐色的細沙土。

24 據延安導遊說，1970年代，人口下降到約5萬人。不論共產主義怎樣公平，這裏的人們依然很窮。他們的皮膚乾裂，永遠眯縫著眼睛遮擋陽光和風。

會的許可，只有那些政治可靠的人才能進去。當江青站在黨的著名領導人面前，於作為女演員和政治激進份子的過去，接受審查時焦灼不安。她記得很清楚，他們一件一件地詳細調查，並檢討和現在的政治問題有沒有直接聯繫。

張國燾，毛澤東的長期對手，是很少能回憶起當時江青被延安接受的領導人之一，當時他是陝北邊區政府的主席。他的回憶錄從另一方面確認了江青到達延安的日期。1937年夏末，公共關係部負責學員錄取。儘管這項工作名義上是由邊區政府秘書處負責，實際上它是政治保衛局的分支機構，受中共中央委員會領導。公共關係部受兩個人的意志控制：毛澤東和張聞天。儘管公共關係部對他們接收的個別人員共產黨員身份有所懷疑，但仍把他們當作朋友，其中有民主人士梁漱溟和軍事家何致禮，以及後來成為毛澤東妻子的女人，演員江青，她的到來引起了一點小小的關注。

江青回憶說，多年後，她和李富春回憶起在邊區時代的往事，李富春笑着說，「當年你想進黨校時的口試，我是故意嚇唬你。」江青雖然通過了考試，但這只是過了第一關。她當時還急切地想進「魯迅文藝學校」（後來改為學院，是否在同一時間，還是她進黨校後就不清楚了）。只靠過去從事表演藝術的經驗是不够的，政治資格是極為重要的基準。當她到「魯藝」申請入學時，校領導陳雲——中央委員會成員，也是組織部部長接見了她。江青得知陳雲個人掌握着入學許可的一切權力時，盡力給他留下這樣的印象：她真摯地渴望在「魯藝」學習馬克思主義，不能讓他覺得自己的興趣只是演戲。她對陳雲說，她已打好行李並隨身帶來了，她是如此渴望進這所學校。她這場表演大概打動了陳雲，使他相信她會服從組織部的任何決定，所以當場就錄取了她。（想起自己當年做事的拼命方式，她笑了，然後又匆忙加了一句說，當時自己真的只想學習）。實際上，陳雲從來都不是她

的戲迷。在錄取她進「魯藝」不久，曾去看她的演出，對她演的戲，批評苛刻，使她難堪。

總的説來，在延安的生活開始正規起來。秋天，她參加了6個月的軍事訓練，這是她第一次接觸軍事。她驕傲地指出這段歷史（文革以來，她一直努力獲取軍隊的支持）。同時，她開始第一次正規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中國版的理論，主要是王明根據「共產國際」正統理論在黨校宣講的。王明的年齡只比她大一點，但他的話被上海自封為共產黨的那些人視為真理，他儼然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最高傳播者，毛澤東是他在延安的意識形態對手。江青在表演藝術領域的工作繼續着，儘管她沒有理會我問她演過哪些戲和哪個角色的問題。

江青强調在藝術和文化領域工作時間不算長。「上海的4年中，有2年在文化圈上層工作，有2年在基層工作。到延安後，我的工作性質變了。起初我不想上「魯藝」，但還是服從了組織的安排。」

我眨了眨眼睛，問她為什麼，但這並沒有使她想起在此前的敍述中曾説過非常想進「魯藝」學習的話。

我喜歡做群眾工作。與文藝相比較，群眾工作更重要。群眾工作是基本的政治工作。

顯然，她的感覺是矛盾的，這種矛盾來自她的回憶。也許她認為到藝術學校工作會恢復「資產階級戲劇」和國防電影演員的形象，而這是與毛澤東的革命根據地生活格格不入的。或者第一次被安排做秘書工作是對她含蓄的侮辱，因為這個職位太低了；或者在學校某些負責人手下工作的經驗，對她來説痛苦到不願回憶——在他們之中有曾在上海迫害她的周揚和張庚；或者這所學校變成了王明領導的，以致她不想提到他們？

暫且不論她的感覺，江青確實在藝術學校做了一些工作，這所學校於1938年發展成著名的魯迅文藝學院。1937年秋，她在

學校任秘書，主要負責保護女學生和激發她們的學習興趣。其中有個名叫張穎的，後來成為她在廣州最信任的副官。另一個女同志安琳和其他一些健在的人也在那裏。江青欣賞地瞥了一眼張穎說：「我想炫耀一下我的資歷，我當過她的老師。」

2

張穎值得我暫時從江青的故事中脫離出來作一個簡短的描述。儘管她擔任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宣傳的重擔，但在我的採訪中，她只是作為江青的首席副官。在談論延安時，江青轉向她尋求更多的信息或確認自己的一些說法。張穎只比江青小 8 歲，但像大多數人一樣，政治地位要低得多。在江青面前，她是個敏銳的觀察者，說話總是很謹慎，但一離開江青、回復自我的時候，她是一個充滿活力、感性和熱情的知識份子。在我們住的客房裏，或是在去紀念館和飯店的路上，她負責接待並記錄我的話，還負責綜合同伴們對我的觀察和評價。顯然,這一切信息已傳到江青那裏。江青通過張穎這個渠道傳達給我信息，她喜歡通過他們間接傳達。這樣，我就不會打斷她的思路。張穎也傳遞能讓我看的文件，都是有關江青後來的經歷。從同一渠道，我傳遞給江青一些問題，包括外國媒體關於她到達延安時間的混亂說法。毫無疑問，她已知道了這個問題。張穎堅決否定這種說法分歧，並確認江青到達的時間是1937年8月，從上海經西安這樣一條直接的路綫。

她的根據是什麼呢？我在一次私人談話中問道。

張穎說，她在江青之後不久就到了，是同年11月，不是1938年，也不是1939年。她繼續笑着敍述她在延安的早期歲月。當時，她還是一個孩子，只有15歲，只會說廣州話，因為她在廣州出生和長大（儘管她說的普通話也很棒）。

為什麼來延安呢？

「我想抗日，實際上，那是我當時了解的全部內容。一開始西北人聽我說話，總是忍不住取笑我奇怪的方言。當我開始努力學習北方話時，她們總是嘲笑我的濃重廣州口音，為了克服困難，我每天早晨都起得比別人早，然後跑到山上，用北方話大聲朗讀劇本。」

「這麼說，你和江青都是演員？」

「和江青同志不太一樣，」她害羞地回答我，「我從沒有在劇裏面扮演過角色，因為我的才華不够。」

通過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以看出張穎謹慎而謙虛的性格。有一晚，江青停止了談話，伸手拿過一個幾分鐘前侍衛拿來的長方形箱子，從箱子裏拿出兩把精工細雕的開信刀，一把是象牙做的，一把是竹子做的。「兩把都不是給你的」，她和我開玩笑。她還沒有決定給我哪一把，把它們放在手裏，愛不釋手地翻看着。她說，這兩把刀都很漂亮，儘管象牙做的那把更珍貴。「所以你應該拿這把象牙的」，她遞給我，然後把那把竹子做的送給了張穎，張穎顯得非常吃驚和不安。我高興地謝過她，然後閱讀這件文革中在長沙挖掘出來的古文物上銘刻的文字。那些大量出土的文物象徵着廣大人民的科學成就。它們的藝術和歷史價值對她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幾天後，張穎獨自來找我，並給了我那把竹子做的開信刀，堅持讓我收下。我很不理解，拒絕收下，但她毫不妥協。於是，我提出用象牙的和這把竹子的交換，她還是不接受。「我知道你喜歡竹子，」她說。我很奇怪她怎麼會知道呢？原來她注意到我在黎明時分溜出客房（我們住在不同的房間）拍竹笋的照片。我開玩笑說，自己的隱私受到了侵犯，向她屈服了。在下次見面時，江青高興地看到我有了兩把開信刀。她說，喜歡這種不計物質價值，把竹子看得比象牙貴重的思想。

3

既然江青在延安，自然的，我想知道她是怎麼遇見毛澤東的，是怎樣走進他私人領地的。這個答案被省略了，在一個公眾人物背後閃爍着她的浪漫想像。並非她說的一切都是為了公眾記錄。早在上海，她曾聽說過紅軍領袖毛澤東及其夥伴朱德的謠言。零星的報導以及在白區和紅區間穿梭的人士使人們對毛澤東有着不同的印象：一個具有現代革命思想的農民起義者和民眾的保護人。江青對他的外貌只有模糊印象，更談不上對他人品的了解了。和其他到延安的新人一樣，她對這些領導同志的不尋常感到好奇，並開始注意毛澤東超凡的光環：威嚴的氣質（如一些人所說的）。最初在延安的歲月裏，生活受到那些在政治、軍事和文化上直接控制她的人影響。

但到達後不久，毛澤東還是發現她就是女演員藍蘋。（她是怎麼知道的呢？）毛發現了她，然後給了她一張他在馬列學院演講的票。出於震驚和敬畏，她不敢要，但很快就戰勝了自己的膽怯，收下這張票，去聽他演講。

他們的聯繫發展着，根據地領導層中並不清楚，在人民群眾面前完全不暴露。對她的保密要求源於傳統和革命兩個特點，不允許她向公眾傳達任何親密的信息。在與我進行純粹的精神交流時，她會說一些帶有個人感情的話，如被劃為「資產階級情調」的浪漫想像、生活或文化中的性等——背離了否定個人和性的「無產階級」理想。儘管荒謬，我還是發現她是一個有着強烈感情的人，有着非凡的想像力和明顯的女權思想。但她沒有給我理由，讓我相信曾經受過浪漫愛情和革命決心這對矛盾的困擾。

江青和毛澤東之間有什麼共同點呢？表面看來，在他們個人經歷中，不同點比相同點更明顯。這種截然不同是否就是令他們互相吸引的因素呢？

毛澤東出生和成長在湖南，一個南方內陸省份，早在2500年前，湖南是楚國疆域，自宋代起（960-1278）因躲藏在沼澤地裏的強盜出名。上一個世紀，湖南孕育了無數的民族英雄和共產主義革命者。

江青，正如我們所見，來自沿海地區山東，曾是古代魯國的地方，孔子的出生地。在19世紀，山東被太平天國和義和團的起義者以及一個叫「紅燈照」的女子武裝團體割據（江青的第一部革命劇恰巧也叫這個名字）。20世紀初，帝國主義者競相爭奪山東半島的控制權，引起國家動蕩，從而喚醒了江青的政治覺悟。

富農家庭出身的毛澤東接受的是傳統儒家教育。他對家庭的反抗始於閱讀經典小說《三國演義》，一本描寫漢末割據各國現實政治的書；《水滸傳》，描寫一群造反者的故事；西遊記，一個關於和尚和猴子的有趣故事，是對社會制度的嘲諷。

民國初期出生在一個沒有文化的家庭，江青只接觸了基本的儒家價值——嚴格自律和順從尊者。比毛澤東小20歲，她錯過了世俗的歷史小說，這些小說傳統上對男孩和男人更有吸引力。她更偏愛現代戲劇，這是外國價值和生活方式的寶庫。然而，她還是被傳統文化所吸引，特別是《紅樓夢》中描述的大家族的浪漫，以及明代言情小說《金瓶梅》中描寫的富貴生活。

儘管江青加入共產黨的年齡比毛澤東還小，她19歲，毛澤東28歲，這種不同容易讓人誤解，其實是毛澤東創建了共產黨，在此之前，共產黨是不存在的，而江青的黨員身份是不連續的。作為一個流浪青年，毛澤東曾開玩笑想像自己可能成為幾種人：制肥皂的工匠、教師、律師或者商人。然而，在他20歲時將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領導革命。對比之下，江青投身一個行業幾乎1年了，直到23歲遇到了毛澤東。她將自己的精力分散在自己的職業和黨的工作兩方面。

也許，他們間的強烈對比，現代社會的辯證體現，是毛的

農村定位和江的城市定位。毛澤東從來沒有在一個大城市連續生活過，直到1949年成為北京的領袖。從15歲起，江青就生活在文明的省會城市濟南，然後是現代港口青島和上海，偶爾也去過北京。在踏入成年期後，上海一直是她的文化楷模。在若干年後發動的文革中，她把那裏作為奪取北京權力的戰略據點。

毛澤東的上海經驗比較短促和自卑。在1921年秘密成立中國共產黨時逗留，很快又在1922年冬返回，成為組織部主管，並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為國民黨執行局工作。在那裏，他還做過短期的洗衣工（眾所周知，那在一個外國人統治的城市裏是很低下的工作）。在城市的貧困經歷，從他的作品就可以看出：沒有一篇文章是關於上海政治歷史或社會經濟結構的。

毛澤東在婚姻上就像在政治上一樣自稱是革命的。第一次是與一個農村的文盲女孩結婚，由父母按傳統方式安排，從來是不完美的。他第一個真正的婚姻對象是楊開慧，他在長沙時倫理學老師的受過教育的女兒。作為一個男人，不受傳統貞節觀念的束縛，毛澤東總是自由地談論以前的伴侶。即使在經歷兩次再婚後（他的另一位伴侶是賀子珍），他還在一首詞裏讚揚楊開慧：

> 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
> 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
> 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
> 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江青是一個新名字，代表着一個新人物，從此上海的李雲鶴和藍蘋以及這兩個名字在上海的種種窘迫就不復存在了。她喜歡用這個有着共產主義特徵的新名字。那麼，江青這名字，一般人相信是毛澤東取的，是否屬實呢？我問她。

她對此反應很迅速，好像我侵犯了她私人的領地一樣，說是

她自己選的名字。然後，她解釋這個名字的意義，從字面上說，是「藍色的江河」之意。江字和她家族姓氏「李」沒有關係，她本來就想和「李」這個姓脫離關係。「江」這個字說明，她愛又寬又長的長江，她在上海看見過長江的入海口。「青」字表示她愛高山和大海，在中國畫中，山水都是用青色表現的，這是一種自然色，在中國人的印象裏，「青」是微帶綠色的藍。為了讓我了解「青」的特殊，她引用了唐詩裏的句子：「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她說，這就是人們能從她名字中讀出的含義。

這個含義是多重而富有魅力的。「青」意味着她要超越舊的她——藍蘋的「藍」，而「江」之意義為河，令人聯想到「陰」，中國傳統思想「陰」代表女性。在中國的神話和歷史上，曾有女人引致江河泛濫，淹沒土地而受罰的故事。所以有「女人是禍水」的俗語。

顯然，她所以聯想到「陰」，意在與毛澤東的「陽」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中國傳統思想「陽」象徵男性。人們習慣把毛澤東比作太陽，太陽是宇宙中最根本的陽性力量。在文化詮釋中，太陽總是代表着積極的好的一面，是佔據統治地位的，一首歌曲的歌詞是：「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在他們最初結婚時，為彼此截然不同的背景而互相打趣，江青苦笑着回憶這段經歷。主席經常說她小時候「信神並讀孔子書」。此後又學會「資產階級情調」，主席說這來自對戲劇的沉迷。只是後來才開始學習馬列主義，這是她學習的第三階段。然而，真相是她從很小的時候起就反對儒家，長大後知道要支持共產黨。即使現在，她也沒有在理論和實踐上精通馬列主義，在有生之年將朝着這個目標不懈努力。

江青與毛澤東發生了性關係，當時在紅區引起極度的混亂。在參加過長征的人員中，只有30個女性，大部份是紅軍領導人的妻子。幾乎所有成家的士兵都不得不拋下妻子和孩子參加長征。

由於距離和戰爭原因，沒有多少家庭最後能夠團聚。當紅軍在西北安定下來的時候，男女比例約為18：1。一些男人在本地找伴侶再婚，但並沒有與被拋棄或失散的妻子離婚。大部份士兵年齡都很小，也很窮，沒法結婚，領導人要求他們不能沉迷於酒色，也不能嫖妓，全部力量都要用於革命，也就是打敗敵人。

在紅軍控制區，結婚和離婚都要根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律進行，這部法律在1931年完成初稿，1934年修訂，後來在1939年（江青和毛澤東結婚這一年）再次修訂。它打破了傳統制度，規定人人平等，用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取代了中國的一夫多妻制（適用於過去的有錢人），並可以自由選擇結婚伴侶，擯棄了過去由父母或媒人指定的婚姻。登記手續簡單，符合王明的中國化蘇維埃模式。結婚就像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簽協議那樣，由共產黨組織來確認婚姻的真實性，婦聯也處理一些結婚和離婚的事。

長征的幸存者組成了革命的中堅力量，他們的觀點，如同法律改革一樣，為解放區人民樹立了標準。在過去的歲月裏，他們可能為了父母而結婚，但在先進的延安，他們不再服從父母的這種安排，掙脫了孔孟之道的束縛，在維護黨的利益以及不與剝削階級結婚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來選擇伴侶。作為革命理想主義者，他們嘲笑虛浮的浪漫和為人不齒的通姦行為，以及所有個人放縱的事情。這種高尚的革命思想在文化落後的西北得到了加強。在這裏，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離婚實質上是丈夫的特權。當一對夫妻離婚時（很罕見），被拋棄的妻子是受辱的一方。這個標準對任何人，無論是他們的領導人，還是他們的主席都毫不例外。

此外，那些追隨紅軍腳步來到延安的城市學生、藝術家和知識份子，他們獨立的社會行為與當時存在的農民標準發生衝突。受過教育的年輕一代經歷了五四運動和婦女解放運動，男女平等的思想激勵了他們：蔑視所有舊式婚姻習俗，配偶之間通過簽

訂合同生活在一起，或免去所有的程序——這表明他們屬於先鋒派。或者文化程度較高的男女用一種現代的方式生活在一起。關於電影明星私生活隨意的傳言，從沿海城市傳到內陸城市，一直傳到國外。

這種傳言甚至已經牽扯到毛澤東。外界的印象是他和妻子賀子珍的關係已經破裂。賀子珍是一名長征老戰士，是毛澤東孩子的母親。毛與一個上海流亡來的電影明星有關係。江青不僅要克服領導人對電影明星藍蘋刺眼形象背後政治動機的懷疑，還要克服農民對這種與城市女孩公開的無所拘束的自由戀愛的本能恐懼和蔑視。

江青與毛澤東的關係在歷史記錄上是很混亂的。私下裏認識她和毛澤東的沒有人敢對媒體製造的各種謠言進行討論，或者是他們沒有什麼可解釋的？例如，曾有這樣的傳言，說中央委員會對毛澤東與江青的婚姻規定了一個條件，即如果毛澤東娶了演員藍蘋，她在20年內只能在家庭生活範圍內活動，不准干涉公眾事務，或者直至她死去都不能干涉政治。對於一些觀察家而言，她在文革中的出現遠遠沒有超過結婚20年這個期限，似乎也證實了這條傳聞。

我私下問張穎，不出所料，她把問題轉達給了江青，次日晚上，江青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這個問題。

在離開上海後的很長時間裏，她都不能擺脱在上海的敵人，因為他們中有很多人又在延安出現了。他們採取很多方式，包括操縱西北民眾的輿論，警告她如果拒絕合作（她在這裏沒有說出來，儘管這種合作可能包括讓她拍攝政治和解電影），他們會殺了她[25]。

期望在延安能得到公正的待遇，她向最高層的領導人，即

25 她的語言即不誇張也不粗俗，可以看出上海共產黨員之間的革命情誼是很淡漠的。

政治局成員說明了受迫害的背景，為使他們能清楚地了解她的過去。後來，她成為毛澤東的妻子（1938年被認可）[26]，但發現仍不能從事她想做的工作，擔心對她過去個人歷史的誤解仍然存在。因為沒有人可以站出來為她辯護（顯然，包括毛澤東在內）。為了使這些表面公正的人注意到她在上海的境況，她特別在黨組織面前表現出另外一種姿態。

他們的回應是：「我們對你的歷史很清楚。」

他們的話聽起來是很確定的，但只憑這些話是不夠的。如針對張庚，她問道：「他為什麼說我是托派份子，使別人相信這就是問題？」

「張庚沒有那個意思。」他們含糊地回答。

他們說，當時被周揚[27]蒙蔽了，江青推論。他們宣稱，張庚和其他人還不認識她，那實在可笑，實際上張庚對她相當了解。剛到延安不久，她就充分意識到張庚及其跟隨者是真正的的特務（大概是國民黨特務，但不知為什麼特務在紅軍陣營沒有暴露）。她永遠不會忘記他們使她在上海的生活變得何等困難。在成為主席夫人後，她有權力去消滅他們，但控制住了自己。就說張庚，在延安被任命為「魯藝」戲劇系主任，她或許可以阻止這種安排，這種安排損及她的利益。解放後，張庚被任命為戲劇研究所所長。

黨組織對她的不斷哄騙難以驅散她的疑雲，一些當時的領導人仍反對她，封鎖她，不讓群眾認識她。最重要的是她想讓群眾認識她，歡迎她在他們中間出現。

儘管心裏很明白，她表面上仍在黨中央作出另一種姿態，提供在上海地下黨活動的詳細政治狀況以及自己做出的犧牲。在

26 無疑沒有慶祝儀式，可能是主席在中央委員會上簡單地告訴同事們最近的生活安排，而將這一結合正式化。

27 以他當時在延安的地位，不可能要求政治局成員強調他在王明影響下，在上海曾倡導國防文學和國防文藝。

主席夫人的地位上，她想讓他們明白，不會報復那些曾經反對過她、並仍在反對她的人。他們應該明白，她願意代表他們工作。只要他們願意認罪，她會原諒的。她一直在等待，但沒有人懺悔。

在後來的幾年裏，她懷疑周揚（他從1930年代以來幾乎掌控着黨的文化事務）是切斷她與上海黨組織聯繫、散布謠言以及隔離她與延安群眾聯繫的罪魁禍首。但在這一切得到確認前，她一直保持着沉默。

向周圍工作人員面無表情的臉上掃了一眼，她嚴肅地宣佈要利用這個機會堅決澄清她脱黨的事情。幾年來，她一直猜測周揚、田漢、陽翰笙和其他「劇聯」領導人要對她在上海的不幸遭遇負責。在文革前夕，取得主動權前，她曾鼓起勇氣去找周揚，坦率地問他：「你知道我當時在上海嗎，知道當時我尋求的是什麼嗎？」

「我知道，」他謹慎地回答。

「我努力在與黨組織取得聯繫。」

他低下了頭。她用低沉、鄭重其事的語氣説道。

4

江青站起身，召喚我跟隨她，並示意警衛帶路，走出那些打開着的大門，進入漆黑的夜色中。小趙看來顯然很困惑，拿起手電走在前頭，進入潮濕的夜霧和昏黃的月色中。她跟在小趙後面，我跟在她後面。在我後面的是翻譯以及記錄我們談話的那個青年。他現在得完全靠自己記筆記了，因為江青有意離開室內的麥克風。

她一邊走，一邊興致勃勃地講話，但由於背對着我們，有些話我沒能聽見，在我後面的記錄員顯然也沒有聽到。而且，我們走路時還要小心翼翼，避免被躲在狹窄小路兩旁竹叢裏的警衛手中亮閃閃的刺刀刺傷。在向四周掃視時，我看見月光下張穎，俞

士蓮和老陳冷冷的微笑，還有這個神秘的、全副武裝的熱帶花園裏洋溢的不安。

「我有一些事情想告訴你，但不想告訴大家，」[28]說完這句話後，江青開始了一長串滔滔不絕的講述，這些談話都沒有記錄下來。她知道她和毛澤東的婚姻在國際上的流言蜚語，但她對此並非十分在意。這些流言可能大部份出自王明及其同黨的胡說八道和惡意誹謗。她也知道出現在倫敦《中國季刊》有關傳記上的種種臆測，但其間充滿了錯誤。周總理關心她的幸福。她信任他，他也對她有信心。他和妻子鄧穎超都知道她不願談論圍繞她與毛澤東婚姻展開的亂七八糟的論戰。然而，她要說一些關於這方面的事情。

黨中央到達蘇區時（她指的可能是1937年1月到延安），毛主席和賀子珍已經分開一年多了。1937年夏末，她從上海到達延安時，毛澤東與賀子珍已經離婚了。賀子珍已經離開西北，在蘇聯休養，身體正在逐漸復原。「誰挑起的離婚？是賀子珍，而不是毛主席。」她嚴厲地說道。

儘管從未見過賀子珍，她把從主席家庭成員，間或從主席那裏也聽到一些，對賀的人格評論拼湊在一起，主席說得很少。江青意識到賀子珍是一個非常固執的人，她從未理解主席的政治世界。她的問題部份與家庭背景有關。她出生於一個地主商人家庭，生活上習慣高標準。在長征途中，當佔領城市後，賀子珍想放棄長征，住在城裏，因為她習慣城市生活。由於從小被寵壞了，她永遠也克服不了對體力勞動的輕視。她不願意做剪報這類替主席分擔責任的簡單工作。

神經質問題是不幸造成的，江青繼續說道。在長征期間，賀子珍在敵人進攻中幾次受傷，這些經歷使她身心受到極大刺激[29]。

28 我自始至終努力尊重她私人和公眾資訊的區別，以下是她授權我講的。

29 像其他數不勝數的人一樣，她因爲精神失常身體垮了，這是中國革命史中未經考察的一面。

1935年下半年，紅軍到達西北時，她已不能應付政治形勢、她的孩子或其他人際關係。當然，主席發覺她的行為難以容忍。當共產黨到達西北蘇區時，賀子珍拋棄了毛澤東，發誓再也不在延安居住。她獨自回到西安。周恩來和鄧穎超關心她和主席的關係，試圖説服她回延安，但被拒絕了。由於沒有人安慰和勸止，她禁不住把一腔怨氣灑在兩個孩子身上，經常打他們。甚至在長大成人後，他們仍然顯出被打壞的後果，江青説道。由於她的緣故，他們像母親一樣，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生活的要求。

1939年，賀子珍和兩個孩子（女兒仍很小）被送到莫斯科。在那裏，醫學機構和其他俄國人的粗暴對待，使她的情況變得更糟。由於在隔離環境下的壓抑，她又開始無情毒打孩子，最後放棄繼續撫養他們。別人拿走了孩子的監護權，她被送進一個精神病院。在1940年代後期（當時斯大林對毛澤東越來越抱幻想），她被送回上海。現在，她仍然生活在精神病院裏。她間或仍被施以休克療法。

「對她的狀況有任何説明嗎？」我問道。

「對於嚴酷生活環境的憂鬱反應，」江青輕輕回應道。

毫無疑問，關於毛澤東與賀子珍（忠貞的妻子、多產的母親、長征老兵）決裂的故事比江青講述的要多得多。她能夠理解賀子珍悲劇命運對自己的暗示嗎？

賀子珍、江青和其他被毛澤東吸引的女人的命運，都被無情地與革命的最受保護的東西——毛澤東的聲譽及其權力聯繫在一起。當代觀察家已留下了一些暗示。象許多渴望政治羅曼蒂克的外國記者一樣，尼姆·韋爾斯着迷於這個「延安奧秘」。她稱毛澤東為「中國的亞瑟王」、「延安圓桌主人」，稱他的手下為騎士，稱他的妻子是真正的淑女，她尊貴高傲，且具有為人表率的意識。儘管尼姆·韋爾斯從未見過毛澤東的最後一任妻子，但江青符合她作為一個美國人對毛澤東的理解。她曾寫道：「毛澤東

是一個特別喜歡女人的男人，但不是普通的女人。他欣賞美麗、漂亮和才智以及對他本人和他的思想的忠貞。他不畏懼有獨立頭腦的人，不拒絕口紅和鬈髮。」

在《紅星照耀中國》修訂版中（1968年），埃德加·斯諾提到一個叫吳莉莉（吳光偉）的女演員，毛澤東曾深深地為她着迷，她神秘地為江青奠定了基礎。在1930年代後期，吳莉莉為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做翻譯。史沫特萊是一個記者，曾經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朋友。吳莉莉是一個非常優雅和聰明的女人，非常有主見。當幾乎所有女人都剪短頭髮時，她卻保留着一頭長鬈髮和塗口紅的習慣，這是在上海養成的。1937年5月，毛澤東順便拜訪史沫特萊住的窰洞，當時，她和莉莉、尼姆·韋爾斯正在吃晚飯。象其他在延安的政治狂熱者一樣，莉莉也是毛澤東的崇拜者。當他們在喝酒時，她誘使毛澤東握住她的手。

賀子珍風聞這次調情事件後（無法知道是否有比斯諾夫人所見的更嚴重後果），正式指控吳莉莉使她丈夫移情別戀。毛澤東否認了這種指控。根據斯諾的說法，由中央委員會成立的特別法庭仍然批准了離婚。吳莉莉和賀子珍都被驅逐出延安，我們知道，賀子珍到了俄國。

被驅逐出延安的吳莉莉是江青的先鋒嗎？儘管江青沒有具體說明她與毛澤東關係開始的日期，但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講述了賀子珍的經歷，大體上與江青講述的可以互為補充。1938年早春，楊子烈從上海到達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在那裏，她被安排進一個單人房間，裏面有兩張簡樸的木床。在另一張床上躺着一個瘦小、蒼白、看起病怏怏的女人，自稱為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楊子烈問她，為什麼不在延安與丈夫及其同志們在一起。賀子珍說想去莫斯科治病，不想在延安。她說：「澤東待我不好，我們吵嘴，他抓板凳，我抓椅子，我知道我們完了。」

「做了夫妻的同志不應該這樣，」楊子烈說，並自告奮勇到

了延安要去拜會毛澤東，說服他給賀子珍寫一封信。賀子珍非常沮喪。

後來，另外一個同志劉春嫻私下告訴楊子烈：「藍萍很漂亮，而且會演戲。她到延安後，毛澤東對她非常着迷，為她的表演大聲鼓掌，這使賀子珍非常妒忌。他們兩人經常為此打架，後果非常嚴重。」

幾天後，楊子烈到達延安，告訴毛澤東在西安遇到了賀子珍，她曾提議帶賀回來，但被拒絕了。「都是你的錯！」楊子烈氣憤地對毛澤東說道。「你應該立即給她寫一封信！」

聽了她的話，毛澤東只是笑了笑，什麼也沒說。幾天後，當她再見到毛澤東的時候，他說：「我已經給賀子珍寫了一封信，但她不願意回來。」楊子烈不能確定他是否真的寫了那封信。但有一點能確定的，是賀子珍的健康狀況正在惡化，她必須到莫斯科去。同志們過去常說賀子珍很倔強，有湖南人的「驢脾氣」。

顯然，藍萍一到達延安，毛澤東就看上她了。

5

總的來說，江青很少談起自己的家庭和先輩，說的大多是在幾年親密相處中聽說的毛澤東的家庭。其中一個原因是出於中國傳統，在中國，一個女孩出嫁後，就永遠離開了生養她的那個家，成為丈夫家庭中的一員。自己的那個家慢慢地就從她的生活中淡化了，而丈夫的家則成為生活中心。毛澤東的家庭模式與大多數流動的革命者一樣，是反傳統的。在家庭中，丈夫和妻子處於中心地位，丈夫的父母（他們通常在家庭權威方面處於優先地位）很久前已被拋到一邊，遭受批判。在毛澤東70歲時，仍然繼續公開批判他的父親。然而，作為一個父親，毛澤東用自己的權力依然盡可能地把所有不同妻子生的孩子集中在家庭的庇護下。

在這個話題上，江青非常健談。

毛家的悲劇，在革命創始人一代中，是很典型的。當長征幸存者們到達西北後，他們的記憶由於內戰失去數以千計的親友而變得麻木。隨着歲月的推移，死亡人數達到數百萬之多，人們的仇恨也越積越多。無論受傷害的人有多少，共產黨領導人不是感傷主義者，而具有戰略眼光，個別地去訴諸血債血償決不會帶來歷史性的根本變化。最後，他們通過不懈努力把人們的仇恨轉化成實現意識形態的動力。

荒謬的是，革命戲劇對大眾情感的依賴超過對政治信仰的依賴。我們坐在一起觀看反映1940年代西北地區革命的戲劇「紅燈記」。她開始談論毛澤東的家庭。與幸存者經歷相連繫的，是對妻兒親人失散、發瘋或在毛澤東及其敵友改變20世紀歷史的暴力中被殺的痛苦記憶。在劇中，奶奶痛說李家（與江青一樣都姓李，是一種巧合嗎？）的悲慘家史。江青一邊講述毛家6個為革命犧牲的成員[30]，一邊擦着眼淚。按照她敍述的順序，他們分別是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死在中央蘇區的二弟毛澤覃，死在新疆的小弟毛澤民，死在朝鮮的兒子毛岸英，死在中原撤離時的侄子毛楚雄和因遭毒打而神經失常的另一個兒子。她還生氣地補充：「國民黨惡毒地散布謠言，說他的神經錯亂是『我們造成的』。」

在接下去的談話中，江青又提到了楊開慧，毛澤東名義上的第二個妻子。事實上，楊是他的第一任妻子，這次婚姻是非常完美的。他們的3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龍是在婚後不久出生的。後來，主席離開楊開慧到山區建立革命根據地[31]。楊開慧非常理解主席目標的重要性，給予全力支持。由於主席的革命活動，她被國民黨逮捕當作人質。她拒不揭發丈夫和共產黨，1930年在長沙被湖南軍閥何鍵殺害，一起被殺的還有毛澤東的堂妹毛澤建。

30 指他們死於戰鬥或其他捍衛黨的行動中。

31 江青沒有解釋爲什麼他不試圖保護她跟他一起走，毛也沒解釋過。

至於毛澤東前妻賀子珍，江青對她生的孩子不太清楚，主席也很少提起（據其他報導，長征前，賀子珍生的一個或兩個孩子都臨時或永遠送給了農民）。其中一個叫毛毛的兒子，主席特別鍾愛，但那個孩子在1940年代後期山西北部的戰爭中丟失了（顯然是在從延安撤退期間）。

江青剛與主席結婚時，負責照看主席的另一個兒子（顯然是賀子珍生的）。這個小男孩顯然曾被送到莫斯科，後來回到上海（可能是1944年，具體時間不詳）。在上海，他由一個牧師照顧。這個牧師有兩個心腸歹毒的老婆，她們無情地毒打這個孩子，使他永遠喪失了平衡感。江青清楚記得這個走路時左右搖擺的男孩，甚至數年後，他在轉身時仍然經常會跌倒。

江青對待這個兒子視如己出，直到1950年代初，她不得不接受癌症的放射性治療。在這種情況下，她很難再去照顧他了。人們（未點名）決定她不能再當他的媽媽了。不顧她的請求，他們把他從身邊帶走，還拒絕向她透露孩子被安置的地點。（如果孩子的監護人是江青，這種拒絕已超出了作為父親和國家領導人的毛澤東的權限）。這個損失巨大，因為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孩子，3歲時已能把《國際歌》從頭到尾唱一遍。她和毛澤東再也沒有找出誘拐孩子的人。

「主席從未對我提起關於賀子珍的事，」江青說。她所知道的大多是從毛岸英那裏聽來的。在毛澤東離婚時，毛岸英已有18歲，他陪同賀子珍和最小的孩子（是個女兒）到了蘇聯。他一回國（大約1944年），江青就和他成了親密的朋友，因為只比他年長幾歲。她與賀子珍女兒間的年齡差距則要大得多，對她顯然像母親一般。

從岸英那裏，她了解了更多毛家的人。賀子珍的這個小女兒，一個未成年人，由一個農民家庭臨時監護。賀子珍在蘇聯被送進一家精神病院後，這個小姑娘被送到一個提供膳食的國立幼

兒園，接受典型的俄國教育。在媽媽被轉移到上海的精神病院後，她被送到江青處撫養。江青給她取名李敏，李敏與她自己生的女兒李訥年紀相仿。江青把她倆放在一起撫養。

我對江青提及一些外國消息稱她自己生過兩個女兒，可能還有一個兒子。她堅決否認，說只生過一個孩子，孩子的父親是毛主席。在談話中，她總是把女兒李訥與我相比，說我們倆幾乎是同歲，都是受過訓練的歷史學者，都顯得過份理性。「李訥曾被送到鄉下，那對她有好處。」江青補充說，眼睛灼灼閃光。

她把李訥和李敏一起撫養的事實，也體現在給她們取的名字上。她把自己原來的姓，「李」[32]給了她們，名字的含義則截然相反，源於古語「君子應納於言而敏於行」。「納」指的是「納於言」，而「敏」指的是「敏於行」。但在現實中，納和敏的對比沒有發揮作用。在學校中，她自己孩子的各門功課都得了5分，但後來由於學習太努力而行為變得遲鈍了。儘管通過政治鍛煉，李訥也不是必然地「納於言」。至於李敏，她沒有變得「敏於行」，江青沒有詳細闡明這一點。

毛澤東最小的弟弟毛澤民死後（1943年在新疆被國民黨的擁護者殺害），他的兒子毛遠新請求加入毛澤東的家庭。他們自然對他非常歡迎，最終他們成了非常親密的一家人。儘管人們猜想他會稱江青為嬸嬸，其實他卻稱江青為母親。這個有天賦的孩子長成了一個典型的知識份子，在文革期間必須同大家一起去接受鍛煉。

她的女兒李訥也同樣如此。從孩童時代起，她就埋首於歷史中，成為一名眼界狹窄的知識份子。在1960年代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江青把她派到了廣大人民生活的農村，只有在那裏才能加深對社會現實的理解。這樣，李訥成為數以萬計長途跋涉到農村的城市學生和知識份子隊伍中的一員。她在那裏待了幾年，

32 江青把自己的姓氏給了生女和養女，反映出中國性別平等的一個進步，即打破以父姓命名的慣例，也能用母姓命名。

參加社會主義教育活動。返回北京後，她結婚並生了一個孩子。「我當外祖母了」，江青驕傲地大聲說道。她補充說，她的繼女李敏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結婚後生了2個孩子。

6

在抗日戰爭和國內戰爭背景下，這些個人悲劇顯得微不足道。戰略形勢的不斷變化佔據了毛澤東大部份的注意力。1939年，在胡宗南指揮下的國民黨軍隊（因抵抗日本、保衛上海而著名）開始封鎖共產黨邊區。這次行動使邊區與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貿易和交通被阻隔了5年。在邊區導致急劇的通貨膨脹：糧食價格飛升，棉花和布匹等主要進口貨物突然停止供應了。當時，食鹽出口佔邊區貿易收入的90%以上，而食鹽出口也變得不可能了，約50萬紅軍的武器來源也斷絕了。增加農民稅負（數世紀以來，地主和軍閥的最後手段）將不可避免地使他們不再擁護共產黨。為了扭轉這一歷史性的危機，共產黨領導人採取一種激進的創業精神。毛澤東是一個天才的冒險家，他把「自力更生，自給自足」作為動員口號，命令士兵從事農業生產。在環繞延安的古城牆上，他用木炭寫下：

「自力更生，豐衣足食」

「發展經濟，保障供給!」

「通過自給自足，我們將在西北建立一個繁榮的邊區。!」

「一手拿鋤頭，一手扛步槍，實現生產自救，保護黨中央。」

即使今天，黨到達那裏已超過35年了，延安仍是一個落後地區，江青承認。但錯誤是「我們的」，她容忍領導人「在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他們近幾年的注意力因國際責任而偏移了。西北的自然環境也提出幾乎不可超越的挑戰：陡坡、深溝和傾斜的田地。這一切使增加生產幾乎成為不可能。開墾新土地和改善耕地

的工程是長期任務。領導因素也要對延安的落後負部份責任，一些領導人不是為人民利益工作。

毛澤東在西北地區生活時（我們從其他地方得到的信息），發起了一些最有野心的墾荒工程。1939年冬，他命令年青的指揮官王震和第359旅的一萬名官兵在南泥灣（位於延安西南約30英里的一塊荒地）貧瘠的山頭上和山谷裏創業，白手起家，儲備糧食、製作衣服。接到指示後，他們拆除了廢寺廟裏的鐘、瓮和佛像，把它們熔化後做成犁，從飼養的羊群獲取羊毛，打新的窰洞建立居民區和學校。互助原則支配着生產和消費合作社的建立，首先在農業，然後是手工製作和小型工業。結果，除了士兵以外，所有本地的男女老少都投入了這場大生產運動中。儘管在荒野，文化仍然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在士兵演員的示範下，當地人被引導表演反映他們翻身生活的宣傳劇目。

儘管在軍事領導下的大眾墾荒工程看起來很革命，但毛澤東，一個歷史的學生，承認這只是一個新版的軍事殖民地，2000年來一直斷斷續續地强加於中國邊陲地區。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領導人定期從延安來到南泥灣，偶爾用詩文捕捉他們留下的印象。勇敢的鬥士朱德寫了《訪南泥灣》：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無宿營地，破窑亦難找，
今辟新市場，洞房滿山腰，
平川種嘉禾，屯田令告成，
戰士粗溫飽，農場牛羊肥，馬蘭造紙俏。

並不是所有的南泥灣印象都是質樸宜人的。江青去那裏，不是作為領導人視察，而是作為領導人新婚妻子去工作。她是1939年1月到那裏的，大約是工程的起始階段，在那裏停留了6個月。她

告訴我，除了大部份領導同志外，沒有人知道她那次行動的職責（難道是毛澤東和某些領導同志在考驗她，希望向有懷疑的人和反對的人證明一個城市姑娘的忍受力嗎？）。她說，1939年日本對西北根據地發動攻擊後，國民黨派出10萬軍隊，在胡宗南指揮下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國民黨不僅試圖通過圍剿的老戰略從軍事上消滅共產黨，而且進行經濟封鎖，切斷周邊地區對八路軍的供給。正當他們努力在陝甘寧根據地進行經濟建設的時候，國民黨則竭力把他們全餓死。（說到此地，她憤怒地提高了聲音。）

主席送別她們一組人離開延安時說，如果不能生產出糧食和衣服，她們將會死在荒野中。在這種威脅下，她們出發了。在扎營時，江青的手起了水泡，因為以前從未做過體力活。她繼續說，參加墾荒和大生產運動的婦女幾乎沒有受到任何優待。例如，在月經期間可以有兩天脫離日常勞動，但仍期望她們能做洗衣等較輕的家務勞動。她總是拒絕對婦女的這些照顧。一些婦女喜歡從事較輕的活計，因為她們不願意象男人一樣被迫去幹重活。在當時，她們認為做男人的工作是「二等」。

當時她正遭受肺結核的折磨，因此沒有做緊張的紡紗工作。大部份時間在做編織（通常是西北的男人和359旅士兵的任務）。儘管她從不會做開始，但在那裏一共編織了10件毛衣，全都交給了集體。山區天氣總是很冷，毛衣非常重要。在那裏的6個月，她一直穿着厚厚的棉大衣。她和同志們從山區回到延安，又重新進入夏天，重新穿上單衣的感覺真好。回想起在南泥灣的經歷，她坦承別人工作得比她好得多，還補充說事實上她在那裏的成績一點不算什麼。

一回到楊家坪，和毛澤東一起居住的位於延安附近一個小山上的窑洞裏，她又開始了文化工作，這更合乎她的興趣。在那些年裏，她對領導層沒有什麼影響，遠沒有像她最終所達到的呼風喚雨的程度。

7

延安的大眾文化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們統治着舞台。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

——毛澤東〈『逼上梁山』觀後感〉，延安，1944年

江青如何讓人們了解她的延安歲月？幾乎沒有中國人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敢發表領導人妻子的意見。據我所知，毛澤東從未做過這樣的安排。只是在文革期間，她得到權力後，某些紅衛兵組織才出版吹捧她政治歷史的概覽。關於江青的印象，比較公正的報導大多來自外國來訪者。這些訪問始於延安時代，大部份來訪者是記者或外交官。自然，所有人都渴望與當權的那個人談話。他們的敘述只是粗略地提及他的妻子，說她舒適地生活在政治外圍。沒有人預見到這個20多歲的漂亮女人在中年時會成為政治强人。

每個外國人都以自己的文化背景來描述眼中的江青。埃德加·斯諾來自西北的報告指出，毛澤東從來不强迫自己的妻子會見來訪者。因此，斯諾對江青和賀子珍只是匆匆一瞥的印象。儘管這樣，後來斯諾在1968年修訂版《紅星照耀中國》的傳記體筆記中概述了江青的背景，其中一些選自未曾被透露過的資料，與江青現時的説法相矛盾。他與她在延安簡短的會面，估計是在她與毛

澤東結婚後的幾個月。在這個美國人眼裏，她是一個身材修長且吸引人的年青女人，會打一手好橋牌，還是一個優秀的廚師。

一個對江青更大膽的描述來自那個叫羅曼．卡曼的電影攝影師，他3次獲得斯大林獎。1938年，斯大林派他到中國拍一部關於革命英雄和抗日戰爭的電影紀錄片。幾個月的輾轉，他越過國民黨控制區，於1939年5月中旬到達延安。在那裏，他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收集關於革命的生動鏡頭，尤其在「魯藝」周圍。5月25日，在去和毛澤東會面的路上，他第一次見到江青。顯然，她迷住了他那藝術家的眼睛。在我們的會談中，她把卡曼描述成斯大林的攝影師，親切地提到他。他為她拍攝了各種不同場合的照片，尤其喜歡在馬背上的那張。他的照片冊提醒我們對一個中國婦女來說，騎馬是何等罕見（儘管江青沒有提到這一切），在當時馬匹稀缺的西北地區，分到一匹馬是革命骨幹份子的特權。（當她把這張照片給我時，她說，1939年在延安，卡曼把這張照片與其他照片一起送給了她。當她讓新華社為我準備一張彩色的複製品時，也決定給鄧大姐（鄧穎超）一張。）

卡曼拍的照片上，她穿着華麗的衣服，頭髮梳成辮子，看起來更像一個斯拉夫人。他寫道：

> 在我們去見毛澤東的路上，騎着馬通過這個城市。為幾千個從全國各地來到延安的姑娘和婦女新建的女子政治大學高高地站立在一個位於魯迅藝術學院和抗日軍政大學背後的小山上，我們兩次穿過小溪。
>
> 第二次過河後，一個全速疾跑的騎馬者追上了我們。幾乎和我們一起，她在馬背上勒住馬，用一個很誇張的手勢愉快地歡迎我們。她就是毛澤東的妻子。像多達數千計的中國男女一樣，她也是早幾年來到這個特殊地區在政治大學學習的。她離開了上海，在那裏曾是一個著名演員。現在，她是一個年青的共產黨員，執行着偉大且光榮的工作——擔任毛澤東的私人秘書。她為他準備日記，記錄他的

講話，複製文件和照看各種事情。她剛從一個遙遠的地方回來，在那裏，她繼續為毛澤東執行任務。馬在騰躍，她安穩地坐在那匹生氣勃勃的小馬背上。兩條絲帶編織物束在頭後。她穿着一個被俘日本軍官的軍用厚大衣，光腳穿着木質涼鞋。

「我要告訴毛，你來啦，」她說，突然掉轉馬頭，向前奔去。她的手臂向後搖着，身體微微前傾，一陣小跑後，消失在一團團塵霧中。

另外一名蘇聯記者，彼得．伏拉底米洛夫，在1942年至1945年期間一直生活在延安。儘管他的有爭議的日記在約30年後，中蘇關係惡化時才出版（顯然是在江青當政時）。1942年，在他的描述中，江青是一個身材削瘦，舉止優雅，一雙烏黑的眼睛閃着聰慧的光芒，站在她健壯結實的丈夫身邊，看起來是那麼的嬌小、柔弱。「她品質中最突出的特點是極其果斷。」就在同年，伏拉底米洛夫後來又寫道：「她從不意氣用事，對自己也毫不留情，在她的心中，事業才是最重要的，儘管她還很年輕，但已經在匆匆忙忙地為實現她的最終目標而努力了。」第二年的2月，他又在日記中寫道：「江青不僅是毛澤東的私人秘書，而且已經掌管了毛澤東所有的秘密聯繫。」 江青的親密朋友和知己是康生。康生高度地評價她的婚姻，正是由於這場婚姻才使其有了接近主席的條件。在伏拉底米洛夫的描寫中，毛澤東對於西方經典著作了解很少，對於任何非中國的東西都嗤之以鼻。他只閱讀古代的百科詞典、古代的哲學論著和古典小說。與之相比，江青在西方著作方面涉獵要廣得多，尤其是在外國文學方面。在解決那些變化最大的問題方面，江青能非常巧妙得體地為丈夫提供幫助，這絲毫無礙於他們的家庭生活。她對事情擅於研究，有野心。但是，她非常巧妙地把這些個性掩蓋了起來。她把自己的個人興趣淩架於任何事情之上。

1944年，美國《紐約時報》的通訊記者蒂爾曼．德丁與江青

會面，和其他人一樣，他注意到當時江青的光芒被籠罩在更多地位較高的女士之下，其中最著名的有：李富春的妻子蔡暢、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這些女士不僅在地位上高於江青，而且在與大眾的關係方面也要好過江青，這一點是江青非常痛苦意識到的事實，可是，德丁在她身上能找到傑出的中國美女的品質。儘管江青在衣着上與普通大眾一樣，可是衣服的剪裁和材料卻顯然要好得多。她的頭髮是蘇聯式短髮，這種髮型已經在西北的革命女領導人中非常流行，使她顯得比較漂亮，30年後，大多數婦女都梳着同樣的髮型。當時，在陪同外國人時，她還抽煙，她也是一個美國舞蹈音樂迷。一個與她跳過舞的美國人發現她會說英語「不是不可能的」。

在德丁的報告中說，在江青嫁給毛澤東後，感染上了肺結核，直到1944年，疾病對她造成的影響仍然存在。但是，體弱多病的身體並沒有阻止她在「魯藝」繼續教授戲劇藝術，她還導演了一出鼓勵大眾抗日的宣傳劇目。

另一個優秀的美國記者哈里遜·富爾曼1944年曾與毛澤東和江青同時會面。他對於江青個人歷史的評論（可能就是來自於那次會面）與江青1972年的報告相吻合。在評論中他寫道：

> 我在一個小院子的門口與毛澤東相見，在這個小院子的對面是6個普通的窰洞，他與家人和警衛都住在這些窰洞裏。他那個年青漂亮的妻子——以前的藍萍，上海著名的電影演員，一個極其聰明的女人，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與他在一起。1937年，江青放棄她的電影生涯，來到延安魯迅藝術學校工作。在延安，由於毛澤東對戲劇的興趣使他們走到了一起，1939年春天，他們悄悄地結了婚。
>
> 他們兩個衣着樸素。江青的纖腰上系着一根如睡衣帶子一樣的東西，毛澤東穿着一條粗布短褲。富爾曼被領到一個「客廳」內，這間客廳實際上也是一間窰洞，窰洞的地面用磚進行了簡單的裝修，

牆上刷成了白色，幾件粗笨的傢具。已是傍晚時分，屋裏點着一支蠟燭，蠟燭固定在一個頂端朝上的蓋子上。他們提供了一些淡茶、當地製作的餅乾和糖果、香煙招待我。在我們談話時，不時有小孩子在窰洞中進進出出。他們總是會停下來，瞪我幾眼，然後抓一塊糖果跑出去。毛澤東對他們毫不在意。

巴大維和謝偉思，美國觀察組（迪克西代表團）的兩名成員，對江青有相似的印象，他們都認為她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女人。巴大維上校記得毛澤東在一次軍事演習中對江青的介紹：「巴大維上校，這是江青。」本以為看到的是一個肺病患者，可令巴大維上校吃驚的是，江青的健康狀況看起來相當好。她的舉手投足帶有一個女演員應有的所有優雅。她的普通話如大多數女演員一樣，講得非常好。在巴大維上校的記憶裏，江青看起來比大多數共產黨領導人的妻子要漂亮優雅得多。

謝維思進一步證實了一個普遍現象：作為婦女領袖，鄧穎超和康克清要比江青的地位重要得多。江青只偶爾地出席星期六晚上的舞會，但在一些重要的場合，如歡迎美國觀察組或不斷到延安拜訪的客人的宴會上，江青都不參加。在謝維思的記憶中，曾有一次，他與毛澤東、江青及他們的翻譯一起吃晚餐。在進餐過程中，毛澤東主導着整個談話，江青幾乎沒有參與。她是相當的年輕（在整個以中年人為主流的延安社會中），不是美人，但很迷人。謝維思在延安的整個停留期間，沒有聽到關於賀子珍或江青破壞其婚姻的流言蜚語。在中國延安，婚姻關係被認為是個人私事。

1945年，羅伯特·佩恩拜訪了毛譯東。當時毛澤東52歲。據羅伯特的回憶，江青走了進來，穿着一條家常褲和一件毛衣，用正宗的北京口音說「你好」。一下子，你會感到她那長型的臉龐比蔣介石的太太更美麗，表情更豐富。同時，她的身上還帶着在山地採集的野花的香味。

對於毛澤東妻子的印象這麼多。在江青自己對這些年的回憶裏，她不斷朝着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的感覺努力，這彌補了其他人對她的貶低。在那些年與毛澤東一起出現的畫面中，江青如何選擇自己的記憶呢？在那裏，美麗和純潔掩飾了正在浮現的現實：此後30年裏，他們上升到控制10億中國人物質和文化生活的權力地位上。在那裏，他們也給出了兩人同等露面的少有的機會。在訪延安的外國人眼中，1940年代，毛澤東的革命人格顯示出是一個生動活潑的中心人物。他在1938年被艾德加·斯諾通過《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的出版而推向了世界。他和其他人關於自然、理想主義和革命熱情的具體化，帶走了抽象馬克思主義的冷漠，減輕了人們產生於蘇聯嚴厲實踐的恐懼。

1

1947年，國民黨把紅軍趕出了根據地，並把延安炸成了一片瓦礫。1950年代初，共產黨政權穩固地建立起來後，延安被重建成黨的聖地。在延安博物館裏陳列着從長征到奪取政權的紀念物。最重要的是，重建延安意味着激起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1972年8月初，見到江青前，我花 4 天時間參觀了延安，想看一下它喚起了過去的什麼東西。像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和稀疏的外國人一樣，在這個貧瘠地區簡樸建築裏的展覽會上，熟練地擔任嚮導的紅衛兵把我搞糊塗了。我曾花費多年閱讀關於那些戰爭年代領袖人物的事迹，卻被眼前這種不平衡所震驚：放大的毛澤東像使朱德、周恩來、羅瑞卿和其他優秀戰略家的像變得矮小。不過，看到劉少奇和林彪（曾被指定為毛澤東接班人，但後來失去了信任）的像被徹底拿走了，倒不是太吃驚。江青的一張模糊照片（肯定會被大部份觀看者認為是一個年輕的男士兵）出現在毛澤東後面，毛澤東騎坐在他那匹著名的白馬上。

離開這座白灰粉飾的博物館，我坐車穿過耀眼的太陽和路邊火紅的塵土到達毛澤東居住的一排窰洞裏。在這些簡單的居住場所，當然作為聖地比過去更多了質樸，毛澤東給人的是一個完全知性的印象。在作為紅軍和共產產黨領導人的第二個10年間，他從許多軍事事務中擺脱出來，開始對過去的成敗進行理論分析。年青的嚮導根據毛澤東創作文章的數目來説明他們領袖的重要價值。從他們流暢的話語中，我了解到收錄在《毛澤東選集》裏的150篇文章，有120篇是他在西北的13年間創作的，其中92篇是在他居住的延安窰洞裏寫成的。

在楊家坪的窰洞裏，他性格中謙虛的一面顯現了出來，這一面也將被人們仿效。在山腳下，我看到了他喜歡在連續寫作幾小時或幾天後進行勞動的勝利花園。種植自己的蔬菜和西紅柿可以保持與泥土接觸，現在他的小塊地皮仍被耕種着。我嚐到了太陽曬得熟透的西紅柿——非常漂亮的西紅柿。

從一套窰洞到另外一套，它們擁有同樣的建築格式：兩個房間，一個作為臥室和洗澡間，另一個作為書房和餐廳。在一種情况下，第三個用來招待客人和召開中央委員會議。在毛澤東寫作的那個房間裏，我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那張沒有裝飾的桌子，曾經安放他手稿的地方和旁邊的毛筆墨水。一個用過的馬口鐵茶杯（不是原來的那個）放在桌子一邊。當主席有時間的時候，他精力旺盛地連續無數個夜晚不間斷地寫作，忘記了吃飯和睡覺。這種官方塑造的人物形象（在別的國家裏被稱為「哲學王」）被整個延安的導遊重複着。

在與導遊的談話中，他們告訴我許多主席的知識成就。但是，難道他沒有妻子嗎？他的妻子不是江青嗎？當主席沉湎於革命規劃中時，她是怎樣度過這一長段時間的？當然，他們的孩子不可能繞着這個小院子跑，他們在那兒？

這些是很簡單的問題，一個中國朝聖者鮮有可能提出的問

題，但我得到的答案是規避和微笑，或者說「我們不知道」（無疑，年青人是真的不知道），但信息是清清楚楚的。在中國官方記載的歷史中，也僅有國家大事，毛主席不是作為一個丈夫或一個家庭中的男人。江青的角色，不論是婚姻上，還是政治上的，都沒有被公開討論過。

在我們隨後的會談中，對她來說，再現延安歲月是零零碎碎的而且在情感上是痛苦的。在她眼中，毛澤東政治地位的確立是斷斷續續、令人鬱悶、具有諷刺意味和理想色彩的，且運用了一定的策略。他真得經歷了長期沉默思考和理論研究以及在人群中徘徊的時期。無論他轉向哪裏，都受到競爭對手及他們的共同敵人——王明的威脅。在1930年代後期，王明和毛澤東仍處於鬥爭中，他們各自通過自己的方式來取悅革命領袖——斯大林。他們就像兄弟倆一樣互相競爭，向斯大林展示自己作為革命領導人的正確和傑出。

對江青來說，王明對其造成的威脅來自另一個方向。她在上海的那段時期，王明不在那兒，但他的權威仍在。他通過莫斯科的辦公室對地下黨組織進行遙控。為了能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她別無選擇，只有接受他的政策，即後來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綫。另外，她受到那些掌控上海地下黨日常活動人員的阻撓，其中包括周揚和張庚。作為延安以及後來北京的領導人，他們不斷阻撓她接近群眾。

如果不是她到達延安並嫁給了毛澤東，作為個人，她也不會認識王明。人們已能看出，這兩個人有各自的革命路綫。王明的是蘇聯道路，即以城市為導向，暫時依靠對手以及資產階級的幫助。毛澤東的是本地化道路，即首先發動農民大眾推翻地主，然後佔領城市。斯大林在觀望嗎？他看到了嗎？難道毛澤東邀請斯大林的官方攝影師卡門製作的一部系統化的農村革命的紀錄影片，不是一次為了贏得支持而做的努力嗎？難道他妻子在紅塵中

馳騁不是一個吸引人的短片嗎？

為了說明毛澤東和王明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區別，江青作了一系列書面陳述。所有這些陳述在這裏不再重複，因為真相一定會存在其中。在她眼中，最具爭議的事是土地改革和統一陣綫政策。在中央蘇區的時候，毛主席已開始規劃土地改革藍圖。1934年1月23日，毛澤東寫文章提出，為了提高農業生產力，廣大民眾需要進行土地改造工程。那年夏天和秋天，他對重新組織人力的問題進行了深思熟慮，提出了互助組方案。

儘管缺少文獻資料證明，她仍聲稱：「王明從莫斯科回來前，在共產國際提出正式抗議，反對毛澤東提倡的土地政策。」後來的抗日戰爭（它使毛澤東和王明之間產生了更多分歧）使王明以取消階級鬥爭為代價，全力經營與國民黨的統一陣綫。（她沒有提到王明曾煽動武漢的無產階級起義）1935年10月，紅軍長征結束，儘管當時的勝利是由毛澤東領導的軍隊取得的，但高層的分歧仍沒有消除。1935年12月25日，在瓦窰堡召開的領導會議上，傳達了在莫斯科的王明觀點。在那裏，第七次共產國際大會已在仲夏舉行。代表來自莫斯科的權威，王明在每一個關鍵問題上與毛澤東相對立。在敍述這些紛爭時，她的臉色非常陰暗。

但在她的心中，個人矛盾以及王明煩人地出現在領導層，比路綫爭論更印象深刻。「幾年前，王明已經失去了同志們的信任，」她堅持說，「但只要有可能，主席做得非常寬宏大量，在危急關頭去挽救他。例如，在1945年的第七次黨代會上（這次會議就在她家附近的楊家坪召開），沒有一個代表願意選舉王明進中央委員會。還是主席說服他們，王明才當選。到1969年召開的第九次黨代會時（當時江青加入政治局，正在制定方針），無可辯駁的證據已證明王明是一個黨和民族的叛徒。他不僅沒有機會重新當選中央委員，而且被開除黨籍。後來，他到蘇聯避難，他曾在那裏度過了大部份的青年時代。現在，王明已經是一個老

人了，但仍頑固堅持原來的方針政策。」她說道，（他死於1974年）「自從回到莫斯科，他每隔兩、三天就給報刊編輯寫信，詆毀我們的政權，但人們置之不理。」

「王明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人，由於同樣的原因，儘管安娜·路易斯特朗是一個美國人，但她比王明更像一個中國人，」她說。

2

繼續土地改革的主題，她對此已在西北做過粗略的觀察。她在交談中說：「1943年10月1日，毛主席起草了一篇文章，號召根據地開展減租運動，增加生產，支持政府，熱愛人民。」他在文中詳細闡述了1934年曾寫過的一些觀點，尤其是建立互助組（在陝北被稱為變工隊）。這些互助組將被發展成合作社，服務於廣大民眾，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組建。這種有組織的勞動交換，以及使農民成為兼職或全職工人，在戰爭時期是勢在必行的。當時，農業生產和軍事防禦必須兼顧。

1940年代的經濟形勢體現了新民主主義經濟。通過互助組和變工隊的形式組織合作化，後者是互助組的一個變異形式。不管貼什麼樣的標籤，它們都包含了兼職和全職的工作。只要有可能，一起居住，一起工作，一起吃飯，只要是自願加入就好。除了這些農業合作，也安排了其他的合作，如市場和信貸合作、運輸合作和手工生產的家庭合作。

為了讓我理解1940年代的那個時期，江青推薦了主席的幾篇文章，包括《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組織起來！》（1943年11月）、《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說明只要共產黨在統一陣綫內的獨立性和主動性得到保證，就能使統一陣綫發揮最大的優勢。她也強調統一陣綫問題是如何反映兩條路綫（毛澤東的本地化路綫與王明的蘇聯路綫）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文

化各方面鬥爭的。

當周圍一些人開始打哈欠時，江青從柳條椅上站起來，大步走到房間另一邊的枱球桌旁。兩個警衛立刻拿着球桿過來，她拿起球桿，彎下腰，兩眼平視，解釋說如果不鍛煉，她的腿就會腫。幾分鐘的時間裏，屋內只有枱球撞擊發出的卡卡聲和她贏球後高興的尖叫聲。一邊玩遊戲，一邊斷斷續續地討論西北的經濟問題。在私人經濟和合作經濟之間總是存在着鬥爭。沒有組織，什麼都是空談，組織必須包含每一種生產要素：牲畜、種子和勞動力。

3

從歷史觀點來看，如果創立無產階級藝術（毛澤東曾在延安搖搖欲墜的禮堂裏對此進行了不確切的闡明）的規則被逐字逐句遵循，25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就不會涉及如此廣泛的領域。這個判斷在馬克思主義者所倡導的上層建築——教育、文學和藝術——尤其真實。創立整個無產階級文化的初步成功從一開始就存在結構性弱點。儘管毛澤東和江青都沒有公開承認這一點，但他們從來沒有徹底說服文化領域內（尤其是文學和表演藝術方面）的那些主要領導人。極權主義政治權威與創新獨立之間的鬥爭是不可調和、普遍存在的。然而，為了提供兩條路綫（毛澤東的正確路綫和其對手的錯誤路綫）鬥爭的證據，不能解決的矛盾被過份簡單化了。在1930年代和40年代，兩條路綫以毛澤東和王明為代表，在60年代則以毛澤東和劉少奇為代表。

毛主席、共產黨和人民是牢固地結合在一起，這種公開的宣傳已有很長的歷史，似乎已經使帶有不確定性的海洋平靜了下來。然而，如果這艘船是安全的，那麼為什麼毛澤東——我們偉大的舵手——每數月或數年都會誇張地改變他的行動方針呢？為了保持在延安的優勢地位，毛澤東必須向他的同志和民眾證明：

那些在知性上背離他的人，同樣是對他個人不忠誠的人。一些
對者被公開挑選出來，冠以陰謀家、右派份子或王明追隨者的
名，但罪名不是非常清楚。當然，許多反對者只是獨立的馬克
主義作家或藝術家。

為了迎合毛的熱情，1940年代，在思想改造會上進行了詳
的調查。總而言之，思想改造成為可能是革命最深刻、最痛苦
經歷。這是毛澤東說服那些愚昧者、懷疑者或反動份子（大部
是知識份子）接受其世界觀和政策的方式。

思想改造的對象不能簡單地默認或保持沉默。成功的思想
造體現在被改造對象變成了公開的擁護者，並繼續鼓動周圍的
士。思想改造就是為了反對外來者而進行的洗腦。

毛澤東的思想改造方法具有民族性背景。為了向人們傳達
的革命信息，他使用人民的語言，宣稱治病救人。通過再教育
心理治療方式對持不同政見者和其他人士進行思想改造，與斯
林的做法截然不同，後者以殘暴著稱。斯大林的處理方式帶有
皇傳統，而毛澤東則是根植於中國歷史。如同孔子說的「孺子
教」，毛澤東認為任何人的政治信仰或思想都可以改造。毛澤
和共產黨的經驗與宗教皈依沒有不同，即說服人放棄畢生的信
和行為模式，去接受新的，尤其是無產階級鬥爭必需的信仰。
少奇的心理學論文（最著名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939年
版）是皈依過程的經典，被認為對繼續革命非常重要。

在中國，很少有新聞記者、小說家或劇作家的文字寫到思想
造，官方記錄中也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東西。也許是革命實驗時期
痛苦仍在眼前，實際上還在經歷着，而不能有公平的評價。表現
理創傷和重構，對於一個劇作家是不能容忍的，他被迫以心智健
或生命為代價，以革命的名義，去接受完全不同的階級任務。

思想改造是1942年至1944年間整風運動的基礎，整風運
被系統地運用於延安乃至周邊地區的政治、軍事、教育和文化

域。解放後，淨化階級觀念的相同方法經常得到運用。

對藝術家的整頓在「魯藝」展開。這裏是一個瀰漫着個人憎惡和文化衝突（這實在太微妙，難以用兩條路綫鬥爭來解釋）。的革命文化中心。學院的同名人——魯迅所代表的，在那個流亡藝術家殖民地實際發生的，以及兩者之間不同的，還在被未來的歷史學家研究。一些魯迅最傑出的追隨者，包括女作家丁玲和小說家蕭軍被任命為學院的員工。但他們最終被成為偶像的魯迅和清一色的藝術標準摧毀了。當周揚（一個魯迅看不起的文化代表）緊隨江青到達延安後，他在上海地下黨和文化戰綫組織中的立功記錄得到毛澤東的獎賞，被任命為邊區的教育主管，不久又被任命為「魯藝」的院長。

在周揚的管理下，學院組建了4個系：文學、戲劇、美術和音樂，還有一個作家工作室、一個研究中心和一個民間工藝製作室。戲劇系和音樂系是最大最重要的，因為表演藝術被民眾接受的潛力最大。江青擔任講師的戲劇系主任是誰？除了張庚沒有別人。在上海的那些年，他曾是她的上級和反對者。他提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方法，這個學派後來由於存在鼓動自私自利和個人自主的想像，會危害社會主義集體主義而遭到批判。他還繼續演出了大部頭的外國劇目，其中包括果戈里的《婚姻》。這是一部資產階級劇目，能娛樂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但會讓當地鄉下人感到莫名其妙。他們在共產黨領導下已具有無產階級新的自豪感。另一方面，張庚、馬可和其他一些有經驗的戲劇家是文化革命的先驅。他們組織了農村劇團，開創了地方民間文化的模式。秧歌，一個古代的民族舞蹈和西北地區慶豐收的儀式，被當作解放舞蹈。地方歌劇被注入了新鮮的政治內容，主要作品有《兄妹開荒》和《白毛女》。它們都是充滿痛苦並突出當代生活中湧現的英雄人物的戲劇。20年後，江青把《白毛女》重新改編，作為她的樣板戲的中心劇目。

由於延安建築物和所有的材料都很稀缺，因此老的建築物常被賦予新的用途。「魯藝」就是在一個廢棄的天主教堂裏，離縣城中心約 3 里。教堂的主體部份被用作禮堂，這裏是綜合古今中外藝術的粗腔橫調的舞台。在每個普通日子裏，一個大提琴獨奏者或許在禮堂的某個角落揮動着手臂演奏，而在另一個角落裏，一個小型管弦樂隊演奏出貌似外國音樂的曲調，在其他地方也許流出在老調上添加了政治抒情詩的地方歌手的旋律。

曾被基督徒佔用的這些地方，現在由音樂和戲劇的革命學生使用。他們中的一些人仿效波西米亞，穿着摹仿故事書中俄國農民的浪漫服裝，遠離軍事。這些學生大部份都是從當地平民中招來的年青人。經過兩年培訓後，他們被送到前綫去，表演即席音樂和戲劇小品來振奮紅軍和當地人民的鬥志。

在藝術家、作家、音樂家、戲劇家和新聞記者中間，學院資深員工的辯論是每天的工作。在對一次由外來的城市知識份子控制的會議進行觀察後，美國記者哈里森·福爾曼明白了為什麼毛澤東被迫對他們趾高氣揚的表現進行攻擊。

這些藝術家、作家、音樂家、戲劇家和新聞記者大都來自上海。抗戰爆發前，上海是中國的文化中心。然而，上海西洋化、高度成熟的藝術和文學與中國貧瘠地區的農民傳説之間的距離，就如同詹姆士·喬伊斯對中國孔子的距離一樣。在戰爭條件下，這些文人離開了上海，就如同魚兒離開了水一樣。對他們來説，不可能看得起這些無知的農民、工人和士兵。這些人通過拒絕接受他們來進行反擊。沒有公眾，他們為自己書寫、繪畫和演奏，忽視了低於他們文化和知識水平的普通人民。如果農民未能欣賞好的文學和藝術，那就是他的不幸。藝術對大眾的交流不會貶低自身。

被一些來訪的美國人稱為「周六舞會」的領導人非正式聚會在梨園舉行。共產黨員逗趣地把他們自己同前朝的皇帝對比。這兒

曾是唐明皇的秘密宮廷劇院，因此被稱為梨園。在解放區，有一個女孩在選擇舞伴方面顯示出個人的解放，毛澤東也不是不可以邀請的。她轉向主席，尊敬地邀請道：「主席，請您跳個舞。」

有的音樂是從一個破舊的留聲機沙沙的唱片裏機械地發出的聲音，有的是現場演奏，管弦樂結合中國的二胡、外國的小提琴、口琴、廣東齊扁琴、鋸琴和傳教士留下的管風琴。用什麼音樂作為舞曲的想法甚至更加隨意。演奏法國人的米奴哀小步舞曲、維也納人的華爾茲舞曲、門鈴曲和美國人的即興曲來向外國客人表示敬意，通常還夾有傳統的中國民族曲調。在這多種多樣的音樂中，他們跳狐步舞、華爾茲和複雜的秧歌舞。

「在樸素的共產主義狀態下，領導人在音樂中與民眾混在一起。西方社交舞中必要的肢體接觸沒有被禁止。」福爾曼回憶道。

在某一早上，你或許會看到長着濃密頭髮、穿着長袖襯衣的毛澤東——這個在共產黨保護下9000萬人民敬愛的領袖——在與一個延安大學的可愛女學生跳快一步舞，而卡車司機可能會是活躍的豐滿的朱德夫人。矮胖的朱德，這個擔任超過50萬抗日軍隊的總司令，看起來像一個慈祥的老牛仔的樣子，在與一個身材只有他一半、年齡只有他三分之一的年青人跳舞。常勝將軍林彪、聶榮臻、葉劍英和12個其他人（他們每個人都是日本人願意犧牲一整師的優良軍隊去抓到的人）像狂舞的大學生一樣飛來飛去。

毛澤東，這個正與那些走過歷史記錄（他當時正在策劃的）的人們一起狂歡的人，也從一個階段轉向另一個階段，即從年青的革命積極份子的領袖到成熟的戰略家和政治理論家。儘管他的身體已不像長征時那麼瘦弱，但仍保持一種有別於他人的浪漫特徵，即一頭長髮。當他在最珍愛的角色（即教師）的領域中活動時，黨報《解放日報》把他推到了個人崇拜（幾年來有增有減）的第一個階段。1941年12月14日，他的同志蕭三頌揚他為「我們傑出的偉大領袖、我們的導師和大救星」，這些話將成為標準的

誇張用法。

當毛澤東對這些原則（依照這些原則，他在10年內搜羅了一群經過訓練的崇拜者）進行深思熟慮後，他的寫作主題變成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應用於中國的實踐，即尋求「民族形式」。那次尋求延伸到了文化領域。1942年5月，在「魯藝」引起了劇烈的爭論。對於這些激烈論戰，僅有的官方記錄是主席稱之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不着邊際的報告。其中有多少是針對當時爭論的反應，而不僅僅是駁斥個人；有多少是對共產主義作家瞿秋白觀點的剽竊？這些都沒有得到確定。

4

在江青眼中，1970年代的延安情況仍不如人意。儘管比她和主席在那裏生活時要好得多。甚至在那時候，周揚就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批評家。儘管他們努力在延安建設一個平等社會，但他通過文章虛構一個不公平的等級制度來詆毀他們的成績。他描述說，人們被分成三個等級，九個階級。當然，這意味着人們沒有從過去的等級中逃離出來。

為了證明自己的論點，江青從文件夾中拿出一個細長形的卷宗，沒有標題，曾在有限範圍內發行。她一邊翻動着紙頁，一邊說：「這些文章最早出現在1941年，1958年反右運動時重新印製，純粹都是造謠」。1941年，周揚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有「太陽也有黑子」之類的話語（當時在延安，毛澤東已被比作太陽）。1942年3月，王實味發表了「野百合」系列文章，寫道「野百合——延安最美麗的野花——是從一種嚐起來味道很苦的球莖中生長起來的。」借用植物暗喻，間接抨擊領導人中間存在官僚作風和腐敗（這些傳統錯誤，他們認為已被克服了）。同時，丁玲發表了一篇三八婦女節有感的文章，是對當時延安共產主義政府

下婦女地位的嚴厲批評。江青說：「讀了這些文章，你就能理解，為什麼主席必須從他們那裏奪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主導權。」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及其他場合的辯論，點燃了各個角落的火種。」江青氣憤地說：中央機關和青年團都有人貼出一個牆報，叫《輕騎隊》不斷對共產黨、軍隊和人民進行詆毀。這些對主席以及高層最親密戰友的責難，是舉行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提。

在對自己樸素生活方式的强烈辯護中，她說第一次到上海時，住在一個閣樓裏，在延安一直住窰洞。她和主席吃穿都同勞動人民一樣，但仍有人誹謗她奉行反革命份子的奢華作風。

在學院正規化的幾年間，大部份講師都和江青一樣，其中包括專業戲劇家、作家和音樂家，具有建立在以前經驗上不可動搖的自信。他們要適應這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的環境，過程很長很慢。戲劇家馬可回憶起當時的文學家如何浪費數小時時間來爭論希臘羅馬名著以及令人羡慕的19世紀歐洲文學。一些經過外國戲劇訓練的女演員像着魔一樣迷上了安娜．卡列尼娜的角色。在她們的心中，最擔心的是自己的眼睫毛投影的長度。

江青最美好的回憶是「魯藝」的進步。1940年代，當她在戲劇系擔任講師時，學院管理者大力促進話劇（當時，話劇是最靈活、最有希望的劇種）取代舊的、以宮廷生活和士大夫為題材的戲劇套路。她提到的新劇目有《火燒飛機場》《松花江上》和《兄妹開荒》，全都是當代題材的。

在排練這些劇目時，主席第一次到了「魯藝」。她回憶起當時主席的到來是多麼令人高興。一定是引起了主席的好奇心，他開始了解學院的其他活動。為了熟悉現代文藝問題（過去這不是他的興趣中心），他發動學院員工舉行一次廣泛討論，在討論期間，闡明了後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的觀點。

「毛澤東在魯藝發表的充滿說服力的指示，在1942年5月著名

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公開了，」馬可回憶道。主席將乘車蒞臨學院的消息像閃電一樣傳播開去，春天的細雨淅淅瀝瀝，人們從窰洞中湧出來，拿着紙和墨水來到大禮堂。由於人太多，許多人坐在戶外操場上。周揚先作了介紹，主席站在人們面前，回顧了最近關於文藝問題的討論，然後提出了一個中心問題：文藝家服務的對象應該是誰？他開玩笑說：「你們的學院只是小魯藝，而解放區的生活和更廣泛地區的鬥爭才是大魯藝。小魯藝的成員不應該待在修道院裏，而應該走出去，到大魯藝去宣傳新文化。」主席的講話引起了激烈爭論，論戰持續了好幾天。在這段時間內，毛毛細雨變成了急風暴雨。

然而，誰能將這個顯而易見、且影響不斷增強的諷刺解釋清楚呢？儘管毛澤東設立「魯藝」來表示對魯迅的尊敬，但他的這些觀點是與作家魯迅對立的。例如，關於大眾文學的民族形式，毛澤東對魯迅的觀點——舊的封建形式不可能成功地注入新的政治內容——表示了含蓄的反對。他贊成周揚的論點，即大眾熟知的文化形式可以通過注入新思想（即共產主義宣傳和對毛澤東的讚頌）得到挽救。這樣，在支持反魯迅的周揚理念時，他對魯迅最親密的學生丁玲、胡風和王實味（他們經過勇敢的長途追尋到達延安）進行了攻擊。這次座談會後的20多年間，周揚（江青對他非常鄙視）在文化事務上一直堅定地作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直到文革開始被江青撤職。此時，她一邊狂熱鼓吹以魯迅為榜樣，一邊同樣狂熱地違背魯迅的意見，正在把新的無產階級思想注入到舊的文化形式——京劇中去。

江青出席了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她在訪談中說過。以什麼身份？毛澤東秘書的身份。到此為止，這個職位已代替了教書和導演的工作。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爭論，表面上圍繞文學和藝術問題，實際上也針對其他領域的各種問題。從辯論方式上，她能區別人們代表的是主席，還是主席的首要政敵——王明（他主

張源自蘇聯的正統理論，主席稱其為右傾機會主義路綫）。她再次重申：在文化領域內，王明機會主義路綫是通過國防文學口號體現的，這與1930年代魯迅的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南轅北轍的。主席採納了魯迅的無產階級口號，並作為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基礎。毛主席向學院派發起了進攻，並用談文藝的方式闡明觀點。他也用同樣的話語向受王明影響的許多聽眾講話，這些人對主席的敵意已波及到延安和整個邊區。[33]

她繼續說道，在她學習過的黨校和馬列研究院沒有任何主席著作，而只有28個布爾什維克的作品，其中王明佔了首要地位。主席能打破他們意識形態封鎖的唯一辦法，是繞過其他領導人，走到人民中去，到處演講他的思想，直接了當地指向他們感興趣的東西。只有直接與人民接觸，他才能擴大自己的追隨者隊伍。

回到座談會現場的話題，她說，會議又長又漫無邊際。許多人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滔滔不絕地發表長篇大論。主席等待轉機。他在開場白中對創作《火燒飛機場》《松花江上》和《兄妹開荒》的負責人（江青也是其中一員）進行了有說服力的批判。他的評論要旨與其他人有明顯不同，不僅有關文學和藝術，而且着眼於哲學和政治理論。他的議論和結論被收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中。在過去幾年裏，江青讀了無數次，每次閱讀都有新的見識。主席在文中提出了至關重要的問題：寫作應該是反映光明面，還是陰暗面？文藝工作的目的和結果是什麼？我們的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是什麼？他還警告說：讚美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劃無產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

「經常讀讀這個」，她要求道。（第二天早上，給了我完整的中文版，作為我的學習材料。）

回想起在他們共同創造生活時毛澤東遇到的挑戰，江青直率

33 編年史上揭示的一個矛盾，王明在這次對抗中被徹底打敗。

地說：「我崇拜毛澤東。」她探詢地看着我問：「維特克教授
你難道不想讓學生崇拜你嗎？」

被她的直截了當嚇了一跳，我說，「不，我喜歡學生與我辯
論，不希望他們崇拜我。」

她隨即笑了笑，繼續說：「在文革期間，主席一直都在與對
他的崇拜作鬥爭，因為對他的崇拜充滿了風險」。某些尋求在文
革的鬥爭中打敗她的人開始奉承她，後來他們的贊頌變得愈益過
份。有一段時間，她愚蠢地被欺騙了，後來才明白如何保持革命
策略的靈活性。

江青的談話從延安文藝座談會到文化大革命來回跳躍。這
對她的思維來說是不由自主的，因為毛澤東在座談會上的講話
為她在文革時期的工作提供了唯一的意識形態依據。無論毛澤東
的「講話」，還是江青的覆述，都沒有保存這個記錄，即導致舉
行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對立文學觀點的來源。馬克思、恩格斯和列
寧在系統解決文化革命問題上的失敗，從一個側面說明毛澤東在
這個問題上的武斷、斯大林主義和功利主義方針（這對中國共產
主義的整合至關重要）。顯然是要在疲備的知識份子背上猛擊一
掌，毛澤東用一種機械學語言，稱作家為「人類靈魂工程師」
這是斯大林從高爾基那裏借來的一個稱號。他稱文學和藝術是革
命機器上的齒輪。用毛澤東的話說，「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
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份，作為團結人民
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
地和敵人作鬥爭。」

如果作家是工程師，那麼「魯藝」就是一座充滿異常矛盾的
文化工廠。學院員工在藝術上的嬌柔做作就像中國後來的幾代人
一樣。他們被告誡要發明出足够簡單的文化形式來教化中國的工
人、農民和士兵大眾。在1940年代初期，這種說法還遠遠不是陳
詞濫調。新興的戲劇和改良的地方戲從生活中取材。一個流行模

式是一個聰明的農民協助紅軍戰士挫敗日本鬼子的卑劣陰謀。這些簡單的、迎合大眾的習慣與轉變靈魂工程師的思想是分不開，他們原先習慣於創作複雜的、帶有人物衝突的劇目。面對這種由於人才和教育長期不平等造成的兩難處境，毛澤東要求全面採取措施，解決根本問題：創作為大眾提供積極文學生活的新作品；通過思想改造矯正那些頑固的、不願服從的知識份子。

為了推翻舊秩序，毛澤東勸誡知識份子（不包括「魯藝」的黨棍）從象牙塔裏走出來。他們應該像他那樣深入到人民中去。長期習慣於在精英圈內工作的作家、音樂家和藝術家應該注意群眾的牆報，注意軍隊和農村中的小劇團，注意群眾的歌唱。只有進入大眾文化中去，這些名義上成為腦力勞動者的知識份子和藝術家才能成為人民的忠誠代言人。他寫道：「專門家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於『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麼，不管他有多大的才華，也是群眾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

毛澤東警告作家：「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的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份子以民主自由的新政權下，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一樣。我們可以大聲疾呼，而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眾不易看懂。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但是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我們並不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反對諷刺的濫用。」

這一警告不斷被違反和不斷被重申，最明顯的是在整個文革期間。這也就是為什麼毛的這篇方章對江青至關重要的一個原因。

5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勇敢地抵抗毛澤東、並在以後拒絕接受其命令的作家，包括勇敢而獨立的丁玲。在江青對座談會背景的討論中，她指出，丁玲的女權主義諷刺小品「三八節有感」，是在這樣一個社會臉上公開打了一巴掌。這個社會以實現了性別平等以及經濟、政治平等為自豪。江青沒有再深入探討丁玲的意見，表明丁的意見對她來說太敏感，不能公開討論。對於這個女人，她也沒有說更多。對丁玲人生的一瞥，顯示江青的見識和坦白何以會刺激到一個不完善革命社會的神經。

丁玲，湖南人（與毛澤東同一省份），比江青大8歲。她與最初的革命領導人物一起在省會長沙的一個現代學校接受教育。在那裏，她開始作為女權主義者、吉普賽人、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和政治左派的生涯。這些品質可能已使她喪失了在一個要求全民服從的男人政府統治下生活的資格。

江青和丁玲在學生時代都把寫作當作一種與反傳統、反封建世界溝通的方式。丁玲一直堅持寫，後來成為中國1930年代激進份子圈中最英勇的女作家。江青放棄了寫作，投身演藝界，結果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電影生涯。在1920年代中期，丁玲也曾動過成為電影明星的念頭，但由於厭惡電影經理對女人的性別剝削而放棄。兩人都曾在北京和上海的大學讀過書，但江青不是正式學生。兩人都是「左聯」成員，丁玲在1931年已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更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丁玲也遭受國民黨迫害，曾在1933年被捕，一直關押到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才被釋放，當時蔣介石被迫釋放了著名的抗議者。兩人都有複雜的性歷史，但只有丁玲敢於以現代的、坦白的文學方式暴露個人經歷。她們都是短篇小說家沈從文的朋友，江青在青島大學時還是沈的學生。陷入三角戀的丁玲，她的丈夫作家胡也頻在1931年被國民黨殺害。兩人都崇拜魯迅，丁玲是

近距離的，而江青則在遠方。由於認識魯迅，而且本身是一名作家，丁玲對魯迅及其立場的了解肯定比江青更清楚。也許是精神親合力以及人格忠誠，導致她責難共產黨為本身利益而扭曲魯迅的名聲，魯迅是一個反對一切極權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反叛者。

隨着抗日戰爭的爆發，江青和丁玲都逃到延安，成為「魯藝」的員工，又都通過自己的方式與毛澤東聯繫在一起。毛澤東同丁玲親密的友誼曾使他在自己的窰洞裏與丁玲進行了長達數小時的談話，這被某些人看作是對毛澤東的迷戀，認為她是最終被拒絕的女人。毛澤東與江青結婚，但表面上仍保持着對丁玲的尊敬，儘管兩人在延安座談會上的觀點不同。無論經過怎樣的思想改造，以後的15年裏她的獨立姿態沒有改變。在1956至1957年的爭鳴運動期間，她自由表達意見（數周內，每個人都被鼓勵自由發表意見），直到反右運動開始，她第二次被打倒。傳說丁玲這個革命時代最傑出的獨立婦女典型淪落為「作協」的女清潔工。儘管1970年代仍健在，但沒有後來為她恢復名譽的記錄。

在上海時，江青並不認識丁玲，因為江青在上海的整段時間內丁玲幾乎都在關押中。她們首次相遇是在延安。當時丁玲擔任黨報《解放日報》編輯，地位相當重要，深受信任。但由於對婚姻制度的蔑視，她和她的知識份子朋友觸怒了領導同志。關於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性別平等的必要性，她們看到某些共產黨領導人與過去士大夫一樣，仍然認為婦女需要受男人的控制。

毛澤東和江青結婚後，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嘲弄了領導人廣泛宣稱的婦女革命。丁玲在文中指出，儘管從世紀初開始，現代受教育的中國人已在為性別平等而鬥爭，但男子沙文主義仍佔主導地位。沒有公開點名，她說領導人的妻子是受害最深的。

丁玲寫道：「延安婦女的狀況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聽說這裏的婦女比中國其他地方的婦女更幸運。但延安的情況也不例外：社會壓力仍驅使婦女躲進婚姻，那些反抗的（如她自己）會

受到譴責。她們被敦促生兒育女，但母親們會發現讓別人替自己照看孩子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她們不能返回到新社會要求的工作中去。這樣的社會狀況，迫使婦女們成為典型的資產階級婦女，即回家的娜拉。十年的家庭生活，在婚前思想非常進步的婦女會退步為落後的妻子。在當代的延安，『落後』和『缺乏政治純潔性』已經成為丈夫要求妻子離婚最普遍的理由。」

「在過去，婦女得到的只是同情，但在今天，被迫遭受苦難的婦女將會把她的怨恨變成懲罰。『這是你該得的。』她會對一個男人這樣說。」丁玲繼續說道。她對女性的弱點表示公開的同情。由於社會勢力的壓制，婦女不能超越她的時代，不能理性地思考，不能果斷地行動。追求平等的婦女必須要關愛自己的健康，使用自己的大腦，行動堅決且有責任感，期待經受考驗。

長久以來，毛澤東和丁玲似乎對於彼此獨特的力量很感興趣。但是，由於毛澤東需要消滅幾乎所有對延安新社會以及他本人的批評，最終，他被迫把這個非傳統、不妥協、有才華的女人驅逐出革命隊伍，因為他已經驅逐了許多具有政治危害的同事。正如她想像中的婦女一樣，為了在同代人中脫穎而出，她遭受了許多磨難。起初是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現在是在延安，最後在北京。但只要她有與媒體接觸的機會，就會不斷講述獨立的革命思想，直到1950年代的反右運動，從此以後，她似乎永遠沉默了。

作為一個痛苦的被丈夫的陰影籠罩（不包括知識份子圈內的），在婦女運動和共產黨組織中沒有獨立地位的妻子，丁玲的揭露無疑使江青感到非常窘迫。不過，江青最後還是按照丁玲的意見做了。在毛澤東的勢力範圍內默默輾轉幾年後，終於擺脫了被一些妒忌的同事強加在她頭上的「回家的娜拉」的修正主義角色。她依靠自己的頭腦，譜寫了自己的政治篇章，並獨立地走向世界。然而，即使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她仍無法逃離為挑戰不平等的性別歧視而遭受的磨難。

8

走向北京

在這裏，我沒有談話的對象，沒有人能理解我。我的希望和見識超過周圍的那些人。但是，我們幸存的機會太少了，在我衣服包裹下的英雄的心，好在哪裏？

——秋瑾《致陶夫人的一封信》

「我是一個戰士，」我們在北京會見期間，江青明確宣佈，似乎要消除一種相反的假定。「在解放戰爭期間，我在直屬於西北戰場總部的一個特遣部隊擔任政治講師，我仍然保留軍人身份。」

在廣東時，她又回到這個話題，她的敍述摻雜着個人回憶和最新研究。為了準備和我們的談話，她參考了中央委員會逐日編寫的從延安到北京征途中的大事記，並裝在文件夾裏，整天都帶在身邊。作為補充資料的還有手繪地圖和詳列戰役、軍隊數量和各戰場概況的表格。過去幾天裏，她整理了35年間（1935－1972）的筆記。她承認自己非常疲憊，但談論那個動蕩的年代，給她帶來無窮樂趣。她已對此反復考慮多年，但還沒有機會找到一個持續不斷表達看法的機會。外國人必須明白，只有我們（領導同志）才清楚這段歷史，只有我們才能全面地描述在全國發生的一切。

對戰爭發表權威意見是令人不安的冒險，這歷來是男人的特權，因為她不時流露出令人驚訝的女子味。在晚上，約 7 個小時的討論中，她總是突然中斷對軍事歷史的敍述，帶着明媚的微

笑，有時轉向牆上懸掛的主席書法，有時玩弄小巧的白蘭花環，有時擺正放在我扇子上的茉莉花。

在晚上認真討論前，她站起身，帶我穿過大廳，到另一個寬敞的房間，打手勢讓我和她一起坐在米色的特大號沙發上。我們面前的長矮桌上放着青瓷茶杯，杯中泡着花茶，熱汽中的花香味散發在潮濕空氣中，桌上還有幾盤子奇異的蔬果。她對這些東西進行了植物學描述，還很有詩意，不只是簡單評判它們的美麗或味道。蓮藕和蓮子對稱地放置在盤子裏。她熟練地將蒺藜果上玫瑰色的刺拔出來，果實很脆，果肉呈白色。最令人目瞪口呆的是鳳眼，長在南方樹木上的長豆莢爆裂開後，每個豆莢裏露出一個大黑籽，像大眼睛的瞳孔。當我們用筷子夾住這些黑色鳳眼吃的時候，它們毫不畏懼地瞪着我們。（鳳凰在傳統中國肖像畫中是皇室女性的象徵）。這些鳳眼含有澱粉，嚐起來味道怪怪的，但還不錯。

江青站起來，打手勢示意我跟着她，穿過這個房間。房間裏有兩張大桌子，上面放着 6 張地圖，每張都用手工熟練地繪製。在汪東興（內戰時曾是毛澤東的警衛員）的指導下，這些地圖剛剛在北京為她準備好。汪同志過去常常向主席提出一些軍事方面的建議，並陪同毛澤東經歷了在西北的轉戰。江青把汪同志視為很優秀的軍事歷史學家，並透露他負責搜集她將要展示的軍事記錄。但現在與我們在一起的是不太內行的張清化同志。他身材很高大，相當敏銳，站在桌子的另一側，非常專心地工作，被我們的突然介紹搞得似乎有點局促不安。

「在陝北戰役中，張清化同志是軍事領導人，」江青繼續説道。「現在他是國家測繪總局局長。他的戰爭經驗使他能生動、具體地講解軍事歷史，雖然在毛主席著作裏提供了全面的理論分析。」她承諾，她和張清化同志的具體描述都不會是乾巴巴的。開始講解時，張拿着那些大幅地圖和圖表給江青作參考，謙恭地

點頭贊成江青的觀點，但沒有發表評論。

「有嚴重歪曲，甚至是謊言和誹謗，」在談到解放戰爭中涉及自己那部份的情況時，她以自辯的口吻警告。「如果敵人不攻擊我，我會是什麼樣的中國共產黨員？舉例說來，在陝北戰鬥中，我一直在部隊做政治工作，但有人說我是在做軍鞋；還有人說我在延安第一次見到虱子就被嚇跑了。事實上，他們不知道，在與部隊一起行軍途中，我身上長滿了虱子。在當時，有虱子就是革命的。」

「我說這些，不只是為了你寫書的需要，你的到來以及出現在我面前已經激發我把這段軍事史告訴全世界。」她說將集中敘述親眼目睹的西北戰場的情形。

就這樣，江青介紹了逐日發生的事件，其中穿插着個人見聞。為了把敘述限制在西北戰場，她不得不忽略掉其他戰場。於是她沒有提及彭德懷、劉伯承、陳毅和林彪這些將軍的功績。她對和平談判的策略爭論以及和談努力的失敗沒有做過多的描述。

1945年8月9日，蘇聯出兵東北，結束了日本對中國東北長達13年的控制（日本曾把這裏稱為滿洲國）。當時，這個殖民王國在傀儡皇帝溥儀和跟隨在周圍的一群滿清遺老遺少統治下。就在同一天，美國向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於8月14日宣佈投降。

對國民黨和共產黨來說，他們發動的抗日戰爭已斷斷續續進行了14年。打敗了共同敵人，使他們除了互相對抗外，一下子失去了打擊對象。在日本投降時，國民黨軍隊在數量上幾乎是共產黨軍隊的3倍，武器裝備實力幾乎是共產黨的5倍，而且還有強大的空軍和海軍，共產黨則沒有空軍和海軍。當時，雙方力量的懸殊使觀察家相信：中國的國家秩序不久將會由國民政府重建，他們控制着城市、財政界和新聞界，並被國際承認。此刻，美國政府不顧此前一年內由延安和各地美軍觀察團提交的「反國民黨

報告書」，向國民黨提供了大量戰爭物資，使國民黨軍隊成為當時亞洲武器配備最強大的軍事力量。這些戰爭物資將如何被有效應用呢？人們拭目以待。哪一方會得到中國人民支持呢（過去稱為「獲取委任」，用現在的話說是「贏得民心」）？這一點也是未知數。

爭奪優勢的鬥爭非常迅速。共產黨軍隊總司令朱德命令所有共產黨部隊佔領一切以前由日本人和偽軍控制的城鎮和交通綫。國民黨撤消了這個命令，要求所有部隊原地待命，直到國民黨正式接受日本投降。「這是在竊取人民的勝利果實。」共產黨對此提出抗議。雙方陷入僵局後，毛澤東接受了蔣介石的電報邀請，到重慶進行談判。

毛澤東、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王若飛將軍和美國大使赫爾利於是在8月26日飛往重慶[34]。談判拖延了幾個星期，雙方在10月10日達成一份臨時協定，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組織一個新政府，所有黨派都派代表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並草擬一份憲法；成立一個國共聯合委員會負責軍隊國有化。大體上就是國民黨政府做出政治讓步以換取共產黨軍事妥協。在整個談判期間，雙方的小規模軍事衝突不斷。10月11日，最終協議還沒有簽署，毛澤東返回延安。到了12月，美國大使赫爾利由於對國共和談的斡旋失敗而被由馬歇爾率領的代表團取代，最後協議還是沒有達成。周恩來（自1944年以來在重慶進行了數月談判）仍待在那裏，與美國人和國民黨代表商討停火以及為戰後政府奠基。

到了1946年春，隨着雙方互不信任加深，和平解決分歧已不可能。在華北和東北，停戰協定一再被違反。1947年1月，馬歇爾的調停使命失敗，離開中國。國民黨的政治技巧和公眾支持度已使他們喪失了美國人民的信任。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決心和軍事目

34 江青沒有陪伴毛澤東的第一次空中旅行。毛澤東在年初被選爲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主席。

標超出了和談所能接納的限度。

1947年2月，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共產黨代表乘美國軍用飛機返回延安。他們到達延安的幾天後，國民黨對紅色首府進行了襲擊和圍剿。1947年中，內戰使整個國家分裂。共產黨的 7 個解放區成為 7 個戰場。

江青繼續她的談話，說到第三次革命戰爭期間，從個人記憶到集體記憶，她的想像空間時而狹窄、時而廣闊。我注意到她不再使用個人的「我」，轉而使用集體的「我們」。艾德加·斯諾對毛澤東1930年代自傳中一個相似的轉變作了評論：在講述紅軍創建過程後，「他」的敘述開始略過「個人歷史」範疇，而把自己無形地置於一場偉大的運動中，儘管他在這場運動中佔據着主導地位，但你顯然看不到他是作為「個人」出現。不再是「我」，而是「我們」；不再是「毛澤東」，而是「紅軍」；不再是單個生命經歷的主觀印象，而是由一個關心人類命運的旁觀者客觀記錄下來的歷史資料。對江青來說，集體的「我們」主要限於對解放戰爭的敘述。當後來提及其他鬥爭時（黨內鬥爭，或她自己的），重新又用回「我」。

1

「為什麼將1940年下半年解放戰爭的這一部份稱為與敵人和舊勢力的搏鬥？」江青開始說，「在整個革命歷史中，西北的戰爭歲月（從1947年3月13日至1949年6月12日）是最困難，也是對未來發展最重要的。」既然從個人經驗中知道這是關鍵的兩年，因此在她指導下就有了相應的藝術表現，《黃河協奏曲》、革命樣板戲《沙家浜》和《紅燈記》就是反映那段歷史的傑作[35]。

戰爭開始時，共產黨被圈在西北根據地。長征後，這些地區

35 將在第16和17章討論。

已經由共產黨控制。從1935年到1947年的12年間，國民黨從未敢對這些紅色區域的邊界提出挑戰，反而膽怯地躲在峨眉山上。提及美麗的四川峨眉山[36]，她想起唐朝詩人李白的詩〈廬山吟〉。「我本楚狂人」，她唸了一句就停了下來，說會把原詩抄給我。

她嚴肅地說，在我回美國後研究這段歷史時，應該重點研究毛澤東關於抗戰的著作，包括《論持久戰》、〈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都收在《毛澤東選集》第 2 卷和第 3 卷中，她真誠地向我推薦。

對那幅涵蓋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間戰局的地圖，她介紹，它標明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的共產黨控制區和國民黨控制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也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劃上句號。抗日戰爭的主力是朱德指揮的八路軍和陳毅指揮的新四軍，而兩者都是毛澤東領導的，她堅持說。

日本投降後，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在軍事對比上處於絕對劣勢。1945年和1946年，共產黨方面有120萬到130萬軍隊，控制着一億三千萬人口，而敵方則有430萬軍隊，控制着三億多人口。美帝國主義為蔣介石提供飛機和軍艦運輸軍隊。隨着共產黨逐漸地贏得優勢，蔣介石「大方地」讓他們使用美國捐獻給他的物資，共產黨很快給他取了個「運輸大隊長」的綽號。

當她斷斷續續講述戰役記錄、軍隊數目、人員和物資得失時，發現我在費力地作筆記，她高興地說：「不用記了，我會把這些表格送給你的。」

「那會是最好的參考資料，」我感激地用中文說道。

向周圍扭了扭頭，看起來有點生氣的樣子，她大喊：「這些資料絕對真實，沒有任何虛假的東西。」

對她的發怒感到很困惑，我突然意識到我在語義上失言了。

---

36 南京在1937年落入日本人手中後，國民黨政府把首都遷到位於峨眉山脉的四川省會重慶。她也很快隨軍事、教育和工業機構一起前往那裏。1946年日本投降後，國民黨重回南京。

「參考資料」這個術語在漢語中常被用來指那些可靠性不確定的資料，經過深思熟慮才能被使用。我笑了笑，向她道謙，並解釋了語言上的衝突。

重新看了一下邊上的提示，她說：「在1940年代中期，美帝國主義採取一項重大舉措來調停蔣介石和紅軍。他們成立了一個3人小組，但經常嚴重違規，以致只是為蔣介石服務。雙方最終被說服，在1945年10月10日簽訂了停戰協定。然後，毛澤飛回延安[37]。但還沒等他下飛機，蔣介石就發動了內戰。

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後，主席提出以下戰略。在開始階段，紅軍以表面讓步的方式保持主動，放棄中小城市和鄉鎮，把敵人分散到各處駐守，以削弱其實力，暴露其弱點。另一個策略是把敵人引入紅軍布下的「口袋」裏，然後給予痛擊。共產黨領導層還決定把戰鬥限制在根據地，因為只有在最熟悉的地方，才能最有效的控制局面。

為了彌補在軍隊人數和武器方面與敵人之間的差距，紅軍採用了一種積極防禦的策略——游擊戰，即把有限的力量用來集中對付敵人的弱點，總的目標是消滅敵人。「這種消滅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從身體上消滅他們。」她慌忙補充，對於那些能够虛心接納新事物的戰俘，有兩條道路選擇：一條是加入到共產黨一邊來，另一條是重新回國民黨中去。對選擇重回國民黨的人還發給路費。實際上，如同她後來說的那樣，幾乎沒有人選擇回去。

毛主席堅持留在西北戰場，在那裏指揮全國的戰爭。他同時指揮着兩支軍隊：我們的和敵方的。他把敵人引到我軍能够吃掉他們的地方。「我曾經親自經歷和見證了他的指揮藝術。那是一個關鍵時期，對你來說理解當時的情形極其重要。敵人有兩個拳頭，一個是中國東部的山東，在那裏，我們已撤到膠東半島；另

37 江青記錯了。「三人小組」（馬歇爾將軍、周恩來、國民黨將領張治中）在1946年1月前沒有開過會。

一個是西北部的陝北，在那裏，敵人有20萬軍隊（號稱30萬），而我們只有 2 萬人，只是對方的十分之一。然而，我們將他們大部殲滅，全國戰局都在我們的控制之下。

在以後的談話中，她論證最初對延安撤退的陳述，還補充說敵人拳頭在膠東半島的一次突然襲擊破壞了她的諸城老家。她估計敵軍超過自己達 9 倍。1947年，敵軍有30萬人（在另一場合，她估計在撤離延安時，敵軍有23萬人），而他們只有2萬5千人（這比以前說到數目多）。如毛主席指出的，我們與敵人一樣都長着腿，但我們的腿比敵人的長。在內戰中，敵人像瞎子一樣攻擊共產黨軍隊，卻不知道他們在哪裏，也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隨着戰爭的推進，民眾對共產黨的同情不斷增加。在軍隊路經的地方，他們實行減租和土地改革。這些政策逐漸贏得了民眾的支持。

2

江青記得國民黨在1947年3月12日開始對延安發動空襲。這次空襲突然中止了一個時代。十多年來一直非常安定的延安社會被完全破壞了。江青本人的生活也被破壞了。人民突然大批離去，使她產生了一種新的人格力量，增強了她的政治意識，帶來的效果如同長征帶給她大部份親密同志一樣。

「在撤離延安前幾天，敵人發動了戰略轟炸。由劉戡和董釗派遣的（他們各自率領一個國民黨第29軍的兵團）近50架美製B-24和P-52型飛機組成的空軍對離延安市中心只有 5 英里的地區進行轟炸。「儘管使用這些令人咋舌的飛機和武器，但我方沒有人在炮火下陣亡，」她以一種蔑視的口氣說道。

她回憶起在那種緊急情況下如何帶着小女兒李訥躲避空襲，表情頓時變得柔和起來。在防空洞裏，她倆和其他人一起唱歌來驅散恐懼。當夜幕降臨時，空襲的火光照亮了各地，有人離開防

「參考資料」這個術語在漢語中常被用來指那些可靠性不確定的資料，經過深思熟慮才能被使用。我笑了笑，向她道謙，並解釋了語言上的衝突。

重新看了一下邊上的提示，她說：「在1940年代中期，美帝國主義採取一項重大舉措來調停蔣介石和紅軍。他們成立了一個3人小組，但經常嚴重違規，以致只是為蔣介石服務。雙方最終被說服，在1945年10月10日簽訂了停戰協定。然後，毛澤飛回延安[37]。但還沒等他下飛機，蔣介石就發動了內戰。

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後，主席提出以下戰略。在開始階段，紅軍以表面讓步的方式保持主動，放棄中小城市和鄉鎮，把敵人分散到各處駐守，以削弱其實力，暴露其弱點。另一個策略是把敵人引入紅軍布下的「口袋」裏，然後給予痛擊。共產黨領導層還決定把戰鬥限制在根據地，因為只有在最熟悉的地方，才能最有效的控制局面。

為了彌補在軍隊人數和武器方面與敵人之間的差距，紅軍採用了一種積極防禦的策略——游擊戰，即把有限的力量用來集中對付敵人的弱點，總的目標是消滅敵人。「這種消滅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從身體上消滅他們。」她慌忙補充，對於那些能夠虛心接納新事物的戰俘，有兩條道路選擇：一條是加入到共產黨一邊來，另一條是重新回國民黨中去。對選擇重回國民黨的人還發給路費。實際上，如同她後來說的那樣，幾乎沒有人選擇回去。

毛主席堅持留在西北戰場，在那裏指揮全國的戰爭。他同時指揮着兩支軍隊：我們的和敵方的。他把敵人引到我軍能夠吃掉他們的地方。「我曾經親自經歷和見證了他的指揮藝術。那是一個關鍵時期，對你來說理解當時的情形極其重要。敵人有兩個拳頭，一個是中國東部的山東，在那裏，我們已撤到膠東半島；另

37 江青記錯了。「三人小組」（馬歇爾將軍、周恩來、國民黨將領張治中）在1946年1月前沒有開過會。

一個是西北部的陝北，在那裏，敵人有20萬軍隊（號稱30萬），而我們只有 2 萬人，只是對方的十分之一。然而，我們將他們大部殲滅，全國戰局都在我們的控制之下。

在以後的談話中，她論證最初對延安撤退的陳述，還補充說敵人拳頭在膠東半島的一次突然襲擊破壞了她的諸城老家。她估計敵軍超過自己達 9 倍。1947年，敵軍有30萬人（在另一場合，她估計在撤離延安時，敵軍有23萬人），而他們只有2萬5千人（這比以前說到數目多）。如毛主席指出的，我們與敵人一樣都長着腿，但我們的腿比敵人的長。在內戰中，敵人像瞎子一樣攻擊共產黨軍隊，卻不知道他們在哪裏，也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隨着戰爭的推進，民眾對共產黨的同情不斷增加。在軍隊路經的地方，他們實行減租和土地改革。這些政策逐漸贏得了民眾的支持。

2

江青記得國民黨在1947年3月12日開始對延安發動空襲。這次空襲突然中止了一個時代。十多年來一直非常安定的延安社會被完全破壞了。江青本人的生活也被破壞了。人民突然大批離去，使她產生了一種新的人格力量，增强了她的政治意識，帶來的效果如同長征帶給她大部份親密同志一樣。

「在撤離延安前幾天，敵人發動了戰略轟炸。由劉戡和董釗派遣的（他們各自率領一個國民黨第29軍的兵團）近50架美製B-24和P-52型飛機組成的空軍對離延安市中心只有 5 英里的地區進行轟炸。「儘管使用這些令人咋舌的飛機和武器，但我方沒有人在炮火下陣亡，」她以一種蔑視的口氣說道。

她回憶起在那種緊急情況下如何帶着小女兒李訥躲避空襲，表情頓時變得柔和起來。在防空洞裏，她倆和其他人一起唱歌驅散恐懼。當夜幕降臨時，空襲的火光照亮了各地，有人離開

空洞回到自己家的窰洞。當轟炸聲似乎停止時，她與其他人一起穿過曠野，一邊還唱着軍歌。最後，她冷靜地說：兩個敵方指揮官劉戡和董釗都被他們自己人打死了。

持續數天的空襲最終迫使他們做出撤離延安的決定。她解釋說，（為消除可能的誤解：他們放棄首府，似乎丟了臉面）撤離是主動的，開始時大部份領導同志和軍隊都不願放棄這塊幾乎是白手起家建立的根據地，他們只想撤退到黃河東岸。賀龍司令（軍事家，1945年以來擔任中央委員）還提出了另一個方案，但遭到毛澤東駁斥。無可否認，對他們來說，讓部下遵循主席命令是不容易的。好不容易撤出內蒙古的張家口（1946年10月11日），延安的撤離更不容易。黨內領導層的一些「壞份子」抗拒主席要在延安再堅持幾天的決定。在撤除作戰工事，準備打包撤離時，她無意中聽到一些同志說主席留在這個被圍攻的根據地太危險了（她知道這些同志是出於好意）。她向主席傳達了他們的焦慮，主席說：「你是膽小鬼，為什麼不和他們一起走？」

她和主席待在一起，成為堅持留在延安到最後的唯一女同志。她想，在最危險的時候，應該留下來照顧他，與他同甘共苦。

在撤離延安前這段時間，主席帶着李訥行軍以示坦然。白天，他陪着李訥玩耍。到了晚上夜行軍，孩子睡了，就不好辦了。軟了，甚至幾個人都對付不了。在延安的最後幾天，江青去工作時經常一個人拖着李訥隨行。她們穿過河流和地勢險峻的地方，由於不習慣這樣的奔波，李訥總是哭鬧着要求回家。

江青順便回憶起就在他們撤離前，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請求一起行軍，由於她年紀太大（當時52歲），就勸阻她，她才離開了中國。全國解放後她又回來了，說明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沒有間斷過。

3月18日，2萬5千人的部隊開始集合出發，包括2個縱隊、8個旅組成第一野戰軍，由彭德懷指揮，每個縱隊有自己的指揮官。

她再次强調，軍隊的撤離是戰略轉移，是主動的，有計劃的。

每天的夜行軍，天氣很冷，地上的冰有一尺多厚，腳下很滑，冰腳下還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在3月18日晚上6點開始行軍，拋下了一個悄無聲息的城市[38]。

主席是乘吉普車離開的，雖然方便但並非沒有危險。在劉家莊以北數英里遠的地方，已是黃昏時分，敵機從空中發現吉普車，用機槍猛烈掃射。儘管無人傷亡，但車頂被打穿許多洞。後來在路途中，戰士們就用樹葉僞裝起來。

那次空襲留下的彈殼顯示敵人連續丢了3種炸彈，有穿甲彈、爆炸彈和燃燒彈，全部都是美國人製造的。空中的掃射一下子從四面八方像雨點般地落下。這次經歷沒有像預料中那樣恐怖。當然，她説，我們也笨，大多數人都飛跑進掩體躲避。

自然也有引起恐慌的時候。當第一次在劉家莊被攻擊的時候，她和主席找不到女兒李訥了（他們原以為她被很好地保護着）。他們自然很擔心她被殺害或丟失了，如同長征年代主席的其他孩子一樣。轟炸過去後，在一個農民家裏找到了李訥，她正玩得高興，完全不知道大禍臨頭。為了安全起見，她被送到鄧穎超處，當時鄧與在西北總部的丈夫周恩來分開。李訥由鄧穎超照看了數個月，彼此都很喜歡對方。江青微笑着説：「李訥仍一直稱鄧穎超為鄧媽媽。」

---

38 蔣榮增，中央警衛團的一個成員關於同樣的事給出了一個更以毛澤東為中心的描述。當空襲在12日發生時，延安全城的人都跑著尋求避難所。當時中央委員會設在楊家坪附近，而毛主席（和江青）就在楊家坪。兩處都發生爆炸，非常危險，緊挨著主席在山頂的家。但主席還待在那裏，繼續伏案思考，忘記了敵人的攻擊，直到周恩來、任弼時和彭德懷進來喚醒他，勸他撤退。第二天又開始攻擊時，他們又催促他快走。他頑固拒絕，決不丟下這裏的人民。猛烈的炮轟和機槍掃射持續了一周，毀壞了家園，殺死了孩子和家畜。如江青所説，18日黃昏，紅軍開始撤退。蔣榮增目擊的歷史與江青對相關事件的説明大體上相符合。在所有的中央領導人中，他對毛澤東和周恩來進行了最具體的描述（周恩來形象比江青的敍述更清晰）。任弼時、陸定一和彭德懷也作為領導人出現在途中（江青的敍述幾乎沒有提到他們。蔣榮增的敍述1957年出版後，彭德懷和陸定一分別在1959和1966年失勢）他沒有提及江青和其他女性參與者。

第二天晚上繼續行軍，日息夜行，逐漸加快速度。第三天，到達東北方向幾里外的高家嶮。在那裏，他們研究了作戰計劃，部署青化砭戰役。此時，主席對中央委員會做了調整。

撤出延安時，中央委員會代號「三支隊」，下設4個大隊，江青被任命為直屬大隊政治協理員，轉戰中一直擔任這個職務。此時，主席將中央劃分成兩部份：中央工作委員會（也叫中央前委）和中央後委。周恩來負責組織分工，他在轉戰西北時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前委由毛主席、周恩來、任弼時和陸定一組成。她想了想，又很快補充說劉少奇也是其中之一[39]。葉劍英負責中央後委。

為了避開五台山附近的敵軍，毛主席帶領部隊西行向長城進發。為了不讓敵軍發現踪迹，部隊只在夜晚行軍。事實上，幾乎每天夜裏部隊都要行軍，每行進一個小時休息10分鐘。毛主席帶領一個縱隊，其他縱隊則分別渡過大理河。

部隊在夜色掩護下馬不停蹄地行進，有些剛參軍的十幾歲的孩子幾乎跟不上行軍步伐，有些人筋疲力盡地倒下了，對此毫無辦法。行軍途中，江青還有馬騎，日子好過不少。她還記得有個十四、五歲的男孩為了跟上部隊，就抓着馬尾不放。江青也筋疲力盡了，擔心睡着了會從馬背上摔下來受傷。每到凌晨3點就想睡覺，於是強迫自己不停地高唱革命歌曲，不讓自己睡着，以免從馬背上掉下來。最難受的是慢性胃病，她從小就不得不忍受胃痛的折磨（這是她眾多生理不適的一種）。通常她有高胃酸炎，行軍途中要翻越高山，變成了低胃酸炎。

1947年3月31日，部隊到達大理河邊的邱家坪。她看見隊伍裏有一個戰士竟然還戴着國民黨的軍帽和徽章，就很生氣地命令那個戰士立即摘下來。為了讓他明白為什麼要這麼做，江青還脫下

39 劉少奇是毛澤東指定的第一個接班人。他在1960年代中期倒台。40年代末，他和朱德一起沿着一條單獨的行軍路線向河西挺進。

自己頭上戴的鑲着紅五星的八路軍帽，換上那個戰士的國民黨軍帽，然後盯住他看。在旁圍觀的同志們見她換帽子都很憤怒。沒有關係，她的目的達到了。那個戰士和其他圍觀者明白了：在他們中間有右傾機會主義者，試圖引誘他們佩戴國民黨帽徽而不是共產黨的紅五星。李維漢也參與了這場爭論，當時他擔任中央黨校校長。看見江青戴着那個戰士的帽子，李維漢喝道：「把那個國民黨帽徽給我摘下來！」

「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開戰了！」她也大聲回答。誰還戴着國民黨帽徽，都應該聽她的，因為她是一名政治協理員。

他們繼續行軍，翻山越嶺直到平原。行進途中，每逢一小時一次的10分鐘休息時，戰士們就一直在原地踏步抵禦嚴寒。儘管江青穿着毛皮外套，她也禁不住感到徹骨的寒意。有一個同志帶着一小瓶酒，大家就傳遞着喝一小口暖暖身子。

部隊就這樣繼續行軍，夜行軍已經成了一種習慣（即使解放以後，這一代中央領導人大部份仍沿襲着這種夜裏工作白天睡覺的習慣，江青也是其中之一）。部隊在早春4月向西挺進，5日到達青陽岔，在當地宿營的最初幾天，部隊忙着大量儲存行軍的「三大寶」：鹽、毛皮和草藥。

在戰爭的這一階段，中央領導人都使用假名來掩蓋真實身份，以免暴露行踪被敵人發現。選擇假名也是很謹慎的，毛主席改名「李得勝」，就是一定要勝利；周恩來假名「胡必成」，意思是一定會成功。在青陽岔宿營時，出於安全考慮，中央機關再次改名，稱為九支隊，仍然下設4個大隊，江青繼續擔任大隊政治協理員。

在青陽岔逗留期間，毛主席常常在住處獨自一人思考。4月9日，他發佈了一份通知，闡述保衛陝甘寧邊區戰略中「暫時」（當時主席是這樣說的）放棄延安的必要性。他寫道：「國民黨佔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絲毫不是表示國民黨統治的強有力，而是

表示國民黨統治的危機業已異常深刻化。」主席號召全黨全軍堅決地以戰鬥精神保衛和擴大陝甘寧邊區和西北解放區。

3

在行軍的下一站王家灣，部隊停留了2個月，到7月7日拔營再次出發。王家灣是個只有10多戶人家的山邊小村，在清澗縣境內，距敵軍只有6英里。中央委員會的幾個人就住在兩個相鄰的窰洞裏，江青和毛主席住裏面一間，周恩來、陸定一和任弼時在行軍途中沒有帶家屬，就一起住在靠外面的那間[40]。他們一開會，江青就不得不離開窰洞，待在一個驢棚裏。（這段可笑的回憶讓她很開心。）江青身上長了虱子跳蚤，體重急劇下降，脖子後面還長了一個腫塊，難以想像這是怎麼引起的。中央領導人的會議結束後，毛主席才把她叫了回來，聽到她的抱怨，還教育了她——江青是這樣說的。在她睡過的炕上，主席發現好多臭蟲，說就是這些臭蟲咬才引起腫塊的。為了紀念牆上密密麻麻的臭蟲大軍，他們把這個驢棚命名為「臭蟲大本營」。於是主席和她一起開展了一場清查運動，直到最後一隻臭蟲被消滅。（描述這些情景的時候，她愉快地笑了。）

在王家灣逗留期間，中央委員會內部發生了一場激烈的鬥

40 毛澤東的前警衛員閻長林對當時生活環境的描述和江青一致，從中透露江青的性格。閻回憶說：中央4月到達王家灣時，農民老王把自己破敗的三間室窰洞借給他們。屋裏鹹菜缸的氣味在院裏就能聞到。主席（應該和江青）住在裏間。周副主席和陸定一睡在靠門一間的土炕上。任弼時的屋子剛好和他睡的炕一般大。老王為自己簡陋的條件深感不安，讓親戚騰出另一間窰洞。但江青（當時是指揮部的政治助理）告訴閻長林「不要讓他們搬，怎麼能讓他們一大家子男女老少擠在一間窰洞裏呢？」「這裏太小了」，閻說，「即使連指揮所也比這大」。「現在條件艱苦」，江青說，「我們大部隊進入這麼小的村子已給當地群眾造成很大不便。主席告訴我們：遇到困難要想辦法解決，太舒適會讓主席不高興。另外，我們會考慮給群眾留下好印象」（閻長林『偉大的轉折點』，58－59）。閻的文章沒有提到江青是毛的妻子，但體現了她重視良好的政治形象。

爭。據江青了解，涉及緊張的局勢和對策。敵軍此時正在逐步逼近，但卻不清楚來犯的方向和兵力。如果仍然待在王家灣，共產黨是不是會被消滅呢？敵軍會不會一直向東追擊他們到黃河對岸進而佔領陝西呢？陸定一想退守河東，然後繼續向東快速行軍。任弼時也同意他的想法，但主席拒絕撤退。他決心要在西北地區繼續與敵人打靈活的游擊戰，因為我們熟悉西北，決心要守住這一地區。中央委員會會議一拖再拖，一直在討論主席的方案。主席每次開完會回來都顯得筋疲力盡，還總對她發火。一開始不明白為什麼他脾氣變得這麼壞，後來才知道主席的火不是對着她發的，逐漸也就習慣了。

總的來說，在王家灣的生活還是不錯的。主席和她不把自己孤立起來，走到人們中間去，和他們共同生活。主席和村裏的一些老人交朋友，他們很有智慧，主席常常和他們暢談到深夜。回憶到這一段的生活，她從一個褐色大信封裏取出一張發黃的照片。她說對這張照片特別珍惜，因為這是他們兩人以前簡樸生活的見證。（照片粗糙，影像也很模糊，江青頭髮短得近乎平頭，以致我把她當成一個瘦弱的男孩，引起一片笑聲。）照片上，主席、她與兩個孩子以及一個婦女（也許是女傭）坐在窰洞外一張簡易的桌子周圍。那時候，他們可以與普通人民住在一起。

在王家灣，他們（即江青說的「我們」）組織指揮了陝西的幾場戰役。其中一場在王家灣東南邊的一個小村莊叫羊馬河，位於延安和王家灣的中間。在這個村莊擊敗了國民黨第135旅，俘虜4000多人，對國民黨投降部隊進行了整編。主席在王家灣還寫了《關於西北戰場的作戰方針》（1947年4月15日）指出：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包圍之中，蔣介石政府的强大，只是暫時的表面的，其進攻是能夠打敗的。

4月4日，發生在羊馬河正南方向的蟠龍鎮戰役，進一步證實了毛主席的判斷。在這場戰鬥中，共產黨全殲國民黨第167師只差

一個團，俘虜正副師長以下6700多名，還接收大量敵軍的軍備物資，包括12000多袋麵粉和4000多套軍裝。戰鬥勝利後，毛主席派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到蟠龍祝捷。

江青描述了擔任宣傳家（她所謂的「政治協理員」）的工作。在部隊穿越的地區存在兩種人：一種是毛澤東的支持者，還有就是敵人。支持毛主席的沒有太多的領土，也沒有美國的援助。作為一個政治協理員，她給紅軍戰士和當地群眾講演：「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者。我們的理想是改造全世界。」（她沒有進一步說明窮苦文盲的農民聽眾能否聽懂她講的革命術語。）她對農民們演說時，解釋了共產黨在中國和世界鬧革命的任務和目標。蔣介石軍隊犯了如此之多的戰略錯誤，事實上把自己的武器雙手奉送給共產黨。蔣介石是運輸大隊長。國民黨士氣低落，共產黨戰士一個可以頂他們10個。這些宣傳給紅軍和支持紅軍的人民大眾注入信心。

部隊剛到王家灣，當地民眾非常恐慌，因為國民黨軍隊不久前席捲了村莊，留下滿目瘡痍。共產黨以實際行動贏得了人民的信任，證明同樣是路過的軍隊，卻與國民黨軍本質不同。部隊在當地重新建立秩序，同時釋放了被敵人關進監獄的無辜民眾。國民黨搶劫農民的糧食，共產黨卻幫他們收集和儲藏多餘的糧食。這樣一來，當地群眾對紅軍千恩萬謝，依依不捨，請求部隊不要離開。紅軍說：「我們還沒有讓你們吃上白麵饅頭呢！」意思是現在做得還不够，要讓老百姓過上更好的生活。當部隊出發時，很多當地群眾到紅軍住的窰洞要求參軍。儘管要長時間遠離家人，還是有很多人參加了紅軍。

6月7日，共產黨到達陝北靠近內蒙古的一個村莊小河村，停留了一宿。像在其他地方一樣，部隊臨時住進了當地群眾的窰洞。那天，大雨一直不停，主席不進窰洞，看着每個戰士都宿營以後，他才進窰洞住下。

部隊一停下來，就得知敵軍正從東向我方運動。第二天。部隊就離開小河村，向田茨灣進發。她說這段戲劇性的行軍值得描述一下。敵軍隨時可能發現部隊行踪，共產黨就在雷電和傾盆大雨掩護下一刻不停地連續行軍。嚮導迷了路，部隊幾乎又折回到原地，希望能找到正確方向。當時他們離敵軍只有百步之遙，部隊萬分小心地行軍，只用手勢來交流信息。

在這段危險的征途中，江青不想給毛主席和警衛員增加負擔，故意落在後頭，在馬背上不下來。她發現成為唯一騎馬的人，其他人都是步行。有位同志擔心地叫她下馬步行，因為在暴風雨裏騎馬很危險，馬可能停步不前，或脱繮狂奔，也可能滑倒在泥濘中，這樣都可能把她摔傷。見江青不願下馬，這位同志走上前直接把她從馬鞍上拽了下來，嚇了她一大跳。踏在骯髒的泥地裏，她努力站穩身，發現周圍幾乎伸手不見五指。為了在灌木叢生的泥濘小路上不掉隊，大家手拉手，排成一行，後面同志的頭只要往前稍稍一傾，就能碰到前面同志的後背。部隊在黑暗中無聲無息地行進，以免驚動近在咫尺的敵軍。

天快亮時，前面傳口令說，主席找江青，部隊要在山邊休息，主席會在那裏等她。她很快趕到部隊前方，到了主席身邊，她的雨衣已濕透，沉重地搭在肩上，但還是有點用處，就請求主席穿上她的雨衣（據她說，這是部隊唯一的雨衣）。在她一再堅持下，主席才穿上了這件雨衣。能説服主席穿上這件珍貴的雨衣，是她的一大勝利。

傾盆大雨還在不停地下，部隊繼續前進。她也像許多人一樣，再次累得陷入崩潰邊緣。走在旁邊的一個戰士大概注意到她的危險狀況，什麼也沒說，就解下栓在腰帶上的一個裝滿酒的軍壺遞給她。她解下繫在腰帶上的馬口鐵杯子，倒了一點酒，喝了下去，感到又有活力了，然後又把酒遞給其他同志。

天剛破曉，部隊決定停下來休息，偵察員四處尋找可以暫時

容身的窰洞，但幾乎一個也找不着。這個地方人口稀少，找不到什麼吃的東西。她的樣子看上去一定是愁苦不安，周恩來走上前來問她怕不怕。

她說：「我為什麼要怕？我們這裏可有兩百號人呢[41]，沒有人是孤立的。」

後來，一個女同志私下向她傾訴說，從娘胎生下來後還從未經歷過這麼慘的時刻。

6月9日，天終於放晴，部隊到達田茨灣。偵察員馬上偵察敵情，顯然敵軍對他們的蹤跡毫不知情，部隊就在這裏停留了一個星期。這一個星期的時間也沒浪費：他們考察了當地民情和經濟狀況，為將來的土地改革做準備。江青也承擔了許多任務，包括替一個生病的婦女梳頭。

田茨灣，有 7 家地主霸佔着大片土地。在當地群眾協助下，她深入了解了地主和佃戶的關係。例如，一個僱傭勞動力大概要耕種90畝地，但既沒有犁也沒有其他農具，無法耕地。除了地主，其他人都沒有謀生條件。

1947年夏，戰場上的敵軍就像一群無頭蒼蠅，毛主席負責制定全局的作戰方針。他首先統帥着自己的部隊，同時也在指揮敵軍。敵軍跟隨着我方行軍的路綫前行，但其怯懦本質總是使自己處於劣勢。紅軍選擇在平原休息，住進當地群眾的窰洞，但「內心怯懦」的敵軍只敢在山頭上紮營，以為這樣就佔據了地理優勢。結果很可笑，高山上的濕冷空氣使他們關節僵硬，減弱了軍隊的機動性，也打擊了士氣。正是考慮到這樣的後果，共產黨領導人才決定不在海拔太高的地方紮營。而且，和當地群眾住在一起還可以贏得群眾支持和信任。

幾個月過去了，人們對紅軍的行軍習慣也越來越了解了。例如，如果看見行軍隊伍裏皮襖多和手電多，就知道毛主席很可

41 她說的「二百人」可能指的是中央委員會及其衛戍部隊。

能就在這支隊伍裏。為了防止敵軍奸細和反動派謀害毛主席，他們就不直呼「毛主席」，而用「他」來代替，大家一聽就明白。如果有人問起部隊或主席的位置，大家都不理睬，或者怒斥那個人。群眾就這樣保住了「不是秘密的秘密」，她低聲說[42]。

她繼續說道：雖然大戰略要求中央機關留在西北，但主力部隊仍繼續東進，以轉移敵軍的注意力，掩護主要領導人的行軍路綫。然後，中央警衛團派出一支特遣小隊向南，前往安塞縣。江青對這個地方比較熟悉，以前曾來過附近的何家岩。中央警衛團特遣小隊的另一個同志也對安塞比較熟悉，這就派上了用場。有一天，他單獨執行任務時突然與幾個國民黨士兵正面相遇。「舉起手來！」他大聲喝道，要他們投降。這個同志威嚴的喝令迷惑了敵人。他們想當然地認為灌木叢中還埋伏着很多共產黨，就投降了，一下就抓了 7 個敵人。「真是好計謀！」江青高興地說道。

那時候，王家灣隱藏着一個反動組織「還鄉團」，主要成員是地主和村長。當村子遭到日軍或國民黨軍隊侵擾時，這些人不鼓勵村民抗戰，卻唆使他們向敵人投降，敵機在頭頂盤旋時跪在地上磕頭。村子裏食物短缺時，這些人把糧食全都藏到洞穴裏，不分給村民。她指出，革命芭蕾劇《紅色娘子軍》裏刻劃的地主南霸天就是這樣一個反動組織的成員。

1947年6月16日，部隊第二次到達小河村，一直待到8月1日，約一個半月。這一時期，彭德懷領導的第一野戰軍遭遇最強大的敵人，青海省長、穆斯林領袖馬步芳的騎兵。他及其兄弟馬步青和馬鴻逵領導着一個「地主資產階級」武裝，號稱「三馬」，勢力強大，非常富有。他們也是數個「反動勢力」的首領，在政治和文化上與國民黨有所不同，「三馬」在兵力上也遠比胡宗南的國民黨軍隊強大。這兩支部隊相互支持，「三馬」政治上的追隨

42 關於行軍秘密的話題讓江青想起了去年4月（1972）她曾秘密訪問廣東，但5月1日香港媒體就給廣泛報導！她很驚訝和我得見面「這麼快就被外界知道」。

者並不限於穆斯林。她大膽斷言，但沒有更多解釋：「到40年代中期，西北地區的大部份穆斯林已轉向共產黨陣營，共同對抗國民黨。」

她發現大批穆斯林定居的寧夏經濟很不平衡，當地民眾三分之二收入都用在衣服的花費上，但就其所知，當地群眾根本就沒有像樣的衣服，那裏的婦女看見她穿的普通軍裝，眼睛都發亮了，因為從未見過像樣衣服。她們穿的大多是用羊毛綫簡單縫在一起的幾塊羊皮而已，夜晚就睡在粗糙的毛氈上。一般來說，她們的生活習慣極不衛生。在和這些當地人生活了一段時間後，江青身上的虱子更多了。

雖然這些人都是漢族，而不是少數民族，但她們有些習俗還是很奇怪。她記得當地婦女都把一小簇一小簇頭髮搭在耳朵前，而把其他頭髮一律梳到腦後。沒結婚的姑娘梳辮子，結了婚的婦女要把頭髮盤起來。只有極少數女人敢把頭髮剪了，這是革命的標誌之一。

寧夏以西的甘肅東部女人向來以美貌而聞名，小河村的女人更是美貌優雅。江青還清楚地記得兩姐妹，一個叫桂花，一個叫蘭花。她們的父親並沒有按照一般漢族人的習俗把女兒嫁到夫家，而是招女婿進門。這樣，女婿就像一個長工，丈人就像一個地主。紅軍在小河村實施土地改革時，這種特殊長工就分到丈人最好的一塊土地耕種。但他們對這種改革感到害怕，不敢接受分給自己的土地，做自己的主人，也不肯改變自己的想法。不管如何向他解釋土地改革帶來的社會轉變，他們都無法和丈人斷絕舊關係，仍把丈人當作一個必須絕對服從的地主。

在行軍途中所經歷的土地改革，加深了江青對當地文化的認識，尤其是婚嫁習俗。例如，她後來聽說南方沿海省份廣東地主的處境和小河村地主的處境剛好相反。那裏的男人都習慣移居海外，使當地男女比例極不協調，所以納妾是很普遍的現象。廣東

的地主往往有好幾個妻妾，還强迫她們從事體力勞動，如給他抬轎子和田間勞作。這些女人蘊藏的仇恨之强烈已遠遠超出想像。在廣東梅縣進行土地改革時，地主妻妾發動大家聯合起來齊聲辱罵和報復他們，徹底擊垮了這些地主。最後，江青愉悦地說，每個小妾都得到地主一部份土地。

4

在轉戰的兩年裏，代價昂貴而又痛苦的戰爭幾乎成了家常便飯。然而，共產黨要佔領陝甘寧邊區的大片土地，要取得全國性的勝利，就別無選擇。每到一個地方，他們都致力於和當地群眾建立友好的軍民關係，這是部隊發展壯大的唯一途徑。從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紅軍成功地殲滅了國民黨97個半的正規師，消滅了120萬非正規軍（這裏指紅軍在全中國的戰果）。她急忙補充，她說的「消滅」不一定是指肉體上的消滅。

對待投降的國民黨士兵要與他們一起工作，首要任務是盡力促成他們的思想轉變。紅軍戰士遇到潰敗的國民黨士兵時，就主動和他們攀談，獲取信任，鼓勵他們「憶苦」（這些人都是因為貧窮和受壓迫才加入國民黨的）。有時候，回憶起深埋在心中的苦難讓他們痛哭流涕，要求加入紅軍。這種轉變很不容易。那些選擇加入共產黨的前國民黨士兵接連幾個月都生活在恐懼中，害怕被國民黨抓住受到懲罰，甚至被處死。江青和其他政治指導員覺察到這種恐懼後，在解放他們家鄉的戰鬥中，不斷做新兵工作。自然，有很多人不願意把革命帶到自己的家鄉。作為一種激勵措施，紅軍承諾每個人都可以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一塊土地，這也是他們向地主和國民黨報仇的唯一途徑。她不假思索地宣稱，這些新兵和共產黨員一樣，一開始都是勞動人民，是被國民黨強迫加入反動軍隊的。

從國民黨叛逃過來的士兵人數眾多，但並不是紅軍新兵的唯一來源。有些是在農村徵召的，但人數較有限，因為陝甘寧邊區本來就是人口稀少的地區。這些新入伍的士兵首先要接受一個星期的政治教育，然後是軍事訓練，大部份迅速成長為勇敢的戰士。在那種情況下，他們的物質要求很樸素，只是能夠代表「屬於我們」的一頂鑲着紅五星的軍帽，其他什麼都可以不要，大家都是有什麼穿什麼。時間一長，我們的無產階級隊伍就成了一支穿着雜亂無章的軍隊了。（這樣的回憶顯然使她很得意）

她很嚴肅地聲明，現在很多有關這段轉戰西北軍事歷史的描述都不真實。有些是號稱參與過這段歷史的紅軍寫的。有個叫王超普的人給《紅旗飄揚》寫文章，無恥地吹噓自己，結果發現他其實是蔣介石政府的奸細。另一個叫閻長林的人，她認識他，不過這個人並不識字，請報社記者幫他寫，很多地方寫得不真實。如他稱自己的部隊有100萬人之多，明顯是誇大了。如同她先前解釋的那樣，部隊從小河村行軍到田茨灣的時候，明明敵軍在山頂上宿營，但這個王超普卻說山下都是敵人，紅軍跑到了山頂。這個人還說，她為主席做鞋子，而事實上她做的是政治工作，還是中央委員會下屬一個大隊的領導人。這個人其實很清楚她在那裏做群眾工作，可是他不提這個。在她看來基本上沒有多少可信的記載，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毛主席本人的記述。

部隊剛開始行軍的時候是春天，幾乎天天都下雨，但到了夏末天氣卻變得異常乾燥。土地都被烤焦，當地群眾都沒吃的，更別說是行軍到這裏的部隊了。敵軍的野蠻劫掠是雪上加霜，日子更艱難了。敵人殺光家畜，摧毀莊稼，搶走群眾的糧食。敵人每佔領一個地方就燒殺劫掠，連一隻雞、一條狗都不放過。

1947年8月1日，紅軍部隊從小河村出發，向西北方向急行軍，平均一小時要走3英里。經過10天的行軍，部隊到達綏德，這裏曾經是一個繁華的商業中心，而現在則人煙稀少，滿目都是

荒涼景象。紅軍在這裏突然遭遇數股强敵，共有 7 個師從三面向紅軍快速逼近。

部隊快速離開了綏德，8月17日到達佳縣城，這在去黃河西岸村莊白龍廟的半路上。在佳縣休息時，她買了山楂給主席吃，這讓她想起來就高興。敵軍仍從三個方向快速向紅軍逼近，打算夾擊第一野戰軍：一路從南面的吳堡來，一路從西面的榆林來，另一隊路來自榆林西南的橫山。主席召開了一次領導人緊急會議，重新制定戰略。雖然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她還是感受到軍中的緊張氣氛。機要室有一個年輕戰士端着一碗米飯小心翼翼地走到他們跟前説，他想在黃河東岸吃完這碗飯，意思是想渡過黃河回自己的山西老家。江青聽到後罵道：「你這個膽小鬼！」[43]

儘管敵軍就在 5 英里外，卻顯然不清楚紅軍所在的具體位置。主席抓住這一點，下令主力部隊，即他們這一縱隊掉頭向白龍廟進發。部隊按命令進軍，在黃河邊停下，準備渡過黃河。河水洶湧，春天連綿的暴雨讓水位猛漲，部隊怎麼渡河呢？他們拆了白龍廟，以最快速度搭了一座橋，大家排成縱隊快速渡河，等最後一個戰士上岸後，再把橋拆毀，敵人無法渡河追擊。到了黃河東岸，紅軍部隊首次會師，從此進入了解放戰爭的一個新階段。

---

43 閻長林（《偉大的轉折點》，92－93）記述：在8月的第二個星期，部隊從綏德往北朝米脂急行軍。每個人都因為缺乏食物和睡眠而疲憊。周副主席因勞累而摔倒，鼻子碰出血。主席堅持把自己的擔架讓給周恩來，但周命令把擔架擡回去，照顧好主席。「那時江青也來啦，經過反復勸説，周恩來最終同意躺在擔架上行軍。」根據閻的回憶，周恩來在行軍中精力充沛，大事小事都親自過問。他吃的和睡的都很少，有時還要分擔一些主席的工作。他比主席睡得晚，起的早。儘管鞋底磨穿了還不讓人知道，擔心他們會照顧他。直到他上了擔架，大家才發現這個秘密。江青説：「周副主席，你的襪子都伸出鞋底了。」「難怪走起來顛簸」，周恩來喊道。儘管我詳細記述了她的描述，可是她沒有在地圖上指明第一次跨越黃河，顯然，他們先越過黃河，然後折回來繼續行軍。

5

在江青的講述中，這場毛主席領導的艱難曲折的西北轉戰的轉折點就是發生在1947年8月中的沙家店戰役。紅軍在此次戰役的勝利結束了戰爭第一年的防禦階段，開始轉入反攻階段，到第二年年底又打了一次漂亮仗。多年後拍攝了一部電影《沙家店》，講述紅軍抗擊敵人採取的靈活游擊戰術。

8月18日，紅軍路經楊家園子前往梁家岔，一路上士氣被鼓動起來。第二天傍晚前，部隊就到達目的地。梁家岔這個村子小得幾乎容不下紅軍幾百人的隊伍，位置在沙家店以北 7 英里。當時，雙方主力都集結在沙家店。主席在梁家岔親自用電話指揮沙家店戰役。大家既疲憊又緊張，都知道這一仗的結果將決定部隊是否會被迫再向西撤退。其他部隊正在西邊進攻榆林，主席又無法把全部兵力都投入沙家店戰場，最後決定佯攻榆林來解決這個兩難問題。這個策略成功了！以有限兵力殲滅了敵軍主力胡宗南的第126師，俘虜約6000人，只有師長往南逃脫。

部隊再次向東進發，前往朱官寨，在那裏停留了一段時間。雖然只有乾豆角果腹，但士氣依然高漲。在朱官寨，毛主席寫了《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規定了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和方針：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綫去，將戰事引到國民黨區內，在外綫大量殲滅敵人。在這裏，中央前委（即中央工作委員會）機關代號改成教導旅，由周恩來兼任政委和旅長。

10月18日，沿着曲折的路綫行軍，部隊到達譚家坪。主席和她一起參觀了當地的一個造紙廠。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真是好極了。這裏的村民和其他所經之處的一樣，設法保護主席的安全，仍只稱呼「他」，從來不說主席的真實姓名。3 天後，他們又到了南河底，然後是神泉堡。新成立的指揮機關設在神泉堡，但主席已轉移到別處去了。江青很快和主席會合了。他們一起穿過大

街小巷。所經之處的群眾看到他們很激動，都流淚了。有些群眾甚至說，見了毛主席一面，自己就是死而無憾了。

11月1日，部隊在呂家坪郊外駐扎。在這裏，一連串勝利消息使他們感覺到歷史洪流正轉向自己一方。受到勝利的鼓舞，江青此時暫時離開主力部隊去辦一件私事。她既恐懼又激動地渡過黃河，到了河東的古城雙塔，被領到女兒李訥藏身的地方。延安轉移後不久，李訥就隨鄧穎超一起離開了。此時鄧穎超和中央後委也到別處開會，就把李訥托付給人照料。與8個月前分別時相比，女兒的變化很大。江青和李衲一起離開雙塔。就在離開之前，兩人登上佳縣城牆，向西看延安，對延安很留戀，陷入傷感的回憶之中：正是在這個臨時政權的中心，她度過了人生近三分之一的時光，命運現在又把他們帶上另一個方向。

江青和李衲回到支隊，主席的心思全部投入了對戰局的把握，所有時間都在研究對策和方針。在神泉堡的12天裏，主席寫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1947年10月10日），即《雙十宣言》，還寫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新頒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命令》（1947年10月10日），重申紅軍的根本宗旨。這兩份文件構成以後政治工作的核心。《雙十宣言》向全國人民發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號召。她還推薦讀《毛澤東選集》第4卷的文章。江青所在的大隊利用這個時機，發起一場憶苦三查運動，號召回憶苦難的過去，珍惜現有的幸福，嚮往更美好的未來，檢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執行情況（1928年毛主席在井岡山向紅軍提出）[44]。作為大隊的政治協理員，江青的職責是負責召開憶苦思甜會。她給大家示範講述自己過去經受的苦難，也許是最近發生的事觸動了心靈深處，所有在場聽眾都感動得流下淚來。

44 三大紀律是：（一）一切行動聽指揮；（二）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三）一切繳獲要歸公。八項注意是：（一）說話和氣；（二）買賣公平；（三）借東西要還；（四）損壞東西要賠；（五）不打人罵人；（六）不損壞莊稼；（七）不調戲婦女；（八）不虐待俘虜。

11月11日，部隊繼續出發，10天後到達烏龍鋪。當地群眾看到毛主席都一擁而上，激動地哭了，熱切地歡迎他們的到來。11月21日，部隊到達楊家溝，在這裏停留時間遠遠超過預期，一直停留了4個月。他們一直在研究策略，爭取群眾信任以及結束戰爭。從11月25日一直到12月28日，中央委員會召開了一次特殊時期的擴大會議，主席宣讀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7年12月25日）。她對這篇文章印象特別深，因為是聽毛主席唸稿時一字一句記錄下來的。然而，她立刻補充說明，全文都是主席原話。[45]

她說，這篇文章是一個綱領性文件，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文章很快便有了回應，從12月28日起，解放軍的4個野戰部隊發起了一場新式整軍運動，就像1942年延安的整風運動。這場運動前期包括憶苦三查，緊接着就是土地改革。在楊家溝的4個月，主席還寫了一系列光輝文獻，都收錄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內。

江青指着桌上一張中國北部態勢圖，講解到1947年7月戰爭在華北進行的情況以及敵軍被逐步消滅的過程。1948年春，共產黨轉變作戰方針，進攻態勢更為猛烈。黨和部隊一起繼續進行前一年12月發起的整軍運動。共產黨在幾條戰綫同時發起反攻（由劉伯承、陳毅、林彪和其他偉大的將軍領導），但主力部隊的部署仍然針對蔣介石控制區。在北方，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控制的邊區與新解放區合並成晉察冀解放區（包括陝西、察哈爾和河北部份地區）和晉冀魯豫解放區（包括陝西、河北、山東和河南部份地區）。這些合並構成了建立華北人民政府的第一步。

45 1964年，毛澤東客觀地回憶那段往事說：「《當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是我1947年口述的。有人記錄後，交給我修改。我那時有病，不能自己動手。現在想寫的時候，卻都讓秘書做了，而不是我自己，但如果你打算自己作這些工作，那就好比讓秘書負擔你的領導工作一樣」（在邯鄲除四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3月28日，見《毛澤東文集，1949－1968》2：338）。

眼看戰爭快要結束了，1948年部隊的士氣越發高昂，江青講述到這裏情緒似乎也受到了感染，變得高亢了。3月21日，他們離開楊家溝，前往西柏坡，當晚到達吉徽店。3月23日，部隊穿過川口渡黃河，到達陝西的寨則山。3天內，他們經過雙塔，到達蔡家崖。4月4日，他們到達岢嵐縣城，弄到幾輛敵軍留下的吉普車，繼續前往神池縣城，在東北方向越過長城，然後再折回來，6日到達代縣，很快又到了繁峙。

1948年春末，五台山仍然是大雪覆蓋，綿延向東，北面不遠處就是內蒙古。4月11日，部隊開始攀登五台山，寒風刺骨，空氣潮濕。他們手拉手，沿着蜿蜒的小路緩慢地盤旋而上。雪很厚，達數尺，每邁出一步，都得提起腳、身體後傾。（她示範當時如何行軍）他們越爬越高，氣壓就越來越低，她和很多同志都感覺頭暈目眩，主席也腳步不穩了。五台山最高點幾乎達海拔一萬英尺。主席和她坐着吉普車到頂峰。從車裏出來，恢復了身體平衡，俯視剛剛征服的山峰。當天他們到了台懷鎮塔院寺，這是一座有琉璃瓦屋頂的宏偉建築，比她所知道的北京城的那些廟宇還要宏偉。她又尖刻地補充說：不管這座廟有多宏偉，裏面的喇嘛首領也像楊林街的地主惡霸一樣。

4月13日，戰事似乎稍微平靜，他們到達河北的城南莊。突然密集的炮彈在他們頭頂上空傾瀉下來。後來發現是隱藏在隊伍中的一個叛徒用無綫電指揮了這次轟炸。在猛烈的空襲下，又經過5天的危險行軍，到達秦嶺山脈的華山。密集的炮彈仍然從空中向他們襲來，到處是爆炸聲，連沒有人煙的地方也遭到轟炸。等空襲平息下來後，他們就在山腳下紮營，主席一個人待在一旁，又寫下兩篇文章。

江青回憶到，覆蓋着華山峭壁的大雪開始融化，從山上流下很多雪水，場面壯觀。華山看起來是如此陡峭，簡直不能想像，如何能攀上峰頂，越過這座高山。當部隊排成一列縱隊攀越

華山時，毛主席寫好了《再克洛陽後致洛陽前綫指揮部的電報》（1948年4月8日）。在這篇重要文章裏，主席規定了解放全國城市時的九大政策。從1948年春天起，中國的城市開始一一被共產黨攻克。

4月18日，周恩來到了離河北省石家莊數英里外的一個小地方西柏坡。毛主席直到5月27日才到西柏坡和周恩來會合，在這裏待了10個月，然後主席離開，前往他們最終的目的地——古都北京，離西柏坡不到200英里。在西柏坡，主席仍然堅持寫作（內容包括土地改革、黨的紀律、軍事戰略和國民黨）。

儘管如此，他仍和以前一樣積極地指揮戰爭。在西柏坡，主席曾經制定了三大戰役的作戰戰略和戰術，包括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她再次強調，主席在指揮紅軍部隊同時，也牽着敵軍跟在共產黨的戰略戰術後面轉，敵軍也在主席的控制之下。看着一小疊參考筆記，她報出了這些戰役的一些數據。遼沈戰役殲滅敵軍33個師、共47萬2千人；淮海戰役殲滅敵人22個兵團、共55萬5千人；平津戰役連俘虜帶消滅敵軍第39兵團52萬人。1949年1月最後一次戰役結束後，國民黨指揮官傅作義向共產黨投降了。

1948年，由劉伯承和鄧小平（政委）領導的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採取從中部突破敵人防綫的戰略。劉鄧大軍越過大別山向武漢進發，到達南京以東的時候，敵軍幾乎已經瓦解了。「國民黨幾乎已無路可逃了」。1948年末，國民黨請求和談。隨後，1949年1月21日召開一次會議，但國民黨反動派拒絕簽署和平協議。眼看國民黨已處絕望境地——共產黨幾乎已經佔領了整個中國，蔣介石使用奸計，表面上辭去總統一職，宣佈「引退」，由李宗仁任代總統，但實際上真正的大權還是掌握在蔣介石手裏。

儘管共產黨領導人認識到戰爭已到最後階段，國民黨軍隊正在迅速喪失領土，但他們繼續宣傳「打倒蔣介石政權」的口號，喚醒行軍沿途的老百姓，說敵人勢力仍很強大，必須堅持與紅軍

並肩作戰，直到奪取最後勝利。

1949年3月25日，主席離開西柏坡前往北京。這個臨時首都直到1949年9月27日才正式成為共產黨政權的首都。主席到達北京後，檢閱了奪取全國勝利的軍隊。1949年3月，主席主持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在會上作了極其重要的報告，提出在全國勝利後，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規定了黨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提出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和主要途徑。

關於江青，在指揮所最終選在西柏坡前，她一直擔任政治協理員職務，領導着一個「辯論隊」（流動的宣傳單位）。北京新政府組成後，她放棄了這些職務，進入中央秘書處。她朝桌子另一邊的張清化點了一下頭說，他們就是在西柏坡分手的。

中共第一次向「國民黨反動派」提出和平協議後，遭到拒絕，江青再次重復說，但國民黨別無選擇，他們已無處可去：他們的老家都已在解放軍控制區域。到戰爭的最後一個春天，有158個國民黨師（154萬人）被消滅。只有局勢發生了扭轉（敵人：290萬軍隊；共產黨：300萬軍隊），國民黨才不得不接受和談。

和談在1949年春開始，國民黨代表團由張治中率領。談判破裂後，他拋棄了國民黨，加入到共產黨這一邊。這很容易理解，幾年前共產黨還在延安時，張治中（1946年前任國民黨西北綏靖區司令）曾訪問延安，並為人們的新生活深深吸引。當時主席準備視察陝甘寧邊區，張治中請求一同前往。這樣的請求是始料不及的，但如同後來有人評價說：1940年代中期，張治中「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把共產黨的政治首都當成自己的了」。

談判持續到4月20日，南京政府否決了協議草案。丟掉幻想，準備鬥爭。4月20日，主席號召「保衛國家領土的獨立和完整」，下令紅軍向西北和南方進軍，給敵人以迎頭痛擊。百萬雄師橫渡

長江向南進發。23日，解放南京。一個月後，解放上海。全面進軍，風卷殘雲，「橫掃」一切攔路之敵。

江青簡潔介紹了最後戰果：紅軍消滅了190萬國民黨正規軍，98萬土匪武裝，120萬人投誠，解放了除台灣以外的所有地區。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慶典時，江青在那裏？沒有在主席的身邊。江青對此沒作解釋。

時間過了凌晨3點。儘管江青從前一天傍晚就開始講述，但看起來沒有一絲倦意。現在，她對解放戰爭的描述都落到了私人筆記上，其中流露出她在男性領袖中的艱難比預想的更嚴重。

她回憶說：在戰爭的最後階段，主席給負責大多數機要文件的秘書處送來一封重要電報。雖然是主席的妻子（在秘書處工作），但她沒有看到電報——明顯的疏漏。後來她把這件事告訴了李陶——一位長征老戰士。對江青遭受的輕視表示不滿，他找到處理電報的負責人，告訴他：「你必須尊重女同志」。

III

幕後

9

五十年代的隱名埋姓

我們身上不僅有父母遺傳下來的東西，還有各種各樣古老的傳統、觀念和信仰……我隨手翻開報紙，就如同看見了鬼魂在文字之間游蕩，乃至在整個國家游蕩。

——易卜生《群鬼》

根據中國革命的官方記錄，1949年解放戰爭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告別苦難的過去、迎接美好未來的轉折點。但是，10月1日，一個舉國歡慶的日子，在江青的回憶裏卻不是什麼重要的日子。事實上，她連提都沒提到這一天。不過，我們可以推測出她當時的感受。

誠然，她從農村搬到了首都，從借住的窰洞搬進了屬於自己的皇城，一個供中國皇帝及其臣僕居住了7個世紀的城堡。然而，這些古老建築蘊涵了多少過去仇恨幽靈和封建歷史的重負啊？漫步在紫禁城綿延的華麗宮殿間，她與毛主席單純的關係，以及無產階級同志間會發生什麼變化呢？她會不會像古代嬪妃一樣被限制在傳統女人的狹窄空間裏呢？或者，她會不會像壓不住的清代后妃慈禧一樣，把自己推上安穩的太后寶座，然後在珠簾後面控制大權數十年呢？

下面的章節講述了江青逐漸獲取主席一些事務的控制權，以及慢慢建立個人事業的過程。在江青的記憶裏，1950年代是自己在政治上的試探期，也是對自己身體的考驗期，是一個疾病反復

的階段，也是退出政治舞台又重新返回的階段。整個50年代，她幾乎從未在媒體上公開露面，但幕後工作一直沒有間斷過。對她來說，50年代是一個抑鬱症的代名詞，而抑鬱症則是中國有錢階層的標誌，只有那些有錢有閑的人才能負擔得起養好這樣的病。

她的確努力在黨中央機關裏謀到了一席之地，但要在權力核心站穩腳跟，首先必須向人民大眾和地方領導人證明自己。為了這個目標，江青離開紫禁城來到農村，發起了具有爭議性的五反調查，並違背黨中央領導人、有時也包括毛主席的意願，參與了50年代早期的兩大運動：土地改革和婚姻改革。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那些持懷疑或嫉妒態度的的同志們迫使她不得不在遠離首都的地方保持十分低調的姿態。隱名埋姓會妨礙她在人民群眾中建立個人威信、贏得人民的擁護。

1

1949年3月，毛主席、江青和一些主要領導人及隨行部隊前往北京，佔領這座皇城。他們將西邊的一部份劃為專用區域，叫做「中南海」。每一位在戰爭中生存下來的領導人及其妻子兒女都分到一套在這個前皇家建築裏的住所。儘管由於交通的原因，拆除了大道邊上的幾段紫禁城城牆，但領導人們的住所以及他們的私人生活仍然停留在公眾的視綫之外。江青和毛主席的住所是明代建築的樣式，中間是精雕細刻的彩繪梁柱。兩人的臥室分開，但又彼此相通。

自1912年民國成立起，這座擁有無數宮殿的前清皇宮紫禁城就開始對公眾開放。滿清政府垮台後，被稱作「故宮」。解放以後，共產黨對紫禁城進行了大規模修復，小到每一級台階每一個門，大到每一座宮殿，然後建立了故宮博物館，向公眾展出過去的皇家制度和生活，但是中南海不在此列。人們會告訴你，這個

地方每天只對它的主人們開放。

20世紀中期，借住在農民窰洞裏的共產黨領導人還無法想像出遙遠勝利後的生活，而現在他們不得不面對曾經擺在所有新朝代創立者面前的問題：怎樣才能保持人民對他們的信任？要知道，他們現在已經不再和以前一樣過着普通人的艱苦生活了。共產黨最相近的先輩——太平天國在進入首都南京之後就沉溺享樂。他們不就是這樣失去人民的擁護，最後失敗了的嗎？

1949年3月，江青回憶道，2年的行軍生活對她的身體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在最後階段是怎麼挺過來的。在做了身體檢查和工作交接之後，一些領導人——似乎並不是毛主席提出的——鑒於江青的身體狀況，決定把她送到莫斯科接受治療。我問道：為什麼？既然病情已如此嚴重，為什麼還要讓她忍受幾千里的顛簸到另一個國家去呢？她回答說：因為連年的戰爭已經摧毀了大部份醫療設施和醫院。1950年代早期，全國各地的醫療設施都一團糟。在徵求斯大林的同意之後，也是江青剛到北京後不久，她帶着幾個護士和保鏢踏上了開往中國最北邊鄰居——蘇聯的火車，這也是她唯一知道的外國。在莫斯科火車站，一輛救護車把她接到了醫院，住院費用是中國方面負擔的（這是她强調的一點）。一個由蘇聯醫生和醫學教授組成的醫療小組對她進行了全面的身體檢查，結果顯示她持續高燒和身體衰弱是由好幾種疾病引起的。她這麼描述自己當時的情況：全身瘦得只剩皮包骨頭，體重下降到42公斤（相當於94磅）。躺在病床上，聽到那些已熟知她身體狀況的醫生和教授們在為先治療哪種病而辯論，雖然她那時只能聽懂一點點俄語。

主治醫生是波爾什伊教授，也是她最熟悉的蘇聯醫生。發燒的根源之一是扁桃腺炎，開始是右邊扁桃腺發炎，然後感染了左邊的扁桃腺。當醫生說要先做一個扁桃腺切除手術時，她從病床上爬起來，自己走進了手術室。護士說她看起來像一個「英勇的

將軍」（很明顯，她很樂意把這些褒獎之辭重複給我聽）。儘管手術只持續了半個小時，但難度很大，醫生首先要切除右邊的扁桃腺，然後要以更快的速度切除左邊的扁桃腺。

經歷這次難熬的手術之後，醫生希望她能增加一些體重，安排她到1000多英里之外的黑海海濱度假城市雅爾塔療養。她在雅爾塔溫和的氣候下，住在為俄國沙皇建造的華麗宮殿裏（又被追求享樂的蘇聯官僚們所佔據了）。經過了一個月的療養，身體開始康復。4月底，江青乘專列返回莫斯科，途中護送她的除了2個蘇聯保鏢以外，還有幾個蘇聯廚師。漫長的途中，她只能躺在臥鋪上聽收音機解悶。從收音機裏，她得知解放戰爭進行到最後階段時，共產黨軍隊擊沉了一艘英國軍艦，這個消息讓她激動得渾身顫抖。聽到主席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那一刻，她不禁激動地痛哭失聲[46]。她異常的情緒引起了保鏢和廚師們的慌亂，大家一點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她對他們說，中國人敢於向英國軍艦開火，多麼了不起！

她從雅爾塔一回來就收到了斯大林的邀請，但他們的第一次見面卻有點尷尬。當她和隨從們到達克里姆林宮時，斯大林的副官們顯然被搞糊塗了：他們原以為毛主席是和她一起來參加談判的。其實，直到江青1949年秋返回北京以後，毛主席才第一次出訪蘇聯（主席於12月16日到達莫斯科，第二年4月4日返回北京。）由於去了蘇聯的緣故，1949年10月，她成為中蘇友好協會的發起人之一（劉少奇任主席）。

她說：1949年黨中央領導人到達北京時，中國還處於半解放狀態，土地改革已經開始了。有一段時間，他們重新走回以劉少

46 1949年4月20日－21日，解放軍在橫渡長江時，受到紫石英和另外3艘英國軍艦及一些國民黨軍艦的炮擊，252名解放軍傷亡。解放軍還擊，擊傷了紫石英。毛澤東為此發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為英國軍艦暴行發表的聲明》（1949年4月30日）。毛那段著名的話「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并沒有出現在修改後的文章裏。

奇為代表的右傾路綫，開始依靠富農的支持（而不是像對待地主一樣剝奪他們的財產）。1949年秋，從蘇聯回來後，比以前更強烈地感覺到她那間設備齊全、隨從眾多的住所對她的限制。所以決定到農村視察，在土地改革如火如荼的時候獲取第一手土地分配制度的信息。當第一次向主席提出她的決定時卻遭到反對。他們爭吵之後，她還是離開了。

1949年秋，她正在為離開做準備，別的女同志覺得也應該作為北京的先頭部隊去農村做調查。也就是說，一些其他領導人的夫人（她絕少把自己說成是領導人夫人）和她一起去了農村。對她來說，這是一個參與基層階級鬥爭的好機會，當然她也已經不是新手。剛結束的轉戰西北的行軍途中（始於1948年初），根據毛主席的農村政策，她也曾經參與領導了推翻地主階級、重新分配土地的活動。

她希望能參與中國東部農村的土地改革運動，所以乘火車到了上海。她對上海這座城市是非常熟悉的，但這次卻是12年來第一次到上海。雖然知道現在的上海已經不再是那個她熟悉的上海了，政治和文化生活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一想到要重返上海，她的心情還是非常激動的。當火車駛入站台時，她看到高崗和饒漱石，一個是東北局領導人，一個是華東局領導人，也就是說他們兩個控制了整個中國東部。顯然，他們已得知她的計劃。一踏上站台，也就是所謂他們的「勢力範圍」，她在上海的一舉一動就都處於他們的控制之中了。

儘管當時她、毛主席以及其他人都不知道，但數年後他們發現高崗和饒漱石早在那時就已經背叛黨中央，投靠敵人，做了叛徒。他們僱用了3000多個特務滲透到中國東部的廣大城市和農村，而50年代早期這片廣闊的土地就已處在他們的控制之下了。在上海期間，她主要是和饒漱石打交道。她一到上海就對饒漱石說，要直接下農村，開始土地改革的調查研究。饒漱石勸她不要

去，說現在到處都潛伏着特務（好像這些特務不是他派遣的）不能保證她的人身安全。這種勸阻其實是僞裝的，他完全是在企圖掩蓋自己的惡行。

他不間斷地監視她。一天，她想去市中心買東西，饒漱石不顧她想獨自一人去的願望，堅持要陪她一道去商場，否則，她就不能出門。從此以後，陪在她身邊的不是公安局長，就是饒漱石本人。不管他們去哪兒，旁邊都有一大批佩槍密探，讓她感覺自己似乎隨時都可能遭綁架，這種恐懼感簡直和以前在上海的感覺一樣。饒漱石及其同夥的專橫行為使她看到解放後華東改變的只是表面現象。

饒漱石安排她住進勝利賓館。為了監視她，決定在江青停留期間也住進來。起先，她住的是一間帶中央供暖系統的朝南房間。她說那年（1950年）冬天保持室溫，對她很重要，因為她的身體還很虛弱。但是，饒漱石一定是意識到這個房間的位置會使她有機會接觸一些有影響力的同志。當時，饒漱石絕對不想讓她再獲得權力，而且如果她真的感到不舒服就會離開。他的行為簡直就是一個僞君子，她說道。他調換了房間，給他自己安排了朝南的最好的房間，而江青則只能住在賓館側翼的一間朝北房間裏，沒有中央供暖系統。房間裏寒冷刺骨，沒有陽光。她把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整個人捂在被褥裏保暖。「去看醫生吧！」當江青向饒漱石訴説發燒難受的狀況後，他只說了這樣一句話。這並不是她想要的解決方法，她也沒有去看醫生，而是喝了很多水來退燒。最後，饒漱石終於讓步，允許她住進一間帶暖氣的房間。

在華東局的陪伴下，她的工作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所以就去找上海市長陳毅（是他領導解放了上海和她的家鄉山東），並對他講述了所遇到的讓人惱火的事。陳毅鼓勵她改變策略，走出來見一見文藝界人士。江青在文藝界還是有很廣泛的人際關係，她也算是文藝圈裏的人。陳毅自己太忙，沒有時間親自陪同她，指

派了副市長潘漢年作她的嚮導。潘副市長陪同她觀看戲劇和電影，還參加了許多文藝活動。作為陪同，潘漢年是否起了積極作用，這還很難說。據說1930年代，他曾經是王明的忠實擁護者，而且跟饒漱石一樣，最後也被發現是一個叛徒，她憤怒地說道。（1955年潘漢年被開除黨籍，關進監獄。）

由於饒漱石掌管華東地區，所以必須表現出對江青負責，但他不清楚該如何接待她。有一天，他邀請江青參加一次由他主持召開的華東黨委擴大會議，事先向她簡要地介紹了會議內容。也許是想讓身為女性的江青在這種情況下輕鬆一些（那時這種重要的黨委成員全部都是男性），也許是想打擊她，他還提到他的夫人也會參加這次會議。在那次會議上，他坐在正對着江青的座位上。介紹的時候，他戲謔地稱她為「欽差大臣」。這讓江青非常憤怒，但當時也不能說什麼[47]。據江青推測，饒漱石及其同黨的目的就是要羞辱她，把她趕走。她很快就離開上海，到了上海以西70英里的無錫，這是江蘇省京杭大運河邊上的一個主要工業城市。江青在無錫參加了一次縣黨委會議，首先提出反對在華東開展的黨內「反右傾」運動。（一個特殊詞匯，不過意思很明顯，就是內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

在無錫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調查這一地區的歷史背景。她了解到太平天國政府（1850年至1864年通過起義控制了中國的東部和南部）曾經下令農民可以永久租賃土地，通過這樣的土地制度，每個人都分到了不超過一畝的土地。這麼一小塊土地，必須精心耕種，需要大量的糞便做肥料（主要是人糞便），連狗糞也被利用起來。但耕種這麼一小塊地產出的糧食根本不够吃，農民不得不尋求各種副業來謀生。由於無錫地區長久以來就盛產茶葉和蠶絲，所以大部份農民都在自家土地上種植茶樹或桑樹，然後賣掉

47 按毛澤東的說法：「欽差大臣」是被派出去，對自己不了解的事誇誇其談的人。毛的意思是理論和實踐要相結合。

茶葉和蠶絲。

在無錫，江青走訪了周邊的農村，考察了當地的茶葉和絲綢業。這兩個行業都遭受日軍侵華帶來的毀滅性打擊。1950年代早期，這兩個行業仍然處於停滯狀態。農民們如此需要食物，以至願意用50公斤蠶繭來交換不到200公斤的大米。日軍佔領江蘇期間（1937年至1945年）建立了一套通訊系統，砍掉了無數絲綢業賴以生存的桑樹。她說道：即便現在無錫地區以及整個中國的絲綢業都還沒有完全恢復過來。

同時，茶葉工業幾乎已經完全恢復了。她繼續說道：桑樹大概需要 5 年時間才能進入盛年，但茶樹沒有10到20年是成熟不了的，有時甚至還不止這點時間。所以茶樹的種植是相當耗費人力的。她很快從無錫返回上海，然後回到北京。回北京後，她深刻地意識到劉少奇正把土地改革引到「富農路綫」的方向，主席已經發起了對他的批評，雖然他們爭吵的結果還沒來得及對農村產生影響。

她帶着惱怒繼續說：她在土地改革中扮演的角色，從來沒有正確地向公眾披露過。長年以來，她和其他一些領導人的公眾形象被用各種方式扭曲了。在無錫參加土改時，她的行動非常低調。然而，有些人暗中拍了一些她的照片，也許懷疑她的真實身份。當然這些人沒有經過批准就拍攝她的照片是錯誤的。無論如何，這些後來發現的照片可以作為她參加農村革命的有力物證。她從褐色的包裝紙裹抖出兩張當時的照片。由於年代久遠，照片已經發黃變脆了。一張是在打穀，另一張是在耕田的照片。雖然她不允許在中國公開這兩張照片，但我可以刊登第2張照片，證明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樣犁田耕地。還有一些後來非正式拍攝的照片，包括文革時期的，當然未經批准的拍攝是不對的。這些照片現在不能公開。

然後她以正式口脗講述了女性角色的變化：「婦女在中國

所有的革命鬥爭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是你已知道的五四運動（1919年）和一二九運動（1935年），還包括整個抗日戰爭（1931至1945年）和解放戰爭（1946至1949年）。在這些革命鬥爭中，婦女的作用十分重要，她們不僅是戰場上的鬥士，還是前綫部隊的後勤支持者。有些村莊的大部份工作都由婦女完成。

「到今天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52年，我去另一個農村完成土改的第二階段，那裏的男人都在茶館裏賭錢打發時間，而讓婦女們幹所有的活。女人叫他們回家時，這些男人對她們不是打就是罵。不過，耕田還是不讓婦女幹，所以我自己去耕田了。那個地方曾經是國民黨政府的模範縣。現在婦女既可以耕田，也可以參與任何一種工作了。

「不要只看到今天取得的進步。雖然婦女在工業、農業、教育和其他部門佔據了重要位置，甚至在諸如國防這樣的要害部門也有了女性的參與，但現在仍然存在一些落後的方面，你也要好好看看。」

2

說到國際事務，這是江青相當關注和感興趣的領域，她控訴了針對新中國的第一輪「外國侵略」，包括美國入侵與中國接壤的朝鮮。她說：1950年10月1日，美國越過三八綫，逼近中國境內的鴨綠江和圖們河，並發動了攻擊。為了動員全國人民保衛祖國，毛主席發出「抗美援朝」的號召，寫了一篇「保家衛國」的文章，這個題目成為一條大眾標語。10月19日（正式是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支援北朝鮮。到1951年6月10日，中國人民已將美國傀儡部隊趕回了三八綫以南。1953年7月27日，美帝國主義被迫簽訂停火協議。

戰爭一共持續了3年零一個月。簽訂停火協議後，與美國侵略者打了2年零九個月仗的中國志願軍繼續留在朝鮮。據她提供

的數據，敵軍有110萬人，其中54萬是美軍，52萬是韓國傀儡部隊，另外48000人來自其他國家。中國援助北朝鮮共打了五大戰役，其中的四大戰役大量消滅了敵軍。只有第四次戰役，彭德懷違反了毛主席的命令而失利。

戰爭結束後，美國拒絕釋放朝鮮戰場被俘的中國軍人，把這些戰俘運到了台灣，而中方則釋放了美軍戰俘，把他們送回美國。

台灣局勢是一個長期的麻煩。朝鮮戰爭爆發前，美國就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但看看他們幹了些什麼！她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無論如何，我們一定會解放台灣的。」她接着又唸記在紙上的戰果：中方在朝鮮戰場上取得了「輝煌勝利」，109萬3800名傷亡士兵中有40萬是美軍，39萬7千人是敵方的其他部隊。中國人民志願軍共繳獲了一萬架飛機、560艘炮艇以及3000多輛坦克。她說，這些數字顯示了正義和非正義戰爭之間的區別，正義在中國和北朝鮮這一方。中國人民志願軍帶着毛主席「珍惜朝鮮的一山一草一木」的指示出國，他們也是這樣做的。

說到朝鮮戰爭，她不止一次地說：「艾森豪威爾將軍其實很偉大」。他競選總統時允諾要結束朝鮮戰爭，當選後的確這樣做了。中國和鄰國很尊重他，雖然只達成了一份停火協議，但他的動機很真誠。

戰爭將結束時，中國人民將抗美援朝的所有軍用物資都無償捐獻給了朝鮮人民，還派去了無數中國人幫助他們重建家園。為什麼呢？因為朝鮮與中國是唇齒相依的關係，中國人民讚賞朝鮮人民願意保衛自己，所以也慷慨地援助朝鮮人民。

在中國國內，通過媒體、電影和藝術表演方式有力地喚醒了中國民眾對戰爭威脅的意識。她指出，有個革命樣板戲「奇襲白虎團」就是以朝鮮戰爭為背景的，目前正在修改中[48]。我下次再來

48 她的助手告訴我修改是為了淡化其極端反美色彩。他們指的是把美國兵一律刻劃為絕對的「壞蛋」，江青認為這樣不好，尤其在中美關係改善期間。

中國時應該看看這部京劇。

為了從中國人的角度看朝鮮戰爭，她安排我第二天上午去看一部電影紀錄片《平原游擊隊》。她提醒說，這部電影還有不足之處，不過倒還有趣。

1950年10月，主席的長子毛岸英在朝鮮戰場上犧牲了，這對他們的生活造成很深刻的影響。第二年1月，她和毛主席一起離開北京搬到一個比較輕鬆的環境居住，他們可以在那裏休息、寫作、看電影。她發現有些電影必須先經她審查（她已經步入領導文化革命的第一個階段）。

3

作為1930年代的電影人，江青在解放後不久就重新回到了老本行，主要負責電影審查，她對全國電影業掌控的權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1950年代早期，中國的電影產業、電影資料以及國際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掌握在獨立的電影公司手裏。儘管在全國範圍內都已建立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地位，要致力於推進無產階級藝術，電影公司卻仍然在拍攝不同種類的故事片，翻版1920和30年代的電影作品，那是一個戰火紛飛、但又百花齊放的年代。直到黨中央發動「建設社會主義」的電影宣傳攻勢前，電影一直是城市裏最流行的娛樂方式。

1930年代早期，共產黨就已經在上海地下文藝圈內開始爭取電影界的支持和忠誠。1937年夏，日本進攻這座城市時，一些勇敢的電影人帶着攝影設備經過艱苦跋涉到了延安。在那裏，他們拍攝農村革命實踐的紀錄片（很有藝術水平，基調也是支持共產黨的），外部世界還很少有這方面的電影資料。上海還有一些人才飛到香港，在艱苦的環境下拍攝戰爭紀錄片和愛國故事片。同時，國民黨政府在北京、長春和上海設立了電影公司，一直運行

到其統治結束。1945年日本投降，信仰共產主義的電影人接管了長春的日本電影公司。此後十多年，這裏的日本專業電影人才與中國合作者一起製作了一批不涉及政治敏感題材的電影。共產黨政權繼承了日本的電影設備，也接管了原國民黨控制的私營電影公司。

解放後不久，黨中央在宣傳部下設了電影處，制定了宏偉的電影製作計劃。為了成功地體現蘇聯開創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風格[49]——當時的中蘇關係還是友好的，就意味着要在新作品中壓制中國電影人經過多年探索才形成的個人風格；還要取締那些衝擊中國市場的、宣傳「外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江青這樣說）的外國電影，主要是美國電影。對於純粹的無產階級領導人來說，最惡劣的就是這些有毒的外國電影的廣泛流行（這些電影倒是從來沒有停止過誘惑純粹的無產者江青同志）。

她所面對的問題是，在沒有同志們協助支持的情況下，如何在社會主義的劇烈變革中拍攝出擁有廣大農民觀眾的電影。她毫不懷疑30年代娛樂和教育了上海市民的電影會動搖現時觀眾的意識形態，這些觀眾是以農民為主體的全國人民。社會變革禁止拜祭祖先、地方宗族以及帶政治目的的流行戲劇和宗教。這樣一來，農民群眾就出現了意識形態的真空，很容易被影響。只要中國資產階級電影和外國電影還存在，資本主義核心價值的個人主義、溫情主義和物質主義就會影響黨對變革的努力，而變革絕對是建設社會主義必需的。

江青被任命主管電影處之後，要在這樣一個歷史轉折點，實現用電影藝術重塑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建立現代新觀念。她的決心更堅定，行動步伐也加快了。滿清政府倒台還不到半個世紀，仍給現代社會留下豐富的歷史話題。對清朝衰敗和滅亡的評價，

49 斯大林的文化代表日丹諾夫把這個源於蘇聯的詞解釋為「了解生活是為了在藝術作品中真實地再現生活，不要書生氣地和呆板地刻劃生活，或把它描寫成『一成不變的現實』，而要在革命的發展中展現它」。

也可以檢驗現時人們的政治取向。有關滿清滅亡的故事講述了各種事件：狂熱的義和拳運動，陰險的慈禧太后，阿諛奉承的太監和恣意妄為的八旗子弟，幾乎摧毀滿清王朝的八國聯軍入侵紫禁城，以及聲名狼藉、又被視為愛國的交際花賽金花。在江青看來，那個時期最具煽動性的，莫過於香港電影《清宮秘史》（根據姚莘農的話劇《清宮怨》改編）。這部電影引發的爭論焦點是，慈禧太后鎮壓義和拳運動是愛國的（因為此舉避免了外國對中國的佔領），還是賣國的（因為她代表封建統治階級鎮壓了無產階級的義和拳運動）。

第一次看完電影《清宮秘史》，就引起了江青很大的不安。她說：劉少奇看完這部電影後說是「愛國的」。毛主席則反駁說是「賣國的」。劉少奇及其支持者爭辯說，八國聯軍在滿清末期入侵中國是正確的，但毛主席不會屈從這種觀點[50]。電影編劇十分狡猾，劇本觸及的是政治上似是而非的事件，但她並沒有說明自己最憎惡什麼。

江青沒有再深入研究這部電影的背景和情節（也許是以為我和其他人都看過這部電影）。然而，這讓我們知道中國統治者在重新解讀歷史題材的大眾娛樂作品：讚揚統治者的被表揚，觸犯他們的則遭譴責，有時候還要處死作者。《清宮秘史》的主要人物是既不被人民愛戴、也不被後世歷史學家讚揚的慈禧太后。她和她輝煌的王朝試圖繼續保持絢爛的皇家生活時，不得不面對不斷增加的內亂，外國入侵，民主主義的抬頭。從姚莘農的刻劃中可以看出，慈禧很喜歡奇花異草，喜歡看戲（她那奢侈的露天戲台現今仍矗立在皇宮裏），對技術新奇的攝影也很感興趣。但在人際關係方面，她的脾氣很不好。年輕皇帝的好意，卻遭到慈禧和大太監李蓮英的恐嚇——李蓮英是個惡毒的、善於阿諛奉承的

50 從更廣泛的意識形態範疇看，這樣的說詞可以看作是劉少奇和毛澤東「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爭論的焦點是，是否所有歷史事件和表現它們的藝術都要從階級鬥爭（毛的觀點）的角度加以評判。

傢伙。最後，滿族王爺們和仇恨外國的義和拳聯合起來。危機最嚴峻的時候，慈禧太后甚至準備和叛亂者劃地分治來挽救自己。後來，她轉變態度站到了鎮壓者一邊。

處於權力頂端的慈禧太后和珍妃之間的緊張關係引發了激烈衝突。慈禧認識到真正威脅她專制的是珍妃，而不是很容易控制的皇帝。所以，她必須阻止珍妃獲得對皇帝的控制權。這部電影證明一個革命領導人可能不願意在人民面前展示的歷史公理：權力的繼承控制在女人手裏。

1949年，香港中文報業協會把這部電影評為年度最佳電影，香港民眾向來都很喜歡有關過去宮廷奢華和秘史的故事。雖然共產黨政府在新中國早期禁止了這部作品的舞台演出，但電影還是在中國的狂熱觀眾中廣泛流傳開來，直到江青出面制止。

僅僅電影審查並不足以說清這個故事，也不能消除中央領導人之間的分歧。1954年製作了名為《光緒皇帝和珍妃》的紹興戲，演員全部是女性。以後的3年裏，上海、南京和杭州分別將它改編成地方戲。1957年，劉少奇當政期間，原來的話劇又重新進入北京，並且名列官方的「優秀劇目」榜上，意思是這樣的戲劇不僅很好，還是學習的模範。

1957年至1958年，在毛主席發起的反右運動中，姚莘農作品的所有改編版本都遭到批判和禁演。1962年京劇版本曾經短暫演出過，但在次年又遭到了壓制。1967年文革高峰時，姚文元攻擊這部電影，公開地批判了周揚和其他保存這部電影的人。戚本禹，江青領導的文革小組成員之一，不僅批判了這部電影，還批判了支持它的劉少奇。1967年5月，毛澤東再次指示在全國範圍內放映這部電影，但這次是作為「反面教材」。每一次放映都伴隨着強大的宣傳攻勢，分析批判這部電影的政治錯誤。

江青繼續說：圍繞着《清宮秘史》的爭論所以重要，不僅因為電影本身，更因為關係到文化政策的大問題。解放後禁止引

進香港電影，但不久文化部就無視規定，允許香港電影公司繼續向中國市場傾銷「極端腐敗」的電影，演的都是穿着牛仔褲的牛仔。江青以習慣的馬克思方式分析：《清宮秘史》的根本問題在於它是由一家資本主義電影公司製作的（香港昆侖公司）。掌管中國電影事務的當權人物認為，只要內容不是那麼露骨的反動電影就是好的，這種想法太「天真」了。

回憶針對這部電影的第一個行動，江青說：一看完這部電影就在家裏召開了一次包括文化官員、作家和歷史學家的會議。這樣，他們能共同決定應該繼續放映，供人民群眾觀看呢，還是立刻禁止這部電影。但參加會議的人似乎都不清楚繼續放映這部電影帶來的危害。會議由江青的上司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主持。與會人員中有兩個她不認識的歷史學家。他們認為，不管這部由香港昆侖公司出品的電影有多少缺點，都應該在中國放映，因為這部電影是「愛國的」，從正面角度講述了「保衛國家」。她用冷漠的沉默回應了他們這種牽强附會的辯護。他們拒絕討論這部電影蘊涵的階級含義，這種態度激怒了她。然而，當時她還沒有自信可以立刻反對他們。陸定一咕噥了幾句，就宣佈這部電影的確是「愛國的」。她反擊說，這部電影是「賣國主義的！」有參加會議的人要她站起來批判陸定一及其支持者。於是，她就大聲重複道：「這部電影是賣國主義的！」

會議結束前，她指示那兩個歷史學家寫一篇批判這部電影的文章。此後，她還聯繫他們，看看他們寫了些什麼。但他們說文章寫出來了，在共產黨歷史學家胡喬木那裏，他說寫得不好。找不到專業歷史學家來完成她的事業，江青就親自處理這件事，禁止發行這部電影。

1950年和1951年製作了大量電影，也舉行了無數電影節。她仍舊看電影，也批判了很多電影。最讓人惱火的，是以朝鮮戰爭為背景的《英雄兒女》。在她以電影處名義揭露這部電影的多處

錯誤後，那些參與制作的人「未能逃脫厄運」。一個電影製作人被發現是個「反革命」，另一個是「黨內的叛徒」，製作這部電影的公司以前也是被「叛徒」掌握着的。她還揪出了文化部副部長周揚，發現他在上海電影公司時有問題。她指出，一部以朝鮮戰爭為主題的電影，一定會對中國和兄弟國家朝鮮的關係帶來政治影響。這種影響絕對不允許是負面的。她說要麼拍成革命的，要麼就禁止它。

她說道：周揚虛偽地點頭表示贊同，但卻我行我素。江青回家後還不能確定他會怎麼做。不久以後，她就給在電影公司的周揚打電話，讓他修改電影。他做出了及時的讓步，以非常大的代價對電影做出一些修改。陳伯達和胡喬木與周揚一直有聯繫，打來長途電話告訴她，《英雄兒女》的確已經修改過了。他們問她為什麼不再親自看看呢。厭煩了前前後後的反復修改，她完全沒有興趣觀賞他們修改後的作品。

討論到50年代早期的電影審查時，丁玲的名字再次出現。那時候，剛剛以描寫土地改革的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榮獲1952年斯大林獎的丁玲是個焦點人物。她是好幾個文化管理委員會的成員，也是中國最權威的《文藝報》主編，按照以後的眼光看，這份刊物在政治上享有很大的自由度。江青關於丁玲的評論與丁玲的文學作品或文學地位並沒有什麼關係，只是把丁玲看作一名政治上的異端。（這樣的定性讓人懷疑丁玲和其他類似被當權人物批判的人，有一天人民和國家會重新給他們做出評定）

江青說道：幾年前，主席和他的支持者就認定周揚和丁玲屬於黨外小集團。1950年代末期丁玲「走錯誤路綫」的時候，她就「投靠了敵人」（敵人指的是國民黨及其文學代言人）。也有些人懷疑丁玲是不是真的國民黨「特務」，不過他們並沒有證據。1930年代丁玲曾師從魯迅，但魯迅顯然並沒有提到過她是個叛徒。至少胡風、蕭軍和其他與丁玲有來往的作家煞費苦心地「給

自己戴上了革命的假面具」。他們的小團體思想可以追溯到延安文藝座談會（1942年）時期，那時丁玲、胡風、蕭軍及其追隨者就已經「脫離了群眾」。當時，黨中央領導人就已經看到這些作家在搞「小集團」，10年後越來越明顯，這些人最後終於蛻變成了徹頭徹尾的小集團。

1950年代早期，丁玲習慣得到允許才寫作[51]。當丁玲察覺到江青與周揚之間的矛盾以後，為了討好主席夫人（據江青推測），丁玲接近江青主動提出寫幾篇批判周揚以及他在電影審查上錯誤立場的文章。江青當時是這樣告訴丁玲的：這麼深刻的矛盾是不可能單靠你的筆解決的。江青在我們的採訪中還說道：只給丁玲和其他人一次迎頭痛擊不會奏效！

4

江青說：1951年和1952年，主席實在太忙，根本沒有時間觀看和評價太多電影，她自己的工作也比較忙，不可能隨時都關注主席在幹什麼或者陪同他出去。電影批判並不是她「真正的工作」，她所描述的真正工作，是通過「勸說」讓地主和資產階級意識到在土改階段需要完成的工作。她諷刺地說：不管提出什麼建議，當時沒有一個人聽她的。

儘管如此，在那些日子裏，她去農村視察了兩次，都是匿名低調進行的。儘管有些領導同志認出她是江青，但對於人民群眾來說她只是李進，這是她的原名。這兩次視察雖有不同，但都與土改問題有關。第一次視察持續了8個月，目的是要調查19世紀臭名昭著的、從乞丐變成教育家的武訓的歷史背景；第二次視察進行了3個月，主要是了解土改完成情況。

51 為了生活去做影子寫手。40年代以後，中國的領導人開始僱傭寫作高手為他們的政治觀點作有說服力的闡述。多年來，陳伯達和姚文元（還有其他人）就用本名或假名為毛澤東和江青起草文章。

江青說：1950年12月電影《武訓傳》首次上映時是在全國範圍內放映的。為揭露這部電影蘊藏的政治含義，她寫了一份有關其背景的報告，還寫了一篇文章總結她的發現。她的文章一發表就「瓦解了敵人的武裝」，這部電影立即被禁止發行和放映。以後人民群眾就再也不會看見這部電影了，只有特定的人員才能觀看。然而，這篇文章還只是一場嚴厲調查的開始。

江青並沒有清楚地說明《武訓傳》的細節，只是說《武訓傳》從表面上看是一個簡單的士大夫成功的故事。武訓實現了從窮苦人到統治階層的跳躍，雖然在那個時代這樣的跳躍也不是沒可能，但還是非常驚人的。他如何做到這一點，已經吸引了過去一個多世紀思想領袖的分析，而江青是第一個從馬克思主義角度進行批判的。

儘管在她告訴我這些事情之前，有關武訓事件的真相並沒有被公開，但武訓的傳奇在中國是一個婦孺皆知的故事。我所得知的簡單信息是這樣的：武訓，1838年出生於山東堂邑縣武莊村，是家裏6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家裏很窮。父母很早就過世了，他不得不靠乞討為生。但他並沒有把討來的錢用光，而是盡可能地攢下來。他把這些微薄的錢當作資本存放在地主和高利貸者那裏收利息，後來還親自倒賣土地。50歲的時候，他終於達成自己的畢生目標，效仿那些滿族貴族：以自己的名字開辦了一所給窮人家孩子提供免費教育的學校。1889年，他在柳林縣開辦了第一所學校，離武莊村不遠；後來在館陶縣開辦了第二所學校。在他臨死那年，在臨清鎮開辦了第三所，這三所學校都在山東。

對武訓不尋常的個案，反應不一：舊的統治階級對一個窮人以他們（地主和貴族）為榜樣開辦學校的行為感到高興。改良派吹捧他促進了窮人教育的發展，既有儒家精神，又有民主含義。直到江青表明立場前，共產黨的反應其實是很遲鈍的。她爭辯說：對武訓的繼續崇拜很危險，因為他的行為不利於現在國家的

責任，那就是推翻地主階級，埋葬孔家店，駁倒改良派（從共產黨的角度說，就是相當於像劉少奇這樣的修正主義者）宣揚教育可以化解階級矛盾、取得社會和政治勝利的謬論。在她看來，武訓背叛了無產階級，與儒家沆瀣一氣，還帶有一定的資本主義色彩。

江青對武訓的興趣，源於用最現代的電影手法描寫他一生的傳奇故事。這部電影是解放前夕由中國動作片電影公司拍的（由在美國學習的孫瑜導演），周揚和夏衍負責最後製作，江青反對他們所用的方式。當時沒有人認真對待她的意見。儘管她沒有足夠的能力阻止他們製作這部電影，但至少會考慮授意別人寫一篇文章批判這部電影的改良主義思想。此後，她會見了文化部副部長周揚，並向他提出了這個建議。他對這個想法嗤之以鼻，告訴她：「我可以接受一點改良主義色彩。」

「那就繼續你的改良主義去吧！」她衝他喊道，當着他的面砰地一聲關上門揚長而去。

她不得不用自己的方式來處理這件事。首先，她搜集了所能找到的有關武訓背景的材料，然後起草了一份建議書。她說，當時「有些高級領導同志」（她並沒有提到具體名字）還在讚揚武訓。她是唯一提出自己反對意見，並寫信和文章公開闡述的人。她把自己的文章整理後交給主席。主席對她的行為表示不贊同。他們爭吵後，她轉身走開。接下來的數天，她都待在自己的房間裏。主席一定是發覺她總不露面有點奇怪，最後在書房找到她，面前堆滿了書本和寫作材料。主席冷淡地說：「看來你還在弄這個。」

不管主席怎麼說都不能使她放棄努力。不久，她邀請了2個可以信任的理論家陳伯達和胡喬木來自己的住所討論武訓問題。她提醒他們注意這部電影所犯的意識形態錯誤，尤其是美化了地主階級的形象，過份宣揚將教育作為取得成功的階梯。這樣的觀點肯定會影響觀眾。

周揚很快就察覺到了她的行動，包括見了哪些人以及在她授

意下寫了哪些文章。周揚開始故意給她製造難題，迫使她決定是繼續留在北京幹這件事呢，還是離開北京去別的地方工作。

這樣，1951年春末，她做好了準備，去山東西部追查武訓故事的根源。她的故鄉也是山東，所以在那個地方交流是沒有問題的。毛主席反對她去，反對她公開去做這樣的事情，所以她在整個行程中說自己叫李進。無論如何，肯定不會有人記得她童年的名字，行動也會更自由一些。她很自豪地說，自己是第一個到那裏做調查的領導同志。

周揚得知了她的計劃——儘管對此不屑一顧，仍派出了自己的秘書（也是政治作家）鍾惦棐跟着她，假裝充當助手。《人民日報》也派遣記者袁水拍隨行，主要負責給北京當局提交調查報告。調查行動剛開始時，她一般還是很信任這 2 個人的，但很快就意識到鍾惦棐是被派來阻撓她計劃的「右傾主義者」。

他們 3 人以及隨行人員坐火車到了山東西部。在堂邑縣換了一輛吉普車。突然來到一個不同氣候的地方使他們都患上感冒，又是鼻涕，又是眼淚。江青配了點盤尼西林治療喉嚨痛。感冒還可以忍受，不能忍受的是這些本來應該協助她調查的人，卻成為最不願意聽她話的人。如不是她固執地堅持，他們根本不會聽從。

在堂邑縣，他們受到地方黨委書記段俊卿的接待，這個人是出了名的武訓倡導者。他根本不知道她的真實身份，很快他倆就對展現在群眾面前的武訓形象展開爭論。她試圖說服他相信，對這樣一個人的持續崇拜，最終會毀掉黨和國家。段書記終於接受了她的觀點，同意合作，並開始為她提供相關信息。

段書記告訴她，在過去20年裏，有一個很有權勢的地主組織的小團體，在鼓吹武訓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她接觸到這個地主秘密武裝團體的成員。當得知這個地主的兒子也參與其中時，她就叫段書記進行了特別的調查，然後把結果轉交給她。這個老地主擁有的武裝數量比革命芭蕾舞《白毛女》裏那個臭名昭著的地主

黃世仁還多。一旦掌握了這個地主強大勢力的動態，她知道一定還有其他同夥潛伏起來了，這些人都在警惕地保衛過去的特權。

在工作進行的時候，突然又出現了另外2個調查組，一個來自河北省，另一個來自平原省[52]，她不能確定是誰派來的。袁水拍和其他本來應該協助她的人不讓這些小組取得資料，把他們看成競爭對手。但江青反對獨佔信息，願意與他們分享自己的發現，也想依靠本地廣大群眾收集有關地主階級的情報。她的小組勢頭越來越大，河北小組和平原小組失去了興趣，轉到其他地方。

她說：在工作中嚴格地執行毛主席關於科學調查的指示。還在北京時就主動研究了山東的人文地理。到山東後繼續研究，走訪當地的很多群眾，還一絲不苟地記錄這些人的姓名、年齡、職業和有關武訓的回憶。武訓一生的歷史背景漸漸清晰了。

江青派袁水拍去臨清，在那裏待了2天後，袁給她打電話說沒發現任何有關武訓與地主階級有關聯的新東西。江青感到很失望，督促他加倍努力，不久就親自到臨清接管這項任務。她用李進的名字給鎮和縣黨委做演講，盡可能地給他們分析「武訓精神」的潛在危害。她的演講感動了這些人，也許是出於害怕，他們加入了江青的工作，發誓要挖出歷史根源。

她指示鍾惦棐和袁水拍繼續留在臨清，自己到了附近的寬縣。在那裏待了幾個星期，從其他角度調查武訓的歷史。

調查從夏天持續到秋初，長時間的調查損害了她的身體，她的健康狀況本來就不好。她不時地感到一陣陣頭暈，但仍沒放棄查個水落石出的決心。

有一天，袁水拍從臨清打電話告訴她，發現一本地方志，記載着武訓擁有土地。終於找到了武訓是地主的證據，使她非常激動，命令袁水拍立刻把書送到寬縣，拍了照片，給歷史學家郭沫若送去一張。郭在北京一直關注着他們的調查，而且願意接受採訪。

52　1949年由河南和山東的一部份組成，1952年撤銷，以前的省界得以恢復。

在重構武訓生活背景時，江青能夠感受到（她所稱的）他的哀傷，這是以往的評論中沒有涉及到的。仿效社會上層人物，他也沉湎於美色，有好幾個情人。其中一個還活到現在，並願意與調查組會面。

為了了解武訓的動機，他們試圖查明他的階級出身以及後來的階級變化。雖然出身窮苦，但他長大後卻成為一個「地主階級的忠實走狗」。他們還將他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來分析。例如，1888年，武訓在柳林鎮建立第一所武訓學校。柳林曾經是最繁榮的城鎮之一，但在那個年頭，到處都不安寧，柳林也有幾千農民發動起義，而這卻沒有体現在他的事業裏。一個本地人宋景詩就是這次起義的領袖，也指揮着其他農民起義隊伍。黑旗軍在這裏很活躍，太平天國領袖李開芳曾率領部隊路過這裏，但拒絕支持這些當地農民起義——他們只讚揚地主階級！武訓本人也沒有參加過任何農民暴動。後來的傳記總是用最諂媚的語言來刻劃武訓，實際上只是根據不切實際的記敍。有些被採訪的老農民還記得他的外號「武豆沫」，因為令人厭惡的長相，嘴上經常流着口水，象徵着他的貪婪。

在江青看來，武訓最根本的錯誤是所有精力都用到了傳統教育上，以為只要有幾所學校，一切就好辦了。根據對柳林學校的調查，雖然學校是免費的，但並不對最窮苦的人們開放。一些中農的小孩可以入學，但貧農和長工的孩子仍不被接受。這樣，只有中農的孩子能够掌握基本的讀寫，從而改變生活狀況。統治階級的辯護者有意忽略了這些事實。武訓死後，柳林的地方官員將他建立的學校改名為武訓中學，以此紀念他，還樹立了華麗的牌坊。這都是出於統治階級利益的需要。

經過在山東8個多月的調查，江青寫出了一系列報告，提交給主席審定。她的每一篇文章，主席都做了修改。她補充說：實際上，一些關於武訓的文章從頭到尾就是主席自己寫的。

調查過程中，《人民日報》逐日發表了他們的報告。他們採訪了許多還記得19世紀末這段歷史的老人，還頻繁地召開群眾大會。採訪這些老人並不容易，1951年，武訓學校當年的學生都已70多歲高齡，甚至有百歲老人。年紀最大的老人沒有接受過革命的新思想，對江青及其同志們盤問的動機表示懷疑，指控他們的追問是代表看不起窮人的「上等人」。她很嚴肅地說：他們的報告出來並被廣泛傳閱以後，有些從未動搖過對武訓忠誠的老人感到很羞愧，以前讚揚過武訓的中央領導人也覺得羞恥。以前强烈反對她戳穿武訓神話的文化部副部長周揚甚至不得不做公開的自我批評。

5

1951年9月結束了武訓調查後，江青返回北京。但不知疲倦的她又決定，去農村再次參加正處於高潮的土改運動。基於她最近取得的成績，這次主席表示了支持。但其他一些人仍然反對她與人民群眾直接接觸。周揚又在主要領導人中挑起一場爭論，爭論焦點是應不應該讓她去。最後她取得了勝利，參加了一個包括部份領導人的小組，政治局委員、經濟學家李先念也是小組成員之一。他們坐的火車到了武漢火車站後，突然命令江青帶着保鏢下車，其他人繼續前往農村地區。這樣的歧視讓她很生氣，但她什麼也不能做。被她看作是支持者的李先念留在了長江南面的武昌。

她想通過正常方式參加土地革命的真誠意圖遭到了重重阻礙。在她的工作小組裏，除了自己，就是保鏢，這樣的成員組成也太奇怪了[53]。按照上級指示，她的小組不允許跨出武漢範圍活動，也不允許和農民住在一起，甚至連接近農民也不行，但最後她爭取到一次例外。那些不希望人民群眾知道她真實身份的人迫使她不得不再次匿名，稱自己為李進。她帶着保鏢剛在武漢附近

53 工作組的組成一般要考慮政治、社會和地域的平衡，通常包括知識份子、學生、政府人員、地方官員和其他地區有經驗的官員。

的一座農村小鎮安頓下來，中南局就派出安全人員。這個新來的保鏢是個看起來很難纏的女人，帶着手槍寸步不離地跟着江青。這就嚴重地妨礙了她的工作。有一次，江青去拜訪一個農民家庭，人還沒坐穩，那個女保鏢就嚴肅地說：「那個農民有病！」在江青看來，這只是一個讓她離開的詭計，所以把這個保鏢趕了出去，自己繼續訪問。

有一次，她想和一個剛加入民兵的養牛婦女交談。剛一開始說話，那個女保鏢就直直地站到了兩人中間。江青憤怒地看着她說：「作為一個保鏢，你是我的下屬，還是我的上級啊？你現在把我和群眾隔離起來了！」

江青接着說：這個女人的伎倆很高明。只能推測是強烈反對整個計劃的周揚教給她這些詭計。這個女人曾告訴江青應該吃得好些，實際上是她自己想吃好的，所以就希望江青給她們要些好東西吃。這個女人最喜歡油膩食物，但江青是決不吃這類東西的。為了吃飯的事，江青特意規定每次只供應適當的菜量。這讓女保鏢非常憤怒，後來就讓她的丈夫特別準備飯菜送來。

在一起這麼長時間，這個保鏢一直不知道李進同志的真實身份。只有江青自己從北京帶來的保鏢才知道。雖然離武漢很近，但這個地方還是一塊文化荒漠，人口也很少。解放 2 年多來，這片廣闊而潮濕的土地上還潛伏着逃犯、土匪和「流氓團夥」。現在說起來可能很難使人相信，國民黨統治時期這個地方還是「模範縣」，實際上卻十分落後，這裏的群眾頑固地對抗着土改動員。當江青和她的小組開始追究那些舊社會的壓迫者時，發現自己沒有實施逮捕的權力。要拘捕一個人，他們首先要通過合法渠道提出控告，這個手續很麻煩。在整個工作中，他們始終堅持只「觸及」（顯然是消滅）那些殺過人的地主。

毛主席和黨中央已下定了決心，在進行土改過程中，工作組的重心要放在「三座大山」上（封建主義、官僚主義和帝國主

義），他們也遵循了主席的指示。在農村主要的敵人就是封建地主階級，但他們只懲處那些最惡劣的凶手和罪犯，放其他人一條活路。貧下中農構成了主要力量，與中農結成聯盟，實際上中農也逃脫了懲處。對於富農來說，允許他們保留一部份自己耕作的土地，但抓了那些依靠剝削別人為生的富農。為證實這些話，江青從一堆文件裏找出了一張《土地改革法》的複印件，1950年6月30日公布實施。江青瀏覽了一遍，便開始大聲朗讀起來。

土地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揪出當地的惡霸，這些人往往也是當地地主階級的核心人物。一般規律是在他周圍還有許多小地主，他們佔有的土地分布相當廣。江青的工作組決定將工作重心放在佔8-20%的最惡劣的地主惡霸身上。其中有一個被當地群眾取外號叫「痘瘡秦」的。地主的權力是通過秘密會社實施的。雖然這些人扮演「秘密」角色，但他們戴的不同顏色的臂章出賣了真實身份，使他們很容易成為土豪和殺人凶手的替罪羊，即土地改革要消滅的對象。

江青小組從外圍着手，慢慢地集中到剝削人民最殘酷的那些地主惡霸，並把他們送上正義的審判台。所有步驟都是依據《土地改革法》進行的。毛主席和黨中央規定只有省一級政府才有權處決這些人（對此，她沒有說得太清楚）。人民法院將犯罪的地主惡霸的處罰權交給當地農民，由他們來決定給予什麼樣的懲處。江青興奮地回憶到，看到廣大群眾憤怒地站起來的情景尤其震撼。如果人民的情緒和憤怒失控，她的小組還要介入保護這些地主惡霸不當場被打死，不得不經常召來民兵幫助他們控制局面，避免群眾對這些被拉上台審判的剝削者實施暴力。有一次，審判失去了控制，她和小組成員努力在惡霸和群眾之間起到緩衝作用，結果遭到了攻擊，憤怒的群眾威脅要把他們撕成碎片。

群眾情緒得到控制後，工作組把惡霸抓起來帶到人民法庭，並在那裏宣判死刑。如果他們做得好，行刑的場面會讓群眾情緒

高漲。她永遠不會忘記土改中一幕幕的悲喜劇——宣佈惡霸名單、發動群眾、法庭宣判和公開行刑。

她平靜了一下繼續說：在這一次又一次的騷亂之中，當地人民從來不知道她和其他小組成員究竟是什麼人。因為他們帶着武器，所以有些人推測他們顯然是政府官員。但她的身份仍然讓這些人迷惑。因為她帶了一個相機，且經常用來拍照，有些農民猜測她是個專業攝影師。既然有攝影師，那麼推測其他人至少是縣級幹部。江青解釋，要了解農民的想法，必須知道在農民有限的知識裏，縣級就是他們所知道的最高級別官員了。他們把小組其他成員認定是縣級幹部，對江青也就更尊敬了。

揪出並處決當地惡霸，接下來才是土地分配。江青所經歷的這兩個階段分別持續了10到12天左右。土地分配開始時，工作組負責劃分階級成份，劃分出地主、富農和中農。成份的劃分決定了分配土地的具體標準。每一個地方都有不同的社會情況，所以土地改革法也依據具體情況而具體運用。

她在武漢工作時，聽到有報告說，另一個地區的區縣政府錯誤地將富農劃分為地主、將中農劃分為富農。雖然那些負責同志的出發點是好的，但階級成份劃分的錯誤造成了擴大打擊目標的負面影響。在江青工作的地方，對於限制不必要的暴力最理性。在初步調查結束後，她召集當地幹部詢問他們制定的工作原則和步驟。他們回答說，要把佔當地總人口的16-20%的人劃為地主和富農。她說，打擊目標太廣泛了。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爭論不休。

他們為了增加可供分配的土地，說服中農也把土地捐出來供政府分配。但中農擁有土地的數量一般很少，不足以影響土地分配。她在爭吵中沒法建立自己的權威，所以就給省委打電話。打電話時，她有意讓幾個當地幹部站在旁邊聽。她在電話中說，這樣不負責任地擴大打擊目標，擾亂了黨的政策。必須停止剝奪中農土地的錯誤政策！

困難接踵而來。1951年11月，一場寒流襲擊華中地區。雖然，她總是穿着毛皮外套和厚重的夾克，但天氣還是冷得令她不停發抖，嘴唇都凍紫了。她定期向主席匯報，知道情況後，毛主席派人送來她留在北京的大衣，但她不敢穿，因為大衣獨特的手工和質地可能會讓人們看出她的真實身份。

她每天晚上冷得睡不着覺，只能睡兩、三個小時，而且咳嗽引發了支氣管炎。李先念知道了就叫她到武昌看病，她照做了，可是醫生開的藥沒有什麼效果。她回到農村後不久，李先念就派人送來一車木炭。此後，保鏢每晚給她整夜整夜燃着炭火取暖。她很感激李先念送來的木炭，但咳嗽仍然沒有治愈。為了完成任務，每天都得連續工作好幾個小時，使她筋疲力盡。然而，當地人對這種惡劣氣候比較適應。有些農民見她精神萎靡，還奚落她：「你以為你是誰啊？」她感到很委屈，不過還是堅持兩面鬥爭：對外與地主鬥爭，對內與自己鬥爭。

雖然身體很虛弱，但江青和她的小組還是將土改推進到土地分配階段。階級劃分完成後，就開始分配土地和其他財產。地主知道後非常驚恐，採用一些可笑的伎倆妄圖保留自己的財產。他們把衣服長袍全都穿在身上，看起來很滑稽，走路都走不動！不僅是地主，所有人的想法都跟不上形勢。記得有一個長工自己沒有衣服穿，當分了一床被子和一件長袍給他時，還不敢接受，心理上仍然害怕那些地主。當然，農民也可以很貪婪，除了衣服，還有床、被褥和傢具都拿來分配。第一次分配時，那些從未曾擁有過這些財物的窮苦農民紛紛爭奪。

她質問一個長工：「你自己用不着，為什麼要拿這麼多被子？」她不得不向這些人耐心解釋：大部份人都是單身漢（太窮了，娶不起媳婦），相對於有家庭的窮苦農民來說，他們所需的家用物品要少一些，很多家庭連張床都沒有。她的一部份任務是教育農民要「心胸開闊」。

土地分配還出現了其他問題。有些農民拒絕接受水稻田，也不願意要可能遭水淹或其他災害的田地。所以她還得勸他們，說水田的收成會更好。把分散在遠處的地分給同一個家庭會造成爭議，肥沃的土地分得不均也會引起爭吵。當要給牧民分配住房時碰到了奇怪的難題。這些游牧者以前從來沒有住過房子，不知道這些房子有什麼用處。起初，連政治積極份子也表現得很頑固，誰都不願拿別人家的東西。直到每個人都有了新的政治思想，才敢拿走這些東西。分配家畜和農具時也是問題多多。這些都是農民急需的物資，她所在的村子只有一、兩頭水牛供分配。在土改的這個階段，她重溫社會主義理論，認識到理論和實踐的根本任務就是要把農民組織起來。下一階段的任務就是在民主基礎上建立新的地方政府。

江青看到農民的情緒已被極大的激發起來，已不再是原先的農民，巨大的社會變革，令他們無比激動，充滿了烏托邦的希望。她沒敢參加當地土改最後階段的全體會議（因為害怕暴徒？）。工作組離開時，當地群眾敲鑼打鼓歡送他們。送別人群中有一個寡婦，在土改中打破傳統，成為一名政治積極份子。她走到江青身旁，感激的淚水滾滾而下，江青自己也哭了。後來在一份有關地方選舉的報告中，江青得知這個寡婦被選為當地農業合作社的負責人。就任時，她向群眾交代曾加入過一個秘密社團。在和江青一起工作的日子裏，她從來沒有告訴過江青這些事情。難以置信（可能懷疑這個寡婦還繼續在為這個秘密社團服務），江青說道。

完成土改任務後，江青帶着工作組返回湖北省會城市武漢，做工作總結。土地改革並不總是公正的：出現的偏差反映了負責幹部的不同政治取向。那些左傾幹部劃了太多的地主，而右傾幹部劃得又太少，使很多地主成漏網之魚。幾乎所有土改小組都遇到如何劃分和對待中農的問題。在武漢舉行的最後評議中，其他地

區代表詢問江青如何正確對待中農。地方黨委領導人都匯報說，當地群眾都相信「不觸犯中農利益」的政策得到了確實的貫徹。

隨後，他們在漢口稍事停留，當時主管農村事務的是鄧子恢。儘管名義上是林彪主管中南局，但在整個土地改革的過程中，林彪顯然沒有做過任何事！

第九次黨代會（1969年召開，會上江青和林彪夫人葉群成為唯一進入政治局的兩個女性）召開後，葉群決定要「找麻煩」（江青的原話）。葉群宣稱她在土改運動中曾下到基層工作過，這完全是假的。而且，葉群還說江青參加土改的地方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當葉群說這些話的時候，江青竭力克制自己的怒火，但馬上向政治局提交一份正式批評葉群錯誤言論的報告。

必須承認，江青參加土地革命的武漢周邊地區抗拒變革最嚴重。她再次提到國民黨把那裏稱作模範縣是多麼荒唐。以共產黨的標準看，這是一個無比落後的地區。舊的習俗和反動政治基礎很難動搖，甚至在解放後國民黨仍潛伏在這個地區，對婦女和青年進行肆無忌憚的迫害，幾乎人人賭博，到處是土匪。就連工人也是頑固的反動份子。她認識一個工人，把自己的腿摔斷，只是為了逃避工作。

她在那個「模範縣」的時候，發現老虎的傳言引起很大恐慌，但當地沒有一個人敢向政府報告。因此，她親自在村子巡邏，告訴大家拿起棍棒，組織起來。一個有月光的夜晚，她躺在床上，一聲吼叫劃破了天空。保鏢們立刻起身，緊張地四處巡查。「沒有什麼好擔心的」，她安撫他們。不過，現在她承認保鏢的步槍是抵擋不住一頭老虎的。

那時候，有一個地方幹部差點被老虎吃掉。一天，他在巡邏時想抄近路，走上一條雜草叢生的小路，突然聽到身邊傳來老虎的怒吼聲。「我的頭髮都豎起來了，」他後來說，因為知道手上的那把槍不可能抵擋老虎。幸運的是，他走的路邊長滿灌木叢。

如果是在空曠的大路上，老虎遇到人最容易引起恐慌，而對人發起攻擊。江青說，自己在走什麼路的選擇上總是很明智，「你看我就沒被老虎吃掉！」

6

新中國成立之初，江青參加土地革命的經歷，使她有機會參與另一社會領域的革命：制定「婚姻法」。她說：1950年5月通過的《婚姻法》主要目標是保護婦女，但推行起來卻相當困難。每個地區各種年齡層的人，甚至包括法律的首要受益者——年輕人，都在抵制這部法律的推行，經常發展到暴力抗法的程度。

在工作過的地方發生了一起流血事件，讓她記憶深刻。村民在水塘裏發現一具男人的屍體，雙手被反綁在背後。打撈上來後，屍體已腫脹得無法辨認。顯然，他不是淹死，而是被打死後扔進水裏的。在驚恐的村民中很快就傳開了這個人被鬼殺死的故事。

這一事件的神秘，促使江青決定收集所有相關的信息。通過一系列調查，得知村裏有個女人和丈夫關係惡劣，「癩頭」，她是這樣稱呼丈夫的。《婚姻法》通過後，她向「癩頭」提出離婚要求，但他置之不理。沒有其他辦法，她和情人想自己來爭取公正。他們抓住她的丈夫將他打死。從水塘裏撈上來的屍體就是這個女人的丈夫，也許是為了轉移視綫，她就編造了鬼殺人的故事。

掌握了這麼多信息，江青帶着工作組安排與這個女人見面，她的情人也在場。這個女人滿不在乎地承認與情人一起把丈夫打死。在工作組鼓勵下，她娓娓道出細節，3個當事人的階級背景逐漸浮現：這個女人和丈夫都是窮苦的工人階級，她的情人是個長工，3個人都很年輕。她有2個孩子，其中一個還在繈褓中。她的丈夫以前當過兵，解放後復員了。丈夫沒有了收入，家裏窮得揭不開鍋。交待罪行後，年輕的女人受到審判。江青不以為然地說：這個女人從頭到尾「表現得像個小孩子，好像自己什麼也

沒做錯一樣」。她和情人都被判處死刑。

江青繼續說：他們的情況在當時很典型，全國各地都發生過這樣的案例。根源就在於舊的婚姻制度。如果一方不滿意，要求解除婚姻關係，另一方很可能會拒絕，也不會同意按照新規定執行。法律不能順利推行的地方往往會發生自殺或謀殺。

這一案件結束後，江青拜訪了地方幹部，提醒他沒有關注百姓的生命，沒有認真宣傳新的婚姻法。他辯解說，推行這部法律難度太大，「沒人關心婦女」。當地群眾只想把這兩個人槍斃！那些利用公眾輿論保護「死亡婚姻」的人也應該受到譴責。老一輩人就最不情願接受《婚姻法》以及法律賦予的離婚權。後來省政府被勸服，改判這個女人及其情人死緩，強制在本村勞動改造，但沒人願意負責監管這個女人！

在同一個村子裏，還有一個帶着小孩的寡婦。聽說這個寡婦染上了瘧疾和急性肺炎，想到她可能需要幫助，江青想去看看她。但隨從和保鏢都不讓她去，害怕江青被傳染。江青沒有理會他們，還是去了。江青看到這個女人眼睛黯淡無光，呼吸也幾乎聽不見。在這一片死寂中，唯一的聲音就是孩子們在院子裏嚎哭。江青把自己所有的西藥都給了她。這個寡婦服了兩、三天就恢復了，重新回到社會。有生以來第一次，這個寡婦開始關注村裏的政治事務，成為一名積極份子。她的任務是監管被判處死緩的殺人犯。

江青說：對於普遍存在的婚姻問題，農村地區舊習難改，甚至在《婚姻法》實施後，很多地區的婚姻還是與幾百年來一樣，仍由父母和媒人包辦。這種習俗相當古老陳舊，代價也非常昂貴。男方必須給女方或女方家庭很多財物，包括自行車、手錶、收音機或其他彩禮。新娘要穿上新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坐着轎子出嫁，還要宴請無數客人。社會主義社會不能忍受這樣的浪費，她憤怒地聲稱。

對婦女來說，土改也不是靈丹妙藥。雖然《土地改革法》規定土地分配要實行男女平等，但並不意味着會被自動執行。婦女還不習慣行使自己的權利，被迫接受分給她們的較小塊或比較貧瘠的土地，大部份都毫無怨言。儘管政府堅持同工同酬原則，但農村婦女長期以來得到的都是不平等的酬勞，男人們不擇手段地保證自己得到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工資。一般來說，男人獨佔了農具，並拒絕與女性共享，她們也是有權使用農具的。還需要艱難的政治教育讓農村群眾允許婦女耕田。農村物質上的不平等要比城市嚴重，城市裏同工同酬原則實施情況要好得多。

江青再一次提醒說，決不能混淆理想和現實。中國婦女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10

北京與莫斯科

他們在看不見的地方忍受痛苦；

這就是他們所做的全部事情。

一條綳帶掩蓋了每個人生活的地方。

他對世界的認知局限於器械所給予的治療。

——W·H·奧登《外科病房》

江青重構了1950年代，當時她奔波於北京和莫斯科之間，有時以個人名義；有時又為了外交事務。從獨有的優勢中，她敏銳地察覺到政治潮流的趨勢：在醫學上的不同觀點，影響了蘇聯醫生為她準備的醫學報告，也影響了她的未來；蘇聯國內駭人聽聞的異議可能衝擊中國的革命理論；中國和蘇聯領導人之間的衝突日漸緊張，那些蘇聯領導人在宴會上的表現令人憎惡，不守信用；蘇聯一怒之下撤走了中國急需的技術人才和設備，最終導致了兩國關係的破裂。

這樣的劇變更加劇了她的憂慮。看到這些雄心勃勃的男人之間的競爭、不可調和的意識形態爭執和不可預測的權力衝突，必然會對自己的未來做一個推測。狡猾的蘇聯人會不會把她扣下來當人質？這難道和賀子珍的可怕遭遇沒有相似之處嗎？——賀在蘇聯待了這麼久一直說是在治療精神病，結果被送回來後也進了精神病院。她會不會成為另一個被拋棄的中國夫人？這些可能性無窮無盡，也難以想像。

1950年代，她的身份對於中國人和外國觀察家來說都是一個謎。很少人知道往返於中蘇之間時，她的政治問題和身體狀況一樣始終懸而未決。50年代初，她被剝奪了所有的重要職位，只能通過毛主席玩弄一下後宮政治，而主席使她從中南海的窗口看到整個世界的風暴中心。在一次次被迫流放蘇聯的日子裏，表面上過着高級官員生活，但沒有實際意義，她遠離蘇聯的權力、社會和文化中心。

不同於獨自在農村調查，也不同於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江青談到50年代中期，主要是闡述毛主席有關內政外交政策的預見。毫不出奇的是，主席的一舉一動將影響全國人民，江青對此已有了模糊的預感，此時中國人口已達6億。江青在關注自己健康恢復的同時，也在關注全國形勢。

1

江青接着講起在1951年冬天的傳奇經歷。從華中地區回到北京後，她發現中央領導人都在積極籌劃「三反運動」（反腐敗、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目的是改進日益壯大的幹部隊伍的工作方式。土地改革和婚姻改革結束後，她回到北京繼續以往的生活，被分配到一些新職位，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辦公廳秘書處處長。然而，這項工作的強度和壓力遠遠超過預期，使她的身體狀況愈益惡化，又開始發高燒，肝痛也開始不停地折磨她。

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和其他不懷好意的人都不願她參與中央權力，以不斷惡化的健康狀況為藉口，建議她辭去秘書處的工作，過平靜的退休生活。她向毛主席提起這些「建議」（從她的語氣看，顯然很不情願），而他竟然也贊同這些人的意見。在主席的調和下，那些領導人也理解她想繼續工作的願望。1951年末，她不僅放棄了秘書處工作，還辭去了宣傳部電影處處

長和中蘇友協的工作[54]。從此，她唯一的工作就是擔任毛主席的秘書，但就連這唯一的工作在決定她去莫斯科再次治療時也被迫放棄了。想到要再次離家，她感到非常苦悶，於是就一直拖延到1951年冬才動身前往蘇聯。那時候，三反運動也波及到城市醫院，國內醫療服務的混亂狀況使她別無選擇，只能出國接受治療。

在江青的記憶裏，莫斯科留下的主要印象就是自己的疾病。由於肝疼得厲害，蘇聯醫生直接給她做了肝部手術，但沒能減少膽囊積水。手術時採集了一些樣本做進一步診斷。經過一段治療後，江青再次被送到南方的雅爾塔（這次她沒有再次描述那裏的奢華）。為了退燒，醫生讓她服用大量的盤尼西林，一次的劑量有2000萬單位之多，這樣的數量和頻率讓她感覺更糟糕。連自己的身體都無權掌握，令她很傷心，但抗議也沒有用。

在雅爾塔乏味冗長的冬天，她越來越想家了，但醫生是不會允許她回中國的。據她推測，這些醫生把她留在那裏，是因為對沒能治好她感到羞愧。最後，他們終於把她送回莫斯科，安置在一家普通醫院，幸運的是後來又被轉移到克里姆林宮內富麗堂皇的宮廷醫院。她補充說，這家醫院是專供蘇聯政府高級官員使用的[55]。

斯大林逝世（1953年3月5日）前一天，她在郊區療養院從收音機裏聽到他中風的消息。其他病人，大多數是高級官員，也都

54 和政治徹底脫離，友協職務通常是重要人物象徵性的職務，不是實際的政治職務。談到蘇聯話題，江青有點離題。50年代初，中蘇友誼和文化交流是對外交往的最重要內容。中蘇友好大廈是當時北京最高的建築，裏面有一個劇院，完全是中國人自己出錢建造的。中蘇關係破裂後，中國人將其改名爲北京展覽館，沿用至今。

55 當時宮廷醫院負責治療江青的是一位醫術高明的女醫生。她治療江青膽囊和肝部疾病的方法之一是向膽囊中注射製劑以便提取膽液（在西方這樣的做法很少見）。江青的膽液是黑色的（快成結石了）。醫生告訴她，這種情況一般出現在肥胖或40歲左右的病人中。雖然她年近40，但她並不胖——江青的回憶喜怒交加。為了找出發燒原因，她還做了其他項目的檢測，比如肺結核（陰性，對她很重要，因為40年代有幾百萬中國人死於肺結核）。關於食道管的檢查，她繼續做了自己的分析——位於食管和胃之間的管道因為「門靜脈擴張」開始出血。她在宮廷醫院的治療最終收到效果，膽汁開始恢復正常色質。

全神貫注地收聽收音機，擔心他的去世會影響領導層結構以及自己的事業生涯。當收音機裏傳來斯大林逝世的沉痛消息時，接連好幾天，醫院的病人和醫護人員都陷在悲痛的情緒裏。在那場災難中，江青的兩位蘇聯保鏢和負責治療的醫護人員紛紛向她提供政治建議。這麼一件重大的事情，毛主席應該和世界其他領導人一起來莫斯科參加斯大林葬禮。她回答道：那不關我的事，這樣重大的事情由中共中央委員會來決定。

斯大林葬禮那天，莫斯科的氣溫降到零度以下。雖然毛主席捎來了唁函，但本人沒來參加葬禮[56]。雖然身體仍處在監護狀態，江青還是和療養院的其他病人一起為斯大林守靈。從窗戶中望出去，她看到葬禮隊伍正從療養院走向紅場。站在道路兩旁的人群情緒悲痛，她感到很吃驚。他們互相擠擠攘攘，表現得很「狂熱」。與毛主席的觀點相同，她這樣評論說：斯大林的失敗之處就是沒有讓群眾做好思想準備，接受他辭世的現實。

來參加斯大林葬禮的世界領導人裏，包括領導捷克斯洛伐克二月（7日）革命的哥特瓦爾德和波蘭領導人鮑列斯瓦夫·貝魯特。在來莫斯科參加葬禮前，哥特瓦爾德和鮑列斯瓦夫·貝魯特兩人的健康狀況都很好，但都死於莫斯科零度以下的氣候。她說：還有意大利共產黨領袖陶裏亞蒂和美國共產黨主席威廉·福斯特也死於這寒冷的天氣。她說了一連串稀奇古怪的錯誤[57]，但明確地暗示毛主席逃脫了斯大林葬禮致命的傳染病。

雖然她第二次訪問蘇聯的時間持續了將近一年，從1952年冬一直到1953年秋，但基本不可能了解到任何有關這個國家的事

---

56 信由周恩來親自遞交。他率領一個代表團前來吊唁，并且是唯一的非蘇方的護柩人。周恩來在葬禮上的出現開啓了中蘇兄弟關係的新時期，并被赫魯曉夫1954年9月的訪華推到頂峰。（見弗朗茲.舒爾曼的《世界力量的邏輯》，紐約，1974，247）

57 哥特瓦爾德死於1953年3月14日，其他人還健在：貝魯特活到1956年3月12日；福斯特活到1961年9月1日；陶裏亞蒂活到1964年8月21日。

情，因為所有的中國人都被與蘇聯人民隔離開來[58]。文化活動更是不可能，她沒有任何其他的娛樂。

她所能看到的只限於中國外交使節送來的文件，所能接觸到的人主要是那些俄國醫生，護士和保鏢。雖然這些人看起來比較像「金錢至上主義者」，但基本上還是「好人」。有一個俄國護士曾告訴她著名作家兼編輯康斯坦丁·西蒙諾夫不僅有豐厚的版稅收入，還有擔任政府部長的薪水，是個「百萬富翁」，他的夫人戴的都是華美的珠寶。江青說：那個護士自己也戴着珠寶。她問到這一點，這個護士回答說，戴不戴珠寶只是個人喜好，不應該包含什麼政治意義。那個護士還聽說，有人曾經給蘇聯的雜志《文藝報》寫信揭發西蒙諾夫家族的物質主義。但這個問題太敏感，牽扯面也太大，所以《文藝報》不敢刊登這些信件。

錢對這些她在蘇聯接觸的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這讓她感覺十分不安。江青和隨從人員接觸的蘇聯政府官員在提供正常服務時還索要禮物和小費。這裏的消費品明顯極端匱乏。她說道：這要歸咎於那些領導人，因為他們沒有提供精神激勵，來制止人民群眾的貪婪。

儘管1953年中蘇關係還比較友好，但她已經開始感覺到一股敵意的暗流。既然官方對中國人民和蘇聯人民之間的接觸「皺眉頭」，所以當她身體恢復到可以出門時盡量不隨便與人交往。有一天，她很驚訝地聽到附近在演奏中國國歌。有一個俄國人，大概不知道她的真實身份，很友好地走近，讓她代問候毛主席和其他中國同志。這個人剛說完這些話，就衝上來一個特工把他抓走了。

江青繼續說：1950年代早期的蘇聯，在文化上崇美尚歐的程度已經超出了大部份中國領導人的認識。這裏的人民看起來似乎還活在「貴族」的魔力下。所謂貴族，就是說法語，而不說俄

58 實際上，在結束於1960年秋的中蘇友好期間，數以千計的中國學生、科學家、技術人員和蘇聯有著廣泛的文化交流。雖然他們通常聚居在一起，但他們可以買到戲院的票，也可以比在國內購買到更多的報刊書籍。

語，矯情地培養歐式習慣，非常注重個人儀表。她住的那些高級的醫院和療養院就是專門為這些貴族服務的，很多這樣的人在新政權裏都已經成為有權勢的高級官員。有些人無所事事，就批評她打扮得太普通了，或者批評她沒有跟上最新的潮流。

就連這裏的普通人也比中國的群眾更在意風格和色彩。有一天，她從醫院的窗戶凝視着外面的街道，注意到一個戴着一頂淺綠色帽子的女人，帽子與她穿的衣服並不匹配，還有很多男人也戴着綠色的帽子。有些人全身上下穿戴的都是綠色。她和其他病人談論到處是一片綠色，有個人狡猾地回答：「難道你不知道綠色是今年的流行色嗎？」各種各樣的女人都化妝，但化妝品不適合她，因為這不是革命的。她補充道：但她絕對不予置評。

終於有些病人注意到她穿的不是標準的病號裝，她穿的衣服剪裁和顏色都有些與眾不同，實際上她衣服的顏色和街上流行的顏色差不多，但卻是斯大林親自命令為她特製的。斯大林注意到醫院統一發放的病號服，她穿起來太大，因為她比一般俄羅斯人都要瘦小。這些斯大林親自下令製作的病號服也是用他最喜歡的綠色。她微笑着說：這一來，那些人不僅羡慕她的深綠色，還羡慕她的瘦小呢。

1953年6月15日，當毛主席向政治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綫」（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她還在蘇聯過着苦悶的日子，通過外交信函才獲悉這個消息。但直到秋末才被允許回國。幾乎整整一年的時間，那些著名的蘇聯醫生仍沒能治愈她。

回到北京後，她仍然被腹部的劇痛折磨着，疼得連路都走不動。中國醫生發現她的白血球數量高得不正常（這一點被那些蘇聯專家忽略了）。新的檢查表明她的膽囊、肝臟和腎仍然存在病變。

江青斷斷續續講述病史時[59]，不時向坐在身後的兩個醫生核實

59 毛澤東認爲對健康的關注有著階級色彩，他對自己的許多不適都會隱瞞。他在1964年1月24日「談醫療衛生」中說：「中國的醫療體系是摹仿蘇聯的。我不能完全聽醫生的話。我只聽他們一半意見，另一半他們要聽我的。如果每一件

細節。他們對她講的都點頭贊同，有時會再詳細闡述。她繼續說道：她的肝臟在胸腔下擴張了兩指寬，抽掉了部份腹部積水後情況才好轉一些。通過特殊的食物療法減輕了肝臟管道的炎症。可怕的病史告訴她，有些醫藥治療不好的病症可以通過食物治愈。她以權威口吻講了更多的此類建議。

2

她回憶說，從1953年冬一直到1958年是生命中最困難的一段時期，大部份時間都臥病在床，病情時好時壞。她還講述了這5年內兩次去蘇聯治病的經歷。

1953年冬天，她的「辦公室」就是中南海的臥室，辦公桌就是帶靠背的床，冬天太冷還加了床被子。在這裏的幾個月，她做的工作比以前一年做的還多。她閱讀大量的書籍，主要集中於「我們和階級敵人之間主要的政治鬥爭」，即「社會主義者和資本家之間的鬥爭」。從收到的信件、新書和藏書中，她選取供毛主席閱讀的材料，還向主席指出她認為是最突出的問題。主席坐在床邊上，她就為主席讀報、讀電報，讓他大體了解最新情況。她還寫報告研究一些至今還弄不清楚的問題。

1954年2月前一直在秘密調查的地區衝突公開化了，當時她還臥病在床。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召開，會上正式宣佈高崗和饒漱石（解放後，這兩人就一直分別控制着東北局和華東局）已結成反黨集團。會議還通過一項決議「加强黨內團結」。江青補充說：直到最近，她和主席才發現林彪也參與了高饒反黨集團，雖然當時還沒發現，但現在已有證據證明林彪與

事都聽醫生的，病情會加重，就不用生活了。我以前從沒聽說過高血壓和肝炎。如果一個人不鍛煉，只是吃好，穿好，住好，出門乘車，他一定會得很多病。對衣食住行過份關心是高級幹部得病的四個根本原因」（《毛澤東文集，1949－1968》2：325）

反黨集團的關聯。

同年2月，作家胡風發表了一份30多萬字的反黨陳情書。這份萬言書引發了各種反黨勢力對黨的猛烈攻擊。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阿壟、路翎和舒蕪紛紛寫信挑起激烈的意識形態戰爭。每篇誹謗文章一發表，江青馬上仔細閱讀，但長期病痛讓她無法讀完主席寫的所有批注。以後的幾個月裏，主席把自己寫的那些批注整理成文，作為1953年5月和6月發起反攻的武器。

雖然江青本人並沒有仔細研究胡風言論的實質，但還是值得在這裏簡要地評論，因為這是人民共和國作家和統治者之間長期衝突的中心。胡風，1903年出生於湖北，1920年代末，懷着對現代思想的渴求到日本留學。直到1934年，他一直在上海參與「左翼作家聯盟」工作，成為「魯迅派」的一員。儘管從未加入過共產黨，他卻自稱馬克思主義者，宣揚所謂「藝術家在創作中的主觀鬥爭精神比中央規定的宣揚階級鬥爭的形式更寶貴」。胡風和毛主席的矛盾可以追溯到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在座談會上，他代表上海作家團體（丁玲、肖軍、詩人艾青等人）堅持在文化上知識份子獨立於黨指導的思想。50年代早期，他和上海出版界重要人物保持着密切聯繫。1954年7月（也許是江青所說的1954年春）是黨和知識份子關係的平靜期。這時候，胡風給中央提交了一份長篇報告，指責中國現階段的思想貧乏是教條統治和「學院派馬克思主義」造成的，否認只有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闡述才是正統的。當然，他並不反對黨改造一些難以駕馭的個人，但對殘忍地鎮壓一切創造精神表示悲哀。

胡風在全國人民面前提出的實質問題，比共產黨在辯護中敢承認下來的還要深刻。他提出的問題會在醞釀成熟後再次爆發。共產黨能用處理經濟基礎（土地和勞力）的方法來處理上層建築問題（書籍和思想）嗎？有才華的作家，甚至那些過去的社會主義者會像地主一樣被釘上「階級敵人」的標籤消滅掉嗎？毛主席

的統治難道是如此極權主義，以至要剝奪作家耕種精神田園、表達自己思想的權利嗎？也許，文學領域也要像土地一樣被一塊塊分配給工人、農民和軍人，讓他們來耕種和收穫（如果思想也會生長的話）嗎？

從1955年1月開始，展開對象徵中國藝術完整性的胡風的徹底批判[60]，在蘇聯和東歐也存在着胡風式的人物。共產黨還集合了一批解放前就著名的重要作家，包括巴金、老舍、艾青和郭沫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信件和文章來批判以前的同事胡風。但對胡風「反革命」的控訴顯得很不合理，沒有證據證明他攻擊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或曾企圖顛覆共產黨政權。在黨的誘導下，胡風於1955年5月發表了一份自我批評，但遭到否定。下個月又查出一批胡風和朋友間的私人信件，並在《人民日報》和其他媒體上公開發表，同時刊登的還有官方的批判文章。接着，又對表達過相似思想獨立性的知識份子展開一場肅清行動，稱作「肅反運動」。

對這些年輕時曾崇拜過的文人羞辱性的審判，江青的講述保持意識形態的正統，不帶任何人道主義或情感。雖然沒有直接表達，但顯然她和毛主席關注的根本問題就是維護權力。她提到的反對毛主席文藝思想的文人，親蘇軍閥高崗、饒漱石，以及與蘇聯關係的惡化，同樣都是圍繞着對毛的權力的挑戰。

事實上，1954和1955年都被排除在決策圈外，她了解的只是中蘇最高領導人間的爭吵和撕毀協議，而對雙方的政策分歧知道得不多。當身體恢復到可以四處走動時，她小心地觀察蘇聯領導人仍往返於兩國之間，但訪問越來越不友好，也越來越沒有成效。

她說：赫魯曉夫（他從未在蘇聯見過她）對中國進行了 3 次訪問。第一次從1954年9月29日持續到10月2日，是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5 周年而來。第二次從1958年7月30日到8月3日，她

60 上海革委會的肖木用老套的措辭向我介紹胡風。用他的話說：「胡風很狡猾，多年來一直假意尊重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但那是虛假的崇拜。事實證明，他最終站出來誹謗主席的思想。他藏起皮鞭，用來鞭笞共產黨。」

不記得這次訪問有何特別的理由。最後一次訪問從1959年9月30日到10月4日，似乎是為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但赫魯曉夫的出席卻是尷尬的。

她與赫魯曉夫唯一的短暫會面是在1954年，他其餘兩次來訪時，江青都因病沒能見面。記得當時和其他領導人一起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國慶閱兵式和放禮花。一向注重禮儀的周恩來正要向赫魯曉夫介紹江青，毛主席突然站起來，走到江青身旁（他們幾乎從未在公共場合並肩出現過）陪她走開了。主席帶她走下城樓，在公眾視綫之外一起欣賞禮花，她很珍惜這段回憶。

她解釋說，這一姿態意義重大。主席決定不把她介紹給赫魯曉夫，表明早在1954年就厭惡這個粗魯的蘇聯領導人。毛也知道赫魯曉夫在背後嘲笑他們是「愛國黨」和「兒童團」。1959年9月，赫魯曉夫前往美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當眾脱掉一隻皮鞋，十分不雅觀。後來在中國也有相似舉動。在中國領導人為他舉行的一次宴會上，他侮蔑中國領導人是「好鬥的公雞」，還做了一些很不體面的行為，讓中國領導人記憶猶新。

1954年秋，她的身體在緩慢地逐步恢復，中國領導層內部發生了重大變化。在1954年9月15日召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上，毛主席做了開幕講話，指出共產黨是領導國家的核心力量，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理論基礎。在這次大會上，他當選為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這次會議還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

1950年通過《土地改革法》的5年後，主席再次回到農村問題上，認為實行新的組織模式，即成立合作社的時機成熟了。那年夏天，他開始發動農村群眾從半社會主義轉向完全社會主義的合作社運動。在新的合作社裏，每個社員所佔的分配份額完全由勞動貢獻決定。為了動員群眾完成這一個艱巨的變革，首先要讓地方領導人了解如何實現這一轉變。1955年7月31日，主席召開了一

次由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會議。在會上，主席針對建立合作社的問題講話。他也遭遇劉少奇及其追隨者的反對，主席把他們稱作右傾機會主義者。主席在這一問題上對劉少奇及其追隨者的不滿帶來更深遠的後果[61]。

為爭取人們支持合作社運動，毛主席在1955年9月[62]着手準備《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出版。他為最初 3 卷寫了前言和其中100多篇文章的注釋，書中收錄的文章都是從全國合作社運動的參與者中徵集來的，此時合作社運動勢頭正如火如荼。1955年10月4日至11日召開的中共七屆六中擴大會議上，主席分發了書中收錄的文章，其實在此之前已發給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代表了，主席還號召徵集更多文章。

收到更多文章後，12月底主席重新寫序、定稿。江青說：書的開宗明義第一篇《黨委書記帶頭，全體黨員共同推進合作化》是他最喜歡的一篇。他在序中表揚了王國藩合作社，河北省遵化縣的「窮棒子社」，王國藩合作社在3年裏從組織形式到生產方法都展示了艱苦奮鬥的優良品質。

《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在國家領導和經濟計劃的關鍵時刻出現，可被認做「兩條路綫鬥爭」的證據。主席為何編撰這樣一本書呢？江青解釋說：是1954年2月揭露的高崗和饒漱石反黨集團的陰謀活動，但高饒不是孤立的，有蘇聯修正主義者支持，事實上他們是合作者。有些在前台公開表演，有些在幕後

---

61 毛澤東說：「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總是埋怨別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和合作化高潮已經在一些地方出現，很快會席捲全國。這是一場包括農村5億人口的宏大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它有着巨大的世界性意義。」（《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北京，1956，1）

62 同月，江青一篇文章的標題是「農業要解決人民吃飯問題」發表在《實踐》雜誌（1955年9月10日）。她的文章鼓勵實行糧食配給。她用數字分析了配給要建立在個人需要上並根據不同年齡、性別、身體狀況的需求。

秘密行動。高崗的野心就是要成為國務院總理，國務院就是一個「蘇聯式建制」。

1956年1月25日，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交了1956年和1957年全國農業生產的14點計劃。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主席的評論《論無產階級專權的歷史經驗》，接着在12月29日《人民日報》又刊登了同一標題的另一篇評論，這兩篇評論都非常著名，江青說[63]。1958年4月25日至28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講了有關中國管治的《論十大關係》[64]。

1956年，北京想完全控制的文化事務突然上升到國際層次。東歐知識份子反共行動的消息會不會削弱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的權威？為了應付這一危機，主席召開了一次最高國務會議（1956年5月2日），並發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指示（號召言論自由，包括批評共產黨的自由）。9月15日至20日，在北京召開的第八屆全國黨代表大會上，主席在開幕式上的講話發出信號，一場運動將要來臨[65]。她說：國內階級敵人開始與蘇聯修正主義者相呼應。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事件激發國內階級敵人為各種西方謬論和反革命觀點辯護。百花齊放運動中很快出現大量此類文章、小說和其他文藝作品。其中最惡毒的包括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和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1956年冬天，

63 這篇社論有英文版，是對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罪行」和批判其「個人崇拜」的回應，也是對領袖問題和革命未來的反思。其中隱含著毛澤東要防止後來的繼承者歪曲他的歷史和群眾對他的個人崇拜。

64 文章在領導中傳閱，未正式發表。它對十個根本的社會關係做了辨正分析——城鄉、工農、中央地方等關係。毛澤東強調了對立因素之間平衡的需要，同時傾向於地方分權和地方自主，目的是糾正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失誤。第一個五年計劃遵循的是蘇聯模式，強調中央集權、官僚主義和工業優先。

65 月末，陸定一（宣傳部長、出版物的管理人、文藝界的權威）把毛主席要求的公開討論變成了全國性運動。陸定一公開肯定毛主席的觀點：中國的藝術和科學停滯不前，必須採取新的舉措——別忘了，文藝和科學思想是階級鬥爭工具。文化部的二把手周揚也支持對文化人士和其他人進行揭批的活動。過去的經歷支配着現在：江青忽視了周揚和陸定一的支持。十年後，江青對他們個人的厭惡和懷疑導致了他們在文革期間的垮台。

鍾惦棐以評論員名義發表了《電影的鑼鼓》（指社會主義電影缺乏票房價值），激起憤怒的聲討。然後，1957年2月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發表了一篇名為《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的文章。

這些險惡的文章在「1957年3月對黨發動的全面進攻」中萬箭齊發。知識份子發起的攻擊出現在全國各大城市的各種媒體上。主席對此進行了回應，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做了《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並於1957年6月18日用同樣的標題刊登出來。其目的是要強化階級分析，為回擊近幾個月來對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進攻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做準備。

1957年3月12日，主席在全國宣傳會議上講話，後來以小冊子形式公開。然後，在資產階級右派發動反黨進攻後，1957年4月27日黨中央正式宣佈發動針對他們的反右運動。5月，主席下達《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指示。6月8日講話又介紹了未來「社會主義教育」的主題。《人民日報》在當天和10日刊登了主席的評論《這是為什麼？》。這些評論是對右派反攻的開端，此後主席還寫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加快步伐》，使反攻擴大到全國範圍。

她繼續說：國際社會也能看見反右運動的熱潮。運動發生的原因不單單出現在中國，上一年發生的波蘭和匈牙利事件動搖了社會主義世界，也是原因之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發表了「六二六報告」，向成千人解釋反右運動與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之間的聯繫。周總理反駁一些外國社會主義政黨的無恥謬論，這些外國黨在中國國內的反映就是知識份子的反黨叛亂。報告後，毛主席處理了國內主要反對派別。1957年7月1日，主席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該批判〉。

最壞的情況過去後，江青和毛主席前往南京召開一系列會議，但盛夏的天氣讓人熱得實在受不了，他們只待了很短一段時間，就北上去了青島。那裏的天氣也很可怕。每個人，包括她自

己，都得了感冒。主席很擔心她的健康，堅持讓她回北京，於是她就回去了。

主席離開青島前，總結了1957年夏季之前的情況，提出了反右運動的理論基礎，草擬了將反右運動轉為全國性運動的策略。8月8日，中央委員會確定了江青所謂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5天後，這一運動和反右運動一起在全國範圍內展開。

群眾反應是很迅速的，在他們工作的地方、路過的地方都貼滿了大字報。媒體的主要內容也是在闡述主席講話的意義。首先在城市燃起的爭論之火蔓延到農村，「革命形勢一片大好。」

1957年末，主席第一次在國內的文化生活中贏得了優勢。但並不包括電影，電影製作仍然延續着1930年代的精神，雖然那種歷史條件已經很遙遠、也被人們遺忘了。她發現最惡劣的電影（儘管人們很喜歡這些電影）包括夏衍的《林家鋪子》（1959年）和《不夜城》[66]（1958年）。但直到文革，她才和這些電影的製作人清算完畢。她對這些電影感到很痛恨，因為「在政治上，他們試圖通過頌揚階級敵人來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上，他們試圖建立資本主義企業，在農村復辟私人經濟，破壞集體經濟。」

3

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揪出反黨份子的時候，江青再

66 《林家鋪子》是根據茅盾（沈雁冰）的同名小說改編。茅盾是與共產黨正統藝術思想不符的左派作家。他寫的故事發生在1932年1月28日日本對上海突然進攻時。主人公一商店的林老闆愛國，但不接受階級鬥爭理論。夏衍因將故事改編成電影而被指責為同情資產階級和反革命，沒有「反映工人、農民和戰士的生活」。夏衍自己檢討說：影片藝術上缺乏對「工人、農民、戰士」的歌頌，缺乏心理描寫、豐富的情節和令人信服的人物刻劃，沒有高潮和懸念。文革前，對《林家鋪子》的正式批判沒有發表。《不夜城》由柯靈創作。他是30年代初的劇作家和批評家。故事發生在上海的紡織廠，時間跨越了25年。他的電影在文革中被指控為突出「資產階級英雄」和「工業救國思想」——這把電影和受批判的劉少奇和其他修正主義份子聯繫在了一起。

次發病了，這次病得讓她完全起不了床，高燒不退、體重迅速下降，整個人變得異常消瘦。她的醫生都被召集來檢查病情，經婦科醫生檢查診斷她患上了子宮頸癌。

她回憶說：1955年再次被送往蘇聯接受身體檢查，後來證明這次出國檢查是沒用的。因為那時蘇聯醫生根本不相信什麼「細胞理論」，當然也就拒絕承認中國醫生在她出國前做出的診斷。直到1956年中國醫生才發現變異的細胞已經馬上要穿透子宮頸膜了。他們斷定可能的治療方法有兩種，一是手術治療，二是放射療法。由於此前的肝臟手術導致腹部組織粘連而疼痛，所以她不能再接受任何手術的折磨。這就只剩下放射療法了，實施過程用到了鐳和鈷60。鐳已讓她感覺很痛苦，而鈷60帶來的痛感更強烈、更難以忍受。她無法忍受這樣的治療，搞得醫生們也不知道該怎麼救治她，於是建議她再去一趟莫斯科，讓蘇聯醫生接手治療。雖然病得非常嚴重，但她無法接受再次遠離中國的建議，擔心不在中國時會發生什麼事情。她强烈抗議他們的建議，但那些完全不懂醫學的領導人橫加干涉，施加壓力讓她盡快啓程。毛主席和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安排了一個婦科醫生陪同她出國。沒辦法抵制集體決定，她屈服了，開始了第4次蘇聯之行。

她記得到達莫斯科時，身體已虛弱得難以支撐，高燒一直不退。她知道得了可怕的病，也知道治愈的希望很渺茫。醫院檢查她的身體狀況，以便決定是否接受她住院。結果，那些蘇聯醫生不願接受她住院，因為放射治療使得她的白血球數量迅速下降到只有3000，她的身體對於感染的抵抗力相當弱小。江青、她的婦科醫生和隨從們都十分怒憤，對蘇方說，只要醫院還有床位，就有責任收治她。他們讓步了，而且第一次允許中國醫生陪伴在病床左右。她控訴說：為了消除子宮頸癌細胞，醫院在治療過程中給她加大了鈷60的用量。她失去知覺，骨髓也受到損害。接下來給她輸血，但每次輸血都使她的高燒加重，於是整個治療計劃不

得不中止。

治療中斷後，蘇聯醫生認為，莫斯科郊區新鮮的空氣要比市區更有益於她的健康。於是把她送到了莫斯科郊區的一家療養院，顯然他們是不會再負責她的治療了。

那個冬天冷得刺骨，治療也很極端。療養院的醫護人員把她丟到零下20度的空氣中試圖「治愈」她的病。她身體的每一個毛孔馬上都迸出了汗珠；視覺也扭曲了：眼前的景象都模糊、變形了；兩條腿也站不穩。為了調理身體，她試着做一些輕微的鍛煉，但只靠意志力是不能阻止身體狀況惡化的。在她記憶裏，噩夢似的冬天過去後，到了春天，又從春天到了夏天。在長時間漫不經心的照料之後，醫生宣佈她患上了「軟骨病」。她不禁大笑起來，想起1930年代和40年代在山西北部的時候，很多同志都得了這種所謂的「軟骨病」，一般以為是身體缺碘和鈣造成的。但這次診斷她得了軟骨病，真正動機是找個藉口甩掉她、把她送回市區醫院。

市區的醫生給她使用最強大的治癌武器，一輪又一輪的鈷治療。大量地用藥嚴重惡化了她的身體狀況，以至於需要不間斷的輸氧。第 4 個療程時，她陷入昏迷。她清晰地記得一次次從昏迷中醒來，感覺到可怕的窒息以及死亡的逼近。

她一有了力氣就反復提出兩點要求：一是放棄鈷治療；二是送她回國。蘇聯醫療等級非常嚴格，基本上不可能在未得到上級批准的情況下，讓一個醫生或醫學教授來負責某一個病例。在還沒來得及找到另一個負責她病例的醫學教授前，她就陷入了另一次昏迷。當她戴着氧氣面罩再次甦醒過來時，覺得頭暈目眩，渾身都被汗水浸得濕透了，她急切地表示要回國，但沒人理她。她虛弱得沒法進食，身體繼續衰弱。醫生們對自己明顯的無能感到懊惱，又叫她回到郊區的療養院，撒手不管了。[67]

67 醫療界在蘇聯已經成了公眾醜聞的代名詞。對那些掌握蘇聯領袖命運的「白衣

她充滿感情地說：在那幾個月裏，毛主席知道她最想要的就是回國，也看了蘇聯醫生寫的詳細報告。當周總理被派到莫斯科與蘇聯政府談判時，來醫院看望她。周總理還傳達了主席的指示，要她繼續留在莫斯科，直到身體恢復為止。來醫院的時候，總理與醫護人員交談，查看醫學報告，以此來確定她的真實病情。當看到診斷書和照片時，對蘇聯醫生的治療，總理感到非常生氣。江青解釋說：當然，總理來蘇聯的主要任務是和赫魯曉夫談判。那些漫長沉悶的討論，讓他整個人看起來都變形了。

她見了總理非常高興，因為一直在努力跟上國內外的最新政治形勢，而總理可以告訴她很多這方面的信息。但在他看來，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有點別的消遣轉移注意力。一天，他帶了鮑羅廷夫人[68]和著名的京劇演員程硯秋（擅長演花旦）來醫院看望江青，他一直堅持要來看望江青，同行的還有其他人。因為還要應付赫魯曉夫，周總理並沒有一直待在醫院。為了讓她輕鬆一下，程硯秋表演了一出啞劇，既沒有遵循傳統的梅派（梅蘭芳，1893－1961，是一位著名的京劇表演藝術家，擅長演花旦），也沒有遵循他自己開創的程派創新風格。

他們相互談論熟知的人和開着政治玩笑，一直到深夜。大家都餓了，醫院沒有為她準備適於客人的飯菜，他們就離開醫院去別處吃飯。那天晚上，周總理帶着隨從怒氣衝衝地來到醫院，赫魯曉夫在談判中相當固執。總理對赫魯曉夫不聽勸說感到絕望。她沒什麼可以招待他們的東西，分配給她的俄羅斯食物、粗麵包、魚和鷄蛋也不够招待客人，這讓她感到尷尬，總理倒是毫不在意，還盡力讓她心情愉悅。實際上，他帶來了夫人鄧穎超寫給

殺手」的恐懼到處蔓延。1953年1月13日，出版了一本關於「差勁的間諜和刺客化妝成醫學教授」的小說。斯大林的死也被解釋成「醫生的陰謀」。很容易受蘇聯領導人擺布的江青當然知道政治醫療的風險。

68 鮑羅廷是共產國際的代表，1923年受孫中山邀請來到中國。從1923－1927年，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政治顧問。

她的一封信，但忘了交給她，無意中一路帶到了印度，回國後才想起來。

程硯秋是一個創新的演員，也許以後她會用到他。她說長期以來都在努力讓總理和主席保護他免遭敵人的迫害。1950年代末，他第一次遭攻擊時，總理試圖通過各種途徑保護他，但最終還是失敗了。1958年，程硯秋被「四大名旦」迫害致死。為什麼他們會迫害他呢？因為他的表演方式是新的，而競爭對手梅蘭芳的才是正統的。

江青說，待在蘇聯的時間越長，身體就越差。為了恢復血細胞的正常數量，她接受輸血。在與癌症作鬥爭前，她的血細胞數量還是很正常的，有24萬個，現在也是如此，但在放射治療過程中下降到只有七萬個。輸血後，她渾身發冷、四肢麻木，發現半個身子都動彈不得，這種半麻痹狀態嚇壞了蘇聯醫生。她的頭疼得感覺要爆炸，高燒也再次出現。她不斷請求回國，最後他們終於同意了。回國的飛行途中，她開始全身皮下出血。

4

由於時間隔得太久，江青只是粗略地評論了外交事務。她的第一句話是：中國不是一個富裕的國家，但中國仍拿出有限的資金支持受壓迫的民族和人民。主席經常教導國人，必須教會年輕人兩樣事情，因為年輕人最終要領導這個國家的：「不要像軍火販子一樣」，「不要指望人家報答」。中國領導人現在仍然遵循着這些原則，相信應該援助北越人民，因為他們在前綫作戰。如果北越人民不抗爭，那麼敵人就會進攻中國人民，對朝鮮也一樣。

她用厭惡的語調宣稱：赫魯曉夫的表現是另一回事。1955年9月，西德總理阿登納訪問蘇聯，赫魯曉夫對他說國際社會最大的問題是「黃禍」，指的是中國人，還要西德幫助他對付中國。她

繼續說：在中國革命過程中，蘇聯人並沒有提供多大幫助。朝鮮戰爭期間，斯大林借給他們3億美元貸款，但利息相當高。赫魯曉夫上台後，發生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中國人民迅速提供了幫助。

1959年秋，赫魯曉夫訪問中國，看上去是來慶祝中國國慶的，卻充滿了沉悶和背信棄義。訪問期間，赫魯曉夫宣佈撤回所有蘇聯專家，逼中國人償還所有債務。他的話讓人震驚，因為1950年代末是中國最困難的時期，而赫魯曉夫卻要讓中國人向他叩頭！他沒想到蘇聯撤回專家（1960年7月約有1300人）後，中國人民會勒緊褲帶站起來。而且，蘇聯人撤回人員和設備時並沒有遵照平等交易原則。他們要求在中國建立長波電台，如果得逞的話，蘇聯就可以控制中國的通訊系統。他們還提出建立一支聯合艦隊，主宰中國的水域、沿海和內陸。主席同意了前一項提議，但前提是中國自己出錢買這套系統。毛主席這樣告訴赫魯曉夫：「這是個原則問題。否則你就把一切都拿走。」[69]

她說：赫魯曉夫是個「大笨蛋」。對於他們的不滿，毛主席曾說過這麼一句話：「我們會到山裏去」。不過，赫魯曉夫蠢到聽不懂主席這句話的含義。他也不敢對他的敵人發動「突然襲擊」[70]。

蘇聯人與中國還有接觸的時候，掠奪了大量稀有礦石，其中就有鈦。這是她第一次去海南島調查時發現的[71]。在海南調查時，

69 赫魯曉夫回憶：「1959年是我們最後一次到中國。我們的討論很友好，卻沒有結果。其中在電台問題上，我說：毛澤東同志，我們出錢建電台，誰擁有電台並不重要，只要我們能使用它和我們的潛艇保持聯繫。我們願意把電台交給你們，但要盡快建設它。我們的艦隊正在太平洋活動，海參崴是主要基地。毛澤東同志，為什麼我們不能達成某種協議，讓我們的潛艇在你們國家有一個基地用來加油、維修、出航？」「最後一次，不行，我不想再提及這件事。」（赫魯曉夫回憶錄，472）。聯合艦隊的事就此了結。

70 江青指的是秘密地在中國製造麻煩或和毛的反對者聯合，就像赫魯曉夫被認爲與高崗、饒漱石、彭德懷所做的一樣。

71 這是1964年的事，她為了排演革命樣板戲《紅色娘子軍》到海南做背景調查。

她採訪了兩名抗戰老戰士，還拍了不少照片揭露1939年日軍佔領時期軍事行動的罪證。這個熱帶島嶼比她想像的要富饒和美麗得多。宋朝詩人蘇東坡也覺得這個島嶼非同一般，他和後來的浪漫派詩人把海南島稱作「天涯」。

有一天，她正在島上無人居住的地方轉悠拍照時，不小心摔進一個灰色粉狀的土堆裏。她很尷尬，連忙站起來拍掉身上的灰，問嚮導這種奇怪的物質是什麼東西。他們回答說是鈦。這顯然是一種稀有礦石，於是就盤問起來。一些島上居民告訴她，不久前來了一群俄羅斯人宣稱享有島上鈦礦石的所有權。島上居民堅持立場，堅決反對向蘇聯的要求讓步[72]。調查中，江青發現海南島擁有豐富的鈦資源。

對勃列日涅夫，她就沒那麼感興趣了。她草草地評論說，他的思想充斥着「謬論」。他的「有限主權論」可以稱為「社會帝國主義」，意味着欺凌別人的權利。蘇聯人認為只有他們才是愛國的政黨，而所有其他黨都只是他們的「兒子黨」。這是馬克思主義嗎？這樣的理論能在馬克思和列寧的言論中找到嗎？勃列日涅夫是「世界上最大的小丑」！自然，中國人民不會允諾給蘇聯人任何的援助。毛主席告訴中國人民要援助那些給自己援助的人。美國政府和修正主義的蘇聯政府都是為本國軍火工業的利益服務。要是沒有戰爭，這些軍火工業怎麼掙錢啊？

外交關係方面讓她想起曾經看過的一部有關中印邊境戰爭（1962年10月）的電影。電影講述的是一個印度士兵攢了些錢準備戰爭結束後返回印度的家。不知道什麼原因錢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不見了，這個士兵哭了。一個中國士兵找到錢，還給了他。

---

72 赫魯曉夫在回憶錄裏表示了對海南物產的興趣（江青也提到這件事），說：「一天，我們到了斯大林那裏，試圖想出在不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橡膠的情況下滿足我們橡膠工業需求的辦法，我建議可以讓毛允許我們在中國建立橡膠種植園來換取貸款和技術援助。我們給毛拍發電報說明此事。中方回答說：如果我們提供貸款，他們會讓我們在海南島建種植園。我們為此簽訂了協議。但後來我們看到在海南提供的地方太小，不能大規模種植，就放棄了這個想法。

這個印度士兵簡直是欣喜若狂。

她繼續說：赫魯曉夫就是挑起中印邊境戰爭的罪魁禍首，是他挑動印度人進攻中國來擴大印度領土的。他對印度人說中國不會反擊。他簡直錯到家了！當印度軍隊的考爾中將知道即將被俘虜的時候，僞裝成一個普通印度士兵逃跑。毫無疑問，要是中國堅持把這場戰爭打下去，肯定一路打到新德里去了。但是他們做出了另外的選擇，撤出軍隊，而且將在戰爭中俘虜的印度士兵和繳獲的武器歸還給了印度。她再次說：中國人知道很容易就可以一路打到新德里去。中印邊境戰爭使他們知道，儘管印度是一個剛獨立的國家，但印度人民還在遭受壓迫。印度人民與中國軍隊開戰，只是他們的領導人逼迫他們這樣做的。與她的父親尼赫魯一樣，甘地夫人也實行大國沙文主義。

江青繼續說：跟蘇聯的麻煩沒完沒了，後來又發生了珍寶島事件（1969年3月2日）。這場精彩戰鬥由一位叫孫玉國的20多歲年輕人指揮，這個年輕人「真知道如何打仗」。他的勇猛受到了嘉獎，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69年4月）。

為了舉例說明毛主席如何在有關蘇聯修正主義份子的問題上實行「民主」，江青說，蘇聯人辱罵中國人的時候，中國媒體公開了他們那些詛咒的語言，但蘇聯人卻從來不公開任何中國對他們的批評。尼克松總統訪問蘇聯的時候（1972年5月22日至29日），中國對此沒有表示反對，儘管當時美國政府正在對越南狂轟爛炸，但中國人還是保持了沉默。當然，他們認定尼克松是一個「反共老手」，不過，也是第一個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是他走出了恢復中美友誼的第一步。她半是嘲諷半是沮喪地說：在這件事情和其他問題上，他卻受到其美國同胞的批評[73]。

他們看到尼克松可以從根本上改變想法，以前他把中國看作「擴張主義者」，後來又認為中國是「閉關自守的」。他們需要

73 她是以中國標準在衡量這件事，因爲在中國沒有人可以公開批評毛澤東。

對他不斷變化着的外交政策保持警覺。如果毛主席對尼克松善變的風格不是感覺靈敏的話，怎麼會邀請尼克松以游客身份來中國呢？

在尼克松問題上，她在仇恨美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尊重尼克松這樣一位緩和兩國關係的領導人之間劃出一條清楚界線，保持政治正當性。對於我先前針對印度支那問題而攻擊美國外交政策的發言，她反駁說：如果尼克松沒有來中國，那麼你也來不了中國。

她的生活重心在公共事務領域，以及不可避免的與他們私人生活相關的領域。江青談到她和毛主席時說，他們一直過着簡單的生活。他們的大部份時間都在閱讀、研究時事、寫作，不時與外界接觸。她和毛主席極少一起出門，幾乎從來沒有一起出去吃過飯。自從在北京安頓下來後，他倆只去餐廳吃過幾次飯（她年輕時很喜歡）。她苦笑着承認：毛主席對吃不怎麼在意。主席吃飯很快，而且總是在最後一道菜端上來之前就已吃飽了。他甚至忘了最後還有一道菜沒上，等到菜上桌的時候，他已經一點興趣都沒有了。他的這一習慣讓她想起宋朝宰相王安石，這位宰相總是只吃那些擺在他手邊的菜，從來不注意擺在桌上的其他菜。當王安石的夫人告訴廚師，他只喜歡吃那些擺在手邊的菜時，廚師認為那是宰相喜歡吃的菜，不是因為擺得近。江青把這個故事講給主席聽，他輕輕笑了一聲，對她說：「你知道的歷史也就是這些了，你取笑我。」

11

夢回紅樓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皆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紅樓夢》

《紅樓夢》是一部18世紀的中國經典小說，但很少有西方人知道這部書。一代代中國人將這本小說讀上5遍、10遍甚至20遍，翻譯這部書也成為一種文學愛好，一個心智成熟的過程。江青對《紅樓夢》的評述顯示她精通這本小說，也預示了文革中她對文學和藝術顛覆性的重新評價。

如果一本小說生動地刻劃了一段自己不希望看見的過去，那麼其他朝代的締造者們可能會「焚書坑儒」。然而，共產黨領導人選擇和小說一起生活，並賦予它新的生命力。這可以在政治策略中找到原因。例如，把一部小說重新解釋成舊傳統不可分裂的部份，這比禁止這部小說的破壞性要小一些，不太可能招致人民的抗議。令人驚異的，是這部小說有着自我修正能力：那夢一般的敍述暗示了對被描述的社會體制的不信任、幻滅和懷疑。此外，主席和黨對他們的宣傳很有信心，認為可以引導人們批評從前的詮釋，然後從馬克思主義角度來閱讀這本小說，至少公開地討論。

為了理解江青對《紅樓夢》的評述，西方讀者可以瀏覽這部小說的大致情節，弄清小說的主要人物。小說裏所有人物都和貴

族賈家的兩大分支，寧國府和榮國府，有着各種關係[74]。

榮國府主人賈赦是賈家寡母的一個兒子，寧國府主人是賈敬，在他父親出家當道士後就開始主持家政。賈政是榮國府老爺的另一個兒子，他的兒子賈鏈娶了王熙鳳，一個很有能力和影響力的女人，不過後來在小說裏病死了。她的活動力體現在對付皇家護衛抄查賈府家產的時候。

賈政妻子王夫人生的兒子寶玉是小說主人公。家族寄托在寶玉身上的希望是用功讀書，然後參加科舉考試去當官。但這個具有藝術家氣質，又多愁善感的寶玉更願意與姐妹、女僕們混在一起。有一個表妹黛玉，從小就與他一起玩耍，他也很喜歡這個表妹。黛玉是個迷人的女孩，患有神經衰弱，是賈母的外孫女。另一個美麗的表姐寶釵也搬進了榮國府。她是寶玉的未婚妻，舉行婚禮的前一夜，黛玉心碎而死。寶玉與現實社會是如此不合，婚姻也沒有給寶釵帶來任何歡樂。最後，寶玉還是應考成功，但很快就了斷塵緣，出家做了和尚，拋下寶釵帶着他們唯一的兒子。

這樣簡短介紹自然免不了側重愛情，不過愛情其實只是小說中的一部份。小說人物豐富，且每一個都有自己的個性。這部小說所以能夠吸引讀者，就是因為展示了沒落貴族生活的絢爛和骯髒。這些18世紀有錢人追求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的一切誘惑恰恰就是倡導普通農民風格的共產黨領導人努力摒棄的：宗教神話和象徵主義；住在大觀園裏偶爾瞟一眼窮人；官場的腐敗；假公肥私；男女調情和赤裸裸的不正當性關係。

這部小說在超越社會背景的情況下，巧妙運用了抽象的對比：外部的絢爛和內部的腐化，縱欲和苦難，虛假和真實，現實世界和夢幻世界。精心構造的暗喻將這些對立的各方編織到了一起。

74 表面看來兩個家族生活在北方的北京，但經專家考證認為，真正的地點應該在南京。

1

1964年，毛澤東曾說過：「《紅樓夢》我已經讀過5遍了，但並沒有受它影響，因為我是當歷史來讀的。」在背誦了大段書中的傳說、玉石和宮殿的描述後，江青警告說：「不要把這部書只當故事來讀，而要當作一部有關階級鬥爭的歷史書。」

如同以歷史為題材的《清宮秘史》、《武訓傳》一樣，江青把自己描述成第一個提醒領導人和全國警惕那些歪曲《紅樓夢》的文學評論家。不過，在我們的談話中，她花幾個小時談書中故事、詩歌、傳說和歷史，倒並不完全是為了審查。她坦承，這是性格中不同的兩面又一次重合。藝術審查是其公職，要提醒主人警惕門口的危險，但在私人生活中，她又是這部作品的忠誠讀者。

江青興致勃勃地分析這部小說的作者和含義，這類複雜問題需要真正的專業知識[75]。雖然她背誦小說細節和介紹研究成果時過於興奮，或許是因為疲勞，出現了一些小錯誤，但她確實對新的研究和評論非常了解，對許多「紅學」流派的來龍去脈如數家珍。這幾小時的自言自語，在採訪結束一年後，被按照官方論調整理發表。

有關這部小說最初的問題，就是小說素材的根據以及最終版本完成的推斷。小說作者是一人還是多個？現存於世的手稿真實性有多大？小說在多大程度上真實反映了當時的歷史條件和人物性格？圍繞這些問題的爭論將是無休無止的，也許永遠不會有答案。

前8章的作者基本上肯定是曹雪芹（1715－1763年）。康熙年間，曹家在南京掌管皇家刺繡廠，非常富有，也很有影響力。康熙皇帝將清朝推向了輝煌的頂峰，不久就落到衰敗的邊緣。同樣，曹家失去了財富，也失去了皇帝的恩寵。小說中的賈家就是現實中的曹家。小說開頭是賈家被皇帝賜予兩個爵位，賈家美麗

75 至於指正江青的錯誤，我要感謝趙剛教授，他是全世界真正的紅學家之一。

的女兒是高貴的皇妃，賈家與朝廷關係密切。到了小說結局，賈家的財富幾乎已經散盡。

以馬克思主義觀點批評《紅樓夢》，始於新政治秩序建立的5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讀者還能看到這部小說以及其他文學、戲劇和電影作品。等到江青結束第二次蘇聯之行回國後，這部小說及其現代評論家們才被推到全國的審判台上，其間也出現某種警示。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蘇聯國內對非無產階級文學的壓制稍微放鬆，開始解凍。但對其危險的後果不能忽視，中國的異端份子開始膽大妄為起來。胡風狂妄地詆毀黨確定的標準，不就是預示知識份子自主性大潮洶湧而起的浪花嗎？不僅在文學中心上海，而且在首都北京，取消這種自由變得勢在必行。1953年寒冷的冬天，高崗和饒漱石這兩個享受了數年地方自治權的老同志，在政府結構和重大決策上挑戰毛主席的個人權威。1954年春天對高饒的公開批判也是一個嚴冬來臨的先兆。

2

江青說：因為沒有學過外語，所以接觸外國文學的渠道比較有限。但從她讀過的譯本來看，從分析人與人之間微妙關係的角度看，世界上18和19世紀的小說沒有一本能比得上《紅樓夢》那麼尖銳。

外國作家中，她尤其欣賞馬克・吐溫，一位意在揭露不公正社會狀況的「進步」作家。她繼續說：儘管如此，他筆下的主要人物都是小資產階級往上爬。狄根斯小說《孤星血淚》的主人公也是如此。還有司湯達《紅與黑》中的主人公于連已經爬到軍官了，丈人想給他買個貴族頭銜，還給了他一塊手錶和其他象徵資產階級身份的物品。無論這個往上爬的小資產階級主題多麼腐敗，並沒有影響她對司湯達的欣賞。

《紅與黑》這部書是「不朽的」，會在世界文學史上佔重要地位，因為它描述了19世紀早期歐洲的政治和經濟情況，還寫了政教鬥爭，寫得很複雜。像《紅樓夢》舊時的評論家一樣，一些法國修正主義評論家貶低了《紅與黑》的歷史意義，只把它看成一部愛情小說。至於司湯達，實際上是一個「無可救藥的反革命」。他出生在一個小鎮，也在那裏長大，但後來在為王朝服務時遊歷了整個歐洲。不過，他的人生經歷提升了這部小說的價值，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政治面貌。

她欣賞的另一部偉大小說是《金瓶梅》，寫的是發生在明代山東一個小鎮的故事。這個小鎮和她兒時所見所聞的那些地區商業中心大同小異。這部小說赤裸裸地描寫性關係，導致數世紀以來都禁止閱讀未經刪節的原版小說。她嚴厲地說：與傳統相反，她絕對不看經過刪節的版本。她不能容忍對文學作品任何形式的篡改。

1950年初，她出於政治需要第一次看完《紅樓夢》。談到這部書，江青說自己是半個紅學家。值得回顧的是有關這部小說無休無止爭論的背景，爭論中湧現了不屈不撓的小人物，使一些領導人多年來不得不面對他們。這一切都發生在1954年她回國後、身體逐漸康復的時候。在翻閱雜誌時，她無意中看到一篇山東大學學生發表在《文史哲》上的有關小說《紅樓夢》的文章。作者是兩個寂寂無名、但很有才華的學生，李希凡和藍翎。他們批評俞平伯教授不久前發表的《紅樓夢研究》。俞平伯的專長就是用「資產階級」思想解讀《紅樓夢》。她馬上將文章拿給毛主席，主席看完後也認為這篇文章很有價值，應該讓廣大讀者都知曉。主席讓她指示《人民日報》刊登李希凡的這篇文章（談話中，江青强調李希凡多於藍翎），編輯答應了。

她同時還開展調查，了解到李希凡起初把文章投給《文藝報》（上海出版的文學刊物，編輯包括胡風、丁玲等），被拒絕

發表。李希凡接着又投給《人民日報》，結果也被退稿。直到她以毛主席名義提出要求，《人民日報》編輯才同意發表這篇文章。《人民日報》最初拒絕發表李希凡文章，是因為迷信名人和仍然崇拜他們的文學教條。俞平伯和胡適屬於同一個派別[76]已不是什麼秘密。李希凡的文章擊中他們兩個「最薄弱環節」。但他們的權威早在1920年代就已經確立，到現在仍遍布着他們的影響力。這樣，李希凡代表的新學派，如果沒有她的介入，是永遠不可能在全國範圍內通行的。

身體還在逐漸恢復時，她專程去《人民日報》在北京的總部，安排宣傳李希凡文章。此後，她出席了中宣部的一次會議，把文章給周揚和胡喬木。他們掃了一眼，然後輕蔑地嘲諷說：「這是小人物寫的文章。這樣的小人物怎麼敢批評俞平伯呢？」江青聽了很生氣，但並沒有說出《人民日報》已同意刊登這篇文章。

根據她的調查，1954年10月16日，毛主席給政治局和其他政府部門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還專門開了一次會。江青參加了會議，清楚記得主席的講話。主席從理論上指出「資產階級大人物壓小人物」的錯誤。其實，這部小說的含義並不難領會，儘管俞平伯和胡適都是唯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但中宣部和文化部領導人周揚和陸定一長期以來崇拜胡適和俞平伯有關《紅樓夢》的研究。批判胡適和俞平伯會讓這些領導人丟臉。

俞平伯和胡適在1920年代研究這部小說時，壟斷了「16回本」和「80回脂硯齋本」，「群眾都看不到」。現在這兩個珍稀版本都由公眾信託機構保管，其他版本都做了影印。80回本的原本現保存在北京圖書館。有一次，她去北京圖書館借這個本子，

76 曾在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留學。胡適是民國時期最出色的自由主義者。1920年代早期，他和學生俞平白用嚴格的經驗論和其他現代手段考證《紅樓夢》歷史出處和文學意義，特別是證明此書基本是曹雪芹家世自傳，而不是對滿清王朝含沙射影的攻擊。胡適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人文主義和改良主義」，在他去台灣後遭到共產黨的詆毀。他走後，留下時任北大教授的俞平白獨自承受攻擊。

要求抄寫一本。一些「資產階級權威」知道後，把她臭罵了一頓。為什麼？因為他們自己想壟斷原本。

後來發表的評論的水平參差不齊。有一位當代評論家周汝昌寫了一本書叫《紅樓夢新證》。雖然與胡適派的觀點相近，但他有一個好處，是使用了清朝檔案。除了論證方法上的一些瑕疵，這本書還是值得讀的。文革時期，周汝昌遭到攻擊，江青曾試圖保護他（她很快地說，直到現在還從來沒有向任何人承認過這一點）。

她說：雖然《紅樓夢》的寫作形式是小說，但和歷史書一樣生動，就象一部百科全書。書中一共有三、四百個人物，作者選了20多個重點描寫。作者喜歡的這20個人物都是主人，剩下的都是依靠大觀園裏的殘羹剩飯活命的奴隸。

「80回本」是獨一無二的，非常珍貴，因為裏面有作者曹雪芹許多批注。這些批注具有很高歷史價值。由於曹雪芹是站在18世紀初的角度寫這部小說，所以他的議論是反動的，但今天的讀者必須認識到，他的想法在那個時代還是相當進步的。

她繼續說：一切文學作品都必須結合當時歷史背景來討論。曹雪芹寫《紅樓夢》時20多歲，修改就耗費了10年之久。在研究過各種版本的批注之後，與其他前人的觀點一樣，江青認為曹雪芹是寫了小說後半部的，但沒有後代，可能給人借走失散，小說原稿就永遠遺失了。從曹雪芹寫的批注來看，小說的結尾寫得很悲慘：失寵、抄家、坐牢、討飯。

原稿遺失後，有些作家就為小說寫續集。現在完整的120回本的後40回被認為是高鶚寫的，不過他沒有署名（這樣就可以讓人相信是曹雪芹的原本）。在後40回裏寫了寶玉中舉（參加鄉試），結婚又生了兒子後才出家[77]。

她說：從嚴格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角度看，曹雪芹沒有試圖去

77 比較起來，高鶚在一生中要好得多，因爲中了進士（科舉考試，通常在首都舉行，是獲任高官職位的初試）。

改變社會，而只是想改良社會。他確實不滿官僚體制，但也不會號召推翻支撐這種體制的王朝，只是試圖修補已經出現的弊端。即使有這樣的局限，《紅樓夢》還是唱響了封建貴族的挽歌，套用曹雪芹的話就是：「滿紙荒唐言。」

3

她接着說：這部小說的背景、人物和語言的真正意義常遭曲解。寧國府和榮國府在很多方面是對立的。寧國府為東方，榮國府是西方，就像兩個政黨，榮國府是父系統治，寧國府是母系統治，而兩府都要爭奪寶玉，但最後都失敗了。她宣稱：小說的前5回長期遭曲解，不過，現在毛主席已經給出了正確的指示，要從階級鬥爭和勞苦大眾的角度來分析這部小說。

小說中眾多人物之間都存在着複雜的親戚和主仆關係。大部份人都同情寶玉少爺、他的表妹黛玉和妻子寶釵。首5回介紹了小說的所有主要人物，而第一回中的《好了歌》則揭示了整部小說的結構和主題。說到這裏，她輕聲哼起來：

>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 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

她抱歉說記不得完整的詞了。

作者在整部小說中的用詞和人名的選擇都有深意。他運用道家哲學，揭示表像背後隱藏着真相：寶玉在夢中遇到一個姓甄（真）的少年，也叫寶玉，而真正的寶玉卻姓賈（假）。甄（真）賈（假）的隱喻貫穿整部小說的人名、物名和語言。

她引用《好了歌》注解指出有些段落在不同版本裏是不一樣的：

陋室空堂，

當年笏滿床；

衰草枯楊，

曾為歌舞場。

蛛絲兒結滿雕樑，

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

說什麼脂正濃、粉正香，

如何兩鬢又成霜？

昨日黃土壟頭送白骨，

今宵紅綃帳底臥鴛鴦。

談到小說具有的神話、超自然和夢幻的特點，江青講述了小說中某一個情節。說的是劉姥姥進了榮國府華麗的大觀園，裏面住着她的富親戚。大觀園的設計仿照天上的太虛幻境，故事展示的是大觀園和太虛幻境的呼應以及逃離現實到夢幻世界的可能。林黛玉是天上的絳珠仙草（女性的特點），賈寶玉是神英侍者。他可憐這棵草，每天以甘露灌溉（漢語中歷來以此為性的象徵），所以絳珠仙草化為人形，下凡去用眼淚報答神英侍者的恩情。

江青解說小說裏很多詩詞和大段篇章的意義。比如，她把寶釵稱作「白骨」（雖然在現有版本和曹雪芹原版裏，寶釵都活着。她指的很可能是死去的女主人公黛玉）。「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這說的肯定是寶玉。下面一句說的是誰就不太清楚了：「正嘆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說的是寶釵的哥哥薛蟠，薛蟠是個讀書人，卻沒逃脫做強盜的結局。

講到第 5 回，江青停頓了一下，開始講述其中寶玉在太虛幻境遇到警幻仙姑的一段。警幻仙姑送給寶玉有插圖的12支曲子，

12支曲子就是小說中的金陵12釵，每一曲影射一位女子。江青說這一段發生地點是天上的太虛幻境，裏面有金陵12釵正册和副册。副册裏面就有寶玉的丫鬟晴雯，最美麗卻很苦命，死得很淒涼。

江青憑記憶唸出這段詩詞，帶着強烈的個人情感抒發其含義：

霽月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靈巧招人怨；
壽夭多因誹謗生，
多情公子空牽念。

以下這首詩前有一幅插圖，畫的是兩棵枯萎的樹上掛着一條玉帶。樹下是一堆雪，雪裏插着一隻金簪。

可嘆停機德，堪憐咏絮才；
玉帶林中掛，金簪雪裏埋。

「林中玉帶」指的是黛玉，「雪裏金簪」指寶釵。玉和金的象徵意義一直貫穿小說始終。寶玉的象徵物也是玉，金玉不成良緣的預言在寶玉和寶釵不幸的婚姻中得到應驗，寶釵是金，寶玉是玉。

江青繼續說：寧國府的每一個女孩都有獨特的美麗之處，但都以悲劇收場。例如，賈敬的兒媳婦秦可卿被賈敬誘姦，最後上吊自殺。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她知道婆婆和丫鬟親眼目睹了這一不倫行為。兩個丫鬟被嚇呆了，一個自殺了，另一個逃到尼姑庵出家。這一連串撞奸、逃跑和自殺說明：互相猜疑的主子和

僕人住在這樣一個龐大複雜的家族裏，不會有什麼好結果。人們常說壞事都發出在寧國府，實際上大部份壞事都發生在榮國府。

小說第 4 回描述了控制社會的四大家族（賈、史、王、薛）：

賈不假，
白玉為堂金作馬。
阿房宮，
三百里，
住不下金陵一個史。
東海缺少白玉床，
龍王來請金陵王。
豐年好大雪，
珍珠如土金如鐵。

4

江青在講述這部小說時，常常伴隨着誇張的手勢。黃昏的熱氣逼人。有一次，她一邊講，一邊從桌上拿起一條白色的厚絨毛巾，緊緊裹在頭上。然後不時地解下來抖一抖，甩一甩自己的頭髮。

在談話或吃飯時，她偶爾會從頭髮裏取下小梳子，輕快地解釋道：「我喜歡短髮，因為這樣涼快。」（這讓我懷疑，她是否想起以前在上海的時髦，梳着不同樣式的鬈髮）。

坐在桌邊的江青興致很高，憑着記憶又背誦了大段詩詞，偶爾夾雜着對女服務員送上的精美點心的評論。太過投入的江青有一次從腿上拿起那條亞麻大餐巾，把兩隻角繞着自己的脖子打了個結，另外兩隻角壓在餐盤底下。這樣就在她的下巴和餐桌之間形成一個鉤懸帶，而身上被弄得髒兮兮，她大笑起來，就像一個小孩似的。

連續幾小時專心談論《紅樓夢》的世界，似乎暫時增強了她

的女性意識。有一次，她向身旁保鏢示意，保鏢立刻遞上一個用裸木板做成的長方盒子。她笑得像個小女孩，打開盒蓋，象變魔術一樣從裏面抽出一條又一條黑色百褶裙。「我喜歡裙子。」她邊給那些女伴（除我以外）分發裙子、邊說道：「夏天穿裙子很舒服。」我在革命中國從未見過有人穿這種明顯帶有外國風格的衣服，於是問這些裙子是從哪裏來的。

「友誼商店！」對她來說，友誼商店專為外國人服務的官方規定並不是問題。從裙子厚厚的束胸和厚重的樣式來判斷，在中國設計師腦海裏，50年代人的體型都像俄羅斯大媽。

第二天，張穎、江青的2個翻譯以及我的2個同伴聚在一起，開始我們的採訪時，每個人都穿上了江青發的新裙子，露出了以前不見陽光的白晰的小腿和腳踝。脫下平時穿的褲子，他們都坐得很不自然，有意識地把繞在大腿周圍的裙褶攏在一起，不知道如何使這些群褶乖乖地不再擺動。

5

江青說到女兒：李訥還很小的時候，她就給了小李訥一本《紅樓夢》，教她如何正確閱讀這部小說：要從階級鬥爭觀點來分析書中人物的生活。毛主席也告訴全黨：教導我們的孩子們要看這本書，不要只看愛情故事，要看階級鬥爭，牢牢記住書中20多條人命。這數百個人物都依靠富人的賞賜而活着。只要丫鬟還得到主子的寵愛，他們就恃寵而驕，一旦失寵就唯有一死。

俞平伯從唯心主義立場穿鑿附會地做了一堆假設，武斷地對書中人物關係和事件進行解釋。例如，他分析其中一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連誰坐在哪兒，誰怎樣都畫了圖，但都是自己臆造的。然後，他就荒謬地說，兩個女主人公林黛玉和薛寶釵是合二而一的，是一個人的兩個面。古人坐在哪個地方，坐的姿勢，

他怎麼可能考證得那麼準確？真是太主觀了！

仔細閱讀小說，會發現雖然黛玉和寶釵都是貴族，但寶釵是尖端頂兒上的，黛玉只是一個寄人籬下的孤女。寶釵挖空心思害黛玉，而黛玉則天真爛漫。當然林黛玉也反抗過，最後還是放棄了，不希望得罪別人。

曹雪芹寫薛寶釵都是稱讚她的美貌：唇不點而含丹，眉不畫而含翠，眼同水杏，臉若銀盆。江青馬上補充說：當然那個時候算美的，現在看來很可怕。曹雪芹寫林黛玉倒是很細緻，和寶釵完全不同，都是在批評她，從來沒有說林黛玉漂亮。他形象地描寫林黛玉：兩彎似蹙非蹙的籠煙眉，一雙似喜非喜的含情目，什麼淚光點點，嬌喘微微，什麼行動如弱柳扶風。兩個女孩性格的不同，還體現在對兩人房間的描述上。在劉姥姥的眼裏，林黛玉的房間是哪一位哥兒的書房，儘是書。在那個年代是很不正常的。

寶釵還顯示了一點文化野心，她曾經試圖到宮裏考賢人。黛玉從小被當作男孩子那樣培養和教育。從經濟條件上說，這兩個女孩也是一高一低。黛玉從小寄人籬下，實際上是無產者，沒有產業。當然，她的思想還是貴族，這必須要聯繫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理解。相反，寶釵家裏很富，是皇家商人。寶釵和黛玉之間存在如此根本的不同，但俞平伯在《紅樓考證》裏還堅持說林黛玉就是薛寶釵，薛寶釵就是林黛玉。

曹雪芹寫的本身就是一群貴族，但貴族中出了兩個叛逆：一個賈寶玉，一個林黛玉。儘管這樣刻劃兩個主人公，但也批評了他們的對抗姿態：賈寶玉的無所事事，林黛玉的不合群。作者總是慷慨地稱讚寶釵，誇她何等大方，其實薛寶釵手裏有錢，用錢收買人心。從這個角度看，寶釵可以扮演「特務」了。無論如何，寶玉的作風說明他是一個真正的叛逆。他直率地說，其他書都是假的，只有《四書》是真的。寶玉厭煩傳統，不願意讀所謂正經書，也不願意應考。這是他對抗官場的一種方式。他說，官

員們千方百計向皇帝遞奏摺，唯一的動機就是名聲。一些有雄心壯志的大臣為博取名聲，甚至在皇帝面前自殺。在寶玉看來，那些當朝的武官根本就不是真正關心社稷安危，打仗也是為了名聲和獎賞。

與寶釵不一樣，黛玉沒有錢，僅有的就是外祖母每個月給她的一點零花錢，而且連這點錢也不是都歸她一個人用。有一次，她把零用錢和其他個人財物分給了有需要的人。江青嚴肅地推論說：如果林黛玉和賈寶玉活到現在，也是大右派。不過，這是另外一個問題。考慮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他們對封建主義的反抗是那麼堅決。甚至在羅曼蒂克的愛情上，寶玉和黛玉也是作為封建貴族階級的叛逆出現的。真是太了不起了！

她强調：對前5回的理解可能不完全正確，自己只能算是半個紅學家。這部小說應該用辯證唯物主義方法分析。這場圍繞小說的爭論，涉及到如何對待文化遺產的問題。胡適和俞平伯把它看作是愛情小說，一部人物傳記。但把它看作一本帶有傳記色彩的小說不是更好嗎？難道小說不能對中國社會做出深刻的概括嗎？難道這本書不是既有現實主義，又有浪漫主義嗎？難道它只是一本描寫愛情的低俗小說嗎？難道我們不應該承認寶玉和黛玉是作為叛逆出現的嗎？黛玉和寶釵真的是同一個人的兩面而已嗎？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是否可以把這合而為一的人物與「一分為二」的哲學思想聯繫起來呢？

她更傾向於認為黛玉是封建階級的叛逆，而寶釵則是幫凶。就是這一區別最終導致黛玉的死亡。胡適和俞平伯的論調是在中國共產黨之外出現的，但從1960年開始，他們的觀點正式引起了共產黨的注意和警惕（導致更多有關文學遺產的爭論）。

1962（1963?）年，江青在上海組織各種文藝運動時，和華東局宣傳部長夏征農打過交道，當時稱他「好同志」，後來才發現他不可靠。一天，在談論小說的歷史背景時，他告訴江青在北京

發現了小說描寫的大觀園。江青就說：哦，要是真的，那麼《紅樓夢》就應該改名《曹雪芹遊記》了。她諷刺說，這個人根本就沒聽懂那句話的意思。

曹雪芹的小說對當時的統治階級是一個極大的衝擊，朝廷被迫禁了這本書。清朝一代，《紅樓夢》都是官方規定的「禁書」。但這樣的禁令只會使老百姓更喜歡它。人們如此渴望得到未經刪節的原版小說，都願意花幾兩銀子買一份小說抄本。經過那麼長的時間，那麼多人的抄寫，致使流傳下來的幾個版本間存在不少差異，但小說原本的鋒芒並沒有因此磨滅。道光年間（1821年至1851年）和鴉片戰爭期間（1939年至1840年），有一位大官還認為《紅樓夢》可以出口到國外去毒害那些外國人，就像英國人把鴉片進口到中國毒害中國人一樣。

6

在我們腦海裏，有關18世紀的花園、詩詞和成群結隊女伴的想像已經很生動了。江青在南方的生活方式也可以看到這些畫面微妙的投影。雖然沒有《紅樓夢》裏的大觀園供江青支配，但在廣州休養期間也享受到同樣的愉悅：在她的別墅和珠江間有一個蘭圃。一天早晨，江青和我大談一通文革的嚴肅話題後，突如其來地提議換個談話的環境：下午為什麼不到蘭圃集合再繼續談話呢？

我們分頭抵達江青的這座繁茂的秘密花園。張穎帶着我一起沿着蜿蜒的小道緩步前行，指給我看沿路幾百種蘭花裏的稀有品種。我們漫步穿過月門，走過依地勢起伏「自然」而建的花園，經過簡樸的涼亭以及溪流上的拱橋。大概只有穿長袍的先生和躬着腰的僕人才會錯失這種田園風光。遠處朦朧地出現一座賞月亭，江青穿着閃亮的絲綢正坐在亭子裏俯視着蓮花池。

我們一行人走近時，江青坐在一把寬大的柳藤椅上開心地向

我們打招呼，繼續着她手上的工作。她從籃子裏取出稀有的蘭花，放在帶軟木框的吸水紙上（這些軟木框是江青的保鏢做的）。她把每一種蘭花樣本放在一個木框上，然後，一個蓋住另一個，再用綫把四個角穿上，兩個木框被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她手不停，一邊微笑，一邊對我說：「我工作的時候，你也可以拍照。」我拍了幾張她製作蘭花標本的照片。雖然下午的日頭很毒，但保鏢還是在她身上打着強光。突然，她覺得這樣的形象有些輕浮，於是就走到欄桿邊，對着蓮花池，擺出一個嚴肅的官式表情。

「現在輪到我拍了，」她一邊說，一邊走向走廊另一邊的那套高級瑞士攝影設備。操作着三角架上那台雙鏡頭反光照相機時，江青把頭和相機都埋在一塊舊的藍絲絨布下面，輕快地按下快門，低聲地讓人調換姿勢。她把那些做好的木框一個一個地遞給她的保鏢，解釋說他們會照看這些標本。她不停地指揮陪同她的這些人給自己當模特照相。

我們回到亭子裏，喝着用新鮮蘭花泡的花茶，觀賞着關在漂亮鳥籠裏面的鳥兒，欣賞着園子裏稀有的蘭花，閑逸地聊天。很快江青又開始在游廊上散起步來，腳下五彩斑斕的金魚在水中歡快地游來游去。

也許是金魚身上的光芒讓她想起馬來，想起馴馬以及高高地騎在馬背上的挑戰。然後，她的談話從馬又轉移到了人身上，講到如何討好和拉攏人心的藝術。那麼我呢？我們靠在欄桿上的時候，我好玩地問到自己。那一瞬間，我們都笑了。然後她把話題轉到晚上。

「晚餐前換身衣服。怎麼不穿顏色亮麗一點的衣服？你為什麼穿黑色的？你知道我今天的拍攝是原色的。」

我對她解釋說，我的同伴小俞和小陳向我推薦了這身暗色服裝。

她強調說：「你決不要聽別人的。你應該自己做決定。穿你喜歡的衣服，穿讓你覺得最開心的衣服。」

傍晚，我們再次見面時，她穿的還是一條米色的絲綢裙子。我穿了一件紅白相間帶圓點的襯衣，下身穿了一條白色的寬鬆長褲。看到我的穿着，江青似乎挺高興。過了幾個小時後已是午夜了，江青的話題再次移到了支在屋內的照相機上。為了營造出一種自然的拍攝環境，江青命令小趙搬來巨大的盆栽棕櫚樹當作背景，還打了光。快要再次照相時，她伸出手來要撫平我那頭蓬亂的自然鬈髮。我開玩笑地懺悔：「我這頭髮很叛逆，但並不革命。」江青就笑了，垂下手，讓我去梳一梳頭髮。

江青從那塊藍絲絨布下面伸出頭來的時候，我又再次拿出了我的尼康相機。「彩色的？」她問道。不是，那時相機裏面碰巧裝的是黑白膠卷。她提醒我說，她喜歡彩色的。我說知道了，但又補充道，黑白膠卷可以更好地體現人物面部的細微之處，也能更好地反映出人的個性特徵。她沒說什麼，但臉上的表情一直很僵硬，完全不同於平時她生動的面部表情。從取景器中望去，我意識到她不往後傾的時候，整個人看起來要可信得多，也動人得多。

後來，我仔細地想了想江青那麼認真地研究《紅樓夢》，又那麼急切地要和我分享這部小說，我意識到她腦子裏的那些真實和虛構、歷史和文學，還有過去和現在，都混在一起分不清了。這樣的思想狀況正是江青賴以生存的宣傳中心。

IV

文革

12

搭台唱戲

如果人們是帶着足够的勇氣來到這個世界的，那麼這個世界就不得不殺掉這些人來擊垮這些人，所以這個世界當然殺了這些人。世界擊垮了每一個人，然後很多人在這些被擊垮的地方變得强大了。

——海明威《永別了，武器》

「我想永遠保持政治上的年輕，」江青第一次與我談話時只說了這樣一句話。她自信地笑着，她這樣說代表的不僅是她本人，還代表着一群正在老去的革命領導人。以毛主席為代表的一些人決心要保存足够的機敏和體能來領導這個國家，繼續半個世紀前就開始的基本政治路綫。他們也不能允許這個有着眾多年輕人的國家（近50萬人口年齡都在30歲以下）進入一個政治不成熟的中年，也不能允許一不小心重新回到舊的社會制度。

她繼續平衡着個人利益和公眾利益：「雖然我身患疾病，但一直堅持工作和鬥爭。」

「江青同志與病魔做鬥爭就像她進行政治鬥爭那樣堅決。」姚文元以他一貫的革命謙恭補充道。

「你知道姚文元同志是誰嗎？知道他做過些什麼事嗎？」她邊問，邊向我介紹在近期運動中她最忠實、最有才華的跟隨者，一個真正用筆做鬥爭的戰士。早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姚文元就是我們黨的一位文藝評論家。文革初期和中期，尤其是初期，他組織撰寫文章批判文藝界的反動陣綫。當然我首先是得到了毛澤

東同志的批准後才去上海的，在上海我得到了柯慶施同志（擔任上海市市長兼黨委書記）的支持，不過大部份文章還是姚文元同志寫的。

「工作是在毛主席的領導和江青同志的組織下進行的。」姚文元指出：「那時候正處在鬥爭十分艱難時刻。那是為什麼毛主席說當時的北京針插不進、水潑不出的原因。」

江青接着說：「整整19天（1965年11月10日至29日）北京的報紙拒絕刊登姚文元同志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首先刊登了這篇文章。在毛主席的建議下，文章又以小册子的形式發行，但後來的兩、三天裏，北京還是不允許刊登這篇文章。這群人就是這麼專橫！姚文元同志花了整整 7 個月才完成文章的初稿，之後又進行了無數次修訂。這篇文章的寫作是秘密進行的。然後文稿送到北京，我又審閱了 3 遍，這也必須秘密進行。你覺得奇怪嗎？」

實際上，有一段時間，這個故事在中國觀察家中間廣為流傳。我很早就對這個能幹强勢的姚文元同志感興趣了，不過只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第一次會見江青時見過他。早在1955年，姚文元就參加了對自我標榜為社會主義作家胡風的批判。兩年後，他又參加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反右運動。他宣揚魯迅的文章《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1962年）帶出了新的重要主題。3 年後，他協助毛主席及江青發表了有關海瑞的文章，削弱了北京黨中央對上海以及上海文化事業的控制。姚文元勤勤懇懇的工作得到了嘉獎，被任命為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主編，還當上上海黨委宣傳部的部長。通過姚文元對上海出版業的控制，暫時失去對北京出版業控制權的毛主席和江青，對首都發起了一場針對市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意識形態進攻。

姚文元用來攻破北京宣傳大本營的武器，就是那篇有關海瑞罷官的批判文章，而《海瑞罷官》這部戲就是北京市副市長吳

晗寫的。文章所挑起的政治災難基於一個中國歷史的格言：戲劇、小說、詩歌以及歷史記載，要麼美化了統治階級，要麼醜化了統治階級。吳晗則擁有這方面關鍵的政治、歷史和文化條件。他是一個有權勢的城市管理者（還是毛主席的敵手劉少奇的親密同事），同時還是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明史專家，以及寫現代歷史劇的作家。在吳晗的《海瑞罷官》中，海瑞是一位正直的明朝大臣，無時無刻不是心繫人民，由於直言不諱地反對皇帝的土地政策、而遭到「不公正的」處罰。這部戲劇對當今政治的影射簡直太明顯了。土地欠收加上大躍進的計劃不當，給人民群眾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損失。「正直的幹部」彭德懷將這些災難歸咎於「皇帝」毛澤東。通過歷史的類比，這部戲劇提出了要「為冤案平反」的口號：減少集體土地，把一部份分配給個人耕種。主席的忠實擁護者們抓住了這樣一條信息：復辟。

江青繼續講述發生在1960年代的危機：文化革命前奏始於1962年毛主席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的號召。1962年至1966年發生的北京京劇匯演事件。多篇有關海瑞文章發表都為文革爆發做了前期鋪墊和準備。

我說：文化大革命起源於文藝因素，只是那些關注中國政治的外國觀察家的假設之一。新舊世代之間的緊張和對繼任權的爭奪，也被認為是導致文革的原因，看上去似乎是內戰。

江青承認：「這些話裏有真實性。毛主席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過，這是一場全面的內戰。」

姚文元附和道：「是一場全面的內戰！」很快又補充：「這是一場發生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爭奪領導權的鬥爭。」

江青說明：「還不能說從1962年到1966年這段時間已爆發了全面內戰。真正的全面內戰，直到1966年廣大群眾發動起來以後才開始的。那年，我去北京大學好幾次，每次都差點出不來。

有些人高喊要吊死我，有些說要讓我下油鍋。我回答說，我忙得很，等我有了時間，會親自邀請他們來吊死我，讓我下油鍋。」

她說：調查早在1961年就開始了，到1963年就採取行動開始進攻。1964年，我發表關於京劇革命的講話，但他們故意在講稿裏製造了一些錯誤，使我無法公開出版。當時大權還在他們手裏，我說的話一點份量也沒有，就是因為人民群眾還沒有被發動起來。

江青接着說：文革前期，主席講了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文革的主要行為準則。1962年9月，由她起草的「五一六通知」提交八屆十中全會，這是文化革命的前奏，真正開始的標誌是廣大人民群眾被發動起來。最初，毛主席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接着在天安門城樓接見廣大群眾。最先到達天安門的是學生、工人和農民。此後，毛主席又連續數次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約1300萬名紅衛兵，實際數字還要多，她補充說。當士兵和人民聯起手來的時候，內戰就全面爆發了。從此以後，各方勢力開始交替變換：先是一派奪了權，然後另一派又重新掌握政治權力。這樣的輪換不斷重複。

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劉少奇是「第一個跳出來的」，她說，接着就是林彪，林彪是革命史上埋藏最深的叛徒。他對毛主席的領導權和生命的危害被稱作「兩條路綫的第十次鬥爭」。她斷斷續續地列出與此相關的名單：第一次是陳獨秀；第二是瞿秋白；第三是李立三；第四是羅章龍；第五是王明；第六是張國燾；第七是高崗；第八是饒漱石；第九是劉少奇；第十次是林彪。

「我不是特別聰明，但我經歷了鬥爭實踐，」她說。還補充說自己的「革命兩手戰術」沒有那些反革命的兩手策略那麼高明，她的戰術運用經常很笨拙。劉少奇及其追隨者做出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的錯誤後，她號召他們與自己這一方的人團結起來，但他們仍然謀劃着如何對付江青這一方！不過，「當劉少奇叛黨集團和林彪反革命集團自我暴露時，就是我們的偉大勝利。」

1

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前奏曲把她推到萬眾矚目的地位，但比起後來重建動亂中的社會仍遜色不少。她的談話着重强調了3個連續的歷史潮流。第一個是大躍進。在大躍進中，毛主席冒進地要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三個10年建成一個物質充足的平等主義社會。毛主席鄙視蘇聯模式，認為蘇聯模式放任了「資本主義」。如江青所描述的，毛主席在廣大農村發起了一場「一人運動」，力排眾議，推動人民公社的發展，實施根本性的社會組織變革，大力加快共產主義的步伐。但在1950年代末，毛主席忽視了上層建築，忽視了對教育、文學和藝術的改造。

難以掩蓋的事實，是中國廣大農民對於自己「一窮二白」的政治優勢還毫無知覺，毛主席就要立刻實現共產化，他的意願和努力失敗了，但還是不願忍受別人做出這樣的評論。難以避免的饑荒和混亂再次把中國逼到了叛亂的邊緣。失去人民支持的危機迫使1960年至1961年開始糾正大躍進中所犯的錯誤：對自留地、農村集市、個人財產以及補償國家在共產化熱潮中拿走的物品做出了有限的「讓步」。江青在敍述這場關乎國家命運的冒險運動時，焦點幾乎全部集中在毛主席個人身上。她盡責地背誦毛主席那些煽動性的、口號式的、有時實在一無所用的指示。領導糾正大躍進錯誤的劉少奇和當時擔任總書記的鄧小平，在江青講述這些事情時，正遭受官方的批判，所以極少被提及。不過，他們暗中還是有眾多的追隨者。

1962年秋，開始了社會主義整風運動，在人民解放軍以及軍隊統帥林彪支持下，毛主席在與劉少奇關於中國選擇何種道路通向社會主義的鬥爭中佔了上風，受到英雄般的讚譽，被稱為「我們偉大的舵手」。江青在身體逐漸康復的情況下觀察到革命運動中的這些較量。直到1960年代初，江青才轉向電影事業，電影是

社會主義整風運動强調的文化教育媒介。

有關1950年代末期國內發生的事件，她還講到了1957年和1958年的的反右運動：那時候，毛主席的注意力從城市中那一小撮動亂份子身上轉移到廣大農村，這裏的革命勢頭比較緩慢。1958年2月19日，主席將這一轉變在《有關黨的工作方式的十點意見》中提出來。隨後主席開始了一次視察農村之行，3月和4月都在四川度過。在成都，主席參加了一次重要會議並講了話，這次會議正式通過了5年前首度向政治局提交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綫。1958年6月1日，黨刊《紅旗》第一期發表毛主席寫的《介紹一個合作社》。

為了進一步快速推進農業合作化，1958年8月，政治局在河南鄭州召開了3次會議解決「過度徵用財產」（過度的以物代稅）以及其他「強迫命令」問題。會議還公布了針對小農經濟頑固思想的條例，即反對任何非集體的農業形式。為讓大家理解他的想法，毛主席坦率地問道：「你們還信不信馬克思主義？你們還信不信價值規律？」

主席繼續在中國農村進行單獨活動，從8月4日到13日，視察了河南、河北和山東等省的城市和鄉村，還視察了北京東南面的天津市。每到一個地方，主席都要召集當地幹部開會，大力推廣人民公社，讓全國各地都來建設人民公社。這一觀點得到反復强調，有些地方做出了積極響應。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開了八屆六中全會，會議通過了有關人民公社化的幾項決議。同時，毛主席再次强調「一切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判斷。江青還平靜地透露，這次全會還通過了毛主席不作「國家主席」的決定。

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在領導層中引起震動的1959年7月和8月政治局會議，是如何為江青的政治生涯提供了不可預測的機會。和其他高層會議一樣，這些會議仍選擇在江西省鄱陽湖西岸

的旅遊名山——廬山舉行。這一歷史性的時刻是緊張的。中國以前對蘇聯在意識形態和物質上的依賴關係，如今則面臨着破裂的危險。大躍進帶來了饑荒和痛苦，這在傳統觀念裏代表一個朝代衰敗的開始。然而，毛主席可能是「硬着頭皮」頂住羞辱和壓力，決不把政治領導權拱手讓給對手，決不接受那些知識份子文人的評説，也決不讓別人有報復自己的機會。

無論如何，高層還是做出了謹慎的調整。毛主席從國家元首的位置上退了下來，名義上是為了能够更好地發揮他的才能，研究革命理論。儘管劉少奇才是負責農業工作的人，而且也積極推動了毛主席的大躍進運動，但主要領導人仍認為毛主席，而不是劉少奇要對最近發生的倒退負責。廬山會議上，劉少奇代替毛澤東成為國家元首，使他們兩人及其各自的擁護者之間的緊張關係更明朗化了。與以往一樣，毛主席用一種歷史的眼光，對眼前的危機採取疏遠態度。他立刻在主要領導人之間重新挑起一種意識形態衝突，並把這樣的衝突説成是一場階級鬥爭。

在廬山爆發的是一場階級鬥爭，是此前數十年社會主義革命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陣營間生死鬥爭的延續。看起來在中國，在黨內，這樣的鬥爭至少還要持續20年，甚至半個世紀。階級不消滅，階級鬥爭是決不會停止的。舊的社會鬥爭結束了，新的社會鬥爭又會出現。總而言之，按照唯物主義的辯證法，矛盾和鬥爭是永恒的；否則這個世界便不再存在了。黨內鬥爭只是社會上階級鬥爭的一種表現。

在這個灼熱的夏天，這群人以及他們之間的爭奪對於江青來説是很遙遠的事情，因為此時她正在北京東面的海濱度假勝地北戴河專為主席和她準備的別墅裏療養。她回憶在北戴河溫暖的海水和微風裏如何的愉悦，而這種愉悦很快被主席的一封短信給打破了。在這封主席給她的短信裏，有主席回覆國防部長彭德懷的草稿，彭德懷剛剛提交了一份萬言書，批判主席大力推行的向社

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彭德懷的這份萬言書是7月14日交上來的。江青回憶說，根據報告也是在這一天通過對黃克誠「罪行」的決議，還討論了有關三面紅旗（總路綫、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問題。因為沒有親見彭德懷寫的萬言書，所以江青無法對毛主席回覆的草稿做出合理的評論。這樣，她就給主席打電話說準備馬上飛往廬山，以便了解更多衝突之後的問題。

主席說：「鬥爭太尖銳了」，反對江青來廬山。但無論如何她還是到了廬山參加會議，雖然對此主席很不高興。這裏發生的人與人、思想與思想之間的衝突比她以往見過的都要激烈，這讓江青的病情愈發嚴重了。毛主席對此很着急，會議一結束就帶着江青去杭州療養，兩人一起休息了一段時間，同時對他們的下一步行動做部署。

在政治史上，廬山會議的高潮是彭德懷猛烈的對抗。不過，廬山會議的確和個人歷史也有關聯——是一個丈夫和一個妻子對美學生活的喜愛。和往常一樣，江青帶上了自己的相機，閑暇時就拍一些她覺得好看的東西。她認為最成功的一張照片是拍攝廬山仙人洞的那張，這個仙人洞是古時候的一座道觀。數百年來到此遊覽的世人都將仙人洞視作廬山風景區的代表性景點。

2年後，也就是1961年9月9日，江青就像是毛主席的繆斯，使他詩興大發，寫下一首詩，題在李進同志所攝廬山仙人洞照的背面。李進是江青兒時的名字，她所拍攝的作品題字都用這個名字。在我們的採訪中，江青給我看了一張放大的廬山仙人洞照片，她本人對這張照片十分珍惜，親手在背面抄下了毛主席題寫的詩。毛主席對仙人洞以及對照片的拍攝者江青的描述充滿了浪漫主義情調：

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

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1961年的時候又有誰會料到毛主席寫給李進同志的詩會成為他們現在正在策劃的文革語言的一部份呢？

根據江青接下來的講述，8月15日，她和毛主席仍然在杭州，主席還寫下了《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一文，建議所有領導人和負責同志都要閱讀當時還是第三版的《哲學小辭典》。同時，主席還推薦了一本有關政治經濟學的教科書。

杭州還是一如既往的秀麗，但到了夏末，這裏的空氣變得十分潮濕、悶熱，氣溫已經升到攝氏40度以上。就算有空調，還是沒有辦法將溫度降到30度以下。她實在受不了這烤爐般的氣溫，於是就離開在杭州的主席，來到他們在上海的住處。為了恢復體力，江青强迫自己進行體力勞動，包括打理花園，這一向都是她很喜歡做的事。但現在只是澆澆水、掃掃樹葉就讓她大汗淋漓（在40歲的年紀，這些更年期症狀是不是恰好與她的政治生命的轉變相呼應呢？）她不斷暈倒再甦醒。她認為這都是由於低血糖造成的，於是每天强迫自己吃大量的糖，弄得她「胃都挪位了」，總覺得噁心。她什麼也消化不了，連續好多天都想吐。

為了讓心緒從身體病痛上轉移出來，醫生建議她去看幾場演出，她就去看了。1959年夏末的文化世界呈現出了嶄新的一面。上海劇院上演那些古代和資產階級的劇目就像挖掘一處考古遺址一樣，突然就挖到了埋藏了多年的一堆古董。在「使上層建築適應物質基礎」方面，她所看到的問題令人震驚。

為了讓自己能够更好地領導將來的工作，江青接受了一系列的針灸治療以及更嚴酷的體力訓練。她每天要打15分鐘太極拳，20分鐘乒乓球，一兩圈枱球，還有一個來回的游泳。「游150米中間休息 4 次，對吧？」她把這個問題拋給了保鏢小曹，顯然這個小曹擔任江青保鏢已經有13個年頭了。小曹同意地點了點頭。這樣恢復訓練持續了 3 年，到了1962年末，江青覺得自己的身體已經完全恢復，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化工作中去。

在此之前的幾年，主席一直堅持寫作，寫了很多文章，在人民群眾中傳播他的觀點。他應該繼續只通過小册子、偶爾出版的書和日報來和人民交流溝通呢，還是應該去尋求一些更長久的方式呢？她說，實際上是斯大林首先向毛澤東提出建議，讓他出版自己《選集》的。這項工作耗費了好幾年時間。

1960年，斯大林已經逝世好幾年了，他本人的聲望遭到了赫魯曉夫的詆毀，而中蘇關係也惡化了。為了應對這樣危機的情勢，1960年3月主席起草了《鞍鋼憲法》。

1960年7月，蘇聯單方面撤回在中國的專家，並且撕毀了此前與中國簽署的和約。她承認：主席對這一倒退事件感到十分震驚，但還是從容冷靜地做出處理。失去蘇聯這個靠山，讓毛主席不得不重新考慮全國的資源（與以往一樣主要指土地和勞動力），迫使他向人民群眾發出實現經濟自給自足的號召。這次突然的政策轉變發生在8月，在國家經濟發展中，農業被賦予最重要的地位。

1961年1月13日至18日，召開了中共八屆九中全會，考慮到當時發展不平衡狀況（自然災害和大躍進），毛主席在會上提出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2月和3月，中央委員會在廣州召開會議，主席幫助起草了《人民公社六條原則》，這個文件是要把業已實行的組織原則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據江青解釋，建立人民公社的目的，就是要鞏固集體三級所有制——生產隊、生產大隊和人民公社，但不會剝奪農民用來種蔬菜、喂猪以及其他滿足個人消費的小塊自留地。以後的幾個月實施了修訂後的新規定。

在全國推行人民公社運動的同時，領導人也在為經濟工作辯護，因為正遭到記者和編劇們的攻擊。這些攻擊促使1962年2月召開了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主席在這次數千人參加的會議上講話。江青說：主席的講話是極其重要的。

到1962年春，她已使主席相信（數年來，她一直在努力說服主席）現在迫切需要的，是在文藝領域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贏得意識形態的優勢。主席第一次把將提交中央委員會通過的政策文件起草工作交給江青（當時，她還不是中央委員）。她起草的這份文件就是「五一六通知」，應該被視作文化革命的序幕，她強調。1962年8月6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中央會議時下發了《階級：現狀和矛盾》的指示，深入探討了國內外階級鬥爭以及在全國加強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問題。北戴河指示後來成為「十中全會精神」。她再次強調：文化大革命開始的真正標誌是人民群眾的參與，實際上，直到1966年群眾才被真正發動起來。

與劉少奇的鬥爭加劇了。這是她從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1962年9月24日至9月27日在北京召開）上採取的方針中觀察到的。主席在主持這次會議時提出「社會主義階段黨的基本路綫」，以對抗劉少奇向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妥協的外交政策。在國內事務上，劉少奇倡導自由市場經濟：私有地、自主經營的私人企業以及包產到戶（而不是生產隊）。

1963年5月20日，中央委員會在杭州召開會議，江青作為列席人員參加。在會上，江青整理了幾個有關農村問題的決議。這些討論後來成為「前十條」，強調思想對物質力量的影響。4個月後，1963年9月，劉少奇發表了他的「後十條」，這份文件是「形左實右」的。江青控訴：表面上是對毛主席「前十條」的補充，其實是辯駁。

2

毛主席曾經說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不在教室裏上的政治課」，此話一語雙關。1960年代初，江青在貫徹這個指示的同時，也向群眾傳達毛的這項指示。以往只要主席察覺到自己在永無休止的權力鬥爭中失利時，就會離開中央，不通過黨的正常渠

道，親自去接觸真正的支持者，那就是人民群眾。這樣做的智慧來自中國漫長的歷史，來自對只有群眾才能讓政府最終就範的認識。按照傳統說法，只有以自信和實力面對人民者才是順應了天意，證明作為領導的勇氣。從毛主席身上就有力地證明了這個政治道理，在江青身上也得到同樣的體現。

60年代初，在身體康復後（據信是治好了癌症），她更加希望不要被革命運動忘記。她開始用自己的名字在青年和婦女雜誌上發表文章，結果無人認同。更重要的是，她又恢復了旅行，可以向中央匯報所見所聞，憑着和毛澤東的關係參加一些中央會議。當然，這些只是她衝破障礙的開始。在20年的隔絕後，她能重新建立和普通群眾的聯繫、並說服他們接受自己為領袖嗎？

江青借着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機會到群眾中來。當時，正通過廣泛的教育和藝術活動在群眾中宣傳「十中全會精神」。林彪領導的解放軍在人力和精神上給予協助。春季教育工作座談會和解放軍第三屆文藝會演都打出「向解放軍學習」的口號。年輕戰士雷鋒（意外死亡後，被授予烈士稱號）的故事是各種媒體宣傳的典型。

這個口號加快了文革的到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求重新結合軍隊和民眾的利益，縮小城鄉之間、特權階層和普通階層之間的差別。在春節招待會上，毛澤東決定：有必要讓歌唱家、詩人、劇作家和作家離開城市到鄉村、工廠中去，不要總是待在辦公室裏，否則他們不會寫出好作品，不願去基層的人不應受到資助，去基層的人才應該被資助。

同時，江青毫不張揚地開始討伐那些無用的歷史劇。她以馬克思主義觀點批判「鬼戲」（源於迷信和民間宗教）。作為上層建築要素，上演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戲劇，與正在形成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不相適應。最讓她無法接受的「封建」戲劇有：1961年上演的吳晗的《海瑞罷官》、孟超的《李慧娘》、田

漢的《謝瑤環》（一部自由藝術的偉大作品）。《謝瑤環》激起的政治憤怒背後是高層的憂慮，江青比其他人更不安。這與10年前她審查過的《清宮秘史》一樣令人震驚。女性統治者是兩出戲的共同點：《謝瑤環》中的武則天和《清宮秘史》中的慈禧。田漢劇中的主角——女司儀、武則天的密友和心腹——是虛構的文學人物，其實武則天只要男人侍奉。在他的新戲裏，田漢以刻劃古今女性的嫻熟戲劇手法，描寫武則天和謝瑤環「關心」被霸佔土地的百姓，與權貴抗爭。這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是根本站不住腳的。根據階級分析方法，女皇帝及其心腹屬於封建統治階級，不可能對其敵對階級——農民有任何同情。和土改時期的《武訓傳》一樣，《謝瑤環》出現在需要思想和道德支持的公社化和大躍進時期。這些戲劇被譴責為復古：美化帝王和地主階級，削弱階級鬥爭；在需要鼓舞社會主義精神時，鼓動思想上的封建主義復辟。田漢和吳晗被批評利用謝瑤環和海瑞來發泄不滿。劇中人物和作者宣稱「代表人民」，但無產階級領導人試圖壟斷這一特權。這種壟斷直到1966年才完全實現。

江青的朋友——上海市長柯慶施支持她剔除戲劇中的宗教面具、「牛鬼蛇神」和過時的浮華，這在當時的領導人中為數不多。1963年1月，她號召城市中有影響的演出團體拋棄舊曲目，學習「十中全會」精神，創作新戲劇來反映社會主義建設13年，歌頌工人、農民和戰士中的英雄。

毛澤東受妻子的影響，發出後來被經常使用的口號：禁止一切描寫「妖魔鬼怪、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戲曲。為了強調他的觀點，毛澤東指責田漢、夏衍、林默涵等人領導的文化部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

12月，江青再次危言聳聽地說：「『腐朽』的東西還在統治着許多部門，雖然社會和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藝術作為服務於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築仍有嚴重問題。我們要繼續調查研究，認真

關注這件事。許多黨員熱衷於推動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藝術而不是社會主義藝術，豈不是很荒唐嗎？」

劉少奇（被認為是這些惡毒官員的保護人）回應說：「允許描寫帝王將相，但不應多寫。談到藝術，資本主義——我們叫新民主主義時期——的音樂、小說、詩歌、戲曲的水準還沒有達到封建時期的高度。現在創作的小說、戲曲大多數不如封建時期的作品。因此，描寫『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作品可以演出。」

對表演藝術的調查，使她有機會接觸以前關係疏遠、又不被她敬重的著名政治人物，陶鑄（南方的強人）就是其中一個。他和江青一樣有興趣操縱文化以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當江青為北方的京劇改革不遺餘力時，陶鑄在南方用武斷的權力，強迫廣東的粵劇和現實政治相結合。

江青說：1961年10月11日，陶鑄（中南局第一書記）在廣東談了知識份子問題，大部份談話帶着對知識份子的蔑視（後來是讚揚），實在不清楚他的動機是什麼。第二年春天舉行了一系列全國性的文藝工作會議。陶鑄出席了1962年3月5日的會議，目的是培養現代戲劇創作。他還出席了文藝創作座談會。5月23日，他參加了另一個重要的文學會議。她說，直到最近才明白陶鑄高調參加這些會議的真實目的。1963年5月以前，他的文化政策不為人知，甚至在1965年，人們還不了解他的思想。江青在文革初期的助手——姚文元是第一個認真研究陶鑄作品的人。姚曾寫文章評論陶鑄的兩本書，其中一本是《論報紙的風格》。他機智地論證陶鑄確實支持四條漢子，反對她和毛主席的文化政策。姚文元的揭發公開後，他們（她和毛澤東）發現林彪是陶鑄的後台老闆，她補充說，最近才揭露林彪和劉少奇早在60年代初就「關係密切」。

直到1964年六、七月，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現代京劇會演前，江青在公眾大會上都並不出風頭，這次則不同了。和以前的演出一樣，會演不只是文化狂歡，各地按中央指示帶來了新劇目。這

些劇目將在舞台上宣傳無產階級政治。周恩來總理負責籌備會議，考慮到江青最近在全國對戲劇團體的調查，他決定邀請她寫一篇有關京劇革命的文章，並在會演時講演。

對參加演出的劇團及其演員來說，會演是史無前例的新鮮事。但其實有更重要的意義，把表演藝術統一到中央的無產階級政策中去。以往戲劇主要是表現地方文化，而不是反映國家政策。這次來自19個省市自治區的28個劇團演出了37個劇目，其中33個的內容和當前革命有關，其餘則描寫了共產黨的革命鬥爭歷史。宣傳部長陸定一（不是江青的朋友）做了主題演講。毛澤東似乎忘了劉少奇公開反對的狂妄言論，與持保留態度的周恩來一起觀看了會演，北京市長彭真也有到場。他後來說過：革命戲劇「還處在穿開襠褲、舔手指頭的階段」。在一篇關於戲劇會演的報告中，江青寫道「如果資本主義復辟，或現代修正主義掌權，改革之風便會不復存在。」

江青同志（她的長相和聲音還不為大部份人熟悉）作了首次公開講話。在我們的會見中，她指出，這篇講話被延誤了3年才發表，別人的講話卻立即發表。1967年3月，黨刊《紅旗》發表了她的講話。為什麼？因為她的「敵人」（反對她在文化領域行使權力的人）竄改了講話內容，並拒絕正式確認。直到他們被罷免後，她的觀點才被公開發表。

在那篇文章裏（她沒有引述文章內容，但她的助手此前向我唸過部份內容），她抨擊了藝術和政治生活中的無政府主義，要求創造合適的上層建築「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文章使用了一些「令人震驚的」的數字，流露出明顯的政治意圖，强調戲劇對群眾思想意識和公共輿論的廣泛影響。根據她粗略統計：

全國有3000個劇團（不包括業餘和未登記的劇團），其中，約90個是職業話劇團；文工團有80多個；其餘2800多個是各種地方戲曲團體。我們的舞台被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有妖魔鬼怪

佔據着。對於現在的90個話劇團來說，也不是完全表演工人、農民和戰士，而是專注於演出外國戲劇和古代題材的戲劇。我國有超過6億的工人、農民和戰士，只有少數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和資產階級。我們應該為少數人，還是為6億群眾服務呢？

這種簡單的藝術為階級服務的馬克思觀點，會反復出現在後來的日子。她在會演中首次提出的培養無產階級新覺悟的呼籲，也以問答形式出現：

> 我們吃的是農民種的，我們穿的和住的是工人造的，人民解放軍在國防前綫保衛我們，我們卻沒有在舞台上反映他們。請問：你們這些藝術家是站在什麼樣的階級立場上？你們常講的藝術家的「覺悟」在哪裏？

他們必須在戲劇方面「培養一些榜樣」。當時還在試驗階段的榜樣有：《紅燈記》、《蘆蕩火種》（後來改名《沙家浜》）、《奇襲白虎團》、《林海雪原》（後來的《智取威虎山》），後來都成了「樣板戲」。觀看這些新劇、並給予肯定的領導人包括毛澤東、無產階級戲劇的愛好者——柯慶施、康生，還有她的同鄉——一位負責公安的領導人。談及此人時，她帶着謹慎、溫柔和風趣的神態，「他想要一張我最喜歡的桃花照片，但我不會讓他得到。」

她對自己的敵人——文化部領導人記憶猶新，相信此人阻礙了她30年來的政治發展。在會演期間，江青認為有必要和四條漢子——周揚、陽翰笙、田漢、夏衍以及張庚（還在創作資本主義戲劇）談一談，與在延安時一樣，她不願報復他們。她和他們友好（據她的回憶）交談，鼓勵他們做出革命性的改變，他們沉默無語。江青仍保持克制，因為情況變得複雜起來。那年夏天，她和主

席懷疑（沒有確鑿證據）他們可能是「叛徒、托派份子或國民黨特務」。

為了測試田漢的善意（與他相識時，江青還是一個與上海黨組織失去聯繫的惶恐女孩），她邀請田漢夫婦參加晚宴。田漢接受了邀請，席間，江青請他把現代戲《紅色娘子軍》改編成京劇，他同意了。然而，改過後的劇本比以前更糟了，江青生氣地說。

北京京劇會演後（江青認為是完全成功的），劉少奇和王光美不滿江青的成功，從8月到9月，開始在各地活動。名義上是為了推動「四清運動」的開展，而實際上是在破壞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

周總理一直密切關注這些情況，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他論述了本年度的文化發展，闡明人類歷史是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江青順便提到那一天有着重要政治意義，她第一次作為家鄉山東的代表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她深信，在政治領域取得一席之地後會受到挑戰。同年12月，著名軍事將領羅瑞卿的罪行敗露。事情發生在上海，他因為奉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綫」而受到批判。她說，林彪對此持相同看法。早在1965年文革發起之前，林彪就視主席為危險人物，他們之間的分歧已十分明顯。

羅瑞卿受批判後被揭露：年初，他已把長期主管的公安工作的觸角伸到江青那裏。事實上，文革初期，羅瑞卿僞裝成要求《解放軍報》發表她的個人倡議，這也是她不願公開的秘密。江青得知這件事後，立刻打電話給羅瑞卿，和他「做了鬥爭」。羅瑞卿的觀點很簡單，就是軍隊所作的一切都是對的。「解放軍是生活在真空裏的嗎？」她反問。羅瑞卿沒有回答。

解放軍通常會創作自己的電影、戲劇和音樂。其中有一部據說是根據長征歷史改編的電影，給江青留下了「改革」的印象。

她放映給毛澤東看，毛說它是「宗派主義」，因為沒有反映軍事行動中各部隊的團結合作。相反，孤立地描繪了紅一方面軍（林彪率領）的作用（抹殺了第二和第四方面軍的表現）。為了糾正電影中的「宗派主義」和「山頭主義」，毛澤東建議做針對性的修改，但「林彪和他的同夥」極力阻撓修改「他們」的電影。

江青繼續說：1966年春，衝突在各個領域展開。2月（毛澤東在杭州和湖南調查），她在上海主持了軍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同時，負責文革的五人小組也「出爐」了他們的「二月提綱」。小組由一直反對她革新戲劇的北京市長彭真領導。她相信「他們」的意見是對「她」把社會主義思想引入文藝領域有預謀的攻擊。「二月提綱」以「學術」討論的面貌出現，似乎沒有更多的政治色彩。它提出了一些愚昧的觀點，比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和其他老掉牙的理論。這種「反革命修正主義」理論在各地突然大量湧現。在哲學領域，一些人開始反對「一分為二」原則（毛認為很重要的辯證法原理）。經濟學家孫冶芳比蘇聯的李伯曼更極端，鼓吹「利潤掛帥」和「其他修正主義的價格和利潤理論」。歷史學家中，「讓步政策論」變得流行起來。這一理論認為：歷史上農民起義的勝利，不是因為農民自己不懈的鬥爭，而是皇帝向人民讓步。她補充說，這個提法暗指唐朝的第二個皇帝——唐太宗（公元627－650）。

1966年4月16日，中央委員會在杭州召開會議。北京市委（受負責文革的五人小組控制）被要求表態「糾正」那些冒犯領袖的知識份子。通過精心準備，她們收集了很多文章，批判吳晗的一個報紙專欄：「三家村」（由吳晗和鄧拓、廖沫沙合寫，被認為是借用歷史典故批評毛和他的追隨者）。她說，北京市委一直在保護這個煽動性的欄目。他們的錯誤觀點在全國蔓延。陶鑄還在地方報紙《廣州日報》上轉載。杭州會議期間，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暴露出來了。她說，他領導的市政府是外人

無法進入的「獨立王國」。

彭真的人中，廖沫沙承受着巨大壓力。江青30年代在上海時和他很熟。他當時還年輕，在城市裏努力奮鬥着。廖沫沙不僅因撰寫「三家村」受到牽連，還因為中傷魯迅的「花邊文學」而被批判（魯迅從前的對手周揚倒台後，魯迅被重新評價）。江青這麼説是在暗示廖沫沙是親國民黨的。「花邊文學」一詞來自國民黨的審查制度，他們把魯迅和其他異議人士的文章審查刪除，在報紙上「開天窗」，這是蔣介石的法西斯手法。

江青和彭真的對抗要早於文革的開始。她清楚地記得，到北京市委參加會議，請求彭真允許她給北京劇團提供革命劇本和音樂，未被理睬。很快到了1965年，李宗仁（40年代任中華民國代總統）回到北京，毛澤東設宴款待。江青本想出席宴會前的接見，得知彭真也要參加，她只出席了宴會。宴會上，她鼓起勇氣請彭真到宴會廳外的房間談一談。單獨和彭真一起，她解釋了自己把社會主義引入文藝領域的願望，並舉了張春橋的例子。張是上海市委書記，在江青鼓勵下組織了對芭蕾舞劇《白毛女》和其他革命戲劇的改革。手裏握着劇本，再次要求彭真給她一個北京劇團進行自己的改革試驗。彭真憤怒地抓過劇本，拒絕了她的請求。她把談話向主席做了匯報，主席很生氣。

他們以及持同樣想法的人很清楚：沒有高層的支持，她什麼也幹不了。雖然可以暫時在幕後揭露那些反動作品，重新改編那些尚可挽救的作品，但畢竟不是長久之計。

13

在游泳中學習游泳

當我們學游泳時，不是先學會游泳然後再下水。我們在游泳中學習游泳……當我們進行革命時，也不是先學會革命再進行革命，而是在實踐的過程中學習，或者說，是先實踐再學習，實踐本身就是學習。

人民日報社論1966年8月17日

中國古代的帝王住在與臣民隔絕的豪華宮殿裏，過着錦衣玉食的生活，周圍簇擁着獻媚的朝臣。他們的政令用華麗的語言書寫，通過層層的文人官僚機構（沒有女官）傳達下去。

以平易近人的姿態會見群眾領袖，已成為20世紀革命領導人的特徵。在政治權力之巔，極少會見到女人的身影出現於這樣的場景。江青開始糾正這種男女失衡的局面。她定期離開舒適的家——中南海，發動她信任的同志衝垮社會秩序，把街道變成組織政治活動的場所，用以打擊其他領導人。這樣，她成了革命以來第一位召集群眾集會的女人。她向他們宣示自己的主張，下令出版自己的言論，其中一些還被翻譯成外文。

作為女性，江青的這些行動從來沒有受到官方媒體的重視。然而，她的行動會像她的革命思想一樣受到歷史的重視。其他領導人認為：人民的思想覺悟還沒有進步到接受女人作為國家領袖的程度。

20世紀中葉以來，糧食生產和分配的改善、醫療保健水平的提高和戰爭的減少，使中國人口從 4 億增長到近 8 億。文革開始

時，大多數人的年齡不到30歲。領導人自然有需要向他們灌輸成為一個不安於現狀的、有理想的人，有時免不了還需要他們憤世嫉俗。儘管在外部世界看來，中國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國家，但中國的年輕一代多少都對革命有着更高的期盼。1960年代早期，外國的文學、電影和旅行團在城市中很常見。但從一些領導人苛刻的實用主義觀點看來，這些東西會防礙「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團結人民的力量，需要主導他們的思想，特別是他們的文化興趣。毛澤東和江青都認識到必須根除資產階級思想，年輕人與生俱來的道德責任和魯莽衝動必須引領到正確方向。

建國後的繼續革命，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必須有一個思想把幾代人聯繫起來。誰來從事這項工作呢？60年代中期，毛澤東是一個神秘人物。這一印象掩蓋了他操縱男女大眾及其思想的真正才能。外國觀察家認為，主席不僅位高權重，而且老態龍鍾。但毛澤東1966年7月那次在長江著名的游泳讓他們跌破眼鏡。由一群精力充沛的年輕人保護着游泳，可以多大程度上象徵性地化解兩代人之間的代溝呢？

象徵是不够的。疾病困擾着每個領導人，江青（至少比他們年輕10歲）更感到死亡的危機會改變歷史進程。從延安以來，她從同志們中間脱穎而出的機會在哪裏？在男人們發起的權力繼承鬥爭中，她的遭遇又將如何呢？她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毛澤東呢？

文化大革命不僅源於男人和女人對權力繼承的爭奪，也是不同年齡的人們較量的結果。它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思想和社會的動蕩。很難用簡單的詞語回答它是如何開始的。國外對此也有眾多猜測：它只是（或主要是）一場政治鬥爭或政策爭論嗎？毛澤東和劉少奇確實代表了不同的政策路綫嗎（按照毛的標準，一個是好的社會主義路綫，另一個是壞的修正主義路綫）？

本章以及隨後的章節對江青歷程的回顧可以提供一些答案。江青的言論代表的自然是毛澤東和她支持的勞動人民。她肩上的

擔子也是雙重的：不僅要捍衛毛澤東和他的思想，還要對抗男性主導的歷史，努力在群眾中樹立自己的威望，成為獨立的領導人。

江青的生活背景中有兩個男人。他們的人格和思想對立，如同弗朗茲·舒爾曼所寫的：

> 在文化大革命戲劇性的權力鬥爭中，兩個主要的人物分別是毛澤東和劉少奇。他們被以摩尼教的方式擬化為善和惡，就像古典京劇中人物一樣。局外人無需參加這場演出，或選擇站在誰的一邊。歷史的事實是毛澤東勝利了而劉少奇失敗了，這一點勿庸置疑。他們都代表了中國根深蒂固的力量，都在文革中扮演着主要和不可或缺的角色。文革中最有名的一幅刻劃毛的油畫顯示毛澤東穿着長袍，手持雨傘走在山顛上，周圍是莽莽的群山。即使在1962－1966年期間（那時劉少奇被認為是毛的接班人），刻劃他的也是斯大林時期呆板生硬的俄式風格。毛不斷地强調要「一分為二」，劉少奇則主張盡量把分歧降到最低程度：把鬥爭局限在黨內。

在文革錯綜複雜的「故事」裏，江青出於正當目的，做了許多先導工作。她不願像普通歷史學家一樣徒勞無功地編排歷史情節。她對話題的選擇向我表明：她想弱化惡意的國外媒體對她「激進」和「極左」形象的看法。我索要她60年代中期後的照片，她沒有提供。也許讓外國人最難理解的，是她認為自己的「實際工作」是對國家戲劇的革命。戲劇裏，無產階級的價值觀應該通過戲劇人物來體現，為群眾樹立政治榜樣。

文件的記錄是本章和隨後章節的主要內容。期間，江青的語氣在個人回憶和官方語言之間交替。有時候，她最革命的一面——對群眾發出威嚇，會讓聲音變得特別刺耳。

1

1965年，中國處於三人執政時期。毛澤東象徵性地（不實際有效地）領導着黨。雖然最近受到嚴峻考驗，劉少奇和他的人控制着黨和首都。林彪（長征和解放戰爭中的英雄）統率着軍隊。為了獲取國家領導人地位，江青必須選擇跟隨他們中的一個或多個。作為領導文化領域的第四種力量，她的地位很不穩定。完全依賴毛澤東會被指責為裙帶關係。她的對手劉少奇正在走下坡路，只剩下林彪，他當時的聲譽還沒有像後來10年搞修正主義那樣糟糕。她對他的誹謗表明了這一點。

1966年2月，江青和林彪做了一次公平交易。她用作為主席妻子所獲得的利益（以「文化」為名）換取在軍隊高級指揮機構的一席之地。儘管與革命最高領袖有25年的婚姻生活，她仍不為幾百萬忠誠戰士和大多數群眾熟知。作為男性政治文化象徵的林彪會如何安排毛主席的妻子（長期受到忽視，並做過演員的江青）來擔任其文化事務的最高顧問——表演藝術領域的「先鋒」呢？

受林彪「委託」，江青在上海召開了軍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在那裏，她的工作不受北京政敵們的阻礙。在到達會場前，林彪不安地向與會者介紹：「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談過話。她在文藝問題上的政治立場很堅定。她十分了解藝術，許多觀點都很有價值。你們要重視這些意見，在思想上和組織上貫徹。從現在起，軍隊有關文藝的文件都要送到她那裏去。」

江青準時到達，穿着男式軍裝，這也是她在文革中的標準打扮。面對眾多軍人，她的開場白帶着歉意，讓人想起中國傳統婦女的謙恭。她說健康原因影響了這幾年的工作，沒有勤奮地研究毛主席思想。但她為十中全會起草了報告，奠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基調。在報告付梓前，主席修改了3次。她提醒大家，這份報告强調在全國範圍內開展階級鬥爭，提高無產階級覺悟，清算

資產階級思想的必要性。她最後說，必須批判30年代的「文藝黑綫」，包括「寫真實論」、「現實主義道路論」、「中間人物論」和「反對硝煙味」等資產階級謬論，還要肅清俄羅斯資產階級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影響。

在正式進入新的歷史角色時，江青號召歌頌軍隊的革命功績：「趁領導和指揮戰役的人（特別是林彪）還健在」，着手創作關於三大戰役的文藝作品（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以後，要把文藝批判的主導權從所謂的「批評家，思想錯誤、不懂軍事的人」手中奪過來，交到群眾手裏。「必須改造我們的寫作風格，鼓勵創作短小通俗的文章，把文藝批判變成匕首和手榴彈，在近戰中熟練運用。反對使用術語和行話來嚇跑群眾。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降服那些自封的文藝評論家。」

江青鼓勵戰士們投入一場不尋常的戰鬥：一場旨在打破文人的神秘感和對傳統和外國文化遺產敬畏的階級戰爭。今後，沒有多少文化的樸實士兵將被要求拿起鋼筆、油墨、指揮棒和照相機，開始創作的狂歡，掌握對自己歷史的宣傳。

江青回憶說：在接受軍事任命後的4個月裏，她繼續活躍在上海的其他領域裏。大部份時間和劇作家、演員和編舞一起度過，致力於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每天還要看在主要領導人間傳閱的剪報，關注着國家政治形勢的發展。為了和北京的政治局面保持距離，主席避開了其他領導人和媒體，開始到農村進行考察。初夏時，他來到了上海，和江青一起毫不聲張地準備着下一步的計劃。

幾年來，他們一直不安地關注着這個國家的年輕人。他們知道年輕人可以忠實地追隨他們的領袖，也可以無情地批判他。1965年初，毛澤東告訴斯諾：他不信任知識青年，因為他們「沒打過仗，沒見過帝國主義者，不了解掌權的資產階級」。因此，他們未來會「否定革命」。江青回憶說：從1966年5月開始，她

用了一個多月時間研究運動在大學的發展，特別關注來自南京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北京大學的消息。

到了夏天，江青比以前更有實力採取行動。1月，她被任命為軍隊的文化顧問，5月，毛澤東（當時和中央委員會在杭州）最終對負責文革的五人小組失去信任，因為小組起草的「二月提綱」婉轉地批評了毛澤東和江青所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主席以中央委員會名義召集了文革小組的第二梯隊取而代之。他們都很有能力，並且忠於毛的領導。小組由長期支持主席政策的陳伯達領導，江青和上海的張春橋擔任副手，還包括他們信任的姚文元和康生（唯一來自五人小組的成員）。

江青還在上海時，主席就讓她草擬第二份《五一六通知》。《通知》是對《二月提綱》的逐條批判，後者已在各級黨委成員中傳閱了3個月。她把草稿發給主席做了幾次修改。她說，大部份內容都是主席親自擬定的。

儘管江青在談話中沒有深入談論《五一六通知》的內容，但它值得特別重視，因為它標誌着江青派在1966年春的發難。《通知》以醒目嚴厲的語言譴責《二月提綱》作者（特別是彭真，不包括康生）抵制毛主席在十中全會上發出的號召——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二月提綱》暴露了資本主義右派的「學閥」思想，使用混淆視聽的語言掩蓋階級鬥爭，脱離政治來談論學術和理論問題，鼓吹「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謬論。《五一六通知》的第六點是很關鍵的：「毛主席經常講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此時，對立面的人正在以整風的名義搜集左派成員的黑材料用來打擊他們。《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2天後在《北京周報》上刊載。一年的拖延説明毛對媒體和輿論控制的艱難過程。

1966年5月18日，在杭州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林彪做了「臭名昭著的反政變演講」。這次演講導致在月底再次召開

擴大會議。江青出席，回憶了當時的凝重氣氛，因為劉少奇（彭真和剛受批判的「二月提綱」的後台）出席了會議。會議結束後，江青返回上海繼續文化工作，毛澤東則回到北京準備反擊。

幾天內，中央內部鬥爭擴大到大學校園，進入了公眾視野。5月25日，哲學系女教授聶元梓和她的朋友們貼了一張大字報，批評由陸平（長期受彭真扶持）任校長的北京大學。這次自發的對抗讓毛澤東感到高興，打電話給江青，告訴她在全國轉發這張大字報。6月1日，毛澤東發表了自己的大字報，稱為「中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他的大字報為學生運動的泛濫大開綠燈。

突然間，校園裏充斥着派系鬥爭、謀殺、自殺和暴力。著名的北京大學一直首當其衝。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和1957年的爭鳴運動中，北大都湧現了許多理想主義的和辯才無礙的年輕人。他們發動了學生運動，在大學和社會中，特別在城市中喚醒了左派的政治覺悟。歷史會再重演嗎？

北京大學的情況令江青為難。學生造反（血腥的6.18事件）的性質是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要不要把它作為正面典型在青年中推廣？如同她後來的公開反思所說，匯集的簡報表明局勢很「不正常」。「我驚訝地意識到：一些家庭出身可靠（工人和農民）的人在大字報表示要革命，結果被打成反革命份子。這樣的指責足以令許多人發瘋和自殺。」在我們的交談中，江青再次置疑為什麼有這麼多「好階級出身」的年輕人會自殺，究竟發生了什麼？

6月，學生的抗議活動達到頂峰。「工作組」被派往北京大學鎮壓反革命暴亂。江青記得7月18日毛澤東比她早兩天回到北京。天安門前舉行了大規模集會（可能是有關支持越南，她不敢確定）。為了了解學生的情緒，江青決定訪問北京大學，親自閱讀他們的大字報。劉少奇聽到她的計劃後「拉長了臉」。她及時與陳伯達、康生和文革小組其他成員取得聯繫，並派他們了解北京

大學的情況，然後向主席匯報。在校園裏，她遇見了聶元梓——第一張煽動性大字報的作者。她們一起漫步在明代風格的建築中，觀看牆上的大字報，不時停下來和師生交談。師生們都被江青出人意料的到訪驚呆了。經過幾小時調查，她認為被工作組鎮壓的造反派師生並不是最初簡報中寫的「反革命」，而是對5月底第一次大字報浪潮的革命性響應。早在6月初，主席就指示不要急於派工作組到那裏，顯然命令沒有得到執行，學生的造反行動不應該被壓制。

江青、陳伯達和其他文革領導人幾次緊急訪問北京大學。為避免在聽眾中引發恐慌，他們謙虛地自稱是「學生」，來向他們的「老師」——群眾學習。「必須好好用自己的耳朵、眼睛和大腦來聽取群眾的聲音」，陳伯達說。年長的康生則引用毛主席的話：「只有先做群眾的學生，才能成為群眾的老師」。江青接着說，「我們只是革命群眾的勤務員。」

靠着說服力，他們很快讓學校師生相信工作組沒有經過毛主席授權，是彭真派來協助陸平校長維持校園秩序的。7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解散了工作組，這一做法令毛澤東主義者滿意。他們要求精簡官僚機構，實行更富彈性的教學，縮短學制，招生政策要重在學生的政治表現，而不是學習成績或父母的政治地位。這些都是文化革命的長期教育目標。

2

1966年的8月和9月是社會劇烈動蕩的歲月，特別是對被領導人鼓勵為革命接班人的青年來說。騷亂中，大多數中學、學院和大學被關閉。大約1300萬青年受黨中央的邀請，離開學校，靠徒步，騎自行車，乘巴士、卡車、火車，從全國各地匯聚到北京，集體接受最高領袖毛主席的「親自」接見。

整個漫長炎熱的夏天，江青都在忙於改變自己的特性。文革小組的領導們從前總是躲在幕後交換意見，然後通過報刊公布政策。現在他們成了主席和青年之間的紐帶——多了幾百萬人親眼目睹他們的領袖，可謂盛况空前。多年來躲在他人身後的幽閉與遮掩過後，江青投入到了群眾中，為毛的事業爭取支持。8月6日，她在北京宏大的天壇劇院（文化中心，江青的特別舞台之一）向紅衛兵發表講話。

江青親切說：「毛主席向你們致以最誠摯的問候」。她承認犯過一些錯誤，以後還會犯錯誤，「但我們革命者不怕犯錯誤」。這個主張由她引入了革命行動，隨後的日子裏會被徹底執行。首先揪出黨內「走資派」；其次破除「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第三是貫徹鬥、批、改的方針。或者簡單地說「面對強大的敵人，我們必須掃除一切牛鬼蛇神，我相信你們會做得很好」。

學會識別「鬼神」和「走資派」的年輕人該如何對待他們的父母呢？她的回答被編成了口號：

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造反。

8月16日，在毛澤東接受百萬群眾覲見的頭兩天，江青和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李雪峰、姚文元、康生、張春橋來到北京工人體育場主持「革命學生和老師」的群眾集會。身着樸素的軍裝，他們一行人站在雨中。凝重的天空和革命的暴風驟雨顯得十分一致。江青再一次以讓群眾興奮的言辭開場：「毛主席讓我代表他向你們致意。」

「今天我們身處暴雨之中，不再是溫室裏的花朵」，姚文元疾呼道，每個人都要在「暴風雨般的階級鬥爭」中錘煉自己。他吟咏着文革的贊歌（被認為是對毛主席的歌頌）：大海航行靠舵

手……。

目前的主要任務是在朋友和敵人之間劃清界綫（階級鬥爭至關重要的永恒的辯證行為）。這樣做的根據是「十六條」和毛主席8月8日授意通過的中央委員會公報。決議授權文革小組「找出」左派，並把他們發展成為革命的領導。這樣左派就可以和他們一道揭露反革命份子、右派份子和修正主義份子，批判他們的反黨罪行，完全地孤立他們。

康生有着良好的修養，是秘密警察的頭目。他很善於和學生打成一片。江青也借鑒了他的領導風格。「你們想學習公報和『十六條』嗎」，康生問。「想」，師生們回應道。「你們想不斷地學習它嗎」，「對」；「你們想了解它嗎」，「想」；「你們想掌握它嗎」，「想」；「你們想運用它嗎」，「想」；「你們想在學校的偉大文化大革命中使用它們嗎」，「想！想」，學生們雷鳴般的喊道。康生（像江青後來所做的）對「十六條」的第四條——革命的「自己教育自己」（很快被錯誤地解釋為對無政府主義的認可）給予特別的關注。個人要獨立地開展革命；群眾要解放自己；學生要相信和依靠群眾。他再一次要求群眾給予響應。靠着在其他文化裏可以被看作是宗教式的鼓動手段，康生、江青和毛澤東的其他信徒在群眾的心裏奏響了革命的進行曲，為8月中旬的動蕩譜寫了前奏曲。

「毛主席接見了百萬群眾……」，文章的一開頭報導了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的第一次大規模集會。從天安門城樓上，領袖俯瞰着下面的人群。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這裏還會有類似的集會。林彪元帥（國家副主席）在一星期前被指定為接班人，緊挨着毛主席，旁邊還有江青。江青在交談中沒有具體回憶那不尋常的一天和他們職位的變化。事實上，在群眾看來，她和最高領袖從未如此接近過。

「毛主席來到了人群似海，紅旗如林的天安門。」官方媒

體記述說，「人們面向毛主席，高高舉起手，歡呼雀躍，使勁鼓掌，許多人的手都拍疼了，許多人流下了幸福的眼淚……歡樂的氣氛直上雲天。」群眾代表發表了宣言：

> 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我國發起了史無前例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這是一次具有世界意義的革命。我們要粉碎舊世界，創建新世界，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
> 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到1966年11月，江青參加了8次紅衛兵重大集會中的7次。她不時出現在車隊裏，城樓上和講台上。作為演講者，她顯得輕鬆和自信。在公開的雄辯中結合了對個人的展示。她把自己11月28日對文藝工作者的演講看作是一次重要的哲學闡述。在一連串的病痛過後，她發現自己遭遇到了歷史的不和諧狀況。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卻在編排（或喜歡）鬼戲和表現帝王將相和貴婦的戲，或者在外國的戲劇中找樂趣。如果上層建築不能順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這樣的戲劇會不可避免地「破壞」經濟基礎。試圖誇張地震撼已習慣於外國文化的聽眾，她警告說：

> 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寄生而腐朽。現代修正主義是帝國主義政策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的變體。它們不可能創作出好的作品。資本主義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只產生了可憐的少數「經典作品」。他們（資本主義作家）創作的作品是對「經典作品」的摹仿。他們的作品呆板，對人民沒有吸引力，完全在走下坡路。另一方面，市場上還充斥着許多同樣的東西：搖滾、爵士、印象派、象徵主義、抽象主義、野獸派、現代主義，不可勝數……總而言之，他們用頹廢和淫穢毒害着人民的思想。

經過整個夏天的演講和對革命形勢的把握，她已忽視了自己先前的作品。她為此道歉，並發誓要彌補自己的過失。現在，她開始考驗北京京劇團。它多年來一直處於北京市委的保護下，沒有響應她的無產階級號召。現在他們公開批判剛被解散的北京市委領導人，來表示革命忠心。為了證明這種忠誠，他們必須在朋友和敵人之間劃清界綫，讓年輕大膽的團員「跟隨」她進行表演藝術的革命。那些拒絕服從她領導的資深演員「必須徹底反省，重新開始」。她再次堅持用教育而非暴力的手段：「不要毆打他們，暴力只能觸及他們的身體，説服教育才能觸及他們的靈魂。」

11月28日，北京京劇一團開始轉變，從前北京市委保護下、擁有相對的藝術獨立性，轉而服從文革小組（江青任副組長）和人民解放軍（江青任文化顧問）的領導。她説，團員應該按照巴黎公社模式，在他們中間選出文化革命委員會。北京的各主要表演團體要和軍隊整合，並聽從它的指揮。（好比是五角大樓突然接管了大都會歌劇團和紐約其他演出團體，並規定它們的作品必須受到一個總統女親戚的親自過問。）

促使江青在60年代做出變革的是30年代的幽靈。這個幽靈襲擾着她和她的思想，為國家投下了不祥之兆。考慮到上海的勞工條件依然糟糕，她要取消臨時工和合同工。對勞工處境的關心，與她對文化和政治角色的痴迷相比實在微不足道。60年代中期，毛澤東和江青因為各自原因都感到來自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的輪番挑戰。他們把此歸咎於劉少奇的挑戰和影響。她和毛澤東知道，要想重新奪回控制權，需要創造有利的公共輿論，即要在思想領域佔上風。為了獨佔文化領域，她批判了30年代的普世主義。用她的話説，劉少奇贊賞文化的多樣性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意味着他背離了「人民文藝」，是在「象牙塔裏觀察這個國家的生活」。然而，毛主席告訴我們，文學藝術要服務於「無產階級專政」；作家和藝術家要「和工人、農民、戰士一道深入

到階級鬥爭的心臟」。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思想」不僅體現在夏衍、陳荒煤、蔡楚生的電影裏，也體現在夏衍和程季華寫的電影史中。這些作品讚揚30年代上海文化的優點，並要在60年代繼承和發揚它們。

對30年代電影最全面、最有力的批判出現在1966年3月1日的北京報紙——《光明日報》上。這篇極長的文章《論《賽金花》的反動思想》剖析了這個30年代的所謂「著名戲劇」。它的作者——報紙主編穆欣以後成為文革小組的一員。他表達的觀點更像是江青的觀點。江青對妓女賽金花的鄙視超過了任何一個近代人物。她對夏衍的憎惡也超過了對其他作家和製作人的厭惡。因為夏衍成功地（以公眾眼光看，而非江青的眼光）創作了「賽金花」劇本，並於1936年由40年代劇社首演。

穆欣寫道：即使在30年代，夏衍也是「逆時代潮流」而動。雖然在50年代，夏衍曾被說服批評關於武訓的電影（也是江青發起的），但他仍然為「賽金花」的創作辯護，呼籲「重新審視賽金花的故事」。他「討好外國人」；他的女主角賽金花是「二流的外國惡棍」，因為她和德國人的曖昧關係。他對30年代的外國文化態度溫和，贊成60年代左翼的自由藝術（暗指外國藝術）。在劇本裏，他嘲弄應該被看作為革命者的義和團，把普通中國人寫成妓女、癮君子、騙子和裹腳的女人。這些負面的刻劃暴露他的「民族自卑心理」。憑藉對同胞的羞辱，讓西方文明看起來非常美好。

這些指責在1966年春引發了貫串全年的清算活動。當幾百萬青年在夏天匯聚到北京時，江青和她的文革小組「揪出了首領周揚」和他的「黑幫」，包括夏衍、田漢。對他們的名譽和30年代作品的批判，是為了「徹底鏟除30年代資本主義文學黑路綫」，揭露他們的老底——親國民黨的「國防文學」的「投降主義本質」。「國防」戲劇、電影、音樂的黑旗必須扯下。紅衛兵受命「剝下30年代

國防歌曲的面具」，看一看它們究竟是什麼東西。田漢因為想讓群眾「忘記舊賬」被批判。他的歌劇「公憤」被指控侮蔑在黨領導下進行鬥爭的革命群眾像「可憐而笨拙的牡牛」。

暴力在入秋後開始升級。儘管1966年11月20日通知禁止公眾自發的逮捕、酷刑和審判，但極少受到人們的關注。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了公敵名單，榜上有名的人當月就接受了審判，包括北京市長彭真、夏衍、田漢和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12月12日，他們在士兵的押送下來到工人體育場，有一萬名紅衛兵等候在那裏。就像「封建」時代被公開處決的罪犯一樣，他們的脖子上掛着沉重的木牌，牌上用黑體大字寫着他們的名字，還加着醒目的「X」。當權的領導人在台上高高地看着他們被批判和咒罵。

3

「毛主席向你們致以最衷心的問候」，江青又一次高調發言。這一天是12月19日，這個場合有10萬名士兵奉命來到北京，以同志的方式監督幾百萬在京城扎營已一個星期的青年人。「你們一定想知道毛主席的近況」，江青喊道，「讓我告訴你們，主席十分健康」。

另一個雄心勃勃的政治舉措是：在不同的社會群體（拿着紅寶書，帶着袖標和徽章的青年；衣着笨拙的群眾；穿着草綠軍服的士兵）之間培養同志般的友誼。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滔滔不絕地鼓舞軍隊的士氣。因為戰士的忠誠是貫徹文革政策的關鍵。

「世界歷史上從未有一支像你們這樣的軍隊」，陳伯達宣稱，「有這樣一支由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軍隊，會戰無不勝。一切敵人，無論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或是妖魔鬼怪，必將在你們手裏粉碎。在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領導下，你們真正懂得了如何為人民服務。作為學生，我們希望和我們的老師——你們一

起前進。」

他們被告知：他們的挑戰是組織「革命造反」團體，進行跨行業的革命，在工礦企業和農村公社採取學生紅衛兵那樣的行動。

年底，周恩來總理完全站到了文化革命一邊（可是作為一個傑出戰略家，他很有彈性——隨時準備退出）。他現在的表現是一個矢志不渝的革命家，決不會為個人利益而犧牲原則。5個月以來，大批青年在串連中的衣食住行都靠政府開支。國家已經陷入無法控制的無政府狀態了嗎？周恩來要求他們重拾長征精神，步行串聯。青年人的回應震耳欲聾：「長征精神萬歲！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出人意料地從家庭和學校中解放出來的青年看來要把他們交給新的主人——文革派手裏。激進的演說家點燃了青年的熱情之火，何況他們中還有一位拒絕一切傳統的强悍而迷人的女人。他們砸碎了舊秩序的招牌，重新聚集在解放軍的旗幟下，並在它的領導下為全體人民服務。

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推動歷史的邏輯發展，由初始的修正主義秩序走向新革命的無秩序。遍及全國的武鬥開始出現在學生團體之間、騷動的青年和維持秩序的士兵之間、學生和工人之間。生產遭受極大的損失。文革的首要發起者，也是新局面的第一收益人——毛澤東別無選擇，只有盡力控制無政府主義的猛烈勢頭。

1966年8月，學生運動的發展勢頭漸趨强勁。他們的領導人重提毛澤東1939年的口號「造反有理」。經歷了長期的鬥爭生活，毛澤東對這句話有了限制性的修飾，「造反動派的反有理」——江青在後來講話中給予證實。但陷入狂熱中的學生們仍然在隨後的2年裏使用最初的口號。

一些世界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被引用來形象地描述這場運動。歷史知識貧乏的中國青年被告知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見16條的第九條）是革命的純潔和集體自決的典範。江青長期以來

從電影和小說中感受到法國文化的浪漫。1966年12月，她大力推廣巴黎公社模式，但最終注意到主席對運動保持克制的要求。直到第二年1月，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還在繼續推動巴黎公社式的起義。對激進者來說這意味着「奪權」，不一定要有文革小組的指導。最終不祥的「一月風暴」席捲全國，演變成「一月革命」。

在哈爾濱市和黑龍江、山西、安徽、江西省都發生了奪權的事情，但只有在上海，巴黎公社式的起義獲得短暫的實現。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姚文元親自坐鎮，幫助北京來的學生領袖控制了《解放日報》、《文匯報》和所有的廣播電視機構。通過對媒體的控制，他們把輿論的矛頭指向了上海市委，譴責他們是「經濟主義」、修正主義，並號召無產階級起來「奪權」。自然，正常的社會活動陷入了停頓，工廠的生產、交通、通信、水和電力供應癱瘓。上海以北的鐵路交通被切斷。陳伯達、姚文元主持着這場混亂，他們要求在1月5日建立「上海公社」。新政府的成立受到上百萬示威者的支持。他們湧進城市的街道，高舉着五彩繽紛的標語和紅旗。

上海革命自治的要求導致了城市的癱瘓，激怒了毛澤東和林彪，因為他們對黨和軍隊的有效領導是建立在地方穩定和對革命領導轉換的響應上，儘管這種結合並不容易。1月底，陳伯達、姚文元被召回北京，據說毛澤東斥責他們的無政府主義行為是一種「反革命政治」。為了防止「上海公社」的極端模式蔓延到國家的其他地方，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了。它是第一個為適應新局面而成立的機構，由三方共管：「革命群眾」的代表與地位更高、更穩定的兩方——解放軍代表和老幹部代表。

在幾個月的困難時期，其他地方的革命委員會陸續建立起來，取代了省市政府。考慮到軍隊在轉換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江青在軍隊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加强，1月中旬被任命為軍隊「文革小組」顧問。動蕩時期，對地方團體頻繁的講話表明她為建立革命

領導人魅力而努力着。沒有暴力的進攻，怎樣來維持反對修正主義的思想進攻？這樣做可能會割裂領導和被領導者之間的聯繫。再說，壓制釋放政治熱情的暴力會不會失去革命動力？現在需要這樣的動力來防止社會滑落到從前那種把窮人和女人排除在社會公共事務之外的狀態。

和以前一樣，江青不得不接受主席的批評，跟隨他思想的變化。1966年12月22日，她對北京中學生說：「你們（政治）水平很高，我要向你們學習。我做得還不夠好，共產黨員是什麼樣的人？共產黨員是不怕批評的人。」她告誡學生們要保持冷靜，和大多數沒參加暴力活動的群眾團結在一起。「如果你們要團結，就必須要堅決抵制少數堅持暴力的人。」

1月10日，江青在人民大會堂西會議廳發表講話，繼續文化革命實踐、政治譴責和人身攻擊。她強調：儘管執行「資本主義」路綫的代表人物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政治生涯在夏天之前已經完結，但他們的影響在人們的思想、習慣上還活生生地存在着。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因為堅持丈夫的路綫被痛罵。他們的修正主義經濟思想仍然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地方貫徹。「要在敵我之間劃清界綫」，她繼續攻擊對手，但有了更多的合理解釋。聽眾對她的攻擊性言詞（會讓外國人刺耳）已習以為常。她反駁了最近的指控說：陳毅（受人尊敬的外交家）「是一位好同志」，雖然講了一些錯話，寫了一些「錯誤的詩」，但他不是「兩面派」，不應忘記他在新四軍的出色工作和早期對王明路綫的抵制。李富春（經濟部長、政治局委員、她長期的私人密友）就不够謹慎（她沒有解釋）。李先念（金融專家、中央委員）和謝富治（60年代公安部長、國務院副總理），雖然曾經是鄧小平的下級，但他們都是「好人」。

另一個例子是陶鑄（南方實力派人物、政治局委員、1966年起任宣傳部長），江青說他是「兩面派」。在文革期間的一次集會

上，陶鑄給領導人拍照，把陳毅的頭像剪下，貼到鄧小平的身上。

1966年對暴亂的鼓動逐漸減弱，要求克制在新年裏顯得急迫卻無人關注。江青勸告北京年輕的造反派：革命不是必然和暴力聯繫，不必否定沒有暴力的革命。從批評和自我批評（在談話中不斷被提及的套話）角度來説，革命應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左派要聯合其他的革命團體。那些存在無政府主義和極端民主傾向的青年要得到糾正。除了和階級敵人鬥爭，學生們要學會在思想中運用「一分為二」的辨正法。每個人的思想「都有黑暗一面和光明一面，必須作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的錯誤」。

她敦促離開北京——被彭真反革命陰謀滲透的城市，到工廠和北京周邊地區去，儘管不需要走得太遠。真正的革命者要壓制私利，考慮整個國家的需要，首先要停止無政府行為，交還非法奪取的權力。

4

在建立上海公社的幾個星期裏，江青一直在北京。1月22日，她在對紅衛兵的講話中稱他們為「戰友」，希望他們能以非暴力方式鬥爭。她談話的主題是清華大學。幾個月來，那裏政治分裂的結果是公審、譴責、武鬥和傷亡。她沒有具體提及參與的人物。談話的動機也不單純，涉及的主角是另一個處於政治中心的女人——王光美，劉少奇的妻子。

江青和王光美都是忠實的妻子，自己丈夫事業堅定的支持者。當江青帶着丈夫的指示來到北京大學——自由的文化中心（毛澤東曾和它有聯繫）時，王光美早就代表自己的丈夫來到了清華大學（劉少奇有着濃厚興趣的科研中心）。她們的不謀而合中蘊涵着這樣的假設：只有處在頂峰的男人才能讓觀察家們相信，女人之間即使意識形態一致，也可能成為勢不兩立的私敵。中國人一直認為嫉妒是女人「最敏感的神經」。為了轉移人們的

視線，讓別人覺察不到她對王光美命運所起的作用，江青在談話中對王光美的態度相當克制。她應該還注意到：如果毛澤東垮台，她也會有同樣的命運。如果毛澤東死了，她就會受到那些想鏟除他的家庭和政治路綫的人的擺布。

王光美何許人也？儘管我接觸了一些女性領導人，但沒見過王光美——一個革命的失勢者。文革期間關於她的記錄很殘忍，和事實相去甚遠，但仍可以在歷史的痕跡中尋獲一些真實。這很重要，因為王光美的悲劇表明那些嫁給高官，追逐權力的女人面臨的風險。

王光美才華出眾，善於社交，政治上忠於自己的丈夫（王光美是劉少奇的第五或第六位妻子）。生於美國，王光美回國後就讀於輔仁大學和燕京大學。1946年，她在延安擔任翻譯，結識了一些美國調停人。60年代初，當時江青還沒嶄露頭角，王光美已是公眾矚目的人物。1963年，她陪同國家主席劉少奇出訪雅加達。1966年春，她訪問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和緬甸。由於外交需要，她會臨時脱去樸素的無產階級裝束而代之以時裝打扮，（據說江青反對她帶項鏈），不時參加社交舞會。在國內，她和丈夫一起招待來訪的外國領導人。那時，這樣的做法在社會主義領導人中還不多見。當然，她同樣重視國內的政治。1963年，和10年前江青做法如出一轍，她喬裝來到河北農村，經過幾個月的工作，在四清運動中掃除了地方的腐敗。但文革進入高峰後，劉少奇的罪名一樣落在她身上，包括在農村篡奪毛主席最高權力的罪行。

1966年6月，就在江青訪問北大前夕，王光美代表中央來到清華大學（她們都不是中央委員）。儘管王光美聲稱代表黨和毛主席，但她率領的「工作組」（大約500名從各地抽調的幹部）實際上是由劉少奇（據紅衛兵的報導）授權來鎮壓在校園中製造混亂的左派份子。她不許學生貼大字報，孤立和分散他們。不滿的學生被打成「黑幫」遭到開除。劉少奇在8月倒台後，「工作組」被

逐出校園。數千名激進的師生接管了大學，開始到各地串連支持毛的事業。12月，他們返回清華，以毛澤東第一次組織工農武裝的地方「井岡山」來命名他們新成立的組織——井岡山兵團。12月25日，上萬名師生聚集在校園批判劉少奇。醒目招搖的大字報隨處可見，持續的騷亂變成了春季內戰。不顧毛的命令，學生們繼續通過武力進行思想鬥爭。

在周恩來勸說無效後，1967年4月10日，蒯大富（井岡山兵團首領，被江青稱為「造反英雄」）組織了30萬群眾集會。學校和私設的法庭中貼滿了反對劉少奇的大字報。王光美——毛澤東40年來親密同志的妻子排在隊伍最前面。對她「資產階級」外交生活的典型諷刺是：她身穿緊身的晚禮服和高跟鞋，戴着英國貴族的草帽，脖子上是一串乒乓球大小的骷髏。雖然，我們知道社會主義中國沒有宗教，曾經信仰的巫術和魔咒已被廢除，現在的人群分明向她喊道「打倒牛鬼蛇神！」

劉少奇以略微體面的方式消失了。他主要在身後受到醜化，後來幾年對他的例行控訴變成了一種儀式。但他的妻子是活着的替罪羊和女巫。她激發了人們性別歧視的觀念，獨自承受着他們的狂熱。

14

反潮流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毛澤東《滿江紅—和郭沫若》1963年1月9日

1966年11月，江青警告說，文革領導人不應滿足於對政治錯誤膚淺的糾正，因為敵人的根基很深，司法懲罰是適宜的。「我們不僅要考慮到50天以及16年，還要考慮整個30年代」。「50天」是指從6月初到9月中旬。當時主席被迫離開由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人控制的「密不透風的中央機關」。為保護自己利益，主席向大學和衝突地區派遣工作隊。然後，主席在長江游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重新控制首都，受到了幾百萬紅衛兵擁戴。「16年」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其間，她（有時是主席）還沒有充分掌握應有的權力。30年代是左翼國際主義鼎盛時期。當時，她第一次想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和明星，但沒有成功。

在江青獲得逮捕政敵的權力後，周揚、夏衍、田漢以及最顯赫的政府官員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都被逮捕了。1967年8月5日，10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這些曾受人尊敬的領導人擠在中南海，收聽群眾集會的現場廣播。通往中南海的街道兩側樹上掛着他們的漫畫像。幾天內，這些污辱他們的漫畫被發往全國各地。

在大多數情況下，失勢領導人的妻子和孩子會像過去的罪人家屬一樣沉淪下去。但劉少奇的家庭則很不一樣，甚至還有進步。他的妻子隨他一起倒台，孩子們則在毛主席與他進行的意識

形態鬥爭中平步青雲。

大批判伴隨着新年到來，指控的材料指向其他革命元老。他們中的一些人近50年來一直受到公眾讚揚，其中最令人關注的是朱德。他在政治局有一個長期的名譽職位。有一本早期傳記追述他從一個癮君子、花花公子、軍閥到紅軍創建者的傳奇經歷。現在年輕的檢舉人從中斷章取義地找到「事實」來詆毀他的名譽，爭辯說紅軍完全是由毛主席創建和領導的，從來沒有朱德的份（與可查實的證據不符）。朱德在中南海的住所遭到洗劫，他的妻子康克清（出身女奴的紅軍戰士）被不光彩地游街示眾。

另一個新左派的犧牲品是外交部長陳毅。他獨立的思想、犀利的才智、對片面宣傳的厭惡、對藝術的酷愛、對外交的精通讓迫害者又敬又怕。對他的攻擊始於1966年末，持續到第二年春天，因紅衛兵在4月衝擊外交部而達到頂峰。文件被洗劫，官員被污辱，正常的外交工作被迫中斷幾個月。陳毅的妻子張茜（熟悉軍事和舞台藝術）也因丈夫的所謂罪行受傷害。

那年春天開始，周恩來擔起了陳毅負責的外交事務，與毛主席的黨中央、林彪的中央軍委、江青的文革小組保持聯繫，還與江青一起出席頻繁的討論會和群眾集會。他全力應付這些事情，時常精疲力盡，但指控他和江青的材料仍然出現。誰會這麼幹呢？江青認為是極左份子幹的。

老軍事家譚震林青年時代就跟隨毛澤東，最終站出來為軍隊中遭打擊的高級將領辯護。在江青領導的文革派看來，「二月逆流」是右派對他們成就的攻擊。譚的冒犯換來監禁。他被指控企圖為劉少奇和鄧小平翻案，實現「資本主義復辟」。

當時文革正進入「清理階級隊伍」，為了擴大影響，他們把用於學生的嚴格的紀律標準灌輸給工人和農民。學生對這一套可以很快地學習、實踐以及遺忘。工人和農民接受起來就要慢得多，但一旦改變了思想，他們在新秩序下更容易被管理。

經過幾個月內戰，江青仍然把重點放在上層建築，利用媒體傳播毛的意識形態。除了已取得豐收的革命京劇和芭蕾舞劇，她還努力控制電影，相信電影有潛力成為改造大眾思想最有力的工具。最緊迫和最終的任務是塑造模範的革命人物，她為此花費大量時間指導藝術，要求藝術家戰勝自我，培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毛也有同樣的思想：為人民服務。

1

1966年末，隨着宣傳部的瓦解，文革小組的建立，媒體逐漸落到文革派的手裏。大量的報刊雜誌停刊，幸存的要嚴格遵循毛主席的路綫；圖書發行者50年代末開始恢復30年代自由思想氛圍的努力被突然終止；除經批准的實驗劇目（大部份是江青的樣板戲）外，其他劇目一律被禁演；電影製片廠被關閉，劇作家、製片人、導演和演員受到羞辱和驅離，除經批准的幾部電影外，其他故事片和紀錄片都取消上映。影評人和電影史家的著作被無情地抨擊。在30年代風靡一時的文學、美術和電影被文革小組下令鏟除。

與其他領域一樣，電影的「破」伴隨着「立」。在哪裏能找到電影人才呢？最成熟的電影製作人是那些30年代活躍於上海地下創作的人。由於國民黨統治的無能，他們可以自由創作激進藝術。荒謬的是，當左派為之奮鬥的共產黨執政後，對電影作品的審查比國民黨更嚴厲。

江青的回憶，與她的行為一樣，把意識形態與個人目的交織在一起。以前柔弱的藍萍現在成了大權在握的江青。她終於能把矛頭指向上海從影時的老闆夏衍，他和其他 3 個「家伙」終於被禁錮（顯然是軟禁）。

1967年2月的第一天，江青向兩家已遣散的電影廠代表抱怨：

夏衍、陳荒煤及其一夥（都是被驅逐的電影製作人）整天躺在床上呻吟，其他什麼都不做。戚本禹（擁護毛的政治評論家）向她的一班激進追隨者喊道「把他們揪出來，和他們鬥爭」。其實，此前早已揪鬥了大批電影界人物。

江青斥責說：這些「流氓」拍攝了一組主席接見紅衛兵的鏡頭，狡猾地利用現場的光綫突出劉少奇。所有劉少奇、鄧小平和陶鑄的鏡頭都要删去。他們還想上映一部記錄劉少奇和妻子王光美1963年對印尼那次臭名昭著訪問的影片，宣揚「資產階級宮廷生活」。

她提醒電影製作人：「主席不喜歡被拍攝。我和他在延安認識時就是這樣。現在所有積極的革命攝影師都想拍主席。（除了慶典以外）主席不允許在他工作時拍攝。此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拼命想出現在鏡頭裏，劉少奇更突出，總想直接站在主席身邊，或擺出與主席談話的姿勢。他從來沒想過靠邊站。」

她承認對電影生產的破壞是普遍的。攝像機和器材被查封，國家配給工作人員的汽車被收回，房屋被沒收。這些做法並不都有中央文革的授權。在文革小組指導下，隨着電影生產的恢復，左派的代表必須和電影界的「無產階級力量」聯合起來，和階級敵人進行鬥爭。她繪聲繪色地告誡：「妖魔鬼怪絕不能再翻身。你們必須對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和右派提高警惕。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

儘管左派「被允許造反」，但他們的弱點是無政府主義和內部爭鬥。他們一定不能被右派操縱和陷於分裂。她警告說，右派會挑起群眾互相攻擊。他們看到那樣的局面有多高興啊！

戚本禹回應說：「如果群眾之間發生武鬥，黑幫會在場外鼓掌喝采。」

江青以喜歡的話題——自我為中心的問題——結束談話。革命要改造人的主觀方面，一直是（在訪談中最强調的）她最關心

的，也是她所認為的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她說，革命實際上同時是一種內在和外在的體驗，既是個人也是大眾的事情。如毛主席論證的：鬥爭不僅來自外部——來自我們與敵人之間，也來自內部——來自我們自己人，必須進行反對「自我為中心」的鬥爭。她讀了一段前一天的《人民日報》社論。

我們正同時進行兩場革命——改造主觀世界的革命和改造客觀世界的革命。我們也在同時進行兩場奪權的鬥爭——從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中奪權的鬥爭和從我們頭腦中的利己主義奪權的鬥爭。只有從頭腦中的利己主義那裏奪過權力，才可能取得從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中奪權的全面勝利。

思想的奪權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必須發起鬥爭，要有刺刀見紅的勇氣。發起這場鬥爭的最好辦法是讓自己投入到工廠、鄉村的偉大的無產階級大革命的洪流中去……只有這樣知識份子才能克服他們的缺點，成為革命者。

她的聽眾問：如何形成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的大聯合？

「別要我做指示，我們都是同志。」

「江青同志，請向毛主席表達我們的敬意。」

2

4月12日，是王光美在中南海家中被捕，並在清華大學受到嚴刑折磨的2天後，江青在中央軍委發表講話。她的語調顯示現在已經學乖了，作為一個令人敬畏的妻子和領導人有其道德要求。她的聽眾以毛澤東的繼承人——林彪為首，都是軍事強人，正準備從當前的混亂中獲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在他們面前，江青表現得像一個謙虛謹慎的模範，沒有顯示任何在群眾面前煽動性作風的痕跡。

她把自己定位為普通共產黨員、毛澤東多年來的秘書和從上

一年開始擔任的政治局常委秘書。事實上，文革小組是大陸最具權力的常委會秘書機構。她把他們的工作看作是哨兵和參謀。他們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和其他領導成員提供建議和參考。

她把與主席的特殊關係比作是他在文化和教育領域的「巡邏兵」。她瀏覽報紙和雜誌，把值得注意的好的或壞的材料摘錄下來，送交主席研究。

主席對她要求嚴格，是一位嚴厲的老師，她繼續說，當然不像對其他人一樣親手指導她。她承認非常無知，事實上，現在的一些同志比她更了解主席。

我們一起生活，但他性格安靜，說話不多。一說起來就是關於政治、經濟、文化、國際局勢、國內事物——任何他所想到的。有時也談論社會上的「小道消息」（流傳的正面或負面的謠言），但小道消息不是很多。讓我吃驚的是從「小道消息」中獲得知識並不是很有用，浪費精力。

學問上，不能和其他同志比，她的知識不全面，缺乏系統性。「如果我有什麼優點的話，就是一旦決定學習什麼東西，會堅持到底，把它學好。」

她用一個自己喜歡的歷史故事來說明主席的教導：領導人不應吃老本，要為人民立新功。主席解釋這個故事反映了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過渡時期，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利再分配。

談到他們自己，她說，他們代表的是勞動階級而不是剝削階級。如果不能嚴格培養自己的後代，他們就會退步，某一天就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

出席會議的同志，擁有比古代同等地位的人物大得多的權力。陳伯達經常說自己是一個小小老百姓。她表示自己比起陳伯達來更無足輕重。「權力不可以隨意使用。人們給了我們高官厚祿和極大的權利。如果我們不能立新功，人民還會長久地需要我們嗎？」因此，她告訴負責同志：人民解放軍必須立新功。

她提醒與會者，文化教育在提高人民覺悟時的主導作用。在這方面，過去17年中已犯了錯誤。負責文化教育的人是一些在思想品德和能力上有問題的人。他們的影響，加上從舊社會繼承的「幾百萬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讓國家淹沒在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的汪洋大海之中。她承認，任何階級要想掌握政權，無論是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必須先造輿論。過去對此沒有足夠重視。軍隊領導人現在就應該掌握輿論。

她提出忠告說，不能把孩子當作「私有財產」來對待，應該被當作「人民的財富，人民的後代」。把自己的孩子看成是上天恩賜的人不可避免地會忽視別人的孩子，特別是勞動階級的孩子，認為他們毫無價值。

以我的女兒李訥為例。她在上小學時，有一天告訴我，老師講到一本名叫《頓頓的靜河》的書。多麼可怕的老師啊！我說那是錯的，書名應該譯成《靜靜的頓河》，是肖洛霍夫寫的。「想要我讀給你聽嗎？」我問她。「好的，媽媽」。閱讀過程中，我告訴她要把這本書看成蘇聯的歷史或是戰爭史資料，但它不是一本好書，因為叛徒和反革命在書中成了英雄。「你怎麼能這麼說？媽媽，每個人都說它是一本好書。」她批評我的理由是這本書還沒有受到批判。我告訴她不要把我們的談話講出去。我解釋說，我閱讀過這本書，那只是我的個人觀點。

我認為父母與孩子要平等。不能用封建一家之主的方式對待他們。人們應該效仿毛主席在家裏的民主作風。我們的孩子可以和父母辯論，有時可以刻意反駁他們，但是他們一般不會，因為他們尊敬父母。爭辯是好事，可以讓他們反叛一點。如果他們總說「是，爸爸；是，媽媽」，有什麼好處呢？

3天後是有特殊意義的一天，江青同志回到群眾中來了。負責

公安的謝富治經歷了2年多政治風暴，被任命為副總理，和江青一起出席由他當主任的北京市革委會成立大會。

她宣佈首都「政治形勢一片大好」。革委會是工人、農民和士兵群眾與軍隊、官員三方結合組成的新政權模式，在全國的行政、教育、生產單位普遍採用。他們相信在北京已完成從資產階級手中的奪權。她用慣常的高亢聲調說：「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本主義復辟代理人和北京市修正主義集團的幕後老闆都已被打倒，但社會主義和修正主義之間的路綫鬥爭仍會繼續，要持續進行鬥、批、改，政治局勢不會維持永久的平穩。左派內部要堅持團結，批評，再團結方式，「不惜一切代價避免衝突。」

3

在文革中，出於統治穩定的考慮，毛主席讓自己成為個人崇拜對象。帝王及其寶座是傳統的崇拜對象，毛澤東的做法遠遠超過過去的帝王。主席和其他領導人，特別是林彪都允許斯大林式個人崇拜的盛行。

60年代，沒有其他領導人受到頌揚，並被允許以單行本出版論文和講話，但江青是一個例外。1967年春，她也變成受到群眾贊頌的崇拜對象。不知是因為和毛的特殊關係，還是因為作為領導人的威信？是女强人行將出現，還是五千年父制傳統將要顛覆？作為受男人們尊敬的領導人，她在性別歷史及政治領域有革命性。荒唐的是，崇敬她的浪漫青年和一些老同志稱頌她的是其保守，而不是激進一面。他們欣賞她，是把她當作一個毛的追隨者、忠臣和學生，而不是一個領導人、叛逆和導師。

在一篇文章《向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致敬》中，紅衛兵編輯寫道：

距她（江青）在918事變第一次參加革命已經過去了35年了。這是
麼振奮人心的35年！35年來，她為黨做了大量工作，卻從不拋頭
面。面對胡宗南的猖狂進攻，江青同志陪着毛主席最後一批離開
安。在最困難的時期，她緊密地跟着毛主席行軍，南征北戰，擊
了數百萬蔣介石軍隊。全國解放後，江青同志一直作為毛主席的
書，遵循着他的思想。

這樣的評價，毛主席6年前在廬山照片上的題詩已經給出：

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
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以後的幾個月，善於逢迎的青年以下述紅衛兵評論熱烈地回應：多麼有力，雄壯，令人鼓舞，（毛主席的詩）揭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雄心。在我們看來，這是對江青同志最全面、最完美、最深刻、最生動的刻劃。今天，再讀這震撼人心的詩句，人們充滿了對江青同志無比的感動和崇敬。

1967年5月是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幾個激進的學生刊物把江青搬上封面。以群眾為背景的封面上，江青總是顯出戰鬥的疲憊，右手拿着紅寶書，被書上毛主席頭像的光芒照亮。與革命肖像在一起的是冗長的社論。新北京大學讚揚她是毛「最好的學生」，忠於主席及其文藝路綫的榜樣，有着「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在眾多披露的細節中，江青的一個潑辣習慣是派發她親筆簽名的毛澤東選集，可是沒有提到她在婚姻中對毛的幫助以及多年來無聲地追求男女平等的努力。

不僅年輕人，連老同志也開始歌頌她。德高望重德的作家郭沫若在江青主持的（從前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旁觀者）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25周年典禮上說：

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你善於學習和應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你無畏地在文藝戰綫衝鋒，

讓工人、農民、戰士的英雄形象佔據了中國的舞台。

我們一定會讓英雄形象佔據世界舞台，

中國的昨天就是眾多亞非國家的今天，

中國的今天會是他們的明天，

我們要為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徹底解放而戰鬥！

我們要讓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飄揚在亞非國家，

飄揚在五洲四海！

那個夏天，江青最關注的是嚴峻的政治現實而非這些奉承之辭。這一年，各種社會力量在條件未成熟和有內戰風險的情況下開始戰略集結。人民解放軍主要由工人和農民組成，需要被用來穩定新形勢，同時也構成了長期的挑戰。因為部隊駐扎在全國，也要向地方政府負責。除非站在文革一邊，否則部隊同樣會反對他們。

1966年2月，林彪任命江青為軍隊文化顧問。這一高級職務又因第二年1月被指定為軍隊文革小組顧問而得到加强。兩項任命都凸現了她的公眾形象，捍衛了文革小組的政治領導，使軍隊成為加强毛領導的宣傳機器。

然而，部隊像其他機構一樣，易受小資產階級保守主義和利己主義的侵襲。林彪不能也不願對文革的急劇變化做出反應。1967年的「武漢兵變」發生在中國的工業中心，最令人憂慮中央和地方利益衝突的城市。儘管細節有待研究，但可以知道這場長江大橋上流血衝突的雙方是保守群眾組織——「百萬雄師」和造反派「工總」。以溫和著稱的地方部隊首長——陳再道宣佈站在「百萬雄師」一邊。這一舉動讓林彪元帥感到難堪，並迫使主

席派遣周恩來、王力（《紅旗》雜誌副主編）和謝富治去警告陳再道恢復秩序。正在陳再道部隊支持「百萬雄師」控制城市時，反對毛主義者的兵變突然發生。周恩來設法脫身，王力和謝富治則受到綁架、羞辱和折磨。在他們被釋放後，王力回到北京，獲得英雄般的歡迎。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和康生都到機場迎接。同時，親毛領導人匯集在天安門城樓上，以主席的名義召集「百萬」群眾在城樓下的廣場上示威。

工業中心的軍事叛亂激怒了江青，她突然改變語氣。儘管整個衝突交織的夏天，她都在堅持文鬥高於武鬥，但武漢兵變後，她喊出嚴厲的口號「文攻武衛」。她告誡北京的青年不要象主席以前的代理人一樣目中無人。她號召「拿起武器，保衛自己」。她的急劇變化帶來了中央的反映。一道簡短的命令讓在北京和各省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主要是工人）都武裝了起來，對抗解放軍保守勢力的報復。

這次兵變及其後果，讓文革的領導們面臨着一連串痛苦的抉擇。讓忙於喊口號和游行的青年從軍隊手中奪權、發起內戰的做法明智嗎？逐漸武裝起來的學生們可靠嗎？江青領導的文革小組執行毛澤東思想，將武器分發到數以千計、甚至數以百萬計捍衛他們政治路綫的擁護者手上，這種激進冒險的做法靠得住嗎？毫無疑問，武裝起來的青年很難控制。1976年仲夏，幼稚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地方派系的復仇頻頻出現於各地的報導。受學校停課的煽動，大批學生糾察隊攻擊各種權力機關，包括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受到騷亂的震撼，中央文革小組發佈了一系列指示，其中一些支持暴力，另一些則反對暴力。在現實中畫一條區分文鬥和武鬥的界綫比在意識形態上困難的多。

1967年9月，毛澤東結束了對各省的視察回到北京。他一定勸說了周恩來、江青和她的文革小組保持克制，因為一直在文鬥和武鬥之間搖擺的江青現在又支持文鬥了。

在會見中，江青象對以前的擁護者一樣，向我說明1967年9月是文革的轉折點。9月15日，就是禁止從部隊奪權的通知發佈的那天，江青對安徽代表做了重要發言。講話沒被官方發表，但在群眾中傳閱。她的助手在北京把文章的內容唸給我聽。

「我的老朋友康生把我拉到這來」，江青愉快地抗議。儘管沒作充分的準備，她還是仔細回顧了文革最新的形勢。最近的暴力要比她對聽眾說的更嚴重。為了反擊對她倡導武鬥的指控，她要求大家遵守毛主席的命令：要文鬥，不要武鬥。「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代表們喊道。「向同志們學習，向同志們致意」，江青做了回應。

早在一年前，她就告訴安徽代表團：隨着一個省一個省，一個市一個市地建立革命委員會，一小撮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已經「靠邊站」，喪失了權力。她强調，走資派的領袖比托洛斯基更臭名昭著。沒有使用武力就打倒了劉少奇這樣的兩面派和走資派。如果敵人訴諸武力，她的一邊就會反擊，她本人也會反擊。當然使用文鬥更好：除非絕對必要，不要使用機關槍。

他們當前有3個目標：首先，捍衛毛主席在黨中央的領袖地位（還有其他候選人嗎？）；第二，用解放軍保衛文化大革命（不反對解放軍）；第三，通過大聯合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深入進行鬥、批、改。

她繼續說，極左派是另一類敵人，當然還存在極右份子，企圖破壞黨中央的團結。北京的516兵團是「反革命陰謀組織」，代表着極左和極右兩個極端。反革命份子抓住她的1966年「五一六通知」，並以此為組織命名。這個組織成員很少，而且很年輕。他們中只有少數是反革命份子，大部份是受蒙蔽的青年，如江青所說是「受資產階級反革命領袖的欺騙」。雖然眾多青年在文革中經歷了磨練，但因為年輕所以意識形態不堅定，易受「壞人」的幕後操縱。這個組織的政治色彩具有欺騙性。他們的突出表現

是極左，把周恩來作為最大的敵人，不僅收集材料反對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包括她自己），還散布毫無根據的謠言。造反派領袖對此要保持警惕，教育群眾，阻止這個陰謀組織的發展。

她還警告說：社會上到處是「特務」，中央的檔案顯示：壞份子已經鑽進黨內，儘管他們隱藏了幾十年，最終都會被清除出黨。當然一定要避免自私的小團體主義和「山頭主義」（一種無政府主義）的出現，重要的任務是求同存異（對解放軍內部爭鬥的警告）。

這一年，年青的革命者揪軍隊一小撮引起了反效果（在武漢和其他地方），她提醒說，「你們一定不要落入敵人的圈套」。在武漢的叛亂平息後，他們開始巡視祖國各地。如果不深入地方調查，在正確識別和改造主席的敵人方面，就會犯更多錯誤。在文革的螺旋式發展中，1966年的學生運動高潮已讓位於1967年糾察隊與軍隊的衝突，緊接着是1968年夏工人階級被動員起來，不惜以耽誤生產為代價擴展革命運動。1967年9月14日，江青對新成立的工人和軍人宣傳隊講話，讚揚他們對革命運動的貢獻。經歷了充滿暴力的夏天和中央領導人中的嚴重分裂，她的講話變得謹慎。她呼籲要團結，不要分裂。她說應把7月27日工人階級領導上層建築領域鬥批改的功勞歸於毛主席。堅持武鬥的學生會脱離人民群眾，也會脱離領導上層建築的工人階級。

革別人的命很容易，而革自己的命則很難，江青說，把話題再次轉到自我鬥爭上來。每個人都有醜陋的一面和光明的一面（承認內心衝突，但沒有應用到她的樣板戲中）。如果你不擺脱醜陋的一面，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態度，某一天就會發現自己落後了。什麼是「醜陋的一面」？小團體思想、個人主義、各自為政、無政府主義和聽不進別人的話。

她會見安徽代表的講話是為了「制止邪風」。這是什麼意思呢？1967年秋，還需要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員保持一致。那時候，

多數小組成員不願把自己限於做宣傳工作，而求助於暴力。自然，他們的做法被仿效。反對她制止武鬥的首要人物是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但他的幕後煽動未能奏效。

在9月17日集會上，極左派挑起的暴力事件被揭露。幾星期來一直頻繁地與文革小組一同亮相的周恩來是主講人。陳伯達（江青對他的極左思想有所覺察）和康生也一起出席了集會。溫和派代表周恩來譴責持槍的激進份子是堅持內戰的「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者」。江青總結發言說：前一天，30多個「强盜般」的人洗劫了黨刊《紅旗》雜誌辦公室，還有10個甘肅人强行闖入中南海，進入主席辦公的懷仁堂，在那裏被逮捕了。

强闖懷仁堂的事，引起江青懊惱地提到在和安徽代表見面時，主席正在視察鄉村。主席不在時，敵人指使一批群眾包圍了他們的家——中南海，使中南海無法工作。一個中央委員無禮地給主席拍電報，目的是轉移他對北京危機的注意力。一個徹頭徹尾的叛徒，她憤怒地罵道，然後又嘀咕說，難以忍受的婚姻讓他的生活變得多麼悲慘。當她和主席討論這封電報時，主席說電報有太多王明的遺風。他應該學學孫中山。江青莫名其妙地解釋，主席指的是他和孫中山有很大的年齡差異（27歲）。

在我們的談話中，江青對中國人的民粹主義表示卑視。她說，焚燒英國駐華臨時代辦處就是「516兵團」唆使極左份子做的野蠻行為，是完全錯誤的。文革期間，扣留外國船隻也是完全無理的。

1967年11月，江青已是羽翼豐滿的國家領導人，重新回到文化領域。她對過去 2 年的劇變中忽視了對音樂、戲劇和電影的改造充滿歉意。根據毛澤東指示，在其他單位採用的三結合也要擴大到文化團體。「敵人是狡猾的，他們控制着許多演員群體，你處理了一個群體，他們會用另一個代替」，江青用游擊戰語言警告，因此必須在文化領域作徹底調查。這些要求參軍（也許是全

面文化戰爭中的避風港？）的人一定要有耐心，林彪副主席和軍委對此已做了安排。但只專注於軍隊，會讓人忘記其他事情。

陳伯達讚揚江青關於8個樣板戲以及要把樣板戲拍成電影的講話。他說，講話錄音應該發到全國文化單位。11月13日，一個講話的修訂版被採納為中央委員會的文件。

從中國傳統的觀點看，到1967年末，歷史進程已逐漸從混亂狀態發展到和諧狀態。從文革的觀點看，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綫已被毛澤東的無產階級路綫取代。在江青看來，到11月27日，「形勢大好，無產階級開始掌權」。那一天，她向出席討論會的工人——廣大文革的重要支持者發表了講話。她告訴他們，由於武鬥而遭受損失的工業生產得到恢復，毛澤東著作學習班正在蓬勃開展。雖然學生是首先站出來的，但他們的革命熱忱已經影響到貧下中農（土地改革以來對廣大農民的稱呼）和工人。今後紅衛兵學生將不再干涉工廠事務，違反命令干擾工廠生產的學生要受到驅逐。她再次強調，每一個人都要加入和無政府主義的鬥爭，因為它是污染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

她開玩笑說：人們常講過了30歲的共產黨員是保守的，但毛主席已經70多歲了！這證明年齡不是保守的原因。她樂觀地說，「我在政治上仍然年輕，同你這樣的同志一道工作，讓我感到政治上很年輕。」

4

考慮到革命運動逆轉的危險和推動革命向更高發展的需要，1968年3月，文革領導人召開了大量會議。3月11日晚，周總理、江青、林彪的妻子葉群和其他人會見了北京院校學生和大慶石油學院代表（大慶是中國主要的石油來源，也是未來國家工業的基礎）。4年前，毛宣佈大慶為自力更生的榜樣，倡導「工業學大慶」。然而，現在的領導人指責他們沒有跟上新的政治形勢。石

多數小組成員不願把自己限於做宣傳工作，而求助於暴力。自然，他們的做法被仿效。反對她制止武鬥的首要人物是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但他的幕後煽動未能奏效。

在9月17日集會上，極左派挑起的暴力事件被揭露。幾星期來一直頻繁地與文革小組一同亮相的周恩來是主講人。陳伯達（江青對他的極左思想有所覺察）和康生也一起出席了集會。溫和派代表周恩來譴責持槍的激進份子是堅持內戰的「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者」。江青總結發言說：前一天，30多個「強盜般」的人洗劫了黨刊《紅旗》雜誌辦公室，還有10個甘肅人強行闖入中南海，進入主席辦公的懷仁堂，在那裏被逮捕了。

強闖懷仁堂的事，引起江青懊惱地提到在和安徽代表見面時，主席正在視察鄉村。主席不在時，敵人指使一批群眾包圍了他們的家——中南海，使中南海無法工作。一個中央委員無禮地給主席拍電報，目的是轉移他對北京危機的注意力。一個徹頭徹尾的叛徒，她憤怒地罵道，然後又嘀咕說，難以忍受的婚姻讓他的生活變得多麼悲慘。當她和主席討論這封電報時，主席說電報有太多王明的遺風。他應該學學孫中山。江青莫名其妙地解釋，主席指的是他和孫中山有很大的年齡差異（27歲）。

在我們的談話中，江青對中國人的民粹主義表示卑視。她說，焚燒英國駐華臨時代辦處就是「516兵團」唆使極左份子做的野蠻行為，是完全錯誤的。文革期間，扣留外國船隻也是完全無理的。

1967年11月，江青已是羽翼豐滿的國家領導人，重新回到文化領域。她對過去 2 年的劇變中忽視了對音樂、戲劇和電影的改造充滿歉意。根據毛澤東指示，在其他單位採用的三結合也要擴大到文化團體。「敵人是狡猾的，他們控制着許多演員群體，你處理了一個群體，他們會用另一個代替」，江青用游擊戰語言警告，因此必須在文化領域作徹底調查。這些要求參軍（也許是全

面文化戰爭中的避風港？）的人一定要有耐心，林彪副主席和軍委對此已做了安排。但只專注於軍隊，會讓人忘記其他事情。

陳伯達讚揚江青關於8個樣板戲以及要把樣板戲拍成電影的講話。他說，講話錄音應該發到全國文化單位。11月13日，一個講話的修訂版被採納為中央委員會的文件。

從中國傳統的觀點看，到1967年末，歷史進程已逐漸從混亂狀態發展到和諧狀態。從文革的觀點看，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綫已被毛澤東的無產階級路綫取代。在江青看來，到11月27日，「形勢大好，無產階級開始掌權」。那一天，她向出席討論會的工人——廣大文革的重要支持者發表了講話。她告訴他們，由於武鬥而遭受損失的工業生產得到恢復，毛澤東著作學習班正在蓬勃開展。雖然學生是首先站出來的，但他們的革命熱忱已經影響到貧下中農（土地改革以來對廣大農民的稱呼）和工人。今後紅衛兵學生將不再干涉工廠事務，違反命令干擾工廠生產的學生要受到驅逐。她再次強調，每一個人都要加入和無政府主義的鬥爭，因為它是污染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

她開玩笑說：人們常講過了30歲的共產黨員是保守的，但毛主席已經70多歲了！這證明年齡不是保守的原因。她樂觀地說，「我在政治上仍然年輕，同你這樣的同志一道工作，讓我感到政治上很年輕。」

4

考慮到革命運動逆轉的危險和推動革命向更高發展的需要，1968年3月，文革領導人召開了大量會議。3月11日晚，周總理、江青、林彪的妻子葉群和其他人會見了北京院校學生和大慶石油學院代表（大慶是中國主要的石油來源，也是未來國家工業的基礎）。4年前，毛宣佈大慶為自力更生的榜樣，倡導「工業學大慶」。然而，現在的領導人指責他們沒有跟上新的政治形勢。石

油學院拒絕批判發生在前一年的二月逆流，心照不宣地諒解劉少奇（比毛更認同工業的優先發展）支持的保守勢力。大慶被指責陳列了突出劉少奇而忽視毛澤東的展品。江青譴責他們建立自己的電台和竊聽電話——都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動。她把那些負責人稱為保守的「膽小鬼」。

什麼是文化大革命？3月18日，康生在北京問安徽代表團。他說：「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政治革命，也是內戰的延續，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階級鬥爭的延續」。江青補充：這是毛主席說的。

當時有18個省市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浙江將是下一個。這個省有3100萬人口，環繞着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上海（前一年就被革委會接管）。考慮到內戰問題還未解決，周總理、陳伯達、葉群、康生、江青對到京的浙江代表團强調：他們的省處於對台防禦前沿，因為那裏駐扎着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軍隊，所以浙江也持續地警示人們：內戰還沒有結束。江青和其他人也深信：蔣介石、美國和日本在那裏埋伏了大批間諜。安全專家康生指控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前一年已被審訊和譴責）與美國、日本和蔣介石特務沒有區別。江青激昂地說：王光美是一個「戰略情報特務」。

特務的陰影讓江青揮之不去。不只是江青，周總理和其他人都認為國民黨和外國間諜滲透了浙江。此外，彭真和其他「黨內最大的走資派」也安插了特務。他們中的一些人（根據周恩來的話）在江青到杭州療養時對她進行了「迫害」。

「他們在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住處安裝竊聽器，竊聽電話，像間諜一樣活動」，江青宣稱。此外，浙江的文化很封建，紹興戲到現在還用60歲的女人扮演男人。

康生諷刺地說那裏的和尚、尼姑泛濫成災，這些尼姑都應該結婚。江青插嘴說：有成千上萬這樣的閑人在街上閑逛。

3天後，江青、周恩來，康生與江蘇（另一個具戰略地位的沿海省份，在上海以北）代表見了面。他們再次警告：劉少奇和

彭真領導的保守勢力要復辟，會「翻案」。康生引述江青的話，「敵人不會心甘情願地退出歷史舞台」。有兩種形式的右派威脅着革命運動的發展。那些形左實右的人在1967年下半年給革命運動帶來災難。劉少奇和鄧小平迂迴地安排罪犯（王力、關鋒等人）攻擊江青的文革小組。江青說，一旦他們被發現，「我們就把他們揪出來、掛起來」。那些明顯的右派份子拒絕批判二月逆流，要求恢復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權力。

到了3月末，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校園爆發了衝突，全國城鎮也都有零星衝突。執行毛澤東的指示——建立革命委員會鞏固新秩序——激起極左派出人意料的反撲。這樣的衝突發生在1月的湖南。那裏正準備建立革委會，但受到極左團體「省無聯」的抵制。這可能是由脫離江青文革派的「5.16」份子策劃的。「省無聯」宣言概述了一年前「一月革命」和「上海公社」的主張：譴責周恩來是「紅色資產階級」的領袖；依靠解放軍進行徹底革命，粉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湖南人民公社取代湖南省革命委員會。

這樣，威脅革委會新秩序和軍隊團結的極左派就把匕首投向了革命的心臟：江青的革命派。3月8日的混亂報告顯示：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攻擊了文革派官員，並準備逮捕他們。叛亂得到控制，為了報復這次兵變，江青下令逮捕了國防部副部長楊成武和另外一名高級將領。這一事件在人事上和政治上的影響都具破壞性，因為解放軍認為被文革派利用了。讓林彪尷尬的是，楊成武是受他保護的人，江青的做法直接或間接地讓楊成武和林彪蒙羞。

3月27日，江青召開10萬人集會，向追隨者報告了這場針對她個人的武裝威脅事件。她精力充沛地向驚恐的葉群（林彪的妻子，那年春天她自告奮勇地去統領江青的群眾合唱團）和謝富治（他號召每一個人「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捍衛江青同志」）詳細敘述了右派的挑戰和左派的勝利。在雷鳴般的掌聲中，江青詼諧地提醒聽眾：不久前，學生們還威脅要「油

烹她，絞死她」。

對倒台領導人例行地譴責過後，江青做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宣佈：國防部副部長楊成武因陰謀掌握空軍、從事反革命活動而被逮捕。譚震林（她曾為其辯護，為此她批評自己）是二月逆流的首領，被江青斥責為叛徒。現在他們獲得的證據表明：他和他的支持者妄想「逆轉歷史車輪，進行資本主義復辟」。

3天後，江青、總理和其他主要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江青正式譴責了春天的動亂，特別是對「叛徒和壞蛋」在主席家鄉湖南製造的暴亂，最可恨的是由極左份子組成的「省無聯」。他們的極左觀點從1月以來一直受到抨擊。「省無聯」與二月逆流犯的是同樣錯誤。江青順便還讚揚了在文革中湧現的女將。她說，應該鼓勵更多女將的出現。

在1968年春和地方代表的會面中，3月15日與四川省革委會籌備組的會面至關重要。和江青一起出席的有總理、康生、姚文元、汪東興和葉群。江青以儒雅的口氣歡迎這些代表：「你們是來自遠方的客人」。她稱讚說，7000萬人口和豐富的自然資源，讓四川省可以和歐洲大國相比，但願不會再次成為一個獨立王國。

「是你嗎？李大章同志，」她轉向一個可能35年沒有見面的同志。他很不情願地上前一步。這個曾長期受到尊重的西南局書記已被批判（雖不嚴厲）。周恩來向他保證，他的檢討書不用太長，要勇敢地站出來反對四川省領導人李井泉。他被指控和劉少奇、鄧小平、楊尚昆同屬一個修正主義陣營。

江青自豪地透露了她的黨齡，說是1933年李大章介紹入黨的。「您現在多大年齡？」李大章回答道「68歲」。江青鼓勵他：「讓我們互相幫助，保持政治青春。」

一年來，關於四川動蕩和衝突的報告像雨點般地飛向領導人。李大章說：他們已積累了六、七卷報告，有些總理還沒有看過。最讓總理、康生和江青憂慮的是國民黨的殘餘影響。古城重

慶在日本侵華期間曾是國民政府內遷的臨時首都，現在江青把這裏稱為充滿舊政權、舊社會渣滓和叛徒的「巢穴」。城市的公安、檢察和法院遭透了，反革命份子到處安裝竊聽設備。在李井泉2月發動殘酷的反革命鎮壓時，近10萬人被捕和數目不詳的人死亡。此外，四川還裝備了國家最精良的武器，包括雙管高射機槍。派性鬥爭大量存在，人們對中央指示漠不關心。

「今天我們批評你們，你們明天也可以批評我們」，江青繼續着她假想的戰鬥。她說，和她結怨25年的楊尚昆是一個凶惡的地主，他的家人也都好不了多少。他的妻子和其他「壞人」的妻子都應該「起來鬥爭」。她承認，一些女同志做得很好。她告誡四川代表不要「太封建」，「為什麼不招募更多的女將？」

1968年5月16日，對江青個人和公眾歷史來說注定是苦樂參半的日子。那一天，她正在魯迅家鄉——浙江紹興考察。她對魯迅的紀念因為當地封建和資本主義文化的殘餘而變得苦澀。她發現當初由魯迅發起，一度聚集了戰鬥的無產階級年青藝術家的浙江美術學院變成了畫技粗糙、頑固追求30年代黑綫的反動畫家溫床，戲劇舞台上充斥了上了年紀的女演員表演的古代劇目和鬼戲，大部份戲劇表現的都是「瘋女人、酒鬼、吸血鬼和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紹興地方劇《目連救母》是無法接受的資本主義戲曲，當地的音樂也非常消極。

此後的一年，江青受到黨和軍隊支持，成為更廣闊的歷史舞台的主角，同時也走入表演藝術領域——一個被外部觀察者輕視的革命領域。1969年4月的第九屆黨代表大會上（13年來首次召開），江青被提拔到了最高領導層。過去幾年中受到清洗的修正主義份子和叛徒們（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陶鑄）都已被罷免或逮捕。文化大革命的主題——鬥私批修、擁軍愛民和鬥批改——都被一一採納為國家政策。與她在文革期間最堅定的支持者（謝富治、姚文元、張春橋）一道，江青也進入了政治局。黨

史上的二號婦女人物受到同樣待遇（只用了較少的努力），她就是葉群——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林彪的妻子。

以上是公開記錄，江青後來所稱的狡猾的接班人及其野心勃勃的妻子隱藏很深，江青的憂慮也沒有流露出來。這些憤恨在1972年夏爆發。當時江青為了保護丈夫的政權揭露了林彪的陰謀，並用心良苦地向群眾講述自己痛苦的教訓。

15

林彪弄巧成拙

伊卡洛斯，你高高地飛翔
融化的蠟珠落入大海
我的心和蠟盛接着你，
願你傳授這一教訓
讓預言家知曉
冒名頂替將向下落深淵

阿爾恰托，《象徵》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堪稱中國歷史上最不尋常的演講之一。他用世界歷史上一系列的血腥事例講述了政變，這讓毛澤東警覺起來。他以前並沒有意識到作為一個終生領袖面臨的風險。林彪對權力鬥爭的粗糙分析讓江青感到失落。林彪粗暴的操縱歷史，殘酷手段使江青的身心受損。那一天（還有一些其他場合），林彪剖析了高層的謀殺政治。他的講話暗合他作為繼承人崛起和災難性的結局。

林彪講話的時機和講話本身一樣受人關注。3個月前，彭真和忠於劉少奇的人傳閱了「二月提綱」。提綱勉強接受毛澤東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要求，而在實際上抵制它。他們妄圖利用過去16年來掌握的宣傳文化領導機構，在媒體、教育、藝術領域繼續保持權力。受江青慫恿，毛澤東及其支持者組成新的文革小組取代劉少奇的支持者。中央文革的使命是代表他領導群眾運動。同年

1月，江青被任命為軍隊文化顧問。這一職務讓她可以和林彪密切地打交道，獲得軍隊對她雄心勃勃的文化計劃的支持，也為實現毛澤東長期來對紅軍戰士扮演軍事和政務雙重角色的要求提供了可能。只有這樣，他才能用輿論和武器捍衛自己的想法。5月16日，政治局通過了江青和毛澤東在文化領域發動階級鬥爭的提議。兩天後，林彪在同樣一批領導人面前做了這個關於政變的演說。

林彪用他的筆記詳細列舉了從古代周朝到近代的政治鬥爭史，一直講到了1月的「四家店」——他給劉少奇派系核心成員的綽號，成員有：政治理論家彭真，控制軍隊的羅瑞卿，文化和思想戰綫的最高領導人陸定一；負責人事和情報工作的楊尚昆。

作為一個演說家，林彪與其他同志相比，表現出來的革命樂觀主義和使用群眾宣傳所用的馬克思主義術語更少。他說：「政治權力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革命與反革命無處不在，在我看來，政治權力是壓倒對方的力量。」林彪崇敬地說：毛主席派遣視察員到廣播、軍隊和公安系統的做法已對反革命產生威懾作用。我們都要學習毛主席的做法。

他接着說政變要有兩個前提：一個是要控制宣傳機構——報紙、廣播、文學、電影、出版物；另一個是控制軍隊。當軍事和民眾力量協調一致時，反革命政變就會成功。簡單的說，「奪取政權要靠火藥和墨水」。

1966年春，林彪和江青分別擁有寓意深長的火藥和墨水。在中國傳統政治語言裏，林彪統率着「武」——軍事領域，江青按照毛的授權尋求對「文」——文化領域——的控制。拋開個人野心不說，兩個人都以毛澤東的名義行事，都努力運用他的指示。在和平年代，「文」——道德、歷史、文學和管理藝術——是主要的管理手段。因此，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中國共產黨政府把「文」放到了首位。在中國式共產主義社會，「文」被粗略地等同於「宣傳」——一個全面而又不

含貶義的概念。領導問題就是一個如何控制宣傳機構的問題。到1966年春，林彪被江青的論點說服，她認為在過去的16年裏，對宣傳機構的控制已從毛澤東的手中轉移到他的敵人手中，他們正陰謀陷害毛澤東。

在公眾眼裏，林彪對待所有事物都是一個堅定的現實主義者，除了他選擇敬毛主席為神。林彪稱頌毛是「天才」，說他的思想是「永恒的真理」。林彪像其他幾百萬群眾一樣只是對領袖充滿了狂熱嗎？或者是毛已告訴他要掀起群眾對自己的崇拜（實際上是對毛的神化）嗎？或者林彪在高高的頌揚下掩蓋自己精妙的盤算——奪取權力？

毛澤東心事重重。在林彪發表講話後不久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江青觀察到了這一點。主席的不悅在幾星期後與江青的信中表現得很明顯。當時他正在旅行，江青則在上海進行文化工作。毛澤東在6月29日給江青的回信中充滿了沉思。他決心認識「自己」，也讓江青認識自己。他引用魯迅的話說：他們兩個人都要認真剖析自己的動機，而不是他人的動機。（江青在談話中重複了幾次）。他的腦海中是對「我們的朋友」（對林彪的親密稱呼）的疑慮。毛澤東警告說：

> 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衝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4月在上海還講過。

反思自己處境的危險和有關個人崇拜的矛盾說法，他寫道：

> 我感到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現在就是這樣的大王。那不是指折衷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嶢嶢者易折，皎皎者

易汙。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

在革命的年代，現在叫「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知道給人民恢復君主所面臨的風險。他感到人民需要，但又不敢承認這一點。他清楚地意識到，造王者林彪「吹捧」他（後來加上江青）將會如何使他們落入毀滅。無論毛對林彪的個人動機是多麼懷疑，卻不會立即清除他。他當時沒有認真對待林彪的政變分析，沒有將此看作是林個人戰略的一次暴露。不清楚江青對林彪的不信任起於何時，我與江青會談時，林彪的聲譽已經掃地。江青說，他明目張膽的不忠始於60年代中期。她說，林彪慫恿陳伯達唆使1966年夏成立的「516兵團」，這個最初和江青有密切聯繫的組織，變成了「極左派」。他們鼓動武鬥，而不是江青喜歡的文鬥。

不管江青的事後指控、不利狀態的結束以及派系的分合，林彪的地位繼續上升。1966年4月，在第九屆黨代會上，他被正式確立為「接班人」。當時近一半新入選政治局的人來自軍隊。在那次會議上，主席姓名的官方音譯被改為「Mao Tsetung」，一個簡化格式，目的是讓他在語音上和意識形態上都能與其歐洲前輩——馬克思和列寧並駕齊驅。此後的6個月裏，主席幾乎沒有和林彪一起合影。

這種友好關係持續到1970年9月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這次會議名義上是討論修改黨章。2年後的秘密報告透露，實際上，會議是林彪集團企圖從毛手裏「奪權」的一次試探。在公開場合，林彪仍把「毛澤東思想」捧上天。現實政治是他已贏得大多數政治局成員的支持，包括他的妻子和陳伯達。毛的秘密報告顯示林彪曾想奪取國家主席職位。這一職位自從劉少奇遭罷免後就一直空缺。毛在1958年說過不謀求這個職位，意思是這一職位不需要存在。如果林彪12年後恢復這個職位、並成為國家主席，

他的地位會超過周恩來。此外，他領導的軍隊也會主導黨的事務——這是毛澤東、周恩來的核心基地，也是江青的利益所在。

毛澤東是一個辯證法專家，相信歷史的反復，因此不為林彪的挑戰所動。在毛自述的權力鬥爭周期表中，鬥爭出現的時機是可以預見的。1959年的彭德懷、1965年的劉少奇都在廬山挑戰過毛澤東，現在可以預見五六年後，林彪同樣在廬山發起了「兩條路綫的第十次鬥爭」。

在人類歷史上，可曾有國家創建者的指定繼承人可以確保如願以償？取代「偉大舵手」的機會稍縱即逝，林彪知道很容易受那些想在政治和身體上毀滅他的對手的攻擊。劉少奇的失勢證明毛澤東不屑於與回心轉意。林彪害怕比自己大14歲、身體卻比他健康的毛澤東（林彪是慢性病患者，50年代初曾病休）會「活過100歲」。

為了保持差距以便使自己和毛都滿意，林彪專注於歷史哲理，也不忽視過去的宗教。他知道，毛澤東總是按照本質上自相矛盾的革命原則行事：他必須同時屬於領導人和被領導人群體。在領導一群起義民眾時很容易這樣做。成功使他的擁護者劇增，領導人隊伍也相應地膨脹了。為確保在親密戰友和潛在對手中的領袖地位，他被迫站到了他們的頭頂和肩膀上，更淩駕於群眾之上，儘管在神化個人過程中，他並未割斷與人民群眾的聯繫。毛澤東的舉動不僅源於帝王統治的傳統，也來自斯大林（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者和個人崇拜對象）的影響。毛對斯大林的敬仰要遠甚於斯大林對他的尊敬。在中國提出類似的個人崇拜需要政治策劃，需經毛澤東批准，在第一階段由林彪積極鼓動起來。

思想崇拜的物質形態是外國人所謂的「小紅書」或「毛主義聖經」。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60年。那是林彪被任命為國防部長的第二年。他向中央軍委提出了一套建議，即著名的「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第一；思想工作第一和實踐第一。建

議經毛澤東修改後被稱為「加强部隊思想政治工作」。10月，文件被中央委員會採納，預示了文革中造神運動的來臨。其中一部份還出現在1965年8月1日出版的《毛主席語錄》前言中。該書名義上是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並被一版再版直到1966年末。

江青把1962年看作是文化革命的序幕。這一年，黨和軍隊的合作顯而易見。林彪把毛主席語錄定期以粗體字在《解放軍報》的專欄裏發表。1963年11月，毛澤東仿效軍隊的做法發起類似運動。第二年，林彪把毛澤東的或長或短的文摘設計成士兵可隨身携帶的袖珍書。到了1966年，學生和群眾都開始在首都的政治集會中高舉紅封皮的『語錄』。隨着文革的迅速發展，『毛主席語錄』開始普遍湧現：所有期刊刊首；文藝表演的開場、結束或中場；以大字塗寫在建築物和路旁的廣告牌上；孩子的玩具也未能幸免：木牌上印着整句的毛主席口號和不需攀爬的告誡字眼。在1971年倡導者林彪摔死後的許多年裏，主席的畫像和語錄仍然無所不在。

1970年的個人崇拜達到高峰，毛澤東向斯諾表示了自己置身於歷史之中的看法。他提到讓人民克服3000年來對帝王的崇拜是多麼困難，所謂「四個偉大」的稱號——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領袖、偉大舵手是害人的東西。從長遠看，他最關心的頭銜是「導師」，他早年在長沙時的職業。「有時，我想知道那些最稱頌毛的人是不是『打着紅旗反紅旗』。」

毛澤東1970年的懷疑成了 2 年後江青的「深信不疑」。她把林彪譴責為極左派的秘密頭子——陰謀顛覆主席和她在文革中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她說，不是所有向我透露的內容（夾雜着對陷害她個人的憎恨和報復）都可以記錄，也不是所有向我展示的證據都會成為官方指控林彪的證據（證據的收集過程很可能在她的監督下）。

1

江青繼續她的談話：任何人採取極端方式做事都會犯錯誤。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正確地處理問題。如果曾錯誤地追尋極端的目標，但後來改正了錯誤，那麼他仍是好同志。「當然，如果我犯了錯誤，會做自我批評並糾正錯誤。這麼做不是壞事，實際上是好事。」

江青做作而又饒有興趣地回憶自己在60年代差點成了鬥爭的犧牲品。當時，她被提名到文革小組，替代彭真為首的「五人小組」。一些受批判的「五人小組」成員突然闖入她們的第一次會議。他們揮舞着胳膊，大聲喊叫，顯然要謀殺他們所有的人，但沒有成功，最後都被監禁了起來。

在那場衝突中，誰是「真正的敵人」，誰是「一時的冒犯者」？她最後決定：經過適當程序後，釋放那些企圖傷害文革小組成員、但沒有「嚴重」思想問題的人。一些過去犯過思想錯誤的人「穩定下來」，意思是在站到毛一邊後，他們的政治地位和名譽被恢復了。她說，領導人不會始終對這些「受過衝擊的官員」不滿，只要他們能「正確」對待在文革期間受到的監禁。這些人（依照談話情景，她指的首先是鄧小平）經過鬥批改的艱苦過程「鍛煉」會對人民更有價值。

她承認：那些掌權的人不可能總是公正地對待人們。那些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人包括鄧小平、陶鑄和陳伯達。[78]這3個人既不符合、也沒有堅持革命標準。這個標準是她、毛主席及其支持者在文革期間千辛萬苦恢復的。當被公正履行的權力從毛主席及其最親密同志的手中失去時，這些同志就受到了極右派和極左派的迫害。

一些革命的老同志，包括鄧小平和老將軍葉劍英，沒有把握好革命運動的方向，造成了令人憂傷的損失。她身邊的一些同志

78 在他們被揭露時，鄧小平是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也是劉少奇的支持者。陶鑄是南方一個地區領導人，與江青是戲劇革命的對手。陳伯達是毛澤東思想理論家和江青的文革小組成員。他被江青指控受到林彪極左派的收買。

也犯了錯。敵人把他們揪出來接受公眾的批判，主席和總理試圖保護他們免受不公正的打擊。儘管如此，一些人還是在文革的衝擊下倒下了。這種人的尊嚴以至生命的丟失，要從「一分為二」的觀點去考慮。

一方面，文革對這些受到批判的人是好事；另一方面，自我改造（改造思想）的過程顯然不會很快完成。鄧小平和葉劍英就是這樣的例子。他們的工作和聲譽都會及時恢復——江青在1972年末這樣預言。

雖然不願意說出哪些人受到不公正的打擊，但她同情地提到了老戰士徐向前（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1966年，當他的生命受到威脅時，主席請他和其他有危險的人搬進中南海，直到局勢得到控制。

她說文革帶來了不少損失：生命、財產和工農業生產。工業遭受了最嚴重的挫折，至今沒有完全恢復（1972年夏）。大多數工廠的思想鬥爭變成了公開的戰爭。從國家需要持續生產的角度看，情況是災難性的。農村公社也爆發了爭鬥，但損失要少一些。在幾個月的動蕩裏，領導人強迫自己作出「一分為二」的判斷。他們知道，這場鬥爭對自己沒有好處，造成了生命和財產損失，但從長遠來說是有益的，鬥爭分清了階級矛盾，推動了思想和文化的轉變。文革最重要的「勝利」是轉變了人們的態度。

魯迅的遺孀許廣平在文革期間受到不公正的迫害而死。

我問江青：許廣平為什麼會受到打擊？

江青回答說：那是周揚和魯迅在30年代文學論戰的後果。我得知這件事（許廣平的困境）是有人寄了一封信給我。信是魯迅的妻子寫的，我去看望了她。在會面後不久，她像她的丈夫一樣被迫害死了（1968年3月3日）。她的死訊讓我很悲傷。事情發生時，我正忙於其他事情。如果不是受到「516份子」（江青說，是林彪領導的極左派，而不是兩年前就被罷免的周揚）的虐待，她

也許會活得更久。

「不久，周恩來同志、康生和我去看望她的兒子，他是在政府電台工作的技術人員」。他訴說許廣平是如何被迫害致死的。

出於政治上的謹慎，江青沒有說明對許廣平的迫害是政治、身體、心理，還是其他方面的，可以肯定的是江青對許廣平的善意同情。從淺層次上說，尊敬許廣平是毛澤東和江青因各自目的尊敬其丈夫的一種方式。從深層次上說，與其他無數籍籍無名的婦女一樣，這兩個女人本質上都是由丈夫們發起的政治鬥爭的犧牲品。這兩個女人——很有天份，充滿了政治熱情——在上海30年代激烈政治鬥爭中成熟起來。她們都嫁給了名人，又都活得比他們長久。然而，相對平凡的許廣平卻要按照中國文化政客塑造的丈夫傳奇去生活。外界想知道她是否反抗過黨對魯迅作品的壓制；是否反對過對魯迅最重要學生（丁玲、胡風、蕭軍等）的殘酷迫害；是否反對過江青利用魯迅的名氣打擊她們共同的敵人——周揚。

難道屈從於他人對歷史的裁決和缺乏追求獨立事業的許廣平不是一個負面例子嗎？江青忠於丈夫及其倡導的事業並不遜色，何以如此？和許廣平不同之處，是她在20年前就立下了很高的志向，相信她的力量可以改變歷史。從50年代早期起，江青就開始了縝密地建立自己事業的艱難歷程，刻意與她丈夫的事業區分開來。但毛死後，她像許廣平一樣被迫與他的繼承者以及他們對毛傳奇的肆意歪曲進行搏鬥。

2

在北京的會談中，江青談到了共產主義時代中國宮廷政治的最新進展：「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十次兩條路綫鬥爭。第十次是最嚴重的一次，牽扯的人物是林彪。他不僅設計了許多計劃暗殺毛澤東，而且想除掉所有政治局的同志。他的人畫了我們住所的草

圖，策劃攻擊和爆破，一次性殺死我們。鬥爭非常激烈，這些人很陰險、殘酷、野蠻。他們竟想謀殺毛主席！」

她說：更厲害的是，在那段時期，林彪秘密地控制了他們的住所，在毛主席和她吃的食品裏逐漸添加有毒物質，他們生病了，並不知道病因。1969年的大部份時間，她的病逐漸發展到神經系統，影響大腦和記憶，直到最近才恢復過來。

「他有蘇聯修正主義撐腰」，姚文元插嘴說，「他敗露後和妻子、兒子逃向蘇聯。他完全是驚惶失措，驚惶逃跑，投向敵人一邊。他背叛了黨和國家，導致了自己的滅亡——他的飛機墜毀在蒙古。」

江青繼續說，「總理、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和我本人都站在毛主席這一邊。他們（林彪的極左派）到處放火，我們像救火隊一樣和他們鬥爭，保護老同志。林彪的目的是打倒所有老同志，掌握權力，讓蘇聯修正主義者派軍隊進來。然而，就像毛主席對舒曼部長講的那樣，毛主席只用了一滴酒，[79]林彪就毀滅了。」

江青解釋說：1972年夏進行的批判林彪的宣傳運動，是讓所有年齡層的人學習文革帶來的一個教訓。主席公開這件事，讓人們普遍增強認知能力，學會區分左派、右派和那些左右搖擺的人，以便在任何環境下都畫清階級界綫。最重要的，是這場運動表明林彪不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林彪一慣如此宣稱）。解放軍自始自終都是毛主席領導和親自指揮的。

她說林彪很久以前開始背叛，但沒有解釋為什麼長期以來她和主席沒有採取措施。在1959年被任命為國防部長後，林彪宣稱「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主席不喜歡這樣的誇大說：「一句是一句，有一件事（拒絕設國家主席職位）我說了六句都不聽，半句也不頂。」

林彪不停剽竊他人的言辭。比如，林彪喋喋不休地說：「大

79 把林彪的名字從歷史記錄中抹去。

海航行靠舵手」，過去說是他發明的，實際是從別人寫的流行歌曲中剽竊的。她告訴其他領導人，林彪用這樣重的言辭頌揚主席，讓主席看起來很不謙虛。

關於主席的書《毛主席語錄》，她說林彪沒有任何貢獻，儘管他聲稱做了一些事情。像陳伯達指出的那樣，最初的前言（1965年8月1日）由總政治部簽署，不是林彪的。林彪把前言拿到手後，只是改動了開始和結尾部份，署上名，造成的假象是修改後的前言（1966年12月16日）是他創作的。

江青說她已經讀了兩個版本的毛澤東選集。第一本是由部隊和政治局在1968和1969聯合出版的《最高指示》。她想搞清楚《最高指示》的含義是什麼，和主席相關聯的只有標題和名字。被引述為《最高指示》的唯一作者讓毛澤東看起來是最不謙遜的人。這又究竟是誰的作品？談到「最高」指示，她推斷並暗示說某人在某地正發表「次最高指示」，但沒有人向她或任何人承認他是次最高指示。一些同事（明顯是她的同事）最終設法阻止了第一版的發表。

控制出版社的人（林彪及其支持者控制的解放軍出版社）一直向主席和他的人隱瞞出版計劃。在沒有事先通知主席、總理和她本人的情況下，他們擅自發行了主席的幾部作品。一次，江青聽到另一本手冊的傳言後，請周恩來給她搞一本來。周恩來送來的書名是《毛澤東思想萬歲》，不是一本「小册子」，實際上是一本厚書。她和主席閱讀後，送交其他人徵求意見。他們發現三分之二是林彪的思想，只有三分之一是毛澤東的思想。[80]在他們拿到書的時候，別人也都有了一本，因為它只值6角錢（25美分）。她的那一本（她譏諷地提到）在中南海家裏的客廳裏。她

80 這本「厚書」可能是兩卷本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共966頁，1967年和1969年發行，沒有特別的出版說明，在中國分為四卷。江青所稱的「三分之二是林彪的思想」可能指林彪收集和編輯了三分之二的評價毛澤東的言論。除了北京官方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外，這本書是最全面的收錄毛的演講和文章的書。

很快發現同一本書的幾個版本，這本書向她證明發行這些糟糕書籍的目的是推翻毛澤東。

林彪是國家的叛徒，江青憤怒地繼續她的談話。他們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認識到林彪是物質和精神財富的大「侵吞者」。一些人早就察覺到他過份熱情背後的謬誤。他舉着紅旗反紅旗，後來才知道旗只有一面是紅的，另一面是黑骷髏的標誌。林彪多年來有鋪張的名聲，喜歡大肆宴請及在朋友中派發禮物。事實上是想表明他可以隨意獲得國家的財產並分發掉。（孔子推崇的「入仕致富」被覆蓋以蘇式的唯物主義）。在國家的不同地方，林彪都修建了別墅，用以高規格款待他邀請的家庭。

1967年春，一些林彪集團成員在毫無目的的軍事演習中佔據了四川的一個工廠，並無理地朝空中「萬槍齊鳴」（例行的誇張）。

武鬥也有好的一面，江青以肯定的口氣對我說，從文革的勢頭減弱開始，公開的打鬥不見了。她高興地說這是一件好事情。

但文革期間在遠離北京的許多地方都發生了武鬥。她回憶陝西東南部的一次武裝叛亂。當時是一個夜晚（1967年夏），她正在大會堂的指揮部看文件。周恩來突然走了進來，試圖急於讓她離開這個地方。「回家去睡覺吧」，周恩來催促她。說話的時候，一隊士兵手裏拿着地圖，進入了大會堂的指揮部。為首的是一個老軍人、政委鄭位三。江青後來才知道他也是林彪集團成員。鄭已被授權（可能是林彪）指揮平定陝西東南的叛亂。當時總參謀長楊成武和一個副總參謀長趕到現場，火炮、裝甲車和坑道的挖掘設備都已集合完畢。正當她吃驚地觀望時，一個參謀走過來挑釁地問「江青同志，你知道怎麼作戰嗎？」江青猜測他的用意是想讓她參加這次行動。她告訴他：在毛主席身邊多年的經驗告訴她，不能輕易使用武力。

當天深夜，總理把電話打到江青家裏。他告訴她，應該避免軍事衝突，把注意力集中在對群眾的宣傳上。但是她不得不讓他

理解：群眾和軍人一樣，如果緊張升級，衝突很容易爆發。

林彪的陰謀也卷入她的家庭，但並沒有利用她的孩子們反對她。林彪在文革時期不知出於何種目的，陰謀綁架她的女兒李訥。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讓她好笑，當時的情景卻很緊張。林彪顯然不了解她，他的陰謀對象選錯了人！還有一次，當時李訥正在為《解放軍報》工作（代理總編輯），一些林彪「反黨集團」成員誣陷她要「奪權」。[81]

在文革的困難時期，她讓繼女李敏當上了國防科工委的（負責核項目的發展）一名領導人。國防科工委主任是聶榮臻，同時兼任國防部副部長。那時李敏屬於一個總部設在北京叫「9.16」的群眾組織。有幾個空軍將領把李敏叫到一旁，惡毒地告訴她，江青的錯誤已上報到國防科工委，她與此有牽連，也要承擔責任。一段時間後，1971年江青有一次到青島看望因她而受到錯誤指控的李敏。江青對聶榮臻的態度讓人迷惑。與江青打擊聶榮臻的消息相反，江青確實講過：他應該被保護起來免受不公正的批判。她和孩子以及其他親近的人是一張無盡大網上的幾根絲綫，經常要擺脫由謠言及錯誤結論所編織的這張網。

江青的兩個女兒不畏風險，堅持追隨她們父母的革命事業，而且變得勇敢、獨立、敢於批判了。江青幽默地補充：李訥就曾批評過她重男輕女，李敏也講過同樣的話。

3

江青强調毛主席從來不靠竄改歷史記錄來歪曲歷史，而林彪恰恰相反。作為極左派份子，林彪按照自己的野心竄改相片、電影和其他媒體，甚至美國人都注意到了這一點。在喬冠華訪問聯

81 李訥顯然是由母親派到這一關鍵職位，對軍事和政務有很大的發言權。那時李訥是《解放軍報》總編輯（1967年8月末），而《解放軍報》已取代《人民日報》成為中央委員會的主要刊物。

合國時（1971年11月中旬），美國的電視台放映了毛主席和林彪（可能已死於1971年9月）在一起的鏡頭。但在隨後的短片中只剩下「超級間諜」林彪。那家電視台向中國領導人表明，美國政府做的政治調查範圍很廣（也許不如她想像的正式和殘忍），就連尼克松總統都害怕對他不利的間諜活動。沒人是清白的，她預言式地補充。

活躍在60年代的左派和右派之中，林彪是最狡猾的。他有許多邪惡的計劃，陰謀控制黨、國家和軍隊。一個計劃是利用宣傳機器把毛澤東塑造成將來有可能被打倒的偶像，另一個計劃是制造騷亂。文革中，毛主席曾私下對領導同志，並公開地對斯諾解釋：每一個人都要有「自知之明」。還有幾個場合，他請周總理協助平息蔓延全國的激烈武鬥。

江青離開混亂的北京到上海休息，發現上海完全在林彪集團的控制之下。毛主席的話被醒目地塗滿了城市的牆壁。一個荒唐的場景——毛主席巨大的畫像上用大字寫着他的語錄——激怒了江青。這種庸俗的做法使毛主席看起來像「最不謙遜的人」。當她向負責上海事務的張春橋提出意見時，張警告說：如果主席的畫像和標語被拿走，那麼林彪的形象和姿態會更加凸現出來。但江青堅持要求取下巨大的畫像，只允許謹慎地書寫毛主席語錄。

江青說，因為先前的歷史遺存很容易被有野心的人利用，不是所有的歷史遺迹都需要保留。世界上人太多，不能保留所有的遺迹。這樣，中國領導人開始拋棄一些過去的紀念物。頤和園前和 3 個市中心的大牌坊被挪走。這 3 個牌坊以前樹立在天安門前，讓天安門看起來像「 3 個古怪的小洞穴」。我認為這些很珍貴的，她挖苦地說，因為你們的國家只有兩百年的歷史。鑒於中國有很長的歷史，這些牌坊和門沒有任何歷史價值。再說，容易引發交通事故，所以她號召拆除它們。陳伯達和梁思成反對拆除。他們說，你們攀上紫禁城北面的景山看看，北京飯店破壞了

北京的風貌[82]。

無視她對審美和實際的建言，陳伯達、梁思成和其他人都堅決反對建築的變化，特別是拆除這些牌坊。1971年，江青贏得了最後勝利，牌坊被搬到先農壇附近的陶然亭公園去了。她尖銳地指出：這樣的保護並不能增添牌坊的歷史價值。

但是，真正具有歷史價值的古代遺迹和文物要保存。她提到60年代湖南長沙的考古發掘工作，出土的文物可以追溯到商朝。她說，它們不僅屬於中國人民，也屬於世界人民。處理這些文物總是充滿風險。一些中國考古學家和學生被允許任意地研究這些古代文物，但他們逐漸沉迷於古物，革命熱情自然衰退了。她強調，風險是永遠會有的，但中國領導人從不忽視和破壞任何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話題回到林彪和服務於他的人，江青回憶1970年對北京中山公園碧雲寺令人緊張的訪問。因為她所欽佩的負責文化事務的吳德（彭真被罷免後任北京代理市長）有其他事情，她便由王力（1967年被指控屬於516兵團）陪同。王力是個笨蛋，她厭惡地回憶說，那天表現得很不謙虛。他並不是唯一的一個，在70年代，人們的態度都很壞。

到公園後，王力請她參觀一些佛像。江青提醒他此行目的是尋找奇花異草，帶回自己的花園，但王力堅持看佛像。她聽從建議，隨他到了碧雲寺。因為近視（總是戴着眼鏡），她無法一下子看清昏暗環境裏的一切。王力首先向她介紹祭祀器具和供品，然後參觀孫中山著名的帽子和其他遺物——主要是衣服。最後，江青停在毛主席半身畫像前，她想，畫像一定一直被放在那裏。

她憤怒了，儘管把孫中山遺物和佛像並列還可接受，但沒人有權把毛澤東的形象置於宗教神殿內。她仔細查看了神廟，廟有五、六百年歷史，安放了五百羅漢像——佛教聖徒。她立即命

82　1973年，北京飯店又增添了幾層，成為首都第一座中型的摩天大樓。

令警衛把有關物品搬走，使廟宇恢復原貌。她提醒王力，大批外國客人和勞動人民參觀公園，會使他們對宗教環境裏的主席形象產生誤解，這樣做很不妥當。她的怒火震動全場（她尷尬地笑了），但並不在乎，她想人們應該知道她是誰。她指出王力的安排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1971年的一天，她正在頤和園遊覽，決定登上最高的建築排雲殿，俯瞰湖水、樓台和園林。當她走近這座建築時，驚訝地發現牆上刻着林彪的書法「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每一個字都有6尺高。把自己古怪的字體刻在名勝的牆上，林彪是想對民眾謊稱這是他提出的。實際上，這句話是雷鋒最先提出的。

在她發現這些證據前，毛主席已向斯諾指出吹捧他是錯誤的。他告訴斯諾，這種事不會强加在外國朋友身上，這是領導人的共識，但林彪卻忽視這一點。在注意到頤和園牆上這些粗大的題詞時，江青開始只敢向隨從們曲折地表示「主席有很深的文學功力，他的書法是藝術」。到了11月12日，李作鵬（1966年起擔任政治局委員，據信是林彪的人）奉命到頤和園把林彪刻在牆上的字清除掉。江青突然插了一句說，主席一直反對大國沙文主義，顯然是影射林彪的對外自吹自擂。

林彪反對毛主席、她本人以及支持者的活動，在1971年變得頻繁和激烈。毛主席不斷指示總理處理這種衝突，但他的想法並不容易貫徹。在危機的高峰期，她多次到總理那裏幫助「平息事態」。不斷的威脅、群眾分裂和陰謀活動讓他們難以工作，甚至在家裏——中南海都有敵人的滲透，沒有人可以安全地吃飯睡覺。為了安全起見，主席及其擁護者悄悄撤出中南海，搬進京西賓館，後來又搬到人民大會堂，那裏的一流設施使辦公比較便利。主席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在整個危機期間不得不在大會堂接待來訪者。[83]她說，主席為了粉碎林彪推翻他的陰謀而尋找安全地

83　從新聞稿中推斷主席從1970年1月到1971年沒有在中南海接見過任何外國客

點的事，此前沒有向外界透露過。

4

江青接着說：勝利的領導人把林彪作為反面例子，教育下一代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不堅持學習，人民會不斷被「林彪這樣的騙子欺騙」。

為了消除游蕩於群眾中的修正主義思想，整風運動開始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墜機身亡的第二天，主席辦公室就發起了一場批判林彪的艱巨運動。第二年又發起對陳伯達的批判（1967年因極左受到批判）。主席、江青及其支持者決定先在黨內，然後在群眾中展開。最終目標是批判反黨集團首腦及其支持者。群眾被要求重新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江青說，經過一年左右的學習，這些思想體系在群眾中佔據了應有的地位，群眾的思想被「很好地武裝」起來。大量「惹人矚目的學習」使林彪集團名譽掃地。如果人們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就會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總結經驗，堅持鬥爭。不僅年輕同志，老同志也必須每天學習政治理論。「也包括我」，江青微笑着說。

群眾認真地參加了政治學習，當前的革命形勢「好極了」。「大混亂」過去了，「良好秩序的開端」已經到來（他們描述歷史發展階段的術語）。中國地域遼闊，更多的混亂將會出現，他們必須全力控制未來發展中的問題。

他們面臨着三項任務：第一是外國記者所注意到的，在所有工廠和其他生產單位進行鬥批改。政治的整風不應影響日益增長的生產。後者更容易做到，江青坦率地說。在醫學領域，鬥、批、改運動還沒有開展。毛主席告訴全黨全國人民的第二和第三

人。林彪死後，第一個在那裏受到接見的是1972年2月到訪的尼克松總統。

項任務，是中國決不做超級大國和決不使用核武器。

我問江青還會有第十一次「兩條路綫鬥爭」嗎？

「不可避免」，她回答，我們不是階級鬥爭熄滅論者，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仍然在滲透他們的國家，他們還被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着。

1966年7月，毛主席給她寫了一封包含「英明預見」的信，即被外國情報機構獲取，並在本章開始時討論的那封信。毛在信中說到，他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打倒右派，當然不可能全部打倒。七、八年以後還會有一場「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會有多次掃除。主席明確指出，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們斷定他們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百分之九十五的革命群眾都不會容忍。他在1966年所寫的不是異想天開。他的預言得到了證實。文化大革命僅僅是一次預演。

林彪自己跳出來，證明主席的話是英明的預見（她經常重複的話）。當然，他是在漫長而普遍的混亂已近尾聲時暴露的。單是北京的破壞就損失慘重，一些機構，如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在那裏，政治和學術密不可分）特別受到衝擊，幾乎癱瘓。林彪一夥的滅亡表明，凡是右派越猖獗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的反擊也越迅速和果斷。這些著名大學幾十年來培養了著名的學者和優秀的學生，但也把他們和社會現實隔離開來。這是一次全國範圍內的演習，左、右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每個人都吸取到各自的教訓。對待鬥爭的準則是毛主席的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她說：前一年（197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50周年。兩條路綫鬥爭，每隔 5 年就會發生一次。王明路綫時間最久——總是公開衝突，林彪只專政兩天半（儘管有數年的地下較量），從1970年9月23到26日，在廬山會議上。

到目前為止，文革收穫的成果是什麼？領導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加强「革命骨幹」上。他們可以是中年、青年和老年。只要那

些犯了錯誤的人承認錯誤，擁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就會受到人民的原諒。拿鄧小平的例子來説，他犯了錯誤，但後來承認了自己的路綫錯誤。一旦被「糾正」過來，他和其他類似的人都會變成「人民的財富」。

1972年初，她參加了一些年輕領導人主持的中央擴大工作會議。此後，她還參加了一次軍隊成員的會議。兩次會議上，參加者的精神面貌讓她感覺煥然一新。對林彪的批判、清洗那些受其操縱的人、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深入學習，為這次新運動提供了意識形態機制。人民正在學習新的語言和新的思想。此外，他們都有不斷接受批評的要求。大部份群眾不會頑固不化，會改變他們的觀點。

這種要求改變世界觀的普遍願望，在她參加的一次會議上很好地體現出來。會議的參加者有工人、農民和戰士，還有相當比例的婦女和少數民族代表。一些女權活動家在會上的講話精彩得令人驚訝，特別是來自西藏和蒙古的代表也做了有益的發言。在會議進程中，年輕的同志先講，隨後一些老革命帶着厚厚的參考筆記發表了長篇演講。最後，一些中央委員會成員站出來，發表了很好的講話。這樣的會議讓領導人相信批判林彪及其思想的運動正在深化。

且不論江青對林彪故事的重新編排是主觀的和利己的，觀察家們不應該忽視林彪和江青追求和繼承政治權力之目的的可比性。儘管他們一個工作在軍事領域，一個工作在政務領域，但對領袖地位的追求讓他們成為對手。他們都向群眾表明（直接的或間接的）自己是主席「最好的學生」。從60年代早期開始，他們都依靠這樣的説辭，尋求成為毛思想的貫徹者——在毛死後，這一角色將變得至關重要。林彪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成為意識形態的代表，江青在其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崛起。林彪的辦法是在小紅書中技術性地剪輯毛的著作。江青在文藝宣傳上走得更遠，她

的表演藝術變成了毛思想的載體。她固執地追求對文化控制的最高權力和林彪1966年對她短暫的協助將是下一章的主題。

V

女主人

16

戲劇革命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着舞台。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

——毛澤東《給延安平劇團的信》，1944年

這一切都在一種我不熟悉的音樂支持下，它融合了西方的配樂和傳統中國戲劇的唱腔。——革命，只剩下了博物館和戲劇。

——安德烈·馬爾侯，《反回憶錄》

1972年早春，尼克松訪問中國。江青請他觀看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尼克松看起來很喜歡，問起舞劇的編劇、作曲、導演的名字，同時也向她了解其他中國當前「音樂」的情況。江青告訴他，它們都是由「人民群眾創作的」。這個解釋顯然不能被尼克松接受。她笑着對我補充説，不能指望尼克松理解她在為國家創造新的樣板戲所肩負的責任。

回想1960年代早期，她痛苦地承認：告別舞台多年後，再次突然出現在舞蹈、戲曲和音樂領域，並分擔他們的工作，讓她很容易受到外界批評。正當她快速地在藝術領域行使權力時，人們拒絕與她合作，一些人還陰謀反對她，但他們的敵意並沒能阻礙她向前衝鋒。

從文化距離上審視她，我們也許想知道江青對自己這些舉動

的革命本質有着多麼清晰的認識。沒有人支持，她抗拒的不僅是中國，也是世界的歷史潮流。在戲劇體現意識形態的前提下，她尋求表演藝術乃至全國文化的絕對權威，目的是控制，最好是讓人們的思想革命化。她覺得要有對大眾意識形態的把握，包括大眾的認可，以此作為個人權力和權威的基礎，也作為穩定其忠實追隨者地位的手段。成為京劇的女導演無疑是篡奪了男人的歷史特權——扮演發言人角色。

革命領袖和歷史學家面臨的最大問題，既不是帝國的衰敗，也不是政治革命的災難，而是把思想變為社會態度的過程。在中國，戲劇（外國人熟知的是歌劇）就是媒介。路吉·巴茲尼注意到意大利人把歌劇看做是國家的主要象徵。對這個革命國家裏的中國人來說更是如此。在這個國家裏，馬克思主義已經把政治和藝術之間的意識形態關係推向極致。這兩個國家的人民都情節誇張地重塑歷史，誇耀歷史的輝煌，堅持對祖先的崇拜，不同的只是對傳統文化的容忍程度。意大利人在現代國度裏仍保留了中世紀教堂，繼續支持傳統歌劇在現代生活中的位置。但中國人以革命激情，不僅推翻了「封建主義」的政治構架，而且消滅了存於其中的宗教和社會習俗。為了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新文化，中國領導人毀掉了幾乎全部古代和現代、鄉村和都市的「對手」。茶館、咖啡屋、獨立的地方劇團、私人餐館以及貿易市場都被關閉。說書人、算命先生、流浪音樂家、藝人、馬戲班子都被從街頭趕走。宗教節日、奢侈的婚禮和喪禮、陰曆中的假日慶典都被當作瘟疫一樣地從社會中抹去。

文革以來在位的領導人都禁止對那已經消逝的歷史進行戲劇再創作。隨着經濟恢復和社會開放，人們對音樂、戲劇、公共演出的愛好並沒消失，事實上開始活躍起來。江青及其追隨者創作了一組樣板戲劇目，這些創作建立在社會主義結構和象徵的基礎上。在這幾乎成為文化沙漠的國度，反映無產階級文明的「新生

事物」確實有機會發展起來。人們湧入劇院觀看戲劇和電影，在街頭和牧場唱着抒情歌曲，為外國訪客表演樣板戲片段，甚至孩子（他們沒有迪斯尼和芝麻街，也沒有泛濫的搖滾樂）都自然地融入到革命歌曲中。

和其他地方一樣，中國的意識形態也是通過激情獲得力量。革命誓言不僅用言辭、也用行動來表現。中國人談到文化、道德和政治時，經常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古典劇目表現的一般是勸人向善的儒家思想。嘈雜的大眾劇院宣揚的是民間宗教，經常演出一些中傷儒家統治思想的劇目。 如今革命戲劇仍然教導人們區分善和惡。江青的工作是籌劃把作為社會控制手段的意識形態置入表演藝術中。她的革命戲劇中的男女人物都屬於新的一代。他們道德（也就是政治）優秀並充滿魅力。經過舞台的催眠，人們的日常生活有意或無意地摹仿他們的風格和價值觀。

文革開始後，芭蕾舞、交響樂、雕塑、戲劇等樣板作品，都成為歷史、神話和國家政策領域的偉大實踐。埃里亞德把對傳統社會的觀察應用於中國的革命社會，因為中國正努力為未來建立傳統。她寫道：「神和英雄已從源頭上揭示了生活中所有重要的行為，人們只需要無休止地重複他們的榜樣和例子」。今天的中國，閃耀在樣板戲舞台上的「神和英雄」都來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沒有戲劇表現1920年代革命運動開始前的歷史。沒有哪一位歷史人物受到像毛澤東、劉少奇、林彪那樣的現實表現。舞台只有抽象、概括的人物——他們被說成是大眾的「典型」。英雄們都表現了無產階級的光輝品質；壞人們都是對國民黨和外國敵人缺陷的諷刺。不像起源於地中海的海洋文化，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神話都來自陸地，至多涉及到江河。

中國領導人關心人民對藝術的摹仿勝過了關心藝術再現生活。自然，不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樣，劇院效益不用商業效益來衡

量，而是用政治上能否讓人們循規蹈矩來衡量。戲票很便宜，一張戲票的價格大約是一角（10美分）；馬戲票大概8美分，芭蕾和電影票大概是6美分。兒童只要1美分就可以進任何劇院。如果中國人願意問一問美國劇院的票價，一定會非常驚訝。得知中美票價的巨大差別後，江青說，樣板戲去美國演出時，票價一定要壓低，「以鼓勵大眾的參與」。

1

江青說：「如果想寫中國的藝術，你就必須掌握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正確分析，然後就會理解藝術是如何在上層建築起作用的」。

「上層建築」是江青經常使用的馬克思術語，相當於我們對文化最寬泛的概念：藝術、文學、教育、科學、思想和價值觀等。共產主義理論家認為：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的補充；如果歷史沿着正確方向發展，上層建築也會隨着經濟基礎一起發展。60年代初，關於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變化的協調問題，歷史發展取決於哪一方的問題引起激烈爭論，未解決的爭論在文革得到解決。作為毛澤東的捍衛者，江青為首的一方說：中國的上層建築，特別是在藝術和教育方面沒有跟上經濟基礎變化。如果這種滯後狀況持續下去，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就會「遭到破壞」，「資本主義復辟」就有可能。

到60年代中期，革命戲曲已有了悠久的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傳統。1931年，黨在江西中央蘇區的紅軍大學創建了一個劇院。第二年，高爾基舞台藝術學校成立。蘇聯的影響，通過翻譯蘇聯作家作品以及中共領導人穿梭於上海、蘇區和莫斯科之間而持續擴大。從1933年開始，斯大林推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戲劇運動的消息傳到有「宣傳意識」的中共領導人那裏。在蘇聯影響下，中國的「活報劇」成為在流動舞台上宣傳政治意識形態的慣

常手段。人們也注意到江青1930年代在上海的舞台生涯中演出的更複雜的革命戲劇。在國民黨統治的城市裏，這些左派對「上層建築」的革新並非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

解放後，教育文化機構、土地、工礦企業都分階段地收歸國有。這一過程是緩慢的。文革前，一些公私合營商鋪被允許在經濟中存在，因此一些上層建築，包括私人擁有和管理的公司被保留下來。當然，把劇院收歸國有的工作已經開始。1950年6月，周揚召集了40多位頂尖的戲曲表演者參加戲劇改革的第一次會議。文化部下面很快就成立了戲曲研究所，由張庚領導，目的是促進新部長與各個戲劇演員、歌唱家、雜技演員、音樂家團體的合作。這些地方戲劇的表演者對政府管理一無所知。1952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成立，把話劇（從資產階級的中西結合發展而來）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新戲劇。早於20世紀初，平民戲院政策就被用來提升人們的政治覺悟，這一政策一直被系統貫徹。為了宣揚共產主義和縮小職業藝術家和勞動人民之間的階級隔閡，劇團的演員們一般被分為 4 個團隊，輪流為工人和農民演出。這一模式在文革期間被過度和廣泛地使用。

劃分階級的社會運動裏沒有鏟除古代文化傳統，也沒有隔絕現代文化的引進。1960年代出現了幾千個地方劇團，有些是獨立的，有些受到國家支持。行家們，特別是那些尋求新生活方式的人們，對演出易卜生、奧尼爾、蕭伯納、契可夫、曹禺的作品始終保持着激情。俄羅斯劇作家及其中國學生教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方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觀點是：對精神探索、「放逐」、「遷徙」的演繹都要在國家干預下結束。

50年代初，中央對文化的控制還十分無力和粗糙，現代的、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形式開始結合起來，產生新的戲劇現象。梅蘭芳是傑出的藝術家，擅長在劇中表現高貴女性形象（解放後，女演員才逐漸出現在舞台上）。他的舞台生涯證明演員

個人也可以進行藝術創新。本世紀初，他試驗了在京劇中使用現代服飾。到世紀中期，他扮演的女性享有國際聲譽。共產黨掌權後，他繼續為古老的戲劇增添現代魅力，出版了英文版回憶錄，錄製或拍攝自己的作品，毫不掩飾與好萊塢的友誼。那時候，劇作家的作品使用了遠遠超過傳統戲劇的對白和真實場景。田漢關於武則天的作品、夏衍的賽金花、吳晗關於剛直的清朝官員海瑞的劇本，都是這一新歷史浪漫主義浪潮中的代表。他們的作品建立在對封建王朝歷史的演繹——歷史的回顧，讓他們愛恨交織。

女演員通常被認為道德上靠不住，只有表演受欣賞。江青（她的最終目標是令人尊敬，掌握男性政治權力）難道沒有理由避免在群眾中再現其舞台形象嗎？此外，在中國和其他地方一樣，「文化」從來不是女性主導的領域。多少個世紀以來，男性劇作家、導演、音樂家統治着舞台，最近更是壟斷了舞台。

江青執意追求表演藝術乃至全國文化的最高權力，只能從意識形態方面解釋（也許缺乏心理上的解釋）。在我們的談話中，她回憶1962年被經濟基礎的鬥爭反映到意識形態而震撼。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討論了是否允許她組織對北京市委領導人（他們也控制着全國的文化政策）的評論和批判。她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康生和華東局最高領導人柯慶施的支持。和舊文化衛道經過5年的鬥爭，終於把他們趕出了領導層，並讓年輕的輿論製造者相信她的文化權威是無以倫比的。忠誠的紅衛兵報導和讚揚了她在文化領域日漸上升的地位。她的革命樣板戲被認為是「讓上層建築真正適應了經濟基礎」，「世界無產階級的寶貴財富」，「無產階級文藝的耀眼珍珠，閃耀着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江青同志鬥爭和藝術實踐的傑出作品」。

江青的道路和封建帝王普遍支持藝術，特別是戲劇如出一轍。唐明皇曾在禦花園組建戲班，稱為梨園。後來的皇帝都有類似做法。清末的統治者——慈禧太后痴迷於戲劇，下令在頤和園

修建了一座高大華麗的明式風格的舞台。在那裏經常演出浪漫的愛情悲劇、感人的孝義故事以及宣揚佛理的宗教劇。慈禧並不滿意僅僅作為一個聽眾，偶爾也會與年青的同治皇帝一起穿上戲服，看起來不像平時那麼威嚴。

中國當前的統治者卻沒有這樣的閑情逸致。他們正努力改變封建時代形成的大眾文化特性，而沒有時間用在個人的娛樂，如圖書收藏、藝術品收藏和電影鑒賞上。他們最關心的是人們應該聽什麼、讀什麼、看什麼。

文化革命和工業現代化一樣，共產黨領導人都不能排除西方影響。19世紀末以來——距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還有幾十年——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清末改革家張之洞的名言。他擔心為抵禦強權和振興國家而引進的西方工業和武器會污染中華文化。20年代的胡適是倡導美國模式本土化和漸進改革的開明人士。他強調不能「全盤西化」。共產黨領導人也遭遇到如何平衡中外文化的問題。毛澤東說過「破舊立新，洋為中用」。江青把這些當成批判地吸收傳統文化，在群眾藝術形式中引入外國元素的指導方針，「批判地」吸收意味着擺脫上層建築中的糟粕。

「我們能批判地吸收鬼、神和宗教嗎？」1966年11月，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眾多藝術家時質疑。「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是無神論者和共產主義者。我們不信鬼神。」封建迷信是地主階級用來剝削人民的。「掃除剝削階級舊思想、舊文化、舊習俗的殘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挑戰」。

清朝晚期，保守派深信他們的政治體制、文化底蘊和文藝的豐富，比「野蠻人」西方人優越。當馬克思歷史觀促使現在的中國領導人消滅了「封建」政權和文化傳統後，古代物質文化——遺骨、陶瓷、建築就成了新的民族驕傲之源。他們不僅讚美藝術家和工匠的天才，也讚美它是「人民的創造」。

在為革命紀元進行的文學創作上，黨的多個領導人，包括毛和江青，都承認不足或失敗。中國一個世紀以來對西方愛恨交織的態度沒有改變。1921年共產黨創立以來的中國也並非一無所穫。如果30年代以後的政治環境更寬容的話，魯迅就可能成為中國的索爾仁尼琴，田漢就會成為亞瑟米勒，夏衍就會成為費得裏科費裏尼。他們的悲劇性缺陷似乎是與個人主義相連繫的天賦。魯迅死於1936年，田漢和夏衍死於文革。荒謬的是，文革讓魯迅享有英雄般的聲譽，說他是革命的「倡導者」，一名「共產主義者」，儘管他沒有在充斥着共產黨官僚機構的統治下創作過。

我們必須承認:就現代文化來說，西方的標準要高於我們的，我們已經落後了。在藝術方面也是這樣嗎？藝術上，我們有自己的優勢，也有我們的劣勢。我們必須從外國吸收好的東西來彌補我們的缺點。如果我們堅持舊的做法，不學習外國文學，拒絕把它們引入中國；如果我們不知道怎樣欣賞外國音樂，不知道如何演奏它，是沒有好處的。我們不要像慈禧一樣盲目地排斥一切外國的東西。盲目的排外就像盲目崇拜一樣，都是不正確和有害的。

2

有歷史意識的中國人都會記得孔子的觀察：音樂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音樂用於國家祭祀的伴奏。西周時期（公元前1100－771），射箭的儀式由一支包括七弦琴、笛子、鼓、鐘的樂隊伴奏。國家樂隊在漢朝又添加了更多樂器。經過400多年的分裂，隋朝和唐朝（跨越了公元6世紀到10世紀）都十分注重國家的鞏固和文化的豐富，包括借鑒一些外國特色。兩個朝代的帝王都建立了音樂機構。這些機構試圖把中亞音樂和仍然保留着漢朝傳統的少數民族音樂融合到一起。一千年後的人民共和國像歷代王朝一樣，注重分裂後政權的穩固，承諾對少數民族音樂

或所謂「民間」音樂進行新的研究。這可能是對古典的漢朝傳統和西方音樂元素的綜合：完美地清除了音樂中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暗示。

就在慈禧太后「盲目排外」時，幻想改革的梁啓超卻推崇外國音樂。他發現外國音樂比中國的有力量得多。他認為中國戰鬥精神（在19世紀末外國帝國主義挑戰前暴露無疑）虛弱的一個理由，就是中國音樂的「慵懶」。仿效雅典人建議斯巴達用軍歌激勵戰士，梁啓超議論說，中國人應該想辦法激發人民的勇敢和攻擊性。

到了文革前夕，希望有選擇地借鑒外國和中國古代音樂來强化國家音樂的願望，從來沒有如此强烈過。國家劇變的一個最重要目的，就是為人民的革命意志譜寫新樂章，鼓勵人們團結起來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任務中去。1960年代，江青承擔了史詩創作的任務。她面臨的問題仍然是文化的平衡與綜合。為了追尋文化自强，中國可以容忍多少外國東西？異邦異族的文化精華會給中國的無產階級帶來多大幫助？

19世紀中葉以來，西方挑戰包含着文化、工業、軍事標準的挑戰。經歷了鴉片戰爭的羞辱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幾個勇敢的改革者在1860年代發起了一場建立工業、增强國防的運動。不顧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沒有工業基礎，他們對超自然的能量和力量的追求，被歷史學家本傑明·史華茲恰當地稱為浮士德/ 普羅米修斯精神。唯物論和進取思想是中國共產黨有意識採取的通用實踐準則。土地改革和工業化在物質和經濟領域實現這一準則，1960年代中期的劇變又應用到文化領域。

音樂對頌揚文革是至關重要的。大量從西方引入的樂器和交響樂非常適用於中國當時的歷史，就像一個世紀前引入工業技術和軍事一樣。用柴可夫斯基、李斯特、拉赫馬尼洛夫、貝多芬和斯美塔那的風格整合外國小提琴、中提琴、黑管、喇叭、鋼琴會產生無與倫比的響亮宏大的樂風和絢麗的音色。中國舞台音樂的浮士德

/普羅米修斯精神反映了無產階級的願望、鬥志、財富和力量。

在討論文革音樂基礎時，江青對我說，中國人過去常常瞧不起自己的音樂遺產。一聽到西方音樂，就會不加思考地認為優於自己的音樂。他們也沒想過音樂可以是創作的。經歷幾十年西方音樂的熏陶，一些人突然明白了這是國外的資本主義在發揮影響。稍稍放鬆一下她恪守的馬克思信條，江青說，有許多東西需要從西方音樂中學習，幾代中國音樂家不知屈辱地把精力放在掌握外國音樂和樂器上。他們對外國音樂的熱情讓中國有了太多的音樂家。鋼琴家多如牛毛，儘管其中也有多才多藝者。說句玩笑話：中國比任何國家有更多的李斯特。

江青繼續說：她沒有廣泛地聽過西方音樂。在60年代開始學樂譜前，她不能流利地讀譜，但多年來一直相信中國可以在外國音樂基礎上，發展自己的音樂文化。

她邊說邊舉起一個拳頭，「用手中的鐵錘破除一切陳規舊律」。她的言辭在音樂圈中激起强烈爭議。人們通常認為，一首交響樂應有4個樂章；另一些人認為要有8個；還有人認為，所有的音樂都應該是交響樂；其他人傾向於獨奏或尋求聲樂為主導。

江青的音樂生涯並不平坦。年輕時在天津戲劇學校開始接觸樂器，包括學了3個月鋼琴。她回憶：儘管老師關心她，但在鍵盤旁是一個嚴厲的訓練者，經常敲打她的手腕來糾正姿勢。她不喜歡這種做法，所以從未獲得完整的音樂基本訓練。在尼克松1972年春訪北京前，江青被告知尼克松鋼琴彈得很好。她當時沒敢告訴他自己也曾涉獵過。「你是第一個我認識彈過鋼琴的外國人」，她笑着說。

幾年來，從1964年開始，她訪問了不同的音樂學校，花了很長時間聽獨奏音樂會，認真研究外國樂器是怎樣構造和演奏的。觀看單簧管、歐巴、笛子和其他樂器的獨奏、合奏、交響樂的編排。她開始喜歡這些樂器的多樣性，及其與中國樂器合奏的

潛力。她承認，把這些變革引入深奧的音樂領域並不容易，也知道優秀音樂家對她的不屑一顧，因為她缺少正規的音樂教育。然而，他們不敢貶低她的明確目標——把革命引入音樂領域。

她開始致力於喚起音樂家的熱情，讓他們努力把音樂變成革命媒介。她發現他們多數是名義上支持，沒有更多實際行動。中央交響樂團指揮李德倫（受訓於上海，在延安入黨）和殷承宗（20多歲，曾在列寧格勒學音樂）都給江青寫信表示，一定要創作革命的音樂。直到他們的領導人有所行動，這些信才變得有意義。江青知道他們崇拜西方音樂，決不會放棄，因此迫切希望衝擊他們屈從的外國音樂。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她和他們一起工作，直到逐漸掌握創新的演繹方法。

雖然擅長演奏，李德倫、殷承宗及其同事對音樂創作卻一無所知。為了創作革命音樂，江青說必須衝破東西方音樂的壁壘。她事前不聲張地來到中央交響樂團排練場。李德倫聽完江青的評價後，驚呼「你在用錘子敲打我」。那些回憶使江青很高興。李德倫是誠實善良的，知道江青的嚴厲批評很有幫助。江青補充說，多年來，李德倫和殷承宗一直炫耀外國音樂，對政治漠不關心。

李德倫就這樣學會了合作，及時向她遞交由「出色作曲家」創作的作品，（這些作品是從和他合作的人中選出的）。最初的作品包括《鋼琴協奏曲黃河》和《交響音樂沙家浜》（根據革命樣板戲《沙家浜》改編）。這也是文革期間創作的兩部重要音樂作品。作品最初受到外國影響的玷污，但在她指導下，經過修改都成為樣板作品，她承認作品還不完美。改編成交響樂很困難，她不僅要與音樂創作人在觀念上鬥爭，還要與譜寫細節的作曲家鬥爭，最後還得與演奏者鬥爭。當她要重構《鋼琴協奏曲黃河》時，作曲家和演奏者表現得很刻板，不知道如何下手。首先，她招募的歌手拒絕批判早期的音樂信條，江青不得不「敲打他們」，直到他們覺悟。

《鋼琴協奏曲黃河》源於早期冼星海在延安創作的《黃河大合唱》。她也參與了，因為當時正在「魯藝」工作，但後來發現大合唱包含一些「不健康」內容。這些「不健康」內容已被從現在的作品中刪去，江青連忙補充。個人經歷啓發了她促進音樂發展的思路。解放戰爭中幾次穿越黃河並一直到達上游，使江青對黃河的形態和運動有了真實感受。她也曾多次參加黃河岸邊的戰鬥。為了讓殷承宗準備鋼琴獨奏，她派他重走毛主席領導的長征之路。這樣，他就能以音樂把握當時西北老一代革命者的戰鬥精神。

在她指導下，原先有着明顯外國音樂情調的《黃河大合唱》被淨化了。變革的每一步，她和助手們都要汲收群眾看法，然後對作品進行修改。這也被應用到《交響音樂沙家浜》和鋼琴伴奏京劇《紅燈記》。兩部戲都不斷修改以達到理想的演出效果。

3

托馬斯·傑佛遜在19世紀講過「現在屬於活着的人」。每一代關心他們同胞命運的革命者都有相同看法。毛澤東類似的言論是在延安一個朋友葬禮上提出的「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被喜歡口號的領導人應用到眾多方面：教育、科學研究、公共衛生、軍事和官員行為。60年代，江青把這個口號變成衡量表演藝術創作的唯一標準。

構思和創作革命樣板戲，江青得不到毛的實際幫助。毛的文學才能展現在詩歌散文方面。60年代江青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已經習慣尊重自己的舞台知識，還不時嘲諷自己曾被資產階級文化的舞台俘虜。

江青的無產階級交響樂和戲劇創作沿用了數百年的傳統：根據當代興趣改編經典模式。如同節奏給詩歌增添魅力一樣，古典戲劇形式要給革命化的劇院帶來張力。中國人民適應了一定形式

保留下來的古典和民間戲曲。唱腔、節拍、演唱風格、雜技、誇張的形態都被搶救下來。為了一個陌生的演出目的，給觀眾一個他們熟悉的戲曲形式。雖然西方對舞台、佈景、道具的改革以及把樂隊從舞台搬下來的革新看起來似乎很古怪，但中西合壁會比純粹的話劇（沒有歌唱和舞蹈，只有對白）更容易讓大眾接受。

文革期間「先破後立」的口號被廣泛用到表演藝術和其他眾多領域。戲劇是語言而非身體的鬥爭。江青及其支持者引發的浩劫禁止了各種娛樂形式——音樂、戲劇、電影，卻催生出一批挑選的模範劇目——樣板戲的誕生。「樣板」（指「模式」或「模範」）一詞的演變有着政治意義。1950年代後期，「樣板」指的是「演示田」，「大躍進」中為被廣泛仿效而建立的農田。這樣，「樣板」這個「模範喜劇」的術語就從經濟基礎上升到了上層建築。其含義是大眾娛樂和農業生產都要一個模範代表，但會隨着革命領導人及其時代而改變。

到1968年文革開始衰落時，一共創作了8個樣板戲：4部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和《奇襲白虎團》；2部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以及《鋼琴協奏曲黃河》。此外還有表現中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舞台雕塑《收租院》。每一個樣板戲的出現都是新聞頭版渲染的國內大事，同時黨刊《紅旗》也會作哲學詮釋。8部「革命經典」也逐漸擴大到繪畫藝術。最矚目的是一幅油畫肖像（形式是西方的），畫的是20年代的青年毛澤東穿着藍袍去安源煤礦調查工人的勞動條件。

在文化破壞速度超過文化建設的幾年裏，江青不斷為新戲曲模式的局限性作辯護。她在1967年的一次談話中說：如果新戲劇像以前那樣匆匆拼湊而成，「人民會打倒我們」。現在最好讓這8個樣板戲統治舞台，因為它們沒有帝王將相和資產階級。芭蕾和交響樂也做了改革。她說「雖然它們還有缺點和局限性，需要進一步改進，但至少我們已經引起了轟動，震驚了世界」。

江青和她的專家助理們無疑是激進文化變革的領袖：他們感到急需破除游蕩於個人才智中的資產階級觀念，培養集體創作的無產階級思想。這個想法來自列寧的民主集中制，是60年代被廣泛應用的政治俗語。在《關於京劇革命》（1964）的演講中，江青讚揚了上海市長柯慶施推行的「領導、創作人員、群眾三結合」做法。領導確定主題，劇作家在體驗現實後再創作；在舞台排練的每一階段都吸取群眾意見。8年後，在我們的交談中，她顯得更嚴厲，「所有舞台作品都要聽從群眾意見。好的意見要聽取，錯誤的要拒絕，不能決定的暫時放一邊。我們將此稱為更廣泛意義上的民主集中制」。

如果這是民主集中制，那麼對話劇又會採取什麼做法呢？我問她。

江青乾脆地回答：文革期間，她一直試圖修改一些話劇，但沒有得到足够的合作。

作為戲曲界「脊樑」的作家、製作人、演員，他們的價值觀和演出風格形成於30年代和40年代，當時的政治氣候很不一樣。他們中的一些人名義上是共產黨員，實際上是叛徒和國民黨密探。儘管這些戲曲界名流像其他人一樣居住在延安窑洞裏，可一旦回到他們喜歡的城市，就重新開始舒適的資產階級生活。豪華的房子和傢具使他們不可能符合廣大工人、農民和戰士的需要。為了改變他們的態度，她耗費了多大精力啊！江青感嘆道，長期來看沒有多少效果。

儘管有些劇作家的生活方式難以改變，對創作不感興趣，那麼還有其他人可以為當前的目的去重新創作中國或外國話劇嗎？

這取決於話劇的性質、劇作家改革的意願以及演員適應新角色的能力。她說，現在大部份劇作家都已經不再享受庭院裏的奢華。他們與領導人一起深入到作品需要表現的群眾中去。創作話劇的首要問題是一個領導能力的問題，要掌握在適當的時間施加

適當的壓力。領導人應該支持話劇的復興和改造，她自信地說，「一旦他們的視野開闊起來」。

她推動創作樣板話劇始於1960年代早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期（也是林彪主導軍事時期）。當時，她希望重新排演幾個軍事題材的新話劇。其中一齣是關於年輕的軍隊英雄——雷鋒的（他在1963年犧牲後開始被歌頌）；另一出是關於長征的，第三出是《南方來信》（關於美帝國主義在越南的政治情景劇）。這些戲劇最初沒有多少價值，因為沒有用有部隊生活經歷的劇作家去創作。早期版本中的演員缺乏軍事閱歷，只會在舞台上走闊步，炫耀與軍人無關的城市習氣。他們的表演和政治是多麼不相干啊！

江青强調：把故事從一種類型改編到另一種類型，從小說到話劇、歌劇、電影（雖然不一定是這樣的順序），已有幾百年歷史。她發現當前戲劇和電影是最受歡迎的媒介。因為觀眾熟悉戲劇的形式，對內容的大幅變化也是接受的。從長遠看，電影更經濟，可以很容易地發行到中國眾多而分散的人群中去。

從一種類型轉變到另一種類型不可避免會引起抵觸。她提到一部最初叫《長城》，後來改名《南海長城》的作品，從話劇改變成歌劇。文革期間，劇作家同意把劇本送她過目，也接受她做的改動。但到導演手中時，導演以「革命」的方式抗議，對江青要求改進的地方不理不睬，還故作姿態請她導演。江青說，如此頑固的態度，説明她是一個反革命份子。

她繼續說：挽救話劇的失敗是領導的失誤。領導人被動地認識人民主導着戲劇，是戲劇的創造者，但脫離「實際經驗」使他們不熟悉人民的生活。一些演藝界人士非常懶惰，不願承擔新的創作任務[84]，年輕人較容易改造。領導人逐漸意識到要鼓勵有經驗

84 張穎插嘴說：最新的樣板戲《龍江頌》一開始是話劇，現在被改成社會主義主題的京劇。她把中國表演藝術現狀與蘇聯做對比說，蘇聯的舞台多年來一直被十月革命老戰士佔據。當無產階級革命被搬上舞台時，那些內戰時期的演員已經變得衰老、肥胖，不能擔當新角色。斯大林時代的文化當局由修正主義者控

的老劇作家、導演和演員不要喪失良心，作品要跟上新的形勢。

60年代早期，沒有人支持她對戲劇的改革，只有柯慶施和她站到一起。對《年青的一代》的修改沒有成功，江青把劇本交給了柯慶施，讓他以市長名義要求上海劇團演出修改後的劇本。在上海的版本裏，人物表現的對比還沒有成型，也就是先進人物沒有在政治上壓倒反面人物。舞台設計也出現了一些問題——背離了傳統的舞台設計。其次，她注意到儘管在努力培養有經驗的演員刻劃人物的無產階級品質，丟棄矯揉造作的保留劇目，但他們仍然荒唐地享受着過去的高工資。領導人對這種不公正引起注意，演員們驚惶失措，害怕失去工作，其實那是不可能的。即使在1968年後，演員與其他專業人員、政府公務員被送到鄉下「五七幹校」進行政治再教育，仍然領取縮減的薪水。

人們經常譴責她投入到不可救藥的話劇改革中去。她提到解放軍排演的一部話劇《萬水千山》。第一次上演時，有人打電話給她，希望她去看看。在文藝評論家、解放軍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陪同下，江青觀看了演出。她發現該劇並不討好，因為政治取向不明朗（不好也不壞）。幕間休息時，她問陳亞丁舞台上塑造的戰士應該理解為「個別」類型，還是「普遍」類型。令她不滿的男主角是中國軍隊的「典型」嗎？

《萬水千山》作為話劇有許多問題，她想應該把它拍成電影加以補救。因為所有的電影製作在文革期間都已停止，她幾近絕望地為新電影尋找着腳本。她把想法告訴周總理，周總理立刻邀請她在即將到來的電影節（可能是1965年）上作關於話劇轉換到電影的演講。這個消息讓主席感到意外，沒有讓江青去。因為他已經看過這出戲，並稱其是「自由主義的」。她相信改編後的電影可能會誤導群眾。江青解釋說：他比其他人都深刻地意識到劇

制着，他們統治戲劇領域直到上一年代。張穎用眼神徵得江青同意後繼續說：儘管老演員經過思想改造後被鼓勵繼續表演，但缺乏對劇院外政治鬥爭的了解，使他們難以勝任。

中刻劃的軍事生活是「片面的」，並不「典型」。她說這件事再次證明：話劇改革最終是領導人的責任。從領導角度看，根本的問題是：作家會與工人、農民、戰士結合到一起嗎？

幾個現實主義的軍事題材話劇已被改編成歌劇、電影、歷史「紀錄片」（以中國的電影語言形象地再現歷史事件，而非電影紀實和新聞報導）。她舉了《平原作戰》的例子。《平原作戰》以真實場景描寫了游擊隊利用地道和日軍作戰。她欣賞這部戲劇，因為自己曾爬過民眾挖的地道。但同樣主題的電影《平原游擊隊》卻沒有這樣的寫實。

我問她再次把外國戲劇引入當代中國的可能性。

她回答說似乎沒有必要。外國戲劇在1930年代一度很流行。當時花了很多精力排演翻譯作品，很多戲劇都改編自外國電影。日本電影《嬰兒殺戮》和愛爾蘭影片《鎖着你的箱子》被改編為話劇。她在兩部戲中都扮演主角。最成功的劇目，包括《玩偶之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果戈理的《欽差大臣》都改編自原始劇本。他們生動的詮釋比歐洲的直白描述要好得多。

最新的嘗試是把傳統的中國小說（幾百年來就是中國戲劇題材的來源）轉變為革命戲劇。一些「資產階級」劇作家把《三國演義》的部份情節寫入當代戲劇。但是經過多年對劇本、配樂、舞台指導的修改，最終的版本已變得面目全非。這是領導們所不願看到的。

如果文學作品要被改編成革命戲劇，必須得到領導的准許，並給予最大的關注。這樣會伴隨遭受反對的風險。當她和延安「魯藝」的同事在延安的曠野中創作革命音樂時，沒有資源，沒有現成的音樂可供借鑒，手頭也沒有外國音樂，所以把目光轉向地方音樂。他們收集民謠，用自己的樂器演奏，書寫新穎的政治抒情詩。這麼做是有風險的，因為不清楚人們會有怎樣的聯想。和她工作的一些人還把有猥褻內容的歌曲曲調借用過來。既使他

們改寫了歌詞。她知道聽眾不會很快擺脫下流的聯想。她謹慎地說：不過，她本人沒有參與對這些內容的改編。

回到話劇主題，她說：需要修改的話劇可以分為 3 個類別：首先，那些反革命的劇作，根本沒有希望改造。第二類是有好的動機，但表現手法粗糙，似乎不值得修改。第三類也有好的動機，但表現過於平淡（特別是沒有突出主題的化妝、音樂、服裝），大部份觀眾會不清楚它的動機。這一類型是最難挽救的。第一個類型的例子是女戲劇家蘭光的作品。蘭光曾在上海兒童藝術劇院工作（和托洛斯基有聯繫，江青輕蔑地說）。當江青在上海到處尋找可修改的劇本時，蘭光的《最後一幕》被推薦給她。這齣戲在30年代出現，當時國民黨鎮壓所有的政治抗爭，文藝工作者不得不退到幕後工作。江青痛苦地記得那個時代的地下文化工作。她一眼就認出了這出戲，它是危險的誤導，是一個有關「敵方特務」的故事。讚美特務的話劇當然不能呈現給人民。看過蘭光的作品後，江青立刻告訴上海市長柯慶施，作品糟透了。柯慶施立刻取消了演出。

小說《戰火中的青春》也出現同樣的問題。小說描寫幾個在國民黨白區的共產黨叛徒。為了適應現在的政治標準，作者被迫做了幾次修改。小說被改編成電影，後來又被他重新改寫成越劇，全部由女演員出演。但是女人扮演男人，「破壞了她們的形象」，江青抗議說。在劇中，甚至日本帝國主義者都由中國婦女扮演。這讓江青很反感，中途就退場了。在文革期間，作者被要求承認在「我們的時代」寫這樣一齣越劇是反動的。

《杜鵑山》（背景是共產主義興起的重大事件——20年代的秋收起義）最初是上海創作的一齣話劇，由其他人指導，做了修改。最後有些自封的「革命份子」試圖把它改編成京劇——她喜歡的表現方式，但他們的改編失敗了。她認為，那是因為「沒有真正的無產階級風格」，他們炮製的「無產階級英雄」和老乞丐

沒有什麼不同。

文革表明：儘管可以改造全部劇作，卻不能改造所有的劇作家。遼闊的國土上不乏天才的出現。任何人（特別是作家和藝術家）都不能操縱一切，在文化領域也是如此。中央在戲劇改革中的首要責任是作為「加工廠」。樣板音樂《鋼琴協奏曲黃河》可以由「集體創作」——中央委員會或其代表。

如果很難把話劇提高到當前革命的標準，那麼傳統戲曲又如何呢？幾個世紀以來它們一直廣受歡迎。江青開始闡述古老劇種的深奧和優秀。

她說在山東長大時，昆曲（起源於蘇州，為士大夫喜歡）很普遍，但很少有觀眾，劇院內只坐滿幾排座位，觀眾大部份是教授和知識份子，他們不時地看着劇本了解唱段。同樣，在北京的劇院裏（儘管戲曲已不像以前那樣神秘，而且取材於大家熟知的歷史），觀眾也只坐了幾排，其他都空空蕩蕩的。

上海有不同的地方戲，融合了幾個地方流派的風格，包括天津和北京戲曲的特點和秦腔。它們的觀眾也很少，為免這些劇團在解放後破產，國家為每一個劇團提供每年200－300元的補助。儘管門票免費，觀眾也不願意觀看。她淡淡地說，如果接到一張免費門票，她也不會去的。這顯然是想證明她毀掉的民族戲曲是沒有價值和不受歡迎的。雖然大部份昆曲都是反動的，但某些方面還有借鑒意義，有幾個昆曲老調被整理後用在新作品上。

她批准的樣板戲是幾個地方戲的整合。它們體現了上海戲曲（在30年代帶有炫目迷人的好萊塢風格）和淮劇（在上海得到發展）的特點。隨後創作的其他戲曲融合了京劇的山東流派以及貴州、內蒙等地方戲。

60年代初，她開始調查各種戲曲種類，記得一次觀看京劇演出。觀眾仍然稀少，從舞台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燈光在老劇場不

那麼暗）。江青故作驚訝地回憶說：著名演員馬長禮[85]出場時看見她，竟然忘了台詞，不做聲地站在那裏。當時表演的質量已經下降，所以毫不奇怪，人們不願意去觀看。

她認為，中國青年和「外國朋友」都不願意前去觀看，包括她的女兒李訥。李訥曾經是一個京劇迷。由於受過良好教育，她可以理解深奧的唱詞和傳統戲中微妙的象徵性動作。大多數群眾都理解不了——女人的「水袖」、流髯和它的歷史細節（類似伊麗莎白戲劇，即興喜劇，還有西方文化精英光顧的大歌劇）。

她說，不借鑒過去就創造全新的藝術模式是不可能的。這需要謹慎的不屈不撓的努力。中國人從古代藝術中提煉現代元素的過程中遇到與歐洲人一樣的問題。歐洲人想和「宮廷藝術」分手，後來卻發現離不開它。重新啓用傳統曲調時，中國領導人遵循了詞曲不分家的原則：從古代開始，詩詞都是民謠風格——可以演唱。為此，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融合了古典芭蕾的樂曲。革命京劇《龍江頌》則突出了傳統樂器。

江青假設外國人或許會認為，為了新目的而不斷修改舊作品是罕見的。但中國人知道他們不是世界上唯一這樣做的人。歷史學家應該明白：這些創新戲劇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傳統，是建立在現實歷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基礎上的。她為了創作樣板戲閱讀了大量軍事史書籍。她興致勃勃地說：「為了這個目標，我和普通群眾走出去，又一次投入戰鬥。」

4

60年代中期，電影遭遇了和話劇一樣的浩劫。到1967年，所有沒有經過江青審查和修改的電影都被取消公映。音樂、戲劇和口頭傳誦的文學一樣，可以不通過表演流傳下來。但電影則和繪

85　他毫無疑問地被挽救了。1968年他在革命京劇《沙家浜》中扮演主角。

畫雕塑一樣，本身就是完整的藝術主體。可以簡單地破壞，或是把它們封存起來嗎？現在沒有答案。

有了1964年京劇匯演的成功，江青的下一個計劃是第二年的電影節。如同以前的做法一樣，她首先在全國揭露電影界的謬誤，然後建立新的創作方針。開始時，她的努力受到文化部長周揚及其電影界代理人的阻撓。1966年，《紅旗》報導稱：江青同志判處了「電影界中資產階級統治的死刑」。「創新獨白」被譴責為「虛無和頹廢」。「黨的民主集中制」應該取代「以導演為中心的資本主義體制」。在毛的支持者主導的激烈辯論中，沒有黨或紅衛兵的宣傳敢提及江青（電影藝術的新主人）以前是一位電影明星。

電影演員和製片人、導演一道都已被她禁錮或毀滅。在這樣消沉的文化環境中，她如何能選出劇本，信任技術人員，凝聚人才，去開始電影創作呢？

江青說，生產一部好的電影要比演出戲劇費力得多。電影藝術具有多面性，技術也很複雜。她沒有從事過電影製作。她要控制這個產業的努力受到大部份第一綫敵人的壓制。例如：在河北保定有一個電影衝印廠，存放着由江青批准的電影底片。但她的敵人（林彪及其下屬）憎恨她的作品，計劃用手榴彈炸掉底片。如果他們成功的話，會失去所有的新作品。她試圖制止破壞，但沒有成功，請周恩來干預，他也做不到。

更棘手的是「林彪和他的同夥」慫恿片廠的技術人員改動她拍攝的影片，讓影片顏色看起來發紅，不自然。他們的破壞活動在保定人民中造成對立。

有一次，她請3個攝影師和導演到頤和園做一天的拍攝。拍攝對像是正在和其他運動員練球的乒乓球冠軍莊則棟。幾天後，他們再次會面觀看結果時，發現別人用的膠片，紅綠色彩都消失了，而她用自己設備沖晒出來的膠片效果卻很自然。她相信這再

次證明膠片沖印廠中有人惡意破壞。

「江青同志，你創作了什麼新影片嗎？」林彪及其追隨者看到她的憤怒，幸災樂禍地問道。他們知道她失敗了。她說，對她的電影持續騷擾只是後來鬥爭的序幕。

江青不止一次地說：其他國家電影領域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電影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她說，如果有時間，我們應該一起看幾部她喜歡的電影。她提到了墨西哥電影《冷酷的心》。儘管電影美化殖民主義的內容是反動的，但對光和色彩的技術處理好得不可思議。然而，領導同志都沒看過原版。三個拷貝都有中文配音，一個存放在中央委員會，一個在上海，第 3 個拷貝在北京被特殊處理（可能在她的電影收藏中）。

現在，要製作自己的電影，最大困難是尋找人才。她必須勸說人們冒着危險，甚至生命危險參加她領導的這場革命。她承認，演員是「很有主見的」，很難爭取過來。拿童祥苓的例子來說，他當時扮演革命京劇《智取威虎山》中的英雄。他的姐姐童芷苓也是京劇演員（江青離題了），私生活的名聲不好，一個「複雜的故事」。她的兄弟也有放蕩不羈的名聲。江青第一次注意到童祥苓是在北京和上海物色演員時。她所認識的人中，沒有人可以同時擁有年輕、俊美、嗓音、表演和舞蹈的天賦。童祥苓的嗓音很出色，但不能確定他的舞蹈是否同樣出色。因此，江青讓他在《紅燈記》的早期排演中扮演一個小角色，測試他的能力。他的姐姐當時扮演的是李奶奶，她的表演最吸引人。但她去那裏是為了看住童祥苓，江青說，並再次為離題而道歉。

她從童祥苓身上看到了想要的東西。演出結束後，在後台找到他。「你是一個業餘，還是專業演員」，江青盤問他。江青的問題讓他驚訝，他脫口而出：他是一個京劇迷，可以翻筋斗（京劇中必要的動作）。那次笨拙的遭遇（現在回憶起來很有趣）讓她相信童祥苓會有前途。

為了近一步評估童祥苓，她請張春橋去接觸了解他。通過張春橋，她了解到童在演唱和舞蹈方面多才多藝。最重要的，是他願意切斷其他工作和政治關係，而只和她一起工作。[86]江青很高興，在她全力修改的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中，讓他扮演英雄楊子榮。

當「5.16兵團」的「壞份子」知道他們所信任的童祥苓轉到了江青一邊，就設法「抓住」他，置於他們的監護下，免得他為江青工作。江青嚴厲地告訴這些人：以前熱衷於「童派」的童祥苓已改變忠心，向她保證加入革命。沒有人可以碰她的演員，她警告。

「五一六」份子沒有讓步，繼續讓童祥苓處於困境。他們的策略是請他到北京來，謊稱可以給他特殊待遇。不管他的姐姐如何，童祥苓是不同的人，一個堅强的人。最終，他和劇團應邀來到北京。在那裏，他們觀看電影，並參加了江青試圖控制的電影製作。江青被告知，他們一到北京就被她的敵人剝奪了應有的正常待遇，住房和伙食都糟透了。

江青返回北京後，把演員的遭遇告訴副總理謝富治。他們一起去演員們住的製片廠，視察宿舍，改善了住房、伙食和交通。她個人保證說，演員們會吃上熱飯，以保護嗓音。

影片《智取威虎山》開拍了，她的敵人突然切斷舞台電源，熱飯也停止了供應。江青憤怒了，決定把她的項目置於軍管之下。國務院的謝鏜忠應她的要求，下令8341部隊（駐扎在北京的毛澤東特別衛隊）保護她的人。

由於缺少有經驗的劇作家、製片人、導演和演員（他們都已失寵）的協助，江青承認別無選擇，只有從戲劇和芭蕾舞團中挑選信得過的演員，為電影藝術培養人才。問題是令人驚愕的。戲劇演員熟悉的豪放和誇張的表演在電影裏就會顯得過份。從前

86　師徒關係和有君主庇護是中國戲劇的傳統現象。

影響他們的「修正主義」教給他們「可怕的東西」。江青對此沒有更多解釋。演員都是解放後成長起來的，學習外國電影表演的機會很少。所以當他們第一次站在灼熱的燈光下和攝影機前時，表現很不自然。江青必須讓他們活躍起來。「你們不要害怕失敗」，她說，「黨組織支持你們」。為了盡快提高他們的表演技巧，她選擇了一些個人收藏的外國影片在影棚放映。她說，他們觀看時要對照自己，「哪些可以借鑒，哪些錯誤應該避免」。

童祥苓是跟隨江青進行電影革命的主要演員之一，其他人也很快加入進來，包括在《紅色娘子軍》中擔任主角的英俊男芭蕾演員劉慶棠，《紅燈記》主角浩亮，《沙家浜》中表現出色的譚元壽。著名演員馬長禮被江青派演首要的反面角色——《沙家浜》中的日本憲兵。她清楚知道，這些演員對她的忠誠使他們很容易受到林彪「5.16兵團」的打擊。她設法及時找到劉慶棠、浩亮和譚元壽，讓他們免受磨難，但老邁的馬長禮被他們抓獲，受到迫害。

演員們的生涯會重新改寫，江青也通過他們嘗試電影革命。更多演員在拍攝的不同階段參與進來。這些有文學稟賦的人——浩亮、劉慶棠和于會泳[87]——在江青說服下，協助她創作電影腳本，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新課題。最後，他們稚嫩的劇本創作，演員的糟糕演技，敵人的蓄意阻撓，使她試圖生產好電影的努力以失敗告終。

為了快速取得成果，她轉向電視，想把她的作品帶給最廣大的觀眾。她認真研究了國家電視台的節目單，然後向負責人提出批評。她的意見迫使電視台領導人、技術人員和演員自我批評。她由衷地感謝他們，並請他們加入把革命引入電視台的力量。他們很快就看到在電視上播出樣板戲的正確性。在電視上看到《沙家浜》和

87 他是作曲家，負責國際文化交流的主要領導人，也是1976年以來江青戲劇改革的追隨者。1975年1月，在四屆全國人大上被任命為文化部部長。這一職位自9年前周揚離職後一直空缺。1976年10月，他和江青一同被逮捕。

其他樣板戲，讓江青很激動。為了分享她的快樂，召集了一大批電影攝製者和京劇演員到長城，向他們演示如何「向電影學習」。他們的舉動向世界證明：她突破了一個由頑固的電視台老闆建起的圍牆。「我打碎了他們的壟斷！」，她高興地歡呼。

3 年來，江青在電影方面有過 3 次不成功的嘗試。她和助手們最終拿出一個煽情的《智取威虎山》。每一部電影都在北京拍攝，但演職員的家還在上海。江青滿意地回憶：演員們全心投入北京的項目，多次放棄回家省親機會。他們和她一起堅持在北京工作，直到她對完成影片表示滿意。

江青說：要理解1960年代演員的深刻變化，必須明白她所領導的著名戲劇演員和其他不太有名的演員都成長於舊社會。他們的思想覺悟一開始都不先進，重要的是讓他們理解她的意圖，在多年的混亂中追隨她的領導。他們所冒的風險加快了覺悟轉變。當局勢平靜下來時，他們仍然忠於她和她的教導。

為了說明這些革命性的改變是如何發生的，她安排我和浩亮、童芷苓還有其他電影演員和舞蹈演員會談。用她的話說，他們會講述自己的故事。

17

歌舞中的豪情壯志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江青對《紅燈記》演出講話引用的古諺語

在革命戲曲的功用中，娛樂被降到了最次要的地位，反映意識形態、工人階級的崛起和共產黨領導下的勝利是首要的。對重要歷史事件的再現是歷史劇的特點，正反人物的鬥爭貫串始終。江青認為自己屬於開國元勳的時代。在這一時代，有必要把簡單的官方歷史記載變成開國神話，創造一批新的英雄人物，並通過革命戲劇和芭蕾傳播給群眾。另一個革命戲曲不顯眼、卻很重要的功用，是展示戰爭中生命的生存比微妙的心理生存更重要，也就是說比在持續的戰爭狀態中保持個人心智健全和自尊更重要。對戲曲及其表現的生活來說，埃斯庫羅斯風格的復仇是至關重要的，這也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忽視的情感基礎。

革命戲曲以馬克思唯物主義觀點看待歷史。它所描寫的歷史不是一連串的偶然事件，而是遵循一定歷史規律的，因此不會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存在迷惑和恐懼。這種救世的歷史觀否認造成個人悲劇的歷史現實，與中國文化背道而馳。在戲劇和政治生活中，為此而死去的人會被尊為烈士，也會在表演和群眾性政治運動中被頌揚。

看戲是中國基本的社會生活，加强了戲劇作為政治工具的重要性。在傳統的家庭結構中，每個成員都有許多親戚關係或要扮

演不同角色，都有一個相應的親緣稱謂。在革命政權下，每個人在家庭角色外又增添了（如果不是被替代）許多政治角色：青年團員、黨員以及婦聯、少先隊、工會或革委會成員等。社會關係在這種受制約的角色中，而不像以前在較少受控制的個人之間進行。來自中央的社會控制受到舞台的推動，戲劇人物被塑造為政治榜樣，代表舊體制奢華貴族的形象被身穿工人裝的無產階級人物取代。主要的敵人形象是貴族、地主和外國侵略者（一般是日本人）。儘管革命舞台和生活中的階級人物發生了很大變化，對現實和藝術中代表人物的尊重卻得以保留。此外，傳統戲劇的教化功能延續到現代舞台上。江青推崇的劇中無產階級人物是所有人的楷模。

當生活是對政治性藝術和演員的摹仿時，觀眾自然會陷入生活和藝術間强烈的政治辯證關係中。《紅燈記》中鐵梅的扮演者有此感言：

> 扮演英雄人物的過程就是從他們那裏學習的過程。為了演好英雄人物，在台下必須向英雄人物學習，才能在舞台上宣傳毛澤東思想。我縮小了與劇中英雄人物的差距。

舊社會被視為下九流的演員成了新社會的代言人。戲曲演員在舊社會一般都是文盲，儘管其中少數人獲得了財富和社會承認，但仍處於和雜技和馬戲藝人一樣的社會地位。解放後，劇院和其他私有企業都逐步收歸國有，演員們有了住房、工資和表演舞台。但這樣的社會保障是建立在經常被漠視的基礎上：只演出那些由中央認可的劇目。與舊社會演員可以即興演出熟悉的劇目不同，「被解放的」演員必須準確無誤地演出黨提供的劇本。

江青過去的舞台生涯與她在文革期間扮演的角色遙相呼應。從此，她不再做演員，她所維護的社會也沒有那段公開記錄。她的政治和藝術才能讓她結識了毛澤東。她一度成了政治舞台的首

席女歌手，一個為群眾樹立榜樣而創作的文化政委。那些追隨她的演員不僅走上革命舞台，也走進革命歷史。70年代中期，她的文化英雄和上層建築新星的巨幅相片被高高懸掛牆上，遍布城市與鄉村。他們浮華的面容和共產主義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比肩而立。

革命詩史是對文學發展的巨大限制，排斥了許多中國古代和現代的文化遺產。現在的舞台上已經看不到社會諷刺。江青的偶像——魯迅就是社會諷刺的大師。黨的領導人有充分理由限制諷刺的藝術形式，只使用它打擊邪惡的階級敵人——專橫的地主、國民黨統治者和日本帝國主義。古往今來，諷刺作家的筆下主要是窮人和權貴，但現政權不受嘲弄和誹謗的襲擾。窮人（群眾）被歌頌，權貴（領導）被讚揚。江青的革命戲曲讓窮人不再受喜劇的嘲弄，讓權貴不再受悲劇的誹謗。

江青的革命標準高過了新的政治秩序。她知道需要在人民和領導人中激起英雄主義情感。從群眾中來的英雄主義帶來的利益極大。她似乎巴望自己的英雄性格得到廣泛認同。談到1966年的一齣戲劇，她說：「我們不能局限於真人真事，也不能只塑造死去的英雄，事實上活着的英雄要遠遠多於死去的英雄」。第二年，北京大學的革命學生把她頌揚為「無產階級女英雄」、毛澤東最好的「學生」，她使「紅旗的光芒照耀四方」。

因為榜樣的力量，使廣大群眾受到舞台，從而也是黨中央的操縱。這令毛澤東失望。作為一個民主集中制的倡導者，他知道一個高效政府需要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力量間取得平衡。在1957年的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指出：

> 每一個省都要有一到兩名馬克思或魯迅。你們應該寫文章，60歲以下的都應該寫。
>
> 每個省都應該培養理論家。我們培養男演員、女演員和畫家，卻沒

有培養理論家。這是體制的缺陷。你們依靠中央政府，但中央政府從未禁止你們做自己該做的事。

不知道江青的追隨者在自己土地上和我討論江青時會有多少主動性。

1

在人民大會堂的晚宴上，江青稱她的革命戲曲《紅燈記》為悲劇。該劇展現了從20年代到日本侵華時期，一個三代家庭是如何以「英雄般的自我犧牲」反抗日本侵略的。劇中也描寫了「黨領導的八路軍」、白區地下工作者解救在根據地以外為黨工作的普通民眾。

晚飯後，我們前往天橋劇場。在那裏，滿場的觀眾（如此之多）在酷熱中已等了一個多小時。江青在戲劇性的氣氛中步入會場。驚愕的沉寂突然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在專門的燈光照射下，她看起來很激動，愉快地微笑着，揚起胳膊向到場觀眾致意。

劇場的燈光暗了下來，江青（坐在我的左手邊）低聲講述文革期間戲劇的排演。為了避免政敵的報復，她讓演員遠離北京，並和他們待在一起。周總理每天打電話通報北京最新動向。經過公開綵排和不斷修改潤色，《紅燈記》逐漸獲得好評。人們最愛看的還是舊戲流傳下來的做功。有時江青及其助手不得不讓人們控制情緒。她的主要合作者浩亮記下排演進程，並定期向北京領導人匯報。總理曾對這個節目擔心，但在看過最新的排演後，總理表示喜歡這個節目。他們逐漸建立了成功的信心。

大幕拉起，故事開始。故事跨越了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前的歷史時期。代表一家三代的人物是：李玉和——日本統治下的鐵路扳道夫，代表第二代的無產階級英雄典型；他的養母（李奶奶）代表第一代；17歲的養女（鐵梅）在1923年鐵路罷工中成為孤

兒，對年青一代很有感染力。

當時日本佔領東北，李玉和保管着送往山中共產黨游擊隊的密碼。另一個中共地下黨員被日本憲兵隊長鳩山抓獲後叛變。李玉和被捕了，威逼利誘沒有讓他屈服。瘋狂的鳩山便逮捕他的全家並施以酷刑。李玉和和李奶奶因為拒絕交出密碼被處死了。幸存下來的鐵梅「化悲痛為力量」，發誓要復仇。在鄉親們幫助下，她躲過警察暗探，帶着父親留下的紅燈籠（象徵未完成的革命），終於把密碼交給了游擊隊。苦難使她成長為一名革命接班人。在第15幕，李奶奶一段感人的唱詞，回顧了這個李姓（同江青的本姓一樣）家庭的苦難歷史。江青眼裏滿含淚水，一直淌到臉上。江青用白手絹擦着臉，說：毛主席的6位家庭成員「為革命獻出了生命」，每當我看到這些劇情就會流淚。 在毛主席的《回韶山》中寫道「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如果想研究中共黨史，就應該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詩歌，那會給我一個清晰的輪廓。

幕間休息，江青把節目單遞給坐在我們身後的翻譯——徐爾維，讓她寫出《紅燈記》的英文標題。徐用粗體大寫字母寫出英文標題，並把它遞還給江青。江青愉快地重抄一遍。「怎麼唸」，江青問徐，然後隨着徐的嘴唇一字一字唸道：「紅…燈…記」。

她又轉身問我：「the代表什麼意思？」

徐插嘴說：「不代表什麼。」

「那它就是一個虛詞！」江青指的是中國古文中的語氣詞。（在另一場合，江青承認讀不懂那些深奧文字）

對李玉和探訪獄中母親的感人情節，江青解釋說：「因為他剛剛出獄，邏輯上他的頭髮和衣服應該是又髒又亂的。但考慮到他馬上將成為烈士，我們讓他的形象較整潔，因為他代表的是高貴形象。我們並不追求自然主義。

她繼續說：在舊戲中，鑼鼓不能豐富地表現演員的表演，所以新劇中取消了這些樂器，用西方打擊樂器表現明快的韵律，特

別使用了鋼琴（從《紅燈記》開始進入中國戲曲）。

閉幕後，江青走到後台向汗流浹背的演員表示祝賀。演員們為她的到來所感動。在介紹浩亮時（光榮的扳道夫扮演者），江青說：「他的政治覺悟比別人早，跟隨我進行京劇革命」。關於年輕活潑的劉長瑜（扮演鐵梅），江青幽默地說：她的父親是在北平的國民黨官員，但劉長瑜長大後決心跟隨江青同志鬧革命。袁世海（扮演鳩山）在亞洲享有國際聲望。一些日本領導人對她說：中國的革命京劇中，「反派」演得最成功。

2

幾天後，我到北京郊區訪問了《紅燈記》的演出單位——北京京劇院。有點讓人敬畏的浩亮是這裏的負責人。他長得英俊魁梧，深陷的眼窩和修長的鼻子看起來像高加索人。襯衣和褲子的面料精緻，名貴的手錶和意大利皮涼鞋顯示出他的瀟灑，這在當時的中國人中幾乎很少見。

其他演員也很英俊，但沒有那種在舊中國或西方可以看到的「舞台魅力」。他們幽雅地在長沙發上結伴而坐，輕輕地用黑扇子驅趕着 8 月悶熱的天氣。沒有人帶着其他地方隨處可見的毛主席語錄。在結束關於戲劇史的會談後，我們來到一個寬敞的劇場，觀看不同唱腔的演唱和鋼琴伴奏下的舞蹈和雜技。拍照留念後，我們又回到客廳繼續品嘗京劇院裏種植的桃子、葡萄和鴨梨，以此表明藝術才華和社會聲望並不妨礙他們勤於農業生產[88]，不讓他們「與這片土地分開」。

「解放後，革命左派開始服務於普通民眾的文化需求」，浩亮開始正式發言。「就在我們進行京劇革命時，四條漢子（周

88 文革恢復了毛澤東參加勞動的號召，引人注意的是勞動者中有作家、藝術家、官員和教授，他們並不情願參加農業勞動。

揚、夏衍、陽翰笙、田漢）在文化部的指揮所裏惶恐不安，試圖阻撓歷史的進步。文化部不顧中央關於按江青同志要求改革京劇的指示，否定江青和其他同志對京劇改革的宣傳，自己並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到了60年代早期，人們對戲劇沒有反映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擔負的新社會角色感到不滿。戲劇沒有激勵人們為革命貢獻終生。舞台上的奢華宮廷生活與群眾的日常生活相去甚遠。大眾對戲劇的熱情急劇減退。只有為數不多的中老年人前去觀看。

浩亮繼續說：在傳統戲劇中，演員通常扮演受舊社會等級壓迫的貴族婦女，而勞動婦女被刻劃成「看起來非常粗俗，與她們的英雄姿態相背離」。對工人階級從負面到正面描寫的轉變是極端困難的。除了表演技巧的革新，演員自身思想感情的深刻轉變也是必需的。

為了提高表演功底，演員們每年都要到鄉村艱苦跋涉「積累素材」和「擴展視野」。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過去劇團的演員怕弄髒自己的手，現在的演員則利用閑暇時間到田裏耕作。

京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和南宋時期（跨越 7 世紀到13世紀），在滿清的都市風格上發展到鼎盛時期。最初的京劇由民間藝術家而非貴族學者創作。作為征服者的滿人意識到京劇在民間的繁華，下令到宮廷演出。

在帝王的庇護下，「人民的戲曲」逐漸變成「宮廷的模式」。京劇的發展在此時停下腳步（但它是中國最複雜的戲曲，被稱為「國劇」）。

「在這些受皇室資助的劇目裏，對農民起義的污衊是不可避免的。事實是這些起義顯示了農民對剝削的反抗。他們尋求的是平等，這在《水滸傳》裏有詳盡的描述（賽珍珠的譯本《四海皆兄弟》）。其他一些京劇描寫了愛國者與外國侵略者的鬥爭。

我問道「舊的歷史劇會不會在近期排演？」

「那取決於形勢發展」，浩亮警惕地回答。「舊戲不能反映今天的生活，現在黑幫和走資派陰謀剝奪江青同志創作的權利，她沒有時間以現代形式革新舊的劇目。我們的指導思想是毛主席的『百花齊放』、『破舊立新』，當然也會將這些原則應用於傳統戲曲。」

「政治不會一番風順」，浩亮繼續老調重談，「毛主席的正確路綫一直和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鬥爭。在京劇領域，這種鬥爭尤其尖銳。30年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主席就提出了正確路綫，中心思想是藝術要為政治服務。根據這一精神，在延安創作了《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莊》，為什麼現在不演了呢？就是因為沒有時間。」

我問到那些畢生創作話劇的藝術家和劇作家的命運。他們的作品在文革時期都被江青禁演。

浩亮回答說：大部份人都到鄉下接受鬥批改的教育。他接着改變話題：問題是30年代的話劇毒害了50年代的創作。小仲馬的《茶花女》和楊貴妃的羅漫史是與當代生活危險的偏離。「中國已是無產階級的中國，但戲劇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這條路並不平坦。」浩亮刻意微笑，說話時大汗淋漓。

他繼續說：1963年，江青同志開始到訪他們的劇團，對他們講話，闡述了京劇近代以來如何變得頑固保守，拒絕順應歷史潮流。如果這個「封建堡壘」、「死硬的」傳統藝術可以被改造，滿足人民的需要，其他藝術（文學、音樂、繪畫）也可以。「她是正確的」，浩亮斷言。

「你們想鬧革命嗎？」浩亮回憶江青曾這樣激勵他們。「如果你們決定變革，並獻身於革命，你們會如何表現工人、農民、戰士的『魅力』呢？」

1963年，京劇院和江青同志都不知道如何才能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揮作用。事實上，他們也並不清楚「文化大

革命」是什麼。藝術的變革會激起全國範圍內的階級鬥爭是不可想像的（江青最激進的馬克思理論是上層建築可以駕馭經濟基礎）。京劇院文革一開始，江青就想方設法讓他們明白受了階級敵人「蒙蔽」，是舊戲曲的「犧牲品」。江青說，「先有自身革命，才會有表演的革命。」

浩亮大笑着回憶起第一次政治覺悟的觸動。1963年，他在劇中扮演一個副元帥角色，「為了謀取元帥位置，我必須用一支毒箭射殺他」。江青有一次悄然來看演出。看完演出，她生氣地快步走到後台說，「儘管你們演得很出色，但我不會為你們鼓掌，因為你們演的是一個靠謀害他人篡權的自私自利人物」。接着她又向全體演員提出一個本質問題：「你們吃的是農民種的，穿的是工人織的，邊境是解放軍在保衛，如果你們不去宣傳農民、工人、戰士，你們的覺悟在那裏？」

在新劇本的創作中，江青不從事寫作，而是讓專業作家按照她的指示去創作。這是她的一貫做法。《紅燈記》的原型在地方戲中有12個版本，但沒有一個適合京劇。江青也向他們建議過《霓虹燈下的哨兵》和《紅色娘子軍》劇本。由於「走資派」干擾，《紅燈記》花了一年時間才完成。另一隊演員排演《紅色娘子軍》，把它改成芭蕾舞劇。經過無數次修改，《紅燈記》被定為「樣板戲」，「但個人付出的代價也很高，有江青同志的心血，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堅定支持，我們被深深感動了」，浩亮虔誠地說。

開始時，劇團的「走資派」只是假意接受以革命方式排演《紅燈記》。當重新塑造浩亮的角色——扳道工時，他們的虛偽暴露了。浩亮知道江青想去掉李玉和身上消極的個性——感情用事和酗酒。反對者不願看到一個受人敬仰的李玉和形象，堅持用相等的筆墨刻劃一家三代人。他們聲稱那是對工人階級均衡的表現。實際上，他們要加强鐵梅的角色，把她塑造成年輕一代的代

表人物，但他和江青堅持把重點放在革命前輩（江青一代），因為這反映了革命進程的規律。

憎恨江青和他們直接聯繫的官僚試圖「醜化」李玉和的工人階級形象，把浩亮裝扮成駝背，強迫他穿着破爛衣服，留着淩亂的鬍鬚。他們說，「這是寫實主義，過去的扳道工就是這樣子的。」

直到文革前夕，浩亮都被迫扮演這一淒淒慘慘的角色。隨着舊文化部的倒台，他們劇團也經歷了鬥、批、改的痛苦過程。當時開始接觸江青同志。

江青參加了所有的綵排，幾乎對劇中每一個方面都做了改動——內容、唱腔、服裝、做功和總體結構。有時姚文元陪江青來，他們發現姚文元的觀察很敏銳。那些天，姚文元一直在上海，除了其他寫作任務，他還檢查了對《智取威虎山》的修改。江青在上海的工作受到張春橋、柯慶施、姚文元等同志的保護。在北京繼續得到毛主席、周總理、康生同志的支持。在曲折的修改和綵排過程中，演員們忘不了 3 位領導人的支持。

這樣他們改編的戲劇開創了中國戲曲的先河：第一次表現了工人階級有力、親和、聰慧的人物特性。為了說明這一點，浩亮引用了第三幕，市場粥攤前的一幕：看到一車日本憲兵到來，李玉和立即把密電碼藏在飯盒的餿粥中，難聞的氣味讓軍警離開。幾年前，「走資派」刪掉了這一幕，說是愚蠢和令人反感的。江青掌權後，恢復了這一幕以刻劃李玉和的機智以及群眾的配合。

浩亮疲憊地回憶說：「江青把每一件事都梳理了一遍」。在第五幕的原作中，李玉和擔心在日本佔領下會失去鐵梅，就把她藏了起來。這種個人主義思想冒犯了江青，她修改劇本，讓這位父親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

她一直注意肢體語言，經常講「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每一個動作都要造型」。在為「刑場鬥爭」一幕設計舞蹈動作時，她爬上舞台，示範步法，還為他們畫了示意圖。

「新戲劇不是偶然出現的，它是藝術」，江青强調。服裝設計者應「在現實基礎上改進，不應離開理想主義」。她指舊的無產階級英雄服裝「樸實的現實主義」會導致藝術上的失敗。新的服裝沒有窮困的表露，《紅燈記》服裝對補丁的運用引起激烈爭論。

她用的設計師從前是為貴族製作絲綢衣服和時髦套裝的，現在第一次為窮人量體裁衣，就直接把補丁縫到上衣前襟。這說明他們不知道勞動人民是如何勞動的。江青告訴他們，補丁應該縫在肘臂、膝蓋和領子——那些最易破損的地方。補丁形狀看起來要美觀。顏色的運用對塑造人物形象同樣重要。勞動人民穿着基本都是最便宜和灰黯的。但劇中的鐵梅卻穿着炫目的紅色中式上衣，戴着江青挑選的迷人的髮夾。

江青督導了全部配樂創作，親自為第八幕（刑場鬥爭）創作音樂和歌詞，蘊涵着舊京劇的韵律和情調。當鐵梅看到自己的養父和李奶奶被處死，就用娃娃調演唱了一首表現長大成人的經典歌曲。

江青針對最後一幕的武術表演說：戲曲必須反映毛主席的軍事思想，舞蹈一定要表現突襲和其他克敵制勝的游擊戰術。該劇結尾以歡樂的主題結束：武裝鬥爭的崛起和根據地的擴大。

「要知道我們多麼願意成為她的工具」，浩亮意味深長地笑着結束了談話。

活潑的女演員劉長瑜就是其中一個「自願的工具」。她頭一次和江青見面就被認為是年輕可造之才。她的談話是敏銳和果斷的完美體現，充滿自我批評，那是文革時代受無產階級思想熏陶的進步青年最熱衷的。

劉長瑜解釋說：以前在第九幕中，當聽到養父和李奶奶的死訊，她以舊劇中表現悲傷的方式痛哭。江青强烈反對，說不僅要充滿悲傷，更要充滿憤怒。兩種感情都應馬上轉變為力量，她的聲音應該發出怒火和決心。

儘管最初聽起來難受，但江青的批評讓劉長瑜意識到思想上

的問題：沒有把握勞動人民的情感力量。「你的覺悟在哪裏」，江青反復激勵她，「表現革命者，你自己一定是要革命的」。劉長瑜說，在這部戲裏，浩亮是她的老師，送她下去和工人、農民、戰士一起生活，使她學會了熱情地刻劃英雄形象，站到了無產階級一邊。

3

在劇團的第一個晚上，江青越過我，用手肘碰了碰姚文元，請他為我安排上海演出的《智取威虎山》，並在第二天安排與演員會談。她保證它的交響樂是所有樣板戲中最好的。

一個星期後，我觀看了這場快節奏的、壯觀的京劇。會談是在我下榻的錦江賓館頂層，負責人是童祥苓。他扮演了10年的楊子榮，是江青的忠實演員。他介紹了音樂指導夏飛雲。夏長得消瘦，小心翼翼地講述這部劇目中從《黃河鋼琴協奏曲》演變而來的交響樂。儘管是江青在文革期間的作品，協奏曲描寫抗日戰爭畫卷的抒情詩則是由聶耳創作的（上海30年代流行樂曲和電影配樂的作曲人）。他解釋道：一般不演唱抒情詩，而是投射到舞台兩邊的屏幕上。（歌劇的抒情詩也是如此，即使在演唱時）。這部協奏曲第一次在西方交響樂伴奏下用鋼琴演奏民間曲調，來傳遞黨的思想。對琵琶、五聲音階和西方和聲的成功融合，讓樂團有信心在《智取威虎山》中嘗試新的音樂合成。

江青的想法是融合中國的打擊樂和西方的和聲——兩種音樂的精華[89]，所以在演奏中加入了中國打擊樂器和外國的弦樂器：4個第一小提琴、3個第二小提琴、2個中提琴、一個大提琴和一個低音樂器。吹奏樂器增加了一個單簧管，一個雙簧管，一個喇叭，一個法國號和一個大號，定音鼓也被添加進來。以前的8種樂

89 幾十年前，一些香港劇團和海外華人已在管弦樂隊中使用薩克思和小提琴。演員衣服上點綴著小金屬片和小燈泡。歌手偶爾也會動情地低聲吟唱詠嘆調。

器——4個打擊樂器和4個弦樂器（都由鼓來協調），通常安置在舞台兩邊。現在規模擴大到30件樂器和一名指揮，都安排在舞台下伴奏。中國的戲曲音樂家們從未見過這樣的音樂場面。

夏飛雲繼續說：不容易讓江青同志滿意。當他們送交初步樂譜時，江青批評他們，「仍舊在傳統束縛下創作」。她說要避免古典音樂的高亢，那會掩蓋演員的聲音。這樣觀眾才會把主要注意力放到無產階級人物上。音樂家應該把交響樂隊和歌手的關係想像為客人和主人間的關係，交響樂不應反客為主。交響樂隊應該伴隨聲樂演奏而不是蓋過它。

《智取威虎山》的故事發生在1946年的東北，解放戰爭剛開始。與描述黨的地下工作不同，《智取威虎山》描寫了解放軍與土匪的鬥爭。一支解放軍追擊分遣隊深入密林中，發動群眾打擊由美國和國民黨支持的威虎山自立為王的匪首座山雕。楊子榮，解放軍的生動代表，率領偵察排研究智取威虎山（暗指林彪游擊戰法）而非直接進攻（劉少奇的常規作戰）的可能性。

在上山途中，楊子榮了解到當地百姓的痛苦（喚起對壓迫的意識），又獲得常獵戶及其女兒、聰明秀氣的常寶的幫助。常寶的親人都被座山雕殺害，因此要找土匪報血海深仇。此時，楊子榮穿着白毛邊的大衣和虎皮坎肩，頭戴紅狐狸皮帽，化妝成一名土匪，成功地進入匪巢，博取座山雕的信任，為小分隊進擊鋪平道路。在威虎山的百鷄宴上，楊子榮哄着匪徒們縱酒狂歡。美夢破碎了！小分隊突然降臨把土匪全部消滅了。其中解放軍滑雪越過山坡、直取威虎山的一幕，是中國當代舞台寫實主義的頂峰。

像其他中國當代戲劇一樣，這出戲也是借歷史詮釋思想鬥爭。在1945年8月日本戰敗後，蘇聯撤出東北，林彪接替時任東北局書記的彭真，成為東北實權人物。在文革期間，林彪的威望很高，這出戲據說是表現林彪對「人民戰爭」思想的貫徹和揭露彭真反對「硝煙味」。楊子榮的角色具有雙重含義：一方面是「現實生

活中無數英雄的集中體現」；另一方面又是林彪生涯的寫照。

1971年林彪垮台後，這出戲又現實地成為林彪陰謀推翻毛的預言。楊子榮智取匪巢，除去了山大王座山雕，象徵林彪試圖殺死毛澤東，篡奪黨和國家的權力。1966年7月，毛在寫給江青的信中坦言：「我感覺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

和浩亮一樣，童祥苓也因為文革期間追隨江青而獲得舞台和政治上的榮耀。卸裝後的童祥苓露出一張平臉，儘管已40多歲，他的體魄依然充滿活力。他的微笑迷人而略顯淘氣：一座冷漠社會迎客的浮雕像。

「現代京劇為人所知是在上海京劇團1958年演出《智取威虎山》以後」，童祥苓開始快速地講述，「那時候，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綫控制着藝術。儘管楊子榮是一位無產階級英雄，但文革前被混同於土匪，都穿着同樣的戲服。楊子榮的台詞大多是『黑話』（土匪的），手裏攥着煙袋，隨着『黃色音樂』（西方歌曲）舞蹈。導演無視無產階級尊嚴，讓楊子榮對着座山雕行九十度鞠躬大禮。有一幕劇中，匪巢中的座山雕居中而坐，四面人群簇擁，而楊子榮則由一個比我老得多而又無活力的人扮演，畢恭畢敬地站在舞台一角。」

童祥苓繼續説，1963年江青看到這出所謂的現代戲後，走到後台把它稱為「垃圾」。第二年，劇本在她領導下做了修改，删掉楊子榮令人生厭的方面，把他塑造為無產階級代表人物。座山雕和土匪們被移到舞台邊上。

1964年的京劇匯演時，每個省份都派來代表團。當時，江青領導的演員們還沒意識到劇本改動的重大意義。江青的作品被認為表現了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劉少奇的幫凶們站出來，把楊子榮説成是凶惡的土匪。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兼宣傳部副部長林默涵最為激烈。他下令讓劇作者林漢標根據劉少奇路綫重新改編劇本。

劉少奇的人對現代京劇的攻擊，也是對京劇現代化和革命化的攻

擊。他們狡猾地以單純批判「藝術形式」來轉移對思想內容的注意。故事要求楊子榮假扮土匪，他們說為了藝術效果，楊子榮應該比真土匪還要真。這個建議混淆了江青最關心的階級和意識形態問題。

文革前夕，江青同志經常訪問上海市長柯慶施，與他討論戲曲改革的哲學前提。她強調，實踐和認識是相互依賴的（古代中國關於思和行的哲學辯論），實踐產生認識，認識引導更多的實踐。在塑造英雄特性時，音樂、抒情詩、對白、舞蹈、服裝和舞台指導都要服從「三突出」理論：首先突出先進人物；第二，在先進人物中突出英雄；第三，在英雄中突出主要英雄。這一原則被應用到後來的樣板戲中。

文革高峰期，國家事務的負擔讓江青很少有時間去上海。童祥苓的劇團定期通過錄音錄像向在北京的江青匯報，排演的進展。江青告訴他們，她利用吃飯時間反復觀看，揣摩其中的細節。因為對表達效果的關注，江青刻意研究了說白的技巧，要把重音放在關鍵詞上，如「恨」字要說得有力量。

「你們要把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她引述毛的話，指的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推動力量，他們不是小丑和玩偶。為了說明這一點，她推薦主席的《論聯合政府》。

童祥苓觀察到江青對文藝批判理論沒有多大興趣，她的指導重在實踐方面。「她甚至想改變我的表演風格」，他笑着回憶。那時候，他擅長演「老生」。因此，無論何時登台，無論演什麼角色，他都情不自禁地會彎下腰蹣跚而行。「每當她看到這個姿勢，就會用手指抵着我的脊柱說，『站直了』，你的楊子榮沒有諸葛亮演得好。克服舊式表演，要昂首挺立，有力演唱。此外，他的服裝也由舊的絲織長袍改為毛邊大衣。楊子榮伸出 3 個手指（表示一把插入座山雕的匕首）被江青改為 3 個——是更富殺傷力的表現。

江青不受傳統音樂束縛。在傳統京劇中，有兩個獨特的唱腔：一個是華麗的二黃，一個是有力的西皮。它們不能在同一人

物中交替使用，也不能在同一唱段中出現。為了以柔和的唱腔表達強烈的情感，江青在一個唱段中融合了兩種唱腔的特點。她說，情感要舒緩的表達，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如發誓消滅座山雕或決心支持共產黨，才可以使用有力的唱腔。

為了讓藝術手法去表現社會現實，江青改革了古典傳統中用降調結束一段唱詞的習慣。她說，行動的決心必須用升調來表達。

童祥苓最喜歡劇中的第五幕，他成長為胸懷「朝陽」的革命英雄。江青親自設計這一幕的舞蹈。最初的版本中，楊子榮徒步上山。1965年，江青讓他騎馬上山，以突出英雄形象。在舊戲中，馬只是虛擬的。與過去細緻的無聲表演不同，江青要的是栩栩如生的表演，結合現代舞蹈和傳統馬戲的動作。江青作為一個有經驗的騎手（童祥苓當然不是），演示了如何利用動作和道具跨上一匹想像的駿馬，英雄般地向前疾馳，同時控制馬的野性。

童祥苓從桌旁躍起，再現了江青的演示和他的摹仿。江青告訴他：「象徵性地躍上烈馬，先凌空跳起，接着一個劈叉；當馬看見老虎撲倒時，用在地上的平直劈叉來表現；不要從馬背上跌落下來，這看起來沒有力量，要越過馬頭下馬。」

看過1966年電影版的《智取威虎山》，江青對其中騎馬的場面仍不滿意。在北京自己的馬場裏，她反復試驗了各種上馬和下馬動作。回上海後，她告訴他「藝術需要誇張，登上想像的高大駿馬時，盡量抬高你的腿。不是越過馬頭下馬，要在馬背上側身，抬起一條腿，然後另一條，接着跳下。不要直接下馬，豎起你的腳趾，用腳趾下馬。那樣看起來很高貴。」

接下來，楊子榮舉起手槍，射穿了老虎的頭部。匪首問他是否殺死了老虎。楊子榮平靜地回答：「它恰好撞上了我的子彈」。

江青對形象非常敏感。她教他們以服飾襯托或掩飾某些人物特徵。「看到我長得比較矮，但要演出英雄人物，她建議穿短尺寸的衣服，把佩戴的腰帶往上抬。這樣在舞台上我的腿會顯得較

長，人也顯得更高。」

童祥苓說，江青作為政治領導人，對人的關心要超出他們的期望。以前扮演楊子榮時，他把槍跨在皮帶前面。江青讓他放到側面。為什麼？江青解釋說，「前面配槍時間長了會引起骨盆內傷」。

中央定期通報對戲劇的修改，毛主席也是如此。1967年7月，他到上海觀看他們的演出，只對台詞提出了意見。第五幕的一句話被改為「迎來春色換人間！」（更強調革命的樂觀主義）。他還把第九幕中的官腔改為現代語言。兩年後，江青仍然向童祥苓闡述「春天」這個詞的含義，以便更有力地展現其「社會和政治內涵」。

童祥苓向我介紹了齊淑芳，一個20多歲，有點害羞的少女，在劇中扮演獵戶的女兒——常寶。她穿着樸素的長罩衫和長褲，不像常寶那樣穿着紅夾襖和梳着濃黑的髮辮。在舞台上，她的嗓音哀傷、真摯、高亢。

齊淑芳小心地把自己表現為一個文革時理想的藝術家。她珍惜個人名譽，拒絕扮演帝王、公卿、美女等「吸血階級」，譴責資產階級「為藝術而藝術」的態度。江青同志教導她要克服不自信，成為一名戰士，像魯迅一樣培養孺子牛精神。只有牛的固執才能讓他們打破京劇的陳規舊律。

通過常寶的形象，江青同志開始在舞台反映女性的革命。所有表現封建階級的姿勢都要揚棄。抬起手畫了一道雅致的弧綫，江青演示了舊京劇中的「玉蘭指」，然後帶着軍人神態攥緊拳頭說，這是多麼的滑稽和無力。

在舊戲曲以及舊社會中，女人不能露出牙齒，笑的時候就以手掩嘴，以「水袖」遮蔽身體。現在每個人都可以大方地笑。過去小女孩被迫纏腳，長大後只好用「三寸金蓮」跛着走路。女演員如果沒有理想的小腳，或由男人扮演女人，就會穿着小高蹺在舞台上古怪地蹣跚而行。「現在女人們不再擔心腳的尺寸，她們走着自然步伐。」「流淚時，我們擋住雙眼」，最初當齊淑芳唱

到常寶母親被土匪殺害時，坐下來，把臉埋進手裏。江青說，這不是無產階級的哭法，把她拉起來，面對觀眾，讓眼淚流下來。「勞動人民哭時不會坐下來，把臉埋進手裏」，江青說，「他們會站着哭」。

江青强調：不要只顧及悲傷，注意把悲憤化為仇恨，仇恨化為義憤，義憤化為戰鬥的決心。如果對常寶的詮釋有一點自憐，江青就會皺着眉說，「突出階級仇恨，突出憤慨，突出戰鬥的決心。儘管你日夜盼望太陽的升起，但你必須戰鬥到犧牲。你要顯示『掃除一切豺狼』的決心。我們教育人民不要氣餒，不要忘記意志和力量比美麗更重要」。

齊淑芳受的訓練是唱假聲——表演貴婦和仙子的唱法。江青在1964年成為她的老師後，教她把假聲和中低音的自然嗓音結合使用，純粹的假聲只在唱高音時使用。

江青反復告誡她不應該自滿，「你是在為工人、農民、戰士歌唱。表演者不應脱離集體合作去炫耀個人技巧。」她說，「革命舞台上沒有個人的自大」。

在《智取威虎山》的早期版本中，解放軍戰士營救童的場景純粹用特技表演。江青不喜歡這種「極端的矯揉造作」，因為工人、農民、戰士看不懂。為了讓觀眾置身其中，江青增加了新的布景，包括移動的舞台、錯覺屏幕、動感的燈光。但「反動派」決意在空蕩蕩的舞台保留刻板的象徵主義，反對每一項革新。江青沒有妥協，繼續改革。她把古代和現代的舞蹈風格融合在一起，讓演員穿着白色披風在寒風中獵獵起舞，象徵解放軍滑雪越過山坡。江青向劇團解釋，這些滑雪戰士的「集體形象」展示他們「為革命事業而冒着生命危險」。

關於角色，齊淑芳說：第九幕以前，她只是一個單純的獵戶的女兒，沒有「自覺革命」的意識。在觀看民兵訓練和歌唱後，她轉變為一個覺悟的女戰士，一個決心為人類解放而鬥爭的無產

階級女英雄。當她歌頌無產階級時，江青告訴她音樂節奏要慢下來，嗓音要平靜而堅定。在發誓消滅豺狼時，要加快節奏，情緒高昂地演唱。

「討血債」在中國革命戲劇及其頌揚的政治中是最深刻的主題。江青對個人經歷、情感生活和她的樣板戲之間的關係從來沒有公開表述過。江青的傷感曲目《問苦》或許可以讓她再次重溫失去親人的痛苦——當然不僅僅是失去親人，也是對失去自由和女孩裝束的傷感。報仇是為個人，也是為大眾。常寶唱道：

座山雕殺我祖母擄走爹娘。
夾皮溝大山叔將我收養，
爹逃回我娘卻跳澗身亡。娘啊！
避深山爹怕我陷入魔掌，
從此我充啞人女扮男裝。
白日裏父女打獵在峻嶺上，
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
盼星星盼月亮，
只盼着深山出太陽，
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話講，
只盼着早日還我女兒裝。
只盼討清八年血淚賬，
恨不能生翅膀、持獵槍、飛上山崗、殺盡豺狼！

「爹！」她哭着撲進父親懷裏。楊子榮激憤地唱道：

字字血，聲聲淚，激起我仇恨滿腔。
普天下被壓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淚賬，
要報仇，要伸冤，要報仇，要伸冤，血債要用血來償！

4

芭蕾是繼戲劇後另一個重要的革命藝術模式。戲劇傳統上都是站在統治階級角度改編歷史。現在，淩駕於民眾之上的帝王將相已被代表無產階級的黨和解放軍取代。因為男人雖未壟斷、卻主導着新階級統治的「無產階級專政」，戲劇仍然主要是男人的藝術。女人作為崛起的「革命接班人」扮演着次要角色。芭蕾從各個方面看，在中國歷史上並不為人關注，更多地被表現抒情風格和神話傳說。因為芭蕾一直由婦女來主導，所以她們對壓迫的反抗是通過舞蹈、而不是中國的戲曲來表現。

中國對純粹的古典芭蕾的突破，比西方晚了半個世紀。早在1909年，狄亞．格列夫領軍的「俄羅斯芭蕾」就轟動了巴黎。很快，馬莎．格萊姆又以現代舞的藝術野性對抗芭蕾對美麗的痴狂。安格斯．米勒在百老匯音樂劇中對鄉村舞蹈的巧妙修改，開創了以地方特色豐富當代舞蹈的先河。這些對現代主義、民粹主義、普世主義、有時是重商主義的的實踐，與蘇聯的莫伊謝耶夫、墨西哥的民間芭蕾、和以色列的印巴舞所做的嘗試相得益彰。中國對芭蕾舞蹈技巧的革命變革和對少數民族舞蹈的使用只是最近的事。

解放前，上海的有錢人和外國人可以享受希臘的藝術體操、大師主持的芭蕾舞學校、好萊塢的集體舞蹈、舞廳的紳士舞蹈和頻繁的文化交流。到文革前夕，只有古典芭蕾舞沒有被禁。雖然江青欣賞芭蕾舞，卻反對它作為外國文化的載體。穿着粉色短裙的舞者昂然直立和扮作垂死的天鵝，讓江青反感。她對一成不變的古典芭蕾風格進行改造的號召受到右翼和左翼政敵的指責。他們主張，或者保留古典芭蕾、並把它從革命生活中分離出來；或者完全禁止它，但絕不是從政治上挽救它。一些劉少奇的追隨者威脅要打斷那些假稱為革命而舞蹈的芭蕾舞女的腿。

毛澤東的政治權力，讓江青可以按照她的方式對芭蕾進行溫和的革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中國戲曲已提供雜技、歌曲、誇張的面部表演、凝視；地方文化提供了音樂韵律、舞蹈模式、豐富的服飾；基本的步法、腳尖旋轉、蔓藤花紋則可以從古典芭蕾中直接借鑒。管弦樂的編曲則徘徊於對19世紀標題音樂和對外國電影音樂主題曲的摹仿。

江青告訴我，芭蕾革命意味着她和她的助手「要與束縛了中國舞蹈演員幾十年的俄羅斯古典風格做鬥爭」。斯大林應該對保留「以善惡鬥爭為特徵的資產階級古典音樂」負責。蘇聯後來的領導人繼續讓一隻黑天鵝作為《天鵝湖》的中心形象。

與此相比，《紅色娘子軍》（1964年10月首演）的故事建立在歷史真實上。背景是南中國的海南島，芭蕾舞表現了黎族人民的政治抵抗運動。她說，所有少數民族都是受壓迫的，「被像動物一樣對待」。

在和江青會面以前，我就已經在北京看過這出大膽刺眼的芭蕾舞劇。看起來把背景選在海南熱帶是審美，也是政治需要。海南面積幾乎與台灣差不多，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國民黨由於沒有獲得美國支持，共產黨在1950年4月解放了海南。《紅色娘子軍》的海島背景與《白毛女》所處的西北險峻山區是一種環境上的平衡。

像戲曲一樣，芭蕾也要遵循不走中間路綫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正面人物或者一開始就是英雄，或者在被解放後變成英雄。反面人物別無選擇，只有被消滅，然後勝利者出現。反面和正面之間的中間人物可以忽略，或用中國術語說「沒有中間人物」。在新舊戲劇和新的芭蕾舞劇中都用傳統的臉譜和身段來區分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正面人物總是氣宇軒昂地走入舞台，仰起胳膊，亮出手掌，「正臉」面向觀眾。反面人物一般是貓腰碎步，避免讓觀眾看到他灰暗的臉。

《紅色娘子軍》從一座地牢開始，美麗的女奴瓊花（明顯是

一個正面人物）被南霸天（南方凶惡地主的代表）綁到柱子上。在痛苦歌聲的伴奏下，瓊花掙脱了枷鎖，把怒火發泄到阻攔她逃走的男看守身上。後來被一個紅軍通信員發現，並把她領到紅軍的特遣隊。這支部隊由英俊的政委洪長青領導。他勸她去找紅色娘子軍。在為瓊花復仇的激勵下，紅色娘子軍奮起打擊大地主南霸天。南霸天最終被瓊花殺死。黎族人民用歡快的民族芭蕾慶祝村寨的解放。最後，瓊花發誓要像英雄洪長青一樣，遵循毛主席的話：「槍桿子裏出政權」。

江青對我解釋，在她60年代早期排演這出芭蕾舞時，用芭蕾表現軍史還沒有先例。沒人支持她這麼做[90]，就自己做準備。60年代後期，她獨自去了海南，視察那裏大規模建設的軍事設施。然後又到上海親自負責當地的芭蕾舞團。局勢變得很危險，一些在文化領域有影響的人物準備破壞她將在1964年秋上演的革命芭蕾舞劇。為了尋求領導人的支持，她請周總理觀看了早期版本的一場綵排，並改正了總理指出的不足之處。出於教育演員的目的，她決定讓他們到解放軍部隊生活幾個月。就在她發佈這條命令時，在文化部身居高位的周揚宣佈要派遣這個由她負責的劇團到香港演出《天鵝湖》。江青非常憤怒，但無能為力。一般來説，上海市長柯慶施會支持她反對周揚，但此時柯正在生病。她找到周總理，「連珠炮似地講出看法」，抨擊「某人」想鏟除她正處於雛形的芭蕾舞劇。他應該知道她指的是誰。文化領域的鬥爭很快變得如此緊張，以至沒人可以忽視周揚對江青芭蕾舞改革的抵觸。（據説把《紅色娘子軍》醜化為「在搖籃裏舔手指的嬰兒」和「醜媳婦」）。

不顧周揚的蔑視和反對，她繼續修改劇本，並隨劇團到各主要城市巡演。回到北京後，她和周總理一起看了一場經過大幅修改的演出。

90 然而，1961年2月，毛澤東在一張照片背面寫了下面一首詩《為女民兵題照》：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妝愛武裝。

周總理稱讚舞劇是「真正革命的」，讓江青很高興。演出結束後，他們一起到後台向在創作過程中支持她的演員和音樂家表示祝賀。

江青還是有點擔心這種中西合壁的舞蹈會給觀眾帶來多大的衝擊。1964年冬，全國人大正在開會，她邀請了一些代表，包括武漢的工人去觀看演出。表演時，她聽到一位工人說，過去根本不懂芭蕾，現在看明白了。這讓江青放心不少。

為了讓代表們充分了解古典芭蕾和革命芭蕾的截然不同，她告訴上海舞劇團先演《紅色娘子軍》然後再演出《天鵝湖》。在《天鵝湖》演出過程中，工人們紛紛提出抗議，有的還請求離場。代表們對她和其他領導人說：「《紅色娘子軍》要好得多」。（儘管江青從來沒對我說過，在那種環境下工人們還敢說別的話嗎）男子領舞劉慶棠定期向江青匯報觀眾反映。在江青的感覺上觀眾的反應是積極的。

與江青會面前兩天，我在北京飯店採訪了上海芭蕾舞劇團的成員。他們在1964年以後就只演出《紅色娘子軍》。江青的忠實追隨者劉慶棠是首席發言人。他告訴我，在50年代早期，中國對芭蕾舞的研究受蘇聯教師及其學生的操縱。民族和民間舞蹈則由職業舞蹈演員主導。1954年，黨在北京建立了舞蹈學校，目標是培養一批本土的芭蕾和民族舞蹈老師。舞蹈學校不僅從城市中上層階級招收學生，也從鄉村的窮人中招生。50年代中期，芭蕾的推動者只着眼於「國外著名芭蕾劇目」。他們從一些芭蕾舞片段着手，如《天鵝湖》中小天鵝舞，還有吉賽兒和拜倫的《海盜》片段，然後逐步發展了現在這些曲目。1960年，蘇聯「單方面撤走」在中國的專家，在芭蕾領域也引起震動。未完成培訓的師生只有靠自己去發展，迫使他們自力更生，激發舞蹈的革新。從長遠看，也使「革命芭蕾」的出現成為可能。

在蘇聯專家離開不久，一批老師從最初的北京舞蹈學院分離出來，到上海建立分支機構。1962年和1963年，兩地都投入排練「國外

資產階級的經典劇目」。一位芭蕾舞女演員笑着説，維克多·雨果的《鐘樓怪人》和普希金的《淚之泉》曾經是她們最好的作品。

1963年，江青第一次出現在北京舞蹈學院，她沒有裝得對芭蕾舞很了解。她的出現純粹是政治性的。他們知道，2年來江青在交響樂和戲劇界贏得了有力的支持。《沙家浜》被改編成樣板戲、交響樂和電影。她的下一個目標是芭蕾，決心掃除其中的封建殘餘，重構其表演和內容。

早在60年代初，《紅色娘子軍》就根據同名話劇被拍成電影。雖然電影有缺陷，江青告訴演員們，她有能力讓《紅色娘子軍》成為一部革命芭蕾舞劇。這樣，她在1963年末到了海南，除軍事調查外，還仔細研究了當地的地形、氣候、樹木、鮮花、環境的色彩和黎族文化。她聽取了「女子縱隊」（創建於1930－1931年）的歷史。然後，江青滿懷自信地回到北京（不顧周揚的蓄意阻撓），關閉了舞蹈學院，所有排演都被終止。她在舞蹈學院挑選了幾個信得過的人，組成「創作組」。在獲得周恩來支持後，她派遣這個小組到海南收集「素材」，小組成員包括作家、音樂家、舞蹈指導、舞台設計和主要演員。

創作組中的這些北方人被熱帶氣候折磨。他們對當地人風俗的冒犯也毫不奇怪。小組內部對舞蹈詮釋的政治內容也發生激烈爭論，甚至變成公開爭吵。爭吵是令人尷尬的，特別是他們的旅行是在駐島部隊體驗生活。從軍營生活中攫取藝術素材，他們學會了「槍桿子裏出政權」。

為了探詢歷史真實，演員們訪問了幾個曾在紅色娘子軍戰鬥過的老年婦女。她們回憶道，在芭蕾舞劇中化名瓊花的女人是地主家的女僕，受盡虐待，逃跑後變得思想成熟起來。一個有類似經歷的婦女説，她曾逃跑過五、六次，最終找到了解放軍。

劉慶棠説：一些人，特別是外國人，錯誤地認為這部芭蕾舞劇主要表現女人。實際上中心人物是劇中的英雄（他所扮演的洪

長青），而不是婦女瓊花。毫無疑問，文革毀掉了經典的芭蕾。從1963年開始，他的劇團被指示只演《紅色娘子軍》。我問道：還會有新的革命芭蕾舞劇嗎？

劉慶棠回應：《沂蒙頌》在1971年試演後仍在修改中。這部舞劇最終也會被收入樣板戲中，或拍成電影（1973年在北京首映）。故事發生在山東半島，解放戰爭時期，那裏有2個革命根據地。《沂蒙頌》是宣傳毛澤東對游擊戰爭和人民戰爭創造性的結合「軍民魚水情」。為了做準備，劇團到山東發展和當地群眾的「魚水情」。沂蒙的地方劇團請他們演出新排舞劇的片段。受到北京舞蹈劇團的鼓舞，地方劇團也即興演出了同一歷史題材的戲曲回應。芭蕾劇團首場《沂蒙頌》演出吸引了4萬多名觀眾，許多人遠道而來，孩子們爬到樹上觀看。劉慶棠根據觀眾反應估計着舞劇的優點和不足：喧鬧表示觀眾的接受；沉默表示他們需要再努力去追求表現社會實際。

另一個芭蕾舞演員發自內心地說：早年表演經典芭蕾的經歷「很淒涼，只有幾個贊助人到場觀看，觀眾對演出的冷漠讓我們感到寒意，感謝江青同志為我們帶來溫暖和激情。」

5

1936年，周恩來和斯諾訪問延安北部的一個小鎮時，一個赤裸的瘋女人突然出現在一處懸崖邊上。她刻毒地咒罵一番後就逃走了。斯諾後來知道那是個心靈受創傷的人，她全家都被瘟疫奪去了生命，使她發瘋了。

在暴力橫行的年代，女人因為無法忍受的環境而發瘋的故事比比皆是。受現實的啓發，這樣的故事被演繹成現代神話。最有名的是一個白毛女的故事。故事已被改編成戲曲、電影和芭蕾。其創作經歷反映了共產黨對人體、性、未婚生育、戀愛和政治拯

救潛力的態度變化。

最初的《白毛女》是1944年由「魯藝」創作。劇中女主人公喜兒是一個交不起租的老佃戶的女兒。地主和打手綁走喜兒抵租，喜兒的父親為此自殺。喜兒被迫為奴後被地主強姦和受地主婆虐待。懷孕後的喜兒為躲避地主的謀殺逃到深山裏生下一個兒子。不久，兒子餓死了，長期缺鹽和不見陽光使喜兒的頭髮變白（根據當地的說法）。一些村民看見她幽靈似地出沒，偷廟裏的糧食和供品，錯把她當成鬼。延安的劇本是由周揚、張庚等人審定的。喜兒逃離「封建」社會後，被八路軍和共產黨拯救。

在這部粗糙的地方戲中，喜兒、她的父親楊白勞、地主黃世仁都有人物原型，他們的名字也都有象徵意義：喜兒的意思是「高興」，楊白勞意為「白白勞動」，黃世仁意思是「世上的仁慈」。另一人物是喜兒的未婚夫，年輕英俊的大春（偉大的春天），他從白毛女古怪髒亂的外表中認出喜兒。喜兒加入解放軍，和大春感傷地重逢。在延安演出時，劇中的地主激起農民們的憤怒。他們大聲喊着「殺，殺」。

以前這出戲被認為是表現「舊社會讓人變成鬼，新社會讓鬼變成人」（文革期間，這個說法被譴責為宣講迷信，缺少階級特徵）。由於一直受歡迎，1950年白毛女故事拍成「寫實的」電影，由八路軍培養的農村姑娘田華主演。1951年，這部出口到幾個國家的電影被授予斯大林文學二等獎。儘管故事發生於抗日戰爭期間，但並沒有日本人出現在舞台上或電影中。直到現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後裔仍對這個由古典芭蕾舞表現的恐怖而又浪漫的故事着迷。在1957年和60年代初，北京開始演出由江青改編的「無產階級芭蕾」。它失去了以前的浪漫主義和自然主義氣息，卻充滿了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在幾次會面中，江青和她的芭蕾舞支持者解釋，在革命芭蕾中強姦、生育和孩子死亡等情節是如何被刪除的，以展現積極的新形象和徹底的「光明」。喜兒和大春的兩情相悅被

低調處理。八路軍和毛主席的角色被極力誇大。

一部芭蕾如此緊密地和中國革命歷史相連繫，在許多方面都得到外國人的關注。1973年，江青送給我最新版本的電影《白毛女》用來交換《音樂之聲》。《紐約時報》音樂評論人哈羅德·辛伯格報導了他在上海觀看的這出芭蕾舞：

> 用西方人觀點看， 這出芭蕾舞決不是革命的。它只是對神話故事率樸天真的演繹。它起源於俄羅斯的芭蕾，充滿了西方的舞蹈語言。偶爾我可以看到中國元素被引入芭蕾——本土樂器、五音階、還有幾個輕音節。但不知怎麼聽起來是俄羅斯味道。大部份西方聽眾會把《白毛女》的配樂歸類於電影音樂，都是些老舊的套路。

6

8月的一個下午，在上海郊外迷人的歐式風格的學院裏，我和創作這出煽動性芭蕾的劇團見了面。這裏有江青的文化追隨者林揚揚（音）負責。作為劇團的芭蕾老師和政治委員，他顯得很機智，對付外國人很有辦法。他開始講述自己的政治故事：1960年，他們這些被稱為「小兄弟」的演員和「老大哥」（北京舞蹈學院）分開了。過去芭蕾只是迎合那些請得起外國舞蹈老師的富家小姐。10年來，他們一直想辦法讓大眾接受芭蕾。學生現在完全由中國舞蹈老師指導。

江青同志首先發起了把芭蕾由「資產階級古典藝術」轉變為「中國大眾藝術」的文化戰爭。劉少奇是她的主要反對者，也是這一「地主和資產階級神聖領域」的捍衛者。劉少奇、林默涵（前宣傳部副部長）、陳丕顯（上海市委書記）過去常講：把芭蕾這一外國舞蹈從外國的社會政治現實中分離出來，用來表現當代中國現實是荒唐的想法。他們操縱劇團成員，企圖抵制江青同

志對芭蕾的精心修改。

例如，為了強調大春的革命精神，江青要求表演他組織反對地方惡霸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但修正主義者堅持讓大春專注於追求喜兒的戀愛，意味着愛情比革命更重要。其中在山洞裏的一幕，大春和喜兒分別幾年後重逢，修正主義者讓大春的針綫包作為相認的信物，讓他放蕩地舞蹈，沉醉於愛情。舞劇結尾時，兩人結伴過上田園生活。劇中的集體舞蹈也只是歌頌生產，而與政治無關。江青强烈反對「和平的結尾」，因為宣揚了階級鬥爭熄滅論。儘管劇中的地主黃世仁和村中惡霸都被打倒，她仍提醒演員：在30年代末，國家的大部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還沒有解放。大春和喜兒應該把愛情放一邊，投入還未完成的革命工作中去。

關於自己，林揚揚說：「生在新社會，長在新社會，我對勞動人民缺乏真實感受這些演員也都因為忽視實際而無所作為。離開學院的優越環境，我們輪流到工廠和鄉村中去學習如何用舞蹈傳達人民的心聲。大部份演員和音樂家都感受到『代溝』的苦惱。我們在解放後長大，只知道生活的舒適和國家的安全，不懂得什麼是貧窮、背井離鄉和死亡危險。為芭蕾舞伴奏的音樂家為我解釋從最初的陝北民間戲曲到現在的西方交響樂之間的轉變。」

江青同志告訴他們，用新的合成音樂的力量去表現劇中主題： 復仇。她把演奏者和舞蹈者之間的關係顛倒過來。她說，古典芭蕾中，音樂是首要的，舞蹈是對音樂的表現；但在革命芭蕾舞劇中，舞蹈是主要的表現手段，主要人物的英雄形象必須突出。1972年4月，劇團準備到北韓和日本進行演出，她和周恩來前來送行。她提醒演員們：他們的舞技還有不足，應該加强第五個位置，要有更嚴整的陣容。喜兒作腳尖旋轉時腿要踢得更高。演奏者要有意識地讓音律表現得柔和，因為舊式中國音樂的喧鬧，讓外國聽眾很難受。她堅定地說：「音樂應該服務於聽眾，而不是服務於戲劇本身」。

經過持續的比較，林揚揚說，經典芭蕾的獨唱和合唱都沒有把歌唱放在重要位置。看過演出的中國聽眾反映：沒有歌聲的舞台感覺是「裸露的」。所以革命芭蕾中增添了獨唱和合唱，它們在劇中激情湧動，讓觀眾隨着人物故事的展開被打動。如在第一幕中，楊白勞被地主殺害，喜兒的歌聲（如戲曲一樣，在後台歌唱）充分表達了她的悲傷和憤慨。

雖然西方樂器被用來增强表現力，但對表現人物（像在《彼得和狼》中）的主題音樂和劇情高潮時刻的背景音樂，則都由中國樂器演奏。在喜兒接過父親禮物時，在她反抗壓迫時，在她回憶過去的遭遇時，板胡都刻劃了喜兒跌宕起伏的心情，三弦宣告了黃世仁不祥地出現。一組打擊樂器活躍了大春的英雄形象。竹笛則喚起了人們對田園生活的憧憬。

芭蕾舞演員茅惠芳在舞劇和電影的上半部扮演喜兒，另一個演員扮演喜兒在山中艱苦的一幕。作為冷靜和謙遜的領舞，她最有可能成為同時代數千萬女孩的偶像（不顧領導人對追星的警告）。她有着典型中國舞者的外形。她的身體無論何等艱苦的訓練都不會變得强壯硬朗。她的頭髮很長，編成辮子盤在頭上。儘管在中國文化領域出類拔萃，但並沒有達到像芳婷和普莉瑟特斯卡婭那樣的無上境界。她說第一次演出喜兒的父親給喜兒一段紅頭繩時，她的冷淡讓到場審查綵排的農民很不滿。在下鄉與貧苦農民生活一段後，她才感覺出一段紅頭繩帶來的深深喜悅。其中一幕，當她腳尖舞蹈着穿過山間小河時，往往用優美的舞姿。「有這樣的遭遇，你還能如此優雅嗎？」農民們抗議說。後來她的舞蹈變得更加豪放。

茅惠芳匯報說：對國外芭蕾舞劇的改編，趾尖舞蹈和基本步法都被保留了下來，但需要修改。中國的蔓藤花紋特意少了一些浪漫。江青同志堅決反對過多地使用「蘭花指」和優美的上翻掌心。為了表現決心和憤怒，必須攥起拳頭。「蘭花指」只能有

限使用，如流浪的喜兒小心翼翼地摸索着走出黑暗的洞穴，來到原野，用掌心捧起河水喝。喜兒過生日時，大春摘下面具表明身份，喜兒用腳尖站立。

總的來看，江青在教授展現仇恨和決心復仇的激烈動作時，獲得了多得多的樂趣。

革命芭蕾有限地使用獨舞和雙人舞，因為它們的個人和浪漫色彩太濃，林揚揚說。在經典芭蕾中，男子獨舞反映個人高貴的光環，展示的技巧掩蓋住了其他伴舞者的舞技。對女舞者的溫柔則是顯示對女人居高臨下的恩賜。在革命芭蕾中，復仇是唯一讓男子獨舞的理由。例如，當地主把喜兒和她父親強行分開，喜兒的未婚夫大春表演了一套引人入勝的腳尖旋轉和劈腿的獨舞，以激發階級弟兄向專橫的地主報仇。

經典芭蕾中的女舞者經常是舞台的焦點，讓男舞者從屬於她的地位。林說，這讓中國人困惑不解。新芭蕾努力實現男女舞者的平等，儘管中國修正主義者所欣賞的浪漫的思念已被壓制下去。

在《白毛女》的延安版本中，整個地主的家庭都被描寫得很邪惡。文革期間，這一幕被改成只有女家長——地主婆是邪惡的，家庭中其他女人都是她專制的犧牲品。老女僕對喜兒的遭遇寄予極大的同情。女家長不僅是當前芭蕾劇中唯一的邪惡女人，也是樣板戲舞台唯一的女性負面角色。這個令人厭惡的女性人物所以被保留，是因為今天的年輕人已不再是舊式家庭和婆婆們的犧牲品。這出芭蕾舞劇提供唯一機會，讓人們看到過去的邪惡女人是怎樣的。江青把楊白勞從一個失敗主義形象變成一個有尊嚴的人物。是對無產階級人物最重要的強化。舊版本的楊白勞面臨失去女兒時，在地主面前卑躬屈膝，最後服毒自殺了。江青告訴他要勇敢地起來反對地主，用扁擔追打他，最後死於鬥爭。

喜兒的形象從一個不正常的女人變成了一個好鬥的和復仇心切的女人，她用房間裏的蠟燭台反抗地主。舊故事中的其他情

節，包括地主强姦喜兒、喜兒在山中生子、孩子死於饑餓，都被從新的版本中刪去，因為太「寫實了」。

中國戲劇中的步法也被吸收進芭蕾，以着重强調仇恨。漫長的流浪和貧困，逐漸讓喜兒的頭髮失去了自然顏色，變灰變白，她以大强度的動作舞蹈（不同於現代西方的芭蕾舞）。男舞者屏棄了古典芭蕾中的「鴨步」（腳尖朝外撇）代以軍隊行軍的正步。大春鼓勵農民兄弟向地主復仇的獨舞，融合了芭蕾的腳尖旋轉和戲劇中的劈腿。男女舞者影響了舊戲曲冰冷的戲劇化動作。在最初的舞劇版本中，農民用刀棍作戰，現在他們帶着槍，甚至手榴彈舞蹈，因為他們生活在現代。

7

「維特克夫人」，江青私下對我說，「在幾次會談中，你說我國的文學和藝術是『先進』的」（由於受他們奮發走向社會主義的激勵而說的話），我們感覺到我們的藝術水準並不和享有的聲譽完全相符。

她表揚了當前版本的《白毛女》，多年零散修改的結果。她和她的支持者正準備更多的修改。他們的努力受到了林彪集團的破壞，幸虧沒有太遲，林彪的幕後操縱已被公之於眾。一些林彪的追隨者應該為《白毛女》中誇大浪漫色彩的修改負責。他們讓喜兒到山裏避禍、並一直無休無止地待在那裏，結果讓她脫離了階級鬥爭。林彪死後，江青努力淡化大春和喜兒間的兩情相悅。她感到這次最終修改可以進一步增强芭蕾舞劇對大眾的感召力。

她承認這些樣板戲都有缺點。除了為中國大眾創作自己的無產階級形象。新劇目的另一特點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音樂和舞台可以如此大膽地融合外國的傳統元素。世界正拭目以待他們革命作品的全景。

18

如釋重負

敢上九天攬月，敢下五洋捉鱉；

談笑凱歌還。

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毛澤東《重上井岡山》

我還要再待多久——幾個月，還是幾個星期？江青及其助手一直在談論她的過去，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江青在這個無產階級國度是無可挑戰的，但我決定仍然堅持自己的想法。我說過，在史丹福大學簽約教歷史，也要處理其他職業和個人事務。她知道我疼愛女兒，並不只一次向我提過：在中國，兒童是屬於國家的。如果我決定很快離開，她就不會全部展現她複雜的個人經歷。我決定在中國再多待兩天，同時提交了一些書面問題——一些需要澄清的問題和簡單的判斷。最後一天晚上，江青做了回覆。

中國的領導體制是易變和不正規的。70年代初，江青在文藝方面的工作似乎並沒有有關部門的授權。她沒有提及那些在中國歷史上有特殊地位的高層政治任命。她對地位的無所謂態度，與國外根據中國領導風格所做的預測形成對比。

1

關於她職務的問題，江青說：「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人大

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沒有其他的職務。」

她說每天的工作都是處理例行事務：分析國內外政治形勢，然後向中央委員會和毛主席做政策建議。政治局討論的主要問題都要向毛主席匯報，周恩來負責「日常工作」。

「關於我的學習，主席讓我學習馬列主義，我要求自己學習毛澤東思想。他的《矛盾論》和《實踐論》都很有幫助。」她經常重溫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毛澤東的軍事著作也深入研究。「人人都知道我的工作總和軍事有關」，她微笑着說。

讓我好奇的是中國領導人對其倡導的「無產階級覺悟」的廣泛控制。它驅使人們在在精神上改變自己，在物質上改變了這個國家。除了為毛的馬克思主義服務，幾乎所有的現代意識和多元文化在中國都被禁止，只有小範圍的領導人可以享受。她對這一問題是令人驚訝的坦白。

對外國藝術作品（沒有社會主義特徵）在中國的上演，江青說取決於這些作品的思想內涵。在文革前有很多文化交流活動，但文革期間（江青負責對外文化交流）只有 2 個經她改造過的文藝團體出國訪問。

有兩種對文藝作品的展示：公開的和私下的。

上面提到的交流是公開的。「對人民有害的」作品只限於給領導人做「參考」，以便他們研究這些「反面例證」。為此從日本進口了一些法西斯電影供領導人觀看。他們知道日本左派因票價高昂而很少觀看這類影片。她說，要把其他外國作品當作藝術加以研究，其審美標準也可用作「參考」。在可以預見的將來，與外國的文化交流仍受限制。外交部負責與有外交關係的國家的文化交流。對外友協負責與非建交國的文化交流。交流的作品必須是進步的，並要經國務院批准。

「許多外國朋友都喜歡我們的作品」，她自信地說，「因為你們美國佔領台灣，與我們也沒有外交關係，這樣的交流必須通

過對外友協。」她斷言某些作品會受到美國人的歡迎。美國人會欣然接受《智取威虎山》和其他革命戲曲。這些作品都有歷史意義，會對中美關係產生影響。

她再一次讚揚艾森豪威爾將軍20年前到朝鮮簽署停戰協議。她說，朝鮮會自己解決問題，不歡迎外國干涉，美國也表示贊同。她補充說：朝鮮帶來了幾部電影，中國也歡迎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的進步作品，但沒提及蘇聯。

在談話中，她懷舊地提到嘉寶、卓別林和其他好萊塢作品。他們能把這些「反面例證」展示給群眾嗎？

「這些資產階級電影只會私下放映」。她解釋：如果人們觀看，就會站在政治立場上進行批判。公眾的抨擊對嘉寶會很不公平，因為她不是中國人，對卓別林也是如此。她在30年代看過他的作品，《摩登時代》被認為是對獨裁的痛斥。他的其他電影似乎有反對斯大林，特別是反對希特勒的傾向。她們認為，他的電影是「進步的」。這些電影攝於早期，製片人對中國友好，在當前政治環境下批評這些演員很不公平，因為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我們（領導人）中間」放映是正確的。領導人對這些電影有主導權，私下放映，不能被公開。

我注意到中國沒有專門的兒童文化，特別是青少年文化。兒童也要服從那些大人們為革命戲曲創作設定的標準嗎？還是可以為兒童創造別的文化種類？

「我們還沒有採取足够措施」，江青代表領導人正式回覆，「但群眾已經自發地做了許多工作」（不清楚是什麼）。

在群眾性基礎上提高藝術標準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設立的目標。對文學和藝術，我們必須嚴肅、認真、負責。對敵人不能採取粗糙的方式和粗魯的批評。要在歸納分析後，刻劃反面人物。

她預言，隨着國際關係和文化交流的發展，矛盾會凸現，但矛盾（外國或資產階級文化帶來的衝擊）主要出現在他們一邊。

她腦海中的真正問題，是中國人能否為全世界革命群眾創作藝術作品。要做到這一點，作品的藝術標準和思想內涵都必須很高，但絕不會是向他人灌輸。江青反復強調，到國外演出會冒失去已有聲望的風險。

「我從未滿足於現有作品，他們都不完美」，是江青掛在嘴邊的話。「我一直試圖發現其中的瑕疵。我們不應怠於追求完美的藝術和思想，不可以自大。」

過去25年裏，她認為的最大成績和失敗又是什麼呢？

首先，中國人已經站起來了。他們不再被稱為「歐洲窮人（？）和東亞病夫」，他們不再屈服於帝國主義，一些棘手的問題仍有待解決，美帝國主義仍然「霸佔着台灣」，北部邊界的一些地區被外國勢力（蘇聯）侵佔，印度佔領了一些西部領土，並不時挑起衝突。毛主席制定了以下外交政策：必須堅持主權獨立完整；外國干涉使台灣問題懸而未決，但那是一個他們和台灣人可以解決的問題。尼克松總統最終也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簽署了聲明（上海公報）。她注視着我說；「知道嗎，美國對台灣的侵佔就好比中國佔領美國的長島」。我說，這也是我給學生打的比方。此話引起了一陣笑聲。江青接着說，現在中國人擁有獨立和主權的「一部份」，不久就會擁有「全部」。

經濟上，中國必須自力更生，但並不表示主席拒絕國際貿易和其他交往。「中國先進嗎？」江青問，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內債和外債的國家，這也是爭論的焦點。講到不足，中國的經濟發展很不均衡，一些經濟和科學領域受到忽視。

思想上，中國有一個成熟的馬列主義政黨（爭論的焦點）。另一方面，他們沒有很好地研究馬列主義，致使許多好同志受了「政治騙子的騙」。

我們談到婦女問題。她說，封建和包辦婚姻在農村仍然存在，男女同工不同酬。儘管如此，在政治上他們取得了重大進

步。實際上，中國擔任領導工作的婦女比其他任何國家多。我指「實際上」而非「名義上」（江青確實擔任了比名義上更多的角色）。儘管資本主義國家的婦女可以擔任領導工作，但那都是名義上的。這一點，中國超越了西方國家。在其他方面（未說明）中國婦女處於落後地位，必須通過堅持不懈的政治思想工作來改變。先進和落後的婦女角色的並存反映了「辯證的統一」，必須從發展眼光來看待這一問題。

對發表違禁作品的作家、出版社進行政治報復，引起的恐懼蔓延到一切文化領域，包括電影。對此，江青談到一個其他領導人不敢涉及的問題。她引用陶鑄的例子：出於對批評的恐懼，陶鑄剪掉了影片中的人物，他知道對此負有責任。江青知道後，下令調查他參與的所有影片，因為領導人不希望他或任何人纂改過去的歷史。

她不滿意工作人員（遍佈全國的官僚機構）在文化領域的表現。他們表現不良（她認為是政治工作不力所致）的原因，恰恰在於領導人自身（由於延續了儒家傳統，他們要為人民以身作則）。

江青承認出版界十分蕭條（是對我以前觀察的回應。我發現，最近由黨認可的中國簡史在書店很難見到，老師和學生也被拒於圖書館外）。她說已批評了出版社的敷衍了事。周總理對出版界下達了任務，但他們都被可能的政治錯誤嚇怕了。（對文字獄的恐懼同古代一樣）

她說，那些對我的歷史研究有幫助的書現在還找不到。但她堅持為我找一些范文瀾（她信任的歷史學家）的書和其他現代歷史著作。她已經派人到舊書店去找。讓她驚訝的是，即使有毛主席和江青同志授權，經銷商也不情願幫忙。（對人們內心的恐懼，她不感到驚訝嗎？）

你有二十四史嗎？「沒有」，我解釋說，美國學者一般不擁有這種大部頭書籍。她反問：做為歷史學家，你怎麼會沒有專業工具書呢？

難以辯駁，在美國用於研究的圖書館一般為學者提供基本參考書。她對我的話感到困惑，並宣佈為我提供一套二十四史。她說知道我懷疑叛徒和忠實的共產黨員都在歪曲歷史，或不願面對完整的歷史。一套完整的歷史書會幫我打消疑慮。她不能肯定何時能找到一套。如果她的助手不能，她會把自己收藏的一套給我。我感謝她及主席和其他領導人的真心實意。

後來，江青指着堆滿綫裝書的書桌說，主席和她花不完他們所賺的稿費，他們決定為我購置一套二十四史。我們一起走到桌前翻看。這是光緒十年（1884）的版本，加上她找到的《清史稿》，就有了一套完整的官史。她準備把書寄到美國（我回去後沒多久就收到了）。她說，這些歷史書都是封建的，但有必要閱讀。研究過去對每個人（美國人或中國人）都是必要的。儘管美國也有這些圖書，但都十分昂貴。周總理贈送了一套給美國國務院。遠去的歷史關係到現在。例如後漢李固寫給黃瓊的那封著名的信，毛曾在1966年引用過。

儘管她堅持毛主席及其周圍的人尊重歷史，不會「歪曲歷史」。但我並沒有看到歷史研究的迹像。在她看來研究歷史的前景又會如何呢？

她打着官腔說：在我們國家，不僅大學進行學術研究，也在科學機構和人民群眾中進行。在長沙的考古發掘就是靠群眾。無論什麼人，也不管他的地位和教育背景，都必須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去研究。這一原則同樣適用所有的文化創作，包括歷史、文學和戲曲。

2

夜幕降臨，江青要展示其他禮品。兩個人搬進一個大木箱，在江青的解說下一一打開。在箱子上部和四周有許多裝有粉末的小荷包（唐朝一般作藥用）。箱底被碎紙圍着一個大瓷瓶——有

蓋並微微閃光。江青繼續顯示醫學知識：粉末中的生物鹼不能被單獨吸收，必須加水煮過服用。她仔細演示把一包粉末倒入300毫升水中，讓水沸煮，立刻服用，會有尿感。

下一件物品是在竹筒中加熱的海水溶液，不停地從筒口中濺出。「它對牙齦有好處」，她說。最後一件是晾乾的白百合，江青當然也解釋了它的藥效。我猜想海關官員可能會對這些中國藥品感興趣。

「那就不要帶走」，江青說。（可能是不便公開或怕政治麻煩）。江青失望地讓人把它們抬走，然後轉到一個輕鬆話題——她的健康問題。她的白血球數量失衡的問題，經過兩年針灸治療，血小板和白血球都回復了正常。現在她只服用安眠藥。她重複：飲料和鍛煉是最好的祛病良藥。

8月31日早晨4點，她的一個助手低聲對我說：江青同志已把想說的都說完了。儘管我有預感，但還是很吃驚，我就要被趕出她的領地。這裏的空氣充滿茉莉和檀香味，對她的評價也告一段落。

我對她說的滿意嗎？江青問道。

我當時確實表現得很謙恭，並深深感覺我們間的距離是多麼遙遠。我說，儘管一直在忙於作筆記，但我認為她不僅是一個獨特的革命領袖，也是一個好老師——老夫子（一個封建主義詞匯）。我會把她的傳教帶到國外分享。

「你是一位教授，不，是一位副教授」，江青對我的奉承回應。江青對作最後陳述表示了謙遜。就在我要告辭時，她又一次宣佈：美國對台灣的「霸佔」是中美建交的唯一障礙。

真的！我說會從她的角度寫一部革命史書，她的個人歷史也會包含其中。

我的告別辭說完後是令人難受的沉默。我覺察了那長期的矛盾——存在於個人和社會、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私下和公開的歷史、江青和毛之間的矛盾。有誰比毛澤東對過去的歷史更有權

威？還有關於他和其他人在30年代前綫所拍的影片嗎？江青對自己的描繪不是對她作為一個領導人獨立性的嚴峻考驗嗎？

「你是寫作的專家」，江青打破了沉默，「我是革命的領導人」。

握手後，我轉身離去。

3

在我中國之行的意識裏（我身處其中，卻不認為），這個有幾百萬監視者和告密者的國度，保護着那些順從其制度的人們。我所能說的是，他們對中國以外的認識僅限於馬克思描繪的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怪胎（當然那讓他們恐慌）。

在廣東會見的後期，江青的助手和我開始焦慮，不知道在穿越中國邊境時，我的筆記、照片、文件和我自己會有什麼樣的遭遇。人們也許會在香港抓獲我，並利用我的材料肆意歪曲。為了安全起見，我是否該把東西都留下，回家後再把它們寄過來？

我害怕失去這些個文件（即使是暫時的），那是我賴以完成任務的關鍵。因此，我決定說「NO」。

在我們此後的會見中，江青又提及這一話題。埃德加·斯諾第一次會見毛澤東時，說有一些筆記被中國人扣留。這些筆記（和我的類似）中的錯誤和含糊不清之處可能被無知和惡意地利用。

我笑着向她保證：我很厲害，可以保護自己，並且隨遇而安。我們對風險的感覺明顯不一樣。從一開始，我們會面的基礎就是信任。

第二天，我正在房間收拾行李，沈若芸來了。她提到了前一天談的安全問題，說的都是游擊戰中的那一套。她說，我應該裝糊塗，事先想好怎樣打發貪婪的香港記者，以掩蓋行踪。防備措施也想好了，「江青同志」的字眼不再出現在我們的談話中。這個字眼後面的神秘女士像狐仙一樣消逝了，只有面對美麗和恐懼的刺痛感還在。

幾天下來，沈（我的陪同）和我可以放鬆一下了，在嘈雜的汽車裏遊歷和領略廣東紛亂的街道。在火車站的正式道別，沒有信心的交流和感情的衝動。一位為廣東友協工作的年輕雲南女人陪我登上廣東到香港的火車。我從談話中感覺，她知道我此行的目的。我送了她一支從江青那裏得到的枯萎的蘭花。我看見火車上為數不多的旅客，突然意識到這些面孔已跟隨了我幾個星期。

在深圳邊境，我被交給了消瘦老練的賴先生。賴先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情報員。他說曾幾次護送埃德加・斯諾和其他外國友人。中國海關讓我們通過。按計劃，我們各自通過羅湖橋。一輛等候的轎車把我們帶到先前住過的安靜旅館。身着藍西裝魁梧的中國情報員守在我房間門外、電梯旁和餐廳燈柱後面。我們的目光很少相遇。

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混亂和喧鬧，讓香港看起來熟悉而又討厭。第二天，我在香港被一路護送上環球航空的班機。江青事先對我說過，根據她的要求，周總理負責我的安全。為了我的遲行，周總理還換調了另一架滿員飛機上的一位乘客。

19

第11個小時

誰能掌握過去，誰就能把握未來；誰能掌握現在，誰就能把握過去。

——喬治·奧威爾

在延安的日子裏，江青只是一位年輕的妻子和一個並不惹人注意的同志，但她敏銳地感覺到「你或可一見鍾情，但若要長久，便需把握權力。」

也許她沒意識到，這個睿智的判斷書寫了她不平凡的生涯：從曲折的少女時代到嫁給最高領袖，在權力的追逐中撫平婚姻的創傷。她的領導地位是同時代其他女性無法企及的，也是她個人奮鬥的結果。她需要教會主席不僅愛作為女人的她，也要把她看作不受男人操縱的政治人物。她要贏得那些因覲見領袖受阻而厭惡她的同事尊敬，還要與民眾保持聯繫，以取得派系領導人的地位。僅僅靠老一代革命者建立的舊體制是不夠的，她需要建立一套自己的標準去改變國家的歷史。

在我們的交談中，江青對未來的預見在後來的事件中得到驗證。許多在文革中「遭衝擊」的老同志復出。鄧小平一度是劉少奇的有力支持者，在1973年作為總理（儘管短暫）被起用就是這一趨勢的例證。誕生於文革烈火中的樣板戲生存了下來，逐漸為了神化黨史之目的被搬上各省舞台。文化交流仍然是有風險的，「尖銳矛盾」在中國一邊。中國領導人繼續强調要對「舶來品」的文化污染保持警惕。

當疾病和死亡改變着共和國奠基人隊伍時，江青的視野越過文化領域，進入內政外交。每一天面對無情的人事更替和革命理念的輪迴，日益衰老的領袖們變本加厲地利用過去的功績去博取今日的一己私利。他們個人，他們創建的黨以及被他們改變了命運的人民，將如何進入官方編年史的最後審判呢？

1

從外國人角度看，江青是一個神秘的女人，她若隱若現於公眾眼前。她的個人意志（同其他領導人一樣，除了經毛認可的）很難被察覺，儘管她的自我表白和她的利益以及行為方式相一致。

毛澤東憑其政治韜略和家長式神秘可以不出席例行宴會、游行和機場迎送儀式，江青卻有責任出現在眾多國家事務中。偶爾缺席（被外電報導為「失勢」和「倒台」）也是由於她的特權、不滿、政治壓力或健康不佳造成的。無論作何解釋，幾年來她一直隱居幕後和官樣文章中。可以相信，她是少數掌握思想文化領域權力的人。中國的民族文化從未比文革初更流行和受到青睞。同時，包括體育、舞台和銀幕在內的行為藝術受到國家指導。這種對思想、形象和大眾行為的劃一按排也是史無前例的。大眾娛樂對每一個偉大文明——瑪雅、古希臘、古羅馬和美國——都是至關重要的。從基督徒與獅子博鬥到競技賽都是例證。直到20世紀中葉，中國人才意識到這一點，並加以巧妙發揮。

朱維諾尖刻評論道，「羅馬帝國的居民只對麵包和競技表演感興趣」。在2000年後，北京人也只對「麵條和大眾娛樂」感興趣。北京的競技場是工人體育場。從古羅馬到延續至今的中國，死亡遊戲的規則已經改變。對罪犯和刁民的殘酷——那是江青從小畏懼的——被禁止在公眾場合展示。合法的暴力、謀殺和殘酷競爭存在於大多數古代和現代文明中，在中國則被請出了大眾娛

樂圈。紅色歌劇和芭蕾舞劇中表現的暴力是非常不真實，甚至是好笑的，融合了武術和散打的元素。同樣，體育競技場只是模擬的攻擊。人與人的博鬥，例如拳擊和摔跤是不被官方鼓勵的。舊時的鬥雞、鬥蛐蛐也都被禁止。貴族趣味和男性統治的體育運動讓位於大眾體育和女性的參與，包括女子藍球隊。「乒乓外交」則盡現政治韵味。無論如何，「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仍是中國運動員參加國內外比賽的響亮口號。

隨着文革發展，黨所認可的大會操泛濫成災。江青偶爾會主持一下開幕式，全身西式打扮，以區別於泥腿子農婦。場內雲集了她的客人——重要國家的使節。此時，她會散發出獨特魅力：像姿態優美的君主，活潑、生氣勃勃並絕對守時。

這些在民眾面前的亮相（電視攝像機把她帶到外部世界面前）與她的工作密切相關：繼續創造控制當代生活面貌和思想的國家歌劇。文革在1969和1970年走下坡路，她在1966年利用群眾運動建立的派系被悄無聲息地解散。1972年，國務院重建文化部，吳德任部長。他也是江青在談話中推崇的人，同時兼任北京市市長和黨委書記，這顯示吳德權力的集中。

1974年，北京京劇會演10周年。當江青演出首場政治秀時，對革命樣板戲充滿了溢美之辭，現在已成頂尖的文化成就。初瀾，一個匿名的發言人，表示:「革命樣板戲為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樹立了革命的群眾觀點。它是保障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產階級復辟的有力思想武器」。

從10周年慶典到江青的倒台，她對樣板戲的個人支持明顯減少。這主要出於對在毛以外另樹權威的普遍抵制和黨刊上日漸增多的匿名批評（作者往往代表不同領導人的意志）。在一個誇張的文化詮釋中，樣板戲被描繪成「生動的歷史畫卷」，「展示無產階級英雄形象的畫廊」。最新的樣板戲《杜鵑山》歌頌了毛主席1920年代的軍事思想以及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林彪的不

光彩政治表現（這是第一部批判林彪的舞台劇）。

中國人和外國人都注意到了劇目的減少，文革以來只增加了一到兩種，與中國豐富多彩的戲曲傳統形成巨大反差。辯護性的解釋，如「紅旗」所言，「對文藝創作蕭條的攻擊是階級敵人的邪惡煽動，是階級鬥爭在文藝領域的反映」，並補充說「這是一個數量對質量的問題」，「反動派儘管多產，中國領導人也毫不在意，反動派的作品必須被清除，無情地批判，將它們丟進歷史的垃圾堆。」藝術質量被描繪為「反射陽光的雨露」。

此後，以「戲曲之美」的名義，「腐朽」的種子開始在舞台上泛濫。1973年，地方劇團被鼓勵創作社會主義劇目，但要由中央批准。這些劇目後來都被推崇為樣板戲。根據這一精神，山西省演出了「三上桃鋒」，引起了北京的憤怒。

對這出戲政治含義的強烈反應，顯示了隱晦表達的必要性。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對領導人及其作為的批評是不能由官方機構來進行的。中國歷來有壓制批評當權者的傳統，帝國時期懲罰尤其嚴厲。不同意見的爭論被禁止，文藝創作，特別是歷史劇就成了表達這一聲音的載體。毛澤東繼承了古代帝王打擊知識份子和政治異議的一貫做法。在60年代早期，「吳晗派」的一出歌頌海瑞剛直不阿的戲被毛的捍衛者指責為對罷免彭德懷的攻擊（彭德懷是批評50年代毛澤東大躍進的著名將領）。儘管「三上桃鋒」順應了文革要求，歌頌了中國共產黨，但作者選擇在大躍進，毛政治生涯最黯淡的時期為背景。該劇所提到的事件在1964年被搬上舞台。這一年是文革前夕江青興起，劉少奇和王光美將被清洗的時期。

早在1974年，初瀾就批評這出晉劇是反革命的，企圖推翻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宣判。通過巧妙的暗示，該劇美化了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期，劉少奇和王光美在河北推行的政策。劇中的馬匹象徵相互競爭的領導人及其政策。一匹被鞭趕而累死的

病馬，代表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那匹叫老劉的大紅馬（指1964年王光美捐獻給桃園的駿馬）被稱讚是英雄式的。劇中女主角叫青蘭，展現了王光美複雜的柔弱性格。這歸於她所受的儒家教育和對階級鬥爭熄滅論的認同。該劇被指責充滿了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中間派思想和江青樣板戲中普遍存在的反動人物。

後文革時期能被接受的樣板戲並不多，「半籃花生」是其中一例。它被拍成彩色影片並受到熱烈歡迎。劇中描寫一位學生利用業餘時間去揀田間遺漏的花生。儘管做了許多修改，黨的發言人承認它還有待完善。然而貧下中農的議論告訴我們，「哲學已經從講壇上走下來，成為大眾手中有力的武器」。「半籃花生」是農村「兩條路綫鬥爭」（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説教，揭示了矛盾的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也就是要「小中見大」。

像其他領域一樣，為保證毛澤東在藝術領域的絕對權威和思想指導，江青在審查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不為人所知。她的動機（在我們的談話中毫不隱諱）表明她的權力不僅是對主席權力的補充，也可能是一種競爭關係。無情的是，她的個人野心和對婦女的世俗輕蔑為她日後的政治生涯埋下隱患。

1974年7月，有了較少危險的回報方式，第10屆北京京劇會演上，江青被稱為「毛澤東思想的詮釋者」，這一稱號以前只有周恩來和林彪獲得過。初瀾聲稱，經過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和數百年的資本主義制度，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看，只有幾部作品得以傳承。帝國主義已經滅亡，資本主義日漸沒落，「舞台充滿了現代主義、野獸派、阿飛舞、脱衣舞和其他腐朽的垃圾。作品無數，卻都具有一個特點：毒害和麻痹人民」。

作為樣板戲的推動者，神秘的初瀾無疑是他們中顯赫的一位。伴隨着以新無產階級文化取代封建主義、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文化的陣痛，他們讓中國處於歷史的前衛地位。與反對古代哲學的運動相呼應，初瀾批判了古戲曲中宣揚的「狂熱的」孔孟

倫理：包括「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女子的「三從」：在家從父、婚後從夫、夫死從子和「四德」：品德好、舉止好、形象好、針綫好以及「忠、孝、貞、烈」和「忠、忍、仁、愛」等。

對中國在文化領域的優秀成績，初瀾宣佈：「我們不但要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要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無產階級10年來的努力換來了17部樣板戲。江青在文革時期構思與創作了8部樣板戲，新增的9部是：《紅燈記》、《黃河組曲》、現代京劇《龍江頌》、《紅色娘子軍》（改編自革命芭蕾舞劇）、《平原作戰》（改編自電影）和《杜鵑山》；現代革命舞劇《沂蒙頌》和《草原英雄小姐妹》以及現代交響樂《智取威虎山》。創作是緩慢的，至少有5部曲目是從以前的作品演繹而來。

展望1974年（具有諷刺意味），初瀾決心：「在下一個10年或20年，我們要快馬加鞭，加倍努力為無產階級文化事業譜寫新篇章。」

1975年秋，在中央負責文革的江青授意重組文化部，並由文化部贊助公演了一批新的電影和劇目。它們直截了當地頌揚當時的政治活動——包括赤腳醫生、魚雷艇和遠洋輪船的生產。愈來愈多的演員和英雄口號主導了國慶節慶祝活動。地方劇團表演了民謠、故事、相聲、話劇和其他在文革期間被禁的類目。第二年3月，5個被停刊半年的文藝雜誌宣佈復刊。這些藝術形式都很常見，並都無一例外地歌頌無產階級和毛澤東思想的崇高。

這一時期對革命歷史劇最有影響的是解放軍總政治部排演的10幕話劇《長征》。《長征》不僅是文革以來第一部受到高度肯定的話劇，也是第一部受歡迎的紀念長征歷史的演出。劇情是政治性的，描寫了「毛的革命路綫戰勝王明機會主義路綫和張國燾的右傾逃跑和分裂主義」。在舞台上表現早期毛澤東，渲染毛的思想和激發觀眾對毛的想像。

在訪談中，江青解釋文化交流如何維繫上層建築領域的對外關係。她知道，文化交流比物資貿易更具風險。對中國人來說，把他們道德純潔，藝術龐雜的無產階級先進文化讓外人去評判，同時輸入「資產階級」文化，可能會激起對文化多樣性的渴求。在受過現代教育的中國人和老鑒賞家們的頭腦裏，對中國每年生產數百部影劇以及出版數量驚人的圖書應該都記憶猶新。60年代初，人們還擁有欣賞古代或外國戲曲、音樂和電影的自由。這些寬鬆政策在文革開始時被突然終止。到70年代早期，最輕微的放鬆也會成為一個渴望更國際化氛圍的機會。

當時有兩個對外交流項目最讓江青着迷，一個是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拍攝有關中國的記錄影片，一是費城交響樂團訪問北京。官方對這兩件事的記述顯示了中國的熱情好客和尋求文化純潔性之間的長期矛盾。這並不比過去的王朝有所緩和。

意大利人安東尼奧尼在1972年春受邀訪問北京，並為中國電視台（近年來已成為主要輿論工具）製作一部電視紀錄片。他受到廣播電視部門大張旗鼓的歡迎（這些部門文革以來就在江青控制之下）。許多著名製片人已經在30年代到訪過中國，包括愛森斯坦、加爾曼（蘇聯）、喬伊斯·伊文斯（愛爾蘭，1972年夏再次訪問中國）。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説明同一事物在不同觀察者眼裏各有真實一面。這部由《紅色沙漠》導演所拍攝的 4 小時影片的缺陷及其對自然主義的無力嘗試，都説明影片是安東尼奧尼式的，是對無產階級中國的滑稽反映。他對日常生活不加掩飾的描寫與黨的理想形象和治國精神相抵觸。安東尼奧尼的影片表現了輕鬆、率真、倦怠、憤怒和夢想，是每一個在路邊或公共場所的中國人都可以擁有的一連串記憶。

在為中國領導人私下放映後，安東尼奧尼剪輯了影片的

部份提供給外國電視台（1973年1月在美國上映）。人民日報評論員譴責其是「完全的謬誤，是誹謗和抹黑中國」。影片沒有拍攝上海碼頭的國產遠洋巨輪，只出現了外國貨輪和中國的小漁船。在描寫山東林縣的鏡頭中，引為自豪的紅旗渠幾乎看不到，只有「一連串支離破碎的片段：孤獨的老人、疲憊的家畜和破敗的房屋」。在一幅畫面中，人們正在打太極拳，安東尼奧尼（錯誤地）認為領導者想要鏟除這項運動。其他「怪異」的鏡頭包括：茶館裏的民眾、裹腳的女人、剔鼻孔的和上廁所的民眾，影片暗示人們留戀過去。人們確實「痛恨那個百年魔怪舞翩躚的過去」，「歷史不可逆轉，任何不自量力的人都將被歷史的車輪碾碎」。在拍攝南京長江大橋時，安東尼奧尼選取了一個糟糕的角度，讓它看起來搖搖欲墜。一條在橋上晾曬的褲子似乎是另一個嘲諷。安東尼奧尼對《龍江頌》中女主人公的咏嘆調「昂起你的頭，敞開你的胸懷」的嘲諷，是把它用作一隻天鵝搖頭的背景音樂。

北京的抨擊讓安東尼奧尼感到沮喪，他平靜地回應說，「他們沒能理解我要表達的東西，沒有看到他們的國家是多麼廣闊的舞台，沒能理解這宏大而神秘的劇作中許多演員和 8 億人民所要表達的心聲」。

1973年9月，中美關係開始回暖，費城交響樂團應邀到北京、上海訪問演出，但沒有相應的中國音樂團體訪問美國的計劃。極端的外交行為和偶爾的理智回歸，讓這次訪問成了中國對待外國訪問團自相矛盾態度的一個縮影：為「友誼」乾杯的熱情下，是客人走後對外國文化的排斥。

官方對費城交響樂團的報導注意到：該團來自美國獨立之鄉費城，由尤金·奧曼迪指揮，此人的年齡（73歲）和經驗（他雪白的頭髮頗有說服力）都堪稱一絕。江青說：按照慣例，北京的 4 場演出和上海的 2 場只對領導人，而不對普通民眾開放。聽眾中包括美國駐北京的首席代表和中國政府高官，其中長期擔任中

央交響樂團指揮的李德倫引人注目。中央交響樂團是革命戲曲和芭蕾舞劇的代表，是江青這一顯赫女主人的堅定追隨者。

費城交響樂團演出的曲目是保守的、豐富多彩的標題音樂，包括貝多芬第五交響曲（感謝他鼓舞性的標題「勝利」）、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塞繆爾・巴伯的弦樂柔板。據說江青特別要求演出貝多芬第六交響曲《田園》，但被告知沒有帶樂譜來。不同於中國的交響樂團，他們不能倉促行事。於是江青派飛機到上海取來一份樂譜，以便《田園》可以在北京演出。官方音樂評論對《田園》所展現的明亮的音樂渲染、潺潺的溪流、鳥鳴、鄉村舞蹈、暴風雨和歸寂於撒滿陽光的田野都贊不絕口。不知貝多芬對19世紀維也納鄉間的描繪，能否喚醒20世紀中國鄉村浪漫的社會主義情結？

作為結束曲，美國人演奏了《工農進行曲》和江青的代表作《黃河鋼琴協奏曲》，殷承宗擔任鋼琴伴奏。北京交響樂團在這次訪問中一直保持低調。殷承宗還演奏了他改編的一首美國樂曲《牧場是我家》。

在北京第三場演出的結尾，江青向奧曼迪贈送了一套她的私人藏書，並介紹說這套書有上百年歷史，現今只有一套流傳於世。其中一本有幾頁奧曼迪也許看不懂的中國樂譜。江青解釋說：當她還是小姑娘時，她和朋友曾把西方樂譜符號比作「豆芽」，還說「與『豆芽』分隔了幾十年，我們都快變成粗糠了」。

音樂時光在外交圈中一閃即逝，友好的面容隨客人離去而消逝，舊中間路綫又被新的無產階級義憤壓倒。中國領導人恢復了對外國人的抵觸，掀起了對「資本主義」音樂的抨擊。也許中國領導人對奧曼迪演出的格外熱情，會讓那些早期受過西方音樂教育的人認為，從此對外國音樂嚴厲的禁令會被放鬆，但他們錯了。

即使在社會主義先驅中，這樣的文化高壓也不多見。莫斯科早年的革命文化運動也未曾如此排外。我們知道，馬克思喜歡

莎士比亞和巴爾扎克的作品，列寧對普希金和切尼雪夫斯基情有獨鍾。但在1974年春，北京領導人把資本主義的興起與古典音樂相連繫，把它的衰敗與印象派和現代音樂掛鉤——批判一個最近才被承認的理念：音樂不具有階級屬性。孔聖人的哲學此前一年就被批判，他被指責為使用音樂喚起仁愛和諧的情感，卻否認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中的讚美詩，包括抒情歌詞「人們團結成兄弟」、「億萬生民互相擁抱吧!把這一吻送給全世界」，都被初瀾在一篇文章中指責為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資產階級印象主義」作曲家德彪西的作品被指為「充滿頹廢、失望的世紀末情結」。結論是「當前醉心於外國文化和音樂的復古趨勢，本質上是詆毀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企圖逆轉歷史的車輪，在文藝領域恢復邪惡的修正主義路綫」。

另一些人則被初瀾稱為「盲目崇拜外國文化，放松了對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警惕」。不是每一樣「舶來品」都受到抵制，但必須用階級觀點去分析西方的傳統音樂。要制止那些「骨子裏崇洋媚外」的人。對外國文化要批判地吸收，「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江青對音樂的盛情似乎已經逆轉。初瀾對外國文化的竭力否定是得到她授意的嗎？也許是政敵以此來攻擊她？《紐約時報》音樂評論員哈羅德· 辛伯格曾隨費城交響樂團一同出訪中國，公正地報導了事件的另一面：在受邀演奏《黃河協奏曲》時，美國人戲稱其為《黃色狂熱》。儘管殷承宗在北京受過舊式西方音樂教育，卻忽視了奧曼迪的指揮棒。這首配樂可稱得上最好的「電影音樂」。它是後浪漫派拉赫馬尼洛夫·哈察圖良作品的翻版，融合了中國傳統音樂和華納兄弟電影的高潮。

真是「太多的洋為中用」！

3

在江青的意識中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個人歷史地位問題：她僅僅是一個新秩序創建者的配偶，還是應該作為一個領導者在毛澤東去世後繼續掌權？或者應該在兩種角色間擺動？這可以從她70年代的日常活動和哲學辯論中看出蛛絲馬迹。

文革期間，江青升入政治局並獲得了「國家領導人」稱呼。但她的影響力應然還只是限於領導人之間和她的追隨者中，她很少與外部世界保持聯繫。偶爾她也會接待外國來賓，包括美國總統尼克松、英國首相希思、塞浦路斯大主教馬卡裏奧斯和非洲的達官顯貴。江青一般不參與實質性會談，就國家發展重點、對外事務或貿易關係發表講話。這些問題仍然由毛澤東、周恩來、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和外交部長喬冠華掌管。

作為領袖的妻子（第一夫人），江青招待了一些來中國訪問的第一夫人，其中最有名的是菲律賓總統夫人伊梅爾達· 馬科斯。中國與這個具有戰略意義的亞洲國家關係並不緊密。伊梅爾達· 馬科斯是前選美冠軍，她的美貌得到國際公認。她一直關心國外的人權事務，對權力充滿激情。江青在1974年9月會見她。馬科斯夫人後來回憶：她一開始害怕江青會是那種「激進的理論家」，後來發現她「說話和氣」，「非常溫柔」，「東方女性」是她們的共性，並且都非常「開明」。她還披露江青在水門事件後說：「尼克松是勇敢的，相信他會挺過去」，「他的功大於過」。

江青以一種高貴的無產者方式陪馬科斯夫人看戲、參觀工廠和到天津郊外一個叫小靳莊的村莊。遵循先賢建設模範社區的做法，江青讓村裏的600個農民組成一個生產隊，形成了小小的無產階級文化烏托邦。她向客人展示自己住過的房間和床。這是她在此地創作無產階級詩歌、小說、歌曲和舞蹈，對農民進行輔導時用的。她的一個目標是讓男女在社會和政治地位上平等。

如果普通民眾的革命激情可以像樣板戲中的人物一樣保持和發揚，他們無疑會創造新的國家歷史，會有幾百萬英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文革試圖證明革命的繼承問題與國家上下都密切相關。對小靳莊的宣傳未能掩蓋這樣一個事實：「製造公共輿論」的力量仍然是為了維護領導同志。否則，毛身邊的統治者該如何確立自己的歷史地位呢？又如何傳承一個確定的統治模式呢？

在幾次談話中，她敦促她的同志要學習歷史，但學習方式要正確，要在領導同志指導下進行。到1975年末，歷史學家（大部份人有官方許可）對歷史的記載變成領導人的特權。他們的觀點通常來自 3 個渠道：毛澤東的直接指示；某一位或幾位領導人的匿名指示；某些由高層操縱的群眾作品。

為什麼王朝會在其創立者死後衰落？這個問題一直困擾和鞭策着毛澤東，也讓當代人努力探詢歷史興衰的奧秘。整個70年代，黨一直在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研究中國浩瀚的歷史資料。研究久遠的歷史是為了現實的功用。林彪反對領袖和人民被「解釋」為孔孟之道的「回潮」，而黨是「進步的」法家，法家被認為是共產主義者的歷史先驅。

中國的法家和共產主義者都尋求絕對權力。統治者扮演父親的角色，民眾則像孩子。他們都相信要做（不包括其他世俗的、宗教的、個人的道德標準）是非的裁決者。社會控制通過一套嚴格的獎（榮譽或愉悅）罰（羞辱或痛苦）和相互監視的體系來實現。兩種制度都強調發展農業和軍事力量，所以農民和軍人的地位要高於商人。反對林彪的運動把林彪同孔子聯繫起來。孔子，這位公元前 5 世紀的先哲，被後世王朝尊為聖人，並被看作法家的首要反對者。現在孔子被攻擊為反對毛體制的代表。這樣的聯繫很難讓人信服。縱觀林彪的一生，包括在黨內35年的威信，並沒有因教授孔子信條（等級主義勝過平等主義；和諧勝過鬥爭）或在生活中身體力行而為人矚目。相反，林彪是武裝鬥爭代表、游擊戰術專家、解放戰爭

的英雄。江青在談話中對林彪的攻擊並沒有提及孔孟之道。隨後解密的黨中央文件中也未涉及。他與孔子的聯繫1973年被炮製出來。2年後，林彪被指控企圖謀殺他的同事。同年10月，林彪被定為「右派份子」而非「極左派」（如江青稱呼他的那樣）。林彪在外蒙古的死僅僅是一系列事情的開始，隨之而來的是如何費力地把他消瘦的形象從8億人民記憶中抹去。此前已有先例，另一個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劉少奇在6年前被廢黜。出於對蘇聯的憤怒，他被稱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正當領導人吸取過去教訓時，林彪又重蹈覆轍，自然讓攻擊他的人把他和孔子聯繫在一起。

對人們思想的粗暴操縱（從過去到現在）很快演變成對林彪、孔子和歷史上其他「復辟派」的批判運動。言論可以毀滅偶像，無論它是封建的，還是革命的；是可以替代的，還是不可動搖的。這種運動已變成了生活中的儀式。運動據稱是毛提出的，周恩來是具體的執行人，江青不僅是這場運動的受益人，也是公共輿論的總導演。據台灣情報機構掌握的文件顯示：江青把林彪的罪證分發到全國各主要軍事單位，特別是那些曾經在林彪指揮下的部隊，目的是讓曾效忠於他的人為保全自己而指控他。可以推測江青是批林批孔辦公室負責人。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林彪、孔子、孟子都被譴責，他們都是大男子主義。儘管只有孔子和孟子有此言論記載，但3人都被指責為反對婦女擁有權力。

對林彪死後的迫害還在繼續。江青的個人聲望在1974年秋和1975年春直綫上升（如同其他強權女人一樣）。縱觀中國歷史，做帝王的配偶可算是女性提升自己地位最快的手段。

4

在當代中國，對女性政治權利的看法正在發生微妙的，但

可以看得到的變化。過去的物質和文化遺存因當前的政治利益而被翻箱倒柜。所有博物館都陳列精心設計的政治展品。到古城西安的游客都被領到「半坡遺址」博物館。「半坡遺址」據說出於新石器時代，距今有6000多年歷史。它於1953年被發現，兩年後進行發掘，文革中修繕一新。這個「原始共產主義」社會被描述為母系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女人負責農業生產（經濟基礎），男人只做輔助的狩獵工作，孩子由女人撫養並隨母姓。漢字中的「姓」字就是由「女」和「生」兩部份組成。儘管中國有很長的父系社會歷史，「姓」這個字卻一直使用到今天。母系歷史在革命文化中的幸存實在像迷一般，但至少象徵性地彌補了「儒家」歷史上對婦女的排斥：不准參加宗族祭祀和國家公共事務。

年輕時的毛澤東崇拜歷史上起義的綠林好漢。晚年毛澤東研究政權建設，把秦始皇當作榜樣（秦始皇生於公元前3世紀，是中國最徹底的法家統治者）。2000年來，儒家一直稱其為暴君。這種看法在1975年發生了變化。一個署名「羅思鼎」的人（可能是毛的一個歷史學家）發表許多關於秦始皇的宏博而帶有爭議性的文章。儒家認為秦始皇是一位法家皇帝，在統一六國過程中異常殘酷。羅思鼎爭辯說秦始皇並不十分殘酷，沒有翦滅所有敵人（只有460位儒者被活埋）。後來敵人起來反對他，動搖了其繼承人的根基，最終導致漢朝的建立。羅思鼎小心地指出：雖然出身於農民，劉邦卻代表了地主利益，並繼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綫。

共產黨與歷史，特別是與法家思想的妥協並非不合乎情理。秦朝，大批民工被徵召去修建公共建築，包括著名的長城。共產黨則組織民眾參與國防設施建設（包括挖地道）、清理河床、修建橋梁、開挖隧道。兩者都斥責鬼怪、巫術、靈魂的存在，貶低過多的「書本知識」。出於對思想和知識份子的控制，毛澤東稱讚這位法家先驅的「焚書坑儒」，並通過文字和考古發掘對秦始皇重新評價。毛含蓄地提問：他的政權會像秦朝一樣短命（15

年），還是會更長久？

「領導人從不掩蓋和歪曲歷史」，江青說。然而，他們利用歷史獲取政治利益。江青同樣通過策略性解釋歷史來維護自己的歷史地位。在秦始皇負面形象扭轉的同時，儒家對女性統治者的鄙視受到挑戰。黨領導下的新研究成果表明：從漢朝開始，至少有 6 位皇帝遺孀參與朝政，其中幾位一直執政到小皇帝成人。在革命者看來，從秦到漢的更替，一位平民（即後來的呂后）發揮了重要作用。呂后年輕時是義軍首領，追隨劉邦一起反對儒家。劉邦稱帝後，她成為皇后。在丈夫和兒子死後，呂后繼承皇位。在8年統治期間，呂后用法家反擊儒家。當代歷史學家用這個例子決心為女性在歷史中的地位作新闡釋。

魯迅曾說過：「武則天成為皇帝後，誰還敢說『男尊女卑』」。12個世紀過去了，武則天仍然是官史、野史、傳說、甚至現代戲曲、影視不厭其煩的題材。1974年，武則天被統治者熱情稱頌，稱她是法家先驅。

武則天生於中產的地主家庭，14歲被選入唐太宗後宮做一名低級別的嬪妃。唐太宗死後，她隱居於尼姑庵，直到他的兒子——高宗把她接回宮去。鑒於武則天的文學才能，高宗請她出任朝廷官員。不到一年，高宗就離婚娶了武則天。皇帝的這一舉措觸怒了朝中的儒家大臣。他們傾向前皇后（一位顯赫貴族的女兒），鄙視出身卑微的武則天，稱其為「愛嫉妒」的女人，並把她和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嬪妃相提並論。攻擊她會招致「國家的災難」。「如果她當皇后，唐朝就會滅亡」，一位鄙視女性的儒家學者警告。

不顧這些可怕的預言，武則天放棄奢華的後宮生活，運用法家方式幫助高宗處理朝政。在高宗當政時期，她被尊為「女賢王」。反對者把她近50年的統治說成「專橫和輕佻的」，「實行嚴刑峻法」。但在武則天的共產主義崇拜者眼中：「她治理

家賞罰有度」；喜歡啓用出身寒微的地主，而不是大地主或舊貴族；通過科考和比武選賢任能；在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上引入法家思想。這就造成了保守勢力和進步階層的尖鋭對立。

高宗死後，武則天拒絕退隱，儒家大臣趁機發動叛亂，武則天徵召30萬大軍在15天內蕩平了叛亂。公元684年，武則天登上皇位，定國號為「周」，成為獨立特行的「神聖女皇」，唐朝政統一度中斷。黨的發言人表示，「女性登上皇位這一事實就是對孔孟學説的有力批判」。

共產黨當局認為，武則天的法家改革提升了婦女地位（儘管法家創始人不是女性）。武則天專為婦女制定了考試制度，讓通過考試的人也來參加宮廷宴會。雖然這一舉措並沒影響到農村勞動婦女，也未改變封建制度，但對那種「男尊女卑是國家主要制度」的觀點是有力駁斥。女性第一次可以升到五品或六品官階。在武則天統治的第二個10年，她開始沉淪於奢華，聽信佛教徒的欺騙（他們是武則天反對儒家的長期支持者），她的帝國開始衰落，儒家力量重新恢復。這樣一種從皇后到皇帝的嘗試，在毛死後重新上演。

5

「你最好拍一張水牛的照片，因為5年後就看不到了」，一個中國人在1975年秋對一個美國人這樣説。農業是中國的經濟基礎，70年代電力增長都用在農業機械化和工業化建設上，但這一進程在文革期間放慢了腳步。1975年1月，周恩來總理帶病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了最後一次政府工作報告。他宣佈：「到1980年，要建立一個獨立的、相對完整的工業經濟體系」，「到本世紀末，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

1975年秋，關於江青樣板戲的新聞已不新鮮，人們開始悄悄地把目光投向農業，這是一個她自土改以來就未曾直接參與的領

域。從文革開始，山西的「大寨」就受到全國矚目，被譽為「戰勝自然，自力更生進行農業生產的楷模」。同年9月，在「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式上，鄧小平和江青（不習慣，也不喜歡一同出現）向到會的3700名代表講話，强調「加强無產階級專政物質基礎」的必要性。近400萬人被召集去開荒種田。江青挽起袖子和「大寨」領導人——陳永貴（2年後進入政治局）一起，在鄧小平旁觀下開鑿水渠。這樣的破土儀式與古代帝王的春祭如出一轍。

外交事務一直由毛信任的高級官員主管，江青（和其他女性）似乎無權過問。但情況在1975年春起了變化，同年3月，江青發表了挑釁性的演講，涉及中國外交上的兩難處境。在外交事務上，江青是一個「門外漢」，必須「從零開始」，她來了。

只要我們追隨毛主席的正確路綫，我們就敢於毫不畏懼地與封鎖和威脅做鬥爭。在亂世中堅持革命原則。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最終目標是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在當前的政治時期，我們提出：「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抗爭」。

我們的外交重點應是那些黑人朋友、弱小和貧窮的朋友。他們會感激我們。我們可以沒有白皮膚的朋友、强大和富裕的朋友，我們決不會孤立。因為代表弱小者的聲音，我們才能重回聯合國，才擁有了偉大的力量。

她接着談到尼克松訪華（現代史上最出人意料的外交行動），並對國務卿基辛格提出嚴厲批評。在基辛格與中國人的會談中，他透露說：美國人準備「放棄」太平洋的亞洲地區。江青以中國人「一分為二」的觀點分析：

我們認為基辛格不可能脱離小資產階級政客的思想，階級利益決定了他的本質。他不能理解複雜國際局勢的全部矛盾。基辛格同其他歷史上的反動政客沒有不同。他只是一個冒險家和失敗主義

者。美國政府必須回到現實世界中來，不再干涉他國主權和利益。基辛格談到了勢力的均衡，説明他看到了矛盾的存在，但並不尋求在新的條件下解決。他想迴避對抗，這是一種鴕鳥政策。

江青承認：如何掌握控制海外華人行為的辦法，使他們遠離外國價值觀的腐蝕，無論對共產黨，還是對儒家來説都是個問題。在思想清洗階段（對林彪和孔子的批判），對外派出高級代表團是有風險的。當然，外交人員不會像國內的人一樣，「你不能在紐約和巴黎貼大使和（中國）外交部長的大字報。」

為了轉移話題，江青引用了一句古諺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國外的外交人員不應脱離黨的統一領導，特別是現在可以通過電報、電話、飛機進行快速聯繫。一些大使、參贊或貿易官員只談論生意，對政治事務並無興趣。他們對工作的熱忱令西方外交官和壟斷資本家自愧不如。一些駐中非和東非的大使館已有半年未曾進行政治學習，也沒有對當前運動提交報告。毛主席告訴他們：「要多請示，多匯報，不要怕麻煩，如果必要就經常回北京」。

6

將近1975年末，一連串政治人物的病逝加快了權力交接步伐。12月，江青的老朋友——情報頭子康生去世。新年過後只有8天，江青的另一個溫和支持者——周恩來死於癌症。鄧小平時隔10年後重新復出，代表病中周恩來處理內政外交事務，並出席一個多星期後的葬禮。葬禮通過衛星傳播到全世界，讓人們罕見而近距離地看見這些文革幸存者列隊出席。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面容憔悴，與前來作最後告別的新老領導人一一擁抱親吻。江青表情憂鬱，像在戰場上一般披掛而行。她和鄧穎超只是用手輕輕一握。

為總理葬禮的奔忙，是鄧小平在毛澤東時代最後的政治演

出。那年春天也見證了為江青的文化標準歡呼，純粹是功利的歡呼。鄧小平又一次被罷黜。在1976年3月「紅旗」上，江青的匿名發言人初瀾說：「對革命樣板戲的爭論，是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綫在文藝領域鬥爭的焦點」。抨擊「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全國性運動同時展開。

這一次，群眾分成不同的立場。1976年4月，傳統的清明節來臨，1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紀念周恩來總理。由於暴力、謾罵和焚毀汽車，造成1000多人被捕。黨中央通過媒體譴責這次示威是「反革命的」，是反對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同志的。一些悼念周恩來花圈上的口號反對女性統治者，包括英吉拉．甘地和慈禧太后，以此影射江青。一些涉及歷史的詩倍受關注：

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4月20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寫道：「他們（抗議詩人）譴責無產階級專政是秦始皇式的封建主義」。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判斷秦始皇是好還是壞。抗議者還在沿用過去的老調：秦始皇是一個暴君。難道他們忘記了，或不願承認，毛澤東對秦始皇的推崇，不就是因為他可以毫不猶豫地掃除腐朽的家長作風和陳腐習氣嗎？

中國人一直相信：天災是王朝衰落、政權更替的警示。1976年4月，一顆巨大的彗星墜落在吉林省，它是人們發現並保存的最大的一顆。七、八月間，3次地震光臨中國北部，北京大部份地區遭受破壞。臨近的工業城市——唐山幾乎夷為平地，幾百萬人無家可歸，露宿街頭。國外地震學家估計：有66萬5000人死亡，超過77萬5000人受傷，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二大地震。

除了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和災難作出的超自然暗示，中國媒體對事件輕描淡寫的處理也令人震驚。沒有死者受到哀悼，沒有死亡人數的公開，卻強調事物的光明面，要求人們「化悲痛為力

量」。小靳莊是江青的模範村，靠近受地震重創的天津市。那裏在震災期間是一片革命歌舞，報紙要求其他地方也照樣仿傚。

且不論這些革命浪漫主義，副主席華國鋒組織的救援工作是很出色的。「抗震救災」成了這一時期的口號。《人民日報》8月1日社論標題為「人定勝天」（這不是對宿命論的又一重拳嗎？）。

在7月地震緊張時期，朱德（和毛一起締造了紅軍）去世，終年90歲。毛澤東本人自1971年6月後就再沒公開露面。20餘年的宣傳讓毛成為歷史上最為人們熟知的人物。9月9日，毛澤東逝世。

哀悼活動持續了8天。電視播出的鏡頭要少於周恩來的。江青看起來很憔悴，披着黑色圍巾。她的花圈上寫道：「您的學生和戰友——江青」。與周恩來葬禮上的鄧穎超不同，江青並沒有扮演寡婦的角色，作為獨立的領袖的感覺長期存在。12月8日，全國默哀3分鐘，所有飛機、輪船和工廠停止運行。在幕後，權力的競爭者們為如何處理毛的遺體發生爭論，最後遺體被存放於紀念堂的水晶棺中。

華國鋒在鄧小平倒台後才開始在最高領導層中凸現。現在高大結實的華國鋒成了中國新的政治強人。人們對這位作風直率的山西人知之甚少。他於1955年在毛的老家湖南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1971年後，在北京為周恩來工作。沒有人預料到，在毛澤東死後不到一個月，華國鋒就接任國家主席，並兼任國務院總理、軍委主席、湖南省委書記、公安部部長。他沒有個人的教條，沒有像傳統領導人一樣發明新的口號；也沒有現代領導人的詭辯與俗氣。他證明自己是一個讓人捉摸不透的高明政治家。

10月中旬，華國鋒贏得了對媒體的控制，並使用媒體對他在10月7日繼承主席一職做了解釋。他還不失時機地禁錮了對手（預見到一場政變，或反政變）。10月16日，媒體報導了一個比毛去世更令人震驚的消息：「四人幫」被捕了，這些人曾是毛澤東最親密的信徒，他們是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江青被認為是「四人幫」的首腦。

江青10月6日被捕，她感到驚訝。她所在的黨宣佈她為「反革命」，儘管30年前就已被國民黨宣佈為「革命的共產黨人」，此後就幾乎被人遺忘。

10月16日那天，大批群眾走上上海街頭慶祝，人數超過「四人幫」得勢時期的文化大革命。從21日到24日，伴隨着官方廣播、禮花、雜技和鑼鼓，數百萬人游行在北京寬闊的大道上。毛澤東的衛隊——8341部隊到現場維護秩序。游行隊伍用傳達下來的激烈言辭歡慶「反黨集團」的倒台。

華國鋒突然的崛起是文革混亂局面的結果。沒有人遵守法律，主要的決策都來自於批准，甚至不清楚是誰的批准。如在1976年春，「黨中央」任命華國鋒為黨的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但「黨中央」可以是中央委員會，也可以是毛澤東，或是黨的領導集體。

華國鋒是自封的黨主席，是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還是毛生前所指定的？他如何獲得逮捕不可一世的江青的權力呢？

在毛的晚年，他的談話和語錄被解釋為權威的「最高指示」。10月25日，也就是華國鋒被宣佈為黨主席的第二天，《人民日報》、《紅旗》、《解放軍報》刊載了官方的解釋（不管是否經得住推敲），並在幾個月裏用其他「證據」佐證。1976年4月30日，毛澤東在一封給華國鋒的手令中（儘管其內容可能是讓華國鋒負責反對鄧小平的運動）寫道：「你辦事，我放心」。

對華國鋒競爭對手的中傷很快就開始了。第一個迹像就是引證所謂毛對江青及其小團體不悦的「歷史」。同時，大字報和其他媒體也開始詆毀江青及其「滔天罪行」的激烈評述。

華國鋒執政後，其前任對「四人幫」的評論被公之於眾：1974年7月17日，毛警告說：「要注意，不要讓自己成了四人幫」；12月24日，又說「不要搞幫派，要垮台的」。在同年11月和12月期間，籌備四屆人大之際，毛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想

讓王洪文做人大委員長，自己做中央委員會主席」。[91]在1975年5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强調：「要搞馬列主義，不要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為什麼你們要那麼做？」毛警告：「如果今年上半年不能解決，那就下半年解決；今年不行就明年；明年不行就後年」。

毛最堅定的捍衛者失去了對媒體的控制。江青用以肆意攻擊他人的言辭又被用到自己身上。用魯迅的話「要痛打落水狗」，她的敵人表示要和「四人幫」鬥爭到底。他們的表態對「旗手」魯迅來說是一個嘲弄。

江青對「中國人是『文明人』」的長期質疑何時變得如此有說服力？毛倡導思想革命化的成功何時變得毫無依據了？大字報再現了過去遺留下來的可恥做法。一些人要求「把江青碎屍萬段」——一種古代刑法，另一些人要求「火燒」姚文元，或用筆砸爛他的頭——筆被魯迅比作匕首，一些人展示這樣的畫像：「四人幫」伸長舌頭，張開血盆大口。

報紙和廣播無節制地譴責江青的罪行、她的私生活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江青被說成是「私生活混亂」的「娼妓」（沒有證據，儘管她的許多男同志——公開地和沒有政治風險地擁有自己的情人）。她總是對毛喋喋不休（毛曾以此打趣讚揚她）；在毛去世前 4 天，她還坐在毛的床邊打了幾小時撲克。一家湖南電台報導說：江青承認想成為另一個呂后或武則天，雖然她代表的階級更先進，卻無可奈何，因為呂后或武則天能拉攏到同盟者，她不能。從圖書館借關於女皇的書也被用來證明她的野心（誰敢指責毛澤東讀史書是為了個人掌權）。在毛臨終時，據說有人聽她說，「男人應讓位於女人。女人也可成為君主，在共產主義制度

---

91 1974年11月20日，我給江青寫了一封長信，請她澄清她在1972年所做報告中的一些內容，並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評論一下今後中外關係的發展。沒有收到回覆還是頭一次。第二年1月，何理良和在北京的黃華向我施加更大壓力，讓我寫毛澤東而不是江青的歷史（見前言）

下，也可以有女王」。

為了證明華國鋒從江青手中挽救了國家，新的黨中央繼續用毛的話：「毛主席去世前，曾非常嚴肅地給華國鋒講了劉邦故事：劉邦死前就已經覺察到呂后及其派系要叛國篡權。華國同志銘記毛主席的話，沒有辜負他的期望」。人們不滿地報導江青 2 年來對歷史上女皇的重新評價有個人野心，並把呂后刻成了法家人物。一張宣傳畫上：江青對着有關武則天的書沉思武則天不僅被認為是野心勃勃，也是不檢點的。

這是對江青同志應有的評價嗎？說她是「資本主義走狗」「典型的黨內資產階級代表」指的是什麼呢？又是一輪政治誹的開始？它們以前便被用在早已倒台的毛的同志身上——包括少奇、鄧小平和林彪。

江青被逮捕後，關於她的資產階級作風的報導鋪天蓋地「大寨」對她1976年9月的到訪描寫道：「江青聲稱自己是文藝命的旗手。隨身携帶的物品（除了馬桶）應有盡有，包括一卡的電影拷貝。每天夜裏都看進口的淫穢電影。為了爬一座只有百米遠的山，她先是騎了一會馬，接着改乘轎車。有幾十人在服務。每到一處，她都要留影，此項花去了3000多元。參加『寨』農業會議的唯一意圖是借機擴大她的個人影響。」

還有哪個曾與她密切聯繫的團體和個人願意追隨她的沒落江青的鄉村據點——小靳莊就是其中之一。1976年8月1日建軍時，江青仍掌握權力。當時媒體呼籲軍隊學習小靳莊經驗，建政治夜校、閱覽室和宣傳隊。響應者中引人注目的是防化連，青在文章中和私下裏都表示了對這支部隊的喜愛。華國鋒上台星期後，小靳莊馬上用老一套的措辭表達效忠。到11月底，小莊已經徹底站到了反對江青的立場。他們也曾向江青（現在稱為「壞蛋」）宣誓：「忠於」她和黨中央。在對小靳莊的視中，江青表現得像一個女皇。晚上，她會命令把牲口圈起來，

免打擾她的休息。

類似的報告說：江青睡覺（通常在上午）需要絕對安靜。頤和園附近的機場被禁止起降飛機，以免打擾她的休息。在海南，汽車在一英里外就被強制關閉發動機。當她在廣州別墅居住時，河運和船造廠都被暫停。在通往廣州蘭花園的路上，兩旁的樹葉都被清洗一新，迎接她的到來。

除了說她患神經衰弱症的政治寓意，對她個人歷史的惡意歪曲，顯得更滑稽可笑。我們的談話使我相信，她最害怕對其30年代演藝事業的調查。一篇著名的文章揭發她在演出《賽金花》和《狼山喋血記》時的「反革命」表現。劇本是為王明辯護和對國民黨表示同情。

另一些較少被指控的古怪做法和反復無常，從長期來說可能後果嚴重，因為都與毛澤東思想和國家歷史難以分割。她和她的支持者被認為濫用教條和迫害人民。「四人幫」損害了毛澤東思想，在人們思想中混淆了知識與實踐、物質與意識、領導與群眾、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革命與生產、民主與集中、自由與紀律的關係。總而言之，「他們混淆是非，破壞革命與生產。他們放棄馬列主義旗幟，破壞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推行極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

來自上級的指示、受迫害的感情和對尋求正確方向的無奈，通過「大寨」人表達了出來：這些惡棍讓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泛濫。無論人們做什麼，怎麼做，都會被指責大方向錯誤。他們總是讓你苦惱，因為做與不做都是錯。因此，最終我們將一無所獲。他們對建設社會主義的人恨之入骨。

華國鋒上台後，北京市長吳德對數百萬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群眾做了關於「四人幫」的報告：他們崇洋媚外，有不合法的對外關係， 進行公然的投降和叛國活動。這段話被在報紙上反復引用。另一個指控說江青是一個 「叛國者」。根據社論、廣播和

傳言，從1972到1973年，毛澤東對江青在沒有他本人和中央委員會批准的情況下（事實上有周恩來的批准和汪東興的協助）擅自與我會面表示震怒。他們聲稱，毛澤東批評江青出賣黨和國家機密，試圖建立自己的小集團。從那時起，毛澤東與江青分居。後就是毛澤東在1974年7月對江青搞「四人幫」的那段有名警告。

據報導，早在1976年10月，華國鋒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披露江青與我的會見如何激怒了主席，並在1975年秋（那時主席的憤怒第一次為國外所知）加劇了主席病情的惡化。根據記述，面對江青的無理取鬧，毛澤東對她說：「我已經80歲了，你還用這些事煩我，你還有沒有同情心？我很羨慕周恩來和他的妻子（和諧婚姻持續了50年）。」

當華國鋒强迫江青歸還部份她（被控）佔有和竄改的毛澤東的文件時[92]，江青在電話裏喊道：「毛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想把我攆出去。這就是你們回報毛主席提拔重用的方式嗎？」。華國鋒說：「我從未忘記毛主席的恩德。至於攆你出去，我沒有那個意思。在自己家裏生活，沒人敢讓你離開。」

12月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了毛澤東在1974年3月21日說的一段話，「彼此最好不要見面，你沒有聽從我這些年來對你講的話，再見面沒有什麼好處。你有馬克思列寧的書，也有我的書，但你就是不去研究它們。」

誰知道華國鋒和他的人是在書寫歷史，還是在篡改歷史？

對「四人幫」的清洗（他們與毛的關係比華國鋒要悠久得多）僅僅是一個開始。斯大林式的大逮捕和嚴厲懲罰可能會激起抵抗和內戰。華國鋒必須謹慎行事。那些與江青有私交和靠她起

92 汪東興扮演的角色很關鍵。除了作為毛的衛隊8341部隊（也負責保護江青，到汪加入反對她的一方）的首領，他同時也負責中央委員會辦公廳的事務，裏存放著許多毛的文件。據說毛死後不久，江青就來到辦公廳，說服一個秘把一些文件交給她。秘書照做了，但報告了汪東興，汪東興又轉告了華國鋒華國鋒勸說江青歸還文件，並說那兩人已被收買把這件事說成她奪權的證據。

家的人開始恐慌。他們曾效忠於她，並深信她是毛澤東意志的代表，現在誰會為他們仗義直言呢？

江青被軟禁後，幾個追隨者也被逮捕。他們是文化部長于會泳、乒乓球冠軍和國家体委主席莊則棟、清華大學革委會主任遲群、清華大學革委會副主任謝靜宜。11月底，儒雅的喬冠華（從1971年開始為毛澤東的中國在聯合國奔走）遭免職。喬冠華及其妻子章含之（也是一名外交官）被公開指控與江青有着「機會主義」的聯繫。

為了在文化領域保持穩定，華國鋒沒有立即批判和禁止樣板戲，而是見風使舵地把它說成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關懷下」創作的（沒有說明毛所扮演的角色）。自然，江青的參與（也未說明）被泛泛地抨擊了一通。不久，北京京劇院適時地譴責了「四人幫」：他們的罪行可以讓他們死一千次。他們利用文藝舞台創作邪說。他們是文藝舞台的邪惡力量」。

江青已經意識到25年來在電影審查上的高壓手段激起了眾怒。在新的領導人上台之前，沒人敢批評她。經歷了 8 年的創作萎縮，1974年上映了幾部呆板的說教式的影片，其中電影《決裂》（描寫對文革思想的貫徹）在國內外都受到大力推介。地方戲曲中也開始出現江青倡導的主題。半個世紀的革命進程讓中國的文化創作仍然貧瘠。江青在位時，鼓勵個人創作是不可能的。江青被捕幾天後，文革前拍攝、但在文革中被禁的影片開始在小範圍內放映，這被看作是改變的信號。當然，這個國家或保守或激進的藝術一直被以毛澤東的名義審查。毛澤東死後，江青及其派系被指責「在文藝領域搞法西斯專政」。中國會像斯大林死後的俄羅斯一樣「解凍」嗎？

林彪的死亡、周恩來的去世、毛的慢慢衰老就是江青的第11個小時。她能擺脱迫在眉睫的危機嗎？毛死後，華國鋒巧妙地戰勝了江青，使其政治前途毀於一旦。1976年12月25日，華國鋒

把「四人幫」定性為披着「左派」和「革命者」外衣的「極右份子」和「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他們對黨的挑戰是兩條路綫的第十一次鬥爭。他把1977年的主題定為「深入開展群眾運動，揭露和批判四人幫」。

7

中國也許是獨一無二的用歷史和藝術寓意來間接表達政治生活的國家。人們難道沒想到攻擊江青這樣一個專橫跋扈、充滿野心的最高領袖配偶，不就是對毛澤東（共和國締造者，同時認為自己是另一個秦始皇）的間接批評嗎？在毛澤東死後的幾星期裏，他的繼承者就編造了他與江青關係的破裂。這不就是對新政府投鼠忌器的證明嗎？

毛澤東在1966年寫給江青的信中說：他擔心反共份子會利用他的話奪取政權。但他們不會得逞，因為左翼力量會掀起「全國性的起義」。

10年後，毛澤東寫了一首詩給江青，那似乎是他最後的遺囑。江青的支持者在毛澤東在世時就已廣泛傳閱了這首詩。

毛澤東對她說：「你是被冤枉的。今天我們陰陽隔絕，彼此都可以安寧。這是我給你的最後幾句話。生命有涯，革命無涯。過去的十年，我努力攀登革命的頂鋒，但是沒有成功，你可以做到。但如果失敗了，就會落入無底深淵，粉身碎骨。」

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無疑是中共歷史上最具戲劇性和神秘性的人物。在權力頂峰時期，她被封為「文化革命的旗手」；在成為階下囚以後，她又被指為禍國殃民的「白骨精」。江青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誰為她提供了在中國政治舞台上表演的機會？又是誰縱容她在這個舞台的前沿盡情地表演十年之久？

關於江青一生的真相及其解讀，是二十世紀留給中國人的一個迷。1972年8月江青在北京、廣州，與維特克(Roxane Witke)談話10次，共60餘小時，希望維特克在美國為她寫傳記。江青在談話中不僅自吹自擂，而且大談中共視為高度機密的人與事。可以說，像這樣肆無忌憚披露內幕的談話，在毛澤東時代是絕無僅有的。周恩來知悉後請示毛澤東，封存了江青準備給維特克的全部材料。據說，毛澤東看完有關談話記錄後，十分氣憤，批示：「孤陋寡聞，愚昧無知，立即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

【記憶歷史】叢書

事後中共外交人員一再與維特克交涉，想用高價收買她的版權，使此書不能出版流傳，但遭拒絕。維特克依據自己的筆記寫成此書，1977年在美國出版，名為《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長久以來被人稱為《紅都女皇》。

此書客觀描述與分析了作者奇跡般見到的江青，既不盲目吹捧，也不蓄意貶低，為讀者提供了大量難得的第一手內幕資料。海外學術界普遍認為，這是一部有關這位文革時期最顯赫人物的嚴肅而又立場超然的力作。然而，因為某種難以確定的政治因素，此書出版近30年，一直沒有中文版。但此書在大陸無人不知，近年來還不斷被提及，出現許多以訛傳訛，胡編亂造的說法。相信中國讀者有興趣一睹此書的廬山真面目。我們特在文革發生40周年前將全書譯出，讓中國人有可能透過江青的故事更深入地認識那個但願永不重復的時代。



ISBN 988-98295-4-1

9 789889 829544

港幣 $120 台幣 $400

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
HINKERS PU

